

苏联共产党九十年

—— 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

● 沈志华 于沛等编著



● 当代中国出版社

85638

D351.23
7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

——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

● 沈志华 于沛等编著



责任编辑 陈德仁

封面设计 葛 杰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
——苏共历史大事实录
沈志华 于沛等编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3印张 20插页 8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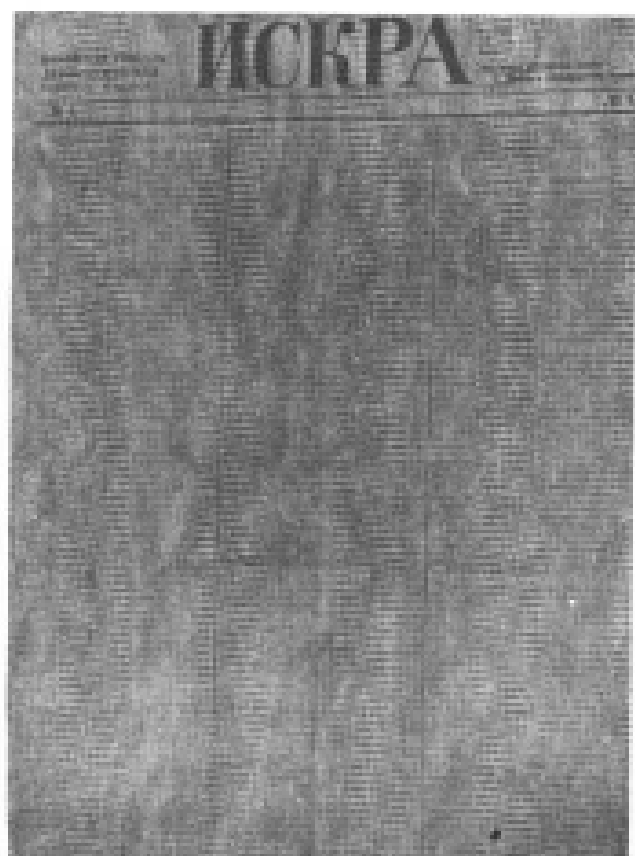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092-136-0/2.124

定价:30.00元(精装)



▲ 1897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从左至右）：В. В. 斯达尔科夫、Г. М. 克尔西沙诺夫斯基、А. П. 马尔琴科夫、В. И. 列宁、П. К. 扎巴罗谢奇、Ю. О. 马尔托夫、А. А. 巴尼耶夫。



◀ 1900年12月由列宁领导的第一个全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图为创刊号。



▲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等人在列宁墓观礼台上(1934年)。



◀ 共产国际七大会场(1935年)。



◀ 很有希望的联共(布)年青的领导人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至今仍是疑案。



◀ 苏军著名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1937年大清洗时被枪决。



▲ 勃列日涅夫（右二）和参加胜利阅兵式的将军们（1945年）。



▲ 波茨坦苏美英政府首脑会议（1945年7月）。

►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毛泽东、斯大林、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主席台上。



◀ 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参加斯大林葬礼(1953年3月)。

►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中)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在尼克松身后的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勃列日涅夫。





▲ 1967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上。



▲ 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会场（1976年2月）。



▲ 接替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尤·乌·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



▲ 接替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康·乌·契尔年科（1984年2月）。



▲ 1989年8.19事件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自左至右是：季贾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普戈、亚纳耶夫、巴克拉诺夫。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写在《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出版之前

沈志华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70年后，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成功地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执掌国家政权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

又过了70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剧变。短短两三年之间，东欧六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相继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权，最终导致曾领导了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庞大的苏

联共产党也在一夜之间悄然退出了世界政治舞台。难道共产主义又将重新成为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根本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了。当用烈士鲜血染红的镰刀铁锤国旗悲怆地落下的时候，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它给人们留下的却是需要冷静和深入地重新开始的思考。

(一)

正如本书所记录的，苏联共产党的成长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的。

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参加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定基础，到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从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着手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初步尝试，到1900年列宁创办《火星报》，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到1912年列宁主持的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清除孟什维克出党；从1915年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罢工运动和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到1917年“阿美乐尔”巡洋舰炮

击冬宫，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终于摆脱了党的领导分散于欧洲各地，甚至从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来领导革命的非法地位，一跃成为处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中的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年青的苏联共产党又经受了外国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叛乱和颠覆的血与火的洗礼；遭遇了大清洗、成千上万党的优秀干部被逮捕和秘密处决的重大损失；经历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大举入侵、300万党的优秀儿女献出生命的危难时刻。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历经了种种曲折而发展壮大，遭受了重重磨难而成熟起来。

随着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苏联共产党才进入了它辉煌历程的鼎盛时期：就其基础而言，成为占世界版图六分之一的最强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执政大党；就其力量而言，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的领导核心；就其影响而言，成为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由革命导师列宁和一批为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献身的职业革命家缔造的、具有93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一个拥有1900万党员、按其党纲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先锋队伍，这样一个志在领导人类历史前进、掌握国家政权达74年之

久的泱泱大党，竟然在一次突发的仅仅经历了 60 个小时的政治事件之后，便神话般地消失了！它最后给世界历史留下的是这样一个悲壮的背影——作为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权力的世界大党，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诞生，又第一个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那么，历史想要向人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

(二)

对历史过程进行粗略的观察，人们便不难发现，苏联共产党的解体和消失具有两个互相矛盾而又使人困惑的特征：

一方面，像是突然得了一场致命的暴病，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结带有突变性质。昨天人们还在指责苏联（当然是在苏共领导下）的扩张主义、“输出革命”，还在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是掩盖其争霸世界意图的策略性退却；今天人们便开始评论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在西方“输出资本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潜流中走向灭亡的。形势发展得太快，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主流派、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三大派别并公开论战；共产党外又出现 20 多个全苏性政党和 500 多个共和国一级的反对党；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设立总统制，从而使党中央政治局逐步失去权力决策中心的地位；苏联第三次人代会决定删去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文；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叶利钦、莫斯科

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等 20 多个党内重要人物相继宣布退党；广大普通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纷纷要求退党，人数累计达 400 万之多……所有这一切表明苏联共产党陷入全面危机的迹象都发生在 1990 年和 1991 年 8 月之前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即便是从波兰“团结工会”重返政治舞台而处于强有力的反对党地位算起，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走上断头台，进而到苏联发生短命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政权，“社会主义大家庭”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全过程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像是一个人到了老年而寿终正寝一样，苏联共产党是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抗争的情况下自行消亡和解散的。它既不像民主德国统一工人党那样，受到“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墙”开放的强大外部压力而导致中央政治局集体辞职，从而使党陷入绝境；也不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通过党内的斗争，自行对党“进行改革和改建”，在改变了党的纲领和性质后，以社会党的名称继续执政；更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那样，直接被国内的其他政治组织或反对党派取而代之。苏联共产党虽然也陷入了民族矛盾、经济危机、党内分裂等重重困境，但党内主流派及其代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党的机器一直在竭尽全力的自我调整中运作。恰恰是在“8.19”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政权失败后重新返回莫斯

科执掌政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地党组织自行决定各自的前途。而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活动并责成苏联检察院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的决议，不过是对已经既成的事实履行法律手续罢了，就如同它从前为执行苏共中央的决议而发布法令一样。同样可以说明“自行消亡”这一特征的现象是，苏共中央的解散，“非党化”在苏联的全面实施，苏共的办公场所、报纸、财产被查封和没收，捷尔任斯基、加里宁，以至列宁的塑像等苏共历史纪念物被纷纷拆除、捣毁……，这一切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间竟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反响，也没有造成任何激烈的社会动荡。除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表示出自己的不满和反对外，人们默默无言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苏联共产党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真是承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病的袭击，难道它就不能凭借执政 74 年的丰富经验和拥有 1900 万党员的雄厚基础自行调节带病的机体，实行自我完善和改造，从而度过这场大难吗？如果说苏联共产党真是气数已尽、命运使然，难道这可以用恩格斯和列宁这关于国家和政党“自行消亡”或“自行停止”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吗？这又是历史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

(三)

对于前面提到问题，不仅前苏联的人民会思索，而且

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会思索；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而且一些抱有严肃态度的西方政治家、史学家、理论家也会回答。这说明，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由此，地球上的各种宣传媒介、各色人等不断提出各自的见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位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的政治事变因“策划不周”、“缺乏经验”而夭折，从而引火烧身，招致了他们本想拯救的苏联共产党的败亡？

还是历史在验证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的那条规律：“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

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蓄谋已久，在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釜底抽薪、落井下石，将四面楚歌的苏联共产党推进了灭亡的深渊？

还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像希腊神话中的勇士伊阿宋那样，虽然获取了“金羊毛”，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地位，反而成为这场悲剧的不自觉的导演？

是如西方一些舆论界权威评论家和政府官员所称道的“共产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证实了某些政治家所信奉的“不战而胜”的预言？

还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决策失误，举措失当，使改革偏离了轨道，从而将苏联党和国家带上了走向消亡的绝路？

是因为苏联的改革要通过给民主和市场“让出半间房子”来挽救陷入重重危机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反被

自己从潘朵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魔鬼所吞噬？

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原理从根本上就是与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截然对立的，所以把实行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中心就是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掘坟墓？

是苏联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最终为广大民众所抛弃？

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几十年形成的传统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任何改革措施也无法为执政党的统治注入活力？

.....

或许还有许多解释，或许这些说法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表面的观察和直观的感觉，而是要回到历史中，通过仔细的摸索和冷静的思考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历史是深沉的，所以能够启示未来。

（四）

20 世纪末发生的这场苏联、东欧的剧变无疑是将对整个 21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产生巨大作用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内在含义的深度和外在影响的广度，也许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料得到的。

从纵向观察，回顾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苏联共产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说 191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推翻资

产阶级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旺发达,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相继建立的前奏,如果说 20 世纪初发生的被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称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十月革命,是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那么,1991 年出现的苏联共产党的消亡、苏联国家的解体,则同样是在苏联这块版图上发生的将对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国际关系以至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体制、战略方针、发展道路产生巨大作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又一个重大事件。“8.19”事件被世人命为“震撼世界的 60 小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毫不夸张的。从“震撼”到“震撼”,这不是历史在开玩笑,这背后是几代人血汗和奋斗的付出,誓言和理想的破灭,是现实留给人们的一连串的问号。

从横向观察,苏联(包括东欧)剧变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

其一,承受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解体的灾难性后果的,首先是苏联社会本身。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民族矛盾加深,宗教情绪高涨,内部争端蜂起,外部冲突不断。布热津斯基曾说过:“马克思称俄罗斯帝国为‘各民族的监狱’,斯大林把它变成‘各民族的火山’,现在各民族又把它变成‘激战的战场’。”领导国家 74 年的执政大党不复存在了,新生的独联体命运将会怎样?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能够长期在某种新式的国家框架中实现新的联合吗?

独联体各国将如何选择自己的国体和政体？它们有可能走上一条共同的道路吗？

其二，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的命运提出了挑战。“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但是，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之后，随着共产党和工人党离开执政地位甚至解散，各国纷纷在宪法、国名中去掉了“社会主义”的字样，乃至叶利钦公开宣称“共产主义体系在俄罗斯的垮台，在法律上得到了反映”。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一顶顶王冠目不暇接落地那样，苏联、东欧一面面社会主义的旗帜纷纷降了下来。难道社会主义又将回归于梦想？难道共产主义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进步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能够经受这个严重的挑战并战而胜之？

其三，历史同样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政治经济模式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提出了挑战。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夜之间分裂瓦解，原来意义上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模仿苏联设立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欧洲以外的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加入民族解放运动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必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那么，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否还能再次出现历史性的突破？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现代世界运动是否还会获得新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否还会恢复往昔的雄风在人类历史上重现光芒？

其四，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格局必将因为苏联的解体 and 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作为“第一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它的战略体系必将进行重大调整。当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汇聚到东欧和苏联时，美国便寻找到了把它变成自己“新边疆”的历史机会。但是东欧的嬗变和苏共、苏联的消失对美国来说并非一支和谐的乐章，它同时隐含着种种近忧远患：倘若因为“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而失去本身存在的前提条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分崩离析，美国就将彻底失去它战后借以控制西欧盟国的工具；倘若东欧出现“巴尔干化”，各国在军事上各行其事，甚至为利益之争而诉诸武力，“冷战”的冰块虽然终于在温暖的地中海中溶化，构成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热点”却又随之形成，美国也就难以把握住历史机遇，去编织它的“新边疆”了；倘若东西德统一后建立起一个“德意志第四帝国”，或者东西欧联合，出现一种“欧洲新秩序”，脱离出美国欧洲战略的轨道，美国就会失去它在欧洲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得不重新设计它的“伙伴关系”；倘若俄罗斯以开发其东部资源为目标向日本靠拢，而日俄又依赖于经济正在腾飞的广大中国市场，那么美国（包括欧洲）将要应付的就是在 21

世纪必然崛起的“大亚洲经济圈”。如此等等。显然，不同的势力组合，将会导致不同的世界格局，取代两大阵营对垒和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会是什么样的呢？

（五）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也指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索。因此，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对已经划了句号的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理性的探讨，以便找到正确的答案，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示。

基于以上目的，我们编著了这部《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也不可能立即作出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回答。痛定思痛，我们确实需要冷静下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如果这部书能勾勒出苏联共产党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做一点准备，我们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93年2月

目 录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写在《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出版之前·····	沈志华(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3年·····	(22)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	(172)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	(247)
苏联共产党——1952年·····	(437)
赫鲁晓夫时期(1953)·····	(442)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	(598)
安德罗波夫时期(1982)·····	(829)
契尔年科时期(1984)·····	(859)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	(868)
附录 苏共领导机构沿革和领导成员变化表·····	(1004)
参考书目·····	(1035)

后记

1898 年

3月1日——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举行。1日上午10时,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普·弗·鲁勉采夫的住宅里开幕,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工人报》社代表、崩得代表计9人出席了大会。斯·伊·拉德琴柯代表彼得堡,阿·阿·万诺夫斯基代表莫斯科,克·阿·彼特鲁谢维奇代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波·李·艾杰尔曼和尼·阿维格多尔契克代表《工人报》,巴·卢·土查普斯基代表基辅“斗争协会”和工人委员会,阿·约·克列美尔、阿·穆特尼克和什·卡茨代表崩得。

3天的代表大会举行了6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宣布党的成立,大会决定把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先后提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工人党”、“俄罗斯工人协会”等方案。为强调不应根据狭隘的民族特征来建党,大会一致同意用“俄国”代替“俄罗斯”。代表大会最后以5票对4票的多数确定党的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后起草党的宣言时,经两名中央委员同意又加进“工”字,即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选出由拉德琴柯、艾杰尔曼和克列美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和它在国外的代表。《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土查普斯基建议请普列汉诺夫起草党纲和关于党的成立的郑重声明。拉德琴柯则建议由彼得堡组织去进行这项

工作,他认为在彼得堡“做这件事能够避免在同国外打交道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困难”。大会采纳了拉德琴柯的建议,并决定“党的详细纲领待各地方委员会审查后予以公布”,还决定发表由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党的宣言。

代表大会还就工人政党如何对待民族问题、建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大会闭幕前,决定致信普列汉诺夫,祝贺他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出版 15 周年;同时还决定以参加代表大会的各组织的名义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纪念德国 1848 年革命 50 周年。

3 月 11 日——12 日 沙皇俄国警察袭击了欧俄 27 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约有 500 人被关进监狱。在基辅有 175 人被捕;莫斯科组织的大部分人被捕;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人报》印刷所被破坏,已印刷好的《工人报》第 3 号被毁。彼得堡、里加、维尔诺、华沙等地充满白色恐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遭到严重破坏,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度失去领导。

4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决议》共 11 条。首先宣布“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各组织、《工人报》以及“俄国与波兰的全欧工人协会”各团体,合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组织,唯有“俄国与波兰的全欧工人协会”系作为自治组织而加入党,但只在纯粹关系欧洲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有独立自主性。《决议》规定党的执行机关为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此外,《决议》还包括中央委员会及地方委员会的职责、党的经费、党的出版机关及在国外的代表机关等方面的内容。《决议》强调,对于那些特别重要而又可以延缓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必须提请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当问题不容拖延时,中央委员会可自行处理,但要向最近一次例行的或临时的党代表大会报告处理情况,《决议》最后宣布,党承认每一民族有自决权,《工人

报》为党的机关报。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参加大会的9名代表中有5人被捕。未被捕的中央委员拉德琴柯和克列美尔组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的撰写、出版和散发工作。《宣言》由司徒卢威撰写，拉德琴柯审阅后，于1898年4月用单页印发，6月的《工作者小报》第8期转载。《宣言》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承了俄国以前整个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但它所选择的却是不同于以往革命运动的道路和手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把自己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工人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俄国无产阶级的党将始终不渝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宣言》明确宣布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已健壮的肩膀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一步，但仅仅是第一步。”《宣言》还宣布：“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然后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1899年

1月30日 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最后两章和附录。同年3月26日至31日出版,署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第一版印数24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部著作从思想上完成了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列宁研究了俄国社会的发展之后作出了以下重要结论:俄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同农奴制残余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破坏俄国专制制度的基础;消灭这种制度的客观条件在国内日趋成熟;社会上各种革命力量正在形成;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人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得无可比拟;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他们的革命性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的上述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依据。《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了俄国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科学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可能而且必须起领导作用,同时揭露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及其对沙皇制度的依赖性,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既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不定期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日内瓦创刊。1902年2月停刊,共出版12期。这是“经济派”的杂志,由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伊万申任编辑。该杂志宣传伯恩斯坦主义,鼓吹经济斗争,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反对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4月——5月 维尔诺、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莫斯科、尼古

拉耶夫、彼得堡、波尔塔瓦、里加、顿河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为纪念“五一”印发了传单。维切布斯克、哥美尔、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克列缅楚格、敖德萨、萨拉托夫、斯摩棱斯克、托木斯克和切尔卡瑟等地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了“五一”罢工或工人集会。

7月10日——15日 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一些成员在马利乌波尔县组织尼科波尔工厂和俄罗斯普罗维丹斯冶金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8月20日——22日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叶尔马柯夫斯科耶村召集在米努辛斯克专区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在此之前，列宁已草拟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以反驳“经济派”的宣言——信条。列宁在《抗议书》中号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捍卫马克思主义，坚决同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机会主义思想体系作坚决斗争。出席会议的除列宁外，还有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德·弗·瓦涅耶娃、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恩·恩·帕宁、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阿·姆·斯塔尔科娃、亚·西·沙波瓦洛夫、奥·亚·恩格贝尔格，共17人。17名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通过了列宁写的《抗议书》，并在上面签了名。《抗议书》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社会民主党人指明了方向，即努力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抗议书》由列宁寄给国外的“劳动解放社”。1900年初，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供〈工人事业〉编辑部用的向导》文集中，转载了《抗议书》。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积极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

1900 年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办的秘密报纸《南方工人报》创刊号出版。报纸由俄国南方工人社出版,到1903年4月共出版了12期,在南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泛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所有单独的团体、小组后,该报随即停刊。

2月16日——20日 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住在安·伊·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处。在莫斯科期间,列宁同莫斯科、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商谈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并同他们就俄国革命的其他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月18日——19日 列宁在莫斯科安·伊·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的住所会见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南方工人报》的代表伊·克·拉拉杨茨,同他就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火星报》出版计划及党的其他活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谈话,在1899年,即流放的最后一年,列宁思考并制订了创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计划,作为这项计划的基础是设想在国外创办全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

3月——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哥美尔、顿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莫斯科、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的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明斯克“工人委员会”为迎接“五一”节,都印发了“五一”传单广泛散发。4月18日至5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在巴库、比亚威斯托克、维切布斯克、格罗德

诺、德尔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洛兹、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彼得堡、顿河罗斯托夫，第比利斯和哈尔科夫等地组织了“五一”集会和罢工。

5月1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的号召和领导下，哈尔科夫1万余名工人举行“五一”节游行示威。工人们提出实现8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等政治性要求，这是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性工人游行示威，标志着俄国工人已由经济罢工转入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

5月20日 列宁和马尔托夫在彼得堡被捕，5月31日列宁获释前往波多尔斯克，7月16日出国。

8月11日——15日，列宁和波特列索夫在靠近日内瓦的科尔斯耶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就出版《火星报》问题进行谈判。

9月27日——10月5日 列宁执笔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用单页出版，并运往俄国散发。声明说：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极端重要的历史关头，但是运动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是“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所谓手工业性质”，这将给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同时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稳固地存在”，“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声明》最后再次明确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业。”

12月11日 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在莱比锡出版。创刊号上发表了列宁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

国的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列宁在1900年1月结束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后立即着手创办《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创刊号后,随后几期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改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弗·伊·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从1901年春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火星报》对于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粉碎“经济派”、组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01 年

2月19日 在哈尔科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织大规模的工人和大学生们的政治性游行示威,以纪念1861年农奴制改革40周年,同时向基辅和彼得堡的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在此之前的1月11日,沙皇政府把基辅大学183名参加学潮的学生送去当兵。1月25日,沙皇政府又把参加抗议送基辅大学生当兵的28名彼得堡的大学生送去当兵,大学生激烈反对政府的决定,同警察发生了冲突。3月1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组织工人和大学生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反动政策。

3月10日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杂志《曙光》创刊号在斯图加特出版,该杂志由《火星报》主编,在斯图加特共出版了4期。除创刊号外,第2—3期合刊于1901年12月出版,第4期于1902年8月出版。《曙光》杂志内容广泛,包括国际生活的重大事件、俄国地方习俗和哲学、文学艺术等。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上述问题,特别强调揭露修正主义,并从俄国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列宁在《曙光》杂志上发表有《地方自治局的迫害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内政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重要文章。

4月17日 俄国社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在“五一”节前夕印发《告莫斯科男女工人宣言》。《宣言》中写道:“工人同志们!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晚上7点钟,排成齐心协力的、坚强的行列,到特维尔

集合吧，——我们要向刽子手们显示出坚忍不拔的决心，我们决心一直战斗到取得胜利。我们要叫他们看一看，我们并不害怕敌人由于绝望而疯狂起来的毒恨。我们兄弟们的无辜的鲜血，应当洒到、并且正在洒到暴君本人头上去。社会主义万岁！8小时工作日万岁！打倒可耻的专制制度！”

4月22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的决定，斯大林直接领导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五一”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在第比利斯的中心区士兵市场举行。示威者与沙皇政府的军警发生冲突，有14名工人受伤，50多人被捕，同年7月，《火星报》第6号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4月22日星期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是全高加索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这一天起，高加索开始了公开的革命运动。”

4月24日——5月1日 《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国外同盟的计划和同盟的初步章程；同时还讨论了“斗争社”为商讨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联合问题再次企图召开这些组织的代表预备会议的问题。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于4月29日以《火星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巴黎的“斗争社”，表示同意恢复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联合问题的谈判，并接受“斗争社”就联合问题召开预备会议的建议。

4月——5月 《火星报》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第比利斯、哈尔科夫等委员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基辅“工人意志社”，图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基辅、彼得堡、哈尔科夫大学生同乡会联合理事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都为纪念“五一”节印发了“五一”传单。1901年5月1日，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第一次按照全党的“五一”节传单提出的统一口号行动。这些口号是：为推翻专制制度、为8小时工作日、为社会主

义而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在华沙、维尔诺、哥美尔、德文斯克、基辅、辛费罗波尔、第比利斯和哈尔科夫组织了“五一”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鼓舞了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志。1901年的“五一”活动，开始把国际性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本国任务提出的要求结合起来。

5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动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大罢工。该厂有26名积极参加“五一”游行示威的工人被厂方开除。工人罢工，要求撤销这一无理决定，严惩虐待工人的厂主和工头，同时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把“五一”定为工厂的节日。沙皇政府派军警镇压，工人同军警展开搏斗，兵工厂的工人与附近工厂企业的工人计3000多人多次击退军警的进攻，史称“奥布霍夫防卫战”。经过激战，有800余名工人被捕，37人被提交法庭审判，被判处苦役或监禁。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新的激战》，帮助工人总结经验教训。他说：“政府胜利了。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必然会使它的最后失败更接近一步。”列宁还号召工人做好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同沙皇专制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5月13日——15日 《火星报》第4号发表了列宁撰写的社论《从何着手》，文章全面论述了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具体计划。不久，西伯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西伯利亚各地广泛散发；萨马拉、唐波夫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也出现了单行本。社论强调：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坚定有力的进行革命工作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应善于避免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时又要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以料到的地方和时间攻其不备。列宁在社论中还特别强调：为了克服革命运动中的散漫性和纯粹地方性，“为了把各地方的运动合成一个全俄的运动，第一步就应当是创办全俄的报纸。最后，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的报纸。在现代的欧洲，没有政治机关报，就不

可能有称得上政治运动的运动。”

5月15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领导了当地的基尔扬诺夫和卡拉施尼科夫机械厂翻砂工人的罢工。

6月 俄国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国外组织的代表、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崩得国外委员会以及“斗争社”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通过了原则协议草案，并决定召开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强调指出，各组织之间虽然存有意见分歧，但并不存在着妨碍它们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共同工作的原则的分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切身利益迫切要求把俄国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包括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紧密团结起来。”代表会议宣布，上述各组织合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委员会”，并以拥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

7月16日——25日 维尔诺和斯莫尔冈皮革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维尔诺委员会领导的，沙皇政府调集军队前来镇压。

7月 由弗·札·克茨霍维利发起，在巴库创办了《火星报》秘密印刷所。除印刷《火星报》外，还印刷《斗争报》及其他秘密小册子及传单。同月，经保加利亚往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瓦尔纳——敖德萨）开始发挥作用。这条秘密运输线是在保加利亚的革命者格·巴卡洛夫和伊·札古班斯基以及《火星报》代办员克·伊·札哈罗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9月21日——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的代表、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代表、崩得的代表和“斗争”集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

次会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争取使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实现统一的尝试。在此之前,上述各组织的代表 1901 年 6 月曾在日内瓦举行了预备代表会议。当时曾通过了《初步的协议》,认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并且强调必须揭露机会主义,但是,“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却违背了这个协议,继续散发宣扬机会主义观点的文章。因此,《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声明后便退出了会场。随后,《火星报》国外部便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列宁化名弗雷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对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表公开演讲。

9 月 格鲁吉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斗争报》开始在巴库出版。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弗·札·克茨霍维利、约·维·斯大林、亚·格·楚卢基泽等人。该报主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和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实践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宣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进行群众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该报还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斗争报》共出版了 4 期。1902 年 12 月出版第 4 期后停刊。

10 月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成立,这是由列宁发起的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参加同盟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和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盟还是《火星报》在国外的代表,出版《通报》和一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但 1903 年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阵地之一。

12月5日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组织了由大学生和工人参加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反动政策,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一些人受伤,约50人被捕。

1902 年

1月8日 《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近郊列宁的住所举行会议。列宁在会上发言批评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草案,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方案。1月8日至25日之间,列宁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新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以根据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草案制定统一的纲领草案。经过列宁的争取,在纲领草案中列入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列宁同时要求明确写出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列宁还亲自写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土地部分的说明。4月14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火星报》编辑部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由协商委员会作出的纲领草案定稿。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在罗斯托夫建立了“南俄矿工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该联合会联合了巴赫姆特、卢甘斯克、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谢尔比诺夫卡和尤佐夫卡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月,在叶利萨维特格勒召开了南俄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并宣布《南方工人报》为联合会的机关报。

1月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根据列宁的指示,在萨马拉召开各《火星报》组织的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由16人组成的《火星报》俄国组织的领导核心(中央委员会),并制定了它的工作条例。除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主要负责外,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和玛

·伊·乌里扬诺娃担任秘书，他们3人组成《火星报》俄国组织局。为尽快实现党的队伍的统一，这个组织的代表被派往全国各地开展工作。潘·尼·勒柏辛斯基被派往普斯科夫；格·伊·奥库洛娃被派往莫斯科；叶·瓦·巴拉姆津、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克·克·加津布什被派往伏尔加河流域；弗·威·林格尼克被派往基辅；德·伊·乌里扬诺夫被派往敖德萨，后又派去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伊·伊·拉德琴科和米·亚·西尔文没有固定地区，他们被称为“飞行代办员”，在各地巡视，加强各地区的联系。

2月6日——8日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叶利萨维特格勒、基辅、基什尼奥夫、莫斯科、敖德萨、彼得堡、波尔塔瓦、罗斯托夫和第比利斯等地，沙皇政府大批逮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成员和各《火星报》小组的成员。

3月3日 彼得堡工人和大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次活动是由“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大学生组织发起的。示威者同沙皇政府派出的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有近500人被捕。

3月5日——8日 《火星报》编辑部举行会议，对即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亚威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火星报》代表费·伊·唐恩作出指示。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认为，“不应当把各委员会的代表的这次大会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应当宣布为**非正式的代表会议**，并规定这个代表会议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是：组织和筹备在夏天召开真正的全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要批准党纲，要把每周出版的党的政治刊物完全安排妥善，在坚持原则、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真正为政治攻势做好战斗准备的基础上，一般做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委员会，甚至一切小组（印刷小组等等）真正地全部团结起来”。

3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组织罗特希尔德工厂

的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无理逮捕 32 名工人，警察前来镇压，又逮捕了 348 名工人，事件发生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在 3 月 9 日组织了巴统市工人大规模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沙皇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前来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同军警展开搏斗，有 15 人被打死，54 人受伤，500 余人被捕。

3 月 23 日——28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彼得堡委员会（经济派）、崩得中央委员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的联合会”（南方联合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以及《火星报》的代表。“经济派”和支持它的崩得分子企图宣布这次会议为党的代表大会。《火星报》代表在会上作了列宁准备的报告，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尚没有准备好，不能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并选出了该委员会的委员。但会后除一个委员外，其余委员均被捕。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新的组织委员会于同年 11 月成立。在新的委员会中，火星派占绝对多数。在列宁的领导下，组织委员会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

3 月 列宁的名著《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在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不仅是 1901 年和 1902 年《火星报》的策略和政策的总结，同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列宁认为，俄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必须明确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实行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列宁尖锐地批判了“经济主义”，他把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看成是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政党的必要条件。列宁特别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

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3月——5月 沃罗涅什省、库塔伊斯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等地相继发生农民骚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其他秘密组织在农民中广泛散发传单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沙皇政府派军警镇压了这些骚动。

4月14日——5月5日 巴库、华沙、维尔诺、德文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科夫诺、克列缅楚格、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萨拉托夫和索尔莫沃等地在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军队和警察展开了激烈搏斗,有几百名工人被捕。

4月23日 为团结和整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有效地把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团结在《火星报》周围,迎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写信给《火星报》俄国组织局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一点做好准备,就是说,使自己人完全能进入尽可能多的委员会……这是主要的任务,因为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掉:一切其他的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任务,要记住第二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为了‘主要的任务’,你们要加倍地小心。如果我们(就是说你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完全糟了。……因此,再说一次:务必参加委员会。”在列宁发出关于争取各委员会的指示后,到1903年初,《火星报》通过艰苦的工作,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地方组织都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同时将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各个委员会一个个地争取了过来。

5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小组发表声明,该小组将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并将同《火星报》团结一致。

5月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印发传单《告俄国公民书》,在工人中广泛散发。传单中写道:因刺杀西皮亚金大臣而被处

死的马尔马晓夫的鲜血“会擦亮无知庸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俄国专制制度难以描述的恐怖，使他们看清我们同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日益扩大或发展。农民已经纷纷起来帮助工人和为数不多的真诚的知识分子。……整整几个世纪以来，农民在那里为地主老爷干活；整整几个世纪以来，农民忍受压迫和贫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了。”传单号召：“再也不能奴隶般地忍受耻辱，再也不能任人宰割了！……只有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打倒暴君！……推翻专制制度！”

6月1日 《火星报》第21号发表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在列宁直接参加下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草案》针对自由派的实现“君主立宪”的要求，提出了共和国的口号，还提出了在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要求，以及其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刊有这个党纲草案的印刷品在彼得堡、第比利斯、基辅和伊尔库茨克广泛流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对《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个党纲草案和列宁的《怎么办》等重要著作，成为从思想上把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的牢固基础。

6月 彼得堡举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火星报》地方小组和“工人组织”的全市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支持《火星报》并根据《火星报》的组织原则改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决议。“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彼得堡《火星报》小组合并，建立了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8月2日 列宁和火星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俄国《火星报》组织的代表彼·阿·克拉西柯夫以及北方工人协会的代表弗·亚·诺斯科夫在伦敦举行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火星派为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建立组织委员会的统一行动计划，组成了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火星派核心。

10月 萨拉托夫建立了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这是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同“社会民主主义手工业联盟”以及已分裂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小组”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实行联合后建立的。

11月1日 南方工人社在《火星报》第27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观点一致。同月，《火星报》第28号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支持《火星报》原则的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也发出传单，声明承认《火星报》。

11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领导了罗斯托夫大罢工。这是俄国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总罢工。11月2日，罗斯托夫城弗拉基卡夫卡茨铁路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后，得到罗斯托夫其他工厂3万多工人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在罢工工人的集会上，宣传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将经济罢工转变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示威。该委员会在11月6日散发的《告全俄公民》的传单中指出，罗斯托夫的罢工运动是俄国工人要求政治自由的总高潮中的一次爆发。这次罢工坚持了三周后，被沙皇从外地调来的军队镇压，但它开辟了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的时期。列宁在《火星报》第29号发表的《新事件和旧问题》一文中指出：“罗斯托夫罢工表明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正在成熟，它已经不仅是革命者头脑和纲领中的思想，而且是必然的、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愤恨日益加深的结果，为了实行这一步骤，需要建立能够指导群众的真正的战斗组织。”

11月2日——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火星报》俄国组织和“南方工人社”代表在普斯科夫举行会议。会议建立了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柯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叶·雅·列文、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伊·伊·拉德琴柯和亚·米·斯托帕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面临着任何地方委员会，甚至任何区

的组织都不能胜任的重大任务,不论地方组织多么完善,它们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因为这项任务已经超出地方的范围。只有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成一支集中的、有纪律的队伍所产生的集体力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组织委员会成立不久,其成员伊·伊·拉德琴柯、潘·尼·勒柏辛斯基、弗·潘·克拉斯努哈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一些成员在11月4日至6日被捕,与此同时,彼得堡委员会在诺夫哥罗德的印刷厂也被沙皇政府破坏。

11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成员遭到大规模的搜查和逮捕。

12月1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在《火星报》第30号发表声明,宣布承认《火星报》,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1903 年

1月1日 《火星报》第31号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1902年11月印发的传单《告全俄公民》。这是为罗斯托夫大罢工而写的。传单驳斥了沙皇政府把工人描绘为“暴徒”的报道，揭露了军警对工人及其家属血腥镇压的事实。传单写道：“几天之内席卷俄国东南部的罢工风暴表明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显示了工人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团结和政治觉悟的威力……成千上万的工人，因亲眼所见而认清了专制制度的本来面目”，传单指出，这次罢工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号召工人继续采取革命行动回击沙皇政府的武装镇压，“把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专制制度判处死刑”，“打倒专制制度！”

1月 领导黑海舰队革命运动的委员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后来该委员会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同月，“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声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该联合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乌法工人委员会”脱离“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法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都发表声明，宣布承认《火星报》。

2月1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在《火星报》第34号发表公开信，表示完全同意《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所提出的党的纲领的原则部分和策略部分；完全同意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基本观点；

同时还表示承认《火星报》及《曙光》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关刊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 1900 年夏成立,由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里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和特维尔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组成。1901 年,协会与《火星报》建立了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协会改组为北方委员会,一直存在到 1905 年 7 月。

2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3 个委员会和小组在 1861 年 2 月 19 日农奴制改革纪念日到来时印发传单,号召通过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纪念这个日子。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和第比利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组织了游行示威和集会。在第比利斯,有 6000 余名工人在 2 月 23 日举行游行示威,同沙皇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有 150 多人被捕。

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火星报》提出的原则,承认《火星报》。3 月中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发表承认《火星报》的声明。3 月下旬,敖德萨委员会致信给《火星报》编辑部,表示承认《火星报》和《曙光》杂志。

3 月 1 日 《火星报》第 35 号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革命组”的号召书。号召书中写道:“军队和人民是骨肉相连的,军队不应该也不能够背离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军队不应该和制造镣铐的人站在一起,而应该和砸碎镣铐的人站在一起。人民同军队结成联盟,就能彻底铲除多少世纪以来的不公正现象,并给自己找到一条走向幸福的道路。”由此开始了在军队中的革命鼓动。在巴统、比亚威斯托克、布良斯克、伊尔库茨克、基辅、莫斯科、敖德萨、彼得堡、罗斯托夫、萨拉托夫等 27 个城市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当地的驻军进行了多种宣传工作,各类传单经常送到现役官兵和退伍回家的军人手中。

3 月 2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巴库和巴拉汉内组

织工人进行政治性游行示威。示威者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有 50 人被捕。同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在罗斯托夫组织工人进行政治性游行示威，一部分示威者遭到警察的逮捕和毒打。一些游行示威者被判处死刑。为抗议沙皇政府的无理判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在图拉组织第一次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22 名示威者被捕。

3 月 13 日 沙皇政府的警察镇压兹拉托乌斯特的工人罢工，虽然是经济罢工，仍有 69 人被打死，250 多人被打伤。3 月 15 日这一大屠杀被披露后，《火星报》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良斯克、伊尔库茨克、彼得堡、敖德萨、萨拉托夫等 14 个地方委员会都印发了兹拉托乌斯特工人被枪杀的传单，力图通过这个事件把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仇恨变成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自觉的斗争。

3 月 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部成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加入了该机构。同月，在第比利斯召开了高加索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决定将这些组织统一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委员会，同时选出了高加索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宣布承认《火星报》。

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建立。这个联盟是当月在第比利斯举行的高加索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和巴库委员会的倡议建立的。来自第比利斯、巴库、巴统、库塔伊斯和南高加索的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 15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出了由波·米·克努尼扬茨、菲·耶·马哈拉泽、约·维·斯大林、米·格·茨哈卡雅、亚·格·楚鲁启泽等 9 人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联盟委员会赞同列宁的《火星报》政治路线，通过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拟定的党纲草案，并决定派波·米·克努尼扬茨等 3 名代表出席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又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的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斗争报》创刊号出版。这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秘密报纸。参加报纸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邵武勉、楚鲁启泽等。在当时，它是除《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之以外，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该报经常从列宁的《火星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上转载各种文章。1904年12月3日，列宁写信给联盟委员会，答复请他为《无产阶级斗争报》撰稿的要求时说：“亲爱的同志们，我将尽力给你们写东西，并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编辑部的同志们。”1905年10月，该报第12期出版后被封闭，被迫停刊。

5月1日 巴库、巴拉汉内、华沙、基辅、库塔伊斯、索尔莫沃、第比利斯、托木斯克、阿斯特拉罕、巴统、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克罗德诺、刻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彼得堡、梁赞、萨马拉、萨拉托夫、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塔甘罗格、图拉、乌拉尔斯克、费奥多西亚等27个城市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和“五一”集会，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全国性统一行动。《火星报》的传单、筹备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传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30个地方委员会和团体的传单，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宣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五一”期间，在几个主要工业区散发了上千万张传单。

5月1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在《火星报》第40号发表声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同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木联合会的各社会民主党组织（辛费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刻赤、雅尔塔四个地区的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承认《火星报》的决议。

5月 格鲁吉亚西部各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在库塔伊斯召

开。这次代表会议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倡议下举行的。会上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塔伊斯委员会(为在工业区开展工作)和古里亚、依麦列梯亚农业工人委员会(为在农民中开展工作)。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塔伊斯委员会和依麦列梯亚农业工人委员会合并,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依麦列梯亚委员会。为便于在明格列里亚开展工作,该委员会于7月改组为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

7月1日——8月14日 巴库、巴统、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叶利萨维特格勒、刻赤、基辅、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第比利斯等高加索和俄国南部工业区的工人及南高加索的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和小组的领导下,罢工工人的斗争席卷整个俄国南部,开始了工人运动急剧高涨的新阶段。

7月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幕。由于比利时警察的迫害,后来移到伦敦继续举行,8月10日闭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26个组织的43名代表,他们有51票表决权(其中有8名代表各有2票),另有14名代表有发言权。代表中包括有坚定的火星派、不坚定的火星派、中派和主要由经济派分子和崩得分子组成的反火星派。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完成1898年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事实上没有完成的建党任务。

列入大会日程的有20个问题:1. 确定代表大会的组成,选举主席团,确定代表大会规程和议程,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和选举确定代表大会成分的委员会;2. 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3. 党纲;4. 党的中央机关报;5. 代表们的报告;6. 党的组织;7. 地区组织和民族组织;8. 党的各团体;9. 民族问题;10. 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11. “五一”节的庆祝活动;12. 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3. 游行示威和起义;14. 恐怖手段;15. 党的工作中的内部问题;

1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俄国各自由派的态度；18. 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 选举党总委员会；20. 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记录的公布程序以及被选出的负责人就职和机构成立的程序。开幕的当天，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斗争。列宁在会上做了 130 多次发言、批评和答辩。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批判了“经济派”和宣扬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的崩得分子，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纲领，纲领中还强调了工农联盟，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民族自决等方面的内容。在讨论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不坚定的火星派、中派和反火星派结成联盟，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提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工作就可以了。这一机会主义条文被强行通过。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反对列宁的人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还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但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这次代表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在俄国建立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认为，“从 1903 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

7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的各组织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确认了联合会支持《火星报》的纲领。8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发表支持《火星报》的声明。9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乌拉尔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0 月，《火星报》第 49 号报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利萨维特格勒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8 月 以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基辅成立，成员有德·伊·乌里扬诺夫、玛·伊

· 乌里扬诺娃、莉·米·克尼波维奇、费·瓦·古萨罗夫、罗·萨·捷姆列亚奇卡、列·波·克拉辛、玛·莫·埃森等，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央委员会内设组织组、技术组、财政军需组和军事组，后又成立执行委员会来协调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活动。莉·米·克尼波维奇任秘书。1904年初，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从基辅迁往莫斯科，同年春，叶·德·斯塔索娃代替莉·米·克尼波维奇任秘书。

9月2日——28日 沙皇政府在基辅、科诺托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索尔莫沃、乌法、费奥多西亚、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地大肆搜捕社会民主党人，大批人被捕。五个地下印刷所和一些秘密书库被查获。

9月9日 莫斯科70家印刷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在罢工者中间散发传单，反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379名工人被捕，1000多名工人被驱逐出莫斯科。

9月12日——15日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同唐恩谈判与少数派缔结协定的条件，但毫无结果。9月21日，列宁、普列汉诺夫、林格尼克再次尝试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反对派孟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由于反对派拒不让步，所以谈判仍毫无结果，在此之前，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已在日内瓦成立了秘密的反对派中心——少数派常务局。他们的纲领是通过夺取地方委员会的领导权，来影响中央机关，最终“改组中央政权”，进而取得在党中央机关的领导权。

10月13日——18日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应孟什维克的多次要求而召开的。他们想以这次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抗衡。列宁反对召开这次会议，他认为“现在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只会引起争吵，与事无补，就是说对国外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15名代表（共18票），孟什维克派代表18名

(共 22 票),既不倾向布尔什维克也不倾向孟什维克的代表 1 名(共 2 票)。大会的基本议程是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列宁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揭露。报告结束后,马尔托夫发言为孟什维克辩护,并攻击布尔什维克。他们反对将国外同盟置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而制订了自己的章程,把国外同盟变成不受中央委员会领导、并可独立地同各地方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派别斗争的主要中心。列宁及其拥护者林格尼克、普列汉诺夫等退出会场。由于这次代表在会拒绝履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宣布它是非法的。

10 月 18 日 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同盟成员举行会议。普列汉诺夫在会上提出同孟什维克“和解”,“结束党内的分裂状况”,“再也不能自相残杀了”,他要求把所有的旧编辑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否则他就要辞职。普列汉诺夫的突然转变令人大吃一惊。列宁坚决反对向孟什维克让步,因为这实际上是为反对派向党进攻扫清道路,是在否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普列汉诺夫在会后开始同马尔托夫等人谈判。孟什维克表示愿在布尔什维克放弃自己的立场后“和解”。普列汉诺夫同意了马尔托夫的要求。10 月 22 日,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时说:“……普列汉诺夫建议我们(同他一起!)在《火星报》上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争。不管怎样,列宁是被击败了。”

10 月 19 日 由于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并要求将原孟什维克编辑拉入《火星报》编辑部,列宁决定退出《火星报》编辑部。11 月 5 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寄去了他于 1903 年 10 月 19 日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并请他将这一声明在《火星报》上发表。11 月 13 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决议，擅自将孟什维克拉入了《火星报》编辑部。自第 52 号起，孟什维克将《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11 月 25 日，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第 53 号刊登了关于编辑部成员变动的通知。

10 月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第比利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所进行的分裂活动。11 月至 12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奥尔洛夫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北方委员会、中乌拉尔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图拉委员会、沃罗涅什“斗争基金会”和里加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都通过决议，拥护和赞成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坚决谴责孟什维克的派别活动。

11 月 6 日 列宁被补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1 月 16 日，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11 月 27 日，他写信给在国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建议尽快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1 月 7 日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 52 号上发表《不该这么办》，从理论上为自己的言行辩护。他认为“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不是一回事，应该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但不应同修正主义者“处处为敌”。为了“和平”，应该向孟什维克作出“爱好和平、温和与让步”的表示。文章还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做“集中制的空想家”，应宽恕那些破坏党的纪律的人。普列汉诺夫开始同孟什维克讲和，并变成了孟什维克。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是这样演变的：“(1) 1903 年 8 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 1903 年 11 月（《火星报》第 52 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 1903 年 12 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

11 月 12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4 名委员（列宁、

林格尼克、克尔H札诺夫斯基、加尔佩林)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上确定对孟什维克采取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即中央委员会向孟什维克提出最后通牒。通牒的基本要点,即中央向孟什维克作出让步的主要内容是:(1)补选4位前任编委到编辑部里去;(2)根据中央的选定补选两人参加中央;(3)恢复国外联盟中过去的情况;(4)让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一个席位。列宁强调,“要是不接受最后通牒,那就战斗到底。”孟什维克拒绝接受中央的最后通牒,走上了同中央委员会公开斗争的道路。党内危机进一步加深。

11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告》在《火星报》上刊出,以后又在俄国印成单行本。《通告》对代表大会做了简要的总结,谈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以及“贯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党章的通过情况。《通告》号召各个党组织为贯彻执行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为使党成为在原则上是坚定的,在组织上是团结的,能够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集体力量而顽强斗争。

12月18日——31日 沙皇政府在巴库、喀山、敖德萨、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等地大批逮捕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和顿河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1904 年

1月1日 沙皇政府在基辅搜捕社会民主党人,有近100人被捕,其中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安·伊·乌里扬诺娃、玛·伊·乌里扬诺娃、德·伊·乌里扬诺夫、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恩·弗·波诺马廖夫、弗·勃·叶拉金等人。

1月15日——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是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建议,为取得“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出版党的书刊的工作中步调一致”而召开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林格尼克、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出席了这次会议,列宁提议通过一项关于能够恢复党内和平并结束实际工作的混乱现象的措施的决议,但被总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否决。列宁还提出讨论召开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也被否定。总委员会在分裂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它允许《火星报》将自己的代办员派往各地方委员会,并越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将书刊运往俄国。在普列汉诺夫的倡议下,总委员会还同意将孟什维克补选进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表明,由于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克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变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会议结束后,列宁在1月18日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提出把争取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列斯克委员会在哥美尔成立,它是联合了哥美尔、新济布科夫和克林采三地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后成立

的。莫吉廖夫小组和罗姆内的小组后来也加入了该委员会，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批准原沃罗涅什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基金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

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通过决议，赞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通过谴责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方针的决议。2月中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中乌拉尔的乌法三地的委员会联合写信给新《火星报》，谴责它的机会主义方针，3月中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斯特拉罕委员会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谴责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方针。

2月7日 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署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条例》，《条例》规定图书馆小组由阿·伊·伊林娜、弗·弗·伊林、维·米·韦利奇金娜、潘·尼·奥林、尼·尼·札米亚京、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组成。图书馆正式命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库”。《条例》还规定，中央委员会不对图书馆小组承担任何金钱资助的义务，也不对其债务负责。中央委员会只能在党的经费情况良好时以一次贷款或从收入中提成的形式资助图书馆小组。1904年底或1905年初，在《创建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发起人小组的声明》中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将移交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2月15日 沙皇政府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萨拉托夫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分子。伊尔库茨克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2月18日，雅库茨克的政治流放犯举行暴动，沙皇政府用武力镇压，至3月7日结束，社会民主党人尤·马特拉霍夫被打死。2月24日

至 25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

2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在敖德萨成立，由瓦·瓦·沃罗夫斯基、伊·克·拉拉扬茨、康·奥·列维茨基和普·伊·库利亚布科组成。

3 月 5 日 《火星报》第 61 号刊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日俄战争爆发印发的由列宁起草的传单《告俄国无产阶级书》，这是列宁在日俄战争开始一个星期之后写的。列宁曾寄给俄国许多城市的党委员会，并指示立即将它翻印和散发。传单中写道：“对俄国工人和农民来说，战争预示着新的灾难、无数人的死亡、大批家庭的破产和新的苛捐重税”。“为了回击疯狂的战争叫嚣，为了回击钱袋的仆从们和警鞭的奴才们的‘爱国’示威，有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必须极其坚决地提出要求：‘打倒专制制度！’‘召开人民立宪会议！’”

3 月 26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通过决议：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做到在党内确立一个“良好的局面”，就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3 月底至 4 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 月 19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4 月——5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列斯克委员会印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传单——由列宁起草的“五一”节，传单中写道：“旧俄国快要死亡。代替它的将是一个自由的俄国。”“让我们用十倍的干劲来准备即将到来的决战！”“打倒罪恶的强盗般的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政府为防止“五一”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莫斯科、敖德萨、彼得堡、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和索尔莫沃等地对社会民主党

人进行了大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巴库、巴统、华沙、哥美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库尔斯克、库塔伊斯、明斯克、米塔瓦、莫斯科、波季、里加、第比利斯、图拉和恰图拉等地，仍组织工人“五一”示威游行或罢工。

5月6日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出版。克鲁普斯卡娅同年3月26日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个月底，列宁关于代表大会和党内形势的一本小册子即将脱稿。应该认为，这本小册子将会透彻地阐明多数派的立场，我甚至有一个希望，这本小册子多少会使目前盛行于党内的理论上的混乱现象得到消除。”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主要分析了以下两个问题：党划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意义；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基础。列宁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每个党员都要遵守严格的统一的党的纪律；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进一步，退两步》出版后立即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先进工人中广泛传播。莫斯科、彼得堡、基辅、里加、萨拉托夫、图拉、奥廖尔、乌法、彼尔姆、科斯特罗马等地的地方委员会都表示欢迎这部著作。中央委员会国外部认为这部著作有特殊意义，曾设法把此书寄往国外，孟什维克激烈反对这个著作所阐述的思想，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现在不能沉默》，批评列宁是“波拿巴主义”，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划清界限。

5月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此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5月初在第比利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拟定了争取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

亚联合委员会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发出一份声明,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

5月3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列宁、普列汉诺夫(主席)、诺斯科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出席。会议讨论了召开俄国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各党联席会议和即将召开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6月5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以下党内问题:(1)关于党的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召回驻党总委员会的代表的权利问题;(2)关于根据章程规定,补选地方委员会委员所需票数的的问题;(3)关于补选各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增补各委员会委员的权利问题;(4)关于各党组织就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表决的程序问题。由于总委员会5名委员中有3名委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反对派的代表,所以在以上最重要的问题上,党总委员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

6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号召地方委员会联合起来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7日——9日 加入“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各个小组(文达瓦小组、库尔泽姆小组、利巴瓦小组、里加小组和塔里森小组),在里加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了党章。

6月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尽快召开党的第三代表大会,并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

7月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捷姆利亚奇卡、波格丹诺夫、古谢夫等19人,后又有3人同意会议的决议,故称“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会议由列

宁主持并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告全党书》立即寄往俄国各委员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告全党书》中写道：“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经根本摧毁，党的严密的统一行动已经成为幻想。”“这种情况已经使人不能容忍，不能想象了；让这种情况继续拖延下去，简直就是犯罪。”“我们认为，结束危机的真正出路就是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能够澄清情况，解决冲突，把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召开代表大会，只会使党日趋瓦解。”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支持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定，要求立即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7月 维亚特卡、叶卡特林堡、下塔吉尔和乌法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下塔吉尔举行第一次乌拉尔区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维亚特卡省、奥伦堡省、彼尔姆省和乌法省的组织统一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拉尔区域委员会。

8月5日——18日 列宁写信给党发行处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建议采取各种措施迅速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同时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筹建“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社会民主党文献出版社”的声明。列宁在信中还催促邦契—布鲁耶维奇同日内瓦俄文合作印刷所订立出版布尔什维克书刊的合同。邦契—布鲁耶维奇负责出版社的所有技术性事务。党的著名理论家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和波格丹诺夫、勒柏辛斯基等参加了出版社的工作。自9月初起列宁、奥里明斯基和波格丹诺夫人的著作开始出版。

8月25日 《火星报》第72号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声明》，即“七月宣言”。这是调和派中央委员克拉辛、诺斯科夫和加尔彼林在1904年7月底背着正在瑞士山区休养的列宁，同时在罗·萨·捷姆利亚

奇缺席的情况下，以中央的名义通过的决议。《声明》号召同孟什维克和解，表明调和派已经公开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去了。调和派在这个声明中强调：普列汉诺夫补选的孟什维克《火星报》编委是合法的，有“不容争辩的合法性”。他们还将三个调和派柳比莫夫、卡尔波夫和杜勃洛文斯基补选为中央委员。《声明》还剥夺了列宁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利，并宣布检查他的著作，出版每一著作时“都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声明》禁止为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鼓动，并把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鼓动的中央南方局解散。列宁早在8月5日即得到《声明》文本，他立即写了抗议书交中央委员会，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他中央委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的，同时列宁还寄信给中央委员会各代办员和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委员，把调和派的行为提交全党审判。列宁还要求《火星报》不要刊登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声明，但《火星报》第72号仍刊出。列宁见孟什维克已控制了中央委员会，被迫宣布断绝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联系。

9月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在敖德萨召开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委托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参加者建立一个筹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构，同时谴责了《七月宣言》，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和巴库、巴统、古里亚、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和第比利斯等地的委员会，分别通过了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七月宣言》决议。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分别通过了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

10月 德尔斯克、华沙、库塔伊斯、里加、彼得堡、莫斯科和琴斯托霍夫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反战游行示威。塞瓦斯托波尔港

口修配厂的工人在 11 月 8 日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港口委员会的号召举行罢工,支持 11 月 3 日拉扎列夫兵营水兵的反战行动,同月,比亚威斯托克、华沙、洛兹、敖德萨、彼得堡、萨拉托夫和哈尔科夫也举行了由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反战示威游行。

12 月 13 日——31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领导了巴库 5 万名工人总罢工。工人们提出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和召集立宪会议,并高呼“打倒专制!”“打倒战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罢工是由巴拉汉内和比比—爱巴特两个油矿区的路特希尔德、诺贝尔、米尔佐也夫油矿的罢工开始的。12 月 14 日至 18 日,罢工扩展到巴库大多数企业,斯大林领导了这次大罢工。20 日,巴统路特希尔德工厂和曼塔舍夫工厂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巴库工人总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也组织了工人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巴库工人罢工。沙皇政府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在俄国历史上签定了第一个工人和工厂主的集体合同,其中包括有实行 9 小时工作制(假日前一天为 8 小时)等内容。

12 月 22 日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前进报》在日内瓦创刊。1905 年 5 月 5 日停刊,共出 18 号。列宁是《前进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编辑部成员是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编辑部的秘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出现了分裂,《火星报》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篡夺。列宁在筹备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党中央的同时,筹备并创办了《前时报》。《前进报》继承了原来的《火星报》的方针,同孟什维克把持的新《火星报》作斗争,并与俄国各地的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前时报》曾发表过 40 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一些重要文章常被布尔什维克地方报刊转载或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在专门的决议中指出,《前进报》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争取恢复党性的斗争中,在提出和阐明已

开始的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方面的卓越贡献，并向报纸的编辑部致谢。

1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区域代表会议在彼得堡附近的科尔皮诺举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和北方委员会。这次代表会议表示支持22个布尔什维克的告全党书。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成员曾在7月“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初步确定，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最后确定。他们是：弗·伊·列宁、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尼·利亚多夫、谢·伊·古谢夫、马·马·李维诺夫、彼·彼·鲁勉采夫。阿·伊·李可夫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也被选入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但他没有实际参加工作。

1905 年

1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就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一事,发出《告普梯洛夫工厂全体工人书》的传单,号召工人认清厂方的假面具,认清厂长米尔诺夫的本质,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传单中写道:“我们摆脱警察和官僚横暴下不能忍受的压迫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我们需要政治自由,我们需要罢工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我们要有自由的工人的报纸,我们要求人民的自治权(民主共和国)。”“当全体俄国工人阶级起来的时候……被刺刀包围起来的沙皇专制制度将化为灰烬”。传单最后强调: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不能让步,而且还应该提出新的要求来,同时向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呼吁,一道罢工,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

1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发出《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的传单。当时彼得堡委员会在工人们向沙皇请愿前夕,已得悉了计划中的请愿和请愿书的内容,认为这种请愿是无益的,号召工人积极准备起义。传单中写道:沙皇及其大公、近臣和各级官吏,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权势和他们现在富足的生活,不会放弃他们过去和现在从工人、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大量财富,要从沙皇那里等待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是要用鲜血去换取,自由是手执武器,在残酷的战斗中去赢得。”“不要去请求沙皇,也不要向他要求什么,不要在我们的死敌面前低首下心,而是要把他从皇位上撵下来,把他和他的全部专制制度的帮凶赶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自由。”传单最后重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历次发出的号召:打倒专制制度!

打倒战争！人民武装起义万岁！革命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的伟大兄弟般的联盟万岁！

1月9日 沙皇政府的军队在彼得堡开枪射击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死伤4600余人。彼得堡街头出现街垒，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自10日起，俄国各大工业中心发生群众性政治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抗议沙皇政府的暴行。在一些城市里，工人同军警发生冲突。12日，列宁写成《俄国革命的开始》，号召准备武装起义，文中写道：“工人阶级从国内战争得到了巨大教训；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数月几年都不能受到的”，“立即武装工人和全体公民，准备并组织革命力量打倒政府当局和政府机关——这就是一切革命者为了共同的打击能够并必须联合起来的实际基础。”

1月13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协助小组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党的多数派日内瓦俱乐部。为适应党内工作需要，俱乐部下设组织组、宣传组、鼓动组和技术组。3月5日，在组织组的会议上讨论了亚·马·埃森的关于主要在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中进行工作的报告。列宁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要求加紧准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月21日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彼得堡印发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的单页传单。《通知》介绍了党内状况，强调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必要性，同时阐述了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找出并实行这样一种总的策略，使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摧毁俄国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只要付出最少量的宝贵的鲜血，就能得到最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果”。这个《通知》2月15日转载在《前进报》第8号上，并发表了列宁所写的社论。社论中说：代表大会应由执行组织委员会职能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召集，这个组织委员会既然受多数派委员会的委托，不顾孟什维克的党总委员会和倒向它一边的调

和派的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而行动，它也就接收了中央委员会在召集代表大会方面的一切权利。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热烈支持。

1月29日 沙皇政府成立以参议员施德洛夫斯基主持的委员会，目的是要“刻不容缓地阐明圣彼得堡及其近郊工人不满的原因”，该委员会打算吸收一些由工人选出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沙皇政府企图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的阴谋，于是建议利用这个委员会的选举向沙皇政府提出政治性的要求，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后，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代表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并举行罢工。1月30日，彼得堡开始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同年2月20日，沙皇政府被迫下令解散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

2月8日 《前进报》第7号发表格·加邦的《给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公开信》。《火星报》第87号也刊登了这封信。信中提出，必须要有一个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反对沙皇制度的战斗协议。第7号《前进报》同时发表了由列宁撰写的社论《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答复了这封信。社论写道：“我们欢迎格·加·邦所说的正式‘协议’，因为只有保持每一个独立政党的原则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它们的战斗团结的尝试才不致无望，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地从事这种尝试，以免使毫无意义的不同类的结合损害了事业。”《火星报》只对《公开信》写了一则编辑部按语：“在这一号的社论中阐明了我们对信中所涉及到的问题的态度。”但在《分开走，一起打》的社论中，对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作出答复。后来查明，加邦是个奸细，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务。1906年3月，加邦在彼得堡郊外被工人处死。

2月28日 《前进报》第8号发表《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次定期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个通知是是列宁1904年12月写成后分寄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最后由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签署发表。《通知》中写道：已责成常务局“作为组织

委员会立即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定期代表大会”。《通知》号召所有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通知》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国外的或是国内的组织，特别的自认为是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工人组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定期代表大会。

2月 布尔什维克国外中央派 11 名党的干部回国，在以后的 3 个月中又派回 45 名。他们中包括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谢·伊·古谢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尼·利亚多夫等。这些人深入到地方党组织，充实这些党组织的力量，同时与列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通过吸收先进工人而迅速发展。

3月2日——6日 国外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成立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来自日内瓦小组、伯尔尼小组、柏林小组、巴黎小组、慕尼黑小组、莱比锡小组、苏黎世小组、夫赖堡小组、卡尔斯鲁厄小组。大会选举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并通过了国外组织的章程，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受代表大会委托，批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权利相当于一个合格的委员会，负有促进俄国革命运动和在国外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使命。国外各布尔什维克小组在印发传单，运送革命书刊，向俄国国内罢工者提供物质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在彼得堡签订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协议，并成立了由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谢·伊·古谢夫代表常务局，列·波·克拉辛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协议上签字。当天，以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名义通过了《告全党书》，通知所有党组织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以确定党的总策略和实现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告全党书》还规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代表名额。此后不久，组织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各地党组织去解释所达成

的协议,协助选出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

4月1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信中通知说,到4月4日止,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28个党组织中,已有21个党组织表示赞成召开代表大会。信中还谴责了总委员会反党的分裂主义路线,同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这封信最初以单页传单的形式发表,后来转载在第16号《前进报》上。

4月11日 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某些组织代表资格的几项决定草案,关于高加索代表团问题,会议认为“把高加索代表团拥有的8票算在代表大会的表决票数中是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关于克列缅楚格委员会是否合格的问题,鉴于克列缅楚格委员会是直到1904年8月才被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在《火星报》第89号公布的党总委员会的名单中,33个合格组织中没有克列缅楚格委员会,组委会作出决定:不把克列缅楚格委员会计算在本届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的合格组织之列,关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问题,会议认为,“无论从形式方面来讲,还是从继承性以及同当地工人的联系方面来讲,组织委员会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现在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不如少数派委员会合法。”但因组委会无法听取另一方的申诉,故决定对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多数派委员会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不作决定,而将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解决。关于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是否合格的问题,组委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中央委员会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认为这两个委员会不能被认为是合格的,因为在1904年总委员会五月会议上,这两个委员会未列入那些被批准到1905年4月1日生效的委员会名单中。中央委员会认为,既然这两个委员会已列入显然是以党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火星报》的名单里,那就应该认为是

合格的。4月12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组委会委员列·波·克拉辛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宣布了上述决定。

4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27日闭幕。代表大会是由布尔什维克筹备举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列宁领导下举行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24名有表决权，14名有发言权。2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总共代表以下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彼得堡、莫斯科、特维尔、里加、北方、下诺夫哥罗德、乌拉尔、萨马拉、萨拉托夫、高加索联盟（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第比利斯委员会）、沃罗涅什、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波列斯克、西北、库尔斯克、奥廖尔。

在俄国革命不断走向高潮的情况下，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俄国革命中一些根本问题，确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各项任务，制定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变革前夕对待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及其他问题。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发言。

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即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在斗争中应同农民结成联盟，孤立资产阶级，为争取革命的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

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工农民主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代表大会把组织武装起义的任务作为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提了出来。

代表大会还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取消了党的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体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孟什维克是“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由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手中，并执行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4月27日，列宁被任命为该报的主编。

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统一领导核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谢·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4月27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列宁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驻国外代表。中央委员之间进行了分工，并规定了联络暗号、密码等，还具体研究了技术问题、运输问题、财政问题。

4月1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草案。经过讨论，通过了如下议程：一、策略问题：（1）武装起义。（2）在变革前夕和变革时期对政府政策的态度。（3）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二、组织问题：（4）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5）党章。三、对其他政党和派别的态度：（6）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7）对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态度。（8）对自由派的态度。（9）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四、党的

生活的内部问题：(10)宣传和鼓动。五、代表们的报告：(1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2)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六、选举：(13)选举。(14)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记录的宣布程序和负责人就职的程序。

5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小组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五一”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近200个城市中有22万工人举行了罢工，成为新的革命高涨的开端。这次罢工运动的明显特点是政治罢工的比重增加了，如果说3月份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还达不到罢工总人数的30%，那么在“五一”前后就已达到50%至75%。

5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任命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的代表。但前提条件是，普列汉诺夫应遵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普列汉诺夫拒绝接受这个条件，这次任命被迫取消。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

5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信给党的所有委员会，通知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全会作出的各项决议，以及筹备出版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及定期小报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号召加强全党的团结，信中写道：“同志们，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让我们同心协力地为组织我们的党而努力工作吧！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地方党组织一致拥护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5月12日——7月22日 俄国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举行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有7万纺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并使之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参加罢工的各工厂选出代表同资本家进行谈判。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5月13日至15日建立了“全权代表会议”，并从5月15日起经常召开“全权代表会议”，使之成为事实上的俄国第一个全市性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出席这个会

议的有 128 名男工和 23 名女工,1/3 以上是布尔什维克。自 5 月 23 日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开始出版关于罢工进行情况的简讯,还印发了传单及宣传品,在罢工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于 6 月底召开各小组代表会议,原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被批准为委员会,党员总人数由 5 月初的 400 多人发展到 600 人。

5 月 14 日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无产者报》第 1 号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 年 11 月列宁回俄国后,《无产者报》停刊,到 11 月 12 日共出刊 26 号。列宁为该报写了 50 多篇论文和短评。除列宁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第 25 和 26 号是由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辑出版的,该报继续执行了旧《火星报》的路线,保持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传统。《无产者报》第 1 号刊载了列宁撰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和代表大会的各项重要决议,《通告》中指出:“在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后,我们就会因此而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一大步,我们将把反动的军事强国这个沉重的枷锁从整个欧洲扔出去,使我们的弟兄、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更迅速、更坚决、更勇敢地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受尽折磨,现在看到俄国革命的成就而精神焕发。而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下,我们不仅能捍卫住民主共和国,而且必定能一日千里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5 月 5 日——7 日 俄国各地党组织开始广泛宣传、贯彻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5 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赞同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同时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在各区组织配备有火器的战斗队”。会后,与会代表分散到基层组织和工厂中宣传党的代表会的决议。6

月5日,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人大会表示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路线。6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各小组召开代表会议,赞同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北委员会听取了中央委员波斯托洛夫斯基的报告后,表示拥护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执行新党章,承认代表大会是合法的。高加索联合委员会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7月号刊登了代表大会的主要文献材料。该报还报道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库、第比利斯、库塔伊斯和恰图拉党组织中作报告的情况,文中写道:“各地党的工作者都非常认真地听了代表们的报告,并且一致表示,要为实现完全合法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展开鼓动工作。”7月30日,南俄布尔什维克组织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在基辅召开会议,会议贯彻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加强了党的团结,同时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关于对工会的态度,关于同自由资产阶级想把工人运动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企图作斗争等决议,还拟定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措施。此外,乌克兰、乌拉尔、南乌拉尔、喀山等地的党的委员会或党的小组也都积极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并表示要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遵循新的党章。

6月9日 俄国纺织中心洛兹爆发武装起义。5月15日,工人将被哥萨克打死的工人举行的葬礼变成强大的政治示威。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洛兹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示威游行,工人们在行进中高呼“革命万岁!”“打倒沙皇政府!”罢工很快波及到洛兹市其他企业。洛兹社会民主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向波兰社会党提出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建议,被拒绝。6月10日,洛兹市布满街垒,工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武装斗争,一直持续了3天,死伤2000余人。7月3日,《无产者报》发表列宁撰写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

滕》。文中指出：“洛兹的无产阶级向我们表明革命热情和英勇精神的新范例，而且还提供了斗争的高级形式。……新的武装战斗日益明显地表示出人民与沙皇制度武装力量的武装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6月1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快报》第一期出版。它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工具之一。第一期刊有《党内情况》和《我们党当前的策略任务》两篇文章，此外，《快报》还发表有关党的建设问题、组织宣传鼓动问题，以及党在革命中策略问题等。同年9月，《快报》出版4期后停刊。

6月14日 俄国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爆发水兵起义。布尔什维克亚·米·彼得罗夫、格·尼·瓦库连丘克参加的“塞瓦斯托波尔水兵委员会”原拟秋天在黑海舰队中举行起义。15日，飘着红旗的铁甲舰驶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屡遭逮捕，力量大大削弱；控制敖德萨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没有支援起义者。6月17日，布尔什维克国外中央从日内瓦写信给设在萨马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东方局，指出这次起义可能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起义，并建议同敖德萨取得联系，采取一切办法支持起义。列宁同时派米·伊·瓦西里耶夫一尤任去敖德萨领导起义。但因警察截获国外中央来信，使这些没能实现。6月19日，“波将金公爵”号驶离敖德萨，25日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列宁指出，这次起义是沙皇军队的一支重要力量破天荒第一次公开转向革命。是“一次组织革命军队核心的试举”。“波将金公爵”号的起义，开创了在海军和陆军中举行军事起义的新时期。

7月27日 《无产者报》第11号发表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出版的消息，该书写作于本年的6—7月。7月13日写完了该书的序言。列宁曾把这部著作的题目定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会议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

命斗争中的基本政策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于对待农民的态度、关于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的方法、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争取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等。列宁在书中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该书7月底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很快秘密传布于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喀山、第比利斯、巴库等城市。1907年2月，彼得堡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下令查禁此书。同年12月，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将此书销毁。

7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郊区组织建立。它联合了谢尔普霍夫、叶哥里也夫斯克、科洛姆纳、奥列霍沃-祖耶沃、博哥罗茨克和基姆雷各社会民主党小组。郊区组织制订了《工作细则》，其中明确规定了工厂和农村如何进行工作。郊区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布委员会下属的土地小组都积极建立县的和农村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列宁在《无产者报》第16号(1905.9.1)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指出：“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到处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同。”

8月6日 沙皇政府批准了选举国家杜马的宣言和条例，这届杜马根据法案起草人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名字叫作布里根杜马。杜马是讨论法律草案的代议机构。一切决议都需呈交国家参议院，经沙皇政府官吏审批，最后决定权属于沙皇。地主和大资产者享有选举权。工人农民和妇女、军人学生均被剥夺了选举权。布尔维克坚决抵制布里根杜马。《无产者报》第12号发表列宁的文章《抵制布里根杜马和

起义》。文中要求用“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积极抵制”，同时还要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右翼的背叛行为；还要展开最广泛的宣传，宣传武装起义，号召立即组织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印发传单《告工人和农民书》，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准备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科斯特罗马、图拉、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喀山、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叶卡特林堡、萨马拉、萨拉托夫、维亚特卡、彼尔姆等地的委员会、西北联合会、索尔莫沃组织和坦波夫小组印发传单，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大力宣传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等主张，揭露沙皇政府8月6日宣言的实质。

9月7日——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制订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召集俄国国内的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里加举行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乌克兰革命党的代表以及不具备应有的全权的组织委员会的代表。代表会议认为正在召开的杜马是“一种拙劣的人民代表机关伪造品”，因此代表会议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参加杜马的路线，并号召“社会上所有真正的民主分子”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抵制杜马的口号受到广泛拥护。社会革命党人和以“协会联合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左翼都表示抵制杜马，只有孟什维克表示不同意代表会议的决议。

9月19日 莫斯科印刷工人开始罢工。面包、烟草、木器、电车各行业的工人继印刷工人之后，也举行了罢工。9月24日，群众举行大型集会时同哥萨克发生冲突，当场有1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自26日起，五金工人参加了斗争，各行业的工人随着罢工规模的扩大，开始成立相应的生产部门的代表苏维埃。10月6日，喀山、雅罗

斯拉夫里和库尔斯克铁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会议决定开始罢工。10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管理局及整个铁路线的工人和职员首先举行了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宣布举行铁路总罢工,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的开端。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代表会议决定从10月11日开始政治总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在一份传单中发出“要用强有力的最后进攻去摧毁专制制度的堡垒”的号召,同时提出“总罢工万岁!全民起义万岁!”等口号。10月13日,列宁在日内瓦写毕《全俄政治罢工》(10月18日在《无产者报》第23号发表)一文。文中写道:“起义日益接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地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死亡前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地没有做到我们为了最后胜利而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政治总罢工开始不久,罢工便波及到莫斯科几乎所有的企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援莫斯科的罢工。彼得堡市的罢工也很快发展成总罢工,并迅速扩展到整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各地及时成立了联合罢工委员会,加强同其他革命的联系,俄国很快出现了全国性的罢工运动,5天内有200万人参加了罢工,并在罢工中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质。

10月13日 彼得堡各工厂举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成立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当夜举行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彼得堡组织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并都有发言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遣亚·亚·波格丹诺夫、德·谢·波斯托洛夫斯基参加苏维埃,在特别重要的场合,列宁在苏维埃中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列·波·克拉辛、彼得堡委员会波·米·克努尼扬茨和彼·阿·克

拉西柯夫在苏维埃执委会中起有重要作用,但布尔什维克并没能在苏维埃中有决定性的广泛影响,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着领导地位。

10月17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签发《宣言》,答应“赐予”人民以言论、结社、集会、信仰和人身不可侵犯等自由;并答应召开由全体公民参加选举的立法杜马;宣布今后不经过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告俄国人民书》揭露沙皇《宣言》的虚伪。声明中说:人民需要的不是纸上的诺言,而是真正可靠的保证:迅速武装人民,解除各地的戒严状态并从那里撤退军队,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废除等级制度,实行8小时工作制,立即对全部政治犯实行大赦。《声明》表示:“必须争取这些保证,得不到这些保证,斗争就要一直进行下去!”其他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团体都响应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起而揭露沙皇的《宣言》,号召继续进行斗争。10月19日,列宁针对沙皇10月17日宣言撰写《革命的第一个胜利》,作为《无产者报》第24号的社论,于10月25日发表。文中写道:“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

10月18日 刚从监狱中释放出的布尔什维克著名活动家尼·厄·鲍曼在莫斯科死于黑帮分子之手。在莫斯科,为鲍曼送葬的工人和大学生队伍变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沙皇政府向工人和大学生开枪射击,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奥·姆·根基娜和费·阿·阿法纳西耶夫也惨遭杀害。

10月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第比利斯委员会以

传单的形式发表《告全体工人书》。传单中写道：俄国的革命人民已经起来了，包围了沙皇政府，并要向它冲击。俄国无产者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推翻沙皇杜马，要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应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行真正的武装并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彻底粉碎隐藏的黑暗势力，建立民主共和国。告工人书最后重申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口号：打倒国家杜马！武装起义万岁！革命军队万岁！临时革命政府万岁！全民立宪会议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无产阶级万岁！

10月26日——27日 喀琅施塔特爆发士兵和水兵起义，遭沙皇政府镇压。彼得堡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沙皇政府的暴行。俄国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单独的罢工可能影响决战前夕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只号召准备向“已被摧毁一半的君主制堡垒”作最后冲击，积极准备起义。但实际形势表明发动起义为时尚早，11月1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从2日起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口号是“废除战地法庭！”“废除死刑！”“取消波兰和全俄的戒严状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发了两个传单《告士兵和水兵书》、《告彼得堡全体工人书》，坚决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号召士兵不要向工人开枪。沙皇政府在不断高涨的罢工运动的冲击下，被迫取消战地法庭审讯。11月7日罢工结束。

10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全体党的工作人员的信》，说明国内新的政治形势和改组党的工作的必要性，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提出在保存秘密机关的同时，要尽量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建立一些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组织的任务；必须并且首先从工人中吸收尽可能多的新党员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中来；在党的组织中实行选举制。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市、区党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西北联合会、高加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上，都讨论了关于改组工作的问题，赞同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此

后,各党组织着手选举支部以上的党的机构,很快产生了一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厂支部。

10月27日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公开的报纸《新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11月初,该报从第9号起在列宁的领导下出版。至12月3日被沙皇政府查封,被迫停刊。《新生活报》在此期间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的经常撰稿人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阿·马·高尔基也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给该报物质上很大的帮助。11月初,列宁为《新生活报》撰写了《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给编辑部的信)》,第一次探讨了关于苏维埃的问题,列宁认为苏维埃应当团结一切多少有些影响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社会民主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领导革命的中心,警告党不要在苏维埃问题上犯宗派主义的错误。

11月6日——10日 全俄农民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布尔什维克虽然看到农民协会的错误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为了加强工农联盟,帮助农民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政策的影响。代表大会决定:如果关于将全部土地转变为人民共同的财产的要求得不到实现,便举行农业罢工;关于武装起义问题,57名发言代表中有30人反对,12人直接号召进行武装斗争,15人认为应根据农业罢工成败决定是否举行起义。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强调:“如果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会使我们的国家出现大动乱,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全民起义,农民已经忍无可忍。”

11月20日 第二次全俄孟什维克员会代表会议在彼得堡召开。会议认为必须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部分的统一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关于组委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合并以及创立共同的出版物的决议。在讨论党员资格问题时,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党章的第一条条文。

同月，高加索第一个公开的布尔什维克日报《高加索工人小报》在第比利斯用俄文出版。斯大林和邵武勉主持编辑部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承认该报为高加索联盟正式机关报。该报只出了17期，于12月14日停刊。最后两期曾改名用《叶里萨维特波里通报》出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第比利斯，1905年11月20日》（斯大林执笔，当时没署名）。文章强调：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城市革命无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革命农民，不顾自由派的任何诡计，总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斗争的，他们不到完全推翻专制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自由民主共和国时，是决不罢休的。”

11月21日——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图拉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雅罗斯拉夫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和弗拉基米尔郊区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

11月26日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格·斯·赫鲁斯塔寥夫—诺萨尔被沙皇政府逮捕。当天举行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马尔托夫等人出席。会议决定继续动员力量，准备武装起义，回击沙皇政府的挑衅。27日，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列·达·托洛茨基、德·费·斯维尔奇科夫和普·阿·兹雷德涅夫3人组成临时主席团。

12月2日 在农民协会的倡议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彼得堡苏维埃，以及其他革命政党与组织的领导联合发布《财政宣言》，号召居民不纳赋税；从银行取出存款并必须用金币支付；不允许沙皇政府偿付在它同“全体人民公开进行战争”时所借的外债，加速推翻沙皇政府。沙皇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下令没收刊有此宣言的全部报刊，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次日司法当局又下令关闭上述报馆。

同月，莫斯科卫戍部队中的第2罗斯托夫掷弹兵团士兵起义。次日，莫斯科士兵代表苏维埃成立，除军队代表外，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军事组织的成员、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和各战斗队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士兵代表表示，“大家都同情革命运动，都能够参加人民起义，无论如何不会向自己的弟兄们开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对如何对待罗斯托夫团起义的态度不一。瓦西里耶夫一尤任提议利用这一时机在莫斯科开始举行总起义，但这一提议没得到支持。大多数人支持维·列·尚采尔的意见，建议“立即将莫斯科的形势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并等待彼得堡的指示”。莫斯科委员会没有及时支持罗斯托夫团起义。12月4日，这一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

12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列宁出席了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小组联合委员会的代表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一项提案：近日举行总罢工回答沙皇政府的挑战，总罢工必将发展成武装起义。社会革命党和全俄铁路工会的代表反对立即举行起义，认为“总决战”尚未成熟。彼得堡苏维埃认为彼得堡应准备罢工，但不能起倡导者的作用，需待外省发动之后举行。会议进行中已得到沙皇政府准备逮捕苏维埃成员的消息，但没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沙皇政府派军警逮捕了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维埃代表。

12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在菲德列尔学校礼堂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伊·阿·萨美尔从彼得堡赶来出席会议，通报了关于在列宁参加下并有幸免于难的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情况，以及关于宣布政治总罢工的决定。与会绝大多数代表赞成举行罢工和起义，而不管彼得堡无产阶级行动的性质如何，代表会议通过自12月7日12时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并将其转变成武装起义的决

定。12月6日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各革命政党的名义发表的告工人书草案。孟什维克提出在告工人书中只号召举行罢工,不提武装起义,后又同意将“起义”作为一个口号来谈。苏维埃执委会中的社会革命党既反对提武装起义,也反对提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要求。会议最后决定由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导罢工和起义,实际上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委员会领导一切,因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是一致的。当晚,召开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小组、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相继公布了自己的决定,“宣布从12月7日星期三中午12时在莫斯科举行政治总罢工,并努力将其变成武装起义。”

12月7日 莫斯科开始政治总罢工。当日有10万多名工人参加罢工,次日罢工人数达15万。9日夜,罢工开始转变为武装起义,出现了第一批街垒。布尔什维克等革命组织号召群众罢工和起义,但又缺乏必要的准备和领导,直到10月,武装斗争已激烈进行时,各区才收到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等领导机关下达的第一个指示。起义的主要中心在普列斯尼亚区,战斗十分激烈,1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向俄国工人发出《支持莫斯科起义》的号召书,号召工人们要竭尽全力,“不让政府镇压莫斯科起义”。沙皇政府派谢苗诺夫近卫团去镇压莫斯科起义,15日抵莫斯科,对起义者开始残酷镇压。由于起义缺乏统一计划和协同行动,不能及时得到有力支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执委会16日通过决议,决定从12月18日晚停止起义,从12月19日起停止罢工,必须有组织地退却,保存干部,普列斯尼亚区战斗司令部向工人发出的呼吁书中说:“斗争是由我们掀起的,现在由我们来结束。……流血、暴力和死亡将接踵而至,但这算不了什么。未来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各国的人们将世代代

从普列斯尼亚区的经验中学习不屈不挠的精神。”

12月8日 彼得堡市工人罢工,以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苏维埃和社会革命党、崩得在12月7日《告全体人民书》中的号召。当天有8.3万名工人罢工。第二天有11万多工人罢工,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29条铁路的代表会议和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响应彼得堡、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号召,也宣布举行政治总罢工,罢工逐渐具有全俄的性质,12月10日,列宁召集会议,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支持莫斯科等地工人武装起义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战斗组织及联合军事组织的活动家维·巴·诺根、维·克·斯卢茨卡娃等出席了会议。中央委员阿·伊·李可夫被派往莫斯科,将同米·费·弗拉基米尔一起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

12月12日 哈尔科夫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向工人群众发出呼吁:“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因哈尔科夫市没有全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义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武装工人同军警展开激战,直至18日失败。12月12日至13日,索尔莫沃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彼尔姆省的莫托维利哈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武装起义。13日,罗斯托夫发生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铁路工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占领了车站,夺得了军需仓库中的枪枝,建立了起义司令部。12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赤塔委员会在赤塔领导了武装起义。在12月起义的浪潮中,顿巴斯、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地区、北高加索、下诺夫哥罗德,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等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

12月12日——17日 由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坦默福斯(芬兰)举行。41名代表来自彼得堡组织、里加组织、图拉组织、喀山组织、雅罗斯拉夫里组织、尼古拉耶夫

组织、塔甘罗格组织、乌法组织、萨拉托夫组织、坦波夫组织、纳尔瓦组织、沃罗涅什组织、特维尔组织、维亚特卡组织、科斯特罗马组织、萨马拉组织、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和西伯利亚联合委员会。弗·伊·列宁、列·波·克拉辛、彼·彼·鲁勉采夫和约·维·斯大林、米·马·鲍罗廷、娜·康·克鲁普斯卡亚等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孟什维克的正式代表艾·李·古列维奇(斯米尔诺夫)也出席了代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各地方的报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部分的统一；关于党的改组；土地问题；关于国家杜马。列宁任代表会议主席，他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关于土地问题的两个报告。各地方代表相继作了工作报告。克拉辛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鲁勉采夫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的报告。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部分的统一问题，代表会议主张根据平等原则，立即同时把双方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和负责文字工作的中央机关报合并，并且与孟什维克的意见相反，认为编辑部的成员完全可以同时是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的成员。会议通过了列宁和鲁勉采夫提出的关于尽快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规定了代表选举程序和代表名额，强调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规定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针对沙皇政府12月11日颁布的新的选举法，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积极抵制杜马的决议，建议所有的党组织“广泛利用选举集会，但这不是为了服从警察限制，参加任何的国家杜马选举，而是为了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并在各阶层人民中鼓动武装起义。”决议同时还明确提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迅速在各地准备起义、组织起义，因为只有起义胜利才有可能召集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即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

12月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与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合并，

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有列·波·克拉辛、伊·克·拉拉扬茨和伊·阿·萨美尔。由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

1906 年

1月9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下,彼得堡、赤塔、雅尔塔、里加、华沙、基辅、维尔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比亚威斯托克等地以及乌拉尔的许多工厂——沃特金斯克、伊热夫斯克、米尼亚尔等地的工厂,举行了纪念1905年1月9日牺牲者的悼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彼得堡,138个企业的4万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2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党内消息》创刊号在彼得堡秘密出版。这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合并以后,根据坦默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创办的。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人数相等的编辑组成。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3人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该编辑部的工作。参加编辑部工作的3名孟什维克是唐恩、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创刊号上发表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在第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俄国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署名“一个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党内消息》停刊。

2月1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召开。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的如何对待国家杜马。出席代表会议的有6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会议听取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承认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合法的,代表会议是有效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执行。列宁

在会上作了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报告，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积极抵制杜马，但是代表会议没有来得及通过详细论证积极抵制的决议票。2月底至3月初，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以讨论并批准关于积极抵制策略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62名代表，经过辩论，以列宁的提案为基础的决议获得通过。为了修订决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列宁参加了委员会。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并退出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写道：“无条件地拒绝参加国家杜马；无条件地拒绝参加任何阶段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在人民中尽可能开展更广泛的宣传，阐明杜马的真实本质，揭穿欺骗俄国和欧洲舆论的这一骗局，指出那些期待杜马能行好事的农民的想法必然要破灭；……把用革命手段争取自由的斗争同通过杜马进行的斗争加以对比，在宣传中要特别注意使工人和全体人民熟悉十二月起义的经验，这次起义标志着争取人民真正自由的更高的革命斗争阶段的开始。”

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发表《告彼得堡市和城外地区全体男女工人书》，并印成传单。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以后(1906.2.11)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写成的。传单中写道：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抵制杜马，完全拒绝参加一切选举，这是因为国家杜马是虚假的杜马，是伪人民代表机关，是警察和地主的杜马。在那里集会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人民的公敌，他们集会是为了更好地勾结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向人民发出号召，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斗争。“只有自由选举的全民立宪会议，才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杜马。只有这种会议，才能在俄国建立良好秩序，才能改善工人生活，给农民以土地，给全体人民以自由。”

3月20日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在《党内消息》第2号发表。这是1906年2月下半月拟

定的，它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观点。3月初，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小组、文化工作小组、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局、省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党的其他工作人员的会议在列宁的参加下讨论了这个纲领。彼得堡于3月中旬也在列宁的主持下讨论了这个纲领。这个纲领包括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武装起义、游击性的战斗发动、临时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工会、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党组织的基础等部分。这份策略纲领后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印成单页。

4月10日——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崩得、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以及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克拉辛、古谢夫、卢那察尔斯基、邵武勉、斯大林、加里宁、李可夫等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有46票，孟什维克有62票，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对时局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发动、同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统一及党章等。布尔什维克在这些问题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就土地问题、关于目前时局、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选举策略问题、关于武装起义等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并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起草委员会。

在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主张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并把全部土地实行国有化，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其目的是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

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创造条件；孟什维克则坚持土地地方公有化，即把地主土地转归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局）管理，而农民须向市政局租佃土地。在关于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和国家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主张对自由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揭露，在斗争中同一切革命民主力量结成同盟；孟什维克则要求把革命的领导权交到资产阶级手中。经过激烈斗争之后，大会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和承认支持杜马是必要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第一次写进布尔什维克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条文。代表大会通过了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实行统一的决议。它们作为在该地区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的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通过了和崩得实行统一的条件草案。

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3名布尔什维克（瓦·阿·杰斯尼茨基、列·波·克拉辛和阿·伊·李可夫）和7名孟什维克（布·阿·巴赫美齐耶夫、列·伊·戈尔德曼、柳·尼·拉德琴柯、弗·尼·罗札诺夫、巴·尼·科洛科尔尼科夫、维·尼·克罗赫马尔和列·米·欣楚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则完全由孟什维克担任。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两部分，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统一了，暂时加强了党组织行动的一致性，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

4月23日 沙皇政府颁布重新修订的《国家根本法》。这一法令进一步削弱了杜马的权力，加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独裁统治。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如何对待新的杜马，应采取怎样的斗争形式。布尔什维克依然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坚持坦默福斯代表会议关于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方针。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写道：“俄国革命的目前形势的特点正是这样：

客观条件把坚决的、议会外面的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推到舞台的最前面了，因此这时再没有什么比立宪论题和议会制的游戏更有害、更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决定用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反对沙皇政府的立宪骗局，反对立宪幻想。

4月25日 列宁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义写告全党书，对这次代表大会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而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各项决议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告全党书指出，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如在土地纲领中通过了“土地市有制”，“这是介乎真正的土地革命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之间的折衷办法。农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纲领的。”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认为在杜马中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是适宜的，“拒绝了关于只有由工人组织提名为国家杜马候选人的人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成员的建议……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同样没有提到必须提出的东西……反而支吾其词地回避起义。”

4月26日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浪潮报》在彼得堡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列宁从斯德哥尔摩来到彼得堡，从1906年5月5日起，该报开始由列宁编辑。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沙皇政府多次迫害该报，《浪潮报》的第10、18、19、22、23、24、25号被销毁，最后该报被沙皇政府查封。5月24日该报停刊，共出了25号。《浪潮报》停刊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出版了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前进报》来代替它。

4月27日 沙皇俄国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孟什维克号召人民支持整个杜马。布尔什维克要求人民区别对待各资产阶级党派，即支持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反对妥协的资产阶级，反对同沙皇专制制度相勾结的立宪民主党人。列宁当时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杜马的喜剧又引起新

的、巨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我们的目的决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是推翻专制政府，把政权转交给革命人民。”5月9日，在彼得堡帕宁娜民众文化馆，在讨论国家杜马活动的3000人群众大会上，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发表演说，揭露立宪民主党同专制制度进行幕后谈判的政策，号召坚持斗争，直至取得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

5月11日 列宁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和弗兰科—俄罗斯分区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列宁提出，有必要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对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展开讨论，列宁的修改意见被大会采纳，并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决议。

6月11日——12日 在彼得堡和捷里奥基（芬兰）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区联席代表会议。列宁领导了这次代表会议，并代表彼得堡委员会作了《关于党对国家杜马的策略》和《关于党的统一》的报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曾发出信件，要求工人赞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同专制政府缔结瓜分政权谈判，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彼得堡委员会拒绝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杜马内阁问题的决议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布尔什维克表示，决不能支持组成杜马内阁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建立由杜马中的革命分子组成执行委员会的主张。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时，有1760票赞同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952票同意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次代表会议批准了彼得堡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并指出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党内多数派的意见。6月22日《回声报》对代表会议作了简要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郊区组织、俄国中部社会民主党组织区域代表会议、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许多其他的党组织也都表示

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策略。

6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各北方委员会代表会议)举行,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专区委员会、沃洛哥达委员会、雅罗斯拉夫里委员会、基涅什马委员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专区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奥勒尔委员会、柯兹洛夫委员会和舒雅城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谴责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待国家杜马的策略,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代表会议还通过决议:“北方联盟声明,北方联盟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因为它认为这个纲领不符合党代表大会的指示,北方联盟建议支持杜马内的极左派。”

7月8日 沙皇政府下令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中的布尔什维克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和瓦·阿·杰斯尼茨基于9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立即号召工人阶级用加紧准备总武装起义来回答解散杜马,同时应防止过早的和行动不一致的发动。中央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建议。他们出席由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维堡召集的被解散的杜马成员会议。会议发表的维堡宣言强调:在沙皇政府没有召集新杜马之前,以拒绝缴税、拒绝招募新兵、拒绝承认沙皇的公债进行抵抗,同时决定不要立即采取这些措施,需在“弄清人民的情绪之后,并且不得在秋季征兵之前”采取行动。

7月17日 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尼亚堡自发地爆发了士兵和水兵的起义。在这前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派马·尼·利亚多夫、亚·格·施利希特尔、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组成代表团去那里,设法延缓发动,如果不能成功则积极地去领导运动。起义开始后,布尔什维克阿·普·叶梅利扬诺夫和叶·尔·科汉斯基少尉领导了起义。斯维尼亚堡爆发起义后,直接促进了喀

琅施塔特事件的发展。

7月19日 喀琅施塔特水兵和士兵起义。停泊在列韦里附近的“纪念亚速”号巡洋舰也爆发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宣布举行政治总罢工,以支持起义,莫斯科也举行了罢工。但沙皇政府很快镇压了起义,因此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罢工没能导致全俄罢工,在此之前成立的苏维埃被迫解散。

7月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布尔什维克发表声明。这份声明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为标题印成单页,并在《1906——1907年党有没有中央委员会》这本小册子上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是,抗议杜马解散后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策略,反对孟什维克在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的路线。

9月3日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创办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在芬兰出版,至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出版,共出了50号。最初20号在芬兰出版,1908年2月26日至12月14日在日内瓦出版,1909年1月21日起在法国巴黎出版。按照党章规定,该报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无产者报》在1906年出的1——2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也参加进来了。因孟什维克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全党的机关报逐渐变成了派别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实际上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短评。1910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停办《无产者报》的决定。

9月 孟什维克对杜马的机会主义立场引起地方党组织的不满,彼得堡委员会、俄国中部社会民主党组织区域委员会、波兰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告全党书。关于必须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要求得到许多地方党组织的支持。

10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区域委员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选出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

11月3日——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坦默福斯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计32人，其中孟什维克11人，崩得分子7人，布尔什维克6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5人，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3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出席了会议并享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运动；党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同黑帮和蹂躏行为的斗争；游击发动。

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四个报告。列宁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阿·瓦爾斯基作了报告，坚持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布尔什维克策略。马尔托夫和崩得分子拉·阿·阿布拉莫维奇坚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孟什维克策略，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伏尔加河流域、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14名代表在代表会议上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代表会议以18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对14票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决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即允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代表14名代表提出了“特别意见”，强调党在选举运动中必须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并且只允许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达成临时协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运动中的政纲。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列宁修改过的《关于各地选举运动的统一》的决议。列宁的这些修改限制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实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策略。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坚持必须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决定不迟于1907年3月15日召开定期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预定要研究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关于同黑帮蹂躏行为的斗争,以及关于游击发动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只公布了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公布布尔什维克的“特别意见”。此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

11月16日——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战斗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坦默福斯举行,这是根据彼得堡和莫斯科军事组织以及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倡议召开的。参加代表会议的有28名代表,其中有伊·克·拉拉扬茨、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等。他们代表11个军事组织和8个战斗组织,伊·阿·萨美尔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组织局的工作报告;关于武装起义的原先意图;对形势的估计;武装起义的性质;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任务;军事组织的工作性质;关于对其他政党的和无党派的军事和战斗组织的态度;关于因组织武装起义而建立军事和战斗中心的问题;关于军事和战斗组织对全无产阶级组织的态度;向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关于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原则;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书刊;关于对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军事组织代表会议的态度。根据列宁的指示,大会批评了极端战斗主义情绪,并表示赞同整个军事战斗工作完全服从整个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代表会议选举了军事和战斗组织临时常务局,通过了出版中央机关报的决定。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军营报》实际上已成了中央机关报。

11月23日 《无产者报》第8号发表《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这是列宁在

11月4日写成,由6名布尔什维克、5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3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署名的布尔什维克政纲。《特别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和杜马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要向人民说明,杜马完全不适于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第二、要向人民说明,只要实际政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的途径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要说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要说明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第三、批评第一届杜马,说明俄国自由派的破产,特别要说明,如果让自由派的保皇党,即立宪民主党在解放运动中起首要的领导作用,那对革命事业是何等的危险和有害。”“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应当在整个选举运动和杜马运动中保持绝对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策略同任何其他反对派政党或革命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混淆起来。”

12月24日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周刊《艰苦劳动》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在1907年1月6日共出版3期后被沙皇政府查封。列宁在创刊号上发表《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文中指出:“俄国现在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争取自由,就是说,争取在国家中实行人民代表的政权,而不是为了旧政府。是为了给农民以土地。”列宁还指出俄国革命的真正的根本的危险,“就是农民群众不开展,他们在斗争中不坚定,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十分空虚和整个叛变行为。”

1907 年

1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省代表会议在捷里奥基召开。出席会议的有7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42名,孟什维克28名。出席代表会议并有发言权的有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4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1名代表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的1名代表及其他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在选举第二届全国杜马时的选举策略问题。在审查代表委托书时,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按现有的选区把代表会议分成市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的提案,因为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要制造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的人为的优势。孟什维克以此为借口退出代表会议,并决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以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孟什维克的分裂行为破坏了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削弱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地位。留下来的代表继续进行代表会议的工作,列宁作关于在杜马选举中和选举协议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批准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特别意见》;代表会议还通过了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的决议;通过了向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建议在选举期间签订协议的决议;其前提是他们应拒绝同立宪民主党的任何联合。

2月1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举行会议,宣读了孟什维克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彼得堡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委员们认为,在对列宁同志进行审查之前,他们不能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因为彼得堡委员会宣布拥护列宁。为了回答这一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如下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听取了 31 个孟什维克的声明后，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孟什维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并认为中央委员会必须阻止这种破坏活动，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采取措施，这将意味着它准许分裂。”

2 月 15 日——18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和《无产者报》编辑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库沃卡拉召开。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将“作为资料提交全党讨论，并就某些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为代表大会作准备。”这些决议草案是“关于民主革命目前的形势”、“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关于无产阶级在目前的民主革命中的阶级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的策略”、“关于群众的经济贫困和经济斗争的尖锐化”、“关于无党派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决议草案发表在 1907 年 2 月 25 日和 27 日布尔什维克公开出版的报纸《新光线报》第 6 号和第 7 号，以及 1907 年 3 月 4 日《无产者报》第 14 号上。

2 月 28 日 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举行第 12 次定期会议，42 人出席会议，讨论列宁拟定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宣言草案《关于斯托雷平的声明》。这份宣言草案是针对斯托雷平在 1907 年 3 月 6 日杜马中宣布的政府声明而拟出的。宣言草案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家杜马党团向人民发表宣言如下：沙皇政府的政策“维护一小撮大地主和皇亲大臣的利益，维护他们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利，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这就是政府通过斯托雷平告诉人民的话。”“政府又一次向人民宣战了。它已经走上必然驱散第二届杜马、取消现有选举权和恢复旧时俄国专制制度的旧秩序的道路。”由于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占优势，所以列宁拟

定的宣言草案没被采纳。

3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组织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列宁的主持下召开。有133人(布尔什维克92人,孟什维克4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堡组织的改组;关于彼得堡组织在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的代表权;关于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关于“五一”节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代表会议批准了布尔什维克的改组彼得堡市组织的草案,并且宣布代表议是常设性的、定期召开的机关。代表会议表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讨论彼得堡委员会改组草案和彼得堡委员会组织工作问题时,列宁作了发言。列宁还被选为参加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全市组织的代表。4月8日召开了代表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庆祝“五一”节,群众大会,全权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选举,杜马代表阿列克辛斯基的报告,组织问题,合作社问题,同黑邦作斗争,失业问题等。代表会议决定“五一”节举行群众大会并罢工一天,在讨论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的报告时,列宁作了发言,他还建议彼得堡代表向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邀请战斗队队员出席大会讨论与改组战斗队有关的问题。5月2日,《无产者报》第16号发表了列宁的《彼得堡的改组与消灭分裂》,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市组织代表会议进行了总结。

4月 列宁的《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由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出版。第一部分是列宁在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或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词)写于本年2月,并在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宣读。第二部分是彼得堡分裂的事实经过及简述。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就将列宁“提交法庭审查”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列宁同志署名的小册子《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包括着对圣彼得堡组织的31个

党员的直接指责……中央委员会认为,把这类指责登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选举的前夜,必然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混乱,使党员政治上的忠诚受到怀疑,并且会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中央委员会鉴于这种言论对党员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决定将列宁同志的行为提交党的法庭审查。”列宁在法庭上对 31 个孟什维克及其领袖唐恩提出了反控诉。彼得堡市 234 个布尔什维克会议通过决议支持列宁的反控诉,认为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分裂完全归咎于孟什维克。彼得堡市区和郊区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莫斯科区委员会、莫斯科区的环形分区和鞋厂分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会议,都通过了类似的支持列宁的决议。

4 月 30 日——5 月 19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303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39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 145 个党组织的 15 万名党员。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 177 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89 名布尔什维克和 88 名孟什维克)45 名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26 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 55 名崩得的代表。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党组织选出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在列宁的领导下,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组。主要成员有安·谢·布勃诺夫、克·叶·伏罗希洛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维·巴·诺根、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康·尼·萨莫依洛娃、约·维·斯大林等。阿·马·高尔基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只有发言权。

布尔什维克要求将以下问题列入议程: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反对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列入议程。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有以下问题列入议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发

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军队中的工作；其他。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都获通过。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上，通过了列宁写的决议案，代表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制定了对这些政党的策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既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了党在杜马中的任务，即应该首先把杜马用来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的讲坛，作为宣布和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在关于党团工作、关于“工人代表大会”及“工会和党”等问题的决议案中，都批判了机会主义观点，强调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根据修改过的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 5 人，孟什维克 4 人，波兰社会民主党 2 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2 人组成。5 名布尔什维克是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尼·亚·罗日柯夫、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维·巴·诺根。还有 3 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派出。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应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鉴于中央委员会的成份十分复杂，以及上届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变成了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的教训，布尔什维克在大会结束时召开了自已的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除已当选的 5 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外，参加这个中央的还有列·波·克拉辛、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加·达·莱特伊仁、维·列·尚采尔、格·叶·季诺维也夫、维·康·塔拉土塔、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

5 月 21 日——25 日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在伦敦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26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10 名。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工作报告;危机、同盟歇业和失业;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任务;关于军队中的鼓动;关于工会;关于宣传和鼓动;组织问题及其他。土地问题从议程中被取消。在第一次会议上,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同受调和派支持的孟什维克,就邀请列宁参加代表大会问题发生激烈冲突。代表大会通过了邀请列宁的建议。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还建议,将听取列宁的政治报告列入大会议程,受到孟什维克和调和派的反对,但最终仍被通过。

列宁接受了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尤·普·加文和扬·安·别尔津—季耶美利斯等人的邀请,出席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 5 月 24 日下午作关于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把俄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力支持实现这一任务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一刻也不应该忘记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代表大会期间,对 1906 年——1907 年间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总结。

代表大会选出了主要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所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委托中央委员会发表以布尔什维克精神起草的宣言——《告拉脱维亚整个无产阶级书》。列宁在他的报告结束时,曾宣读他起草的决议草案,并提议由代表大会决定,是否讨论这一草案,以及讨论的形式。根据布尔什维克罗·安·彼尔舍等人的建议,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列入代表大会记录,在代表大会上不安排讨论。

6 月 3 日 沙皇政府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6 月 2 日,沙皇政府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党团 65 名全体成员,并给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加

上所谓阴谋叛国的罪名，日夜兼程流放到西伯利亚。在6月5日以前，布尔什维克彼得堡组织的约150名积极工作者被逮捕，其中包括9名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沙皇政府同时违背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进一步剥夺工农权利的新选举法，俄国第一次革命结束，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

6月20日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巴库无产者报》在巴库创刊，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巴拉汉内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第二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巴拉汉内区和黑城区党的机关报出版的。自第三号起该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机关报，斯大林领导了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邵武勉、查帕里泽和斯潘达梁等人。该报同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密切联系。1909年8月27日出版第七号后停刊。

7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在捷里奥基举行。有61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1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对待第三届杜马选举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列宁指出：“俄国的革命经验表明：如果抵制杜马的确是积极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它能表现出广泛的、普遍的革命高潮有力量直接转入对旧政权的公开进攻（即武装起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抵制杜马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正确的决定。”反之，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下认为抵制手段本身就能起作用，“那就是办事凭感情，而不是凭理智”。代表会议同意列宁在提纲和报告中坚持的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路线，通过了反对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7月21日——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26名代表中，有9名布尔什维克，5名孟什维克，5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5名崩得分子和2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对付第二届国家

杜马的解散和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关于选举协定问题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绝大多数与会的布尔什维克都主张抵制国家杜马，列宁则坚持反对抵制的观点。当他们的意见被否决后，便投票赞成列宁反对抵制的决议，最后，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列宁反对抵制的决议案。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代表会议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作为资料，其中第三个草案是以列宁所提出的草案为基础的。

8月5日(公历18日) 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884名代表出席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37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是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李维诺夫等。列宁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时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主要议程是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各个政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殖民问题；工人的侨居问题；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列宁联合卢森堡等左派，着重揭露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同时批评了倍倍尔的调和主义错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各国左派共同努力，使这次大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决议。9月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在捷里奥基举行，列宁作关于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但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团结的大示威，而且还在确定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团结成了一支国际力量。”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全文刊登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8月12日 巴库石油工会的机关周报、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汽笛报》创刊。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邵武勉、查帕里泽、斯潘达梁等人。布尔什维克编的该报最后一期是第34号，于1908年6月1日出版。自第35号起，该报转入孟什维克手中。此后，布尔什维克在巴

库开始出版新的工会公开报纸《巴库工人报》，1908年9月6日，该报创刊号出版。

10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代表会议在捷里奥基举行。有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全国代表会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受审的问题；失业问题；改选市代表会议以及其他组织问题。列宁出席了代表会议，并做了关于全国代表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关于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和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问题的报告。报告中重申，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必须遵循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以及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报告还强调“绝对不允许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参加所谓无党无派报刊的观点。”关于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问题，以37票对12票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提案，并决定组织彼得堡市和彼得堡省的工人在开始审判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那天举行一天罢工。在此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已在10月上旬印发传单，抗议审判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

11月5日——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在赫尔辛福斯举行。有27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其中有布尔什维克10名，孟什维克4名，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分子5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3名。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问题，关于派别中心问题和加强中央委员会是地方组织联系的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代表的名称问题。列宁作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认

为,“应当利用杜马来为革命服务,主要是用来广泛宣传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来进行立法‘改革’,因为这种‘改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只能支持反革命和千方百计削弱民主派。”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反对列宁的主张,要求支持代表沙皇政府的十月党。他们还反对列宁提出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任务,反对准备新的革命,坚持要在第三届杜马中联合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本份的”“纯粹实际性的”工作。代表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彼得堡市代表会议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同时决定会后采取措施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的联系。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代表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团”。

12月25日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从瑞典迁到瑞士日内瓦,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同时转移到这里,在沙皇反动政府的迫害下,大批布尔什维克被迫流亡国外。在此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14名中央委员在彼得堡被捕。

12月 列宁完成《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全书五章:俄国土地变革的经济基础和实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纲领及其在第一次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验;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论基础;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列宁强调:“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决定了这个革命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为消灭地主土地公有制和俄国农业制度中一切农奴制残余而斗争,因而也就是为消灭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农奴制残余而斗争。”

1908 年

1 月 20 日 孟什维克首领之一阿克雪里罗得致信给普列汉诺夫，“暂时不要离开它（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要宣布它必遭覆灭，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这种前景，而不要把我们以后的运动和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党内取消主义鼓吹放弃革命，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反对党的一切组织和机构。取消派的核心由以下孟什维克组成：亚·尼·波特列索夫、弗·奥·列维茨基、尤·拉林、尤·奥·马尔托夫、费·伊·唐恩、亚·萨·马尔丁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恩·切列万宁、诺·尼·饶尔丹尼亚。

2 月 11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者报》编辑部举行会议，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新时代》刊载的一篇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关于哲学问题的斗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当作党内派别分裂问题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看来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赞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呢，还是赞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会议一致赞同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声明》中说：“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一切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这篇《声明》在 1908 年 2 月 26 日《无产者报》第 21 号上发表。

2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通过了《告各级党组书》，宣布订于同年4月下半月召开全俄代表会议。但因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干扰，使会议未能按期举行。当几乎所有在俄国工作的中央委员被沙皇政府逮捕时，取消派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活动企图取消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而建立只有谘询职能的“情报局”来代替它，从而达到破坏中央委员会的目的，使其不再起作用。

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在维尔诺和彼得堡先后出版。该报从第2号(1909年1月)起，移往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出版。到1917年1月停刊，共出58号。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唐恩公开为取消主义辩护，反对列宁的路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调和主义态度。列宁为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做了大量工作。马尔托夫和唐恩在1911年6月退出编辑部，自同年12月起，列宁任该报主编。

3月5日 在日内瓦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革命60周年和巴黎公社纪念日的国际群众集会。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关于巴黎公社意义的演说。列宁在演说中强调：“公社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公社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了欧洲无产阶级，具体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这一点已经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中首先表明了，并且由俄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起义中光辉地证实了。”这篇演讲后以《公社的教训》为名发表在1908年3月23日《国外新闻报》第2号上。

3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在一些区讨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5个月工作总结时，一些党员要求召回党团，并且抵制杜

马。5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工会工作和军事组织等问题时,召回派有准备有组织地发言,企图强行通过召回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决议,但因遭到与会代表大多数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列宁认为召回派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其本质都是破坏俄国革命,直接威胁到党的生存。召回派的主要成员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等。

8月11日——1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出席全会共12人,其中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3人,拉脱维社会民主党1人,波兰社会民主党1人,崩得2人。布尔什维克5人中包括列宁、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维·康·塔拉土塔等。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全俄代表会议;国外中央常务局和协助小组;中央委员会机构;财务;中央委员会向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当前的工作;选举等。

布尔什维克就召开党代表大会问题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全会就议程的主要问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立即着手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决议,拟定了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全会还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中央委员会机构和关于国外中央常务局机构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选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次全会谴责了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主张,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旨在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措施。全会还确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和职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保留有中央委员会的全部职权,而在闭会期间,则由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核心组主持俄国的日常工作。全会还决定成立由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其职责是同在俄国工作的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及同在国外工作的各中央委员保持联系。全会结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广泛地开展了全俄党代表会议准备工作。

9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公开报纸《巴库工人报》创刊号在巴库出版。参加该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普·阿·查帕里泽、斯·洛·邵武勉、苏·斯·斯潘达梁、弗·弗·叶菲莫夫等。

10月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定在《无产者报》第36号发表。彼得堡委员会号召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公开反对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号召,并要求大学生的运动应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全民斗争中的任务。第36号《无产者报》同时发表了列宁的《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列宁认为,俄国正面临着相当广泛的学院运动这个事实。对青年来说,广泛的罢课运动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参加斗争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对‘学院式’抗议者群众说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自觉的政治运动……使人们懂得新的革命斗争的不可避免。”

10月14日 列宁写信给叶利札罗娃提到,他已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个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并要求给他一个可靠的通讯地址以便寄送手稿。这部重要的著作是列宁自1908年2月在日内瓦开始写的。列宁在写作时利用了200多种文献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俄国马赫主义者及其他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不调和斗争。该书手稿在11月按秘密地址转寄到莫斯科后,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在1909年出版。列宁的姐姐叶利札罗娃在莫斯科亲自担任了该书的校对工作。

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成立。它是从同孟什维克共同组成的巴黎小组中分出来的,其成员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委员。

12月10日——16日 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堡举

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工人团。与会代表中有不少是女工，在女工们的强烈要求下，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对酗酒、关于农村妇女状况、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关于工艺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等决议。当讨论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时，女工们提出要求实行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的、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选举制的决议案，被大会主席团拒绝。女工们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

12月2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全议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举行的。全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议程和代表资格，孟什维克投了反对票。

12月21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5名布尔什维克、3名孟什维克、5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3名崩得分子。布尔什维克列宁、季诺维也夫、塔拉土塔和召回派波格丹诺夫、取消派哥列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等出席了代表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彼得堡组织、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组织、乌拉尔和高加索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的改变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在各地同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和国外事务等。

布尔什维克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及其拥护者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代表会议在《关于各个报告》的决议中，谴责了作为机会主义思潮的取消主义。并号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任何取消党的企图作斗争。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就杜马党团、组织问题和其他问题发言。列宁指出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他们虽对杜马党团的结论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

机会主义的基础。此外，在组织问题、中央机关报、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等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发表《走上轨道》一文时指出：这次大会“把我们的党引上了轨道，这次代表会议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12月27日——2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立即召开的。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批准代表会议的决议；公布决议和工作报告；代表会议关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决议；关于中央机关报；关于中央委员会核心组；国外事务；其他事项。全会批准了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并选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国外局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1人组成。全会还同时决定，如果孟什维克在一个月之后还不参加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就由布尔什维克代替。

12月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华沙市郊的普腊加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大会同取消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明确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

1909 年

1月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协助小组第二小组在巴黎科学协会礼堂组织报告会,由列宁作题为《俄国目前形势》的报告。在此之前,列宁还于22日在巴黎作了题为《论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土地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报告。

3月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会议上,列宁发言反对发表马尔托夫写的《为什么而斗争》一文,这篇文章是从孟什维克取消派立场出发写成的。编辑部通过决议,决定让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马尔托夫的文章公开答复。列宁写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就是对这篇文章的答复。报纸对马尔托夫的文章加了编辑部按语:“针对马尔托夫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列宁同志写文章作了答复,编辑部同意列宁同志这篇文章的实质。”

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1909年4月3日附刊I刊载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组织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歪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所发生的争论和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请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研究如下问题:如何在《前进报》上说明俄国的分歧,发表有关俄国问题的文章,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的公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原文。

4月1日——6日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区、乌克兰、南高加索等地的工会组织了无产阶级代表团与会。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人，多是由大工业中心区的工会选出。工人代表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提出的关于卫生监察组织问题的决议案被大会通过。他们关于工厂选举工厂视察员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也引起了特别热烈的争论，大会还没开完就被警察禁止了，大会被迫停止。

6月8日——17日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在巴黎举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事实上就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上选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心机关。出席会议的有9名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以及彼得堡、莫斯科地区和乌拉尔三个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波格丹诺夫、戈尔登贝格、杜勃洛文斯基、李可夫、塔拉土塔、尚采尔；托姆斯基、舒利亚蒂科夫、斯克雷普尼克。克鲁普斯卡娅、柳比莫夫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亚·巴·哥卢勃科夫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议程是：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马克西莫夫就《不同路》一文所提出的抗议；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国外（喀普里）的党校；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宣传；关于马克西莫夫的脱离。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关于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状况，他提出的一些原则成为《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会议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认为它是危害工人运动的有害的思潮，还批判了这一派的哲学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造神说

的宣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布尔什维克认为造神说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处。会议还批判了波格丹诺夫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企图;谴责喀普里党校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中心”。与此同时,会议也谴责了经验一元论和经验批判主义。波格丹诺夫、尚采尔、利亚多夫、索柯洛夫(沃尔斯基)鼓吹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根据会议的决议,将修正马克思主义和以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8月5日 列宁从法国博姆邦村写信经巴黎给意大利喀普里岛喀普里党校的组织者,信中拒绝了去该校讲课的邀请,并通知他在《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和第46号发表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中,已表明了对党校的态度,同月,列宁在起草布尔什维克中央给喀普里学校委员会的信中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中央不了解**学校委员会是什么;学校执行委员会是什么;学校的教学大纲怎样;现在在学校讲课的是些什么人;学习的是些什么人;现在学校的经费怎样;各课的学习期限多长等等**,布尔什维克只有得到学校委员会寄来的有关上述问题的详细、准确的报告后,才能解决布尔什维克中央对学校实行“思想监督”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还决定正式给学校委员会寄去:(1)《无产者报》第36——46号合订本;(2)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学校的信;(3)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议。

8月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专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发表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因发现了喀普里岛党校的反党活动和派别活动而写的。执行委员会要求学员们应同莫斯科专区委员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将学校的活动情况作一全面汇报。9月5日,《无产者报》第47——48号上发表了公开信,同时还发表了列宁写的按语《编辑部的话》。

8月 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在意大利

喀普里岛创办党校。该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派别主义。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在巴黎举行时，曾研究了这所学校的问题。会议认为这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以办党校为名，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派别的中央，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的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的”。会议坚决谴责了这所学校，反对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分裂政策。1909年11月，以工人尼·叶·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认清了该校的性质后，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了界限，他们投书给《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学校的反党行为，被学校开除。留下的学员与教师们在1909年12月组成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10月21日 列宁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议上，列宁要求将他写的《论巩固我们的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一文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要求必须保持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独立性，坚决同取消主义作斗争。马尔托夫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提议署上作者的名字后发表在辩论栏内。这时列宁提出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同样被编辑部中占多数的取消派和调和派所否决，10月22日，列宁发表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他在写给编辑部的信中，要求最近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他的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声明及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并要求告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否在最近一期上将采用他的《论巩固我们党和党的统一的方法》的讨论文章。

10月 列宁复信给喀普里学校的学员，这是收到该校学员两封来信之后写的，党员在信中说到了“党校”中发生分裂的情况。列宁在复信中说：“要使学校这个新派别组织的新的中央的真正性质暴露出

来,当然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一直都相信,社会民主党中觉悟最高的工人迟早会认清事态,走上正确道路的。”11月28日,《无产者报》第50号的增刊发表了同波格丹诺夫集团决裂的工人学员的来信和列宁写的《可耻的失败》一文。列宁再次批判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指出他们办“党校”,实际是“一条纯粹是欺骗党、欺骗布尔什维克派的道路。”“党校”是这些“派别组织的中央”。

11月21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例会上,列宁作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11次常会的报告。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正式代表,曾在1909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执行局第11次常会上讲过话,主要内容是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1909年12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刊有列宁写的《社会主义国际局第11次常会》,详细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12月28日 禁酒大会在彼得堡开幕。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大会,工人代表团在大会上的立场把大会变成反对沙皇政府专制统治的大会。沙皇政府几乎逮捕了所有的工人代表,与会的官吏和僧侣代表退出了大会。

12月 在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经验一元论者(即马赫和阿芬那雷斯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在国外组成反党的“前进”集团,该集团曾出版同名的刊物。该集团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必要性,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的必要性,它实行的政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实际上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取消派。1912年,它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及托洛茨基分子结成“八月联盟”,因得不到工人的支持1913年开始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彻底瓦解。

1910 年

1月2日——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的帮助下，不顾列宁的反对而召开的。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列宁、杜勃洛文斯基、戈尔登贝格、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诺根；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马尔丁诺夫、哥列夫、拉米施维里、饶尔丹尼亚、马尔托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梯什卡、瓦尔斯基；崩得代表柯依根、艾森施塔特；前进派代表波格丹诺夫、尚采尔以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奥佐林（利巴夫斯基）。托洛茨基作为维也纳《真理报》的代表也出席了全会。会议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坚持下，通过了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决定，但却用“用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来克服两种倾向”代替了原由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应属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停办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和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在列宁的力争下，全会的决定中加进一个条件，即在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同时，也要取消“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中央。在取消派和调和派的压力下，全会决定从全党经费中每月给托洛茨基的《真理报》拨发津贴，并派加米涅夫为中央委员会驻《真理报》编辑部的代表。全会通过了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组成人员，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呼声派代表马尔托夫和唐恩，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瓦尔斯基。全会一致选举列宁和普列汉诺夫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中的代表。

1月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党的政治鼓动和真正团结，关于即将召开的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决议认为，拟定一个真正团结党以及实现党的政治鼓动的办法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问题。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把领导的实践中心移到俄国来；创办在俄国国内出版的、由上述实践中心编辑的并和各地有联系的全国指导性的报纸；在最重要的工人运动中心（乌拉尔、顿巴斯、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等地）创办地方机关刊物。巴库委员会建议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全党代表会议把上述问题提交会议讨论。

2月13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发表斯大林从高加索的来信。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1月会议后的党内状况，斯大林在“组织状况”问题中写道：在巴库委员会通过的具有全组织性的决定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和创办全国性机关报的两个决定。……巴库委员会认为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同时召开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以消除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最近数日来所形成的不正常状态也是必要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巴库委员会鉴于组织彼此隔离分散，认为只有在俄国出版一种全国性的机关报才能把党的组织连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建议着手创办这样的报纸。

2月 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发表单页传单《给同志们的信》。该信由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和马丁诺夫署名，主要内容是鼓吹地下党和已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分裂出去的合法取消派的各种公开与半公开组织享有“平等权利”，并论述同它们联合的必要性。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已表示反对这种反党立场，公开信则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成为《无产者报》的分支机构；公开信的署名者重申会后打算继续出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列宁在

《取消派的反党呼声(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党在国外的统一》等文章中对其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3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副刊《争论专页》在巴黎创刊。它是根据1910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决定创办的。到1911年4月29日停刊,共出版3号。列宁在《争论专页》上发表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政论家的短评》、《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等文章。

3月7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上讨论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的报告时,列宁发言主张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派)联合。他号召全体护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实际上统一起来,为维护党性、反对分裂派—取消派而斗争。列宁关于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分子,争取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联合的主张收到明显的效果。在彼得堡全市性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前进派决定暂时都叫作“全市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彼得堡维堡区、涅瓦区、瓦西里岛等区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逐步实现了联合,莫斯科、乌克兰、萨拉托夫、乌拉尔、下诺夫哥罗德、拉脱维亚边区等地的孟什维克护党派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同布尔什维克联合的意向。

3月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号发表列宁的文章《取消派的反党“呼声”(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取消派中央委员会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甚至拒绝参加增选新委员的会议。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和该报编辑和《告同志书》是在宣传出版派别机关报,反对统一,反对国外的团结一致;维护公开的取消派;维护公然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存在分子,总之是在反党,他强调:“反党的阴谋已经暴露出来了。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的人,起来保卫党吧!”

3月28日 列宁签署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名义致波兰社会

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同取消派作斗争的问题，并批评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取消派分子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动摇。信中明确指出：“你们的代表们在为捍卫党性和反对取消派的坚决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正在走上客观上只能为取消派效劳的‘调和主义’道路。”“在党内生活中这样重要的转折关头发生动摇，我们深信，这只能对党的敌人有利。”

4月 列宁以中央机关报3名编委的名义发表声明，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声明的主要内容是，由于编辑部内取消派分子的反党行为造成编辑部的困难局面，主张必须以孟什维克护党分子来代替取消派分子，“建立有工作能力的党的委员会”。声明中说：“我们深信不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不改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成员，要贯彻党的路线，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坚决不能同呼声派一道进行党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因为没共同党性基础的人们，光靠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无法进行工作的。”

8月15日——21日（公历8月28日——9月3日） 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列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还有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等。大会讨论了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危险和必须加强同它斗争的问题，列宁参加了代表大会成立的合作社委员会，他起草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交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基础。该草案充分肯定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同时指出，在合作社中要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列宁等左派的坚持下，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作了重要修正，指出合作社运动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但它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武器，而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和实现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1910年9月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7号发表了列宁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文章介绍了合作社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的工作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的原文。在会议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就共同出版秘密的报纸以及在俄国共同出版合法的工人报纸及杂志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很快在国外安排好出版秘密《工人报》的工作。

10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举行会议，列宁出席。在讨论列宁的《穆罗姆策夫的逝世所引起的游行示威》一文时，他反对马尔托夫和唐恩对文章进行修改。在讨论季·布拉戈耶夫驳斥托洛茨基的文章《巴尔干的社会主义》时，列宁坚决反对发表此文前将该文寄给托洛茨基。鉴于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言行，列宁退出会场。他在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议主席弗·尔·列德尔的声明中说，他退出会场的原因，是因为马尔托夫发表反党的诽谤性的言论，支持召回派分子。

10月30日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机关报《工人报》创刊号在巴黎出版，孟什维克护党派也参加了该报的工作。列宁是该报的组织者和编辑之一。霍普纳尔、查帕里泽、谢马什柯、邵武勉等积极参加了报纸的工作。到1919年7月30日停刊时，共出了9号。列宁在该报发表文章有10篇以上。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曾指出，《工人报》坚决彻底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它是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正式的机关报。《工人报》创刊前，布尔什维克筹办的《我们的道路报》的创刊号于1910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编辑是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

11月8日——12日 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莫斯科、彼得堡、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尤里耶夫、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地的工人和学生为列·尼·托尔斯泰葬礼举行政治罢工、罢课和

示威游行。这是长期中断之后出现的第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同年夏季,工人罢工次数明显增加。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新阶段已经到来的明显标志。12月18日,列宁在《工人报》第2号发表文章《游行示威开始了》。列宁指出:“黑帮反动派实行**绝对**统治的时期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涨时期开始了。在1905——1909年间实行**退却**——虽然还有很长的中断时期——无产阶级又聚集起力量,开始转入**进攻**”。

11月2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布尔什维克发表致中央委员会和声明,声明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解决把钱归还给布尔什维克派的问题。声明中说:在1910年一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派和党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如果其他派别解散,我们布尔什维克也保证解散。结果条件没有实现。于是**我们也就有权重新同“调和派”领袖托洛茨基所鼓励的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声明还表示,“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在俄国国内召集起来,在俄国国内恢复中央机构,在国外建立一个党的组织基地(来代替取消派霸占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且**开始**反对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支持中央的一切步骤。”列宁和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的其他参加者都在这声明上签了字。

11月 托洛茨基企图以个人代替中央委员会,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旅外组织部通过决议,号召同呼声派、前进派齐心协力工作,不经过中央委员会而设立“代表会议”基金,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反党派别及集团加紧派别活动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此之前,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时,擅自让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决议派到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离开编辑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谴责了托洛茨基的言行。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派是孟什维克所有派别中最有害的一个派别,因为它较之其他派别更有欺骗性,使工人上当。

12月4日 列宁收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1910年12月15日(公历)给第二国际各党的通告。通告要求对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年)关于仲裁法庭和裁军问题的决议的一项修正案进行审查,该修正案是代表大会交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拟定的。这项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谈军事工业工人罢工是阻止战争的适当的手段,因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建议各党与相应工会进行联系,并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提出报告。列宁在通告中作批注后,将通告交《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发表,在附信中建议将此通告和布尔什维克的声明一起刊登出来。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冲击才能防止战争,而罢工作为孤立反抗的行动是不可能防止战争的。

12月16日 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报纸《明星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孟什维克护党派在1911年6月底以前参加了该报的工作。1912年4月22日该报被沙皇政府查封停刊。经常给《明星报》撰稿的有巴图林、叶列梅也夫、莫洛托夫、奥里明斯基、波列塔也夫、斯大林和高尔基等。列宁在国外对报纸实现了思想上的领导,使之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同月,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杂志《思想》创刊号在莫斯科出版,这份杂志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出版的,孟什维克护党派也参加了该刊的工作。

12月 列宁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委员会,谈当时党内状况的实质。他认为,党内状况的实质可从三方面来概括:(1)巩固并用一切办法支持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和结合,以便捍卫马克思主义,抵制思想上的分崩离析,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2)争取召开全会,以便通过合法途径使党摆脱危机。(3)同勾结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和无原则的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1911 年

1 月 列宁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揭露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活动以及他们破坏中央委员会 1910 年一月全会关于解散派别的决议的行为,并表示,布尔什维克将对他们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

2 月 列宁以在 1910 年一月全会上同中央委员会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名义,写《致中央俄国委员会》的信,信中提到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信中说:“党的路线是全会明确规定的,而呼声派、托洛茨基之流徒劳无益地企图把它模糊起来。这条路线指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全会闭幕后,这两派为了破坏全会的决议,发展和形成了两种反党派别:一方面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另一方面是前进派。”信中还谴责了托洛茨基在 1910 年 11 月 27 日作的越过中央召开代表会议和为代表会议筹集“基金”的声明,认为这是“导向分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

3 月 5 日 巴黎举行纪念巴黎公社成立 40 周年的群众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同日,列宁开始撰写《纪念公社》一文。文章于 1911 年 4 月 15 日在《工人报》第 4——5 号上发表。列宁在文中强调:“巴黎的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死亡;这个事业至今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公社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是劳动人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完全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

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5月14日 列宁从巴黎寄信给阿·马·高尔基,表示强烈反对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告知自己对以某一机关刊物为中心联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持否定态度,因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占优势。列宁说:“为了避免失望和无结果的争吵,我认为应当十分谨慎地对待‘统一’。说实在的,现在不是统一,而应当划清界限!”信中还批评了《明星报》编辑部缺乏一条坚定的政治路线;说风传斯托雷平通令查封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写到必须加强秘密工作;告知说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现代生活》被查封。

5月1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正式宣布退出国外局,以表示抗议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了他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并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书面声明。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通过谢马什柯向国外局提出,必须立即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尽管1910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中规定:如果俄国局半数以上委员被捕,就应该召开中央全会;但是国外局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在谢马什柯退出中央国外局的同日,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义向在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中央委员的会议的邀请。

5月28日——6月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巴黎举行。在国外的9名中央委员都被邀参加。除崩得分子费·马·约诺夫外,其余和人都出席了全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和费·埃·捷尔任斯基;崩得代表米·伊·李伯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波·伊·哥列夫;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姆·弗·奥佐林。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关于研究即

将来临的第四届杜马选举问题的会议；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关于成立技术委员会。会议首先就确定会议的性质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列宁等认为，鉴于党内当时的状况，这次会议应有权讨论并通过党必须执行的决议。哥列夫和李伯尔等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次会议无权就召开中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会议性质的决议，并把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议程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通过了在最短期间内在外国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选出了一个委员会。鉴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即将举行，会议拟定了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起草选举纲领草案的措施。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鉴于国内工人运动的活跃，党内的状况以及临近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会议主动承担了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斯大林、斯潘达良和弗拉基米尔等被会议指定为组织委员会的候选人。会议谴责了中央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并决定把中央国外局的存在这个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这次会议还成立了执行党的出版、运输等技术职能的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小组领导。这次会议加强了党的革命力量的联合，促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团结。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选举产生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区小组代表大会以及乌拉尔等地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表示赞同这次会议的决议。

6月1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召开会议。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出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草案。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该决议1911年7月印成单页并载于1911年8月11日国外技术委员会《公报》第1号。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指出了全体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决议指出,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及其拥护者呼声派,完全违背了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违背了《呼声报》代表在全会上许下的同取消派断绝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庄严的诺言,而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恰恰奉行了这种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政策。决议还指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技术机关的中央国外局,完全处于取消派的影响之下。一年半以来,国外局没有完成中央交给它的任何一项任务,直接帮助了取消派,破坏全会的召开,决议要求社会民主党各派工人注意,国外的“前进”集团领袖和《真理报》的编委托洛茨基正采取支持取消派并同他们勾结起来反对党和党的决议的政策。关于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选举问题,决议中指出:“我们党首先应当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广泛的宣传鼓动,以便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民主变革。”“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我们党在选举中必须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独立行动,不仅在工人选民团,而且在所有城乡选民当中,提出我党候选人。”决议号召全体布尔什维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明确党的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清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而战斗。”

7月2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参加下举行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全俄代表会议等问题,这次会议表示拥护1911年中央委员会一月会议关于召开全俄党代表会议的决定,并决定积极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工作。

8月17日 同年春列宁在巴黎近郊隆瑞莫镇创办的党校学员结业。创办这所党校的目的是从工人革命家中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学员都是俄国各个无产阶级中心的党组织的代表。根据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1910年)决议建立起的学校委员会在通知中说:“学员由各

地方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推选,最好由最接近工人群众的组织委员会即区委员会、代表会议等就地进行推选学员的工作。”在入学的 18 名学员中有 10 名布尔什维克、4 名孟什维克护党分子,1 名前进派分子,1 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 2 名自称为“无派别”的人。列宁是党校的主讲人。党校正式开学前,他曾指导学员学习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学后,他共讲了 56 讲,包括政治经济学、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和土地问题等。这些学员结业后在俄国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中大多发挥了积极作用。奥尔忠尼启泽、施瓦尔茨和布列斯拉夫在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和重建党的事业中贡献尤为突出。

9 月 10 日——11 日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苏黎世举行会议,列宁出席会议并发言捍卫罗·卢森堡的立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12 日,列宁在苏黎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会议上就党内的状况问题发表讲话。13 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之家俄国侨民会议上作题为《斯托雷平和革命》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说:“斯托雷平恰巧是在黑帮君主制度已经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情绪中一切有利于它的东西尽量利用完了的时候下台的。……斯托雷平给俄国人民一个很好的教训:或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求得自由,或者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的政治领导下,去受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和托尔马切夫之流奴役。

9 月 14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3 号发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的附注》。1911 年 6 月,召集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了取消派(呼声派)进行阻挠国内国外中央全会筹备工作的一些事实。在《附注》中,再次揭露了取消派破坏国内外全会、破坏国内外中央委员会的活动。《附注》指出:“凡是没有被叫喊、谩骂、吵闹和恫吓弄糊涂的能够思考问题的人,都不能不看到,中央委员会是被呼声

派彻底破坏了。““呼声派使尽了他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消灭党。党一定也要尽一切力量来消灭呼声派。”

9月29日 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各地党组织代表的会议在巴库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巴库、第比利斯、叶卡特林堡、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的党组织的代表，其中有布尔什维克阿·萨·叶努基泽、斯·格·邵武勉、苏·斯·斯潘达良、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叶·德·斯塔索娃、伊·伊·施瓦尔茨、布·穆迪瓦尼、柯·秦查泽以外，还有孟什维克护党分子亚·索科林。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各地的工作报告；关于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关于对国外组织委员会的态度；关于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关于各合法组织的代表权；关于各民族组织代表的选举。会议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会议在听取了各地方组织代表关于党的工作状况的报告和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奥尔忠尼启泽的报告后，一致通过了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定。会议最后通过了告各地组织书，号召所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全力协助我们党进行恢复工作，立即选举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各个地方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俄国组织委员会由奥尔忠尼启泽、伊·伊·施瓦尔茨、斯·格·邵武勉、苏·斯·斯潘达良、索科林组成。它成立后立即集中全力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后，它作为党的中心，很快得到彼得堡、莫斯科和里加的布尔什维克，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巴库、第比利斯、罗斯托夫、乌法、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基辅、明斯克、维尔诺等地党组织的承认。列宁号召党的各个组织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团结起来，帮助它召开党代表会议。他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经历了一场重病，危殆正在结束。”

10月19日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于退出国外技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1911年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成立的一个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前执行技术

职务的临时机构，主要负责出版工作和运输工作，由出席 1911 年 6 月会议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小组领导。但国外技术委员会中的调和派多数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措施，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定，停发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并在报刊上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弗拉基米尔斯斯基退出国外技术委员会后，从此布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

同日，列宁写信给捷克社会民主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安东尼·涅美茨，通知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在布拉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列宁在信中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最秘密地**进行这一工作。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应该知道这一点。（代表会议是**社会民主党的**，就是说，根据欧洲的法律是合法，但是大多数代表没有**护照**，不能够用真名。）

10 月 29 日 领导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波·阿·布列斯拉夫、伊·弗·普里夏金、恩·斯·马蒙托夫、伊·伊·叶哥罗夫等被沙皇政府保安机关逮捕，使该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个半月后，莫斯科党委会成员菲·伊·戈洛晓金从流放地逃回莫斯科，重新恢复了莫斯科组织的工作，重建了莫斯科委员会，开始积极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的工作。在莫斯科各企业，各分区和区的基础组织中首先召开会议然后召开各区代表的会议，最后召开了在合法工人组织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选出了 4 名代表参加全俄代表会议。

11 月 15 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下，波罗的海工厂、电缆工厂、普梯洛夫工厂以及其他工厂的工人举行集会，要求释放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彼得堡工人的行动得到莫斯科、里加、华沙、洛兹、列韦里、基辅、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城市工人的声援。

12 月 8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5 号发表了奥尔忠尼启泽

《给编辑部的信》，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反党活动。这个委员会是1911年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为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而成立的。从成立之日起，调和派和支持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在委员会中占大多数。从1911年11月起，国外组织委员会拒绝服从已经组成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定。此后，这个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便宣布对国外组织委员会中的任何活动都不负责任，并退出国外组织委员会。从此，国外组织委员会采取了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立场。

12月14日——17日 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是由巴黎协助布尔什维克《工人报》小组发起，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出席会议的有1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巴黎、南锡、苏黎世、达沃斯、日内瓦、列日、伯尔尼、不来梅和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图卢兹、洛桑、伦敦、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哥本哈根、尼斯和其他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出席这次会议，但由于物质上的困难，没有能派出代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团结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力量，促进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组织局和各地代表的总结报告；关于党内状况；关于国外状况和对各派别的态度；组织问题；关于国外工作的任务；对代表会议的态度；其他。

列宁致开幕词并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谢马什柯和弗拉基米尔斯基作了关于国外状况的报告，列宁在总结同取消派、前进派和调和派斗争情况时指出，同他们坚决决裂是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离开党的结果。谈到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时，他强调这标志着党内危机的结束。他认为对待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态度是衡量党性的标准，他说：“我们请所有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人同我们联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布尔什维克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并在各地建立支部，吸收所有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党员参加。会议选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祝贺俄国组织

委员会成立决议，并声明：“全力支持该委员会是每个护党分子应尽的义务。”会议还一致决定参加由俄国组织委员会召开的全俄党代表会议。

12月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政治的文学月刊《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份杂志是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的，它代替了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列宁在国外领导了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上面发表了《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维·米·莫洛托夫、斯大林、高尔基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马·亚·萨维里也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札罗娃等曾任杂志的编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封闭了《启蒙》杂志。1917年秋，《启蒙》杂志曾复刊，但只出了一期双月刊。

1912 年

1月5日——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举行。有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区、萨拉托夫、第比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喀山、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得文斯克、维尔诺等20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除列宁外,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还有彼·安·札鲁茨基、菲·伊·戈洛晓金、格·叶·季诺维也夫、苏·斯·斯潘达梁、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等。孟什维克护党分子德·姆·施瓦尔茨曼和党中央机关及国外组织的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尼·亚·谢马什柯、列·波·加米涅夫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日程共列入15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各地的报告;中央机关报的报告;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罢工运动和工会;“请愿运动”;关于取消主义;党在国外的的工作,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等。

列宁致开幕词后,就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问题发了言,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关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反饥荒斗争中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和其他问题的报告,奥尔忠尼启泽作了关于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代表会议的重要任务是把机会主义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关于国外的党组织》的决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驱逐出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布尔什维克自此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党。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是列宁、奥尔忠尼启泽和斯潘达梁、戈洛晓金、季诺维也夫、施瓦尔茨曼等。在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补选了别洛斯托茨基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斯维尔德洛夫、彼得罗夫斯基等也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会议决定安·谢·布勃诺夫、米·伊·加里宁、亚·彼·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和斯·格·邵武勉为候补中央委员。代表会议选举了由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等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为了实际领导国内的工作，成立了由列宁领导的俄国中央局，有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斯潘达梁参加。

关于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问题，代表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以及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主要任务，应是进行社会主义阶级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代表会议确定党在杜马选举中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修改党的组织章程草案，批准了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列宁在代表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中的代表。代表会议还声明，如果普列汉诺夫承认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提议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中的副代表。

1月19日 列宁在莱比锡主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同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会议，列宁在会议上通报了布拉格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第三届杜马的代表波列塔耶夫和舒尔卡诺夫等。后来查明，舒尔卡诺夫是个奸细。

1月 孟什维克取消派举行会议。崩得、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边区的社会民主党等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阻挠布拉格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执行，成立一个筹备召开取消派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是召开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正式

机构。3月，列宁从巴黎寄给格·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说：“崩得+拉脱维亚人试图制造一个有取消派参加的代表会议。让他们试试看吧！……我们已同取消派决裂，党已同他们决裂。让他们去试图创立另一个有取消派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吧！真是可笑！”

2月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集团——崩得国外委员会、“前进”派、“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托洛茨基维也纳“真理”派、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激烈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指责布尔什维克“篡权”，在党内“搞政变”，号召各地方组织不要服从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与会者对布拉格代表会议提出“抗议”，并将抗议书送交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这次会议的决议用单页出版，并刊发在维也纳《真理报》及崩得的《新闻小报》第4号上，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的身份就这项决议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后来又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胡斯曼写了一封信，列宁在信中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声明：刚刚结束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已把在国内进行工作的23个党组织联合起来了。“大多数国内党组织已经听过的所有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受到了各地热烈的同情，而且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将给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以支持。”信中还说，由于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这些集团的破坏活动，因此，“这些集团对谴责他们的做法的代表会议大肆攻击，企图使代表大会威信扫地，这对党来说，都不是意外的事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于1912年4月12日（公历）把列宁的这封信分发给各社会党，并建议在报刊上发表。

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印发传单《告国外组织各支部》，号召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周围。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小组在听取中央委员会委员苏·斯·斯潘

达梁的报告之后，完全赞同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组织委员会，萨马拉、尼古拉耶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的秘密党组织，都表示拥护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承认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为全党的机关报。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也完全赞同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破坏新的中央机关的威信的一切企图都是反革命的。”

3月5日 列宁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报告中，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状况，并强调指出：代表会议具有党的最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报告还特别强调，国外还有许多小组，这些小组具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因而不负责任的，“这些小组无论如何既不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党对这些小组不负任何责任或作任何保证。”这份报告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处随公报第4号分寄给各社会党，以便在各党的报刊上发表。1912年3月23日（公历）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3月25日（公历）的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3月26日（公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4月6日（公历）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义报》，都发表了这一报告。《前进报》同时发表了托洛茨基对代表会议通报的攻击性的说明。

3月26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正式消息和攻击这次会议的匿名文章。《前进报》拒绝刊载布尔什维克对这些攻击的答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为了使德国同志了解真相，决定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答复。在这本小册子中，简要地叙述了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斗争的意义、过程和结局。小册子名为《前进

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文章写道：“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是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同这些派别‘和平’或‘调和’，早就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或是自行灭亡，或是完全摆脱这些派别。”

3月30日 斯大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没能完全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清除取消派出党，并且不允许在杜马选举运动中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决议，他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在他领导下举行的巴库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未能“吸收……孟什维克参加”，会议决定“建议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组成一个共同的领导集体”，组成一个“共同的选举委员会”。只是到了后来，巴库各秘密党组织才完全支持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

同日，3月初列宁在巴黎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中央委员会于同月印成单页在俄国出版，并寄往各地党组织，4月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6号附刊在国外出版，《纲领》通俗地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治口号，号召各地的党组织及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即将开始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选人的票。《纲领》分析了在这次选举中相互斗争的三个主要党派是黑帮、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的目的，“不是为了在那里玩弄‘改革’的把戏，也不是象欺骗人民的自由派所说的那样，为了‘保护宪法’，‘说服’十月党人或者‘把反动派赶出’杜马，而是为了从杜马讲坛上号召群众进行斗争，阐明社会主义的学说，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一切欺骗，揭露人民中落后阶层的君主主义偏见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根源，——总之，是为了给新的俄国革命准备一支自觉斗士的队伍。”

4月4日 俄、英资本家合股开办的连纳金矿公司的工人举行总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居住条件等要求。沙皇政府逮捕了罢工领导人。4月4日工人再次举行示

威,要求释放被捕者时,遭军警镇压,死伤 500 余人。连纳惨案发生后,社会民主党党团于 4 月 9 日就这一惨案向国家杜马提出质问。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下诺夫哥罗德、尼古拉耶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萨拉托夫、赫尔松、里加等城市的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为抗议沙皇政府枪杀工人事件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4 月 26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举行会议,听取列宁关于连纳惨案、俄国的罢工及党的策略的报告。连纳惨案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工人革命运动开始了蓬勃高涨的新时期。

4 月 22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事实上的机关报《真理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列宁在国外领导了《真理报》的工作,为其撰写了大批文章。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维·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约·维·斯大林、米·伊·加里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也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依洛夫、尼·罗·沙果夫等也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真理报》编辑部的经常工作人员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克·恩·萨莫依洛娃、尼·尼·巴图林、安·伊·叶利札罗娃、克·斯·叶列梅也夫等。《真理报》培养了许多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把他们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真理报》出刊后即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在创办的第一年,它被没收 41 次,编辑们被审讯 36 次。到 1914 年 7 月,被沙皇政府查封过 8 次,被迫改换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等名称出版。

5 月 1 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领导下,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华沙、基辅、哈尔科夫、科斯特罗马等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群众性的“五一”罢工和示威游行。俄国在 50 个省内举行了千余次罢工,罢工人数近 40 万,其规模超过了 1905 年的“五一”示威游行。罢

工工人在罢工中高呼“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等口号。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基辅等地的大学生同工人一起参加了反对沙皇政府专制统治的抗议运动。波罗的海海军士兵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密谋准备起义。5月份有500余名水兵被捕,6人被枪杀。

6月10日 为了加强对党的工作的领导,列宁从巴黎迁往离俄国边界较近的克拉科夫。5月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大部分被捕。列宁到克拉科夫后,使中央委员会国外委员会同俄国国内很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对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领导。同年夏天在彼得堡重建了各区委员会。9月初召开了各区代表会议,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市组织委员会,11月在扩大会议上选出彼得堡委员会,统一的彼得堡组织又恢复了。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期,各地党组织成立了秘密的竞选委员会,列宁在克拉科夫的住宅成为中央领导竞选运动的指挥部。

7月1日 在塔什干附近的特罗伊茨科耶军营的两个工兵营举行起义。14名起义领导者被处死,近200名起义参加者被处罚苦役。7月30日,《工人报》第9号发表列宁的文章《陆海军中的起义》。列宁认为这次起义和在此之前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中的水兵起义表明,俄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从四、五月的群众性罢工开始,俄国无产阶级已转入进攻”。“群众性的罢工不会不到处点起革命的火焰。军队中爆发的起义就证明,火焰已经点起来了,到处都有可燃材料,到处的群众,就连那些受着兵营的严格管制的工人农民,都激起了革命的情绪。”但是列宁认为现在举行起义还为时过早,是极不适当的,“只有工人群众、农民和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的联合攻击,才能为举行胜利的即适时的起义创造条件。”

7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布尔什维克瑞士支部在苏黎世举行会议。苏黎世、达沃斯、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党内状况和

关于国外形势的决议。在此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苏黎世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委员会给社会民主党组织《协约》执行委员会和瑞士工会写了一封信，声明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苏黎世国外组织的唯一代表，针对这一情况，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对取消派委员会的抗议的决议。列宁写有《给瑞士工人的信》，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党驻社会主义国际局代表的身份写道：“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所有瑞士同志们证实一个事实，就是我党 1912 年 1 月全党代表会议曾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单独的国外俄国小组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我证实，我党中央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只批准过唯一的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那就是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它的苏黎世支部。

8 月 12 日 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彼得堡、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取消派团体的代表，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以及崩得的取消派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由于代表性不广泛，只得宣布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些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同年 1 月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八月联盟”，并在所有问题上都通过了取消派的决议。如在“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形式”的决议中宣称，无产阶级的组织只有在吸收工人群众参加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才可能存在，反对无产阶级秘密的政党存在，公开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9 月至 10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在所谓的八月“代表会议”上的反党分裂活动写信给各级党组织。

8 月 18 日 列宁写信给社会主义国际局书记处，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主义国际局的代表的身份，对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写给社会主义国际局的通知波兰社会民主党已经分裂的信，提出抗议。列宁是在同年 7 月收到社会主义国际局书记处

寄来的第15号通报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列宁针对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宣布，华沙委员会“不属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做为自治部分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在信中说：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利决定或宣布谁属于我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本身就不属于我们党，因为它在组织上既同我所代表的1912年1月代表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联系，也同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没有联系，列宁同时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附寄来的抗议书转交给社会主义国际局，并要求将这份抗议书和他的信一起分发给加入国际的各党代表。

9月16日 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日报《光线报》在彼得堡创刊。到1913年7月5日停刊，共出版237号，先由《现代生活报》代替，后来是《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该报基本上是依靠自由派捐款维持的，因此列宁说它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的钱”维持的。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掌握了《光线报》的思想领导。该报公开反对工人革命和群众罢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鼓吹成立所谓的“公开党”。

10月5日 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工人选民团初选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运动中的影响占有明显优势，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参加大会的有50个初选人；在代表大会选出的6个复选人中，有4个是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彼得堡、科斯特罗马、顿河罗斯托夫等地，工人们都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竞选纲领。

10月17日 在彼得堡工人初选人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斯大林以列宁的竞选纲领为基础写成的《彼得堡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赞成选举一名布尔什维克为杜马代表。在此之前，这个委托书在

彼得堡各大企业的工人工会上和其他工人会议上也获得赞同。委托书中写道：“杜马讲坛在目前条件下也是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最好工具之一。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派我们的代表到杜马中去，委托他和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利用杜马的讲坛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要求，而不是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把戏。”11月5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29号合刊上发表了这份委托书。

10月26日 在布尔什维克的倡议下，在彼得堡举行大罢工，抗议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事法庭以图谋起义的罪名判决17名水兵死刑，106人服苦役。罢工很快波及到莫斯科、里加、列韦里、尼古拉耶夫、别尔疆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全俄有25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政治罢工转变成街头游行示威，表明群众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0月27日 在列宁的帮助下，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小组联合会的秘密出版物《公报》在布鲁塞尔创刊。它实质上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刊物。

10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印发列宁所写的《告俄国全体公民书》，其中分析了巴尔干战争同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的全欧战争的联系。它号召坚决谴责战争冒险行为，更广泛地展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告俄国全体公民书》强调：“战争及其带来的全部灾难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奴役千百万劳动人民，使各国间的斗争尖锐化，把资本的奴隶变为炮灰。唯有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军才能终止这种压迫群众和奴役群众的现象，才能终止为奴隶主利益而进行的奴隶大屠杀。”它还明确指出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条由空前的罪恶暴行、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结成的反对民族自由、反对民主、反对工人阶级的环环紧扣的锁链。号召俄国人民更广泛地开展反对沙皇君主制

的宣传，打倒沙皇君主制。

11月11日——12日（公历24——25）为解决防止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危险问题而召开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代表着23个国家的工人政党的55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列·波·加米涅夫、叶·费·罗兹米罗维奇、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和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出席了会议。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即《巴塞尔反战宣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明确了各国党的具体任务和策略原则，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还包含了列宁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所坚持的那种思想：如果战争爆发，就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社会革命。

11月1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主持下，在克拉科夫召开会议，讨论《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即将举行的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3日 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彼得堡委员会、《真理报》编辑部、取消派的领导中心组织委员会和取消派的报纸《光线报》的代表，布尔什维克支持工人提出的在杜马开幕的那天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曾在各企业广泛散发传单，在11月15日（杜马开幕）举行政治罢工并到塔夫利达宫示威。取消派坚决反对工人游行示威和罢工。会后，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报刊上发表了犯有政治错误的声明，说号召工人罢工的传单不是彼得堡任何一个有威信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散发的。尽管如此，游行示威和7万人的罢工还是顺利地举行了，一些企业举行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后，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在工人会议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2月1日 列宁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谈《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同取消派的斗争以及预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等问题。

12月2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工作者的会议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克拉科夫举行。1913年1月1日闭幕，为了保密称作1913年“二月会议”。中央委员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列宁、斯大林、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阿·叶·巴达也夫、尼·罗·沙果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叶·费·罗兹米罗维奇等14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各地方的报告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秘密组织的建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党的报刊；保险运动；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统一问题；关于“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了《革命高潮、罢工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强调俄国工人运动在1912年已发生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俄国的工人罢工有革命的性质，俄国已进入了新的革命高涨时期。会议讨论了地方代表关于党组织的状况的报告和关于《真理报》、《启蒙》杂志编辑部的工作问题，通过了有关工人运动中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各个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罢工，同时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各个工厂建立党的委员会，并在工人运动中心建立统一领导组织。会议听取了第四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工作报告，指出由于中央加强了对它的领导，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活动初期基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会议的决议强调，杜马代表必须作为党的一个集体参加党的工作。在杜马之外，杜马代表“首先是党的组织者”。关于《真理报》问题，会议明确它是党的出版物，同时也批评了它在“贯彻党的精神等方面不够坚定”，“不能严格贯彻党的一切决定”的错误。会议建议成立有1名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参加的起领导作

用的编辑委员会。新补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斯维尔德洛夫被任命为《真理报》编辑，使《真理报》真正成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议，并印成单行本在俄国广泛散发。会议决议得到俄国各地区党组织的赞同。

12月、为纪念1905年1月9日事件八周年，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好《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并印成传单散发。同年11月23日，列宁从克拉科夫写信给在彼得堡的斯大林说：“关于纪念1月9日，预先考虑好和准备好是极端必要的。应当预先准备好传单，号召举行群众大会，罢工一天和示威游行……传单的口号应当是三个革命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并要特别着重指出罗曼诺夫皇朝300周年纪念的‘可耻’，如果没有充分的而且是极充分的把握能够在彼得堡弄好传单，那就必须及时在这里预先准备好再运去。”

1913年

1月22日 在有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彼得罗夫斯基、戈洛晓金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编辑部的领导机构——“三人小组”，为了加强同彼得堡的党组织进行联系，指定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加入编辑部。

1月27日 列宁从克拉科夫写信给在彼得堡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信中对《真理报》的工作提出批评，要求改组编委会。信中写道：“我感到非常遗憾。实质上，事情的关键正在于《日报》和如何办《日报》。如果不改革和正确地办《日报》，我们就要遭到物质上的和政治上的破产，《日报》是团结和开展运动的必要的组织手段。……彼得堡的情况不好，首先是由于《日报》搞得很糟和我们不善于利用或那里的“编辑”委员会阻挠我们利用《日报》。”同年，在克拉科夫举行了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二月”会议上，制定了改进《真理报》编辑部状况的具体措施。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下，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2月中旬以后，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相继被捕，使《真理报》工作遇到严重困难。列宁成为《真理报》实际上的主编。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也积极参加了该报的工作，除出席编委会会议外，还亲自料理出版、印刷等具体问题。

1月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出版社——“波涛”出版社在彼得堡成立，该出版社以出版有关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的书籍为主。1913年12月出版了袖珍日历“1914年工人必读”，其中刊有列宁的文章《俄

国的罢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加紧迫害工人刊物，“波涛”出版社被迫停止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重新恢复出版工作。

1月——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连纳惨案一周年，印发传单。传单由斯大林执笔。传单中写道：连纳惨案在俄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已经忍无可忍了……俄国工人以同心协力的、将近50万人参加的抗议罢工来回答了连纳惨案。同时他们高举起我们旧日的红旗，在那上面，工人阶级重新写上了俄国革命的三个主要的要求：为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农民没收一切地主和沙皇的土地；为全体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永远记住连纳惨案，并用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募捐等方式纪念连纳惨案一周年。

2月19日 沙皇政府军警在深夜几乎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逮捕。布尔什维克中央派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弗·恩·洛博娃去莫斯科开展工作，以后又派去中央代办员瓦·尼·雅柯夫列娃和尼·尼·雅柯夫列夫。2月26日，中央代办员弗·格·舒姆金召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和其一些工人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创办一份合法的日报。早在1912年7月中旬，列宁在《半年工作总结》中就提出：“必须大力注意在莫斯科推销工人报纸的工作。不能再让莫斯科处于落后状态”，“俄国的工厂工人极大部分集中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区……因此，在工人报纸的读者和拥护者的数目方面，在工人民主派的有觉悟的代表的数目方面，莫斯科区本应占第一位。”

2月 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俄国组织了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萨马拉、第比利斯等城市的男女工人积极参与了这一庆祝活动。

4月4日 彼得堡、莫斯科、基辅、里加等城市为纪念连纳枪杀

工人事件一周年举行有 14 万人参加的罢工。仅彼得堡一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就有 8.5 万人。在此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印发传单《告全体男女工人书》，纪念连纳惨案一周年，号召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

4 月 21 日 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举行选举。被选入工会理事会的有 13 名布尔什维克和 5 名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阿·谢·基谢廖夫担任理事会主席。五金工会原是取消派在彼得堡的主要阵地。选举结果表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明显增长。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事业正不顾一切地在向前进展，工人的政党正建设成为一个反对自由主义叛徒和取消派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彼得堡工人在新的五金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中击败了取消派，现在我们正为他们的这一胜利欢呼。”4 月 29 日，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指示在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时应加强工会的统一，给予《五金工人》杂志以帮助。

5 月 1 日 莫斯科、彼得堡、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举行“五一”罢工和示威游行。约有 42 万人参加了罢工。在 4 月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印发传单《五一》。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等城市的党组织和小组印发了“五一”节传单。6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1 号发表由列宁撰写的社论《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示威游行》，社论指出：“最近一年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看不到有如俄国那样多、那样顽强、那样形形色色和那样有毅力的政治罢工。”这是由于俄国在具备革命形势和在直接的革命危机增长方面具有特殊的条件的结果。俄国的“五一”示威向世界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沿着自己的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离开这条道路便无法拯救奄奄一息的俄国。”

5 月 26 日 《真理报》第 120 号发表了亚·波格丹诺夫给《真理

报》编辑部的声明,并同时加了编辑部附言,其中写道,发表波格丹诺夫的声明是“为了不偏不倚”。6月3日,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委员会,信中写道:“编辑部对波格丹诺夫先生歪曲党史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十分令人气愤,真不知道,此后怎么能够继续充当撰稿人。”列宁认为编辑部支持波格丹诺夫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分子,“这简直是对真理、对党的嘲弄”。列宁为了回答编辑部的附言,在寄去这封信的同时,还给《真理报》寄去一篇反对波格丹诺夫歪曲党史的短文。列宁多次向《真理报》编辑部提出,不能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发表波格丹诺夫的文章。波格丹诺夫公开宣扬马赫主义的观点后,《真理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要求,将其开除出《真理报》撰稿人之列。

5月 列宁应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的请求,为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起草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该纲领草案于同年11月用拉脱维亚文在《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局公报》第8号增刊上发表。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俄国革命日益临近,必须训练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为了保证党的秘密组织的统一,必须与取消派划清界限,其中包括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取消派。列宁还指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应拒绝承认八月联盟及其纲领,特别是建党的联邦制原则。列宁写的纲领草案被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登载在各种秘密报刊上或印成单页传单广泛宣传。

6月12日 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在杜马讨论预算委员会的报告时发言。他表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他说,陆军海军所耗费的数十亿卢布应用于人民的实际需要,用于工人保险,帮助啼饥号寒的农民,兴办人民教育事业。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彻底铲除产生战争的根源,在现存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布尔什维克将尽一切可能减轻军国主义的压迫,改善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条件。

6月15日——22日 喀琅施塔特海军军事法庭对被控图谋起义的52名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进行审讯。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抗议罢工，反对判处一批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死刑。在7月和9月，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为抗议压制工人出版物再次举行罢工，有25万人参加。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在罢工中提出举行全俄罢工的问题。列宁认为，这表明政治危机在俄国已经临近。

6月29日——7月3日 第四届全俄工商界职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召开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于1912年9月创刊的《店员通报》杂志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广泛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同店员的关系。会议形成了以布尔什维克为中心的把大多数代表联合起来的“左派联盟”。布尔什维克在城市半无产阶级阶层——商店职员、事务所职员、铁路职员、饭馆招待员、手工业者和小官吏中广泛开展工作，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7月7日 布尔什维克中央代表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巴库召开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开始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委员会委员之间按照行业进行了分工，指定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在巴·阿·博里扬、普·阿·格拉切夫、格·兹·约安尼西阿尼、伊·亚·科热夫尼科夫、斯·雅库波夫等人的领导下，在7月底有3.5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

7月20日——2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举行。列宁在会上作《论党内状况》的报告。

8月25日 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主办的报纸《我们的道路报》创刊号出版。该报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它曾得到395个工人团体的捐款资助。7月27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便决定着手在莫斯科出版报纸的工作。各秘密支部和各工会的代表在8月曾举行会议，确定

了报纸编辑部的人选。尼·尼·雅柯夫列夫、弗·恩·洛博娃、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瓦·瓦·奥波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列宁等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经常为报纸撰稿。阿·马·高尔基也是该报的撰稿人。9月12日第16号出版后,编辑部工作人员被沙皇政府逮捕,报纸被迫停刊。

9月23日——10月1日 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距克拉科夫不远的沃罗宁村召开。当时为保密,会议叫做“夏季会议”或“八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2人,代表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启蒙》杂志编辑部;还有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他们同时也代表地方党组织)以及其他人员。他们之中包括列宁、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阿·叶·巴达也夫、印·费·阿尔曼德、马·康·穆拉诺夫、叶·费·罗兹米罗维奇、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尼·罗·沙果夫、费·尼·萨莫依洛夫、耶·阿·巴拉朔夫、雅·斯·加涅茨基、亨·卡缅斯基等。会议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各地的报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状况;组织问题和党代表大会;关于罢工运动;关于合法社团中的工作;关于民粹派;关于党的刊物;关于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政治形势,强调“关于新的革命的问题在国内整个政治生活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鼓动任务》、《关于罢工运动》、《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等决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党应立即有计划地开展革命鼓动,号召厂矿企业中的工人参加革命斗争,并在全俄范围内使这一斗争联合起来。会议欢迎彼得堡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总罢工的建议;会

议还决定在莫斯科重新创办报纸,更加广泛地推销党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并由波涛出版社扩大出版通俗读物。关于国家杜马问题,会议认为应利用国家杜马讲坛加强革命鼓动工作,同时还谴责了取消派导致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行为。在关于即将在191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提议尽可能多地从秘密的和合法的组织中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且指出在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同时,应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9月25日——30日 彼得堡、华沙、莫斯科、洛兹、维尔诺、敖德萨、明斯克、琴斯托霍瓦、戈梅利、哈尔科夫、里加等城市为反对“贝利斯案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和罢工。列宁1913年11月29日在《拥护真理报》第47号撰文指出:“贝利斯案件之所以值得注意和重视,是因为它非常明显地揭露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内幕,揭露了政治生活中的幕后的‘底细’等等。”布尔什维克在散发的传单上写道:“同志们!我们工人不需要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芬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应当反对他们,而应当同他们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所谓“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贝利斯的挑衅性审讯,诬告他为了举行宗教仪式杀害了信奉基督教的儿童尤辛斯基(实际上尤辛斯基被黑帮分子杀害),其目的是在俄国煽动反犹太人运动,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缓和国内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许多城市工人示威的强大压力下,贝利斯终于被宣判无罪。

10月16日 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第一次会议上,在国家杜马第二次大会开始时,布尔什维克曾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六人团”应与“七人团”平等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于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便退出了会场。10月18日,《拥护真理报》第13号发表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签字的《声明》。《声明》说:“在国家杜马共

同工作的一年中,在我们和你们(其余 7 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之间,暴露出一系列的冲突和磨擦。……你们以 7 票对 6 票所通过的决议是:拒绝布尔什维克(6 个代表)在预算委员会中占上一席(共两席),选举一名代表(而不是两名)到一个重要的机关去。……而你们,7 个代表的行动却不顾工人的意志,反对工人的意志。你们狂妄地通过了违反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意志的决议。”《声明》最后强调,只有“不以 7 票对工人选民团代表中的六人团实行任何压制,只有完全彻底地承认六人团和七人团的平等,只有在两者之间就杜马活动的所有问题实行协商,才能保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真正一致。”《拥护真理报》在公布《声明》时,号召工人们讨论“六人团”向“七人团”提出的要求,并在恢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统一问题上支持工人代表。

10月26日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杂志《保险问题》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它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出版的。著名的保险运动家布尔什维克恩·阿·斯克雷普尼克、彼·伊·斯图契卡、亚·尼·维诺库罗夫、尼·米·什维尔尼克等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保险问题》在为实现工人保险展开积极工作的同时,为实现布尔什维克提出的 8 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土地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也进行了斗争。1918 年 3 月停刊。

10月——12月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在布尔什维克公开出版的《启蒙》杂志第 10——12 期上连载发表。同年夏天,即完成此文写作之前,列宁曾在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等地作关于民族问题的讲演。秋天,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会议结束,列宁完成了此文的写作。在文章中,列宁谈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的吓人的字眼——“同化”、“民族文化自治”、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中央集权制和自治等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进一步论证并发展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

11月15日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根据列宁的建议退出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而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它于同月向杜马主席团登记。它由巴达耶夫、穆拉诺夫、彼德罗夫斯基、萨莫依洛夫、沙果夫和马林诺夫斯基(后来查清是奸细)6人组成,故也称“六人团”。六人团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议会制度进行合法斗争,把合法活动同秘密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同工人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效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在全俄各地进行革命鼓动,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他们组成了一个“工人委员会”,并在工人委员会的参加下拟定了8小时工作日法案。11月20日,《真理报》公布了这个法案,1914年11月,除马林诺夫斯基以外的5名工人党团代表被捕,并以“叛国”罪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11月30日——12月1日(公历12月13日——14日)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十二月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除讨论英国社会党和工人党的统一、维也纳代表大会外,还讨论了俄国形势问题。会议结束前不久,又讨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会议经过仓促讨论,执行局通过了一项由考茨基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委托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代表会议。与会代表将来自“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党团,包括俄属波兰——只要这些党团承认党的纲领,或者他们的纲领符合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便就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问题互相交换意见。”12月1日,考茨基在发言中声称:“俄国佬的社会民主党消失了”,必须根据俄国工人渴望统一的心情来重建党。12月17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9号发表了署名“一群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于社会党执行局决议的决议》,决议中写道:对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来说,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

新的整体,而只是要巩固并完全恢复旧组织——它在 15 年以前就已形成——及其旧纲领和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策略性决定。取消派已经脱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列宁在 12 月写有《好决议和坏发言》、《论考茨基的不可容忍的错误》。列宁认为考茨基说俄国的党已经消失了的发言是骇人听闻的。他说:“我们真可怜德国的领袖们,他们(当他们在研究理论时,是善于搜集和研究材料的)竟听信并且重弹取消派报道者的谎言,而且不以为耻。”

12 月 25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2 号发表了列宁的文章《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1913 年 9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秋会议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列宁重申了《决议》中所阐述的把民族问题提到显著地位的原因,即黑帮民族主义的猖獗,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的加强,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状况(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崩得、取消派企图取消党纲等等),使党不得不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列宁在文章中提出:“‘民族自决权’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一般地有民主,而且特别是**不能有用不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分离问题的事情。”“在现代的俄国否认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就是拒绝同直到如今还无所不为的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

1914 年

1月9日 彼得堡、里加、莫斯科、尼古拉耶夫、华沙、特维尔、基辅、赫尔松、德文斯克等城市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有26万人参加,进一步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加深了俄国的政治危机。3月中旬,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等地又有近23万人参加了罢工。4月22日,因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劳动团的代表出席国家杜马会议时,受到15次不得参加国家杜马会议的处分,彼得堡、莫斯科的工人为表示抗议,又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罢工。

1月12日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列宁在布鲁塞尔向与会代表作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了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号召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强党的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团结,维护党的队伍不受动摇分子和取消派的侵蚀。

1月13日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大会。由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违背党的民主制原则,使与会的18名代表中,只有8名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开始后即发生激烈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时更是如此,通过列宁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团结了动摇分子,使代表大会通过了从取消派组织委员会中召回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并选出了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合并创造了条

件。

2月 布尔什维克举行纪念乌克兰诗人塔·格·舍甫琴柯诞辰100周年的政治活动。莫斯科、彼得堡等城市的工人召开了纪念会，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和第比利斯在纪念日发动了罢工。针对沙皇政府不得纪念舍甫琴柯的禁令，工人代表联名向沙皇下政府递交质询书，其中写道：“残酷无情地、无法无天地对乌克兰语言和乌克兰人民的自主活动进行迫害，是禁锢居住在俄国的各族人民的不法行为和专横措施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2月14日 列宁从克拉科夫寄信给在彼得堡的列·波·加米涅夫，对《真理报》编辑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关系的行动表示称赞；指出在《启蒙》杂志上进一步揭露“前进派”的冒险主义是必要的，并问及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准备工作情况。同日，列宁还寄信给在彼得堡的《启蒙》杂志编辑部。信中说：“对波格丹诺夫的离开，显然存在完全错误的看法，必须对之进行斗争。”“有谁因为他而离开了呢？谁也没有。可是这件事被说成好象我们排挤了什么人，这种谎言应予驳斥。”

2月23日 根据列宁提议创办的供女工阅读的杂志《女工》创刊号出版。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出版这份公开刊物。参加杂志在彼得堡编辑部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康·尼·萨莫伊洛娃、普·弗·库杰利、抑·鲁·明仁斯卡娅及叶·费·罗兹米罗维奇。参加杂志编辑部国外部分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印·费·阿尔曼德、抑·尼·斯塔尔、兹·约·利林娜。

3月2日 彼得堡选举全俄保险理事会的工人小组。围绕着选举问题，以布尔什维克为一方和以取消派及左派民粹分子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在投票表决前宣读了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和取消派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在委托书中向工人代表提出，应使自己

的一切活动同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即党的决定相一致。在保险理事会选举期间，《无产者真理报》、《保险问题》杂志、《真理之路报》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给保险机构和保险理事会中的工人代表的指示，对选举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书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57人中有47人投赞成票，《真理报》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也全部通过。他们都是五金工人、布尔什维克建立的秘密保险中心的成员：格·姆·什卡平、斯·德·丘金、尼·米·什维尔尼克、格·伊·奥西波夫、恩·伊·伊林和斯·伊·扬金。布尔什维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

3月9日 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的领导下，爱沙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在列韦里举行会议。列韦里、纳尔瓦、尤里耶夫以及赫尔辛福斯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克拉科夫会议和波罗宁会议的各项决议，并强调必须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会议声明，从1912年6月在纳尔瓦出版的工人报纸《光线报》，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监督。经过积极的筹备，同年6月15日在纳尔瓦召开了全爱沙尼亚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爱沙尼亚边疆区中央委员会，并且决定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把自己的代表权委托给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

3月28日 《真理之路报》第48号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向第四届国家杜马提出的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是由列宁写的，具体内容是《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及与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有关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该草案强调，居住在俄国境内的一切民族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俄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不分性别和宗教信仰，都不得因为他的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而在政治权利和任何一般的权利上加以限制。草案在要求废止对犹太人加以限制的一切法律、临时条例、法律附则时，清醒地认识到，

“犹太人问题只有同俄国当前的基本问题放在一起才能得到认真的解决”，对沙皇政府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并不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4月2日——4日 有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代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克拉科夫举行。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制订会议日程，起草关于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秘密工作的组织部的决议草案。还研究了关于参加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关于筹备党的下届代表大会、关于农民工作、关于庆祝工人出版节、关于出版《真理报》的地区附页、关于发行全俄工会机关报等问题。在这次会上通过了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中央组织部的决议后，米·伊·加里宁、阿·谢·基谢寥夫等人以及保险运动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问题，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委托国外的中央委员负责起草报告”的决定。中央的这一委托是由列宁承担的。他于1914年4月——5月间完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和要点》。

4月4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和组织下，彼得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彼得堡工厂主宣布的同盟歇业。彼得堡的工厂主是在4月2日为了对付工人罢工而宣布歇业的。示威游行正值连纳惨案两周年。在这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散发了秘密传单，号召在连纳惨案两周年纪念日举行革命的示威游行。当天，《真理之路报》发表了列宁执笔的编辑部文章《论工人运动的形式（同盟歇业和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文章指出：同盟歇业，即企业主联合起来大批解雇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同盟歇业是斗争尖锐化引起的，同时它将使斗争更加尖锐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向布鲁塞尔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列宁用很大篇幅论述这次游行的意义。

4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通过决议，对

孟什维克、“前进派”的组织者之一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行为表示愤怒，并声明与其断绝一切关系。同年5月下旬，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决议中号召巴黎的社会党组织和党的各中央机构（俄罗斯的和其他民族的）对阿列克辛斯基及“前进派”成员的挑衅行为予以坚决的回击，不承认“前进”集团是个政治组织，不与它发生任何关系。6月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全体会议同意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这一决议，这是因为阿列克辛斯基与“前进派”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阿·弗·安东诺夫（勃里特曼）而引起的。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安东诺夫在1906年出卖过自己的同志。这一指控早在1907年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后否定。1912年至1914年，阿列克辛斯基重提此事，攻击布尔什维克包庇“叛徒”。

4月22日 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庆祝俄国工人出版节，纪念《真理报》创刊两周年。布尔什维克各基层组织广泛参加了这个活动。《真理报》收到了1107个工人小组、各种工会杂志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立陶宛的各工人报的编辑部寄来的贺信和捐款。到1914年4月，《真理报》已有8858个订户，分布在740个地点。同日《工人日报》创刊号出版，发表了列宁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等文章。列宁指出：“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懂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经历任何其他道路。”

5月1日 彼得堡、莫斯科、巴库、第比利斯、列韦里、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沃罗涅什、萨拉托夫、萨马拉、顿河罗斯托夫等城市举行“五一”罢工或游行示威。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有50多万人参加，其中彼得堡约25万。这次运动的规模超过了1905年。在1914年上半年，有150万人参加了罢工，其中参加政治罢工约占80%。

5月28日 巴库石油工人开始举行总罢工。油田发生了鼠疫和工人居住条件极端恶劣成为罢工的导火线。主要是由工人布尔什维克组成的罢工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有5万多人参加。沙皇政府派警察镇压工人罢工。大批工人被解雇,从家中被赶出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全俄各地开始募捐支援巴库罢工者。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科洛姆纳、基辅、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尼古拉耶夫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沙皇政府对巴库工人的迫害。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逐渐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罢工。

6月29日——7月6日 列宁在波罗宁领导了党中央委员会同来自俄国的党的工作者举行会议,研究杜马党团工作及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问题。来自彼得堡的基谢列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安尼·尼其佛罗娃汇报了国内的情况,讨论了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工作的性质。他们接受了必要的指示后,分别到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和乌克兰地区开展工作。在此期间,列宁多次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谈论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建议给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寄去从彼得堡运来的材料和报纸。

7月1日 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下,彼得堡各工厂的工人以“巴库的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巴库工人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为口号举行集会,支援巴库石油工人大罢工,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工人,普梯洛夫工厂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集会,被警察驱散。3日,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再度举行集会时,沙皇政府的警察向工人开枪,打死2人,打伤50人。4日,彼得堡举行了9万人参加的罢工。7日有13万人参加。8日至12日,有近64万人参加罢工。莫斯科、里加、华沙、哈尔科夫、第比利斯等城市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沙皇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平息这次事件,查封《真理报》、搜捕布尔什维克、捣毁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彼得堡委员会对形势作了

清醒的估计后，于10日决定有组织地暂停举行抗议运动。它在号召书中说：“当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政府正想把我们扼杀在血泊之中，我们决不允许政府实现这一目的！”

7月3日——5日 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召开的“统一”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该局领导人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派别”开会的目的，是“就恢复党的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列宁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本拒绝去，不过俄国工人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因为第二国际的威望还很高。所以中央委员会决定参加这次“联合”会议。但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同取消派联合，而是为了揭露他们，并证明八月联盟是个空架子。”印·费·阿尔曼德、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和伊·弗·波波夫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出席了会议。除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外，取消派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前进派”、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分裂派”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同“取消派”实现统一的条件应是：承认秘密的党，公开谴责取消派搞合法工人政党的思想；真正承认党的纲领，并且为实现党的纲领而进行实际斗争；公开承认国际主义原则并谴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每个党员必须参加一个秘密的党的组织并在其中进行工作；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条件遭到攻击。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说：“即使热衷于搞统一的俄国同志同意这些条件，第二国际也不会允许这样做”，会议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投票），决议案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并不存在妨碍实现“统一”的分歧，这样，在第二国际的支持下，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集团组成了联盟，列宁称它为“七月三日联盟”或“拯救取消派的布鲁塞尔联盟”。

7月15日(公历28日) 奥匈帝国开始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俄国沙皇政府于16日宣布局部动员。同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叶卡特林诺斯拉夫、里加、科斯特罗马、切尔尼戈夫等地组织印发传单,要求制止即将爆发的战争。沙皇政府为制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工人政党开始大规模镇压。

7月16日——17日 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向士兵和工人发出反战的传单,号召无产阶级同各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抗议即将到来的战争威胁,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传单中说:“他们号召你们为哥萨克皮鞭的光荣而死,为正在枪杀饥饿的农民、工人,正在监狱中摧残自己最优秀儿子的祖国的光荣而死。你们应该声明:不!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的是俄国的自由!这才应该是你们的呼声。”在里加、科斯特罗马、切尔尼戈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都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反战传单。传单中说,在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中,没有俄国工人的敌人,俄国工人应参加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同沙皇政府开展斗争。从7月16日到19日,布尔什维克印发传单6.4万多份,有10多种,传单一致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沙皇政府!”“俄国革命万岁!”

7月18日 7月15日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后,俄国根据密约支持塞尔维亚,宣布总动员。19日(公历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日,彼得堡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有2.7万人参加罢工。2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各小组代表在克雷拉特村(莫斯科郊区)举行会议,以确定在已经爆发战争的条件下的策略。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竭力破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反战运动。战后的头5个月内,宪兵队在彼得格勒(彼得堡于1914年8月18日改名为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图拉、舒亚、科斯特罗马、里加、萨马拉、哈尔科夫、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巴库和白俄罗斯等地,对布尔什维克组织进行了数十次搜捕,成千上万的先

进工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被逮捕和放逐。

7月20日 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在克雷拉特村举行了第一次反战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印发反战传单。在此前后,彼得格勒党组织多次举行会议,抗议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7月底,萨马拉布尔什维克举行党代表会议。根据下诺夫哥罗德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倡议,8月底举行了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索尔莫沃、卡纳维诺和下诺夫哥罗德组织代表参加的区联席代表会议,反对护国主义。同月在里加举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十次代表会议时,声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讨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对待战争的态度。

7月25日 奥匈帝国于7月24日(公历8月6日)对俄国宣战。根据奥地利当局的指示,25日,列宁在波罗宁的住所被搜查,因有人诬告他从事间谍活动。26日,列宁根据宪兵队的命令来到新塔尔克(加里西亚)长官公署,并在那里被捕,送到地方监狱。波罗宁宪兵给新塔尔克司令官的报告中说,列宁在家中曾与其他俄国公民举行过人数众多的会议。从宣布进行动员之后,居民中开始传播说,似乎他常去郊外高地,在路上拍摄照片。根据侦察表明,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不过他持有的是法文的身分证,却从彼得堡得到钱,同俄国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向他们传递涉及奥地利国家的情报。列宁在狱中缜密思考布尔什维克党在已经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所应有的任务和策略,经多方援救,列宁在8月6日被释出狱,回到波罗宁。8月23日,列宁一家迁往伯尔尼。

7月26日 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批准军事拨款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发表反战联合宣言,拒绝投票支持军事拨款,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宣言》表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坚决地谴责了战争,宣告一切交战国的统治集团都要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同时相信战争将使欧洲各国人民彻底地擦

亮眼睛,认清暴力和压迫的真正的根源。但在这份宣言中,明显地印有孟什维克“保卫祖国”的思想痕迹。宣言中说:“无产阶级是人民自由和人民利益的一贯的保护者,在任何时候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保护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受任何侵犯,不管这种侵犯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党团第一次共同行动,也是最后一次。

7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出席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基本结束。为筹备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下面成立了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并决定在莫斯科、高加索南部和乌拉尔也成立委员会,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的代表应到各地巡查。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尼·罗·沙果夫、阿·叶·巴达也夫等根据列宁的指示,分别应到乌克兰、爱沙尼亚、乌拉尔、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和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等地。1914年4月后,进一步加紧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初步确定了出席大会的人员和大会的议程。大会将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地方的工作报告,政治局势,党的组织任务,罢工运动的任务,保险运动的策略,对最低纲领的若干补充,民族问题,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召开的会议有关的取消派问题,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工作以及当时其他的迫切问题。代表大会原订于1914年8月维也纳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7月底,大部分的代表已经产生,委托书已经拟好,委任书也已准备就绪,甚至连秘密联络地点、具体路线和护照等技术性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由此而来的俄国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如沙皇政府封锁边界、中断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迫使党的代表大会只得推迟举行。原订的国际代表大会也没能召开。

7月——8月 布尔什维克的反战斗争深入发展。莫斯科、特维尔、彼得格勒、乌克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卢甘斯克、马凯耶夫卡、巴

赫姆特亚西诺瓦特、基辅省、沃伦省和波多尔斯科省的某些县)、里加、白俄罗斯(莫济里县、伊古缅县、平斯克县和先年县),在俄国南方(帕拉莫诺夫矿区、索菲耶夫卡矿区、韦罗夫卡矿区、瓦尔瓦罗波利耶矿区、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矿区)、在阿塞拜疆(巴库、巴拉汉内—萨崩奇区、甘贾、叶夫拉赫、多利亚尔、陶兹、阿克斯塔法),在察里津、柳季诺沃(卡卢加省),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等地,都出现了工人农民和预备兵的反战活动,在一些已被动员入伍并被派往前线作战部队的人中,出现了抗议沙皇政府战争政策的骚动。7月19日到8月1日,在27个省中有505名被动员入伍的人和106名公职人员被打死打伤。

8月23日——24日 列宁在伯尔尼写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8月24——26日,列宁出席并领导了布尔什维克一个小组在伯尔尼的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印·费·阿尔曼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费·尼·萨莫依洛夫等。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还定作为“社会民主党一个小组的决议”分发给在国外的其他布尔什维克支部。提纲秘密寄回俄国后,交国内一部分党中央委员、党的组织和杜马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讨论,获得一致赞同。提纲分析了战争的性质后指出,“这场欧洲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战争唯一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是:争夺市场;掠夺其他国家;力图制止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唆使一国的雇佣奴隶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提纲提出社会民主党现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队和战场上全面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把枪口对准各国的反动政府和反动政党,而不要对着自己的弟兄;同沙皇君主制度和大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宣传在俄国进行革命。10月3日,列宁接到来自俄国的通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的那一部分中央委员、布尔什维

克杜马党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赞同关于战争的提纲同意他的观点。

9月30日——10月1日 由第四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召集的扩大会议在穆斯塔米亚克车站(芬兰铁路)附近的内沃拉村举行。会议一致决定不接受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埃·王德威尔德提出的支持沙皇政府对德作战的号召。在此之前,王德威尔德曾来电报,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期间停止对沙皇政府的任何斗争,支持它为击溃德帝国主义所作的一切努力。布尔什维克党团坚持一贯的立场,拒绝同沙皇政府合作,反对给沙皇政府以任何支持,反对战争,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时的任务是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俄国的统治制度,实现当前的革命口号。包括上述内容的对王德威尔德电报的答复,是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萨拉托夫、里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后,才最后在内沃拉村的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还对彼得堡委员会关于为即将印发的革命组织力量的号召书全文表示赞同。会议初步拟定了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日期,并决定在代表会议上根据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讨论党的策略。

10月1日 列宁在洛桑作题为《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演讲,2日在日内瓦作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演讲。

10月12日 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领导人员的代表会议,讨论了组织问题和新条件下的工作任务。

10月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一年后,在瑞士出版的第33号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是列宁在同年9月28日以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欧洲大战的态度》的基础上写成的。宣言重申了已经开始的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

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宣言还抨击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左”的机会主义者，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等策略口号。这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了1500多份，《宣言》还被转送到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及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的一些社会主义报刊的编辑部。

11月2日——4日 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奥捷尔基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和形势和列宁的关于战争的提纲。除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全体成员外，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列·波·加米涅夫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尼·基·安提波夫和伊·雅·柯兹洛夫(彼得格勒)、瓦·尼·雅柯夫列夫(哈尔科夫)、伊·阿·沃罗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弗·弗·林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出席了会议。会议还确定了党内工作的主要任务，即巩固各地方组织同国外的联系，出版和财务问题，在军队中和合法组织中的工作等等。代表们表示，虽然党的处境极其艰难，但仍要克服困难，坚持开展秘密的革命斗争。会议还通过了改进地方工作的一些具体决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即11月4日，全体代表被沙皇政府宪警逮捕，使会议没能完成既定的任务。出席会议的杜马代表虽然很快被释放，但在5日晚，第四届国家杜马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再次被捕。12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梁赞等城市举行一天罢工和集会，抗议对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逮捕。

11月10日(公历23日) 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会并致贺词，在贺词中，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社会沙文主义以及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布兰亭提出建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贺词中

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行为的地方表示遗憾。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霍格伦反对布兰亭的建议,但是大会仍通过了布兰亭的建议。

12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写信给布尔什维克鲍日小组,批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未经中央允许即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信中声明说:单独出版脱离中央机关报的《明星报》是不能允许的,指出将经费和写作力量集中在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重要性。

1915 年

1 月 27 日 鉴于即将召开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孟什维克的《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建议就反对“正式的爱国主义”的一致行动计划进行讨论。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编辑部，对此建议表示同意，信中援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草案，并指出组织委员会和崩得是拥护“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的。信中对用“鲜明的革命国际主义”观点反对“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应当准备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在党的正式代表的会议上，在各种私人会议上）这样做。

2 月 1 日 在伦敦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马·马·李维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发言，宣读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待战争态度的宣言。出席这次会议有英国代表凯尔—哈第等 11 人，法国代表桑巴、瓦尔杨等 16 人，比利时代表王德威尔德等 3 人。俄国的有社会革命党代表鲁巴诺维奇、《思想报》代表切尔诺夫和波布罗夫，组织委员会的代表马依斯基等。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权利问题；殖民地问题；保障和平问题。李维诺夫在发言时抗议会议没有邀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当他宣读反战宣言时，会议主席以他的代表资格还没弄清为名，中断了他的发言，并说，召开会议的“不是为了批评别的党派”。他把宣言文本交给主席团后离开了会场。在会上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的有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杨·安·别尔津。会议期间，李维诺夫写信给列宁汇报会议

情况，并寄去会议的剪报。会议通过了王德威尔德提出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案。它以“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为名，欺骗各国人民，抹杀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彻底背叛了国际主义的原则。2月18日，列宁写的《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发表。文中摘引了李维诺夫的来信，同时指出：“掩饰社会沙文主义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完全不中用的”。

2月10日——13日 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对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进行审判。代表们被判永久流放土鲁汉斯克边区。在此期间，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萨马拉、索尔莫沃、里加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印发传单，抗议对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审判，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等城市举行了抗议审判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们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欧洲许多城市的无产阶级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沙皇政府对第四届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无理判决，并对布尔什维克给予声援，列宁出席了伯尔尼的群众大会。

4月14日——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举行。列宁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会民主党妇女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巴黎支部、苏黎世支部、伯尔尼支部、洛桑支部、日内瓦支部、伦敦支部以及鲍日集团的代表，其中有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印·费·阿尔曼德、弗·米·卡斯帕罗夫、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费·伊林、尼·瓦·克雷连柯、伊·科尔恩布柳姆、莫·马·哈利东诺夫、伊·雅·别连基、格·叶·季诺维也夫、尼·伊·布哈林等。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各地的工作报告；战争和党的任务（对其他政治集团的态度）；国外组织的任务（对各集团的总发动和事业的态度）；中央机关报和新报纸；对侨民事务的态度；流亡者“团体”的问题；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选举等。

代表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8 项决议。《关于战争的性质》的决议指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关于“保卫祖国”的口号》的决议，剖析了资产阶级及社会党人右派将这场战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目的。塞尔维亚的战争虽然具有民族的因素，但这只有从属的意义，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总的帝国主义性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决议重申了党的基本口号，同时明确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现在所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资本家阶级，在俄国实现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 8 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在所有落后的君主国建立共和国。”在《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对其他党派的态度》等决议中，强调了抽象地宣传和平对于真正地实现和平是毫无用处的；“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一切交战国，规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 1912——1914 年主要靠《真理报》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坚决从组织上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恢复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还对“欧洲联邦”口号展开了争论。这个口号是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篇宣言中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坚持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合适的。列宁后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认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这个口号都是不正确的。中央机关报第 40 号发表了伯尔尼会议的各项决议，受到各地布尔什维克的拥护。

3 月 10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信给孟什维克的《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该报 1915 年 1 月至 1916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团结所有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者问题，信中表示，“我们衷心主张国际主义者的团结。我们很希望国际主义者多些。但是不能自己骗自己，不能把那些明明成了国际主义方

面‘死魂灵’的人物和组织，也算做国际主义者。信中还表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有理由怀疑组织委员会“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沙文主义者的机关。信中还强调指出，团结的必要条件是在组织上同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决裂。

3月13日——15日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德、法、荷兰、瑞士、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的代表，其中包括国际妇女运动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和俄国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萨·阿尔曼德。俄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会议召开期间，列宁在伯尔尼领导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工作。1915年5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附刊发表了关于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的报告。

3月22日——24日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俄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保加利亚、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10个国家青年组织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向代表会议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内容包括布尔什维克对待战争的策略的基本原则，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由于出席会议的中派占优势，这些主张没被采纳。

6月2日——5日 科斯特罗马大亚麻纺织厂上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积极组织下，妇女在罢工中发挥出重大作用。她们在士兵中散发传单《俄国妇女告俄国士兵书》，呼吁士兵和她们站在一起，沙皇政府调集军队镇压罢工，6月5日有12人被打死，45人被打伤。

7月10日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附近的森林里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郊区代表会议（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罗德尼基、捷伊科沃、哥利奇哈、科赫马），有14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350

名党员。会议讨论了各个组织的工作,选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临时区域委员会。会议还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部地区党组织的名义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训练工人积极参加由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转到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路线,新成立的临时区域委员会在领导罢工运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7月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在奥拉尼恩包姆举行。有5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维堡区、纳尔瓦区、第一市区、瓦西里岛区、科洛姆纳区的500名党员。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 and 经济罢工问题,通过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会议标志着城市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初步完成。

8月10日 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爆发政治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散发的传单上写道:“工人和士兵们!错过时机就是犯罪。美好的生活、自由和权利全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宁肯为持久和平和自由而死在街垒里,也决不为敌人去卖命!当天有32个企业的2.5万名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傍晚,4000余名工人冲向监狱,要求沙皇政府释放在8月9日夜间逮捕的19名工人积极分子和党组织和领导人。军警奉命向工人开枪,打死100人,打伤40人。全国许多工业区愤怒抗议政府的暴行。彼得格勒、图拉、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索尔莫沃等城市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枪杀工人事件举行抗议罢工。在俄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8月10日 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发表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在这篇文章中,列宁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文中指出,从帝国主义列强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它们的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的。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就可能首

先在少数或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团结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8月23日——26日（公历9月5日——8日）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德、俄、挪威、法国、瑞典、荷兰、意、瑞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共代表22个小组和团体。这是第二国际瓦解后，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倡议下召开的。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问题。列宁代表左派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阐明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者散布的幻想，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方针，支持和推进一切革命行动，努力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由于机会主义者的阻挠，这个决议草案没能被全部采纳。在列宁和各国左派的坚持下，会议通过的宣言承认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指出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次会议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集团。列宁被选入这次会议成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在左派集团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反战立场。

8月29日《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合刊在日内瓦出版。这份杂志是由列宁创办、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版的。在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评论）》。列宁在杂志编辑部内部同布哈林、皮达可夫

进行了斗争，谴责他们用杂志进行派别活动的企图，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布哈林、皮达可夫断绝关系并停止共同出版杂志。自1916年10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版自己的文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以代替《共产党人》杂志。

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问题。7月间，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在委员会下面成立工人团，从而将“保卫祖国”的责任强加给无产阶级，使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实现“国内和平”的妥协道路。布尔什维克声明，坚决拒绝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次会议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对选举工人团的具体策略是“尽可能组织更多的工人参加全厂工人大会选举，力争选出布尔什维克提名的复选人，使他们在全市大会上宣读布尔什维克的反战决议，声明拒绝派工人代表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以此实现对这些机关的抵制。9月27日，彼得格勒选举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复选人全市大会通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决议说：“无产阶级的代表原则上不允许参加以任何方式帮助这次战争的组织”。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选举的第一阶段以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左派联盟的胜利而结束。

9月3日 彼得格勒、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萨拉托夫、哈尔科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爱斯兰等省工人为抗议解散杜马和物价高涨举行罢工。仅彼得格勒一地就有70个企业约8.3万人参加罢工，抗议沙皇政府逮捕普梯洛夫工厂30名工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有9万余名工人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罢工。1915年8月至10月，全俄有24.6万工人举行了340起罢工（其中173次是政治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的。

9月23日 叶卡特林堡、彼尔姆、车里雅宾斯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在叶卡特林堡举行。会议具有代表会

议的性质,会议通过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战争》等决议,明确阐述了列宁不久前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胜利的结论。与会代表赞同列宁关于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发动者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分析,强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同政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夺取人民革命起义的胜利。

9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彼得格勒重新建立。

10月4日 高加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巴库举行会议。斯·格·邵武勉和菲·叶·马哈拉泽领导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巴库、第比利斯和库塔伊斯组织的代表。会议强调,“现在全体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沙皇君主制,代之以民主共和国”,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形势、关于民族问题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内容完全一致。会议对组织问题非常重视,通过了将分散的地下基层组织联合成团结一致的完备的秘密的党的组织。会议最后选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对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展活动有重要指导作用。

10月5日——10日(公历18日——23日) 列宁在洛桑民众文化馆和日内瓦大学生“科学与生活”协会作《1915年9月5日——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报告。这是布尔什维克加紧联合左派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国外支部和国际主义者俱乐部都在举行会议,讨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总结。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在决议中认为,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总结“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客观上导致了重新建立第三国际即工人国际的第一步”。

10月 沙皇海军主力舰“汉古特”号水兵,因无法继续忍受低劣

的伙食和繁重的劳动发动起义。沙皇政府迅速镇压了起义的海员，其中2人判处死刑(后改判8年苦役)，24人被流放。在海员受审讯期间，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告陆海军书，号召军队同全俄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团结一致，反对沙皇政府专制统治。“汉古特”号水兵起义之前，驱逐舰“胜利者”号、主力舰“保罗一世皇帝号”和巡洋舰“俄罗斯”号的水兵在8月——9月也先后发生骚动，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全市代表会议举行。会议选出了党的市委会，并确定了在鼓动、宣传和建立区域组织等方面的任务。

1916 年

1月2日 列宁主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会上讨论了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常委会代表资格问题和出版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机关杂志《先驱》问题,在12日举行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会议上,讨论了为即将出版的《先驱》杂志创刊号而采取的措施问题。同月,《先驱》杂志在伯尔尼出版创刊号,发表了列宁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1月23日——27日 扩大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在伯尔尼举行会议,研究了筹备召开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问题。俄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瑞士等国家的23名社会党人出人席了会议。列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草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号召书《告接近本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起草《关于召开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列宁还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参加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问题的提议:《给1916年4月24日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在1916年(公历)4月24日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就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成员和议程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倾向于邀请中派领袖考茨基、哈阿兹和伯恩施坦出席代表会议。列宁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各成员的名义宣读了抗议声明,坚决反对这一个意图。列宁提议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的议程是(1)反对战争;(2)国际无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的策略;(3)无产阶级进行国际联系的方法和手段;(4)民族自决权。但中派只接受第一项,列宁关于讨论“成立反对战争

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问题的提议,也被会议否决。会议最后决定,只允许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各项决定的代表出席会议。扩大会议闭幕后,布尔什维克为召开新的代表会议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们向布尔什维克各国外支部寄出介绍会议情况和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信。为筹备代表会议,1916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出了专刊。

3月12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发表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通告。该通告是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的告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各党派书,在伯尔尼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二月会议上一致通过。当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代表团公开发表声明,该通告同国际社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德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相比,已经前进了一步,但是其中并不是一切论点都能令人满意。

4月11日——17日(公历24日——30日) 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在瑞士昆塔尔举行。来自俄国、波兰、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奥地利、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社会党人组织的43名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列宁、季诺维也夫、阿尔曼德等参加了大会的工作。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争取结束战争的问题,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议会工作、群众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召开社会主义国际局会议的问题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提出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对待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中派分子企图用帝国主义者之间可以实现“民主的和平”来欺骗人民的本质,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放下武器,掉转枪口对准共同的敌人——各资本家的政府”,但是,这项决议草案没被通过。此外,作为布尔什维克基本策略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组织第三国际等内容在代表会议上也没有通过。在列宁等左派的积极争取下,大会通过了一项批评社会和平主义和批评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工

作的决议。代表会议通过了新的反战宣言,向各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及人民群众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坚决反对战争,“奋起投入斗争,争取立即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昆塔尔代表会议结束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组织立即将会议文件秘密转送国内,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

5月2日 列宁在苏黎世布尔什维克支部的会议上作关于昆塔尔代表会议的报告。5月4日前,他写信给在伯尔尼的格·叶·季诺维也夫,要求必须给列·波·加米涅夫寄去供《社会民主党人报》用的评论初稿,并得到他的书面答复,认为鉴于昆塔尔代表会议决议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中央机关报最近一号上全文刊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就显得十分重要。5月20日,列宁又在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支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社会党人昆塔尔代表会议的报告。同日晚,列宁在日内瓦民众文化馆作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的报告。

6月19日 列宁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写作,将手稿寄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再转寄给帆船出版社。这部著作是1916年1月开始写的,列宁广泛利用了伯尔尼、苏黎世、洛桑等地图书馆的藏书,全面地深刻地研究和概括了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方面各种问题的大量资料。手稿交到出版社后,出版社中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马尔托夫机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并篡改了书中的重要内容,1917年初,出版社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1917年初,列宁回到俄国后,给此书写了序言,至年中这本书问世。

7月20日 布尔什维克组织的30名领导在彼得格勒被捕,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此外,还有120名党的积极分子遭到搜查。

8月6日 《工人政治》杂志发表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文集《在老的旗帜下》的评论,副标题是《答俄国社会爱国主义者》。该文集1916

年上半年在萨拉托夫出版,1917年在彼得格勒由生活和知识图书出版社作了某些删节后再版。文集中收集了波·瓦·阿维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等人的文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卫》文集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辩论。该文集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流传很广,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经常提到这部文集,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10月17日 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下,彼得格勒发生了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沙皇政府第181后备团的士兵站在工人一边。10月2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领导了群众性的罢工,抗议对水兵布尔什维克的审判和罢工企业的资本家的同盟歇业。

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彼得格勒重新建立。主要成员有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彼·安·札鲁茨基、维·米·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设在维堡区工人德·阿·巴甫洛夫的住宅中,同列宁及中央委员会的国外部分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同时同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特维尔、图拉、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基辅、哈尔科夫、沃罗涅什、喀山、顿巴斯、以及同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的某些党组织都建立了联系。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建立了巡视代办员网,代办员尤·赫·卢托维诺夫、伊·斯·加耶夫斯基、尼·古·托尔马切夫等在各地广泛开展工作。

12月 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该文件强调,“各国群众如果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不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就谈不上真正反对战争、消灭战争和建立持久和平。”在不断高涨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冲击下,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开始破产,《告工人书》指出:在昆塔尔投票

赞成对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进行谴责的一些最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之后,“竟完全滚进了这个被这次代表会议所谴责和所摒弃的社会和平主义的泥坑!”

1917 年

2月25日 彼得格勒 25 万工人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提出了“打倒沙皇”、“打倒战争”的口号。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士兵转向工人。2月27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号召推翻沙皇制度,成立工兵代表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定保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临时法令,镇压反革命,没收皇室、教会和地主土地,实行 8 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立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发动和团结群众,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取二月革命的胜利中起了重大作用。

3月27日——4月2日 布尔什维克党召开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就如何巩固民主革命胜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在对待临时政府问题上有三种认识:柯仑泰、莫洛托夫等人认为,临时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不应给予这个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和信任,应建立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革命政府。沃伊廷斯基等少数人把临时政府看作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管家,主张支持它的一切革命措施。斯大林认为,“只要临时政府在采取巩固革命的步骤,那就给予支持,只要它是反革命的,支持临时政府就不能容许”。会议还选举斯大林、加米涅夫等 4 人组成代表团,同孟什维克谈判联合问题。

4月3日 通过瑞士社会党书记弗里茨·普拉滕同德国驻瑞士大使达成的协议,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取道德国从瑞士返回彼得格勒。在彼得格勒芬兰车站,列宁受到数千

名工人和革命士兵的热烈欢迎。在一辆装甲车上,列宁发表演说,号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4月4日 列宁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刊登在4月7日的《真理报》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新国家的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列宁还提出,必须说明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只有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把土地收归国有;建立一个国家银行、由苏维埃对银行、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列宁建议,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创立新的共产国际。

《四月提纲》发表后,遭到党内多数中央委员的反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4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对2票否决了列宁的提纲。

4月14日——22日 召开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列宁指导代表会议的工作,并被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在会上,由于列宁的耐心解释工作,列宁的路线得到了多数代表的拥护。

4月24日——29日 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51人,共代表8万多名党员。会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起来。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米柳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和费奥多罗夫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6月3日——24日 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

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 822 人,布尔什维克 105 名,为少数。列宁在大会上提出,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建议政权转归苏维埃,被大会否决。大会选举了由 256 名委员组成的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占 35 名。列宁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布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进入主席团。

6 月 16 日——23 日 全俄布尔什维克军队党组织代表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 60 个前线和后方军队党组织的代表,代表党在军事组织中的 26000 名党员。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号召积极准备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的力量,以使政权转归苏维埃。恩·伊·波德沃伊斯基作了关于党的军事组织的宗旨和任务的报告,并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军事组织全俄执行局主席。会议还拟定了军队党组织的行动纲领。

7 月 9 日 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因受临时政府通缉,秘密转移到离彼得格勒 32 公里的拉兹里夫。

7 月 26 日——8 月 3 日 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半公开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71 人,代表 162 个地方组织和 24 万党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没在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政治工作总结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米尔加分别作了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由于七月事件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大会通过决议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和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根据斯大林建议,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大会吸收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入党。通过了新党章,强调各级党组织都要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并对入党的条件和手续作了新的补充。大会还选举了由 21 名中央委员和 1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等都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代表大会确定了

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方针。

8月31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1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

8月——9月 列宁在隐居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彻底摧毁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专政。新政权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二是国家职能不再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而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列宁认为,由于各国条件不同,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分析到苏维埃国家形式的特点,列宁提出,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是共产党;国家机关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苏维埃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机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论述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国家具有重大影响。

9月5日 莫斯科苏维埃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议案。布尔什维克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9月10日——14日 列宁从芬兰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号召党组织起义夺取政权,并为武装起义制定了总计划。列宁强调,武装起义不仅要选择决定性的关头,还必须选择决定性的地点,他认为首先应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起义来拯救革命,夺取政权。

9月15日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信。加米涅夫反对列宁关于组织起义的建议。中央否决了加米涅夫的意见,对列宁的意见只提出近期举行中央会议讨论策略问题。并作出决定,只保留一份列宁的信件,其他全部毁掉。

9月28日 列宁再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制止反对立即起义的

倾向和意见，并正式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以敦促中央早下起义的决心。

10月7日 列宁由拉希亚护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

10月10日 党中央开会讨论起义问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出席了会议。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政权转移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会议经过讨论，以10票对2票通过了列宁的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了反对票。会议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等7人组成的政治局。

10月11日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给党的地方组织写了一封《论时局》的信，反对武装起义。

10月12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实际是准备武装起义的指挥部。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等组织的代表。它的主席最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兹米尔，后来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

10月16日 在彼得格列列斯诺夫区杜马所在地，举行了有彼得格勒委员会、军事局、彼得格勒苏维埃、彼得格勒郊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10日会议上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会议选举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5人组成党总部，进入军事革命委员会。

10月18日 孟什维克左翼的《新生活报》刊登了《尤·加米涅夫谈“起义”》访问记。加米涅夫以他本人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声明不同意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斥责他们的行动为“卑鄙的叛变活动”，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10月24日 清晨，临时政府派士官生和警察突然袭击了布尔

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决定，派遣立陶宛团士兵到《工人之路报》印刷厂，赶走警察，保证报纸照常出版。报纸上的社论号召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交给苏维埃。

上午，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等 11 名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各中央委员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并派专人监视临时政府的动向，负责各方面的联系。

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卫戍部队发出《第一号书面命令》，要求作好战斗准备。还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无线电台向所有守卫彼得格勒郊区的部队发出加强防卫的命令。24 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向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德宾科发电报，要求派遣一艘巡洋舰、4 艘鱼雷艇和 5000 名水兵到彼得格勒来。

24 日晚，列宁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出，起义必须在今天晚上，不能等待了。深夜，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领导武装起义。

10 月 25 日 起义者占领了火车站、发电站、国家银行、电话总局和政府机关等战略据点。

10 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下午 1 时，起义者占领预备国会所在地玛利亚宫。下午 6 时，冬宫被 2 万起义部队围住。晚 9 时 40 分，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炮，“阿芙乐尔”号也开了炮。起义部队攻打冬宫。深夜 1 时 50 分，冬宫被占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大都被捕。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获得胜利。

同时，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和省委员会以及区域局成立党的战斗总部，成员有弗拉基米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等人。当晚，莫斯科工

兵苏维埃召开会议。根据布尔什维克建议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7名委员中有4名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成立后成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0月25日——27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召开。与会代表625人，布尔什维克309名，占了多数。列宁等14位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被选进主席团。

26日凌晨，卢那察尔斯基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大会以绝对多数（2票反对和12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宣言。宣布各地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26日晚，列宁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大会还批准产生了工农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全部由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等等，共成立了12个人民委员部。

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了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占62名。加米涅夫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代表大会于27日清晨闭幕，它的意义在于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

10月29日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反对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他们利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当天开会，作出决定，派代表同铁总执委会谈，原则上不反对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政府，但这些党派必须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革命纲领，新政府应对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负责。

11月1日——7日 由于加米涅夫等人在全俄总执委会组织的各政党和民主组织代表会议上采取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列宁提出中止同全俄铁总执委会谈判，反对加米涅夫的行为。2日，党中央扩大会议，米柳亭、李可夫等人支持加米涅夫的意见，形成中央内部的反对派。中央会议通过《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严肃批评了反对派，指出，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了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愿。拒绝这个政府就背叛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反对派不接受中央批评，在2日夜举行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会议上，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与党中央意见不同的决议案。中央执委会根据这一议案通过继续同所有的“苏维埃政党”谈判政权问题的决议，邀请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参加政府。3日，列宁起草了中央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保证服从中央决议。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中央委员的同意。4日，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米柳亭和诺根拒绝提出书面保证，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担任人民委员的宣布退出政府。7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严厉谴责了反对派的辞职。8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撤销加米涅夫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任其工作。党还任命彼得罗夫斯基接替李可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施利希特尔接替米柳亭担任农业人民委员，布隆斯基担任副工商业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内少数派的危机被克服了。

11月8日 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外交人员委员托洛茨基正式照会英、美、法、意等国，建议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开始和平谈判。

11月20日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力主俄国立即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越飞率领的苏维埃政府代表团与东线参谋长霍夫曼将军率领的德奥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停战谈判。苏维埃代表团提出在所有战线上停止军事行动，停战分界线以现行的战线为

准,停战期限为6个月。

11月26日——12月10日 全俄农民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90名,布尔什维克91名。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努力下,大会决定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大会新选出108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20名,他们全部进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12月9日 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达成联合组阁的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

12月12日 列宁写了《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基本观点。他指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高形式。而现在产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一种更高的民主制,是唯一能够保证平和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列宁还提出,立宪会议应无条件地承认苏维埃政权,否则应用革命手段对付立宪会议。

1918年

1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团在立宪会议上宣读宣言,宣布退出立宪会议,“以便把怎样对待立宪会议中的那部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提交苏维埃政权作最后决定”。

《宣言》说,反革命在现在的立宪议会占多数,它企图阻挡工农运动的道路。“俄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立宪会议承认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就,承认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监督法令,并且首先要承认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实现俄国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提议立宪会议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然而,立宪会议的多数竟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否决了这个提议,竟敢向俄国全体劳动人民挑战”。《宣言》还指出:右派社会革命党“在口头上对人民什么都答应,而事实上却决定反对工兵农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措施,反对把土地和一切农具无偿地交给农民,反对银行收归国有,反对取消国债”。

1月12日 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通过。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团曾提请立宪会议讨论《宣言》,被拒绝,布尔什维克党退出了立宪会议。

《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各自由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为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宣言》还宣布实现土地社会化,废除土地私有制;批准关于工人监督等法律,将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收归国有,把一切银行收

归国有；为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并组织经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

《宣言》宣布“废除秘密条约，在交战国双方军队的工农之间组织最广泛的联欢，通过革命办法无论如何要达成劳动者之间以及民族自由自决为基础的不兼并不赔款的民主和约”。同时宣布芬兰完全独立；从波斯撤兵和阿尔明尼亚自由自决；废除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订借的一切债务。

1月18日 列宁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并致闭幕词。列宁指出：“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现在，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意义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被认识到了。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规划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

列宁在闭幕词中强调：“一切伟大的革命总是竭力彻底肃清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竭力夺取政治权，而且竭力从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手中夺取国家管理权，以便永远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伟大的革命就是力图摧毁这种旧的剥削者的国家机关，但是这项任务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彻底完成”。

1月24日 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同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告全体党员书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该文件说：“在接受和约条件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决定既然已经通过就应该得到全党的支持”。现在“绝对必须同德国签订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不能自卫”。现在进行战争，客观上就是受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主张现在进行革命战争或借口支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行革命战争，这都是空谈。因为这只对俄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

阶级有利,而对我们是死路一条。

3月6日——8日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6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58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大会代表着17万党员,当时党已有不少于30万党员,但相当多的一部分组织没来得及选派代表,或某些区域的部分领土被德国人占领无法派出代表。

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即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这是一次紧急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3. 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4. 组织问题;5. 选举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等决议。

代表大会通过了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的决议。并选出了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新党纲,并把列宁拟定的草案作为党纲的基础。

代表大会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决定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并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在通过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的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锋队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采取最有力的、十分果断的和严厉的措施来加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自我纪律和纪律”,同时教育群众奋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组织红军,对人民实行普遍的军事训练。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

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斯基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3月6日 布哈林、奥波科夫(洛莫夫)、乌里茨基、布勃诺夫“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发表《告全体党员

书》。其中说：“情况的严重性和我们党内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即和约问题上所存在的重大分歧，迫切要求我们在召开党代表大会之际提出明确的政纲”。“左派共产主义者”指出：“生活将在最短时期内无情地打破一切幻想：似乎革命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可能得到和平与喘息时机。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会的和平政策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在目前把这部分人的意见公开说出来是尤其必要的”。

“这种政策，从它的社会基础来看，是从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转为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士兵的立场；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来看，它作了机会主义的推测，认为有可能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和平地发展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无论是由于德国的掠夺性君主制同俄国的无产阶级制度之间的社会对立，还是由于德国的实际企图（它不在东方掠夺和推翻苏维埃政权，就不能在西方继续作战），这都是不可能的；最后，从直接实践的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将导致接受无法接受的条件，导致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中投降”。

《告全体党员书》最后说：“在党代表大会面前，我们认为必须极其严肃地提出问题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讨论。我们相信，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将象革命的无产者所应该的那样，而不是象没有固定阶级性的投机小贩那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号召我们光荣的、战斗的党的全体党员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3月8日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言，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争取暂时的喘息时机。他认为这是一个“带给我们不可胜数的损害并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眼里侮辱我们的条约”。

他说：“列宁同志硬说，我们在谈论西欧开始的革命烈火，我们用玫瑰色来描绘应该用黑色描绘的形势。而他自己则片面地把情况描写成漆黑一团，断言我们不能作战。但当讨论关于喘息时机这个主要

问题的时候，列宁同志都向你们描述玫瑰色的前景，发展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那种前景。必须肯定地说：列宁同志，你们是否敢断言，你们是否能说，是否能证明，是否能向工人们讲，你们会得到喘息时机来组织你们所讲的全部规模宏大的事业呢？我们肯定说，不仅不可能，象季诺维也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回答，因为可能成功，可能不成功’，——而且只能提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你们不走上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就不把这样的喘息时机给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能得不到喘息时机。有一点很明显，而且我绝对地肯定这一点：在保持苏维埃政权的工人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得不到这种喘息时机。”

布哈林强调苏维埃俄国的唯一前景就是进行反国际资本的战争。他说：“同志们，事实将使我们的路线迟早占上风，只有接受这条路线，我们才能拯救苏维埃政权和这一政权的社会主义内容”。

4月28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此之前，列宁曾撰写《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并于4月26日提交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全会一致同意这一提纲，并决定以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并出版单行本。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为完成这一任务，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上的“中间站”，以达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目的。当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后，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首要地位。

列宁在文章中还提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办法，如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制，加强劳动纪律，反对平均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在加速培养无产阶级

自己的技术干部和专家的同时，利用和吸收资产阶级的技术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5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发出号召书，致俄国共产党各委员会和小组，告全体党员，号召书说：“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极危急的时刻。在国内争取无产阶级的完全统治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大体上已战胜了大资产阶级，大体上已在城市中站住了脚根。在农村中，同资产阶级、同富有阶层的斗争还刚刚开始。农村由于经济上落后，虽然迟一些，但也正经历着它的各不同阶层之间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饥荒和失业，残酷的经济破坏，普遍的混乱状态——这三年半无比痛苦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只有工人阶级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克服”。俄共(布)中央认为，国际形势也是很严重的，“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俄国充满仇恨。从西方到东方，强盗们正准备对我们下手。同德国签订的和约给了我们一段喘息的时间。这个喘息时机会有多长，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的”。俄共(布)中央强调：“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重的时刻”，号召全体党员自觉担负起决定苏维埃俄国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的伟大任务。

8月16日 列宁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关于组织同情小组的问题。列宁在会上两次发言，他说：“现在力量极感缺乏，而群众中是有可以利用的力量的。要更加相信工人群众，并善于从他们中间吸取力量。为此，可采取下列办法：把青年中和工会中的同情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要利用精神上的影响来扩大我们的党”。他强调“必须从工人中提拔青年，以便实现工人群众的监督”。“党员应该在工人当中大力开展鼓动工作”，“必须扩大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必须重视俱乐部工作，从群众中吸取党的工作人员”，列宁还特别强调，“不可任用那些追求地位的人，应当把这种

人驱逐出党”，会议以列宁的提议为基础，通过了着手建立同情小组和制订该组织章程的决议。

8月30日 列宁在巴斯曼区粮食交易所的群众大会上和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前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上发表《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演说。当列宁走出工厂时，遭恐怖分子范·卡普兰枪击而受重伤，有两颗子弹留在体内。

9月19日 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来信《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这封信是列宁为回答代表会议给他的致敬电而写的。列宁在信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取得和实现本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统治。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来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折磨、压迫和分散的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列宁还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推荐工人管理国家”事务上给予帮助。

9月27日 俄共（布）中央发表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号召书。号召书说：“在此以前，我们的党提到第一位的是政治工作，因此集中许多力量进行政治工作和工会运动。合作制问题，只是由于同小资产阶级的合作社派空想主义者作斗争的需要才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实际生活证明了我们党的立场正确，并且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只有取得政治统治才能解放”。

俄共（布）中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产品实行有计划的分配，要求组织消费公社。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中，合作社由于包括了几乎全体居民，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意义”。“私人商业机构的消灭，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农业和工业之间正确地实行劳动交换，向新的工资形式的必然过渡（代替现行的工资形式即货币形式），有计划地

分配产品等等,这一切都要求国家供应机关和合作社的活动实行密切的联系。为了使合作社的活动完全协同一致,国家供应机关必须参加到中央、地区、省和县的联社的理事会中去”。

俄共(布)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立即开展最广泛的鼓动,争取工人大规模地加入工人合作社,说明合作社的作用已经改变,说明合作社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中的全部意义”。

11月6日 列宁出席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并发表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的演说。列宁说:我们一向认为,我们首先开始了在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并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困难的军事战略情况,才使我们在事变进程中走在其他部队的前头,没有等到他们赶上来和行动起来”。列宁强调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只有当农村经济、贫农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时,才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完备的巩固的基础。他认为“这个最伟大的革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使我们的农村走向社会主义,表明了整个斗争已经获得胜利”。

关于国际形势,列宁指出:“随着革命的国际意义的增大,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也愈加疯狂地勾结起来”。“由于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and 成功,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反抗和仇恨愈加厉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真正的实在的策源地,“因此,我国革命的成就愈大,敌人的数量就愈多”。列宁认为不应当掩饰苏维埃俄国处境的严重性,要认清形势,认清所面临的危险,“再接再厉,牢记着我们不是为俄国革命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最后的决战”!

1919 年

1月18日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开幕。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出席代表会议,并严厉批评了以伊格纳托夫为首的部分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列宁说: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和投机行为。经济破坏状态还没有消除,但要消除破坏状态,只有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义的利益,可以看出,这种地方主义利益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而集中制是我们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提出决议案的这部分同志离开了集中制,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列宁还说:“官僚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伊格纳托夫提出的提纲,斗争的锋芒并没有对准目标。”

伊格纳托夫等人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被坚决否决。

3月2日——6日 列宁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被选进主席团。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俄共(布)领导人也出席了大会,并做了报告。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共产国际正式成立。3月6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他团体在大剧院联合举办的庆祝会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成立的演说。他说:“当人人懂得‘苏维埃’这个词的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保证了。在这个大厅里的同志们已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现在他们又看到第三国

际即共产国际是怎样成立的，他们也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将是怎样成立的”。

3月16日 俄共(布)中央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逝世。18日，列宁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是冷静而熟练的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领导群众的典范，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群众仿效这种范例、不断前进、达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会议结束后，列宁随同送殡行列来到红场，并在斯维尔德洛夫墓前发表简短演说，他强调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位为组织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胜利做了最多工作的无产阶级领袖。“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在他的墓前庄严宣誓，要更加坚强地为推翻资本、为彻底解放劳动者而奋斗”！

3月18日——23日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01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313766个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102人。代表大会是在苏维埃俄国被外国干涉者包围，处在很困难很复杂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 俄共(布)党纲；3. 共产国际的成立；4. 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5. 农村工作；6. 组织问题；7. 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就上述议程的第1、2、5项作了报告。列宁宣布了对待中农的新政策，使这次党代表大会成为俄共(布)对待中农的政策转折点。这意味着由中立中农政策转向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的巩固联盟，以便对付白卫匪帮和外国武装干涉，以及在保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情况下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共(布)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反对富农。

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纲认为：十月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农或半无产阶级的赞助下开始建立共产

主义社会的基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的发展进程,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其目的在于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推广,这一切表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党纲还从“在一般政治方面”、“民族关系方面”、“军事方面”、“司法方面”、“国民教育方面”、“宗教关系方面”、“经济方面”、“农业方面”、“分配方面”、“货币和银行方面”、“财政方面”、“住宅问题方面”、“劳动保护和社会保护方面”、“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具体地阐述了俄共(布)的任务。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关于军事问题、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对中农的态度、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关于无产阶级的妇女的工作、关于青年的工作、关于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由于新党员大批涌入党内,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和进行重新登记的决议。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19 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列宁、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候补中央委员有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 8 人。代表大会还选出了由库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 3 人组成的检查委员会。

7月9日 《俄共(布)中央纪事》第4期发表由列宁撰写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信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国内的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俄共(布)中央要求“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击退并战胜邓尼金。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

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用来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攻,并把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缩小和改变,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7月12日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召开。有200余名莫斯科市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会议通过了加强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决议,其中包括军事工作、粮食工作、社会保证、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在工人和红军中开展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等。

列宁出席了代表会议,并就国内外形势作了报告。他说:“现在的情况比去年好得多,现在我们有了去年连想都不敢想的粮食资源了。去年敌人占领的地区要大得多。现在我们在即将获得丰收的东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经验。这是最主要的。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克服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关于国际状况,列宁指出:“在一切敌视我们的国家中,与我们友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在芬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德国,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同日,俄共(布)中央拍电报给土尔克斯坦政府,强调要吸引当地居民参加国务活动。10月,为派遣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处理土尔克斯坦事务的委员会去土尔克斯坦纠正地方工作人员在执行民族政策所犯的错误,列宁写了《致土尔克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一信。列宁说:“请允许我不用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而用一个党员的身分给你们写这封信”。列宁认为苏俄对以前是被压迫的各弱小民族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我恳切地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努力以实例和行动同土尔克斯坦各族人民建立同志的关系;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们是真心想要消灭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切残余,以便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领导者英帝国主义作忘我的斗争”。

8月10日——17日 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

党组织、吸收工人和工农青年入党的决议，彼得格勒举行征收党员周。9月20日至28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举行了征收党员周，10月8日至15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同年9月2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在其他城市和乡村、部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决议。当时有20多万人入党。列宁强调：“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其目的在把这些‘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9月30日 俄共（布）中央发表致俄共各组织的通知信。信中说：“业已结束的1918——1919年度的征粮运动的结果说明：苏维埃的粮食政策在当前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粮食机关依靠忍饥挨饿的工人群众和贫苦农民，并在他们的直接协助下，在组织方面工作得更有效了。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在正在到来的新的征粮运动中，必须彻底地实行先前的粮食政策，遵循既定的道路，竭尽力量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国家的粮食机构”。

俄共（布）中央在信中提出，在1919——1920年度，粮食采购量应比1918——1919年度多两倍以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当确定对农村、对中农群众的正确态度”。“消灭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农场，定期地提高新收获的粮食的固定价格，向农村供应商品并同地方当局的恣意妄为作斗争——这就是苏维埃政权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对待中农方面所走的道路”。

俄共（布）中央在信中强调：“一贯地和坚定地在农村贯彻执行粮食任务，——这既是一项粮食任务，又是一项政治任务”。为此，决定在各地成立临时的省粮食收获会议，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主持，有省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和省粮食委员参加。该会议的工作

内容是“统筹安排贯彻执行粮食任务的一切措施,并就地解决粮食机关在坚决贯彻粮食任务时必然产生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俄共(布)中央号召粮食收获会议和地方政权机关“必须表现出最敏锐的政治嗅觉、最大的干劲和最大的百折不挠的坚定性”努力完成粮食征收任务。

10月 为广泛宣传俄共(布)执政后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对广大群众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写成《共产主义ABC》(原名《共产主义入门》)。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通俗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同时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出发,对民主与专政、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财政金融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列宁认为此书对加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价值。到30年代初,该书再版近20次,并译成20余种外文出版。

11月2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列宁拟定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并将其交付专门委员会审订。后经列宁修改后,于1919年11月29日由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公布。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批准了这一决议。

决议说:“俄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承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并“努力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建立联邦关系”,同时要求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

俄共(布)提出乌克兰土地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废除邓尼金所恢复的地主土地占有制。建立国营农场的数量和规模要有严格的限制,要照顾到周围农民的利益。在建立公社和劳动组合时不得有任何强迫行为。违者要受到严惩。

11月22日——12月3日 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来自土尔克斯坦、阿塞拜疆、希瓦、布哈拉、柯尔克兹、鞑靼、楚瓦什、巴什基里亚和高加索及其他地方各伊斯兰民族的共产党组织的代表 80 余人出席了大会。11 月 21 日，中央委员们和部分代表共同举行了预备会议，列宁任主席。列宁在 22 日作了报告。他指出：“东部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俄国还坏。……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即遭受中世纪压迫的劳动农民”。

列宁强调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特别强调，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解决任务的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应在斗争中“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

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的工作总结报告，选出了新的常务局，并规定了党和苏维埃在东部的工作任务。

11 月 俄共（布）中央就“与燃料危机作斗争”问题通过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信中说：“与燃料危机作斗争已成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了”，因为“燃料危机有破坏全部苏维埃工作的危险：工人和职员因饥饿交迫而四零五散，运粮的列车中途停止，由于缺乏燃料而造成的真正灾祸日益逼近”。俄共（布）中央强调：“燃料问题成为最中心的问题。无论如何要消灭燃料恐慌，否则既不能解决粮食任务，也不能解决军事任务和全国经济任务”。为了克服燃料危机，俄共（布）中央号召广大劳动群众“发挥革命积极性来迅速地大批地开采和运送各种各样的燃料，如煤、页岩和泥炭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俄共(布)中央建议各级党组织采取以下办法完成解决燃料恐慌的任务：1. 各级党组织今后要把同燃料危机作斗争的问题作为一项经常议程。2. 一切苏维埃机关也要这样做，在全国范围内抓紧这项工作。3. 在农村进行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反对地方利益、乡土利益和狭隘的本位利益的倾向。4. 极认真地检查党的指示和苏维埃政权的委托、要求、指令的实际执行情况。5. 最严格最迅速地推行全民劳动义务制，或动员一定年龄的人去采煤、伐木，并把它们运到车站上去。6. 更经常地、更积极地、更有系统地、更有组织地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利用这种劳动解决燃料问题。7. 应派优秀的党员干部去加强地方燃料机关。8. 对于从中央派出的同志，应该尽力予以帮助，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大量青年人材来组织、安排和进行燃料工作。9. 粮食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保证从事燃料工作的人马有粮食和饲料。10. 在一切燃料机关(以及一切苏维埃机关)中，要力求使每个人明确地严格地各自负责一定的工作。11. 处理燃料问题的公文必须迅速而及时。稍有迟误就应予以严办。12. 全部燃料工作应当按军事方式进行，要像战争所需求的那样果敢、迅速、纪律严明。否则，就不能战胜和摆脱燃料恐慌。

12月2日——4日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45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73个有发言权代表。这次代表会议是苏维埃俄国在内战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主要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2. 国际形势；3.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议题(只讨论苏维埃建设问题)；4. 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5. 党章；6. 关于对在征收党员周中入党的新党员的工作；7. 关于燃料恐慌。

列宁致开幕词后，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契切林同志的报告和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草案；党团向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提出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草案；党团向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燃料供应的决议草案；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策；关于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关于使用新党员的提纲；党团向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草案。

代表会议对俄共（布）党章作了许多修改，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规定：“新党员由地方党委员会从预备党员中接收，并由该组织的最近一次全体大会批准”。“凡志愿入党的人，都须经过预备期，其目的在于使预备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预备党员的个人品质”。这次代表会议还提出了一项任务，即吸收在国内战争的艰苦年头入党的新的工人群众参加党的工作。

12月4日 列宁出席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说。与会的140名代表中，有93名共产党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全俄农业劳动生产组织联合会章程。

列宁在演说中指出，不改变落后的农民经济，就不能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耕种方法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制的、劳动组合制的经济帮助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一下子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

12月20日——21日 俄国（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全俄党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关于斑疹伤寒及其防御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别任务部队。20日，列宁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列宁说：“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当做我们党的名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

成了某种危险”。“如果把采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现在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会是极大的歪曲,那就会造成从事无谓的吹牛的实际害处”。

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纯粹是对国家的一种实际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应该了解这一点),它能帮助党清除混进党来的分子和肃清党在腐朽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受的坏影响”。

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强调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意义,指出它是具体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

1920 年

1月14日 俄共(布)中央发表致俄共地方组织的通知信,号召全党都来参加运输工作。通知中指出:“国家的经济状况困难已极。各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一天也没有免除挨饿受冻之苦。农民痛感缺乏最必需的工业产品。红军的极大胜利,只有在我们要在最短期间振兴我国国家经济机构的情况下才能看出其巨大的经济意义”。俄共(布)中央认为,开展一切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主要困难就是空前严重的铁路运输状况,国家的整个命运已经同运输状况联系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依靠最优秀、最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工作人员。必须把他们从其他岗位上、从其他苏维埃工作中调来,以足够的数量集中在铁路主管部门中,他们现在应当特别努力地对对待这个部门的工作,以适应任务的极端严重性”。

俄共(布)中央宣布,动员优秀的党员工作人员从事铁路运输工作和在春季到来之前做好水路运输的准备工作,同时强调这“如过去反革命军队以死亡威胁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中央委员会首先向党内进行广泛军事动员一样”。俄共(布)中央还强调:“在任命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参加铁路主管部门的工作时,不应当考虑任命是否与某个同志在其他部门曾经担任过的职务相称,而应当只考虑是否符合恢复运输业的工作需要”。“奉行特定的职位等级制而不遵从事业本身的绝对要求,这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说是很不相称的”。

3月2日 《俄共(布)中央通报》第13期发表俄共(布)中央《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信中说:党代表大会对俄

国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目前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最困难的转变，必须由全力执行军事任务转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那么，我们党代表大会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信中强调，当前需解决的迫切任务是“收集和运送国家的大批粮食，恢复被破坏的运输业”，“实行苏维埃机关‘工人化’，消灭机关中的怠工行为和官僚主义，把劳动生产率提到最高限度，最大限度地发动国内的一切力量来恢复我国的经济”。俄共（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全力来实现这项任务”。

3月13日 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厦举行。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俄共（布）中央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提纲。提纲规定要动员熟练工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实行经营管理军事化和利用部队进行经济建设。列宁出席了代表会议，作关于俄国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报告。列宁认为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其标志是“我们对所有协约国即所有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列宁指出，苏俄的处境仍很困难，“流血战线上的战争行将结束，而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战场上事情比较简单，而要战胜经济破坏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持续多年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才能学会不白白浪费一分一秒，不埋没一个多少表现出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才”。

3月16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集会，纪念斯维尔德洛夫逝世1周年。列宁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说斯维尔德洛夫“有非凡的组织天才”。他认为组织是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要武器，没有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促成我们逐步克服经济破坏的主要力量，就是组织。列

宁认为今后在劳动者中间将会出现愈来愈多的组织家，沿着斯维尔德洛夫的方向坚定地前进。

3月29日——4月5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5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共代表611978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162人。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 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3. 工会运动；4. 共产国际的任务；5. 组织问题；6. 对合作社的态度；7. 实行民兵制；8. 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听取列宁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决议。此外，还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关于建立各经济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对合作社的态度，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实行民兵制，政治部同党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动员人力参加运输业工作。

在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俄共(布)中央强调：我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根据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国家极端贫困的事实，经济计划自然应当被分成若干循序渐进的、互相制约的根本任务：1. 首先改进运输状况，调运并储备最必需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 制造交通运输工具，制造开采燃料、原料和生产粮食作物的机器；3. 加紧发展生产日用品的机器制造业；4. 加紧生产日用品。决议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电气化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占有主要的地位。

代表大会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发去致敬电。电文说：“你们以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拯救了工人和农民的事业，你们以自己的胸膛保卫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你们烈火般的革命热情和你们为劳动群众的解放而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比你们敌人的坦克、装甲舰和黄金更为强大。两年来，你们在反对优势敌人的伟大斗争中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你们歼灭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米列尔和邓尼金的雇佣军。你们击退了世界资产阶级的一切

进攻，你们为社会主义祖国夺回了极富饶的地区，你们打破了饥饿的封锁圈，并迫使苏维埃俄国的人数众多的敌人同俄国缔结了和约。

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安·安·安德烈耶夫、米·伊·加里宁、阿尔乔姆（费·安·谢尔盖耶夫）、费·艾·捷尔任斯基等人。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有维·米·莫洛托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

4月3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建立各经济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在最近期间订出一项制度，确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其他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之间在日常工作中的组织联系，以保证在执行党代表大会批准的经济计划时行动完全一致。

4月3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构的形式。决议说：“工会是按各个大的生产部门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它同这些生产部门有直接联系，因此工会是这些生产部门中极有权威的组织，是管理工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基础”。“这表现在，工会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它决不专门而纯粹地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而是从下到上地参与组织生产的工作。同时，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工作”。俄共（布）中央强调：“工会在工业行政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行政部门的一切环节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整个工人阶级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还将不断增强”。

4月3日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决议强调：代表大会认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在农业和分配方面所规定的、把旧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变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领导的合作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这个党纲中的原则，代表大会建议俄共（布）中央在农业和分配方面按以下指示进行

工作：在消费合作社方面，决定逐步撤销地方消费合作社、省消费合作社总社和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中一切同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相应的部门中，即工业、林业、农业、文化教育等部门中互相重叠和互相竞争的部门，并将它们交给相应的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关于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代表大会认为把各种较富裕的农民按不同的农业和手工业部门联合起来的组织划归包括所有的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消费合作社机关管辖的第一个步骤，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步骤就是取消农业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独立的全俄中央组织而把他们合并到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中作为它的分部。

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负责改组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的基层联合组织。在改组时“力求不挫伤已经参加和正在参加这些合作社的农民生产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使它们的产量有增无减”，同时，“把省和区范围内的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划归相应的消费合作社联社管辖，作为联社中有自主权的生产部分”。“在生产业务方面，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应当完全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它们只是在行政政策方面受消费合作社管辖”。

4月23日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举行晚会，庆祝列宁50寿辰，莫斯科的党的工作者出席了晚会。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奥里明斯基和斯大林在会上讲了话。列宁致答词，就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发表了讲话。列宁指出：“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列宁认为，俄共(布)曾取得辉煌的胜利和成就，但那主要是当时的军事斗争的形势造成的，“还不能解决主要的困难……使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暂时搁下来了，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把这些任务搁下来了，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来妥善地解决这些任务”。因此，俄共

(布)现在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需加倍努力工作。

5月 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布哈林的重要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共11章,主要内容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经济、国家政权和战争;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生产力,革命的耗费和技术变革;过渡时期的一般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按照布哈林的计划,本书是第一部分,其后应有第二部分,把一般理论联系俄国的实际,阐述现代俄国的经济,但未能成书。

7月19日——8月7日 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等出席在彼得格勒(后移到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列宁还在会上作了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列宁强调了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反对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还要“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深入批判这些问题作了必要的理论上的准备。7月1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乌里茨基广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纪念碑奠基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同日,他还同与会的代表前往彼得格勒马尔斯校场革命烈士墓献花圈。

9月22日——25日 俄国(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16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25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波兰共产党员代表的报告;2.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3.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4.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5.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6.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同波兰缔结和约并准备彻底粉碎弗兰格尔白卫军的问题。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和决议。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和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等建议。

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代表会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统一和党的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以及从无产阶级群众中吸收新党员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决议指出，“必须特别重视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在重新登记的工作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个追求个人名利的可疑的共产党员，带来两三封介绍书，就没有二话地被登记入党，然而，一些工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时间、不愿意或者不会搞到相当的介绍书，就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在进行重新登记时，对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必须把各种形式上的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党，则应尽量加以限制”。

代表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在地方上则在省委员会下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

10月4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当前的劳动动员致俄共各省委的指示。俄共(布)中央指出：各重要工业部门劳动力需要量极大。兵工厂、突击运输队还是各交通线，都迫切感到缺乏工人。“我们的军队需要补充，但是我们却有成千成万的青年人因为没有岁数更大一些的人代替他们而不得不把他们留在各种企业以及木材采伐、燃料装运等场所”。俄共(布)中央认为，各企业需要16万熟练工人和近30万非熟练工人。这些劳动力，“今年秋冬两季就必须向我们的工业提供”。因此决定对1886、1887、1888年出生的公民实行劳动动员，同时系统地从农村吸收在那里定居的经过训练的工人。

俄共(布)中央强调有成效地进行动员特别重要。“应开展广泛的鼓动,向群众充分解释这些劳动动员的意义和发展公有的有组织的经济对全国福利的重要性”,在进行直接动员的工作方面,应特别注意:1. 对不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和职员作出确切的统计;2. 在免除动员和因病延期动员方面不许有滥用职权的行为;3.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容有地方主义倾向。

10月9日 俄共(布)政治局会议通过以下决定:1. 认为代表大会(指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编者注)必须通过决议,尽可能准确地重申和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和使之从属于党的原则。委托列别捷夫—波梁斯基和利特肯斯同志起草决议。如果意见分歧,决议需经中央书记同意;2. 在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的地方,它们同国民教育厅的关系与在中央一样,即它们是相应的国民教育厅的一个处;3. 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新分会需得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11月3日 托洛茨基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解决工会“最深刻的内部危机”的途径,要实行“整刷政策”,“把螺丝钉拧紧一下”,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8—9日,托洛茨基又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被否决。托洛茨基拒绝参加研究中央内部分歧的专门委员会。坚持要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他的意见。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决定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公开讨论,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公开化。30日,列宁发表题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决这种政策的”。

11月6日 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俄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大会。列宁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列宁说：“我们终于在生活空前困难、敌人空前猖狂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3年前我们在斯莫尔尼的时候，彼得格勒工人的起义向我们表明，起义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加团结一致了，但是，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3年就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极端的乐观主义者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现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瓦解比我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要大一千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也足以摧毁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了”。

11月9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工会问题通过决议：“中央委员会同所有工人组织重申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大会提出，当工农国家直接着手消除经济空前混乱状态的时候，必须无条件地采取军事方式的工作形式”。“为了使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的主动精神，……健全的劳动军事化形式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要看党、苏维埃和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向广大劳动群众阐明采取这些救国措施的必要性并在组织上把最先进的阶层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

中央全会决议重申党的九大对工会的当前任务所作的说明：“与此相适应，工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速度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过渡到‘按军事方式工作’，即要求工作极其准确、努力、负责、迅速而紧张，要求工作人员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那么首先就应当向一切工业行政机关，因而也就向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有工会工作者参加的委员会，为工会组织的各项重要问题拟定一个详尽的指示。中央委员会选出季诺

维也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托洛茨基组成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代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党团委员会的安德烈也夫、施略普尼柯夫、洛佐夫斯基和卢托维诺夫 4 人。

11 月 10 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研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形式问题。全会批准政治局的决议，基本赞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拟定的指示草案，委托政治局最后修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形式的决议，以求更准确地表达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厅的工作合并这一思想。在艺术领域(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保持自治，而保留俄共严格监督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的领导作用，完全是为了同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

全会还决定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以中央名义起草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委托列宁、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等同志就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全会同时委托政治局在执行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之前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富有党性的优秀分子进行协商。

11 月 20 日——22 日 俄共(布)莫斯科省举行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 289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89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宁在 21 日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演说。列宁指出：“由于一连串武装干涉的企图遭到破产，我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现在粮食采购工作已经使我们在最近即将展开的征粮运动中不仅能够摆脱今年这种十分缺粮的情况，并且还能充分保证全体产业工人在粮食方面的需要”。列宁再次强调，在军事任务将结束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应当过渡到管理俄国从事经济建设的任务”，他认为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实现“整个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12月1日 《真理报》公布俄共(布)中央的信《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封信是在列宁领导和亲自参加下起草的,由季诺维也夫执笔,克鲁普斯卡娅对信稿中的内容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信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相互关系的基础,应遵照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使两机关的工作最紧密地接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创作工作,应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一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中央机关积极参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一个处加入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并以俄共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方针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强调,“中央不仅不想限制工人知识分子在艺术创作领域的主动性,相反地,中央要为他们创造更为健康正常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影响整个艺术创作事业。中央清楚地看到,现在,战争行将结束,工人队伍中间对艺术创作和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中央珍视着尊重先进工人提出更丰富地发展个人精神生活等问题的强烈愿望。党将尽一切可能使这一事业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使工人国家给工人知识分子提供为此所必须的一切”。

12月6日 列宁出席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表演说。关于租让制问题,列宁强调指出:“租让问题上的主要原则,从政治上来考虑(这里有政治上的考虑和经济上的考虑)就是: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敌视。……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只要从经济和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仍然比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弱小,就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必须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列宁还说:“从获得产品的意义上说来,租让对我们也是得重要的。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主

要点还在于政治方面”。

12月7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会运动方面的主要任务,如同党政方面的一样,是活跃组织的主动精神,即从上到下,尽可能在所有基层组织内首先讨论工会运动问题”,在组织问题上,“必须绝对实行工人民主方法”,“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把一切委派制小到最低限度”。

俄共(布)强调,“现在采用自上而下改造工会组织的方法是不适当的,是同当前党的总的路线背道而驰的”。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的冲突问题,决定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动员工部;在2月份举行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举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选举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将其所有的人力和资财交给工会。

12月30日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列宁发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演说。这是俄共(布)发生关于工会的作用及任务的争论后,列宁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第一次演说。1921年1月25日,列宁又写成小册子《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并于次日分发给各地参加这一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列宁对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进行了批判。列宁强调:“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論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的害的东西”。

1921 年

1月13日 《真理报》发表俄共(布)彼得格勒组织1月6日通过的《告全党书》。这份告全党书是1921年1月3日在全市各区讨论会上经过一系列辩论之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报告和布哈林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之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

《告全党书》指出:“在即将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首要的问题,即目前引起很大意见分歧的问题,无疑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决定今后很长时期内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所以,党应当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真正的分歧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那一派忘掉了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企图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并实际上要着手消灭工会。”“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派别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会引起巨大的危险。这一错误发展下去会造成俄国共产党与全俄工会运动之间的分裂和分离现象。而这一点会对我们革命的命运带来招致灭亡的后果。”“鉴于这一问题对党和对我们整个革命都非常重要,彼得格勒党组织提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不同的政纲选出,必须使那些出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仅反映自己个人的意见,而且表达自己组织对该问题的意见。”“按政纲选出代表不仅与党内的工人民主思想不相抵触,相反,这种选举本身就是工人民主的表现。”

同日,《真理报》发表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认为“绝对不能赞同彼得格勒组织告全党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建议”。

“只有这样，彼得格勒组织的告全党书才不会有其现今极端危险的一面，即不会有把彼得格勒组织变成筹备党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中心的这种倾向”。

3月1日 喀琅施塔得发生哗变。3月2日，彼得格勒宣布特别戒严。5日，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西线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粉碎喀琅施塔得叛乱。从3月7日起，红军开始进攻喀琅施塔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320名代表亲临前线视察战事。经过激烈的战斗，3月18日上午，喀琅施塔得要塞被红军攻克。

3月8日——16日 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694名正式代表和296名列席代表到会，代表73.25万名党员。在会上，列宁作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和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斯大林、伏龙芝等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基洛夫、古比雪夫等被选举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政治工作报告中，列宁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及教训，并宣布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

3月15日，列宁做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进一步详尽阐述了实行实物税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列宁指出，“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协议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列宁认为，实行粮食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调整好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两个阶级达成妥协。为此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尽量满足中农的要求。因为整个农村已经均衡化了，“农民已经达到中农的地位”。第二，“需

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第三，“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

列宁同时指出，实行周转自由，隐藏着政治上的危险，即“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性发生，无产阶级政权需要掌握贸易自由的分寸。

在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中，列宁指出，由托洛茨基挑起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政治错误。列宁指出党在同群众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引发这场争论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党要对出现这场政治错误负责任。列宁分析道，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在苏维埃机关中存在着丑恶的官僚主义现象，党要对先锋队和群众间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如果“不在发展民主方面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对违反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人，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各种新的办法，大力为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主动精神，揭发、暴露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等等而斗争”。

在《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中，指出“工人反对派”的所谓“管理国民经济主权应当属于……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路线”。决议强调，进行管理的只能是共产党。

4月21日 列宁完成《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一书。5月初由苏俄国家出版局出版单行本。

书中，列宁第一次将粮食税作为一种新政策，深入阐释了实施的背景、意义和条件。列宁分析了实施粮食税的实质。他说，“粮食税，

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又是从由于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而具备一些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列宁还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租让制、合作制、国家雇佣制和租借制。列宁称租让制是“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列宁特别强调，实施粮食税“就是要善于把‘租让’政策的原则、原理和基础，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列宁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相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4月25日 俄共（布）中央发布《致获准从红军和红海军退役的全体共产党员》通知信。

信中说，国内战争的停止，使工农政府可以提出裁减红军人员的问题。新的形势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战线，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坚强、正直的工作人员到经济战线去工作。信中说，“工农政府认为可以使一些年龄较大不担负重要政治和指挥责任的普通的共产党员同其他一些红军战士和海军人员一起无限期退役”。信中号召退役共产党员要把在红军中工作和斗争培养出来的精神和一切优良作风带到劳动战线和文化教育战线。

5月9日 俄共（布）中央发布《关于合作社致俄共各级组织的信》。信中指出，最近，由于各项实物税法令的颁布，合作社的作用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向前发展。同时，合作社的任务广为扩大，形式大为

增加,而且困难更多了。信中还指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工人合作社的任务,是使小生产者摆脱投机商人的剥削,使小经济的剩余产品主要掌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而不是落入新生的小资本家手中。合作社的作用,是以公开的统计、监督和责任制,同投机行为作斗争,同一些小生产者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倾向作斗争。

信中指出,合作社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拥有忠于革命事业的领导,数量足够的精通业务的共产党员——合作社工作者,同时得到俄共各级组织的支持和协助。信中提出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最积极地参加省合作社组织召集的各种会议;向消费社和省联社的管理机关派出熟悉地方经济情况的共产党员;在苏维埃党校和党员中开展教育和宣传运动,提高全体党员对合作社的基本问题、法令和义务的认识。

信中指示,俄共各级党组织应拟出实际措施的计划,注意向中央作系统的工作报告,把这件事“看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5月14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实行粮食税时的经济政策》的决议。

决议指出,粮食、原料和燃料资源的极端缺乏,使得苏维埃政权特别注意振兴农民经济。为此,应当制定一系列生产、供应、交换和劳动方面的具体措施,加强日常消费品的生产,并由国家来帮助小工业和手工业。在国有化工业方面,决议提出“应当走改善国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供应和核算的道路”。还提出用“国家的所有资金”“振兴和发展国有化重工业”的方针。

在小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决议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它们在促进农业、修理业、生产个人日用品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必须让小工业和手工业能够最大限度的发展,给它以全面的帮助”。在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决议指出,必须促进那些为工农群众的需要服务的工业部门,尽可能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实物的商品交换方

面,决议指出,实行粮食税剩余农产品和原料买卖法改变了整个采购工业原料的制度。因此,在余粮收集制下的固定价格应代之以“按区域规定商品的等价物;原料的收购应实行分散制,企业也应视为国家收购机构;工厂有权接受农民个人或各种合作社联合组织的订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可以将企业出租给个人或劳动组合及合作社。实行上述条款的细则将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拟定,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

5月26日——28日 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工作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草案。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建立经济上的联盟”。为了建立这种联盟的过渡办法,就是准备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列宁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不应当建立在余粮收集制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粮食税的基础上的主要经济因素是,在余粮收集制下,由于没有流转自由,“小业主对于巩固和发展他的事业,增加产量不感兴趣”,小农经济在许多年内都会死气沉沉。实行粮食税,才能够保证流转自由,使小农经济获得正常的经济基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牢固的经济联盟。

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1. 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实行的长期的政策”。
2. 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没有这种杠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3. “合作社是实行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
4. “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
5. “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用品的生

产”。6. 加强对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鼓动工作。7. 把仔细地全面地阐明和研究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经验,列为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6月16日 列宁在全俄粮食工作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列宁说:“目前,粮食政策有极大的改变;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改变粮食政策,而且在许多方面要改变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党和苏维埃工作者必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建立经济政策的新的形式,为整座苏维埃大厦奠定基础”。

6月22日——7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48个国家的共产党、左派社会党和社会党的代表等。俄共(布)派出由列宁率领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列宁就意大利问题和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问题在大会上发了言,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俄共(布)策略产生的背景以及俄共(布)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他指出,目前,“在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出现了一种均势。“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直到目前为止,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大国中,革命还没有到来”。除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外,“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两个阶级作斗争。……从国际观点看来(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做统一的过程),现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代的意义,本质上就是我们必须在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怎样对待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问题”。

列宁着重论述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问题。他说,“战时共产主义

1957

的作用》。列宁写道：“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完全另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動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振兴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它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

列宁认为，“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

列宁还指出：“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

12月19日——22日 俄共(布)举行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

决议指出，今后将采取的措施有：1. 恢复金本位的货币流通，2. 建立起一些为促进和发展商品交换所必须的机构，3. 毫不动摇地保持土地国有化，巩固农民土地使用制，给农村居民以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创造正确经营和发展农民经济所必须的一切条件；4. 以经济核算制作为经营所有国营工业的基础；5. 将工人对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利益，作为工资政策和工人供应政策的基础。

12月23日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做总结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讲道：“我们要认真地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指新经济政策——编者注）。”

1922 年

1月12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的决议。1921年1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曾研究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这一决议是列宁写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查并一致批准了这个决议,并将其提交给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审议。

1月16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月12日审查并基本通过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月16日最后批准,并于1月21日发给各人民委员。该指示草案指出:“现在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广泛地和迅速地把新经济政策应用到实践中去”。“政治局坚决要求全体人民委员在实际试行新经济政策时要动作迅速、积极努力,要杜绝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指示草案还提出“把各种委员会精简到最小限度,要求各有关部门在最短期间(一两天内)提出书面修正意见或反建议,以替委员会的工作”。中央政治局提出“坚决要求实行奖励制,尽可能广泛地奖励办事迅速、提高产量和扩大国内外贸易额的负责人员”。

3月18日 俄共(布)中央就农业合作社问题通过致俄共(布)各级组织的信。信中说:小农经济有它的适应商品市场条件的特别方法。这些方法,就是联合单个的农户的力量和资金,于是,“合作社就在我国农业政策的发展方案中占据了一个极其显著的地位”。俄共(布)中央强调:“共产党不能置身于这一运动之外。它应当在这一运

动中起领导作用。各地方党组织必须直接地积极参加合作社运动，努力加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并利用合作化的经济成果开展党的和苏维埃的宣传工作”。

关于合作社的任务，俄共(布)中央强调，“就是普遍改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必须把农民的各个阶层都吸引到合作社中来，对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只要他们不带有明显的富农性质，也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在合作社中主要的占中心地位的阶层自然是中农”。

俄共(布)中央指出：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者应当尽一切力量把农村的经济力量单薄的农民大批地吸引到合作社运动中来。前几年的农业社会化工作，已经在全国造成了一个广大的集体农庄网。这些集体农庄作为农村中最坚固的苏维埃细胞，在走上总的合作制轨道时可以发挥出积极的显著的作用。俄共(布)中央还提出：“事业的利益要求我们尽可能把国内一切现有的旧合作社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只要他们真心愿意同苏维埃政权一道工作，都吸引来参加工作”。

3月27日——4月2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2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53.2万名党员；有165个有发言权的代表。

代表大会对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年的工作做了总结，主要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3. 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4.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 俄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6. 工会；7. 关于红军；8. 财政政策；9. 清党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副报告：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10. 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督委员会。

这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出席并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就议程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了报告。他认为苏维埃俄国获得的成就证明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宣布退却已经结束，提出必须重新配

置力量以便转而对资本主义成份实行坚决进攻。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关于检查和更新工会的领导组织；关于财政政策；关于农村工作；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俄共 1921 年 12 月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监察委员会条例；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代表大会选出由下列人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安德列耶夫、米·瓦·伏龙芝、费·艾·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谢·米·基洛夫、阿·伊·米高扬、德·查·曼努伊里斯基、阿·叶·巴达也夫等。代表大会还选出了五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

4 月 3 日，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3 月 28 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条路线保证了党在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最困难的转变关头所面临的各项根本问题(新经济政策、工会的新任务、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作斗争、清党等)上最大限度的统一和团结”。

代表大会确认：“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作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并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

代表大会认为,“党在保持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实行总的领导和指导的同时,应当明确得多地把党的日常工作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党的机构和苏维埃的机构划分开来。这种有步骤地加以实行的划分,一方面可以保证苏维埃机关更有计划地讨论和解决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并且提高每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对本身工作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可以使党在必要的程度上把精力集中于党的基本工作,即对一切负责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4月2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处境、因而也使工会的处境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工业和运输方面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还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加上土地国有,表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决议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不改变自己的本质,而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调节能否有效,不仅决定于国家政权。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但是,这种调节即使十分有效,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组织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俄共(布)中央指出: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在非常巧妙而谨慎地逐渐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

完成这个任务。

同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财政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资源直接地说也就是它的财政资源；无论对工人、职员和军队的供应，或对国营工业的原料、半成品和其他材料的供应，都采取实物形式；因此，财政政策仅限于货币的分配问题，由于市场流通范围极为狭小，货币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在新的条件下，苏维埃国家对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和国家经济管理方面需要的供应，只有一部分是采取直接实物供应（或直接调拨物资）的形式。而且范围正在日益缩小；而通过市场，即通过货币的供应却日益扩大。决议认为，“要扩大国内的商品交换，就必须提高生产，加强运输工作，同时要减少国家经济的实物部分和加强农民经济的商品性以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当时国家财政政策（包括币制改革）的主要措施：“第一，首先通过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国营、合作社营、私营商业来扩大商品流转的范围；第二，用缩减国家开支、增加国家的货币和实物收入（同时必须由一个机构征收各种捐税，并逐渐把重点转到货币税上）的办法来减少进而消灭预算赤字，使预算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必须取消临时拨款，建立固定的财政业务”。

决议指出，“必须允许私人资本参加商业”，同时规定商业政策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鼓励农民变消费经济为商品经济，因为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提高农业生产力，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又是迅速地摆脱经济和财政危机的唯一保证。

同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用行政手段来对待农业合作社机构的办法是错误的，建议在这方面必须极其慎重”。“代表大会认为党在农民中整个工作的首先和主要的目的是，实际帮助迅速扩大耕作面积、播种面积，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减少农民严重的贫困；同时必须尽量用人力物力

来支持和鼓励帮助贫苦农民，坚持不懈地努力设法制定能够在实际上证明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办法”。

决议指出，必须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其办法是：“1. 以党员工作人员充实乡级组织；2. 加强农林工作者工会，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从经济上把已经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和力量单薄的农民组织起来”。决议同时还强调，“党在农村中的工作主要应当是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而不能采取以前所主张的行政强制方法和政治鼓动方法”。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将单一实物税的法令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常会讨论，以便使这项法令臻于完善，特别是要减轻最贫苦农民的负担”。

同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给党造成了新的困难。由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转到在新的环境下进行工作，这在最初一个时期造成了极其纷纭复杂的关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政党和过去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容许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获得组织自由。此外，鉴于资本主义必须要得到局部的恢复，党应当最积极地参加调整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关系”。

决议认为，“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引起了一些新的、复杂的现象，一部分具有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的农民‘共产党员’开始离开党，因为党只能限制作为小业主的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浪潮席卷了某些其他分子甚至不坚定的工人。在某些分子中，主要是在非无产阶级分子中，呈现出颓废情绪、从党内逃跑等现象；党应当坚决而无情地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只要党的基本核心的路线正确，在顺利情况下党的成分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将不是减弱而是增强”。

俄共（布）中央指出今后的任务，“不仅要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而且要帮助他们成为熟练的经济工作者。……党应当在经济组织中、

工会中和青年党员中把自己的党员分别编成小组。整个工作进行应当使尽量多的党员都能够真正改进党所委托给他们的工作,获得本部门的详细的专业知识,并逐步地提高这些知识。

5月19日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为执行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以维·米·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俄共(布)章程修改委员会。委员会拟定了修改党章的草案,并将其提交于同年8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

8月4日——7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29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92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关于国际形势;2.关于工会;3.党在合作社中的工作;4.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5.关于党章工作组的工作;6.关于改善党员的物质状况;7.关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成立了“党章工作组”,修改了俄共(布)章程修改委员会拟定的修改党章的草案,并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党章全文。党章共13章66条,内容包括党员、预备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党的中央机关、区域组织、省组织、县组织、乡组织、党支部、监察委员会、党的纪律、党的经费和党外组织中的党团等。党章规定,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及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入党,须有3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人(职员等)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预备期6个月,其他人至少两年。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以下决议和决定:关于党在合作社中的任务;反对反苏维埃的党派;关于工会工作的总结;关于国际政策的报告;关于改善俄共党员的物质状况;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代表会议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反苏维埃党派的策略发生了变化。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曾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期望俄共投降和建立“民主”联合政权。但是,随着这些希望的破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越来越铤而走险。代表会议还分析了路标转换派的思想,

认为它是新的耐普曼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号召党和工人阶级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斗争。

关于国际形势,代表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实行的路线,并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满意。代表会议根据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的结果,提醒全体党员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和全部精力来解决下列问题:巩固国防经济,保障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防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

10月30日 俄共(布)中央就生产宣传问题给俄共各省委和州委发出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条件下,国营工业的发展和巩固只有全体生产参加者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工具采取自觉态度才的可能。决议认为,党的、工会的和教育的机关应当在不分设专门的宣传机关的情况下,使进行生产宣传的任务成为自己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这项任务要求日复一日进行多年的工作,它的目的是促进工人阶级掌握生产本领”。为此,要提高工人对一般生产问题的兴趣;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工厂的管理机构要定期地向工人群众讲清生产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条件,原料和工厂其他方面的状况。此外,党的机关必须提高对党员的生产教育。

12月23日——29日 列宁在病重期间,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1924年1月4日又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这些信件通常被称为“列宁的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俄共(布)的6名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要求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避免党的分裂。他建议将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由50人增加到100人,并主要从工人中选出增加的人员。信中提出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调离的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由克鲁普斯卡娅保存。1924年5月18日,即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她根据列宁的愿望将列宁口授的文件共 13 份交给了中央委员会。这些信曾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但决定不公布这些信件。

12 月 30 日 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大会上宣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宣言和条约，宣言宣布“苏维埃政权是国际主义的政权，因此，它的结构本身就是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群众走上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路”。“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加里宁当选为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当选为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3 年

4 月 17 日——25 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第一次因病不能出席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408 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共代表 38.6 万名党员,有 417 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2. 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4. 俄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5. 关于工业;6. 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7. 农村税收政策;8. 关于区域划分;9. 选举中央机关。此外,在代表大会的各分组会上还讨论了关于农村工作、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等问题。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俄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关于农村税收政策;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区域划分;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宣传、出版、鼓动工作;关于俄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在于俄国共产党对女工和农妇的工作;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国际政策,坚决斥责这方面的任何动摇。代表大会无条件地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制是坚定不移的”。

“适当和安排俄国余粮的出口工作已经成了一项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党还有一个与这些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前途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仔细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要更加熟悉经济、更加注意领导和加强经济机关，——这就是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口号”。“代表大会提醒大家，在今后若干年内，主要的计划经济工作仍然是苏维埃政权批准的俄国电气化计划，这个计划应当成为共和国一切经济工作的基础”。

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安·安·安德烈耶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基洛夫、米高扬、德·查·曼努伊里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亚·德·瞿鲁巴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的有：卡冈诺维奇、阿·叶·巴达也夫等。被选为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有：伊·伊·斯克沃尔佐夫、德·伊·库尔斯基、维·巴·诺根。

根据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书面建议，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这个机关负有维护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尽量改进苏维埃国家机构等重大任务。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有：瓦·弗·古比雪夫、马·费·什基里亚托夫、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弗·维·林格尼克、尼·米·什维尔尼克、马·康·穆拉诺夫、布·弗·萨哈罗娃等。

4月19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说：“党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整个革命前途的政治任务，这就是要时时刻刻注意仔细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党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着手解决一切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不能忽视：国营工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只能逐步提高，只能在党坚持不懈地改进工业组织和提高工业利润等情况下逐步提高”。

决议还说：“党要不断地吸引一切优秀的非党工人和农民参加经

济工作和整个国家的工作,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俄国共产党对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负有主要的责任,因为只有它才负有做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领导者的历史使命。要更加熟悉经济,更加注意领导和加强经济机关,——这就是党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口号”。

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指出:“如果对苏联境内大量从前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利益关心不够,那对于党是非常危险的。党首先必须坚决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残余进行斗争。只有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保证苏联的巩固和保证党对其他国家的劳动群众的影响”。

决议认为,经过改组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够而且应当解决“党的个别细胞有蜕化的危险”的任务。因此,决议同意代表大会作出彻底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计划。

4月25日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业》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1. 工业在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般作用;2.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优点和缺点;3. 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4. 托拉斯、托拉斯的作用和必要的改组;5. 工业和商业;6. 工厂;7. 成本计算,收支平衡表和监督;8. 工资;9. 拨款、信贷、税收和关税;10. 外国资本;11. 经济工作人员,他们的地位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12. 吸收专家参加生产;13. 党组织和经济机关;14. 印刷业。

决议强调: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基础,只有工厂工业取得实际成就,重工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巩固的基础)得到恢复,以及电气化工作一步步接近于实际完成,农业才能得到发展,工农联盟才能得到巩固。保证和加强这种联盟,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条件,也是党的基本任务。俄共(布)中央认为,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主要缺点,主要表现为“轻工业产品的价格还没有得到合理调整(尽管轻工业产品价格极高,也还没有达到经常不蚀本的水

平),同时,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新经济政策前的整个经济状况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的急剧变动所引起的”。因此,国家当前在工业方面的根本任务是“依据市场情况把物价调整得更符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建立轻工业和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各部门之间的更正常的关系,以及拉平轻重工业的水平”。

同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从余粮收集制到粮食税的过渡,是以承认农民有自由处置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权利为标志的,不过这种权利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必须让苏维埃国家取得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作为保证军队以及恢复经济和运输的实物基金”。“由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开始普遍地健全起来(商品流转的活跃和扩大也说明这一点),党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在扩大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可能性方面实行下一个步骤。苏维埃政权能够而且应该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免除农民用实物形式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义务,而使他们能够用货币形式缴纳一部分赋税”。

决议还指出:“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除了从实物税过渡到货币税外,共产党还应该把农民所负担的各种国家直接税(粮食税、户籍货币税和车马劳役税)以及各种地方直接税统一成为直接的单一农业税。单一农业税一定会完全消除那种引起农民正当抱怨、使农民不能精确计算自己的收支并据此来经营自己经济的税收名目繁多的现象。共产党应该实行一种使农民可以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缴纳的直接税总数并且只同一个收税单位发生关系的税收制度”。俄共(布)中央要求,在确定单一农业税的数量以及其中有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的数量时,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发展和振兴农业为指导原则。

同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区域划分》的决议。决议认为,“共和国过去的经济行政区划已经不能适应国家新的政治

和经济需要,但同时认为划分新的经济行政区必须十分慎重,而且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完成”。“委托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使修改共和国经济行政区划的工作具有更大的计划性,并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行政委员会所拟定的新的经济行政区划计划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需要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补充、检验和修改”。俄共(布)中央认为,组织乡和其他基层政权机关时,要精减整个经济行政机构,同时还要使最接近群众的政权机关得到巩固和发展。

4月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俄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使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发展遭到了困难,使其中一部分人贫困化,同时使主要是中等的和富裕的农户开始发展起来。有些农户通过按很重的高利贷的条件出借农具、种子和牲畜,通过承租土地或者通过贸易,通过制造和出售私酒等等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样的农户开始成为富农。随着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富农的比重日益增长”。决议指出,正在农村建立的关系特点在于,它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苏维埃国家中形成的,……所以党和苏维埃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首要工作,是加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组织农贷,保证占农民群众绝大多数的小农的利益,创造最简单的农民经济协作形式,等等”。

决议认为,“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的最重要条件是不断改善和整顿苏维埃机关,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或者同农民群众接触的苏维埃机关,同时还要在农村进行文化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来提高农民的文化、觉悟和文明经营的水平,从而使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6月9日——12日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古比雪夫

等中央委员 17 人、候补中央委员 3 人、中央监察委员 6 人以及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代表 58 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 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苏丹—加里也夫事件的报告；2. 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

会议就上述两个问题通过了相应决议。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指出：“被党委派担任要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的苏丹—加里也夫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借此同地方工作人员建立起来的联系，通过秘密活动和散发公然歪曲党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措施的秘密通报的办法在各共和国和各区域的不稳固和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党和非党的）中间建立秘密组织，来反对党中央机关的措施”。“苏丹—加里也夫提出的反党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任务以及反党活动的逻辑本身，已驱使苏丹—加里也夫进行背叛活动，寻求同那些旨在推翻苏维埃制度的露骨的反革命势力结成联盟的途径”。“鉴于上述情况，会议认为，苏丹—加里也夫对党和党的统一，以及对苏维埃共和国所犯的罪行（他自己已供认不讳）已经使他置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外”。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决议，包括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工作的总路线，同设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院和组织共和国联盟各人民委员部有关的问题，吸引当地居民中的劳动分子参加党的建设、工会建设和苏维埃建设的办法，关于改善当地居民文化生活状况的措施，根据民族生活习惯的特点进行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经济建设，关于组织部队的实际措施，组织党的教育工作，为贯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挑选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等方面的内容。决议强调：“党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在当地居民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培育和发展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年轻的共产党组织，用一切办法协助这些组织站稳脚跟、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把即使在开始时为数不多然而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

团结起来”。“边疆地区的共产党员应当记住：我是共产党员，因此我应当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行动，向当地民族中的那些愿意和能够在苏维埃制度范围内忠顺地工作的分子让步……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铲除地方民族主义，使当地的广大居民阶层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7月12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针对顿巴斯采取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顿巴斯的主要任务是：“在恢复大煤矿工业企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采煤量并降低煤的成本，因此，要在顿巴斯改变对中小工业的政策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决议提出把顿巴斯国家煤炭工业管理局的所有企业分为两类：亏损类和无亏损类，以现时的矿务管理处的状况为根据，划分类别的标准是无亏损企业的煤的平均成本为每普特 17.2 商品戈比(包括折旧和租金在内)。

决议还规定：“国家煤炭工业管理局不再担负供应工人的职能，把此项职能转交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关，并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以信贷的形式把顿巴斯应得的一年粮食定量一次拨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关于工资问题，俄共(布)中央决定：由国家煤炭工业管理局将工人工资保留，并且使工资达到预算所规定的实际数额即 18 商品卢布，以提高实际工资；同时还决定，降低附加工资 4.5% 到 1%，用于文化工作，附加工资总量降低 25% 到 20%，并在有保证保存各种现有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的条件下把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转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10月25日——27日 有 10 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关于党内状况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谴责了托洛茨基的反党派别活动。

决议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

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认为，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各个党员书的办法，而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46 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 10 个党组织的代表坚决斥责 46 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上述决议在联席会议上以 102 票赞成、2 票反对，10 票弃权通过。

12 月 5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党》的决议。这项决议先后由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决议说：“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证明自己是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道路上的必经阶段。新经济政策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即农民经济、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发展。目前我们的情况是，工资正在逐渐增长，熟练工人正在返回城市，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同时由于高等学校有系统地教育工人和农民而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干部。”

决议还强调指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来估计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没有国家物质财富的增长，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和扩大。如果这种财富的增长使得私人资本比国家资本占优势，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持久”。“目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国营的工业同农民的农业的结合，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我们国营工业的产品同我国

的主要是农民的市场的需要和容量之间的正确关系。但是，这一任务要得到解决，必须正确地 and 系统地保证国营经济各种因素和各个部门之间的结合”。

“因此，全党从上到下应该得出结论：只有我们真正地学会使国营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使它们彼此之间同市场之间经常地相互配合，进一步的经济活跃（这种活跃在最近的将来多少会克服目前的危机）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2月2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决议，将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提交代表会议讨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最后批准了这个决议。

《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强调：在解决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时，党应当以目前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为依据，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实现城乡结合，即国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只有解决工农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才能彻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保证它不致发生任何动摇。

12月27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的错误行为的决定。决定指出：“1. 拉狄克所持的方针是完全支持德共中央的右派少数而反对党的左派，这在客观上使德国共产党遭到分裂的危险，而俄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政策是支持德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在批评左派的错误和支持左派正确的一面的条件下同左派进行合作，同时批判右派极端严重的错误；

“2. 拉狄克对德国今后斗争进程的总的看法是从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的阶级力量出发的：机会主义地过高估计了法西斯势力内部的意见分歧，并企图根据这种意见分歧来制定德国工人阶级的政策。”

“鉴于上述一切，中央委员会有必要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拉狄克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表达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

1924 年

1月14日——15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体会议。参加全会工作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两个乌克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全会的主要议程是：1. 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2.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3. 关于争论总结和争论专题；4. 关于国际形势和涉及党代表会议的一些问题。

全会对党内争论做了总结。与会的许多中央委员“尖锐而断然地斥责了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等)关于派别组织和集团可以在党内合法存在、把党的机关同党对立起来等路线”。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问题方面，全会同意把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提交党的代表会议讨论。

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方面，全会特别全面详尽地讨论了关于德国事变教训的问题，中央全会决定同意把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提交党的代表会议讨论，并认为政治局在关于德国事变教训的报告提纲中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同意政治局在和左派合作的基础上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取得协议的政策。

全会还向拉狄克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俄共中央委员不服从中央关于国际问题的决定是不容许的，同时严厉警告拉狄克和“反对派”的其他同志们不得把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因为派别斗争会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

1月16日——18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28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2个有发言权的

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 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2. 党的建设问题；3. 国际形势。代表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党的建设、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和关于国际形势。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向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致敬”的决议。

斯大林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斥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宣布党内存在着以托洛茨基反对派为代表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指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思想实质是：“在我们面前的现在这个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党内民主原则已经开始被任意地在党的范围以外加以解释。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针对党内的实际情况，俄共（布）中央指出：“尽一切努力增加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数量及其在党的全部政策中的比重。在最近一年中，必须加强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从基本无产者中间至少吸收 10 万个新党员参加俄共党的队伍”。“各级组织应当对这一次争论中在党的路线问题上多少有过动摇的支部进行特别关切的解释工作。解释、解释、再解释，——这首先是党的基本干部的主要任务”。“应该认真研究俄共党史，首先是研究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进行斗争的基本事实，研究各个派别组织和流派在斗争时所起的作用，特别是研究那些企图‘调和’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折衷主义派别组织所起的作用，这是首要的任务之一。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把出版适用的俄共党史教科书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使党史在所有党校、高等学校、学习小组等学习组织中成为必修的课程”。

俄共（布）中央在决议中还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纪律问题。“党内讨

论的自由绝不是破坏党纪的自由。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有人企图动摇党纪,党中央委员会及各个地方党的中央组织应当立即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铁的纪律”。“对于散播谣言和散发禁止传播的文件的行为,以及对于染有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无原则集团惯用的类似手法,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直到开除出党”。

1月18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在解决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时,党应当以目前历史时期的以下基本任务为依据: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实现城乡结合,即国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只有正确解决工农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才能彻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保证它不致发生任何动摇”。

决议指出:“我们目前遭受的经济困难(销售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党的关于农民经济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关于在农民人口占优势的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的这些指示注意不够而产生的。今后党的任务应当是:经常注意执行上述城乡关系方面的政策,不容许发生低估农民经济在我国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意义的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害的偏向。”

关于农业问题,决议认为“首先应当改进国家粮食采购和国家出口的组织工作,减少这方面的一般费用,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贸易中各种中间商和收购商的作用及其收入”。关于国营工业,决议强调,“只有发展国有化的大工业,才能奠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基础”。“社会主义积累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决定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基本因素。但是,除了成本和必要的最低利润以外,再把目前我国基本居民群众显然无力负担的用以迅速恢复和扩大固定资本的费用加到产品价格中去,这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看来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使价格政策同最主要的农民市场最大限度地协调起来,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同农民市场容量的总的扩大进程比从前更紧密地协调起来”。

此外,决议还就工资和工会、对外贸易、国内商业和合作社、私人资本、财政政策、关于加强计划原则的必要性等问题通过了决议。俄共(布)中央在工资方面强调:“采取根据工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资的方针;同时要特别注意进一步提高工资还低于中等水平的那些基本工业部门和生产地区的工人工资”。

1月21日 列宁逝世,终年55岁。1923年3月9日,列宁第三次中风,使其半身瘫痪并完全丧失说话能力,5月被送到哥尔克休养和治疗。

1月21日——22日 因列宁在1月21日逝世,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全体会议。紧急全会通过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1月23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号外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伟大解放运动的历史,在马克思以后,从来没有产生过像我们已故的领袖、导师和朋友这样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一切真正伟大和英勇的品质——大无畏的智慧,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胜一切的钢铁意志,对奴役和压迫的深恶痛绝,移山填海的革命热情,对群众创造力量的无限信任,巨大的组织天才,都由列宁卓越地体现了出来,他的名字成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新世界的象征”。

“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宝库作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工人阶级之所以感激他,正是因为他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工农联盟的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全部意义的学说,以及他的关于党的作用和性质的学说”。《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强调,列宁逝世了,“他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他的事业的死亡。列宁活在我们每个党员的心里。我们每个党员都是列宁的一小部分。我们整个共产主义家庭都是列宁的集体的化身”。“我们应当特别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主要遗训”,“踏着他的足迹前进”。“在欧洲的废墟上,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在工人政权下复兴起来和勇敢地展望自己的

未来的国家。千百万人都聚集在我们光荣的旗帜周围。我们的导师逝世的这一沉重打击,将使我们的队伍团结得更加强大。我们要结成一条齐心协力的战斗链条,去向资本进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

1月29日和31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全会公报。公报说:中央全会研究了党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各个决议后,决定:1. 批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2. 批准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3. 批准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作如下补充:(1)在第11条“中央全会会议的速记记录应当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些字句后面应增加:“同时发给各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2)在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后面应增加:“中央委员会在批准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时,坚决要求一切争论很激烈的地方组织注意:必须尽可能迅速地消除已经形式的尖锐局面,巩固队伍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在现在列宁逝世以后是特别需要的”。

中央全会通过了《告男女工人书》,号召全体工人积极支持和参加党的各项工作。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接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决议,规定广泛开展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的运动为3个月,至少吸收10万名产业工人入党。

2月 《俄共(布)中央通报》第2期公布俄共(布)1924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告男女工人书》。俄共(布)中央在《告男女工人书》中指出:“我们的党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失去了曾经领导我们度过大革命风暴的最伟大的领袖”。“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激发、震动和唤起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党的千百万工人更加努力奋斗”。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将来还会遇到大的战斗。现在必须仔细、耐心和孜孜不倦地进行我国的经济复兴工作。对外,

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强国而屹立着，连最凶恶的敌人也已经承认它的威力和实力。对内，我们在同饥饿和贫穷作斗争中正逐步地夺取阵地。但是，要击溃这些敌人，要在经济斗争中战胜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在妥善地整顿以我们的鲜血换来的经济、我们无产阶级的工厂，要巩固和加强我们同农民的联盟，全体无产阶级就必须忘我地工作。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吸引全体工人来参加这个为自己的、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反对资本家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自觉的工作。这个任务只有在工人们自己齐心协力和奋不顾身的支持下才能解决。直接从事生产的真正的产业无产者新近纷纷加入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就是对这一工作的巨大帮助。党完全无条件地欢迎本阶级的这种兄弟般的帮助，党号召一切非党的男女工人同志帮助党接收新战士。他们，产业工人，是党的依靠。在全体工人的帮助下，最坚定、最忠诚、最正直、最勇敢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将加入到党内来”。

同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2期公布俄共(布)中央1924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关于接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决议。决议说：“由于弗·伊·列宁的逝世，工人们对于列宁同志本人以及对成立之日起就由列宁同志当领袖的共产党表现了无限的爱戴。最近一个时期，工人们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是极其普遍的。这一切向党提出了一项任务：开展一广泛而强有力的运动把产业工人吸收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这一运动的口号应当是：‘产业工人们，坚决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参加俄国共产党吧！无产者！把优秀、先进、忠诚而勇敢的战士输送到党的队伍里来吧！’完成这一运动的最近任务的期限是3个月。”

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自上至下都应当把有计划地开展吸收产业工人入党这一运动当作自己首要的党内任务。在最近几个月内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都应当集中主要力量来完成党的这一基本任务”。

决议重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吸收10万名以上产业工人

加入俄国共产党。“被接收入党的仅限于产业工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关于入党介绍人的人数和党龄的条件仍旧有效”。’对于那些申请入党的工人,最好先在企业的工人大会上进行讨论,从而使党更易于对这些申请者进行必要的审查”。“在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共青团员入党,尤其是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共青团中的党的核心,同时加强它的纯无产阶级部分”。决议还提出:“中央委员会责成各级党组织要集中党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要精力保证新入党的产业工人最迅速而正确地通过预备党员政治常识学校”。

3月7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就币制改革问题给俄共(布)各级组织的信。信中说:“根据工农群众的最迫切利益和苏维埃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币制改革已经开始实行。苏维埃纸币的发行已经停止,而且最近就要确定兑换苏维埃纸币的固定牌价。新的稳定的通货以按黄金折算的国库券的形式开始广泛地进入流通,以便补充切尔文的流通。除国库券以外,辅币将用银币和铜币。银币已经在2月26日开始流通,铜币将在5月初发行”。

信中强调:“币制改革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确立了稳定的通货,革命的工农国家将空前稳定和巩固;总值高达20亿的苏联预算将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每天都在贬值的苏维埃纸币没有能够办到的事。“币制改革的胜利成果在联盟的对外政策上将表现得更有成效:面对资本主义世界,衰弱无力的国家是不能站立起来。

俄共(布)中央指出:“币制改革的成就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将产生真正巨大的结果”。“国营工业有计划生产的政策与国家机关和合作社的坚定的商业政策由于实行稳定的通货正在获得牢固的阵地”。由于“币制改革体现着革命发展的进程已是我们非加以解决不可的基本任务”。所以俄共(布)中央在信中明确规定“币制改革应该是党和

苏维埃全部工作的中心”。

3月31日——4月2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 关于同英国的谈判；2. 关于币制改革的进程；3. 关于军事部门；4. 关于消费合作社和国内商业；5. 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6. 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以及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在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的投票权问题；7.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和今后的工作；8. 关于“连纳金矿”的租让问题；9. 关于共产国际的公报；10. 关于中央委员会到各地视察的问题。

关于币制改革的进程问题，全会听取报告后决定：“1. 委托政治局考虑在全会会议上所交换的意见，以进一步实行币制改革；2. 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有各区域的经济领导机关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的议程应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市场概况的报告，以及在讨论这个报告后所提出的关于实行币制改革的具体问题；3.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第一次这样的会议的召开日期，其办法是把自己建议的日期用电报通知各地，并考虑所得到的反映；4. 委托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第一次上述会议研究关于在各区域之间重新分配资金的问题”。

关于军事部门的问题，全会听取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后作出以下的决议：“中央全会同意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使红军生活和工作条件正规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时全会认为今年春季征集1902年出生的青年入伍是完全正确的”。“全会同意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改组和精简军事部门的管理机关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同时强调指出，军事部门采取的提拔党员指挥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军队中的战斗部门或司令部去担任负责工作的坚决措施是正确的”。“全会同意军事部门进一步扩大民兵建设”，同意“军事部门在考虑和实际运用红军建设中的民族因素方面的措施”。“全会认为改善红军的物质

生活状况是目前军事建设中的极重要的任务”。“完全同意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把重新调整军事人民委员部内部预算和精简其机构所节省的资金,用来改善全体红军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包括改善红军低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物质生活状况”。全会决定“委托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这方面的进一步措施的计划”。

全会决定在5月20日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同时还决定:“在选举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给予全体俄共预备党员以表决权;保留过去的代表大会名额——每1000人选举代表1名”。

5月23日——31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列宁逝世后俄共(布)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74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共代表735881名党员。其中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有241591人;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以前的预备党员有12774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有416人。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关于授予俄共预备党员以选举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表决权;2.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3.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4.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中央监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6.俄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7.关于国内商业和合作社:(1)关于商品流转和计划工作,(2)关于合作社;8.关于农村工作;9.关于党的组织问题;10.关于对青年的工作;11.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报告;12.关于列宁研究院的工作报告;13.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代表大会听取了斯大林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安德烈耶夫关于合作社的报告,加里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和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关于党的省代表会

议的期限；关于省委书记的党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国内商业；关于合作社；关于农村工作；关于农村中的文化工作；关于报刊；关于宣传鼓动工作；关于对青年的工作；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关于列宁研究院的工作；关于对女工和农妇的工作。

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有 53 人，其中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安·安·安德烈耶夫、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德·查·曼努伊里斯基、米高扬、奥尔忠尼启泽、伏龙芝、亚·德·瞿鲁巴等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阿·叶·巴达也夫等人；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有古比雪夫、克鲁普斯卡娅、弗·维·林格尼克、马·费·什基里亚托夫、尼·米·什维尔尼克、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罗·萨·捷姆里雅奇卡等人。

6 月 2 日，代表大会选出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了中央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5 月 27 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大会完全批准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这两项决议列入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党中央委员会在争论期间，在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以保卫列宁主义基础方面所表现的坚决态度和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精神”。决议还指出：“代表大会十分满意地指出中央委员会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方面的政治首倡精神和工作。……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的一切基本群众都参加党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按照下列方针进行一切工作：在最近期间使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占党员的绝大多数”。

决议指出：“党认为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当前的任务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

义成分”。“代表大会赞同党中央委员会在国内商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所提出的及时的倡议。这些问题成了目前整个时期的中心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能否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将取决于党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是否正确。代表大会认为，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且由此采取了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决议还明确提出：“在发展国营工业方面，下一阶段的极重大任务就是发展冶金业”，同时“比过去更重视苏联的电气化事业，以便尽一切可能实现电气化工作的整个计划”。

同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内商业》的决议。决议指出：“不论是进一步发展国营工业，还是建立城乡间真正的经济联系，都要求特别注意国内商品流转问题。国内生产力愈发展，苏联的工农业产品愈丰富，农民经济愈多地卷入总的经济生活，则商品流转问题的意义就愈大，就愈迫切需要苏维埃政权对市场实行计划领导”。决议认为目前商品政策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通过发展并巩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市场上的阵地，来组织对广大消费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正常供应”。

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给予它以下权利：为整个国内商业立法，规定固定价格，监督其切实执行，指导制定有国家投资的一切组织的商业政策。

同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内容包括 1. 合作社在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方面的作用；2. 生产和组织销售；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作社；4. 过渡到稳定的通货；5. 合作社的发展及其主要缺点；6. 农村中的合作社；7. 工人合作社；8. 健全和巩固合作社的办法；9. 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的合作社工作；10. 合作社和国家机关；11. 住宅问题和合作社；12. 党在合作社方面的特殊任务。

俄共(布)中央认为,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恢复取得初步成就后,最首要的经济任务就是“掌握和组织市场,基本上也就是发展和巩固合作社”。决议强调:组织商业和合作社是继续向社会主义经济前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中也基本上已证明完全正确”,农业生产率和农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同时,农民的中等阶层和富裕阶层开始发展起来,贫困增长了,“农村发生了分化”。俄共(布)中央认为,农村分化的特点是:“到目前为止,分化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不如说是商业、牲畜和农具,这些东西正在变成积累的工具和剥削力量单薄的农民的手段。同时,劳动组合、集体经济、共耕社以及集体购买农具的协作社也有所发展,社会劳动开始广泛采用”。“这一切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不仅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的积极性提高了,而且殷实的农民阶层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决议认为,“在解决党在农村中的工作问题时,必须以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为出发点”。决议要求党把主要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小生产者的合作化上,因为小生产者的合作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只有生产者的合作化,才能解决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面临的双重任务:继续争取进一步尽可能扩大农业产量,同时不断扩大对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帮助,以便振兴他们的经济和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

决议还指出要全力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对贫苦农民给予真正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利用土地整理来改善自己的经济”。

同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主要内容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党。决议指出:“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自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长期过渡道路上的必经阶段。新经济政策促进了整个

国民经济即农民经济、国营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发展”。决议认为目前国家经济所遭受的严重困难，主要是国营工业的产品找不到足够的销路，因此“目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国营的工业同农民的农业的结合，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我们国营工业的产品同我国的主要是农民市场的需要和容量之间的正确关系”。俄共（布）中央强调，全党从上到下应该得出结论：“只有我们真正地学会使国营经济各部门协调起来，使它们彼此之间和同市场之间经常地相互配合，进一步的经济活跃（这种活跃迟早会在不远的将来克服目前的危机）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全党最迫切的任务，是集中工业；正确地组织工业机构和商业机构；振兴农业，用包括增加农业信贷在内的办法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使它适应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等等。

5月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致共产国际》、《致德国共产党》、《致法国共产党》的致敬电。在《致共产国际》的致敬电中说：“去年，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国际革命的新浪潮正在逐渐高涨，同时，许多国家所进行的选举证明，共产国际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共产国际因而就面临着新的复杂问题。俄国共产党高兴地告诉共产国际，俄国人的队伍经过了考验更加团结和坚强了。团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的无产阶级正在日益增强；我国的经济状况正在改善”。

在《致德国共产党》的致敬电中说：“去年，我们大家曾一度感到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是特别临近了。但是，德国无产阶级不得不再一次退却。我们坚信，这是不会太久的。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会迅速地重新积聚力量。德国共产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核心已经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坚决地纠正了‘萨克森’错误并克服了机会主义倾向。德国共产党消除了内部危机而走上了广阔的政治斗争道路”。

在《致法国共产党》的致敬电中说：“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热烈

地祝贺你们在最近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特别热烈地向巴黎近郊的革命工人致敬，因为他们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集合在共产主义旗帜下面。我们因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塞纳联邦（它无疑是法国共产党的优秀组织之一）能够组织这次辉煌的胜利而感到骄傲”。

8月16日——20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议程是：1. 关于苏英谈判的报告；2. 关于1924——1925年度苏联预算的控制数字；3.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关于工资的报告；4. 关于社会保险；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的政治教育的报告；6. 关于同歉收和旱灾的后果作斗争以及关于粮食出口；7. 对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态度；8. 关于各区域的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

关于1924——1925年度苏联预算的控制数字问题，全会决定听取一些报告。全会认为，1924——1925年度的预算中，除了初步的年度预算外，必须保留固定的季度预算和实行严格的预算纪律，支出不得超过收入，争取全部地、按时地得到各项收入；同时认为，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必须做到，在1924——1925年度真正有可能采取一些保证发展冶金和提高农业的措施。

中央委员会书记拉·莫·卡冈诺维奇作了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的政治教育的报告。中央全会同意组织局和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责成组织局拟定今后对那些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进行工作的实际措施。

关于对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态度问题，全会同意政治局在苏联工会和工会国际同阿姆斯特丹国际谈判的问题上的总路线。关于苏联工会活动家被邀请参加在赫尔召开的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全会同意派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

8月19日 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关于工资政策的具体建议,通过《关于工资政策》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工资增长较快的情况,到现在为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般说来也是合理的。工资应提高到能满足工人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水平。这从工人利益的观点出发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今后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但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这种对比关系,如果长期保持下去,就会威胁到工业和国家的利益”。“上述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目前已经引起一系列的危险征象。这些征象就是: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使失业数增加;社会保险费的负债日益增长;在按时支付工资方面有很大的困难,所有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不能按时支付工资和拖欠工资的现象;缺乏进行必要的扩大生产和恢复固定资本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和信贷;扩大生产和降低产品价格的速度不够快,因而不能适应贫、中农的支付能力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此,俄共(布)中央决定:“为了从新的预算年度起保持并尽可能地增加实际工资而不普遍地提高名义工资,必须进一步降低零售价格”。“工资已经提高了的各轻工业部门,必须停止继续提高工资,在工资尚未提高的工业部门(运输业及采矿冶金业),必须继续贯彻进一步提高名义工资的方针,但必须估计到该工业部门的经济状况和可能性”。俄共(布)中央强调:“在工资政策方面的最重要问题是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和总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10月25日——27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问题,听取了“关于当前的经济问题”、“关于预算和通货”等报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并根据维·米·莫洛托夫的“农村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基本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该决定将由政治局最后校订。

该决议指出:“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和乡委员会的工作的领导。

为此,必须特别注意农村支部的工作内容,农村支部和乡委员会除了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在农民群众(雇农和贫农)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以外,还应当注意农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问题,以及相当的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农民互助委员会等的工作”。决议针对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情况提出“经常调派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同时“必须特别注意从农村中培养和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党组织面临着教育农民出身的新党员的巨大任务,以及对日益增加的非党农民先进分子进行政治领导的任务”。决议还提出,“随着经济的巩固,全体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正在提高,……党应当竭力把全体农民,特别是力量单薄的农民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政治积极性首先引导来活跃苏维埃,加强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及其他组织的活动。活跃农村苏维埃这一任务(它同活跃苏维埃工作的总问题有关)是当前最迫切的基本任务之一。”

决议最后强调共青团组织应在农村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把先进青年吸收到团组织中去,同时把优秀共青团员吸收到党组织中去。

12月22日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加强对女工和农妇工作的措施的决议。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作出《关于党对东部女工、农妇和其他劳动妇女的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党的当前工作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党在吸收女工和农妇参加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建设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决议强调,“最大限度地吸收东部女工、农妇和其他劳动妇女积极参加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建设,根据一般的原则为她们开辟加入党的队伍和参加管理国家的途径”。“充分地注意支持和发展那些真正帮助女工和农妇能够同男性工人和农民一样参加一切社会工作的机构(农村中的人民饮食公司的食堂、托儿所、集体洗衣房、医疗站等)”。 “加紧对女工和农妇进行苏维埃教育和共产主义

教育；吸收教师特别是女教师参加这一工作”。“大力促使女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以巩固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1925 年

1月12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建立高等院校同生产的联系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高等院校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实际工作，为广义上的生产的一切部门培养工作人员。因此，高等院校的整个教学安排和全部生活应当尽可能密切地联系实际，而且这种联系应当逐步增多。高等院校的理论课、校内实习课和生产工作应该互相密切配合。学员的生产实践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决议还规定，学生同生产的联系应该是经常的或者时间尽可能更长一些。同时学员的实践和观察，每过一段时间应当在校内从理论上再研究一遍。为了加强学校同企业的联系，决议规定经济机关和工会的负责人应经常参加高等院校的校、系会议及其他活动。

1月17日——20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 关于地方组织就托洛茨基言论所通过的决议；2. 关于增加预算；3. 关于金属工业的状况和远景；4. 组织局关于加强对女工和农妇的工作的措施的报告；5.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此外，全会还研究了一系列日常的组织问题，并听取了关于国际形势和租让合同的报告。

全会还讨论了关于召开下次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并委托政治局确定召开的日期，使代表会议在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不久举行。全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1. 党的组织问题；2. 关于合作社；3. 关于农业税；4. 关于金属工业；5.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扩大全会。

全会根据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合小组的提议,认为必须研究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并委托组织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协同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拟订整顿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工作的措施。

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了地方组织通过的关于地方组织就托洛茨基言论所通过的决议,有以下三种意见:1. 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出党;2. 要求解除他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和撤销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3. 要求解除他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和暂时留在政治局。全会根据书记处的报告,就托洛茨基的言论通过了决议。

1月17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中央委员会以多数票对2票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除1票弃权外,全体通过。

决议说:“现在可以把托洛茨基的全部反党言论用最一般的形式表述如下:力图使俄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变成某种被托洛茨基‘现代化了的’不要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修正。这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即企图用孟什维主义的变种(即旧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正在重整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实质上,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按照近似‘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按照‘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伪造共产主义”。

决议指出,“我们党曾不得不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四次全俄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第二次争论是工会”。“第三次争论是关于‘党机关’,关于‘计划’,关于虚构的中央委员会的‘农民倾向’,关于‘世代的斗争’等等”。“第四次现在正在进行的争论暴露了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更加严重和包罗万象的意

见分歧。现在已经明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政策和策略体系”。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1. 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籍要求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口头上服从党纪，要求完全无条件地放弃任何反对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2. 鉴于没有全党的威信的充分支持，军队的领导就会是不可思议的；鉴于没有这种支持就会产生破坏军队中铁的纪律的危险；鉴于一方面，政治工作人员代表会议，另一方面，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团已经主张撤销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因此，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3. 关于托洛茨基是否继续在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的问题将留待下次党代表大会去讨论，但必须警告：一旦托洛茨基重新企图破坏或不执行党的决议时，中央委员会将不等代表大会的召开就不得不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内，并将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关于撤销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作的问题”。

2月9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的决议。决议指出：“巩固工农联盟和振兴农村经济的任务，要求党、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国营农场”。俄共(布)中央就党政机关对国营农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将导致取消国营农场，使其境况更加恶化。俄共(布)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已经收缩的国营农场网应该保存下去(在经济上明显没有生命力的除外)并加以巩固，使每个国营农场都成为没有亏损的农场，同时能够真正成为对农民经济传播农艺影响的传导者和大规模文明经营的优越性的范例。

为了发展和巩固国营农场，俄共(布)中央决定必须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增長和国营农场的巩固情况提高工资，改善国营农场劳动者的物质和生活条件的工作应当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进行。同时，经

济机关应当注意到,有步骤地改善国营农场工人的物质条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决议提出必须采取如下措施:1. 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2. 消除劳动和生产方面的混乱现象;3. 建立派工单制度,以便充分利用职工的工作时间并使之达到最大限度的负荷;4. 在生产季节(3——9月),通过工会与经济机关订立合同的办法把工作时间平均延长到10小时,按照合同相应地提高工资;5. 采取适当的组织—经济措施,使固定工人一年四季都能有正常的充实的工作量。

4月23日——30日 俄共(布)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上批准了关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议程问题的决议草案。

全会讨论了关于铁路运输业的状况的报告。全会认为,恢复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决定成立一个由10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委托委员会向下次中央全会报告自己的工作。

全会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通过了维·米·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党在农村经济贫困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以及关于哥萨克人问题决议。

全会听取了拉·莫·卡冈诺维奇所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对已入党和准备入党的工人进行工作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赞同该委员会的工作,并认为该委员会工作已经结束应予以撤销。

全会决定1925年11月下半月将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4月27日——29日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78名有表权的代表和39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 党的组织问题;2. 关于合作社;3. 关于农业税;4. 关于金属工业;5.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6. 关于革命法制。代表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合作

社；关于单一农业税；关于金属工业；关于革命法制等。

代表会议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提议讨论了并且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提纲。该提纲认为，苏联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它的国际方面。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危险就仍然会存在。苏联人民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的，因为要消灭外来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包围，而消灭资本主义包围，只有到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因此就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和苏联劳动人民休戚相关的。党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方针已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的纪律。

这次代表会议还“斥责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那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可能性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并制止了布哈林分子以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党的方针对立的企图”。

4月27日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单一农业税》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得有可能立即提出进一步减轻某几类纳税的人的赋税负担的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到国家用于国防和满足国家的文化需要和经济需要的费用必然增加，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然而党认为，它首先来注意解决单一农业税的问题，从国家的财政状况来看是可能的，从农民的利益来看也是必要的。为了促进已经走上集约化道路的农业的积累过程，为了发展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以及为了使农民易于获得符合现代农业条件和任务的农具、机器、工具、良种牲畜、优良种子等等，党认为从下一个预算年度起就可以大大降低单一农业税

的总额，将它减为 2.8 亿卢布，并认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常会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决议是正确的。同样，党认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巩固乡预算和促进乡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做出的关于从单一农业税收入项下拨出 1 亿卢布给乡预算的决议是正确的”。

4 月 29 日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认为，“目前苏联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国家生产力迅速增长。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已获得决定性成就”。“然而，在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又引起新的困难。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巩固的同时，私人资本已有发展而且还要发展，因而引起城市中特别是农村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竞争局部尖锐化”。

俄共(布)认为，因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开始的农村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富裕农民阶层中成长起来的新的农民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将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另一方面是农村贫农分子将日益无锐阶级化”。俄共(布)强调，在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国家经济政策的各项措施，就不能不考虑到上述事实。由于“在贸易自由和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合作社是联系国营经济与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主要社会经济形式。只有合作社才能保证国家具有控制与调节小农生产及国内商品流转的最大可能性”。因此，合作社建设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俄共(布)认为，合作社工作“目前最危险的一个缺点，就是混淆了各种合作社(农业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工艺合作社)的职能。今后，必须保证严格划分各种合作社之间的职能，农业合作社无论如何不应从事供应居民个人消费品的工作”。

俄共(布)决定制定新的农业信用合作社章程。此外，还就“关于农业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工艺合作社”、“关于消费合作社”等问题

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同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金属工业》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把 1924——1925 年度金属工业的原有计划总的来说扩大 26%，即把产值扩大到 3.49773 亿战前卢布，并责成有关机关具体确定这些数字”。决议认为今后金属工业的基本任务是“在提高产品质量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同时在工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利用拨款和依靠工人中间目前所表现的热情来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关于技术人员，决议认为首要任务是“把熟练程度提高到国外的水平，增加干部，使培养干部的工作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的要求相配合，改善和整顿劳动条件以及整个工业管理和领导系统的状况”。

4 月 30 日 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了《党在农村经济贫困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后，我国农民经济真正强有力地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就消除了。可是，连年的内战和由内战造成的经济总破坏，以及后来几年的歉收，都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状况。结果，农业生产大大降低了，农村贫困化了(耕畜和农具非常缺乏)，这在目前表现为严重的农村人口相对过剩(即所谓‘农村失业现象’)。因此，目前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基本经济任务是，在进一步发展国内商品流转的基础上提高和恢复整个农民经济”。

决议还提出俄共(布)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实际措施，主要是：“鼓励农民把积蓄下来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土地的耕种和施肥，以便提高集约化和增加收入”；“容许农民根据土地法典更广泛地享有出租土地的权利”；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民经济中使用雇佣劳动问题的决议”；“尽量扩大把雇农吸引到全俄农林工会中来的工作”；“加速和改善土地规划工作……必须为土地规划工作提供最优惠的贷款”；“为了促使更适合于增进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土地使用形式(村

镇、新村等等)的发展,应当严格遵守土地法典规定的自由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权利,对于分建独家农场和独立农庄的活动不能给以行政阻碍”;“党必须保证迅速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和建立新的亚麻、油脂、马铃薯等加工厂”;“特别需要的是制订更快地恢复制糖厂的计划”;“必须采取措施加速实现恢复和发展旱灾区的农业的计划”;“对于大型国营农业经济,是继续给予他们物质的帮助,同时,它们也必须加强对附近农民的经济帮助和技术帮助,帮助他们选种,建立示范农场,修建电话等”;“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和发展农村中的农业信用合作社”;“扩大中央农业银行和各共和国农业银行的固定资本”;“必须从中央农业银行和各共和国银行的固定资本中拨出特殊的基金”,以增加发放给集体农庄(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组合,农业公社)的贷款;“根据现行法律,大力加强建立地方种子储备的工作”;“必须加强注意比较落后的民族共和国、区域和个别区,并帮助提高它们的农业”。

此外,在商业合作社和对价格进行调节方面,在减轻农村赋税的办法方面也制定了具体措施。

7月17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住宅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大城市和工业区的房荒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尖锐性“首先和主要地反映在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中,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住宅条件决定的”。决议同时还指出:“住宅建设合作社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数额相当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来自国家从国营工商业利润中、从国家保险机关的利润中提取的提成,以及来自国家从商场租金中、从特别的住宅税以及优惠拨给的木料中提取的提成”。

为此,俄共(布)中央作出以下决定:“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的全部注意力应该集中于通过尽量发展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住宅建设的办法首先解决工人的住宅困难”。“为了加强住宅建设合作社的

能力,首先必须使产业工人和运输工人就其工资数量和其他具体条件来说能够最积极地参加发展住宅建设和积累建房合作社自有股金的那一部分人参加合作社”。“为了健康地发展工人住宅建设合作社,必须使中央住宅合作总社的工作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密切地协调一致。在地方上,住宅建设合作社的工作则需要同工厂管理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密切地协调一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要注意必须向各经济机关和工会发出关于支援工人住宅建设合作社的指示,指示它们把支援措施列入工作日程并纳入经费预算”。

9月11日 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专家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振兴经济的各项迫切任务的解决,生产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合理化,运输的改善,文化的繁荣,农业的发展等等,只有在专家最密切最积极参加这一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了完成向专家所提出的任务,必须严格确定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改善技术工作人员完成他们所担负的工作的条件”。

为了发挥专家的作用,俄共(布)中央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在报刊、壁报上对专家乱加批评,“批评专家要抱更认真更严肃的态度”,“下结论要更加谨慎”,“同时要使专家有广泛的可能在报刊上就他们的工作所受到的某个批评进行解释,尤其是驳斥报刊上不正确地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

决议强调,在评价专家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工龄(特别是苏维埃时期的工龄),考虑到他们在战前或革命后在一定专业领域中的贡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只根据专家的阶级出身来确定对待他们的态度”。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对专家的生活及工作给予照顾的内容,如“在招收专家的子女上学方面实行优待,改善专家的居住条件,给他们纳税优待,对改进生产的成就实行个人和集体奖励的制度”。帮助专家

通过报刊就科学技术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同时,“尽力帮助出版专门的杂志和技术书籍,以优惠的条件向专家及其组织提供有关的外国出版物(由各个托拉斯、企业和机关订购)并协助他们同国外的学术界建立必要的联系”。

10月3日——10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全会。全会主要审议了以下问题:1.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2.关于对外贸易;3.关于工资;4.关于工会;5.关于贫农工作。全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关于党在贫农中的工作、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和告俄共(布)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书。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全会基本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并委托由中央委员和中央经济机关领导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提纲拟出关于实行对外贸易垄断的形式的具体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关于工资问题,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研究把最落后部门的工资略加提高的可能性问题,并审查关于个别重点工业部门的工资问题的意见书。在工会工作问题方面,全会认为必须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一个关于工会任务的总报告,委托政治局吸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共同拟定这个报告的提纲。全会批准了《关于党在贫农中的工作》的决议后,委托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在民族边区和东部边区的贫农组织的工作问题,并做出最后决定,同时审查设立贫农优惠贷款专门基金的问题。

全会决定于12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批准了代表大会的如下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3.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4.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俄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6.当前的经济建设问题;7.关于工会的任务;8.关于共青团的工作;9.关于修改党章;10.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以全会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专函,指出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和召开各地党的代表会议的时候,特别需要贯彻党内民主制。

全会听取了关于外国共产党状况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以及关于英国工会代表大会情况的传达。

10月5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对外贸易》的决议。决议指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组织对外贸易时,必须服从下面两项基本任务:(1)最大限度地促进和刺激国内生产力的发展;(2)保护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击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攻”。“我们完成这些任务的主要工具就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实质就是:国家本身经过特设的机关(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对外贸易;国家规定什么组织,什么部门,在什么范围内可以直接经营对外贸易业务;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通过制定进出口计划,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和进出口货物限额的制度,直接调节进出口,调整对外贸易组织的业务”。

俄共(布)中央强调:“对外贸易垄断制应当是不可侵犯的。必须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因为它是击退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任何关税保护政策,任何其他调节手段,都不能像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样有力地保护着我们”。俄共(布)中央同时还强调,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使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适应苏联的业已改变了经济条件和任务。同时还决定“重新审定现行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制度,要简化这种制度并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为了确切执行进出口贸易计划,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必须严格统计由它的各地方机关所发出的一切进出口贸易许可证以及将要根据这些许可证而按期征收的款项”。

11月29日 《真理报》公布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告

俄共(布)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书》。中央全会在其中指出：经济的高涨和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决定了党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所实行的政策。这一时期党的政策的中心任务如下：1. 活跃城乡苏维埃，吸收非党工人参加城市苏维埃，吸收中农和贫农参加农村苏维埃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群众的联盟，——这就是我们党在这方面提出的基本任务”。其他任务还包括“活跃合作社，特别是开展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工作”。“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人工资，并把提高工资同保证工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帮助贫农改善物质生活状况，特别是要在政治方面帮助他们，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把农村贫苦阶层组织起来，以便在农村的新条件下进行胜利的斗争”。

中央全会还指出：“目前，党正在准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这个时期，各地正在选举出席当地代表会议的代表，各级组织从支部起都将讨论整个党的政策和当地党机关的工作，改选地方领导机关，然后还要选举出席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个时期，应该十分严格地特别彻底地切实实行党内民主。这就是说，应该吸收党员群众最积极地参加讨论和解决代表大会上的问题，在改选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和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不应强行提出某些候选人，而必须从群众中更换和提拔新生力量参加领导机关，出席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

12月18日——31日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通过了新党章。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65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641个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64.3万名党员和44.5万名候补党员。

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报告人斯大林)；2.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报告人莫洛托夫)；3. 检查委员会的

总结报告；4.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 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6. 当前的经济建设问题；7. 关于工会工作；8. 关于共青团的工作；9. 关于修改党章；10.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和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告列宁格勒组织全体党员书；关于“列宁格勒真理报”；关于修改党章；关于工会工作；关于共青团的工作。

代表大会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为党的完全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工业化的代表大会。它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并用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代表大会通过的《告列宁格勒组织全体党员书》指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辜负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信任，在代表大会上违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意志，反对党的路线。代表大会号召列宁格勒组织起来粉碎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

代表大会选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63 人和候补委员 43 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63 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7 人)。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捷尔任斯基、安·安·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尼·米·什维尔尼克、阿·叶·巴达也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等。日丹诺夫和尼科拉也娃等为中央候补委员。

12月23日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完全

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一路线为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在国内外的阵地”。

决议在肯定苏联在国际国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粮食收购和对外贸易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的稳定的通货——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遭到威胁,并造成了贸易逆差”。联共(共)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进攻和苏联经济向社会主义方面推进的局面。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先锋,领导着整个国民经济”。“但同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来的特殊矛盾、特殊危险和困难也日益增长。这就是:私人资本在其作用相对降低的情况下有了绝对增长,尤其是把业务转向农村的私人商业资本更是如此;农村富农经济随着农村分化的加剧而日益增长;城市新资产阶级也在日益增长,力图在经济上同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富农经济勾结一起来征服基本中农群众”。

为此,联共(布)中央作出以下指示作为经济政策的指针:“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力保证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战胜私人资本,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保证苏联经济独立,使苏联不致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附庸,为此,必须坚持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为经济的机动能力建立后备”;“根据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尽力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转的增长”。

12月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完全取决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成就,而且首先取决于大工业恢复的成就。国营工业的增长和发展及其产量的增加,是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切实保证,因此要求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工会在今后更加聚精会神地来巩固和发展这些成就”。代表大会肯定了工会在恢复经济方面所作出的重大

贡献,同时要求工会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工会代表更经常更有计划地参加编制生产计划的各个阶段的工作,由工会组织的上级机关总结这一工作的经验和结果,把调节机关和计划机关以及委员会中各个工会代表的活动协调起来并经常予以指导”。

决议还指出,“决不能把工会和经济机关在国营工业方面、在国营工业的成就方面的利益的共同性了解为它们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工人群众的作用是一样的”。“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经济工作人员必须使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委托给自己的企业在生产上获得最高的成就:在遵守苏维埃法律的基础上采取符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的性质的办法,使企业获得赢利,使产品的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工会及其代表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贯彻把工会和经济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区别开来的明确方针,决不容许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也应当坚决地支持经济工作人员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倡议,使它和工会所代表的工人的利益相一致,并使这些措施能够最顺利地实现”。

1926年

1月1日 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参加下,举行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3月11日 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培训劳动力》的决议。决议认为培训劳动力的主要措施是:除开办工厂艺徒学校外,还应“按照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方法开办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班、不脱产的班组学习和个人学习、无业人员的转业学习(以上系进行一般培养),以及工长和高级工人训练班”。

联共(布)中央强调:“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通常的一种国民教育,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任务之一,因此工厂艺徒学校应当免授普通课。它的课程应当都是必需的实用课和最起码的综合技术知识”。联共(布)中央还要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职业教育总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必须制定各种提高在业工人熟练程度的办法并付诸实施”。

4月6日——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下一年度粮食收购的组织和方法。联共(布)中央强调:“决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苏联国际地位的增强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国家生产力迅速增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日益增长。这种增长是

党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实行了巩固国营工业同农业的结合以及加强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的政策的结果。这种增长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和国内经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出现的”。

在工资政策方面，联共(布)中央指出：本经济年度开始时所采取的关于普遍提高工资的办法以及最近(1926年2月)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煤矿工业、运输业和邮电业中提高工资的措施是正确的，并建议在本经济年度剩下的时间内，必须使已达到的工资水平得到保证。

4月9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1924——1925年度，工业增产了64%，在本经济年度大约能增产30——40%。但是，因苏联“进入了一个工业品长期不能适应增长得更快的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时期，其结果便是工业品奇缺”。因此，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决定性的任务，便是顺利解决这个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的首要工作是国内积累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剥夺不生产的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废除外债，把工业、国营商业(对内和对外的)和整个信用系统的收入集中在国家手中等等”。与此同时，“要保证在全国实行严格的节省制度，坚决反对一切不必要的非生产开支，另一方面要使居民的游资更多地流入信用机关和合作社机关以及用来购买公债，以便利用这些积累来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首先是发展工业”。“加速积累，合理使用所积累的资金，比目前更严格得多地实行计划原则，这就是下一个时期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迫切任务”。

联共(布)中央还提出“必须首先保证运输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电气化工程以及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重视住宅建设”等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因为“只有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保证的时候，工业才能克服自己进一步发展中的困难，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因此要“大大修改单一农业税的结构，其税额”

只能随着播种面积的扩大、课税对象的增多以及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而增加”。全部农业税的 2/3 归地方苏维埃支配，以满足农村的需要。

联共(布)中央全会建议各级党组织在最近期间解决当前任务时应遵循下列指示：“在货币发行和信用政策方面，必须在最近几个月内做到使国内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流转额相适应。发行额的扩大只能根据卢布购买力的提高程度而定”；“在商品流转方面，必须降低零售价格”；“在工资政策方面，……必须保证工资随着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工业的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工业基建投资和进出口计划等方面，要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执行。

4月22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决议》。决议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整个国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要求各级党的、经济的和工会的组织把注意力着重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厉行节约的问题上”。

针对“1924——1925 年度上半年的工人平均总产值显著增加，但在最近一个时期中这种增加停止了，而在某些工业部门，出现了工人平均总产值则在工资增加的同时有所降低”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必须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在本经济年度的剩余时间内将整个工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 10%，同时，应当不仅靠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来达到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要靠采取组织性质的措施和技术上的改进”。

中央政治局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各经济机关在工会的协助下应实行以下措施：“各经济机关不应当允许超过生产计划所规定的人数增加工人”；“各经济机关应当特别注意使开工的企业充分负荷”；各经济机关应采取措施，消除那些并不决定整个问题但可能影响产量提高的生产上的“小毛病”；“必须采取措施提高中、下级技术人同的威信，保证他们能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真

正领导生产”；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放弃干预各经济机关日常业务工作的工作方法；加强对新工人的生产教育方面的工作；“鉴于下半年已不可能在名义上提高工资，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依靠降低零售价格恢复到10月份已经达到的水平”。

4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通知：《为厉行节约而奋斗》。该通知是致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在经济、合作社、商业、银行及其他机关工作的全体党员的。通知说：“我党和全国正面临着最大限度地保证振兴重工业的任务。这些任务，使重新装备旧工厂和建设新工厂的问题提到了第一位，这种情况又不可分割地与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通知强调，资金来源“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国民经济积累的数量”。“在目前情况下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建立最严格的节约制度，从下到上节约一切行政、经济、商业、合作社、银行以及其他机关和组织的开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的问题，应当得到我们全党密切的注意”。

为此，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以下要求：“吸引苏维埃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参加厉行节约的斗争”。“在报刊上广泛报道和揭露经营不善、滥用和浪费行为的事实，不管应当对此负责的人是什么职位”。此外还提出，严格追究经营不善和浪费行为的责任，将有过失的人交付法庭；党组织不得向经济机关作直接或间接的物资摊派；坚决压缩各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的编制；“绝对禁止任何暗中给职员加发工资的做法，同滥发奖金的行为作斗争”；“为普遍提高企业的产品率而斗争；同缺勤、旷工现象作斗争”。

通知强调，“决不能把这次运动看做临时性的运动。只有通过长期的运动，才能从上到下牢固地确立节约制度”。

6月17日 联共(布)中央最后校订和批准了新党章——《全苏

联共(布尔什维克)党章》。新党章是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共分15章,计100条。新党章规定:“新党员是从受过初步政治教育并经过规定的候补期的候补党员中接收”。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入党,前者须有一年党龄的党员二人介绍,后者须有两年党龄的党员工人介绍;农民(红军战士除外)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入党,须有两年党龄的党员3人介绍;其他(职员等等)人入党,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5人介绍。关于党的纪律,新党章规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同时,党生活中的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未通过之前,党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讨论”。

新党章还规定了与“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外组织中的党团”有关内容:“在红军和红海军中,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由作为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负责。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通过它所委任的各级政治部(战线、军区、舰队、军、师的政治部)、政治委员以及党的各级部队代表会议所选出的党务委员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在一切代表大会、会议和由选举产生的机关(苏维埃、工会、合作社等)中,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即成立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各方面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党的监督”。

7月20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关于苏维埃改选的总结》。决议指出,“1926年的苏维埃改选是国内战争结束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第一次广泛而公开的选举运动,城乡各主要社会集团的选民在国内战争之后第一次公开地参加了苏维埃改选。同时,这次苏维埃是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的”。“活跃苏维埃的政策是发扬苏维埃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首要步骤,它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整个国家机关永久的和唯一的基础’是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

者”。“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在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中得到切实的保证时,这一联盟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支柱”。决议还指出,“活跃苏维埃的政策也是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

决议提出了联共(布)继续执行活跃苏维埃的政策时的任务,主要是“为了加强改善一切苏维埃机关的斗争,为了克服苏维埃机关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必须更广泛而坚决地吸收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来参加苏维埃(各个小组、专门会议、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必须更多地更坚决地提拔非党工人和农民担任苏维埃(工会、合作社等)中较重要的工作,尽力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文化和专门业务水平”;“加强苏维埃代表向自己的选民做工作报告的制度和责任感,为此必须同时向选民说明他们有权撤回自己所不满意的苏维埃代表”,同时要“力求正确执行苏联宪法和有关指示所规定的选举条例”。

7月17日——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体会议。中央检查委员也参加了会议。

全会讨论了全苏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党内生活和工人状况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关于苏维埃改选的总结、关于住宅建设和1926年的粮食收购等问题。

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派别活动和党内某些领导人员、某些党员破坏党的第十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维护党的队伍的统一的决议的问题,以及这种派别活动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的联系的问题做了报告,全会在听取这个报告之后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决议案,撤销了季诺维也夫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取消了拉舍维奇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

全会听取了政治局关于就最近的国际事件(英国煤矿工人罢工、

波兰政变和中国事件等)而通过的决定的报告后,同意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工作。

全会决定在1924年10月上半月召开下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7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指出:“由列宁提出并经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统一的决议,就是在维护党的队伍的团结方面对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指示,而党也是依靠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意志,粉碎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所出现的一切派别活动。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又遇到了所谓‘新反对派’的派别活动”。新反对派的一系列派别活动,主要表现为“举行非法的秘密会议;故意挑选党的一些秘密文件加以翻印并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散发,以破坏党的路线的威信,……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党的其他组织去建立秘密的派别集团”。

决议强调指出:“反对派的所有派别活动,都是同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密切相关的”。“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并不只限于我们党的范围内,它还企图吸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也参加活动,通过这个机关在其他兄弟党内散播那种被我们党斥责过的反对派的观点,从而为唆使外国共产党反对联共(布)奠定基础”。联共(布)中央认为,季诺维也夫应对这次分裂活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季诺维也夫的同道最积极地参加了派别活动,利用了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而季诺维也夫却丝毫没有打算斥责自己的同道并同他们划清界限”。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1. 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2. 给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严重警告的处分,将其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撤销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在两年内禁止他担任党的负责工作。

7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通过《关于住宅建设》的决议。决议指出：住宅问题已成为工人活动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工人的生活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稍为显著的改善。此外，日益加剧的房荒阻碍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大地妨碍吸收劳动力参加生产，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着不好的影响”。

决议认为，“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的工人住宅的建设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为此，决定成立工人住宅建设固定基金；进一步整顿住宅建设，制定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时，必须考虑该期间工人住宅建设的远景计划；减低建筑造价；延长住宅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息；简化并分散办理住宅贷款合同签订方面的事务，及时地拨付住宅建设贷款。责成有关部门采取一切措施来拟定造价最低并最适合工人需要的住宅型式；加强检查工人住宅的工程质量、建筑型式以及它们是否适合工人的生活需要；大力发展住宅建设，鼓励私人建筑住宅；提高房租；但提高的速度应“直接适应于职工实际工资的一般增长速度”。

8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营工业和消费合作社的相互关系》的决议。决议重申联共(布)中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前规定的关于合作社和国营工业的相互关系的有关决议，同时强调：“降低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水平和使批发零售剪刀差接近的任务，要求首先应整顿国内商品运销网的结构并使商品运销网的工作方法正常化”。“在全国消费者中，工业品的主要分配者仍然应当是消费合作社系统，消费合作社系统内部的经济联系和组织联系应当加强，这特别是因为，在某些合作社联社中有利用商品匮乏的情况进行积累的倾向，而对这种倾向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联共(布)中央还就合作社系统销售工业品问题、辛迪加和合作社之间的总合同问题，以及中央国营工业贸易组织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地方合作社组织之间的直接商业关系等问题作了规定。

10月23日、2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10月23日,全会基本上批准了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关于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和“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的提纲,并决定将这些提纲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审议。全会批准了已经在报刊上公布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议程,并补充了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问题,指定约·维·斯大林为这个问题的报告人。全会还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代表中央政治局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首领的派别活动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报告之后,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0月26日,全会批准了约·维·斯大林的《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提纲,并将该提纲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审议。

10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一些中央委员的派别活动和违反党纪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决定》。该决定说:批准基洛夫同志代表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所提出的如下草案:“1. 鉴于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叶甫多基莫米、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候补中央委员尼古拉也娃同志违反党纪,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特向这些同志提出警告,并对党的领导机关人员的这种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行为加以申斥”。

“2. 鉴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表现联共(布)的路线、并且由于自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上进行派别活动而丧失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任(这些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下去”。

“3. 鉴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七月联席全会以后时期在领导上进行派别活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撤销托洛茨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撤销加米涅夫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0月26日——11月3日 联共(布)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9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64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 关于国际形势；2. 关于国内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3. 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4. 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斯大林作了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报告。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有：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其中第三项决议强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是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是第二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辅助队伍。代表会议完全同意中央的政策，并号召进一步为维护党的统一，为揭露滚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坚决斗争。决议指出“‘新反对派’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基本问题上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就是它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一问题上的基本错误的直接继续”；“反对派联盟的特点是：它虽然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却竭力以革命的词句装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

代表会议还通过了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向德国共产党致敬”。文件说：“目前，我们党和德国共产党为维护列宁主义，反对联共党内反对派联盟及其同盟者即德国的所谓‘极左派’（实际上公开宣扬社会民主主义和叛卖的思想）的那种口头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共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空前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反对派联盟在我们党内已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反对派联盟的派别分裂活动已遭到全体党员群众的

致命回击”。“德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斗争来反对派别集团，这种派别集团就是联共党内反对派联盟的继续。……肖列姆、韦柏、乌尔邦斯对苏维埃工人国家、苏联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公开的攻击，已使他们与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死敌同流合污”。

11月3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强有力地要求党、国家和工人阶级把一切力量集中在经济政策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对我国整个经济的领导权的树立(首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对农民经济起主导的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无产阶级人数及其积极性的增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的巩固”。

决议宣布，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工作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更高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造的时期”。在恢复时期，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工农业生产和铁路运输业基本上达到了战前规模的条件下，保证了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经济命脉的领导作用；在商品流转方面，做到了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占优势，确立了稳定的通货，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信用系统”。

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联共(布)提出要“扩大固定资本”，“坚定不移地实行节约制度”，巩固工农联盟，“向农村供应农业机器及其他商品，组织农产品的销售，建立农业信贷，组织对农村贫民的帮助”。联共(布)特别强调，不能把“农民仅仅看作征税的对象，用课以过重的赋税和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办法来从农民经济中榨取更多的资金，这不可避免地会阻止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减低农业的商品率，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遭受破裂的危险，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威胁”。

决议还从“工业和基本建设”、“物价问题和商品流转”、“对外贸易”、“劳动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本经济年度的基本问题。

11月3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目前时期的特点是:“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阵地相对巩固的条件下,国内社会矛盾增长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尖锐化。同无产阶级直接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资产阶级、富农)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加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显露出不可避免的动摇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活动也在加强,这就要求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巩固、团结和组织起来”。

决议提出工会的任务主要是“对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进行共产主义(一般政治的、文化的、生产的)教育,普遍提高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吸引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参加反对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恶习的斗争”。同时,工会应“特别加强对群众的广泛的教育工作,加强他们对整个阶级的总任务的关心,更广泛地吸引工人群众来参加全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决议还就“节约制度”、“生产会议”、“工会和经济工作”、“工资”、“合作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强调“节约制度是进行社会主义积累、降低产品成本、降低一切产品和商品价格的必要前提”。“生产会议(或生产代表会议)应当在工会的干练而坚强的领导下起特别卓越的作用”;工会要进一步注意和参加经济工作;“工会应当更加积极地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工作,并吸引广大男女工人参加这一工作”。

11月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体会议。联席全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一切决议。鉴于瓦·弗·古比雪夫已被任命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席全会批准格·康·奥尔忠尼启泽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1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本经济年度的大型建设》

的决议。决议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提出的各项全国性工程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连结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谢米列契耶铁路的铺设和第聂伯河上的水电站建设”。“关于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今年只限于完成勘测和继续进行亚速港工程的施工”。

12月3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贯彻执行改造农民经济的各项措施以外，还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营农场、确定它作为完全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农业中的作用，并以此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据这项任务，今后国营农场建设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把国营农场变成在经济核算制和赢利制基础上进行经营的工业化大农业企业。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国营农场才能对农业起必要的促进作用”。

关于集体农庄，决议认为“集体化运动已开始摆脱了它在新经济政策初年所陷入的危机状态，集体农庄的数量不断增加，它所联合的居民人数不断增加，集体农庄的商品率不断提高，集体农庄的劳动和生产组织在逐渐改善”。“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工业不可能吸收农村全部过剩人口，农村中存在着数量颇大的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他们没有可能以个体方式使自己的经济上升，这些阶层力图在经济上能站得住脚并使自己摆脱富农的剥削——所有这些情况，都推动着最积极的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特别是农村贫民)走上使自己的经济集体化的道路”。

为了改善集体农庄的境况和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联共(布)中央决定在课税方面、发放信贷方面、土地方面采取优惠措施。

1927 年

2月3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降低零售价格的决议。联共(布)认为,价格政策已成为今后若干年内苏维埃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和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这一决议。

2月7日——12日 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问题,通过了关于1926——1927年度工业基本建设问题、关于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问题的决议,并听取了关于1926——1927年度国家预算的报告。全会还讨论了关于苏维埃改选的进程问题和即将召开的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古比雪夫、克尔日札诺夫、米高扬和加里宁在会上作了报告,全会根据他们的报告,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1926——1927年度的工业基本建设;关于降低出厂价和零售价格;关于苏维埃的改选。

联共(布)中央在上述决议中指出:“基本上同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中所规定的投资为11亿卢布的基本建设计划(包括电力建设业在内)”。“责成政治局加速制定概要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特别是工业、运输业的五年计划,以便根据各种计划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各个经济部门和各地区预定的发展远景来制定下一经济年度的各项经济计划”。

全会通过了《关于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决议。决议说:

“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物价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实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领导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党和国家关于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振兴农业并使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方针，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的必要性——这一切在当前的经济时期都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问题密切相关”。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除批准1927年2月3日政治局关于降低零售价格的决议外，必须采取以下措施，“这些措施就是现阶段的迫切任务，需要动员党组织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全部力量来加以实现”。“无论如何要在6月1日以前把一切工业品的零售价格按照今年1月1日的水平至少降低10%”。“用降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零售价格的办法来全力消除合作社营商业和国营商业中的‘剪刀差’，并保证出厂价格每一次的降低都能通过商品运销网使消费者得到实际的利益”。

3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成立培养高级工业指挥人员的学院》的决议。决议指出，成立该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在工业中充任工厂‘联合组织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经理、托拉斯和其他工业管理机关的人员)的业务水平”。“学院的教学计划、学习期限和课程讲授问题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协商决定”。决议规定，学院将利用各有关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学校以及科研所的教学辅助机构。学校的详细条例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协商制定。

3月2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生产合理化问题》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生产合理化的指示，强调今后在一个长时期内，工会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生产过程和劳动力的合理化问题上。联共(布)中央要求“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的组织作

用对于解决改造和扩大工业技术基础的任务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

决议还具体提出了改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应当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1. 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建立新企业;2. 对现有企业进行彻底改建,采用更好的技术设备,更正确地组织劳动;3. 实行一系列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设备和改造生产的实际措施。

4月13日——1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全会讨论了一系列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政治局关于就最近的国际事件(中国事件等)而通过的决定的报告后,同意政治局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政策。

全会决定于今年11月下半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委托政治局拟出代表大会议程提交下次全会审查。

全会还听取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情况的报告。

5月12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建设金属工业新工厂》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注意:在金属工业新工厂的设计和建造方面工作开展缓慢,原订有色冶金工厂的增建计划被拖延下来,吸收外国技术力量不够,围绕这个问题动员社会舆论不够,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以突击的方式进行此项工作也做得不够”。因此,联共(布)中央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加快工程的准备、设计和施工的速度”,“消除1924——1925年度和1925——1926年度所查出的在建筑工程管理方面的失误”,“采取措施更广泛地使社会舆论注意和监督新工厂的建设事业”,同时采取具体措施整顿新工厂的建设。

联共(布)中央还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苏联劳动人民

委员部会同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一整套措施,保证设计中的金属工厂有足够数量的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

7月29日——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国际政治、经济建设和党内生活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包括:1.关于国际形势;2.关于1927——1928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3.工农检查院关于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合理化以及关于节约制度的报告;4.关于反对派最近的行动以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5.关于党的代表大会。联席全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关于国际形势;关于1927——1928年度的经济指示;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关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决议包括“国际形势和苏联”、“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中国革命问题”三部分。决议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的突出的事件,首先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和无产阶级的苏联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反革命的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目前时期最尖锐的问题。苏联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是目前时期的主要趋向,当然,这并不排斥某个时期在斗争的某条战线上的关系获得某些改善”。决议认为“未来的反苏战争将造成一种和1914年的形势大不相同、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原则差别的局面,因为1914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战线的两方面都是帝国主义,而反苏战争则是帝国主义反对已组成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争”。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中有过三条主要的路线,“它们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真正性质的不同估计而产生的”。第一条

路线是孟什维主义的右倾路线；第二条路线是托洛茨基的路线；“第三条路线是共产国际所执行的列宁主义路线，它认为必须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成立协议，但是这只能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和一定的条件下；同时，它认为一旦发展条件改变，一旦阶级力量重新部署，那就必须抛弃这些协议而同从前的同盟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发动国民党左派的下层反对其上层，并在这方面开展坚强有力的运动。同时，共产党应该大力宣传苏维埃的思想”。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1927——1928年度的经济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指出本年度的基本指标是：国营工业的产值8个月来平增长了20——21%，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9%，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17.8%(半年内)；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际工资在过去9个月内较去年同一时期平均增长了11.5%，但同时在基本建设方面，计划工作和设计工作中存有许多缺点，工业生产成本降低的速度太慢，工业品价格的一般水平仍然很高，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的差额还很大；铁路运输业的发展速度不够快；对外贸易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增长等等。为此，联共(布)中央认为“下一经济年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充分的预算、外汇、粮食、商品、原料和燃料后备”。同时还认为，“保持既定的工业化速度，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在1927——1928年度，基本建设费用应较本年度有所增加，而且应首先用于重工业、运输业和住宅建设方面”。

同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根据奥尔忠尼启泽的报告，通过《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进一步开展党的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1.“责成各级党组织、工农检查院、监察委员会、苏维埃和工会中的党团以

及出版机关大力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教育工人和农民对官僚主义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使他们能够同丑恶的拖拉作风或恶劣的官僚主义习气的每一具体表现进行斗争”。2.“报刊应该像列宁教导的那样,‘不顾情面地’来进行这一斗争,绝不要像通常那样仅限于琐碎小事”。3.“指示工农检查院和各级党机关必须不断坚决回击我们国家机关中那些企图以墨守陈规、因循守旧、官僚式的自满(在这些东西背后常常隐藏着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的压力)来和党的改造国家机关的斗争相对抗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5.“责成工农检查院协同有关主管机关保证更广泛地吸收优秀的外国专家来参加我国的工业建设和帮助组织表报工作和文牍工作”。6.“责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各边区委员会、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派遣党的、经济的和苏维埃的优秀工作者去加强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的机关”。7.责成工农检查院准备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党对苏维埃机关进行工作的问题的提纲,并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建立一个工作好和开支少的国家机构,而且要不断地准备条件,以便取消国家机构并使它和群众合成一体”。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根据奥尔忠尼启泽的报告,通过《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最初以托洛茨基为首、而自1926年起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为首的反对派,从1923年起就不断违反党纪,利用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必须克服的每一个困难来破坏我们党的统一,打击党的领导”。“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最近的活动证明:党虽然用尽了一切的警告办法,却没有能做到使反对派的首领们真正服从党的意志;反对派的首领们仍然不断蛮横地违反任何党员(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必须遵守的党性和党纪的基本原则;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分子的领导下,反对派正在不断扩展派

别活动，破坏党的统一并采取分裂党的战线”。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了给反对派首领们一个改正错误和放弃反党罪恶活动的机会，仅建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以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为了给这些陷入绝境的反对派首领们一条出路和促进党内和平，曾最后一次试图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建议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所必须完全遵守的、同时也为党内和平所必需的起码条件”，但这些条件被反对派首领们拒绝接受。这样，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因此基本上通过关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此之后，反对派才表示放弃自己的错误，基本上同意（有附带条件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建议，并提出相应的“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不讨论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给他们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关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1.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订于1927年12月1日召开。2. 确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2）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4）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5）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6）关于农村工作。（7）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9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农速成学校》的决议。决议指出，“工农速成学校胜利地承担了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的任务，今后在若干年内仍然是输送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的主要渠道，也是工人农民和党员上高等学校的唯一渠道，因而，是党对大学生、对培养工农新知识分子干部的整个事业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传导者”。

联共(布)中央在决议中建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工农速成学校网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教学工作,“同时要特别注意有必要增加工农速成学校录取的产业工人和雇农所占的比重”。

10月21日——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并有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全会讨论并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全会专门委员会修改过的关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两个问题的提纲草案,即1.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2.关于农村工作。

全会还听取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八月联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派别活动的报告,并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此外,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争论的专门决定,并批准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议程上各项问题的报告人的名单。

10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和前提;五年计划的问题和党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合理化;群众组织的意义和作用。

联共(布)中央强调:“十月革命以来十年的总结表明了这一革命的巨大国际意义,表明了十月革命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国际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运输业、信用、对外贸易等的无产阶级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所有这些前提决定了苏联经济必然依据根本不同的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来发展”。

联共(布)认为,“在调整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关系方面,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的困难和问题。在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必须从解决和我国经济方面各种基本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的任务出发”。解

决各种不平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大力实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在降低工业品价格政策的基础上降低工业品成本，就是发展农村中劳动密集型作物和使农业本身工业化（首先是发展农产品初步加工工业），就是尽力吸收小额储蓄（国内公债、储金局、合作社招股、建立合作工厂等）并使之和信用系统相结合”。

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联共（布）要求在工业、商业和国家机关“实行合理化”，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无产阶级工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动员广大农民群众首先是通过合作社动员贫、中农参加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

10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全会同意莫洛托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关于农村工作》。该提纲的主要内容包括：1.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民经济发展的特点；2. 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和资本主义成份的斗争；实际工作的情况和缺点，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党的当前任务。联共（布）中央认为，“（1）在经济方面，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极显著地增长了，工人阶级的比重也随着增加了；（2）私人资本已从某些最重要的阵地上被排挤出去；（3）在农村中，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杠杆的作用都已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富农的某种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中农集团的扩大和贫农组织程度的加强，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按照列宁的说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增长’）以及国家机关对农民经济的计划调节作用的加强”。

针对上述情况，联共（布）规定了党的当前任务主要是在对农业实行国家计划调节方面；在税收方面；在合作社方面；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在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方面；在雇佣劳动和农林工会方面；在力量单薄的农民的保险和农民互助委员会方面；在苏维埃和

文化工作方面；在党的组织问题方面。联共（布）中央强调：“党必须继续执行列宁的联合中农的政策。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和由此而造成的新情况，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利用经济机关的全部力量，仍旧依靠贫、中农群众来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能采取各种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而引导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10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争论》的决定。联席全会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9月8日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穆拉洛夫等人的“政纲草案”的决定，并决定：“1. 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在召开代表大会一个月以前公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议程上各项问题的提纲的决定，并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八月联席全会的决定，在全会工作结束后立即公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本次全会所批准的提纲，以便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2. 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1927年八月全会的决定，《真理报》增出‘争论专页’，刊载反提纲、对提纲的修正意见、对提纲的具体建议和批评文章等等。3. 争论要遵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下列决定进行：‘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研究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的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4.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应注意使争论完全符合党的原则并且采取同志的态度”。

10月25日 《真理报》公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关于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决议说：

“1927年8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表示了高度的容忍，并做了很大的让步。为了给这

些同志一个机会去履行他们自己 8 月 8 日的关于消灭派别活动因素的诺言,当时只对他们提出最后警告。

“但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再一次欺骗了党,极粗暴地违背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不仅没有消灭‘派别活动的因素’,反而由反对党和反对党的统一的派别斗争发展到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组织反列宁主义的新党的地步。”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其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把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首领的分裂活动(建立反党非法印刷所来破坏党,勾结叛徒马斯洛夫、路特·费舍、苏瓦林来破坏共产国际,如此等等)以及维·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集团的分裂活动的全部材料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理”。

11 月 14 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联共(布)中央认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在党内争论中遭到失败以后,就改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由于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而自绝于党。

12 月 2 日——19 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898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771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887233 名党员和 348957 名候补党员。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 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 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4.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5. 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6. 关于农村工作;7. 选举中央机关。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和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关

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关于农村工作;关于反对派;关于反对派 12 月 19 日的声明;关于若干组织问题。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批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以同样的速度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对资本主义成份展开进攻,贯彻消灭资本主义成份的方针。代表大会提出把小农经济逐步纳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轨道当做一项首要的任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展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做出了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方法的明确指示。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 年 11 月 14 日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所有的积极分子 75 人和整个萨普龙诺夫“民主集中主义”集团共 23 人开除出党。

代表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委员 71、候补委员 50 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9 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 人)。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基洛夫、维·鲁·明仁斯基、安·安·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尼·米·什维尔尼克、阿·叶·巴达也夫、克鲁普斯卡娅、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安·亚·日丹诺夫等等。

1927 年 12 月 19 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

织局和书记处。

12月7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不断地巩固,农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农村水平仍然很低。因此,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实际办法来加紧提高农业,……必须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农民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转上大生产的轨道(在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集体耕种土地)看做首要的任务,大力扶持和鼓励社会化的农业劳动的幼芽”。

决议还提出,对于按绝对量来说正在增长的私人资本主义成份,“应当而且可以采取更坚决地从经济上加以排挤的政策”。在实行工业化总方针的同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实现生产合理化以及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工作。

12月19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主要内容包括,1.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和前提;2. 五年计划的问题和党的经济政策;3. 社会主义的合理化,群众组织的意义和作用。

联共(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运输业、信用、对外贸易等的无产阶级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所有这些前提决定了苏联经济必然依据根本不同的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来发展”。“新经济政策期间,公有经济(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业)、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关系已急剧改变。……但是,在由恢复时期转入改造时期之际,社会主义工业及其他经济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起着决定的领导作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包括了国内整个商品流转的绝大部分,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已能决定经济发展的总结方向,排挤私人资本,帮助并逐渐改造那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农民经济”。

联共(布)指出,“在制定五年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从解决和我

国经济方面各种基本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的任务出发”。如工业和农业间的不平衡、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间的不平衡、工业原料即农产品的需求和供应间的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经济上能实际利用的劳动力数量间的不平衡等。为了实现各项任务,联共(布)强调“一切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最努力最紧张地实行合理化”,同时强调发挥科学和科学技术作用,要求尽一切努力改善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尽快地培养具有熟练技术的人材和科学工作者”。

12月19日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民经济发展的特点;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和资本主义成份的斗争;实际工作的情况和缺点,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党的当前任务等。联共(布)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农业发展的条件和进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也使土地关系的发展、农村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经济形式的发展方向都和过去根本不同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力量进一步重新组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进一步加强”。

联共(布)指出:“目前农业发展过程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斗争。这一斗争给在我国条件下具有显著特点的农村分化过程打上了自己特殊的烙印”。联共(布)从以下方面规定了党的任务:1. 在对农业实行国家计划调节方面;2. 在税收方面;3. 在合作社方面;4. 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5. 在土地使用和土地整顿方面;6. 在雇佣劳动和农林工会方面;7. 在力量单薄的农民的保险和农民互助委员会方面。联共(布)强调,必须同“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和“反中农”的倾向进行斗争,“党必须继续执行列宁的联合中农的政策。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报所获得的的成绩和由此而造成的新情况,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利用经济机关的全部力量,照旧依靠贫农、中农群众来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能采取各种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而引导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

1928 年

3月1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主席团联共(布)党组的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有协助巩固苏联国防的基本任务,在协助航空与化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决议建议后援会主席团的联共(布)党组继续进行关于进一步增加会员人数的工作,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改善地方组织的工作质量上;拟定一系列能保证提拔下层积极分子的措施,吸引工人和农民中的下层积极分子到后援会的领导机关中担任经常性的工作;设法扩展并在质量上改进对劳动者进行军事训练的工作,使其具有计划性,并和一般武装力量的训练制度严格地联系起来。

4月6日——1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了联席全会。全会审议了下列问题:(1)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下一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2)政治局所设委员会关于采取实际措施来消除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的缺点的报告;(3)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28年的工作计划。鉴于安·安·安德烈耶夫调到北高加索工作,全会解除了他的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的职务。全会根据米高扬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决议分析了本经济年度粮食收购运动遇到困难的原因,认为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缓和了并进而消除了对城市、红军和工人区的供应中断现象,防止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消灭了产棉区、亚麻区及木材采伐区的粮食供

应不足现象,建立了起码的粮食后备。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负起责任;不满足已有的成绩,毫不放松地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收购运动。决议认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既打击了富农又打击了中农的过火行为,事实上已滚到余粮收集制的路上去了,这种对党的路线的歪曲同党的根本方针、同中央委员会由于目前粮食收购运动时期遭到特殊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毫无共同之处。决议强调,只有在“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唯一正确形式)的基础上,只有在严格实行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法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的口号。“新经济政策”是联共(布)坚决循以前进的道路,只有通过它才能对全国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还在经济措施、改组收购机关和调节机关等方面,拟定了具体的措施。

全会还一致通过了《沙赫特事件和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沙赫特事件表明,经济工作和经济管理体系本身存在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错误,对阶级敌人缺乏共产主义的警惕性和革命的嗅觉,在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生产领导方面的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群众性组织即工会和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漠视工人日常的需求,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表现得非常薄弱。决议分别就关于专家、关于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关于被提拔的干部、关于吸收群众参加生产领导工作、关于改善顿巴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关于改进党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决议最后指出,保证顺利实施这些措施的最主要条件,应当是切实贯彻联共(布)十五大所提出的自我批评的口号、大力改进党组织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工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经常性的斗争。

4月13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的重要报告。报告认为,刚刚结束的中央联席全会具有一个特点,即它完全是

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报告共分关于自我批评、关于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案件和总结四个部分。

斯大林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就是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斯大林强调了进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阐述了自我批评的后果，提出了和实行自我批评有关的问题，也就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关于粮食收购问题，斯大林认为造成收购危机，至少有三个条件，即在苏联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存在困难；富农利用这些困难抬高粮价，攻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收购工作；收购机关存在松懈现象，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具体分析了沙赫特案件的阶级背景，认为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苏联工业的经济干涉。沙赫特案件所提示的结论是：（1）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得不好，而且还使这些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高等技术学校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有培养好红色专家；没有很好地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还是工业的和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作得糟透了。斯大林在报告中最后总结说：“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沙赫特案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对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斯大林号召对国内外的敌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彻底打败来自苏联内部和外部的的一切进攻。

4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关于纪念“出版节”的运动》的通告。通告指出：出版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围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

要问题进行活动,因此行将来临的“出版节”应当被广泛利用来真正争取报刊与群众联系方面的新阵地,应当推动进一步改善报纸的工作,应当具有报纸真正对群众作报告的性质,应当从事出版物的自我批评。通告对报纸编辑部和地方党组织在“出版节”期间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5月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哈萨克边疆区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边疆区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关于土地整治问题的决议中有错误,党组织对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领导不力,在运输业和工业工人以及雇农中的工作薄弱。决议向哈萨克党组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进措施。

5月16日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主要论述了国内建设问题的三项任务。一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斯大林认为形势的特点就是苏联已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五年的建设了,但不能因此就产生“自流论”、“碰运气论”和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理论,阶级敌人还存在,联共(布)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应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二是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斯大林认为,阻碍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联共(布)必须展开无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批评,在制定消灭所存在的缺点的实际决定中考虑到这种批评。三是青年必须掌握科学。斯大林强调,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斯大林号召“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

5月2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会组织的领导者的成分和以工作人员加强工会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人在其改善和更新工会领导干部方面的工作中,在其大量吸引普通工人到工会机

关的领导机构中来,以及增加妇女到工会领导机构中来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其原因首先在于工会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对执行党的指示缺乏系统的监督和检查。决议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包括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组应保证检查对党和工会代表大会在挑选、培养和提拔工作人员方面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在工会机关研究自己干部的质量成分、正确使用和提拔等工作中要有决定性的转变等等。

同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会基层委员会为女工服务的问题》的决议。决议共有七项内容:1. 有系统地检查工会组织为女工的需要与需求服务方面的工作;2. 工会基层委员会要加强吸引女工参加生产工作委员会和生产会议;3. 应加强提拔女工担任需要有一定技艺的工作,有系统地选送最有训练、在实际工作中有所表现的女工干部到高等学校学习;4. 提高妇女工会积极分子的文化与政治水平和职业知识;5. 培养新的女工干部,使她们积极地参加工会工作;6. 吸收青年妇女入社会教育部所属学校、吸收成年女工进入扫盲班及成年人补习学校学习;7. 从改善工人生活基金中至少拨出 5% 的款项供给托儿所支配。

6月3日 苏联共产党(布)发表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的《关于自我批评》的公告。公告指出:“自我批评这一口号,即‘不顾情面’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展开批评这一口号,是目前中心口号之一。”而只有彻底实行了党内民主制度和工会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经常性的群众监督,才能消除官僚主义、互相包庇、官场奉承、愚昧无知、忘却群众利益、庸俗的自鸣得意等现象。公告指出,在党内,必须保证党内批评的自由,保证实行党的机关的完全选举制,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尽力消除党组织的行政命令和监护方式来包办代替无产者的社会组织,有系统地改善党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共产党员在工作中以身作则。

同日，联共（布）中央就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发布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文件指出，如果不是最大胆、最坚决、最彻底地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百万群众对所有的机关实行检查和监督，清除其中不称职的分子，那么改造时期的任务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等（党和工会的各级机关真正由选举产生，任何一级的书记、常委会、委员会等等都完全能够撤换），才能形成群众的经常的监督，才能摘除机关的官僚主义赘瘤，才能清除官僚主义压制、互相包庇、官吏式的阿谀逢迎、胡作非为、忘记群众利益和小市民的高枕无忧等的种种表现。没有这些措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只会使这个口号，使党的领导和党本身在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

7月4日——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审议了下列问题：（1）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2）共产国际的纲领；（3）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4）关于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5）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高等技术高校）。

关于共产国际，全会基本上同意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决议对有关修改纲领草案的建议不作任何决定，仅建议所有在全会上提出修改意见的同志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送交联共（布）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并责成代表团保证在代表大会的纲领委员会上研究这些修改意见，研究时尽可能吸收那些提出修改意见的人参加。7月10日，全会根据米高扬的报告通过《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决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仅限于工业一方面。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完备而全面，就必须包括农业，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的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谷物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谷物问题，消除城乡之间破裂的危险，铲除粮食战线上可能产生的困难的根源并从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国家必须保证帮助在相当时期内还将是谷物经济基础的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日益广泛地把它包括在合作社组织中并促进农民经济的生产过程的联合。决议进一步分析了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特殊原因,坚持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提出了8条具体的消灭粮食收购中缺点和错误而避免采取任何非常措施的办法,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集中全力胜利地贯彻党的粮食收购政策。

7月11日,全会根据加里宁的报告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的决议,确立了在这项工作中的7项原则。7月12日,全会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的决议,指出培养新专家是全党的极重要的任务。决议针对当时苏联在培养新专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论述了培养新专家的规划;教学工作及共同生产的联系;关于学生的社会政治教育;关于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毕业生的分配;以及技术教育经费和学生的物质状况等六个方面的成就,特别是仍待改进的经验教训。该决议特别指出,做出以上规定是因为目前培养工业方面的新专家的工作特别重要,决议最后表示,根据本决议来改进培养国家建设各个部门的红色专家的工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7月5日——11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了三次演说。

7月5日,演说的题目是《论共产国际纲领》。斯大林首先谈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篇幅问题,关于纲领的结构和纲领草案中名单的排列次序问题。然后谈到了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而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斯大林还论述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7月9日,演说的题目是《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斯大林认为,苏联工业发展的主要泉源是内部积累,而这种积累的主要泉源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斯大林指出城乡结合、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的目的是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工农联盟,以集体主义精神逐渐改造农民,改造他们的心理,改造他们的生产,从而为消灭阶级准备条件。斯大林还论述了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认为不能把新经济政策看作仅仅是退却,新经济政策预计到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成分实行胜利的和有步骤的进攻。

7月11日,演说的题目是《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斯大林论述了关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指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巩固结合并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据点,强调还必须加强贫农工作,使贫农成为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有组织的支柱,是联共(布)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7月11日 在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谈。当加米涅夫问到斗争是否很严重时,布哈林说:“我们感到,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我们会因此被推翻。我们同斯大林的分歧远比我们过去同你经常发生的分歧要严重得多,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我都同意对局势作这样的估计:‘如果在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会好得多’。……现在他作出让步,是为了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懂得这一点。他的诡计不过是要把我们弄成宗派主义者……他在全会上宣布的路线是:1.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依靠殖民地,就是依靠外债,或者依靠对工人的剥削。我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不能借债,因此,我们主要靠农民的贡税。你知道,这正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张;2. 社会主义越发展,它所遇到的反抗越强烈……这是胡说八道;3. 由于需要贡税,由于反抗会增长,我们要加强领导。自我批评不适用领导人,而只适

用于执行命令的人们。实际上,自我批评是针对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的。结果,我们正在形成一种警察制度。这虽还不是‘布谷鸟已经叫过了’(指不祥之兆——编者注)的问题,但确实会决定革命的命运。按这种主张一切都会毁灭……”

7月13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报告首先论述了有关共产国际的问题。报告认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的危险是当前的基本问题,因此各国共产党要在各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不断进行斗争,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或者在战争发生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资本主义,解放被奴役的殖民地。报告阐明了共产国际纲领的7个特点,认为共产国际纲领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科学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任务,指出了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使共产国际各支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其次,报告论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报告分析了粮食收购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关于造就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强调要加速造就能够满足工业需要的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7月17日——9月1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联共(布)派出最大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强调了这些成就在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在发展全世界革命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代表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所进行的反革命的孟什维克式的活动,认为把他们开除出联共(布)和其他共产党的队伍是正确的。代表大会确认,各国共产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改头换面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残余,也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共产党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7月2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进青年和儿童出版物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认为,青年和儿童阅读的出版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给工农青年以共产主义教育,使青年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传统,通过共产主义青年通讯员运动、出版物及其他形式的组织工作来吸引青年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无产阶级在对生活和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的不可调和的精神教育他们。决议指出了青年和儿童读物中出版工作的不足,列举了新的改进措施。

8月25日——29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初步总结》的决议。决议认为,联共(布)关于在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工人联系人中开展自我批评的指示提高了群众在和缺点作斗争中的积极性,活跃了党内的工作,加强了报刊在和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缺点作斗争中的作用。决议认为,在进一步开展自我批评方面的中心任务,必须是广泛吸引无产阶级群众参加,以便使自我批评成为最重要的、争取真正健全所有机关的杠杆。决议对这一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提出了深入开展创造性的自我批评的7项具体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系统的检查。

9月30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阐述了他的经济主张。布哈林批评斯大林的“贡税论”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认为在农业还相当落后的时候,就大量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就是无视工业的根本基础,将招致整个工业的危机。布哈林还认为,工业也还给落后于它本身的已经扩大了的需求造成严重的原料短缺和广泛出现的各种短缺。布哈林强调,工业发展速度也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应的比例,工业的增长应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成比例。布哈林批评了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制定的五年计划,呼吁改变不正常状态,达到协调发展。

10月19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如果右倾在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成分在苏联大大加强。而资本主义成分在苏联加强是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总之,右倾在联共(布)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斯大林断言,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着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党内的右倾危险“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有力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到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奥秘”。斯大林还批判了“左”倾错误,认为两种危险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两者都不好。斯大林的最后总结认为,右倾危险是联共(布)党内的严重危险,因为它是生根于苏联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右倾危险因有各种困难而加深,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这些困难。

10月 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兰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市委因支持布哈林的主张而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和斥责,并被以巴乌曼为首的新的莫斯科市委所取代。

11月16日——2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全会审议了

下列问题：1. 关于 1928—1929 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2. 关于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的问题；3. 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4. 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11 月 24 日，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 1928—1929 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党的总路线，就是使国家进一步工业化，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农民合作化，发展集体的农业生产形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农业的发展在内）的必要前提，就是发展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建设业和化学工业，尽力使农业工业化和机械化，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这一切又使整个生产过程的日趋合理化、日益广泛地运用科学，以及最充分地利用西欧和美国的经验和知识成为特别必要的任务。党必须在广泛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高群众物质福利、有步骤地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在提高技术干部的工作质量、使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一切实际经济工作日益结合的基础上，继续坚决地贯彻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全会指出：只有发展工业和实现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全会肯定了过去这一经济年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认为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危机现象，特别是农业问题。全会强调，农业是工业的基地，农业的发展也就是工业化的粮食基地和原料基地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工业的长久发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全会号召通过个体农户普遍合作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高度技术基础上逐步地把分散的农户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加强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发展新的国营农场等等方法，消除造成农业落后的组织上的根本原因。全会规定了下一年度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充分保证按规定速度发展重工业、仔细审查非工业性的基本投资数

字、坚决地最大限度地提高质量指标、协助各种手工业的发展,严禁对手工业施以行政压力。全会还提出了加强税收、纪律、法制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利用等问题。决议最后指出,在经济工作中必须进行反对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的”倾向。全会确认,目前联共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要克服这些倾向,就必须广泛开展自我批评,最大限度地吸引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认真地彻底地发扬党内民主,对各种经济建设问题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讨论。

11月24日,全会还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的决议,决议分为党的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调整党的成分的任务和实际结论三个部分。决议认为,由于工人阶级文化落后,小农和最小农的生产仍占优势,加之国际帝国主义愈来愈坚决地企图从外部施加压力,一意要把苏联置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经济封锁之中,并准备对苏联实行军事进犯,因此,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着各种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 and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的党,其责任是非常艰巨和重大的。决议提出必须大力改变和根本改进城乡苏维埃的工作,坚决而切实地发展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改进工会工作,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克服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必须竭力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高涨,以便在高度技术和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整个农业;必须特别坚决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离开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两种倾向,同时,还要反对对这两种倾向采取任何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调和主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同党的工作中的官僚式的方法和官僚主义的压制行为进行真正坚决的斗争。

决议认为联共(布)党内的产业工人、女工、农业工人和雇农入党

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提出要吸收工人阶级中真正的先进分子入党,到1930年年底以前,争取党的成分中至少有一半是生产工人。决议强调,广泛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还应该同严格审查党的现有成分的工作,同坚决清洗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的工作结合起来。此外,全会还通过《关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决议,认为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不仅对保护工人阶级的劳动和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则意义,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经济问题。决议提出了进一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具体措施。

11月19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斯大林的演说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斯大林强调,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而高速度发展工业,就是指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二部分,谷物问题。斯大林认为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措施,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播种面积、继续发展集体农庄、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等等。为此,斯大林提出,必须使联共(布)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第三部分,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斯大林指出,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有小生产在苏联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联共(布)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联共(布)、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

性,因为右倾危险是目前联共(布)党内的主要危险,而展开思想斗争是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12月1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真理报〉党的生活部》的决议。决议要求进一步改进《真理报》党的生活部,《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必须对联共(布)中央工作计划中所列党的建设问题进行预先的讨论和阐明;为中央举行总结关于该部所阐明的问题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材料的工作作准备工作;必须扩大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报道;必须加强对各地方组织生活的阐明;必须对联共(布)中央就各级组织的问题和报告所作的决议执行情况,组织定期的检查和说明,广泛吸收工人通讯员与党和非党工人参加这一工作;必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一批写作积极分子;必须在工作中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决议还决定:《真理报》党的生活部主任出席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及书记处的会议。

1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向广大读者供应书籍的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大众书籍是组织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工具”。决议要求加强和扩大大众书籍的出版、发行和宣传工作,使之比以往更加进一步地成为围绕基本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动员群众的工具,成为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及遗毒的斗争中对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积极的阶级教育的工具,成为帮助群众掌握科学与技术成就、宣传列宁主义,反对曲解列宁主义的工具。决议为此规定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1929 年

1月1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顿巴斯煤炭工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8 年四月联席全会的决议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得到顿巴斯各级组织的执行,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煤炭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顿巴斯煤矿区的工作有成就,是解决工业化主要任务的保证。决议建议在经济领导方面、工会工作方面和党组织的工作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有步骤地吸收工人群众讨论并解决生产中的主要问题;加强党组织工作,准确执行党的指示等等。

1月20日 原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首脑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在托洛茨基的判决书上写道: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的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他最近已经在进行煽动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准备武装暴动,目的在于颠覆苏维埃政权。根据刑法第 58 条第 10 款,判决将其从苏联驱逐出境。2月,托洛茨基全家从敖德萨乘船前往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吉坡岛。

2月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各种文件,并且考虑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 1929 年 1 月 30 日所交换的意见,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议得出以下结论:1. 布哈林企图秘密组织

反对中央的派别联盟,决定斥责他的行为,这种派别活动证明了布哈林毫无原则性而且违背了忠诚老实的起码要求。2. 关于布哈林的派别活动。布哈林的错误在于:认为联共(布)在七月全会以后的政策是根据斯大林在全会演说中所宣布的“贡税口号,即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而规定的;认为对农民征收“超额”税是党的政策的组成部分,党和中央没有执行中央全会关于鼓励个体农户并提高其单位面积产量的决议;认为苏联的外汇状况已经无可挽救;认为联共(布)党内没有民主,党在官僚主义化,在培植官僚主义,党内没有选举产生的书记,目前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策错了,因为它以叫嚣来代替说服,使共产国际各支部瓦解,涣散和分裂等等。会议决定,确认布哈林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责成布哈林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共(布)和联共(布)中央的一切决议。3. 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报告,要求即将召开的联席全会批准该决议。决议表示相信,联席全会一定能够保证在目前的困难条件下所特别必要的党的队伍的铁一般的统一。

2月21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致各级党组织的信。标题是《关于加强劳动纪律》。信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应该成为党、政和工会组织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信中认为,维护劳动纪律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为了反对损公肥私和劳动问题上的尾巴主义。信中要求工会在坚决反对经济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坚决保卫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日常生活利益的同时,依靠最有觉悟的无产者基干队伍,同那种漠视生产和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信中向各级党的机关提出加强劳动纪律的10条具体措施,并要求将这个任务同有步骤地实现生产合理化、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结合起来进行。

3月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对农业与林业工人的工作

和农业工人工会第六次全苏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真正改善对农业与林业男女工人所进行的工作方面有坚决的转变,并责成农业与林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党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组及有关部局党组、各级党机关,集中所有一切组织的力量,提高国营农场工人、雇农及其他种类的农业与林业男女工人的文化和政治水平(特别要扫除文盲),在最近几年内通过训练班培养出成千上万的雇农积极分子,并提拔他们到工会、苏维埃、合作社及其他机关去担任实际工作。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3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纺织企业中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纺织工业的改造事业已获得许多成就,但也发生了不少不良现象。决议指出,必须使纺织企业中党和工会的整个群众工作致力于克服这些困难,创造可保证对纺织企业实行进一步改造的条件。决议要求各纺织区域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是为了克服那些因改造纺织工业和执行党关于降低产品成本7%的指示而引起的困难;在进行改造纺织企业的全部工作时,应首先依靠老的男女生产工人的基本干部;根本改变纺织企业中群众工作的实际做法,使培养和教育纺织企业中的工作干部的任务,成为地方党组织和有关的中央机关注意的中心;加强接收工人入党的工作。

4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会的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摆在苏联工人阶级面前的对全部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要求把工人阶级的一切创造力量动员起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政治水平及其国际主义觉悟。“工会的文化教育工作应当成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吸收他们自觉地参加国家管理和最积极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决议还认为,工会文化教育工作最重要任务,应当是发扬工人对生产、对国营企业的工作的社会主义自觉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为巩固劳动纪律,吸引群众参加

生产合理化工作,提高工人的技术知识、熟练程度和自学能力而进行的斗争。决议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

4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贫农报〉》的决议。决议认为,《贫农报》在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对乡村积极分子和贫、中农先进阶层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把这些阶层组织到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口号周围——方面,是令人满意的。决议指出了《贫农报》存在的不足,阐明了报纸今后工作的重点,并且特别指出:《贫农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说明大型农场的农业生产技术,详尽宣传有高度技术设备的大型集体农庄所拥有的利益和优越性,使贫、中农大众在生产方面合作化和集体化方面帮助农村建设,促进国营农场的建设、预约收买的发展及文化建设的展开。

4月16日——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审议了下列问题:1. 关于党内事件;2.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3. 关于清党。全会赞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2月9日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并特别通过决议斥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全会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提纲、关于发展农业的办法和减轻对中农的课税的提纲、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当前任务的提纲,并决定将这些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批准。全会基本上同意关于清洗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提纲,并决定将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审议。

4月23日,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议认为,联共党内右倾的发展和形成是同现阶段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在当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共产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肃清党内的社会民主义传统,保证党在不断增长的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准备带领广大群众去进行日益迫近的决定性的阶级搏斗。联共党内右倾分子的政治立场就是向

困难投降,而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则是苏联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资本主义成分的被排挤以及随之而来的敌对阶级的反抗的加强,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转变阶段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因此目前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加剧而不是熄灭。决议认为,完成改造时期的极复杂的任务,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困难。决议指出,右倾的根源是工人阶级周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党内的右倾的基础就是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中那些最容易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最有蜕化危险、最不稳定的分子,以及还没有受过工厂的长期锻炼并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最落后的工人阶层。

全会确认布哈林集团已经开始向党的领导进行派别斗争。因而特决定:斥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而同右倾的立场基本一致的观点,责令他们无条件地执行党和党机关的决议;斥责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采取必要措施,使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言论中没有任何违背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的地方,使一切机关报刊(无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集中批判了布哈林集团的右倾错误。演说第一部分,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采取的是一条与党中央路线不同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实质是机会主义。第二部分,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斯大林指出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斯大林指出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第三部分，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具体列举了联共（布）同布哈林等人在共产国际问题上的4点主要分歧，即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和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第四部分，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在这一部分分析和阐述了联共（布）关于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所谓“贡税”问题、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播种面积问题、粮食收购问题、外汇储备和粮食输入等问题的观点，全面批驳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主张。第五部分，党的领导问题。斯大林批评布哈林集团是搞派别活动，并反驳了有关党的领导的指责，再次强调反右倾的斗争是联共（布）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演说的最后部分进行了总结，提出了8条建议。

4月23日——29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5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67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议程如下：1. 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2. 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3. 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的任务；4. 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代表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部进程所准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代表会议通过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这是一个以现代技术装备苏联工业和农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计划。代表会议否决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拥护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而采纳了五年计划“最高方案”，作为必须绝对执行的计划。代表会议痛斥了右倾，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抛弃党的列宁主义政策而公然

站到富农立场上去的表现，号召全党把它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危险倾向而给以致命的回击。

代表会议根据代表们的要求，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情况和关于约·维·斯大林在这次联席全会上对联共(布)党内右倾问题的发言的传达报告。会议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代表会议根据米·伊·加里宁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的报告制定了一些实际措施，以便在发展大规模集体农业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基础上巩固同中农在生产上结合的新形式。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起草的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办法的决议，并赞同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提纲。

代表会议一共通过了五项决议：1.《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决议规定了五年计划在国民经济总增长方面应达到的水平；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总的增长的方针，即坚决扩大城乡社会主义成分而排挤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决议提出，要实现广泛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五年计划，必须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巨大困难。而要克服这些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在一切国民经济部门中坚决提高工作质量和加强劳动纪律。决议认为，目前党内最大的危险就是右倾。只有坚决反对在贯彻布尔什维主义的总路线方面的各种动摇，继续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使五年计划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得到解决。党不仅能给右倾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能给各种对于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所持的调和思想给予毁灭性的打击。2.《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总结了近几年来农业的发展，提出要在帮助贫、中农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造农业和建立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公有的大农业，并为此而规定：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农业机械的生产，有计划地调整国民经

济比例,实行土地国有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发展生产合作化,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无条件地支持党在发展农业方面的政策。决议提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在生产联系的基础上新的结合形式问题,并指出了6条办法。决议还分析了右倾分子在农民问题上最主要的错误:力图阻碍和限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用“农业退化”的观点来掩盖其在农业发展道路上的机会主义纲领,力图以同富农和平共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政策来暗中代替党的“加紧向富农进攻”的路线,抹杀把广大的贫农群众单独组织起来的作用和意义,力图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3.《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的任务》的决议确认,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使机关接近群众,在目前条件下已成为党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具体有:检查执行情况、改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成分、使管理制度适应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向国家机关提出的要求、组织群众监督、同党内和党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决议最后指出,党所提出的“不顾情面地”进行自我批评以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批评的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改善机关和清除其中同国内富农资本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的分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进一步开展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自我批评,日益使自我批评深入和集中在一切社会生活首先是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根本问题上,是党和苏维埃所进行的全部反官僚主义斗争获得真正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4.《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时期,由于对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开展社会主义进攻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联共(布)必须特别谨慎地重新审查自己的队伍,以便加强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影响的抵抗,使党更纯洁、在克服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中更有战斗力。决议认为,联共(布)党内已经有了数十万无产者,他们是列宁主义党的基础,但同时也钻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把自己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腐化习气带进党内来的、忽视工人和劳动农民社会舆论的生活

腐化分子、自私自利分子和野心家。决议号召，清党工作，就必须把这些分子从联共(布)队伍中清洗出去，以便加强党在社会主义进攻方面的准备，更加提高对党的信任和党的威信，并且把更多的城乡无产阶级群众和雇农群众吸引到党的方面来。5.《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讨论布哈林问题而举行的四月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告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书》。该文件提出了苏联人民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号召组织社会主义竞赛。该文件指出，五年计划是工人阶级为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斗争的计划，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创立基础的计划。社会主义竞赛是发挥和组织群众的首创精神来完成五年计划的强有力的工具，同时也是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强有力的工具。竞赛和五年计划是分不开的。决议最后呼吁全体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更加努力地在联共(布)的旗帜下为工业化、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5月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纺织工业的现状和远景》的决议。决议认为，纺织工业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但纺织工业是在能使它迅速增长的最好的条件下发展过来的。联共(布)和苏联政府收特别注意尽力扩大国内原料基地以发展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同时注意采取最合理利用原料的措施。决议指出，尽管纺织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广大群众文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纺织工业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因此，最近几年纺织工业的中心任务是降低产品成本，扩大生产，实现生产合理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养足够的技术干部；提高纺织工人的文化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造就熟练的劳动力。

5月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厂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决议指出，要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课题，需要

动员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吸收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经济管理,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应是进一步并越来越广泛地在工厂、矿井和作坊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决议认为,竞赛的具体任务应该是: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规定的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定额,改进产品质量,为消灭旷工和废品而斗争,减少一般费用,达到模范的生产纪律,广泛吸收工人参加发明创造借以积极进行技术改革和实现生产合理化。决议要求工会、一切工厂中的社会团体以及报刊杂志等,都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竞赛,并对竞赛的优胜单位和个人实行奖励。决议最后号召在工业企业竞赛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展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学校和医院等的社会主义竞赛。

5月1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扫除文盲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坚决地使今后的扫除文盲工作能有彻底的转变。要求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以及扫盲协会要坚决地加快扫盲的速度,在城市中首先要扫除产业工人和无产阶级新阶层中的文盲,在农村中首先要扫除雇农、国营农场工人、季节工、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文盲,并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决议指出,在扫除文盲的总的工作中,党组织应保证对工作实际有效的、有系统的领导,并以党的力量来巩固进行扫盲工作的各机关。决议还对共青团、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进行扫盲工作提出了要求,并特别指出要保证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中扫盲经费的比重。

5月2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会参加农村的社会生活》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要想用全力发展联合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各种新方式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必须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和加强无产阶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机关以及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都面临着发展和促进农业集体化、提高收

购量、巩固贫雇农组织、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团结中农等方面的新任务和新职责。决议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影响农村和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提出了工会参加农村生活、有系统地领导农村中的工作的具体建议和措施。

6月2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的决议。决议认为，农业合作社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应当是：1. 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生产单位应该是有章程、有股本的村庄类型的专业生产合作社；2. 最简单的生产联合组织和集体农庄除成立集体农庄联合组织外还应按农业的主要部门联合成为全区的专业产销联合组织；3. 基层生产合作社应成为各自的专业系统成员；4. 应按照上述原则改组的，首先是主要谷物产区内的粮食农业合作社系统；5. 巩固种子生产合作社；6. 撤销农业合作社的专门供应组织系统；7. 建立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全苏统一供应组织；8. 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按定购程序办理收购业务；9. 农业信用社应成为履行专门贷款职能的组织；10. 对农户的贷款，通常应由农业信用系统通过农业合作社相应的基层生产系统，按照相应的计划及其同银行签订的合同进行；11. 必须剥夺各种合作社内富农和已被剥夺苏维埃选举权的非劳动者的表决权。

7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致各共和国党中央、联共(布)各州中央局、边疆区委、州委、省委和民族区委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对工业、运输业的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工作的领导》。决议指出，为了实现工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重新装备，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改善企业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安全技术水平。决议要求工农检查院所属机关必须在这方面实行监督；要求在最近3个月内挑选出一批能挑重担的安全技术和劳保工作干部；要求经济机关、企业和车间的领导人，专管安全技术的人员真正负起责任；要求工会改进工作，保证工人群众既能监督经济机关连劳保和保证安全方面的工作，也能监督

劳动检察员的工作。

7月1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棉花总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全苏植棉业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发展植棉业对于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建立纺织工业原料基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议认为,苏联当前这五年计划期间植棉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最大限度地加紧利用全部潜力来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提高棉花单产,以便在五年计划末不仅使苏联纺织业不再依赖进口的棉花,而且拥有进一步扩大纺织工业所必需的后备。这个任务,现有的五年计划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发展植棉业的全部潜力,是一个过低的计划,应该予以大幅度扩大。决议为此规定了专门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快棉田基本建设,增加预算,开垦荒地,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明确棉花的订购合同制,增加棉花的机械化耕种面积,提高棉花单产,加强各植棉科研单位的工作,改善交通条件等等。决议还专门就在塔吉克斯坦发展植棉业作了具体的指示。

8月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南部地区炼钢工业托拉斯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南部地区炼钢工业托拉斯的工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必须尽可能迅速地消除南部地区炼钢托拉斯的落后状况,坚决地改进全部的工作。决议为此在关于南部地区炼钢托拉斯的基本建设、关于南部地区炼钢托拉斯各企业的改造计划,关于供应原料、关于生产的组织和产品的成本、关于工人的住房问题、日常生活条件和劳动保护、关于组织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决议最后要求同南部地区炼钢托拉斯和它的企业有工作关系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和上级组织为保证经济工作者的正常工作创造条件,并及时给予他们帮助。

4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北方化学托拉斯的活动》的决议。决议确认了化学工业所取得的成就,强调化学工业同世界化学最新成就和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相比,十分落后。决议具体分析了化

学工业在原料、基本建设、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五年计划、设备、国外的技术援助、干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决议最后指出，“国家的化学化是整个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和必要的条件”，认为其中的乌拉尔化学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号召所有的党、政、经济和工会组织，乌拉尔全体职工团结一致，执行本决议，全力加强和发展乌拉尔的化学工业。

9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整顿生产管理和确定一长制的措施》的决定。决定确定了基层组织的党政关系，规定：主管人员(经理)对所完成的工业财务计划和全部生产任务负有直接的责任。主管人员既领导管理机关的工作，也领导企业生产的全部组织技术过程。无论是下级主管人员，还是工人，不管他们在党、工会或其他组织中担任何种职务，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经理作出的所有的业务决定。企业的全体行政技术人员由企业的主管人员(经理)直接任命。在任命和撤换某个工作人员时，主管人员必须听取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意见。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如果不同意任命或撤换时，有权向上级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提出申诉，但不得停止执行主管人员的决定。

9月2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体育运动》的决议。决议认为，体育工作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消除体育工作中的各自为政现象，使体育工作具有更高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尽量扩大体育工作的一般规模，以保证吸引工人群众参加体育运动和加强农村中的体育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决定：设立具有国家领导机关职能的全苏体育理事会，加强体育工作的领导；指示全苏共青团中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组织加强体育方面的工作，加强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工作；强化工会体育机关的自愿原则；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党组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党组拟出全苏体育理事会的组织条例及经费等方面的原则。

9月2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社会保险》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国民经济的有力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飞快速度,社会保险变成了改善工人阶级日常生活、改善其物质与文化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已经有1050万工人和职员享受了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费在逐年不断地增加。决议接着批评了社会保险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改正措施。决议最后特别要求工会应该最积极地参加实现社会保险机关所负的任务,注意加强保险工作者干部的问题,注意加强与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的联系等等。

10月2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1929——1930年度的集体合同运动》的决议。决议建议:1. 动员最广大的工人群众注意在社会主义竞赛的基础上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在此基础上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同时和降低运动的政治意义的现象及想把运动变成一些小事上的争执与纠纷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2. 责成各级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对运动进行有系统的具体领导;3. 确认实际执行党的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在此基础上提高实际工资的指示,是集体合同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4. 要与运动期间发生大量纠纷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5. 各级党机关必须保证有系统地领导有关进行集体合同运动的全部工作。

10月3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图书馆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把图书馆变成积极帮助动员群众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文化中心,具体要求有:1. 以各种方法扩展图书馆网,并依靠预算中的经费和极力发挥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来改善图书馆的物质状况;2. 在图书馆补充书籍时要有系统地配备生产技术书籍以及有关农艺技术、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工业化的书籍,使其适应各个类别的读者和各个地区的水平和需要;3. 发展群众性的图书馆工作方式(短期扫盲、社会主义竞赛等),以便使图书馆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任务服务,真正成为提高劳动群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的坚强基地;

4. 配齐图书馆干部。

11月3日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斯大林发表重要著作《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在于它已经使苏联在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取得了许多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总结了经济建设方面的三大成就,一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斯大林认为苏联已在这个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其表现就在于千百万工人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发挥了创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二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其成就表现在基本上顺利解决了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加快了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速度,创造了把苏联变为金属的國家的前提;三是在农业建设方面,斯大林指出,在这方面的根本转变就是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斯大林具体分析了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批判了布哈林的有关论点,即把中农加入集体农庄看作是农业发展根本转变的基础。斯大林最后总结道,苏联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正在把“俄罗斯”历来的落后性扔在后面,“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

11月10日——1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主要研究了下列问题:1. 关于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指示;2. 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3.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4. 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5. 关于中央委员会七月(1928年)全会的培养技术干部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11月15日,全会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决议指出,农业的社会主义部分的蓬勃发展,要求改变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同时,必须考虑到某些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条件。决议认为,集中农业生产的领导于统一的全苏性中央机关,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必须建立联合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其职责是:实现开展巨大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及机器拖拉机站事业的统一,加强对机器供应及电气化事业、农业贷款及培养干部的领导,以及加强开展农业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作。决议还就乌克兰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做了详尽的分析和指示。

11月17日,全体会议通过《关于1929——1930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决议首先肯定,在上一个经济年度,社会主义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和联共(布)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绩。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完成,而在许多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中,五年计划的任务则超额完成了。决议规定了1929——1930年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如国民经济基本投资130亿卢布,固定基金852亿卢布,工业总产值280亿卢布,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等等。决议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性,强调了同右倾和“左”倾倾向作斗争的重要意义,宣称,最近几年来所获得的巨大成绩,经济发展的巨大规模和空前的速度,证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是可以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的,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可以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的”。全体会议通过的另一项决议是《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决议确认,苏联已经进入了对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其中,集体农庄运动具有决定的意义,它表明,在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同贫、中农基本群众的生产结合的基础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困难是技术基础落后，根本缺点是劳动生产率较低，此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决议因而强调，密切注意集体化问题，是各级苏维埃、特别是农村苏维埃的最重要的任务，产业工人以及共青团组织都必须十分关心和切实帮助农村的集体化进程。

中央全会通过的第三项决议是《关于布哈林集团》。决议表示，中央全会考虑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的错误以及把布哈林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并鉴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承认错误，决定把布哈林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而对其余的右倾分子提出警告：如果再有任何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和决议的企图，将立即被处以相当的组织处分。11月16日，全会依据拉·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决议《关于国民经济干部》。决议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普遍而尖锐地提出了干部问题，不仅是数量问题，而且还有质量问题。决议具体谈到了五年计划和五年计划期间的干部供应、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高等技术学校的组织与领导问题、经济领导干部问题，以及改善高等技术学校的社会成分等问题，要求根本改变干部供应的手工业方式和无组织现象，使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规模相适应。决议要求一切党的、经济的和工会的组织把这个重要任务当成自己的中心工作，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来积极完成这个工作。

11月15日，全会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决议《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认为农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急剧增长，要求改变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把农业生产的领导，集中于一个全苏联的中央机关，建立统一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决议还就乌克兰的农业和关于农村工作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指示。全会确定将于1930年5月召开下次代表大会，批准尼·米·什维尔尼克为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在这次会会上，联共（布）中央委员柯托夫、米哈伊洛夫、乌格拉

诺夫和库利科夫向全会声明自己已同右翼分子断绝关系。

12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成以雅可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开始制定在全苏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具体措施。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最大的党组织领导人:安·安·安得列耶夫(北高加索)、巴乌曼(莫斯科州)、瓦累基斯(中央黑土州)、菲·伊·哥洛舍金(哈萨克斯坦)、斯·维·柯秀尔(乌克兰)、哈塔耶维奇(伏尔加河中游)、舍博耳达耶夫(伏尔加河下游)等。

12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决定在辛迪加的基础上成立部门联合公司,实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体制,加强工业的部门管理。决议认为,企业是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因此,对企业进行技术服务,正确地组织供应,最完善地组织企业内部的劳动,生产上完全实行一长制,为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选拔熟练的行政人员,使企业有必要的独立性,这些是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工业管理体制的基础,决议还认为,企业改行经济核算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经济核算制能反映企业的真面目,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正确组织供销,使群众对生产活动心中有数。

同月,联共(布)通过《关于工人阶级干部的增长、失业的状况以及减轻失业现象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共分六部分:1.工人阶级的增长;2.失业现象;3.在组织劳动力方面的缺点;4.干部的培养;5.组织上的措施;6.减轻少年、初成年人和妇女失业现象的办法。

12月2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参加经济建设》的决议。决议肯定了共青团第六次中央全会为共青团参加经济建设指出主要途径的各项决议,并且提出:1.共青团要在青年中组织广泛的讨论,系统地总结出地方组织的有用的建议;2.要为完成和最大限度地超过生产计划和质量指标开展坚决的斗争;3.使团

员和青年工人人人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队运动,这应是共青团关键的、首要的任务;4. 在青年中掀起群众性的合理化技术运动;5. 农村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必须积极开展起来;6. 在解决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的干部问题中,共青团应该起最重要的作用。决议要求共青团组织成为真正的“突击队”。

12月27日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通过对苏联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批判了几个“被称为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1. “平衡”论,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平衡”。斯大林认为其实质是想走第三条道路,而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所以它是空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2.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即小农经济可以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斯大林认为,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按照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前进。3. 小农经济“稳固”论,即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时具有稳固性。斯大林认为,由于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国有化,因而小农正在摆脱对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依恋,易于从小农经济转向集体大经济。4. 城市和农村,即关于“剪刀差”问题。斯大林认为,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建立在新基础之上,城乡之间的对立会加速消除。5.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斯大林认为,集体农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经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6.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斯大林指出,联共(布)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因为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摧毁富农的反抗,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斯大林在演说的最后指出：“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1930 年

1月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
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1929年末,苏维埃政权实行
了一个急剧的转变,即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
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该决议规定了联共(布)在农村中争取集
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决议把全苏分成三种类
型地区,为不同地区规定了集体化的不同速度,并且指出,在集体农
庄发展的现阶段上,在试行全盘集体化中所产生的最普遍的集体农
庄形式,不是共同劳动而又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共耕社,而是基本
生产资料(农具和牲畜、经营用的建筑物、商品食用牲畜)集体化的农
业劳动组合。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帮助建设集体农庄的办法,并且着
重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借口缺乏拖拉机和复杂机器而阻碍集体
化运动的发展的企图,反对任何用从上面“发号施令”的办法来领导
集体农庄运动的做法。

1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告一切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及
经济组织》的通告。通告认为,只有不多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及青年团
员参加突击工作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通告要求《真理报》、《消
息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专设关于工厂、矿山、托拉斯、铁路、内河和
海洋船队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等等的成就和缺点的报道栏,以
有系统地说明在生产计划的执行、劳动生产率的高涨及成本的降低
方面的工作过程,使在执行计划上玩忽职责的企业以及工会组织、党
组织、经济组织及其领导者上“黑榜”,使表现经营有方、坚持不懈而

且有能力组织群众的企业以及工会组织、党组织、经济组织及其领导者上“红榜”。

1月30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地方政权机关在同富农的斗争中有权采取各种措施,直至完全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及把他们驱逐出原来居住的区和州。被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则成为集体农庄基金不可分割的部分。

1月 联共(布)中央政治经济半月刊《布尔什维克》发表《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这是斯大林在1929年5月关于美国共产党的三次讲话。

斯大林说:美共“两派在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方面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种夸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派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考虑到这些特点。但是把这些特点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共产党活动的基础,应当是对所有国家来说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而不是某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独有的特点仅仅是对于共同特点的补充。两派的错误在于,它们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的意义,从而忘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而这些基本特点是整个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因此,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互相为难,说对方有右倾分子,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2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营机器制造厂托拉斯的工作》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了国营机器制造厂托拉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后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不足:如计划完成不好,下属工厂没有生产远景规划,总的生产安排不够好,工会组织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做得不够等等,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改

组国营机器制造厂的基本建设计划；加强机器制造各部门的设计组织并提高它们的工作质量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决议要求所有的经济工作者，以及工会和党的组织，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使之接近于世界技术的先进水平。

2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五金工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改选》的决议。决议提出，五金工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改选，应当作为战斗性的政治运动来进行，其出发点是：工会能实际上切实地实现党的口号——“面向生产”，动员工人群众去注意解决工会工作和生产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改造运动的主要口号是：五金工业不仅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计划。决议对改选运动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并且建议联共(布)各级组织给予各地方工会理事会和五金工人工会的党组以必要的帮助，协助它们重新训练基层工会工作者，还建议联共(布)和工会报纸的一切编辑部保证在报纸上广泛报道工厂委员会的改选情况。

2月2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各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各民族地区实行集体化》的决议。决议警告各级党组织不要在这些地区硬搬集体化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地区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建议集中主要注意力按照各该地区的民族特点和经济特点进行集体化的准备工作。

2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会议，讨论集体化问题。从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视察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米·伊·加里宁、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在会上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都指出对公有化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指示，并批评了打算加快集体化速度的做法。

3月2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的著名论文《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首先肯定了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提出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

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前进的任务,同时着重指出,胜利也有它阴暗的一面,人们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倾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针对集体农庄运动中出现的問題,斯大林指出,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发达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样板机械地搬到不发达地区去。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建立农业公社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斯大林认为,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斯大林宣称,联共(布)之所以强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3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家电机工业托拉斯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家电气化是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计划的基础。决议肯定了苏联强电流电机工业取得的显著成绩,但同时认为,成绩仍然是不够的,过去的生产组织工作做得很不够,具体表现在:设计工作不统一,产品品种过于繁杂,工厂内部生产计划以及供应组织的工作安排得不好。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组织和党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在充分发挥先进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改进生产的质量和提髙工作速度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把群众工作的重心坚决地转移到车间去,并相应地修订企业内党和工会基层组织的建制和权利。

3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认为,在集体化运动获得真正重大

成就的同时,在苏联各个地区出现了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如用强迫命令代替自愿原则,强制地实行住宅、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的公有化,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在一些地方取消市场和集市等等。决议认为,这一切歪曲行为是现在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不立即消灭这些歪曲行为,就无法使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迅速发展和消灭富农阶级。决议为此提出了 8 条具体措施:制止强迫命令;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以及党的政治工作来巩固集体化的成果;禁止强制实行住宅、小牲畜等的公有化;审查被清算者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禁止富农和其他被剥夺选举权的分子加入集体农庄;禁止封闭市场;禁止假借民意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撤换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坚决反对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的工作人员。

3 月 15 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提拔工人参加苏维埃机关和对苏维埃机关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工人监督(关于工厂辅导)》的决议。决议指出,最近数月以来,由于清洗苏维埃机关,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领导之下开展的以工厂对苏维埃机关进行辅导的形式出现的工人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缺点进行的群众性斗争,具有极大的意义。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工作监督形式,是工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最好形式之一。决议充分阐述了这种形式的意义,提出了进一步开展这项活动的指示。

4 月 2 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优待集体农庄》的决议。根据这项决议,集体农庄和庄员免缴 2 年牲畜税,集体农庄从国家手中得到 6100 万普特的无息种子借贷。

4 月 10 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就冶金工业状况的报告论工业企业的领导》的决议。决议认为领导企业的方法不适应改造时期的新条件,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决定:1. 联共(布)的出发点是:

在当前工业实行改革的条件下,企业经理应当不仅是企业的总领导人,而且必须领导生产技术;2. 选拔车间领导干部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最重要问题;3. 加强一长制;4. 保证企业领导经常参加生产;5.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的现场调查;6. 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性;7.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织联合公司对企业实行经常的生产、技术领导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措施。决议最后宣布,将该决议推行到所有的工业部门。

4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行7小时工作日制的工作以及党与工会在这种企业中的工作布置》的决议。决议决定:在过渡到7小时工作日制的准备工作中,应当特别注意慎重地制定正确的定额和工资单价;在工人人数超过1000名的企业中,必须设立临时监督委员会,以审查最有效地实行7小时工作日制所需要的一切措施;建议各有关服务性机关及早地保证在文化与生活方面为各个准备改行7小时工作日制的企业的工人服务;建议有关经济领导机关改进关于经常研究7小时工作日制效果的组织工作;建议各级党委仔细检查实行7小时工作日制的一切有关组织的工作,加强最重要的和最薄弱的生产工段。

5月1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乌拉尔采矿工业辛迪加的工作》的报告,决议提出,为了迅速克服乌拉尔冶金业的落后现象,必须保证加快乌拉尔冶金业的发展速度,使之适应它在苏联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大作用。决议具体地提出了在以下5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1. 关于发展乌拉尔的计划;2. 原料、燃料、运输、动力;3. 生产和成本;4. 工资、住房和生活条件;5. 组织问题和干部。决议最后指出,乌拉尔黑色冶金业面临极为重大的任务,完成这些任务不仅要求乌拉尔全体工作人员有全神贯注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积极协助和支持。

5月2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对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今后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集体农庄对下乡工作者的工作安排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在最近期间检查集体农庄的、工会的和党的组织与这些工人的联系和对他们的帮助的情况;责成联共(布)州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详细了解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中的每一个人的工作情况,并设法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使他们安心工作;责成联共(布)中央鼓动与群众运动部保证及时了解和处理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的重要来信;责成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保证经常地报道下乡工作者的工作。

6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对生产财务计划的执行以及对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进行自我检查的情况》的决议。决议建议:1. 各级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加强自我检查工作的有效领导;2. 责成各经济机关保证实现临时监督委员会和个别工人的建议,以及自我检查工作组的建议;3. 加强对假突击运动的斗争,坚决地揭发那些从内部腐蚀突击工作队的贪图私利分子和旷工分子;4. 扩大各企业之间签订竞赛合同的做法;5. 中央各报和地方报纸展开广泛的运动,以报道自我检查的进行情况和取得的成就;6. 在今后两个月内,在各大企业中设立突击工作队组织员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

6月26日——7月13日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26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1260874名党员和711609名预备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3. 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4.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5.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6. 工业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7. 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8. 工会在改造时斯的任务;9.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共通过了七项决议。

1.《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该决议确认,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实行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苏联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各族人民在列宁主义的民族基础上的兄弟般的合作更加巩固了,五年计划头两年的任务不但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中农群众坚决转向了社会主义,从而使党能够从排挤和限制富农的口号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坚定的和平政策,执行加强苏联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同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的工人和劳动者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系和团结的政策。代表大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在今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中集中全党力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基础——重工业,大力展开农业机械化和拖拉机化,实现提高工资的计划。代表大会认为,根据自愿原则进一步吸收贫、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任务,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和内部收入分配的问题,培养集体农庄干部、提高集体农庄群众的文化水平、克服集体农庄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大力巩固集体农庄等等问题,对联共(布)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议谈到了党对工会、妇女和青年的领导,提出了广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的任务。决议肯定了联共(布)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强调对于一切动摇和破坏党的铁的纪律和列宁主义党的统一的企图,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2.《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该决议批准了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决议表示,完全赞同中央监察委员会所进行的清党工作,通过这一工作把混入党内的,腐化堕落的、官僚化的、妨碍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那些社会成分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异己分子都清洗掉了。决议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应该是:发掘和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快工业化速度,尽力增加工业、运

输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同时简化管理机构,清除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决议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以身作则,领导群众,成为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突击队员,“反官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条极重要的战线”。决议责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坚决撤换那些没有切实地努力地执行党和政府指示工作人员,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过去的功绩如何,责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今后应以同样坚决果断的精神维护党的队伍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及对社会主义所持的调和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的斗争,无情地粉碎任何破坏党内铁的纪律的企图。

4.《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基本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化的程度,表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开始宣告结束。在联共(布)代表团的积极参加下,共产国际及时地估计到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群众积极性增长而引起的力量的重新配置,确定了并坚决地执行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独立地领导阶级斗争并对法西斯化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策略。决议责成联共(布)代表团集中注意于加强共产国际各支部同社会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同它的“左”翼的斗争,并排除民族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各个阶层的影响。

5.《关于工业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决议首先肯定了执行工业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提出了为提高质量而斗争。决议认为,发展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首要条件,就是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动力基地,使它能保证国内各地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决议号召党集中力量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和弱点。决议认为,完成工业五年计划必须依靠广大工人阶级群众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热情,必须大大加强和从质量上改进培养和提高工业干部

技术水平方面的实际工作,必须充分利用目前尚未很好地利用的现有工业设备,采用新技术,必须尽快完成工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6.《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决议总结了集体农庄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苏联农业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转变。要巩固集体化方面获得的成績,并在此基础上使集体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坚持联共(布)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违背这些原则就是犯了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这些原则最主要的是:集体农庄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目前阶段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等等。此外,决议具体地谈到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农业改造的任务,关于非产粮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准备工作,关于集体农庄同个体农民的相互关系,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组织问题等等。决议指出,如果说剥夺地主的土地是十月革命在农村中的第一个步骤,那么向集体农庄过渡就是第二个步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是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最重要的阶段。联共(布)之所以能使集体化事业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是因为它粉碎了反革命的托洛落基主义和右倾分子,是因为它坚决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政策。

7.《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决议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造时期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线进攻的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成千成万的先进的无产者更积极更直接地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要求千百万工人群众和集体农民的贫、中农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因此,作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决议要求工会面向生产,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队应该成为工会在企业 and 车间中的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决议还谈到了工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文化工作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会的国际工作以及工会工作的改革等问题。决议表示相信,曾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起过很大的历史作用的苏维埃工会运动,在改造时期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设事业中更积极和更有决定意义的力量。

代表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委员 71 人、候补委员 67 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13 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87 人)。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米·伊·加里宁、克·叶·伏洛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瓦·弗·古比雪夫、洛·米·基洛夫、维·鲁·明仁斯基、安·安·安得烈耶夫、阿·伊·米高扬、安·亚·日丹诺夫、尼·米·什维尔尼克、阿·叶·巴达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人。7 月 13 日,联共(布)十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进入联共(布)政治局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李可夫、柯秀尔、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米高扬、丘巴尔、彼德罗夫斯基、安得列耶夫和瑟尔佐夫。鲍曼、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波斯蒂舍夫和斯大林担任书记处书记,莫斯克文、什维尔尼克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

6 月 27 日 斯大林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特点,即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目前世界危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它带有普遍性,但它袭击各国的时间和程度各不相同。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其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尖锐化。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继续维持着和平。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首先列举了一些具体材料和数字,如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成就、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地位及其增长速度、农业和谷物问题、农

民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速度、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等等。报告指出,“很明显,‘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在工业方面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成分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取得胜利而解决了,彻底而确定不移地解决了”。斯大林随后谈到了增长中的困难、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认为进攻的实质是动员群众提高阶级警惕性和革命积极性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改造工会、合作社、苏维埃以及其他各种群众组织的全部实际工作,尽量在工业上投入资金,尽量动员党本身去组织进攻的全部工作。斯大林最后谈到了联共(布)当前的任务,一般任务,工业方面的任务,农业方面的任务和运输方面的任务。报告的第三部分党,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问题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斯大林指出,联共(布)目前的基本方针,就是由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的个别地段上的进攻转入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全线进攻,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实现联共(布)的总路线的工作,是在同党内种种困难作斗争中,是在同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问题方面脱离列宁主义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中进行的。联共(布)必须首先肃清党内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不调和的斗争,还必须注意到联共(布)党内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的报告最后说:联共(布)在反对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形成了自己队伍的列宁主义的统一。全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现在全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和团结”。

7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议,要求从1930—1931学年度起,对8至10岁的儿童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决议指出,所有党组织都要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当作“最近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决议还就普及教育所面临的校舍、师

资和学生入学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7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组织措施与动员群众进行粮食储藏》的决议。

8月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对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的使用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切实执行联共(布)中央5月21日关于“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都能受到短期的重新训练、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的决议。决议责成各地党组织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机关广泛吸收下乡工作者参加党的、合作社的和集体农庄的会议,参加解决集体农庄合作社工作中的问题。决议还责成中央各报加强对“二万五千名下乡工作者”工作问题的报道。决议最后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各产业工会中央委员会党组迅速着手进行检查,以求彻底实现联共(布)中央关于该问题的决议。

8月1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舍甫琴柯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机器拖拉机站是农民经济实行大规模集体化的组织者,舍甫琴柯机器拖拉机站充分证实了机器拖拉机站作为振兴农业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杠杆的作用。决议指出了机器拖拉机站的发展方向:使机器拖拉机站服务区主要农业部门实行公有化并得到技术改造,大田生产全面公有化,发展畜牧业和进一步实行畜牧业的公有化;进一步发展集约化生产的部门和作物,并在最大限度吸收集体农庄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加工的公有企业。决议具体提出了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方法,并委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讨论进一步的改进措施。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因废除专区而改组报纸网的决定》的决议。

9月3日 联共(布)中央为五年计划第三年度告所有党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书发表。该文件向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提出了下列基本任务:1.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支持工人

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各种形式的倡议；2. 立即采取措施，以保证坚决地巩固劳动纪律和对松懈疲沓及旷工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3. 应保证发挥工程师和技师在生产与技术方面的主动性，尽量加紧从工人阶级中培养新干部；4. 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工人在生产中固定下来，对企业中的工人流动性进行斗争；5. 组织对工人的供给工作；6. 报刊应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积极动员工人群众完成生产财务计划；7. 必须同因暑期休假而使工作速度降低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文件最后要求，“集中全党力量，集中全体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完成生产财务计划，为保证实现五年计划第三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9月4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工农检察院联合通过《关于工业中合理化工作者的工作状况》的决议。

9月5日 联共(布)中央发出告一切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及民族共产党中央的《关于党、工会、青年团、经济和合作社的各级组织为了研究并实现联共(布)中央1930年9月3日的通告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的文件。

9月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对消费合作社工作的群众性的工人监督》的决议。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坚决加强对消费合作社的领导，积极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动员工人群众去帮助消费合作社并对其日常工作进行广泛的工人监督，首先是对以下几方面实行监督：铲除在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生产、采购、运输、保管和分配中的缺点和漏洞，尽量利用当地资源和发展合作社生产(菜园、牛奶场、养猪业等)，改善公共食堂。决议还指出，由于合作社机关中混有异己分子和阶级敌人进行暗害活动，工人监督工作必须特别注意审查合作社机关的工作人员。决议对监督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0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农业机器站活动地区的党的群众工作》的决议，其中建议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物广泛地说明

拖拉机中心和农业机器站的工作,并吸收农业机器站的普通工作者群众和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参加这项工作。

10月2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有计划地供给国民经济以劳动力和对劳动力流动现象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决定,责成苏联各经济领导机关派专人负责培养工人和向各企业正确分配工人的工作;各有关机关还必须通过工厂附设学校和初级技术学校,通过工业中的速成训练,通过中央劳动学院和劳动机关的短期训练,以及用调配现有干部担任熟练程度更高的工作等办法,来培养劳动力和使其得到深造,以满足各主要工业部门的需要。决议建议工会和经济机关采取措施以固定劳动力和技术人员。这些措施包括:在最近两年内禁止提拔从事生产的工人到各种管理机关中去;对优秀生产者实行奖励政策;对突击工人的家属予以优先录用等等。决议还对经济工作的其他一些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10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群众发明创造的现状及其对生产合理化的影响》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人阶级的创造积极性迅速发展的时期,作为工人群众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合理化的一种最重要形式的群众发明创造,具有特殊的意义”。决议提出,组织和利用群众的发明创造应当成为各级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党组织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决议为此规定了8条鼓励发明创造的具体措施。

11月2日 联共(布)通过《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中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机构》的决议。决议详细规定了在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设立党和工会组织的具体标准。

11月1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报纸工作干部》的决议。决议认为,进一步改进报刊及提高它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攻势上的作用的任务,要求报纸工作干部有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及组织能力,要求他们能够以战斗的姿态和必要的速度组织群众来完成社会

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为此目标,决议建议:1. 立即改善工作人员的成分及中央一级编辑部的工作;2. 使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突击队员,成为报纸工作干部的主要来源;3. 确立干部训练制度;4. 至迟在 1931 年 1 月 1 日前,在共产主义新闻学院之下组织常设的可容纳 50 人的为期 2——3 个月的训练班;5. 中央委员会各有关部应为训练报纸工作者制定详细而广泛的计划。

11 月 15 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石油工业的现状》的决议。决议指出,石油工业部门一些最重要的环节处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其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钻井工作。决议认为,国民经济对石油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出口任务的需要,要求进一步和更为迅速地增加石油开采量和石油产品的生产。决议为此提出了 15 项具体要求,决议最后指示党的机关和工会机关,依靠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运动,动员石油工人和技术人员完成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度计划,广泛地宣传:顺利完成石油工业计划是加快苏联工业化和在机械化和集体化基础上实行农业改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1 月 21 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企业晚班和夜班中党的群众工作》的决议。决议提出,党组织在企业晚班和夜班中群众工作的任务是:广泛开展无产阶级自我批评,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巩固劳动纪律,改进晚班和夜班中全部生产过程的行政技术领导,并为改善工人的文化生活设施、改善劳动保护和安全技术、供应交通工具等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1 月 25 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与苏联工农检察院联合通过《关于在报刊上说明有关巩固区的问题与区报纸》的决议。决议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出版机关注意:必须广泛地有系统地说明有关巩固区的机关的问题,并采取最坚决的方法,实现联共(布)中央 1930 年 8 月 11 日关于发展及巩固工业区和最重要的农业区的区报纸网、关于发展基层报纸——墙报,各企业、各车间、各乡村、各国营

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报纸——的决议。

12月17日——2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了联席全会。全会解除了李可夫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鉴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维·米·莫洛托夫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会解除了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的工作。鉴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安·安·安得烈耶夫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全会补选奥尔忠尼启泽为政治局委员。

联席全会通过了以下决议:1. 12月19日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关于193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决议。决议指出,1929——1930年度,即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国营大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25%,使农业彻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铁路运输也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的规定,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决议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和电气化、农业、运输业和邮电业、供给人民委员部和消费合作社、劳动和文化、财务计划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决议最后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绝对优势,苏联已进入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2. 12月21日根据米高扬的报告通过《关于供给人民委员部就肉类和蔬菜供应工作所作的报告》的决议。决议确认,在顺利地解决了谷物问题的基础上,联共(布)在组织社会主义畜牧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就。目前肉类和蔬菜供应工作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机关混进了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领导这些机关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并责成各有关部门保证切实贯彻执行。3. 12月21日根据巴达也夫的报告和捷姆里雅奇卡的补充报告通过《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就消费合作社工作所作的报告》的决议。决议肯定了合作社工作的成绩,指出消费合作

社的最主要缺点是在工作中存在着“某种耐普曼习气”，在实践中有放任自流、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作风，在机关中有异己分子和破坏分子混入等等，因此决定：联共（布）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应当努力消除消费合作社工作中的小商人习气；根本改善农村消费合作社网的状况；逐渐把食品供应工作从个体消费形式变成公共饮食业务；努力使商品迅速地从工厂仓库达到消费者手中，并尽力促使工业品品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群众的需要；普遍改进和加强消费合作社的财务工作；彻底更新合作社干部。4.12月21日根据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关于苏维埃改选》的决议。决议指出，苏维埃改选的政治意义就是根本改进全部苏维埃工作，使之适应改造时期的任务。在苏维埃改选中，应该广泛检查贯彻列宁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加强苏联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合作。为了确实能根本改进苏维埃的工作，决议要求绝对贯彻党的列宁主义路线，防止在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政策进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歪曲，发扬苏维埃民主。

12月29日 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通过关于德波林学派的决议。决议认为德波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表现在：理论与实际分离，曲解列宁主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提高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1931年

1月15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表致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经济组织、铁路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关于铁路运输》的公开信。公开信说：尽管铁路运输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证明，铁路运输工作进展速度明显落后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致使目前已在运输上造成严重困难。决议认为必须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消除存在的困难，这些方面包括：1. 铁路运输的改革和物资供应；2. 机车和行驶条件的改善；3. 机车乘务组和机车修理工人的工资；4. 运输的计划与调节；5. 铁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组织；6. 干部；7. 劳动纪律和工会工作；8. 党组织和苏维埃经济组织面向铁路运输的大转变。

1月1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村、区及基层报纸》的决议。决议认为，区报纸作为党的武器，对于组织群众来完成全面集体化和以此为基础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任务，对于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的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决议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及边区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改进乡村、区及基层报纸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领导工作；区党委会应该领导区的基层报纸和对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吸收党小组及区报纸编辑部积极参加，协助广泛地开展自我批评和采用新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包括突击工作、社会主义竞赛、工农通讯组等等。决议还作出了其他有关决定。

1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杂志的决议。决议认为,领导该杂志的德波林等人,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把该杂志变成了自己集团的刊物,使杂志的工作既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也脱离了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决议断定:“德波林派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滚到了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立场。”决议宣布,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委会。

2月4日 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强调,必须保证完成1931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数字,因为:1.苏联国内有充足的自然富源;2.有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3.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4.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5.联共(布)的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斯大林指出,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苏联比先进国家落后到了50年至100年,必须至多在10年内跑完这段距离。因此,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掌握科学,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

2月5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表致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经济组织、河运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关于内河运输》的公开信。信中指出,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内河运输按照已经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从根本上改组自己的工作。然而,内河运输至今没有得到改组,其经营状况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对它提出的不断增大的要求,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实施以下各项措施:1.改造工作、船舶制造和船舶修理;2.运输计划与调节工作;3.河运管理的组织;4.工资、供应和住房;5.工会和党组织的工作,干部。

3月1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宣传画的决议》。决议指出,不能容许各出版局大量发行反苏维埃的宣传画,希望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调查有关发行思想上有害的宣传画的问题,并追

究实际犯错误者的责任。决议决定,把群众性宣传画制品的指导权交给联共(布)中央鼓动和群众运动部,并建议该部制定改善宣传画宣传方法的各种措施。决议还责成联共(布)各有关单位定期对宣传画制品进行系统的评论和检查。

4月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以及经济机关、财政机关和银行机关的共产党员领导人发布《关于调整信用改革工作和普遍开展签订合同的活动》的指示。指示认为,信用改革中的主要缺点是,以一律凭预定计划提供贷款取代按实际成交契约提供贷款。信用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是信用改革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不够的结果,是实际上国家银行不进行领导,党组织也不进行领导的结果。指示确认了修正和调整信用改革的问题,并将信用改革办法的修改日期定在1931年5月1日。决议要求在短短的20天时间里,把合同问题作为整个准备工作的中心,保证在4月份内将经济机关之间的各种契约办好合同手续。

5月10日 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发表致各级党政组织、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关于消费合作社》的公开信,公开信说,形势要求“按新的方式整顿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消费合作社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工作不灵活,有官僚主义,商品积压,常常在仓库存货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人为地造成商品脱销。公开信建议实施下列措施:1. 消费合作社的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2. 消费合作社的生产企业;3. 消费合作社的收购活动;4. 消费合作社系统中独立的组织;5. 工资;6. 消费合作社的干部;7. 关于商店和仓库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

4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革新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改建和群众创造积极性有力增长的时期,特别增加了作为党的总路线的积极传达者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的意义。工农通讯员应努力做到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

改善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质量,进一步增进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决议进一步指出,革新工农通讯员的工作,是工农通讯员运动及其成绩进一步提高的条件。因此必须尽量提高工农通讯员的政治准备和新闻准备。使最优秀的工农通讯员都能达到熟练新闻记者的水平,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委托《真理报》总的领导工农通讯员运动。

4月2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善各区报纸的分配和送递的决议》。决议批评了邮局分配报纸工作中的不能容忍的坏现象,提议:1. 邮电人民委员部在6个月内调整国内各区绝大部分的通信工作;2. 委托国家人民委员会在20天内讨论关于适当集中邮局和区通信局所属各机关通信工具的问题;3. 调整职工会工作,务使其重视各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重视真正广泛展开为读者分送刊物予以适当监督的社会工作方法,改善通信工作人员的编制并提高其熟练程度。决议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和方法。

5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安排生产技术宣传》的决议。决议认为,生产技术宣传的安排,特别是技术知识书籍的出版,已大大落后于国家工业化和工业技术改造的总规模。决议建议有关部门制定一个开展生产技术宣传的计划,并为此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为首的生产技术宣传处。决议规定,在技术书籍出版计划中,应保证教科书的出版,还要广泛出版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领导人员以及熟练工人都不十分熟悉的新工业部门的书籍,同时要保证出版千百万份廉价的、大众化的普及技术读物和有关技术的一般原理和各工业部门的通俗技术教科书。

6月11日——1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3项决议。6月12日,会议通过关于《播种工作的初步总结和收割运动的作务》的决议。决议宣布,集体化运动在苏联大部分地区的主

要农业部门中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但是,如果满足于集体化和播种运动的成绩,对巩固集体农庄和收割方面的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就会给集体化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保证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更好地进行收割运动。这些措施包括:实行计件工资制、机器由一定的工作人员固定使用等等。6月15日,全会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报告通过关于《铁路运输业及其当前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尽管铁路运输业的工作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但其发展速度仍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成了国民经济中落弱的一环,决议具体地提出了改造铁路运输业的任务,新铁路的建设、秋冬运输、铁路运输业的物资技术供应、关于全苏修理厂总局所属各厂、关于铁路运输业中的经济核算制、运输计划化以及运输业与货主的相互关系、关于组织机构、关于工资和住宅——生活问题、关于铁路运输业中的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等问题。6月15日,全会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决议肯定了莫斯科社会主义建设和市政建设的成就,指出市政建设对于五年计划的实现和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的成就,对于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文化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决议建议莫斯科市委和苏维埃集中实行下列有关措施:住宅建设、公共饮食业和面包烤制业、动力建设、城市交通、道路工程和地下工程、给水问题、城市卫生状况、城市规划等等。决议最后提出,在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生活的问题上,必须既同反对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反对改善为工人和集体农民服务的文化生活设施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又同那些提出各种各样的空中楼阁式的建议的“左”倾机会主义空谈家进行坚决的斗争。

6月22日——2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经济工作人员会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经济组织和苏联供给人民委

员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斯大林在 23 日的会议上作了《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斯大林在演说中着重论述了工业发展的新条件：1. 关于劳动力，斯大林认为，由于消灭了失业和农村中的分化，劳动力的自流现象已经消失，必须采用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组织地招收工人，使劳动机械化。2. 关于工人的工资。斯大林要求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消灭平均主义，合理地规定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3. 关于劳动组织，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的任务。4. 关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斯大林认为，苏联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能够了解苏联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在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5. 关于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斯大林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6. 关于经济核算。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内部的资源，在一切企业中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斯大林在总结了以上 6 条新条件之后，指出这些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工业创造新的环境，要求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斯大林详细提出了用新方式工作和领导的具体建议，如具体地研究工业发展的新条件，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实行一长管理制等等。

7 月 7 日 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出致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关于顿巴斯煤炭工业的任务》的号召书。号召书首先提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远景，向煤炭工业，首先是顿巴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号召顿巴斯以及全国各级党组织、经济组织、共青团和工会组织努力实现顿巴斯机械化的任务，

切实完成采煤计划和满足顿巴斯煤炭工业的需要,以尽快彻底扭转顿巴斯的工业——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燃料基地的工作。’号召书还就劳动组织和经济技术领导、扩大和加强机械化基地、稳定骨干工人、防止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流动和改善他们的文化生活条件、基本建设以及关于顿巴斯党、政、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7月16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会议通过《关于出版机关的突击队员和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积极分子的协作》的决议。决议建议各共和国、地方(省)和区的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各个组织,要吸收《真理报》和其他各级报纸的突击队员,来参加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调查研究和队并检查组和队的工作,其中,出版机关突击队员和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积极分子协同工作的基本内容应该是:检查斯大林同志在六月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所提出的由于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而带来的新的经济领导任务实际被执行的情况。

7月3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内战争史〉的出版》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赞同阿·莫·高尔基同导的倡议,为广大劳动群众着手出版1917年至1921年的《国内战争史》,本书为10部至15部,采用科学历史论文和文学艺术作品汇集的形式。”

8月2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今后集体化的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定:中央委员会和十六大规定的农业集体化速度已经顺利实现和提前实现。决议决定,衡量某地区基本上完成集体化的标准是指该地区至少有68—70%的农户、至少有农民的75—80%的播种面积加入集体农庄。决议要求在已基本上完成了集体化的地区把工作重心放在从组织和经济上巩固目前正处于劳动组合发展阶段的集体农庄;对棉花、甜菜产区而言,工作重心应是

集中精力巩固集体化方面取得的现有成绩,进一步加强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工作;对尚未完成集体化的地区,工作重心应是以集中精力改进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工作。

8月1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出版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巩固和扩大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和集体农民政治和文化水平的巨大增长,对各种知识方面的书籍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决议指出,书籍应该是战斗性的和现实政治性的,它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技术生产知识来武装广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书籍应该是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团结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周围的最有力工具。书籍的质量应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决议就出版业务的组织、关于出版工作的任务、定期刊物、关于写作干部和编辑出版干部、新书介绍和书评、印刷供应站、纸张、书籍分配等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9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决议。决议指出:任何企图使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脱离系统而牢固地掌握各科知识的做法,都是对学校基本生产知识教育的最粗暴的歪曲。各学科必须根据严格的、精心制订的明确大纲和教学计划,按严格规定的课程表进行教学。决议还指出,目前学校的根本缺点在于,学校教育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对完成此项任务,即培养学生具有足够的文化知识,能够巩固地掌握各科基础知识,以为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作准备的任务,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决议指出: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使学生的全部社会生产劳动服从于学校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宗旨。

9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出致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关于发展肉品和罐头工业》的号召书。号召书指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新的劳动条件,是能保证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因而现

在就要使彻底改造整个食品工业的任务,首先是建立强大肉品罐头工业的任务居于首位”。号召书分6部分,决定了建立新的肉品联合工厂及有关配套工程,发展原材料基地,发展与此相关的机器制造业,提高工人和领导干部的技术水平以及改善和充分利用现有肉类联合厂等具体措施。号召书最后强调,发展肉品和罐头工业具有特殊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10月2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新措施》的号召书。号召书要求各级党,政组织立即安排检查财政信贷机关和经济组织为实行新的贷款办法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立即召开边疆区执行局会议听取各分行和各大经济机关主管人关于实行新贷款方法的准备情况的报告;全面阐述改为自有流动资金制、银行贷款定期制和偿还制对加强经济核算和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意义;责成地方报刊广泛阐述实行新贷款办法的准备工作 and 实行该办法本身的意义;保证同财政信贷机关和经济机关在实施此项任务时出现的缺点进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10月28日——3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下列问题:1. 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运输业的决定的总结报告;2. 供给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关于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发展苏联商业和改善对工人的供应的决定的总结报告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补充报告。3. 日常工作实际中的问题。全会通过的决议有:10月29日根据安得烈耶夫的总结报告通过《关于铁路运输业》的决议。决议批评了铁路运输业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联共(布)在彻底改善铁路运输工作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以共产党员干部去加强管理机关的从下到上的一切环节,调派被提拔的积极的党员去做管理工作。10月30日,全会通过《关于发展苏维埃商业和改善对工人的供应》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商业

还不能满足需要,商业—合作社机关中的耐普曼作风和官僚主义因素依然存在,决议为此提出了发展苏维埃商业、改善对工人供应的12条具体措施。

11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谷物国营农场的工作》的决议。

12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经济组织的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各级经济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当前任务应当是:1. 使技术领导和一般经济领导进一步具体化,把一般经济领导贯彻到企业中去;2. 联合公司、托拉斯、企业在贯彻经济核算制和使用资金时要建立财务经营纪律;3. 在各个企业中建立正确的劳动组织和工资组织,真正清除实际工作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平均主义;4. 对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一次检查;5. 对各经济人民委员部所属联合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合同的履行情况组织一次检查。决议还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12月2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争取对青年和儿童的列宁主义精神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为争取对苏联无产阶级青年和集体农民青年的国际主义教育,要求在当前历史阶段上特别注意思想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锐利武器——青年和儿童的书籍。决议建议“青年近卫军”出版机关:1. 出版一些青年团和工农青年组织在战斗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的书籍和连载小说。2. 出版一些内容与苏联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具体任务以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的书籍。3. 在文艺书籍中要突击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主义。4. 发行一些有关少年儿童队运动的书籍。

1932 年

1月1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经济干部、业务干部和党务干部的技术训练》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干部训练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10项具体的改进措施:1. 建议各有关部委立即组织单人培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小组培训;2. 充分利用高等学校、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师资力量;3. 严格根据个人情况分别制定技术培训计划;4. 建议国家科学出版社在20天内准备好有关的出版计划;5. 建议各有关部委立即为经济干部培训分配拨款;6. 所拨款项除支付工资外,不仅要支付教学人员费用,而且要支付购置图书和教具的费用;7. 责成工会中央保证对工会领导干部的技术培训,并为此拨出专门的费用;8. 每天留出一定的时间供领导干部进行技术学习,这个时间必须列入党的工作量,不得中断;9. 建议各级党委对领导干部技术培训安排一次各种方式的普通检查;10. 建议在《真理报》、《消息报》及各级报刊上报道领导干部的技术培训问题。

1月30日——2月4日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38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52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1. 1931年度工业发展的总结和1932年度的任务;2. 关于制定1933年至1937年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1932年2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它们是:根据奥尔忠尼启泽的报告通过的关于《1931年度工业发展的总结和1932年度的任务》的决议,和根据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制定苏联国民

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决议。前者的主要内容包括：总结了1931年度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工业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提出了1932年的计划及其基本任务，并且特别强调合理地组织生产是完成计划的重要条件。决议还要求改进基本建设工作，使劳动机械化和改进质量指标，迅速增加工业技术干部，广泛开展生产技术的宣传工作。关于“二五”计划的决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经济任务，就是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建立最新的技术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是：最终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彻底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根源，并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决议着重指出，只有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对垂死的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给予无情的回击，克服劳动人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偏见，并对他们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人阶级才能保证获得社会主义的新的胜利。

2月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当前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认为，在集体农庄发展的现阶段，人为地加快从劳动组合形式过渡到农业公社的尝试“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要求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现阶段占优势的劳动组织形式，具体作法包括：1. 使生产队成为集体农庄劳动组织最重要的环节；2. 挑选生产队长，消除生产队长的流动性，帮助生产队长提高经营管理技能和政治水平；3. 实行计件工资，改进核算办法；4. 使畜牧生产队及加入生产队的庄员根据其工作结果取得报酬；5. 选拔和培养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6. 加强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日常帮助，加强对机器拖拉机站全部经济工作的领导。

3月3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通过《关于在伏尔加河上建设水电站》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在伏尔加河中游水系建设3个大发电站，其装机总容量为80—100万千瓦；为了顺利完

成工程，成立伏尔加中游建设局，任命温特尔为局长，韦杰涅耶夫为副局长；规定伏尔加中游建设局的组成；责成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动力管理局最迟在10月1日提交有关设施示意图；规定所有工程的完工时间是1935年春季。

3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牲畜强制公有化》的决议，决议认为，用强迫手段把集体农庄庄员的奶牛、小牲畜实行公有化，“最粗暴地破坏了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决议责成所有的党政组织和集体农庄组织：1. 停止强迫把集体农庄庄员的奶牛、小牲畜实行公有化的一切做法。违反中央委员会指示的肇事者要开除出党；2. 设法帮助和协助没有奶牛或羊的集体农庄庄员为了个人的需要购买奶牛和羊或者饲养幼畜。

4月2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决议认为，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异己分子在文学界的影响还相当大，无产阶级文学的骨干队伍尚很微弱，党曾用各种方法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帮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现在，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已经成长起来了，现有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全苏、俄罗斯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正在妨碍文艺创作的大规模发展，为此，联共(布)中央决议：1. 取消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2. 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且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联合到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去，在协会中设立联共(布)党委，高尔基任作协筹委会名誉主席。

5月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开展集体农庄商业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集体农庄向国家交售的公粮减少了，集体农庄在完成计划和留足种子以后可以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余粮。

8月1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工厂报纸》的决议。决议指出了一些工厂报纸存在的缺点，认为某些地方党组织过低估价了工

厂报纸作为联共(布)在工厂中组织生产和政治生活的有力工具的作用,决议规定:联共(布)中央、边区和州的报纸必须组织工厂报纸的述评和有系统地交换经验;工厂报纸则应组织有系统的车间和突击队墙报的述评,调整对基层墙报的实际领导;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固定的“党的建设”专栏,其主要内容应是工厂的党的内部生活问题,党日的筹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争取共产党员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地方党组织应加强对于工厂报纸的有系统的领导和帮助,并保证工厂报纸的纸张供应。

8月22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工农检察院联合通过《关于检查报刊上公布的工农简报和工农通讯员的信件》决议。决议责成各地方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严密监督各省、区在中央报纸上或省区报纸上公布的工农简报和信件的一定反应,不要等待特别通知。决议建议各共和国的州(边疆区)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对于审查工农通讯员通讯工作,要选派经常负责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检查,把所选出的工作同志的姓名通知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决议最后规定:为了加速提高通讯质量,各报纸必须注意将交付审查的信件,直接寄交区和省(地方)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

9月28日——10月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下列问题:1. 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供给人民委员部关于发展苏维埃商业的总结报告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的补充报告;2.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工艺合作社关于日用品的生产的总结报告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的补充报告;3.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关于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总结报告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的补充报告。全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如下:9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发展苏维埃商业》的决议,决议认为,虽然商业已有发展,但商业机关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仍然没有彻底克服,因而

提出了 13 条改进措施,包括:扩大和增加商业网点、缩减商业行政费用、改进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工作等等。决议最后指出,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各种形式的耐普曼作风,坚决反对商业机关中哄抬物价、滥用公款、优先供应自己、特别是盗窃行为;各级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经常帮助商业机关;监督商业机关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苏维埃商业的决议。10 月 1 日,全会通过《关于日用品的生产》的决议,分析了过去联共(布)中央关于日用品生产规模的决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的主要原因,如对日用品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生产和劳动组织得不好,个别种类的原料不足,现有的设备能力利用得不充分等等,作出了 9 条决定以改进日用品生产。10 月 2 日,全会根据奥尔忠尼启泽的报告通过《关于钢铁工业》决议,决议要求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集中力量克服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中的缺点,加强各厂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并发展文化机关网,保证对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大力发挥和支持工人的日益高涨的积极性。

10 月 26 日 斯大林出席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文学家座谈会,他提出:“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3 年

1月7日——1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举行。全会根据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的报告通过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3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议宣布“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已胜利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立了本国的先进的技术基础。决议从7个方面总结了“一五”计划,即 1.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生危机和出现衰落的同时,苏联工业不断发展;2. 在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生危机和出现衰落的同时,苏联农业不断发展;3. 城乡间商品流转和苏维埃商业不断发展;4. 苏联失业现象消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5. 苏联文化建设发展,技术干部增长;6. 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已被打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已经获得保证;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决议提出了 1933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指标,并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来彻底完成这个指标。1月11日联席全会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关于《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的目的及其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的弱点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的必要性。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条例,1月12日,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和《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阿·普·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清党工作的原则应是保证加强联共(布)党内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把一切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混进党内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爱斯蒙特等人反党集团

的实质就是拒绝国家工业化政策和恢复资本主义、富农阶级。将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月7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斯大林阐明了五年计划的不可估量的国际意义，五年计划的成就正在动员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斯大林接着阐明了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总结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经验，以及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成就、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成就。斯大林认为，保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基本力量首先是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和忘我精神、热情和创造性，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其次是联共(布)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它们号召群众前进；在走向目的地道路上克服了一切困难；最后是苏维埃经济制度特有的优点和优越性，它包含着克服困难所必需的巨大的可能性。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五年计划已经实现，工人阶级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没有力量的和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衰颓，它应当让位给另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制度，即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苏维埃经济制度是不怕危机而能克服资本主义所不能解决的种种困难的唯一的经济制度。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只要共产党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不怕困难，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

2月19日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斯大林首先阐明，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集体农庄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

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集体农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劳动农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斯大林还提出,当前的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斯大林认为,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使用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农具,从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打破了农民分化为贫农和富农的过程,帮助贫农在集体农庄里成了自己劳动的主人,这是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绩。要继续前进并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就必须走第二步,即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最后,斯大林谈了几点自己的意见:1. 关于农村党员,斯大林提醒道,“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要求党员与非党员紧密联系,互相学习。2. 关于女庄员。斯大林认为轻视妇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3. 关于男女共青团员。斯大林认为青年是未来,是希望,要求青年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此外,斯大林还谈到了个体农民等其他一些问题。

4月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杂志》的决议。决议规定,《党的建设》杂志是联共(布)中央在党的工作问题上的主要机关杂志,其基本任务应当是协助地方党组织来解释中央的各项决议,以及动员干部去实际地实现这些决议和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决议认为杂志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做到更多地批评各个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他们党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决议责成《党的建设》编辑部在巩固杂志与自己读者的联系,在中央区与各地方建立通讯干部以及组织稿件方面,加强组织工作,使杂志更加充实、更加实际和质量更加完善,并保证5.5万份的发行量。

4月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顿巴斯

煤炭工业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了顿巴斯煤炭工业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决定:1.撤销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燃料管理总局,在该局的基础上成立煤炭页岩管理总局和石油管理总局;2.改组煤矿管理制度;3.煤炭管理总局、托拉斯、煤矿、顿巴斯党和工会组织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消灭顿巴斯前所未有的工人流动现象;4.取消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5.进行必要的人事调动,把地面上的优秀工作人员集中到井下;6.责成煤矿矿长、矿务局局长和托拉斯经理对人事工作和检查工作负全部责任。决议最后号召掀起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的新高潮。

6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对机器拖拉机站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完成的工作向机器拖拉机站支付实物报酬》的决议。决议指出:“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劳务及时支付实物报酬是必须执行的义务,规避这种义务应受到法律制裁。”决议为此具体规定:1.集体农庄与机器拖拉机站签定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2.集体农庄必须无条件地向机器拖拉机站支付劳务报酬;3.集体农庄向机器拖拉机站支付劳务报酬的时间;4.机器拖拉机站对所获报酬的使用方法;5.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和政治部主任、集体农庄管委会主席和支部书记是正确计算实物报酬额和及时将实物报酬立即上交的特定负责人。

7月3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铁路运输工作》的决议。决议严厉批评了铁路运输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特别是铁路运输管理中组织方面的缺点、工资制度和劳动定额方面的缺点以及铁路部门组织结构方面的缺点,提出了以下一些具体措施:加强一长制,停止由非主要人员分配干部和检查执行情况的做法,加强铁路局的经营性和责任制,改组路区;保证直接在线路上工作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得到较高的工资,改进累进奖励劳动报酬制度,增加从事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基金;把基本建设工程集中在现有

铁路的主要线段上,建立铁路运输政治部,尽快开始执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批准的铁路纪律条令等等。

8月2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为满足集体农庄的需要建立谷物基金的办法和按劳动日在庄员中分配谷物》的决议。决议决定:1. 集体农庄在履行了向国家交售谷物的全年义务、付清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和偿清贷款以后,应着手建立保险种子基金和饲料基金;2. 除上述基金外,不得建立任何基金;3. 在履行了上述义务和按上述规定建立了谷物基金之后,集体农庄剩余的全部谷物都按劳动日在庄员中进行分配;4. 不允许搞任何交售粮食的响应计划,违者追究刑事责任。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帮助无奶牛的集体农庄庄员购奶牛》的决议。决议提出,国家将以优惠的条件帮助一些地区无奶牛的集体农庄庄员购置母牛犊 100 万头,并为此规定了具体办法,包括:国家收购奶牛的办法以及集体农庄无奶牛庄员购置奶牛的办法等。

8月1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减少从职工工资中征收各种费用的规定》。规定了工会会费和党费的交纳数额,并且规定禁止消费合作社和工人供给部从职工工资收入中征收任何附加费、特别费,禁止向职工强行推销彩票、纪念章、邮票及明信片等等。

8月1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为满足集体农庄的需要建立谷物基金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8 月 2 日关于此问题的决议保证了在集体农庄履行了国家交售义务和留足各项谷物基金以后,庄员自己有权处理集体农庄余粮的自由。决议重申,禁止党政组织在 8 月 2 日决议规定的基金之外建立其他谷物基金;但是,如果集体农庄自己希望的话,它们有权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大会(至少有 2/3 的庄员参加)的决议,在

集体农庄内建立其他谷物基金，如扩大农庄不可分资本的基金，残废者、红军家属和托儿所补助基金等。

9月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儿童书籍出版机关》的决议。决议决定：1. 儿童书籍统一于一个专门的儿童书籍出版局出版；2. 儿童书籍出版局应按照联共(布)中央历次的决议，彻底改变儿童书籍的出版；3. 国家儿童书籍出版局应由其印刷所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儿童书籍专门出版之用；4. 儿童作家和艺术家个别出版的艺术作品，事先在儿童杂志上刊印是必要的；5. 委托联共(布)中央文化部、青年团中央和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0天以内审查和通过出版儿童书籍的计划。

10月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进自学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国家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通过开展自学工作来满足广大群众的求知愿望。决议对自学工作的领导和辅导，书籍的出版，图书馆的使用以及报刊的宣传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2月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为保障集体安全而展开斗争的决议。中央委员会预见到苏联将有可能加入国际联盟和缔结反对侵略的区域性互卫公约。

1934 年

1月26日——2月10日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225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73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1874488名党员和935298名预备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有: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2. 第二个五年计划;3. 组织问题(党和苏维埃的建设);4.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有:“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报告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组织问题,党和苏维埃的建设》和《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其中,关于“二五”计划决议具体提出了“二五”计划期间在国民经济方面完成技术改造和增加生产的计划,进行新建设的计划,提高工农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计划。决议特别强调,在“二五”计划期间应当保证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在彻底完成农民经济集体化和一切手工业者合作化的基础上,完全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苏联经济成分的多样性,确定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并使国内一切劳动者成为积极自觉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具体规定了联共(布)党的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苏维埃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包括取消职能管理制和保证具体领导,领导者的个人负责制,执行情况的检查和调派干部

参加生产,地方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在改进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方面的工作;以及加强党和苏维埃监督方面的组织措施。

代表大会选出了联共(布)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委员 71 人,候补委员 68 人)、党监察委员会(委员 61 人)、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 70 人)和检查委员会(委员 22 人)。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米·伊·加里宁、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谢·米·基洛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瓦·弗·古比雪夫、安·安·安得烈耶夫、阿·伊·米高扬、安·亚·日丹诺夫、尼·谢·赫鲁晓夫、尼·米·什维尔尼克、阿·叶·巴达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等。1934 年 2 月 10 日举行了新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泽、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得烈耶夫和柯秀尔。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米高扬、丘巴尔、彼得罗夫斯基、波斯蒂舍夫和鲁祖塔克。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任书记处书记。

1 月 26 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党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斯大林认为,在经济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领域,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已奄奄一息,废除军备的趋势正在被扩充军备和补充军备的趋势所公开而直接地代替。苏联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其中,苏美建交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斯大林宣称,苏联

已经发生了原则性的变化,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苏联已经被消灭,个体农民经济在农村中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社会主义成分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领导力量。斯大林接着具体阐述了工业的高涨、农业的高涨、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商品流转和运输业的高涨。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党。斯大林首先谈到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问题,他指出,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虽然都被击溃了,但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党必须加强思想工作,提高理论水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其次,斯大林谈到了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列举了需要组织的工作,提出了组织工作的任务是:适应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障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实现。斯大林报告最后的结论是:1. 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2. 要始终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3. 要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忠实于世界各国无产者兄弟联盟的事业。

5月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切奇诺印古士州和亚速海、黑海边疆区某些集体农民对政治工作中某些问题的曲解》的决议。决议废除了切奇诺印古士州委会关于在五月初召集省懒汉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州委会书记予以谴责;决议对捷莫留克斯拖拉机站政治部主任在集体农民的政治工作中的歪曲(组织“懒汉和装病者的殡葬”),给予严格的谴责,对该拖拉机站政治部《争取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报》的编辑在本年4月5日刊登“懒汉和装病者的殡葬”的广告事,予以谴责。

5月16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决定认为,历史教学及其教科书的主

要缺点在于抽象概括和公式化倾向,建议在叙述事件时,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年代次序,“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分析和总结历史事件,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历史”。决定还规定:在1936年6月以前要写出《苏联历史》、《近代史》等5本新的历史教科书,并确定了各编写小组的人员名单。此外,决定还要求从1934年9月1日起恢复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系。

6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与商业中对消费者卖货的不足重量和不足尺寸以及违反零售价格的斗争》的决议。

6月26日——28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监督工作、关于“轻骑兵”、关于报刊在监督工作中的作用等决定的执行情形》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会的实际监督工作,首先应针对那些储存物资的部门,并应着重对盗窃、浪费、欺秤瞒尺等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决议建议,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轻骑兵”干部挑选工作的质量问题,应当选择受过严重考验的、最精干的、具有丰富知识和工作积极的青年团工作人员到“轻骑兵”中去。决议要求各家报纸积极参加群众监督工作,加倍坚决地为揭露和消除各种缺点和坏事而斗争,为使提出的问题获得彻底解决而斗争。

6月29日——7月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研究了谷物和肉类征购计划以及改进和发展畜牧业的问题。全会于7月1日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发展畜牧业》的决议。决议认为,整个畜牧业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在以下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1. 关于国营农场的畜牧业;2. 关于集体农庄的畜牧业;3. 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的畜牧业;4. 关于马匹;5. 关于改良牲畜品种和育种工作;6. 关于扩大饲料基地;7. 关于改进兽医工作和饲养工作。决议最后要求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包括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在内,认真地彻底改进畜牧业,保证完成国家发展畜牧

业的计划。

7月20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北方海上航线和北方经济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决定:建造船舶和在极北地区建设港口,迅速培养干部,建设北极站和北方海路总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扩大北方海路总局的职能,向北极地区提供干部等等。决议还指出,必须在北方海路总局系统的所属单位,设立政治部和党组织员。

8月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联名发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该文件具体指出了《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存在的问题,认为一般来说,纲要编得极端不清晰,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文字上也不甚通顺。文件认为,所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这样的:“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人历史不与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一。在那里苏联各民族历史也不与整个欧洲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地也不与世界历史分离,这是第二。”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联合发表《对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该文件认为,纲要的主要缺点,就是它不够突出地强调法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极其深刻的差别和相反之处。决议具体指出了《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所存在的缺点,认为它比苏联历史纲要编得较为清晰。

11月25日——2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定期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下列问题:1. 关于畜牧业的发展;2. 关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3. 关于集体农庄的财务状况和债务;4. 关于个体农户和落后的集体农庄;5. 关于联合收割机和联合收割机手。全会委托政治局根据交换的意见最后确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草案。11月26日,全会根据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关于废除面包和其他几种食品的

配给制》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农业中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已代替了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农业中已占统治地位而且在组织上经济上已经大大巩固、粮食丰收,因此完全可以,也应该取消面包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决议指出,废除面包和其他几种食品的配给制而普遍按统一的国家固定价格进行粮食买卖,以及今后完全可能进一步降低这些物品的价格和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一切为进一步提高工农群众的物质福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1月28日,全会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中的政治部》的决议。决议认为,政治部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它依靠着全党的力量和威信,依靠着机器拖拉机站的经济力量,在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部门——农业转变为先进部门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决议要求加强政治部的工作,并提出还需要加强担负行政、经济、文化、生活福利、财政等全部工作的一般的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决议还具体提出了加强农业中的政治部工作的12条建议。

12月1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遇凶杀身亡。斯大林亲临列宁格勒处理此案。为了对付暗杀和破坏活动,苏联刑法做了如下修改: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

1935 年

1月18日 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杀害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秘密信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因为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

2月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补选阿·伊·米高扬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安·亚·日丹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委托维·米·莫洛托夫代表联共(布)中央出席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建议大会根据下述原则对苏联宪法做某些修改:1. 使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以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代替不完全平等、多级和公开的选举;2. 在宪法中正确说明当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宪法符合于苏联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如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工业,粉碎了富农,取得了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确立了作为苏维埃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等等)。

2月1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莫斯科组织全苏农业展览》的决议。决议决定:1. 同意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于1937年在莫斯科举办全苏农业展览会,并在展览会结束后利用展览会的场地、房屋和设备建造全苏集体农庄宫;2. 委托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立即为展览会的举办采取必要

的筹备措施。

3月13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社论摘要发表了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上的讲话。斯大林说：“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1/10公顷，这就是一点也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奶牛不能给，另一些人认为母猪不能给，总之，你们想挤死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斯大林还说：“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们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便不能承担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同意：集体农庄中的农户应该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的。倒不如承认，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的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同时也要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需要和个人口味，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你们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生活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斯大林强调：“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5月13日 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登记、发给和保存党证问题的告全党各级组织专信。

6月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最近时期的 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了某些党组织夏季停止宣传工作的倾向，指出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带有“季节”的性质，而应当经常地、一年四季都进行。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并且认为，宣传工作的“季节性”的消

灭,必然引起训练和再训练宣传员工作中的季节性的消灭,必然引起在全年中有系统地训练宣传员,决议要求在最近的时期各级党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在党史方面和列宁主义方面训练和再训练宣传员。

7月10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计划》的决议。决议批准了莫斯科各组织提出的10年和近3年改造莫斯科市的总体计划,包括莫斯科市的规划,莫斯科市市政建设和改造等等。

9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降低面包价格和废除肉、鱼、糖、油和土豆的配给制》的决议。决议决定,从1935年10月1日起,降低面包、面粉、谷物、通心粉、杂粮、大米和大众化的糖果点心的现行价格,废除肉、肉制品、油、鱼、鱼制品、糖和土豆的配给制。决议责成各级高业组织保证组织好本决议的实施,扩大相应的商业网点,始终不渝地反对用这些产品进行投机的任何企图。

9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不断扩大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可以越来越充分地满足集体农庄农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能够大大改善农村居民的工业品供应。“然而,作为为农村输送商品的主要渠道的消费合作社,今天已经不适应扩大了的商品流转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城乡商品流转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决议批评了农村消费合作社工作存在的缺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1. 关于农村消费合作社网点;2. 关于区联社;3. 关于采购;4. 关于改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州联社和边疆区联社。

11月17日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斯大林首先论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认为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和新的更高的阶段,即与新的更高的技术相联系的阶段;这个运动打破了旧的技术观点,技术定额,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因而负有在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斯达汉诺夫运动的

11月17日

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其次，斯大林论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特点，即它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没有受到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它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苏联全国各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有四：一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二是苏联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三是已经有了新技术，四是已经有了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再次，斯大林论述了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确认现行技术定额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用新的较高的技术定额来代替它们。最后，斯大林提出了两个最近的任务，即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它扩大和深入到苏联各州各区去；帮助另外一种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改造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领导斯达汉诺夫运动。

11月2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成立联共(布)中央直属宣传员高级学校》的决议。决议规定了成立中央直属宣传员高级学校的目的是训练联共(布)宣传方面的工作人员。决议还规定了该学校的学制，招生人数，招生条件，教学计划以及校舍等等。

12月21日——2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工业和运输业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审查党员证件的总结》的决议。关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决议阐明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即按新的方法组织劳动，使工艺过程合理化，使生产中有正确的劳动分工，解除熟练工人的次要的准备工作，妥善地安排工作场所，保证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 职工工资的显著提高。决议提出了在重工业方面，轻工业方面，食品工业方面，森林工业方面和铁路运输业方面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具体措施。关于审查党员证件的总结的决议认为这项工作最大的成绩是：党组织不但揭露了钻到党内来的异己分子，同时还大大克服了组织上的涣散现象，整顿了党员的登记工作，更深入地考查了各个党员并在此

基础上提拔了许多新的,有能力的工作人员来担任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决议认为,为了巩固审查党员证件工作的收获,特别是为了进一步整顿党员的登记工作,最近应当采取更换党证、预备党证以及党员和预备党员的登记表册的措施。决议为此规定了具体办法。

12月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高尔基边区)巴拉赫宁“捷尔任斯基”纸浆—造纸联合厂的政治鼓动工作状况的决议。决议批评了该厂政治鼓动工作的现状,责成该厂的党委会从有政治知识的、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使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善于唤起他们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的优秀党员、青年团员和同情分子中间挑选鼓动员、朗读员—谈话员干部。决议还要求党委书记负起责任,依靠全体鼓动员,研究男女工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力求做到充分而详尽无遗地回答这些问题,其方法就是作报告、举行会谈以及在工厂报纸和墙报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决议最后还责成联共(布)边区委员会、州委会和区委会,经常检查各企业和集体农庄中的基层政治鼓动情况,在布置这项工作时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把这些问题提交常委会和全体会议讨论。

1936 年

1月26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批评提交审查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写得不好。而这正好证明在某些历史学家中,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在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为了加强对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了一个以日丹诺夫为主席的联合委员会。

2月1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进建筑事业和降低造价》的决议。决议肯定了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还存在的缺点。“这些缺点的后果,首先就是使造价高到不能允许的程度”。决议提出了降低造价的途径,并就建立和巩固建筑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在建筑业中加强经济核算制和财务监督以及整顿设计和预算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决议最后责成所有党和工会组织加强建筑工人中的群众性政治和文化工作;要求一切经济、党和工会组织,在1936年努力做到大大改善建筑业的工作和降低工程造价;确定建筑业的主要任务在于掀起掌握新技术的热潮。

3月2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和〈星报〉(别尔曼)对于处理劳动者信件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这些报社对于处理劳动者的信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和贵族的轻视态度。决议要求检查《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和《星报》的工作,并要求以合格的、有政治知识的工作人员来加强报纸的读者来信部,吸

收工农通讯员积极分子参加审查信件的工作。

5月19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卡姆造纸工人〉(斯维尔德洛夫州)和〈列宁主义者〉(高尔基城)工厂报纸》的决议。决议批评了红色卡姆造纸工厂和高尔基城无线电报工厂的《卡姆造纸工人》和《列宁主义者》两家报纸的现状,认为不能容许这两家工厂忽视对自己工厂报纸的领导,建议斯维尔德洛夫州委和高尔基边疆区委在最短期限内改正上述两报工作中的缺点,加强对工厂报纸的领导。决议还决定改变某些工厂报纸中所存在的书籍报酬制度。

6月1日——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苏联宪法草案以及庄稼的收割和农产品的收购问题。此外,全会还研究了日常工作中关于更换党员证件的问题,并委托中央组织局对接收党员和审理在审查党员证件时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的手续做出决定。6月1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基本上同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苏联宪法草案;鉴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全会认为应当召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审查苏联宪法草案。

6月23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高等学校的工作和高等学校的领导》的决议。决议认为,高等学校干部培养工作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而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当“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的时候,对高等学校就应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以保证培养出来的干部专业水平高、政治上有教养,受过全面教育、有文化、掌握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成就,能彻底利用技术并能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将理论联系实际,把生产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决议在高等学校的招生、教学时间的组织、教学工作的组织、高等学校的领导以及高等学校的制度与纪律等方面作出了非常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7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成立联共(布)中央直属党

组织员高级学校的决议。决议指出,创立该学校的目的是改善训练有经验的党工作人员干部,以提任州委、边委、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市委和大区委的党的领导工作。决议还规定了该校的学制、招生人数、招生条件、教学计划,基本课程以及上级领导等等具体问题。

7月20日 联共(布)中央作出 关于高级组织员学校决议

3. 斥责在接受入党这一工作中的任何急躁倾向, 严厉禁止接受入党工作数量任务的确定, 禁止在这一工作中的任何一种竞赛; 4. 保证在刊物上正确地解释接受新党员入党的问题。

11月25日 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会议于11月25日至12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 其主要目的是审查和批准苏联新宪法。12月5日, 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 并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新宪法制定和批准选举条例, 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期。大会宣布12月5日为全民的节日——宪法日。

斯大林的报告共分6个部分: 1.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即修改1924年通过的宪法, 充分估计到从那时以来苏联生活中取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进展。2.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斯大林认为, 苏联处在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在经济方面, 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 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 成为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在阶级结构方面, 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除, 从前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 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也在缩小, 在消失。在各民族相互关系方面, 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实行了切实的互助, 民族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 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 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 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3.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是: 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 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 因而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 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 其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 新宪法草案

所依据的前提是社会上已经不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相互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新宪法草案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新宪法草案坚持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

4.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斯大林在这里具体地批评了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态度,如不理睬这个草案、认为它没有多大意思、怀疑它能否实现、认为这个草案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批评没有政党自由、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等等。

5.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斯大林具体进行了分析,逐条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6.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苏联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而对于苏联各族人民,是他们斗争的总结,是他们在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战线上胜利的总结。这就会在精神上武装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前进,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员他们去进行新的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新胜利。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还在于,它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它对所有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所以,“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

1937 年

1月23日——30日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托洛茨基平行总部”为名,公开审判原联共(布)领导人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17人,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被判处10年监禁。

2月1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因在肃反问题上与斯大林产生严重分歧,在寓所自杀身亡。

2月23日——3月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定期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党组织在即将根据新宪法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中的任务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讨论了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问题,并通过了各项相应的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决议。全会还研究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的问题,并决定把他们开除出联共(布)的队伍。

2月27日,全会根据日丹诺夫的报告通过《关于党组织在按新的选举制度进行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党的政治工作的相应改进》的决议。决议认为,苏联新宪法的施行是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就在于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以平等的苏维埃选举代替了不完全平等的选举,以直接的选举代替了多级的选举,以秘密投票代替了公开表决。这必然会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使更多的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这个转变,党必须领导这个转变,完全保证自己在

即将举行的国家最高机关的选举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必须在无条件地贯彻党的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改进党的工作。决议为此作出了7项具体规定。叶若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从日本—德国的托洛茨基走狗的暗害活动、破坏行为和间谍活动中应吸取的教训”的报告。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被捕。

3月25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通过《关于〈北方真理报〉和〈高尔基公社报〉的写作干部》的决议。决议责成这两家报纸的编辑：1. 在广泛吸收党、苏维埃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工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苏维埃知识分子代表充任论文作者、通讯作者的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调整报纸的工作；2. 组织报纸编辑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系统地工作，严格检查作者，吸收他们来预先讨论报社的计划和措施；3. 定期招待作者积极分子，以便批评和讨论报社所进行的运动和采取的措施，以便批评和选择宣传论文、信件和通讯。

5月5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致《真理报》25周年纪念的祝词。祝词说：“列宁的《真理报》的历史，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紧密地联系着。1912年在革命浪潮高涨中诞生的《真理报》，在团结布尔什维主义和工人阶级力量的斗争中，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胜利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联共(布)中央确信，《真理报》今后将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团结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千百万群众，帮助他们以及我国所有劳动者来掌握布尔什维主义，引导他们坚决与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6月23日——2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定期全体会议。全会研究并通过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条例”草案，全会还研究了下列各项问题：1. 改良谷物种子；2. 实行正确的轮作制；3. 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办法。全会同意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改良谷物种子的办法的决定草案。全会基本上同意把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实行正确的轮作制的草

案在报刊上公布,并对这个草案进行全面的讨论,以便在下届中央全会上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全会把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建议交给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讨论。

8月10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伏尔加古比雪夫水利枢纽和卡马河水利枢纽的建设》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建立这两个水利枢纽工程的重要作用,委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具体负责建设,委托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首先考虑古比雪夫枢纽站电力的基础上制定灌溉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土地的设计任务,委托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以世界现有的远距离输电经验为基础,制定输电系统。决议还规定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

12月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全体选民、男女工人、男女农民、红军、苏维埃知识分子书。该文件鉴于12月12日即将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声明布尔什维克党是和非党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的,号召一切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投票选举党的候选人那样来一致投票选举非党的候选人。该文件列举了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呼吁:谁希望苏联今后也是强盛的、有文化的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谁希望苏联的工业今后也是不断发展、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谁希望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今后也一样繁荣、能够供给极其丰富的农产品;谁希望劳动人民今后免除任何失业现象,进一步改善工人和职员的物质生活状况,使农村的富裕生活进一步高涨;谁希望教育进一步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学和艺术进一步兴盛;谁希望苏维埃妇女今后在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也一样是自由的和完全平等的;谁希望苏联各民族今后也是自由的、完全平等的;谁希望苏联劳动人民今后同样享受和平劳动的幸福,谁就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谁就投票选举共产党员和非党员联盟的候选人。

1938 年

1 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例行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常会的各项问题,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全会还研究了一些经济问题。全会解除了巴·彼·波斯特舍夫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全会选出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尼·谢·赫鲁晓夫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查·美赫利斯为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共(布)各级组织在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托洛茨基—右派分子方面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偏差,这首先是因为党员中有个别野心家还没有暴露和被揭发,其次是因为暗藏的人民公敌和两面派暗害分子发动对党员的诬告来挑拨离间,决议要求全党提高警惕,揭露和彻底肃清党内一切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敌人,并作出 10 项具体规定,以纠正错误和偏差。

1 月 12 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7 年 12 月 12 日,苏联举行了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9100 万人(占选民总数的 96.8%)参加了选举。1938 年 1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第一届常会。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联席会议选出由 24 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加里宁当选为主席。

2 月 16 日 斯大林致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他说：“在这本小册子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和夸大的地方，以及不适当的颂扬。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斯大林指出：“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迷信。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使它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小册子是在助长社会革命党人的声势。一切这样的小册子都将助长社会革命党人的声势，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斯大林最后建议将这本小册子烧掉。

2月2日——13日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原联共（布）领导人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余3名被告被判处15年至25年监禁。

3月12日 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在法庭作最后陈述。布哈林说：“我已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而且我赞同检察长公民的意见，他曾重复了9次说，我站在我的死亡时刻的门槛上。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利对（1）在印好的起诉书中，（2）在法庭的调查中，以及（3）在苏联检察长公民所作的起诉演说中提出的某些控告加以驳斥。”

布哈林说：“我再次重复说，我承认我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弥天大罪，犯了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搞恐怖行动以及参加一个地下的反苏组织的罪，我还承认，我犯了组织一个阴谋进行‘宫廷政变’的罪，顺便说一下，这就证明国家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演说中所说的许

多话——他硬说我摆出一副纳粹的理论家的姿态、哲学家的姿态等等——是不正确的。这都是一些确确实实的事情。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齿轮的轮牙。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而且我的确不知道，不过这并不能减轻我的责任。”“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右派和托派联盟’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1)我个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中重复对方的话；(3)如果说李可夫第一次从我那里听到这话，那么，我再谈一下，那是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重复对方的话。”

布哈林在否认了“右派和托派联盟”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关的指示建立的之后说：“我坚决否认，说我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说它们是我的主子，说我是按照它们的旨意行事。检查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起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沙兰戈维奇的口供纪录曾被提交给我看过，从那份记录来看，似乎我实际地拟定了进行破坏的计划。”

布哈林在最后陈述中还说：“我否认曾企图谋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的罪名。”“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活动。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派和托派联盟’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但是，检察长公民所谓的逻辑在这里帮了真实内容的忙。他问道：难道布哈林和李可夫能对这些谋杀袖手旁观吗？接着他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谋杀。”

3月13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建立部务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1. 恢复部务委员

会;2. 部务委员会由人民委员(主席)、副委员和若干名经验丰富的人民委员部领导人(总人数不超过 9—11 名)组成;3. 部务委员会的职责是定期举行会议,首先研究实际领导、检查执行情况,挑选干部等问题,研究发布全部的较重要的命令,召集人民委员部地方机构的代表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工作,派员代表人民委员部到地方去检查报告执行情况等等;4. 作为同地方进行联系和交流经验的机构,保留苏联人民委员的咨询会议;5. 部务委员会的决定以人民委员发布命令的方式来贯彻;以及人民委员与部务委员会的关系,部务委员会组成的期限等等。

3 月 16 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新石油区》的决议。决议提出了在新石油区开采石油和钻井的初步规划,并对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开采石油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确定开发顺序,配备技术高度熟练的干部,防止污染,装备技术设施以及有关东方石油托拉斯,巴什基尔石油托拉斯和普里卡姆石油托拉斯的工作等等。

4 月 19 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收入的不合理分配问题》的决议。决议批评了一些集体农庄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的状况,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对分配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 认为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日不认真对待和将农庄收入滥用于过分的基本建设、生产性的和行政事务性的开支的行为是反农庄的行为;2. 废除《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中规定的现行货币分配制度,规定今后劳动组合全部货币收入中按照劳动日在庄员中分配的数额不能少于 60%——70%;3. 基本建设提成不得超过货币收入的 10%,今年的基本建设资金从去年的收入中提取;4. 修改《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第 12 条等等。

4 月 19 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禁止开除集体农庄庄员》的决议。决议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除集体农庄

庄员是“反党的和反国家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基础就是许多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者和许多区的党政领导人对待活人的命运、对待个别庄员的命运的形式主义的和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态度，这种行为“只能有利于人民的敌人”。决议决定，禁止以任何借口在农庄中进行清洗；今后开除庄员，只能作为一种对待明显危害和扰乱集体农庄的不可救要的庄员的极端措施来使用，而且只能在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规定的预防性教育性的一切措施用尽，并严格遵守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所规定的手续，才可使用。

6月2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阿尔汉格州〈北方真理报〉的党的生活部》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北方真理报》党的生活部存在的缺点，建议该报编辑和阿尔汉格省党委会实行下列措施：1. 以可靠的和在政治上有很好准备的有党的工作经验的党员，补充报纸的党的生活部。2. 在报纸上有秩序地设置“党的生活”栏，在这栏内有系统地介绍党的工作经验。3. 在报纸周围组织坚强的积极分子，报纸的每日活动，应依靠这些积极分子。4. 保证寄给报纸的有关党的生活问题的信件和通讯，有更广泛的来源。5. 正规地在报纸上刊登党政题目的和历史革命题目的宣传论文。

同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雅罗斯拉夫州〈北方工人报〉特派通讯员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北方工人报》有关特派通讯中工作的缺点，责成《北方工人报》1. 根据报纸的实际需要，调整特派通讯员网，首先要在省内最重要的地点配设通讯员；2. 正规地确定特派通讯员工作计划，把通讯员材料的检查寄给他们，并指出未被刊登在报纸上的每件通讯的具体原因；3. 经常领导特派通讯员的工作，并正规地至少在每3个月内在报社中召集一次通讯员会议，予以工作指示，并提高其报纸工作的熟练程度。决议还责成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州委员会常委会改善对《北方工人报》的领导，并监督该报对这一决议的正确执行。

7月 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平息。在这场运动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有51名被处决,2名被迫自杀;68名候补委员中有47名被处决;11名政治局委员中,1名被迫自杀,2名被处决;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3名被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总共有15名委员,有8名被处决或病死狱中,1名被驱逐出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前苏军共有6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等4名元帅被处决;苏军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处决,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处决,苏联海军舰队司令员只有1名幸存。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很多领导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领域的领导干部,都被当作间谍而处决。此外,共产国际各国党在苏联的领导人,如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库恩·贝拉等也被杀害。

9月 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斯大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1. 把自然界看作是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2. 把自然界看作是不运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3. 辩证法把发展过程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

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4. 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过去和将来、衰颓着的和发展着的東西,而这种矛盾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1. 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2. 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人脑是思维的器官;3. 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1. 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2.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3.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

动、最革命的因素；4. 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的，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发生的。

10月20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库兹巴斯、莫斯科、乌拉尔、卡拉干达、东西伯利亚、中亚、特克维布尔和特克瓦尔切尔各煤炭管理局的联合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具体规定了各煤炭联合企业和托拉斯的生产进度和生产组织、生产管理，并且规定在煤炭工业的98家大煤矿中设立联共(布)中央派出机构，要求把大部分共产党员直接派往工段和工作面去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决议还责成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煤炭工业总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有关机构为保证煤炭工业的顺利发展创造一切条件。

11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阐述了《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意义，认为该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是共产党伟大经验和科学总结。决议指出了联共(布)宣传工作的主要缺点，如缺乏必要的集中领导，忽视报刊宣传的作用等等，提出了改进宣传工作的26条具体措施，决议最后宣称，《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使联共(布)和苏维埃人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强大的思想政治的高涨。人民一旦掌握了以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武装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会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就会最终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12月4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货币收入的分配》的决议，决议继1938年4月19日修改《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第12条之后，再次对这一条文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劳动组合所得货币收入的分配。

1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整顿劳动纪律、改进国家社会保险办法以及同这方面的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认为,现行放假制度有许多漏洞,因而使一些钻营者和旷工者有机可乘,决议为此规定了具体的措施,并决定从1939年1月1日起按新的办法来整顿劳动纪律。

1939 年

1月20日 斯大林向各地方机关发出密电说：“联共(布)中央特做如下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自1937年以来在审讯中施用肉刑，是联共(布)中央批准的……联共(布)中央认为，作为一种例外，今后对众人皆知的、罪大恶极的人民敌人仍可施用肉刑，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可行的和正确的方法。”

1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通知，定于1939年3月10日召开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知通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规定了代表的比例和选举程序。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在通知上署了名。

2月1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决议。决议决定了展览会开幕的日期，参加展览会候选者的指标和条件，对参加展览会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办法等等。决议最后要求在所有农业部门之间展开社会主义竞赛，使展览会不仅显示苏联农业过去两年来的成就，而且还显示出1939年的成就。

3月10日——21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56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46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1588852名党员和888814名预备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2. 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3. 修改联共(布)党章。4. 选举联共(布)党纲修改委员会。5.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1名委

员和 68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50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3 月 22 日举行了新选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3 月 14 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斯大林同志所作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曼努伊里斯基同志就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工作所作的总结报告》等三个决议。

3 月 20 日，代表大会根据维·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 年)》的决议。决议的第一部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其主要内容是：苏联已胜利地完成了“二五”计划，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根源；目前，苏联社会是由两个彼此友好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别，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克服人民——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议的第二部分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产计划，第三部分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新建设及其分布的计划，第四部分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的计划，阐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决议的最后部分要求所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和工会的组织生动灵活和实事求是地领导经济工作，正确地规定工资，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决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法西斯和外国资本的间谍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反革命暗害活动，在一切共产主义建设工作中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

3月20日,代表大会还根据日丹诺夫的报告一致通过《修改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苏联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人民的阶级成分也改变了,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正在消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正在缓和和消失,苏维埃社会在精神和政治上统一的基础已经建立,因而有必要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此外,由于苏联国家政治生活起了变化,通过了苏联新宪法,从而向联共(布)提出了新的任务,因而也必需修改党章。决议通过了具体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涉及到关于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关于预备党员、关于党的组织机构、关于党的中央组织、关于省委员会、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书记以及红军和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党龄、关于党的各级基层组织以及党与共青团的关系等等问题。同一天,代表大会通过了《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共产国际支部》。安得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进入了政治局、贝利亚、什维尔尼克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得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斯大林任书记处书记。

5月21日——24日及2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定期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 关于防止侵占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的办法;2. 关于收割庄稼和收购农产品的准备工作;3. 关于成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监察委员会;4. 关于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全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其中,《关于防止侵占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的办法》分析了集体农庄公有土地被侵占的原因,谴责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提出17条维护集体农庄公有土地的具体办法。

7月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发展集体农庄的公有畜牧业的措施》的决定,对畜牧业的发展采取了鼓励措施,即肉类的征购量不是根据集体农庄养畜场的畜牧的头数来计

算,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占有的土地面积来计算,决议还就发展集体农庄畜牧场,发展集体农庄畜牧业饲料基地以及关于肉类的交售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7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多夫同志》的决议。决议认为,《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多夫在该报纸编辑“按语”中,对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会决议,发生了粗率的错误,在省报上展开了反对省委的论争,因而违反了联共(布)党章。决议决定:1. 撤换札多夫的主编职务,并宣布其错误;2. 将本决议分别通知各省委会、边区委会及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

7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住在农村地区的工人、职员、农村教师、农艺师和其他非庄员的宅旁园地》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居住在农村的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数额不得超过0.15公顷,超过部分并入集体农庄,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8月1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勒尔州和库尔斯克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状况》的决议。决议指出,白俄罗斯、奥勒尔和库尔斯克的党组织在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没有组织全体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进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共产党员个人的政治自学形成了自流状态。决议责成白俄罗斯,奥勒尔和库尔斯克党组织加强对党的宣传工作的经常的和系统的领导,消除共产党员个人政治自学的自流现象;坚决结束讲演题目落后于党的干部和苏维埃知识分子自学联共(布)党史的要求的现象;达到加强党研究室在帮助自学党史的人的工作中的组织作用;集中更大的注意力去组织报刊上的马列主义宣传。

12月20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致斯大林60寿辰的贺电。贺电称斯大林为“列宁的朋友,他的事业的伟大的继承者,党和苏联人民

的领袖”。贺电颂扬了斯大林的功绩，并祝斯大林万寿无疆，说“这是党、工人阶级、苏联和全世界各族人民为之庆幸的事”。

1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制定集体农庄谷类作物播种计划的程序》的决议。决议决定，为了提高集体农庄庄员进一步增加谷类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积极性，加强集体农庄制定各种谷类作物播种计划的责任并吸收广大庄员群众参加计划工作，废除制定谷类作物播种计划的现行办法，将谷类作物播种计划以全部谷类作物的总面积一年一次下达给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有权根据农庄的土壤、气候、经营条件和按规定程序建立的轮作制，自行安排各种作物的播种计划，但必须保证无条件地按各种作物履行交售谷物的国家义务。决议还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以保证上述任务的顺利实现。

1940 年

1月1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谷物良种播种计划》的决议。决议提出,为了提高广大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关心正确选择优良品种,进一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为了加强集体农庄对制定谷物良种播种面积计划应负的责任,决定废除现行的必须向集体农庄下达良种播种面积的谷物良种播种计划的制度,集体农庄有权在为本地区实行的品种区划范围内自行选择品种。决议为保证该措施的顺利实施,还作出另外一些具体而细致的规定。

3月26日——2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定期全体会议。全会听取了关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关于苏芬战争的结果的报告,并同意这些报告。全会通过了下列专门决定:1. 关于改变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政策;2. 关于改进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全会决定在6月份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全会通过的关于《改变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政策》认为,现行的农产品收购和采购办法已经不能适用,阻碍了集体农庄公共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提出了12条新的措施。

3月3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顿巴斯煤炭工业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顿巴斯的工作对于全国煤炭供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批评顿巴斯煤炭工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工资、配备矿井工程技术人员和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加现有矿井采煤量、掌握新矿井设计能力和进一步实现采煤机械化以及组织问题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措施。决议最后要求顿巴斯煤炭工业的工人、职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领导人在党政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改变煤田落后状况,保证1940年国家采煤计划的完成和顿巴斯煤炭工业的进一步大发展。

4月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农产品征购和收购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现行的农产品征购和收购办法已不适用,“因为它阻碍着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为此,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以下决定:1. 按照播种计划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稻谷、向日葵、马铃薯的现行制度以及蔬菜、油料作物种籽、干草的预约收购制均予废止。2. 规定自1940年收获期开始,集体农庄按照划归其使用的每公顷耕地向国家义务供售下列作物:谷物、稻谷、马铃薯、蔬菜(白菜、食用甜菜、胡萝卜、葱、黄瓜、蕃茄等)、油料作物种籽(向日葵、蓖麻、黄豆、油菜、芝麻、芥末等)、草籽(紫花苜蓿、马草、牛草、红豆草、野豌豆等)。3. 根据全苏谷物供售总量必须达到9.25亿普特这样一个标准,来规定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的定额。向日葵、油料作物、马铃薯、草籽等供售额,按该类作物的供售计划和预购计划加以规定;蔬菜则根据1939年对各省(边区、共和国)及各区所批准的预购计划和非集中收购计划规定之。4. 自1940年起,实行向国家义务供售干草的办法,供售额按耕地面积和草地面积计算,无论耕地、草地、旱地草场或水地草场,均应分别规定不同的供售定额。5. 按乳牛头数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供售乳类的现行办法及采购羊乳干酪的现行制度均予废止。自1941年起实行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供售羊乳干酪制度,并规定按划归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每公顷土地面积计算供售奶类和羊乳干酪的办法。6. 皮革原料和蛋类的现行采购制度应即废止。规定自1940年起实行集体农庄、集体农户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供售皮革原料的制度,蛋类供售制自1941年起实行。7. 按照划归给集体农庄

使用的土地面积,规定一切集体农庄均应繁育最低数量的良种军用马匹。8. 计划收购肉类的现行办法应予废止,对各共和国、各省、各边区、各区以及各集体农庄所规定的国家收购肉类计划,应根据集体农庄的土地面积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按照向国家义务供售肉类的比例所批准的年度定额计算之。至于超出国家收购计划所收购的全部产品,均留归各共和国、各边区、各省自行支配,以供地方需要。9. 国家收购皮革原料应通过换售皮革制品的办法来进行,凡已完成皮革原料和肉类供售任务并能保证国家发展牧畜业计划的实现的集体农庄,准予将皮革原料送交国家或合作社企业代为加工,以供本农庄使用。10. 蔬菜和马铃薯的国家收购,应按义务供售办法进行。11.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皮革采购联合”、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属“羊毛采购联合”以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所属“毛皮总管理局”的采购机关,应即合并为采购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一个专门采购皮革原料、羊毛、生熟毛皮的国家采购机构。

4月1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使集体农庄更加关心继续扩大谷物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尽量利用可耕地以及实行正确的轮种制,特作如下规定:1. 废除按播种计划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的现行办法。2. 规定自1940年起按划归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每公顷耕地计算他们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3. 责成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省委会、边区执委会和联共(布)党的边区委员会、省委会按照对各该省、边区和共和国所规定的谷物和稻谷义务供售定额来确定各区年度定额。各区年度定额经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经济委员会批准后,于1940年5月20日以前公布南部地区的定额,其他地区则在明年6月1日以前公布。4. 规定不论集体农庄谷物作物实际播种量多少,根据本决议第二条规定按耕地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

谷的数额是没有变更的。5. 规定从 1940 年起,对个体农户和未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等按其使用的每公顷耕地计算他们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其定额比对该区受农业机器站服务的集体农庄所规定的定额高 0.6 公担。6. 对种植谷类作物的集体农民、职工和已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按其实际播种面积计算他们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其定额与 1939 年对该区个体农户所采用的定额相同,决议还具体规定了 1940 年集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期限和数额,以及个体农户和播种谷物作物的集体农民、手工业者、职员和工人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期限和数额。

决议强调指出:“执行本决议所规定的向国家缴纳谷物和稻谷的义务,乃是各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头等重要的义务,并应自最初打谷之日起就开始执行,若故意不履行义务应予以法律处分”。对长年没有劳动力、红军战士家属和残疾军人及劳动者,规定可不向国家义务供售谷物和稻谷。

4 月 20 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东部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业,这些地区包括: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阿克摩林斯克州、巴夫洛达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库斯塔奈州、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和东哈萨克斯坦州》的决议。决议向这些地区提出了有关提高单产和开垦新土地、改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使用和管理等具体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和建议。

5 月 27 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提高重型机器制造厂工长的作用》的决议。决议认为,“工长应该享有为履行自己作为直接生产组织者的义务所必需的一切权利”。“贬低工长的作用有损于社会主义工业和国家的利益”。决议规定了工长的任免、授权、义务以及工资、奖励等涉及到与工长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强调要保证工长在生产中的领导作用,加强他们对劳动组织状况的

责任心并为重型机器制造业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7月13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区的报纸》的决议。决议认为,区的报纸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但目前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改进对区报纸的领导,决议决定:1. 区报纸的基本任务是要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2. 区报纸应该清楚地反映本区的生产特点和经济情况,以刊载有关当地问题的文章和通讯为主;3. 谴责编辑部人员为了赚稿费而以自己的稿件充塞报纸篇幅的作法;4. 提高报纸质量,改进其文字和编排;5. 责成联共(布)区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亲自领导本地报纸,经常监督其内容,指导报纸解决本区当前的政治经济任务;6. 建议各州委和边区委改进对区报纸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

同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的工作和1940年文艺书籍出版的选题计划》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的工作有严重的缺点,其工作方法是不正确的,根据作家的请求而订立合同的制度也是不正确的。决议决定,取消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现行的稿件处理手续,委托联共(布)中央人事部和宣传鼓动部在10天之内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各部门主管人和所有编辑的名单呈请中央批准。决议最后规定: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应以出版古典文学以及苏联和国外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为主,主要出版物的印数不能少于5万册,以便保证有系统地补充国家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文艺书籍,并满足市场的需要。

7月2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州、边疆区及共和国各级报纸的工作人员的名额》的决议。决议要求精减报纸过于庞大的编辑部机构,规定报纸应以刊登编辑部以外积极分子——党的、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农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广大苏联知识分子阶层、工农通讯员……的稿件为主。

7月29日——3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举行定期全体会议。全会听取了关于政府对外政策的报告,并同意这一报告。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 关于农产品的收割和收购,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2. 关于监督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0年6月26日“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7天工作周以及关于禁止工人和职员擅自离开企业和机关”的命令,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全会同意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建议。其中,《关于农产品的收割和收购》的决定要求,为了在极短的期限内作完收割工作,避免收成受到损失和按时完成国家的农产品收购计划,各级机关应该及时进行收割工作,按政府所规定的期限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决定具体规定了在谷物和油料作物的收割方面、在收购谷物和油料作物方面、在马铃薯和蔬菜的收获和收购方面、在亚麻和大麻的收获方面、在甜菜的收获和收购方面、在棉花的收获和收购方面、在烟草和马合烟方面以及在饲料作物方面的要求和指示。

9月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企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组建蔬菜和畜牧副业农场》的决议,决议支持企业为改善职工的食品供应在城市和农村组建蔬菜和畜牧副业农场,并责成农业银行和州(边疆区)执委会分别向企业提供贷款和土地的帮助。

12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苏联锻压机器制造业》的决议。决议指出,锻压设备的生产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尤其是不能满足国防工业的需要,从而具体规定了有关发展锻压设备的生产和利用,发展锻压机器制造业的53项具体措施。

12月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了劳动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建议在劳动日分配制度中,加进联产计酬的办法。

以后，在1946年3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1946年发展农业的国家计划》的决议、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战后时期振兴农业的措施》的决议、1948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集体农庄中改进组织，提高生产率和整顿劳动报酬的措施》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中，都明确肯定了附加劳动报酬制、生产组计件制、个人计件制等联产承包形式，建议集体农庄对全部农业工作一律实行个人计件制和生产组计件制。

1950初起，生产组承包制遭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批评，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1941 年

1月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靠地方资源增加日用品生产和食品供应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发展地方工业和主动为其生产日用品创造条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本决议为振兴地方工业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这一极其重要事业的成功现在就靠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领导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者的主动性、坚定性和意志力了。

1月 《党的建设》第2期报道: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设立训练与再训练党的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联共(布)中央直属列宁训练班的决议。决议确定了训练班的学习期限、招生名额、教学计划、开学日期以及其他有关问题。

联共(布)中央召集有关经济学家开会,讨论由联共(布)中央倡议、1940年开始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肯定了苏联仍然存在着商品、货币、价格、工资、利润、地租以及经济核算等等,认为所有这些都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讨论会因而指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对苏联经济生活的实践是有害的。

2月15日——20日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45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3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的议程如下:1. 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任务;2. 1940年的经济工作总结和1941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计划;3. 组织问题。代表会议同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通过的1941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代表会议根据党章把一些不称职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并补充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缺额。代表会议在2月18日根据马林科夫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了运输业和工业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提出了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任务，以及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组织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尽量照顾工业和运输业的需要和利益，为完成计划而斗争。

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190个师的兵力，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下奋起自卫，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6月24日 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什维尔尼克为首的疏散委员会宣告成立，具体领导将工厂、甚至整个工业部门，从即将被德军占领，以及受到德军侵略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的工作。

6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立新的制造坦克的基地。

6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关于撤退到东部的飞机制造厂的分布计划。

6月29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并宣布了组织反击和击溃法西斯德国的纲领。7月8日，斯大林就此纲领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要点如下：

1. 要充分认识战争的危险性和严重性，消除和平时期的心理，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2. 要不怕牺牲，英勇打击法西斯，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

3. 巩固后方。在短期内将所有工矿企业及机关团体的工作纳入

战时轨道,安排好军工生产;同间谍、一切破坏分子和逃兵展开无情的斗争。

4. 要从各方面支援红军。

5. 保证不使红军部队的任何重要物资落入敌手。

6. 在敌占区,要组织游击队和军事破坏小组。要建立党的地下组织领导敌后苏联爱国者的活动。

7. 在每一个可能受到侵犯的城市中,都要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样建立民兵。

6月30日 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工、团的活动。

7月中旬 联共(布)开始在苏联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目的是完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以直接协助指挥员巩固纪律,完成战斗任务。此外,军队指挥干部中有许多预备役军官,他们没有在军队中进行党的政治工作的经验,不完全符合一长制指挥员的标准,因此,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就更加必要。

7月1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

1942 年

4月13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两项决定：《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劳动日的最低义务劳动限额》和《关于动员城乡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参加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农业劳动的办法》。

10月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建立秘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克拉斯诺顿建立地下共青团组织“青年近卫军”。

10月11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地下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1943 年

6 月 10 日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二战全面爆发后,国际局势和各国内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已成长起来的条件下,再由一个国际中心组织领导解决各个党面临的各种问题,已不可能。集中统一的国际组织越来越不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也为了避免为敌对者,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以攻击的借口,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等的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必须寻找恰当时机解散。1943 年春,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巨大胜利,共产国际解散的条件已经成熟。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提议书》。提议得到了各国党的拥护。6 月 8 日,主席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根据各国支部的意见,决定共产国际于 1943 年 6 月 10 日正式解散。

8 月 21 日 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1. 把撤退到东部地区的牲畜归还给集体农庄;2. 关于增加集体农庄牲畜的措施;3. 关于恢复集体农庄养禽业的措施;4. 关于减免集体农庄、庄员、个体农民、工人和职员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数额和 1943 年的收购方法;5. 关于供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1943 年秋播用的种子;6. 关于恢复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拖拉机修配厂的措施;7. 关于帮助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修建住宅的措施;8. 关于修复火车站、巡道工小房和其他铁路建筑物的措施;9. 关于分给铁路运输业线路工作人员宅旁园地并减免他们的农产品征购量;10. 关于设立苏沃洛

夫军事学校、特种技工学校、特别孤儿院和孤儿临时收容所接收红军战士和参加卫国战争的游击队员的子女,以及父母遭德寇杀害的孤儿。决定最后规定:委托由马林科夫、米高扬和安得烈耶夫等人负责的苏联人民委员会收复区经济恢复委员会领导收复区的经济恢复工作,并对政府有关这些地区的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宣传员》1943年第13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组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向农村居民做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在许多农业地区向农民讲述卫国战争前线情况、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情况,以及讲述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责成联共(布)所有的区委、州委、边委以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在每个集体农庄里,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要召集一次集体农民大会进行关于当前军事和政治事件的报告或谈话。做报告的人应是上述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领导工作人员。

1944 年

1月27日 联共(布)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加盟共和国在国防和对外关系方面的权限的建议,并同意将这项建议提交即将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全会还讨论了应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研究的组织性质的问题。此外,全会认为,有关机关决定以新国歌“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旧国歌“国际歌”并把“国际歌”当作联共(布)党歌,是正确的。

5月1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哲学方面的科学工作中的缺点》的决议。

《宣传员》第15——16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鞑靼党组织的群众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状况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批评了鞑靼党组织的群众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的状况,建议联共(布)鞑靼州委在各级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党员和候补党员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工作,恢复党、苏维埃和青年团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方法。决议着重指出必须在事实上把报纸变为群众政治工作的最重要的中心。决议还要求联共(布)鞑靼州委组织对鞑靼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大大改善对青年教育工作的领导。

《宣传员》第15——16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各级党组织在居民中间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最近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各级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居民中间的群众政治工作,恢复

文化教育机关的工作,组织对党、苏维埃、工会、青年团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决议还认为,正确地及时地给予解放区居民以政治报道是顺利动员劳动群众恢复德寇所毁坏了的经济以及迅速肃清法西斯占领所遗留下来的后果的极重要的条件,因而对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州委和市委、区委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

《党的建设》第 17 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成立联共(布)中央直属函授高级党校的决议。决议认为,成立函授高级党校的目的是提高州级领导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决议规定了函授高级党校的入学标准,开课时间,课程设置、学习辅导、考试办法以及毕业证书等等。决议最后说:“提高我们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工作具有愈益巨大的意义。应当对这项工作给予毫不松懈的注意。”

《宣传员》第 18 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乌里扬诺夫州的电影院和巡回放映队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乌里扬诺夫州的电影院和巡回放映队工作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该州电影管理局对电影网的工作领导得也不好。决议为此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改进措施,并责成联共(布)乌里扬诺夫州委和区委的宣传鼓动部建立对农村电影巡回放映队工作的严格监督。

《宣传员》第 18 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的宣传》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的宣传,在进一步提高广大劳动人民阶层的文化水平与克服无文化、迷信、偏见的残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科学教育宣传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以唯物论说明自然现象,解释科学、技术、文化的成就。决议责成党、团、工会的组织、人民教育机关和文化教育机关,以及与宣传教育有关的各部门,包括书籍、电影、杂志等编辑部,都投身到系统地宣传科学的工作中去。

1945 年

5月9日 斯大林发表《告人民书》。文中宣布：“战胜德国这一伟大胜利日来到了。”《告人民书》指出：“我国为了祖国自由与独立所担当的莫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过程中所忍受的无数困苦，后方及前线贡献给祖国的紧张劳动，并没有截然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斯拉夫各民族历代为自身生存与独立的奋斗，终于战胜了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告人民书》宣告伟大卫国战争终结。

6月17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就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发表贺电。贺电指出，在战争期间苏联学者顺利地进行了研究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帮助了前线和国民经济。苏联学者对粉碎敌人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贺电肯定了苏联学者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获得的成就，同时认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虽然已经成熟但远没有解决的问题，苏联学者必须为之而努力。贺电最后表示相信：苏联科学院在自己今后的活动中将发挥苏联和世界科学的优良传统，尽量利用其成就来发展苏联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更加提高苏联科学在世界人民中间的威信。

7月8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占领过的地区建设集体农庄庄员住宅、集体农庄生产业务用房和文化生活建筑物》的决议。

9月2日 斯大林发表《告人民书》。该文件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告人民书》指出：“日寇不仅损害到我们的盟邦——中国、美国和英国，并且还给了我国以严重的损害。所以我国也与日本

有一批特别账目要算清楚。”文件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给苏联造成的损害,指出:“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是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的。我们熬过了艰难困苦的年代。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是胜利了。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是摆脱了西方德寇侵略与东方日寇侵略的威胁,全世界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和平来临了”。

9月24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庆祝该报发行到第10000期的祝词。祝词中说:“从1912年起,30多年来,《真理报》始终不渝地向人民群众传播了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思想,把工人阶级和我国全体人民团结在党的光荣旗帜的周围,鼓舞和发动了劳动人民为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奠定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日子里,《真理报》用无限忠诚于祖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来教育苏联人民,号召人民对敌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唤起人民在劳动中和在战场上发挥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确信,《真理报》今后也将光荣地完成列宁斯大林思想旗手的任务,并且用布尔什维克语言的力量发动苏联人民为继续巩固我们伟大苏维埃祖国的富强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来创造新的劳动功绩。”

《宣传员》第3、4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准备1945年春季播种的农村群众政治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联共(布)的州委会、边委会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在准备春季播种的时期广泛开展农村群众政治工作,吸引党、苏维埃和青年团的积极分子、教师、农业专家、集体农庄先进生产者,在集体农民以及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还责成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为顺利作好春季播种准备工作的社会主义竞赛。此外,决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具体措施,以保证春播工作顺利进行。

《宣传员》第3、4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巴什基尔

党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状况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巴什基尔州宣传鼓动工作中存在的各项缺点与不足,责成联共(布)巴什基尔州委会在各级党组织内广泛开展共产党员、尤其是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学习,把为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斗争当作农村居民中间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开展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系统的工作,改善地方报纸,使其成为联共(布)领导经济政治工作的最重要手段,在1945年上半年恢复所有至今停止活动的农村阅览室,俱乐部和文化宫。决议另外还提出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宣传鼓动。

《宣传员》第14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报纸的质量及扩大它们的篇幅》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45年7月15日起,一些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报纸扩大至到4版,并责成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联共(布)边委会和州委会以及报纸编辑利用报纸篇幅的扩大来大大增加关于苏联、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生活的报道,事实上把报纸变为给群众以政治教育和动员劳动群众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威力而斗争的战斗机关报,以一切办法利用报纸来作为党领导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决议对报纸编辑部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备以及与出版报纸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宣传员》第14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在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方面的缺点》的决议。决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授在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进行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要求保证在高度思想理论水平上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学生深刻领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高等学校教育计划所规定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彻底改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授方法,结束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形式主义和学究式的态度。决议还决定充实萨拉托

夫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并在1945年9月1日以前在该大学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

《宣传员》第16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组织归国的苏联公民的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联共(布)州委、边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在归国的公民中间展开政治工作,使归国的苏联公民知道伟大卫国战争的各个基本阶段和红军的伟大胜利;向归国的公民说明:法西斯德国之被击溃,苏联人民之从被奴役和被杀害的情形下拯救出来,其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红军的英勇功绩,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必须向归国的公民表明:苏联政府在整个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对于被赶到德国监狱的苏联公民表现了毫不疲倦的关怀,而现在则保证他们回到祖国以及在劳动上和经济上安定下来。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归国的苏联人说明他们对祖国的义务,以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和严格遵守国家和集体农庄纪律的精神来教育他们,使归国的公民知道在卫国战争时期所通过的苏联政府根本法。

《宣传员》第17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古比雪夫州演讲工作的状况和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古比雪夫州演讲工作的状况,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演讲是给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人民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决议责成联共(布)古比雪夫州委:1. 增加帮助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自修布尔什维克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演讲的次数。2. 在该州城市和大区中心,以最有修养的讲师的力量组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世界各国问题的售票的公众演讲。3. 州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应当经常把最重要的党的决议以及党组织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任务通知讲师,同时给讲师团领导人以指导。

1946 年

2月2日 联共(布)中央发表告全体选民、男女工人、男女农民、红军和海军战士、苏维埃知识分子书。该文件就2月10日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向全体选民发出呼吁,希望每个选民都来选举共产党和非党员联盟的候选人。文件列举了自上次苏维埃选举以来,苏联在联共(布)领导下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卫国战争的胜利,号召全体选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来为国家的进一步繁荣,为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并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用选举共产党员候选人的态度来选举非党员的代表候选人,号召全体选民“在1946年2月10日大家就象一个人一样走向投票箱”。

2月9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斯大林阐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认为这场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对苏联而言,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经住了考验,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国家制度、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经住了考验;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是红军,它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彻底粉碎了敌人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指出,正是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为苏联赢得战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斯大林谈到,联共(布)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是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

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废除配给制,扩大日用品生产,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较长时期的计划,则是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斯大林最后说:“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

3月15日——18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辛斯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常会上作了关于《苏联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报告和结束语,会议通过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和秘书高尔金签署的相应的法令。沃兹涅辛斯基的报告分五个部分:1.苏联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2.发展生产与基本建设的计划;3.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计划;4.各加盟共和国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5.争取苏联国民经济新的蓬勃高涨。沃兹涅辛斯基在其结束语中呼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斯大林五年计划而开展工人、农民、一切企业中的知识分子以及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竞赛。

3月13日 斯大林就丘吉尔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斯大林严厉谴责了丘吉尔,并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当记者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会损害和平和安全的事业”时,斯大林答道:“无疑是的。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现在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象希特勒及其同伴。希特勒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

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丘吉尔先生和他们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认为丘吉尔的演说是“丘吉尔先生和他在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向不讲英语的民族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自愿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各民族在5年残酷的战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为了以丘吉尔之流的统治代替希特勒之流的统治，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不讲英语的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是不会同意接受新的奴隶制度的。”

斯大林强调指出：“丘吉尔先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这个死硬派托利党人，不懂得这一普通而明显的真理。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千百万‘普通人’都在保卫和平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象26年前一样被出卖”。

7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党和对联共(布)新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和党的政治工作的措施》的决定。

8月2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目前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

共(布)党史等等。

8月2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设立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校》的决议。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批判宣传工作中的无思想性、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种种表现,不断把反对资产阶级残余和反对反动意识形态的斗争推向高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1. 责成《星》杂志编辑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采取措施彻底消除本决议中所指出的该杂志的错误和缺点,端正该杂志的方针,并保证该杂志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停止刊登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以及类似他们这些人的作品。2. 鉴于目前还没有适当的条件在列宁格勒出版两个文艺杂志,《列宁格勒》杂志即行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星》杂志。3. 在《星》杂志设一主编及主编领导的编委会,负责刊物的思想政治方向。4. 批准阿·米·耶哥林为《星》杂志主编,同时仍保留他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8月1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联共(布)罗斯托夫州沙里区区委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联共(布)沙里区委会改进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自该区从德寇占领下获得解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若干经济上的成就,决议同时提出了沙里区委工作中的缺点,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联共(布)罗斯托夫州委会给予该区的帮助不够。决议规定,联共(布)沙里区的基本任务是:在联共(布)州委的帮助下,在最短时期内把沙里区恢复为大生产区,恢复为罗斯托夫州的丰收谷物、繁殖顿河种马和发展牧畜饲养业的先进区。决议为实现此项基本任务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

8月26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话剧剧院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决议认为,苏联作家的现代主题的剧本,实际上已从全国各大话剧剧院的剧目里排挤出去了,就在各剧院上演的为数

不多的现代主题的剧本中,还有一些很差的没有思想性的剧本,这是苏联戏剧界所不能容忍的。产生这个状况的原因,一是艺术工作委员会做了一部分落伍的戏剧工作者的俘虏,二是剧作家的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三是缺乏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戏剧批评。联共(布)中央决定:责成艺术工作委员会主席赫拉普琴科在最短时期内消除本决议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责成艺术工作委员会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创造现代苏联剧目,组织每一个话剧剧院每年至少上演2—3个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现代苏维埃主题的新戏。该决议一共列举了10项改进方法。

9月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谴责这一电影剧本的作者和导演“丑化”苏联社会,对自己的职责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同日,联共(布)中央发表《关于〈伟大生活〉影片》的决议。决议认为,由尼林编剧、鲁科夫导演、苏联电影事业部监制的《伟大生活》第2部在思想政治方面是恶劣的,在艺术方面是极为贫乏的。决议具体地批评了这部影片的情节、表演、音乐等等,同时还点名批评了其他一些电影片。决议批评编剧人和导演、演员不谙主题,对自己的业务采取轻忽态度;批评电影事业部领导人对自己的职务不负责任,对影片的政治内容和艺术价值漠不关心。决议决定:1. 禁止《伟大生活》第2集公映;2. 建议有关部门从联共(布)中央关于《伟大生活》影片决议中得出必要的教训和结论,改进工作,杜绝生产此类影片。

9月19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定。决定认为,集体农庄中存在着严重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如不正确地支付劳动日报酬,侵占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破坏农业劳动组合民主管理的原则等等。决定认为,上述现象,对于集体农庄事业非常有害,对于苏联整

个社会主义建设极端危险,是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而彻底地加以消灭。决定规定了10条措施,以消灭这类现象,这些措施包括:谴责违反集体农庄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违者应送交法庭,作为刑事犯处理等等。

11月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1946至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通过后党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建议各级党组织广泛地开展政治工作,向全体劳动人民介绍该法,向劳动人民解释战后五年计划的任务并动员苏联人民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五年计划而斗争。决议着重指出,这一工作不是短时期的运动,而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时期中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决议要求联共(布)各级组织为劳动人民举办关于新的五年计划的演讲会,报告会和座谈会,要求各家报纸杂志有系统地发表关于五年计划主要部分的宣传性论文和材料以及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做好新五年计划的宣传鼓动工作。

同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训练和再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方面,缺乏应有的系统和制度,党校所规定的课程太多,再训练干部的工作也组织得不好。决议提出,为了大大提高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必须在最近三、四年内使各加盟共和国、边区、州、市区的党和苏维埃的基本领导干部都受到党校和训练班的再训练。决议就高级党校,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的党校以及社会科学院训练和再训练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教学的基本任务、课程设置、教研室设置、学习期限、招生条件、招生人数等等。

《党的生活》第2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伊万诺夫纺织联合厂、格鲁霍夫棉布联合厂、塔什干纺织联合厂的党委会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这三个联合厂的党组织在最近期间,工作有所

改进,顺利地动员了全体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完成恢复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向各企业提出的任务。决议同时着重指出,这三个联合厂党委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决议提出了具体改进的措施。

《文化与生活》第4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锤〉(顿河罗斯托夫市)、〈伏尔加公社〉(古比雪夫市)与〈库尔斯克真理〉各州报的办法》的决议。决议指出,《锤》、《伏尔加公社》与《库尔斯克真理》各州报是在很低的思想和文化水平上办的,事实上不是群众政治工作的中心。决议责成联共(布)罗斯托夫州委会、古比雪夫州委会和库尔斯克州委会保证在最短期内大大改善报纸的质量,提高这些报纸作为改善党领导州的一切部门工作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作用。决议认为,这些报纸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经常解释新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动员劳动群众来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决议还提出了改进报纸质量的其他一些具体措施。

《文化与生活》第12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扩大和改进法律教育》的决议。决议指出了法律教育工作中的不足,认为苏联司法部和高等教育部的重要任务是提高法律干部的修养水平,首先是提高法院和检查厅工作人员的修养水平。为了扩大和改进法律教育,决议建议苏联高等教育部将各大学法律系招生名额增加到2500名,而法律学院则增加到3500名。决议还决定,1947—1949年在下列大学中设立法律系,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敖德萨国立大学、中亚细亚国立大学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文化与生活》第16期报道: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中等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决议规定:在从1947—1948年这一学年开始的4年内在中学毕业班里讲授心理学和逻辑。逻辑和心理学应当由在这两方面有专门修养的熟练的教员来讲授。决议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措施来保证在中学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课程。

1947 年

1 月 25 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工作》的决议。

2 月 28 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安得烈耶夫的报告通过《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苏联农业由于战争的破坏,曾经遭到了严重的困难。在转到和平建设以后,在联共(布)和国家面前重新全面地提出了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即保证农业的发展,使它能在最短期间为居民生产大量的粮食,为轻工业生产大量的原料并且为国家积累必要的粮食和原料后备。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改进对农业的领导,消除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彻底改进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大量培养农业干部,用新的机械装备农业,供给农业以肥料和燃料。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1. 增加谷物的生产;2. 增加技术作物的生产;3. 发展畜牧业;4. 实行轮作制,扩大牧草播种,提高农业技术,改善水利灌溉;5. 改进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6. 改进国营农场的工作;7. 改进农业的技术装备;8. 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和消灭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9. 改进农产品的收购工作;10. 加强农村中党的政治工作。

6 月 联共(布)中央主持召开了大型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 100 多名哲学家。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撰写的哲学史教科书《西欧哲学史》。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会上批评亚历山大洛夫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

的俘虏,把研究哲学史的全部事业当作消极的、旁观性的经院式研究。日丹诺夫还指出,由于亚历山大洛夫本人的严重错误,把整个哲学界变成一潭死水,变成一个远离战场的、无声无息的宿营地。日丹诺夫要求哲学界立即改变这种“没有战斗性的拖沓习气,去掉颓废作风,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地去工作”。会后,亚历山大洛夫被撤销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联共(布)中央还创办了《哲学问题》杂志,组成以凯德洛夫任主编的编委会。不久,联共(布)中央认为凯德洛夫未能令人满意地完成任务,改组了编委会,组成以切斯诺科夫为主编的新编委会。

9月22日——27日 欧洲9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波兰西南部的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小温泉场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联共(布):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南共:卡德尔、吉拉斯;波工人党:哥穆尔卡、明兹;匈共:法尔卡施、列瓦;捷共:斯兰斯基、巴什托万斯基;罗共: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夫人;保工人党:契尔文科夫、波莫托莫夫;法共:杜克洛、法戎;意共:隆哥、雷阿勒。

会议根据哥穆尔卡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配合行动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彼此交换经验及配合动作问题的决议》。会议决定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址设在贝尔格莱德。

会上,联共(布)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安·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战后世界形势,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西斯国家集团在军事上的失败,反法西斯战争的解放性质,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切激烈地改变了两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有利于社会主义。报告指出,战争所引起的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和若干国家的根本变化,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情势。新的政治力量的划分已经出现,形

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和美国结成同盟的有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要巩固帝国主义势力，制造新战争，反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支持一切地方反动的反民主的和亲法西斯的政权和运动。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基础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阵营的目的，是反对新战争威胁与帝国主义扩张，加强民主和根绝法西斯主义残余。报告号召所有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以努力确保一个公正的、民主的和平。报告认为，战后美国推出的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的实质是奴役欧洲，杜鲁门主义具有公开的侵略性质，马歇尔计划则是要谋求建立一个受美国约束的国家集团。报告最后提出了共产党在团结民主、反法西斯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事业中的任务，即领导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在一切方面——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扩张和侵略，在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把人民中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10月5日 苏联《真理报》公布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消息。

情报局从1947年9月成立到1956年4月解散的8年里，开过4次会议：1. 1947年，宣告成立；2. 1948年1月，研究出版机关刊物问题；3. 1948年6月，“开除”南共；4. 1949年11月，进一步“谴责”南共。在以后的6年半中再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在情报局存在的8年里，苏南两党的冲突占有显著地位。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的两次会议主要是围绕南斯拉夫问题进行的。1949年11月下旬情报局第四次会议，听取了苏共苏斯洛夫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报告，意共陶里亚蒂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的报告》以及罗工人党乔治乌—德治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中》的报告，会议通过了

相应的决议。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两个决议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情报局所属各国党内,特别是东欧各国党内纷纷开展了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斗争,造成了一系列的冤、错案,直到情报局解散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对上述冤错案才重新审查,先后予以平反昭雪。

12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和取消粮食、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47年12月16日起发行新币,旧币限期兑换。旧币与新币的兑换率,凡市场流通和人民手中持有的现金,是10:1。同一天起,一切食品和日用必需品都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无需配给证。全国实行由政府统一规定的零售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价格体系。

1948 年

2月10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穆拉得里的〈伟大友谊〉歌剧》的决议。决议断定,由明吉万尼编剧、穆拉得里作曲的歌剧《伟大友谊》,无论在音乐方面或结构方面,都是一种恶劣的反艺术的作品。决议认为,穆拉得里的歌剧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局部现象,而是与近来苏维埃音乐的不良情况,与在苏维埃作曲家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偏向有着密切联系的。决议点名批评了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的音乐创作,还点名批评了有关负责的领导,如莫斯科音乐院院长舍巴林、苏联国家直属艺术事业委员会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等等。决议决定,谴责苏联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偏向,保证苏维埃音乐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下去。

7月1日——8月7日 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举行会议,李森科作了题为《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指出有两种对立的生物学。联共(布)中央直接干预了这次自然科学界的争论,判定一方(李森科学派)是正确的,代表无产阶级,另一方是错误的,代表资产阶级。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共振论(化学键理论)、心理学等都被宣布为“伪科学”,一批著名学者遭到了迫害。

9月1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为极北地区学校培养师资》的决定。

1949 年

8 月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联共(布)中央负责国家保安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兼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副书记格布斯金等人被突然逮捕,1950 年 9 月 20 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这一事件被称为“列宁格勒事件”。

11 月 联共(布)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米·苏斯洛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布达佩斯会议上作了题为《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报告。报告认为,自从情报局成立以来,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性愈益加强,其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但是,保卫和平的民主力量,较之挑拨战争的黑暗势力,要增长得迅速无比。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根本改变,并继续改变着,而有利于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其证明首先就是领导反帝国主义阵营、领导争取持久和平这一斗争的苏联实力更加增大起来,其次就是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稳固的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取得了巨大胜利,再次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此外还有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到处高涨的事实,和平与民主阵营力量日益增长和巩固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报告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反对战争挑拨者斗争的先锋,在新战争危险日益加紧的情势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担负着伟大的历史责任。共产党和工人党

应当运用一切斗争手段来保证坚固持久的和平,使自己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现今这一中心任务。必须更加顽强地来巩固和扩大和平运动,要接连不断地把一批一批的人民群众吸收到这一运动中来,要把这一运动变为现今不可遏止的全民运动。这一运动能够并且应当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及党派而把所有一切珍视和平,珍视本国荣誉、自由和独立地位的人们包容进来。必须特别努力设法把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合作社组织、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宗教组织等等以及一切主张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学者、作家、新闻记者、文化工作者、国会议员及其他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吸收到和平运动中来。报告最后指出,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共产党曾经是全民抗战中的先锋队;在战后时期,共产党和工人党乃是为本国人民切身利益、为全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先进战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之下,一切反对新战争的人,即团结在坚强和平阵线内的劳动人民、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是能够打破帝国主义者罪恶阴谋的。

12月16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于当日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斯大林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经过谈判,两国政府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0 年

5 月 30 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和党组织在这一事业中的任务》的决议。

5 月——7 月 5 月 9 日至 7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次讨论引起了苏联语言学界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在讨论中间,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和《答同志们》三篇文章,并于 1950 年 8 月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结集出版。斯大林认为,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的各个阶级,经过世代代的努力而创造的,因而是属于全社会的,语言没有阶级性。斯大林批评了马尔语言学的错误,认为不能任其存在下去了。

1951 年

1月2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列宁逝世27周年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赫鲁晓夫、柯西金、什维尔尼科、苏斯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苏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院长波斯彼洛夫在会上作报告。他说,现在,既不了解世界历史,也没有从历史中取得教训的美帝国主义,正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纳粹帝国主义所走过的足迹,在这个时候,列宁的预言便有了特别强大的力量。正如过去对苏联的干涉遭到惨败一样,美国今天也正在朝鲜遭到惨败。无容怀疑,美帝国主义者图谋称霸世界的愚蠢计划,将以彻底失败结束。

4月 联共(布)中央发布庆祝“五一”节口号,计59条。主要内容是:“五一”节——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一切国家的工人兄弟友爱的节日——万岁!向一切为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致兄弟的敬礼!向沿着使本国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的道路、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满怀信心地前进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致兄弟的敬礼!已经赢得国家的自由与独立,正在胜利地建设着新生活的伟大中国人民万岁!祝苏中人民的不可侵犯的友谊与合作发扬增进,日益巩固!苏联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们,更普遍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提前完成1951年国民经济计划,以新的和平劳动业绩来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

6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6期发表社论《苏联文学在新的高

涨中》，社论说：我们战后的文学描绘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新的生活现象。在艺术作品中，普通工人革新家当作主人公愈来愈常见了；这种工人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代表一起掌握了科学。同学者合作创造了减轻人的劳动和大大提高生产率的新的机器，作家描写了集体农庄的新人物，农业的革新家和高产收获的能手。作家在表现新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成长过程时，也就是帮助了党和苏维埃国家教育真正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而进行斗争，为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而进行斗争。

苏联作家一面描绘进步苏维埃人的精神美好和力量，同时还揭露落后事物的必然灭亡。这样就能加速新事物的胜利，帮助追随我们时代优秀人物的所有人民的成长。

社论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问题之一是艺术作品思想性的问题。我们苏维埃社会是在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今天，我国剥削阶级已经肃清了，人剥削人这种事情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已经消灭了，社会主义正在建设，苏联人民进一步走向共产主义就有赖于在劳动者中间成功的组织思想工作工作了。作为社会发展因素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空前增大了，苏联人民进一步的成功，主要依赖苏维埃人的觉悟性，苏联文学的作用在这些条件下空前的增大了。”

7月21日 莫洛托夫代表联共（布）中央、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出席在华沙举行的波兰国庆日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关于苏波关系，他说：五个世纪以来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已是沙皇与地主的旧俄罗斯和贵族地主的旧波兰之间的关系的歷史陈迹了，苏波条约签订以来，苏联与波兰之间的同盟与友谊更加巩固了。最近几年来苏波关系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苏波关系根本改变的重大

意义。这种改变是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友谊与同盟的结果。

关于南斯拉夫,莫洛托夫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被骗而落入一帮背叛本国人民、卖身投靠美英帝国主义的间谍、奸细手里去了。现在人人都看到,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集团已经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秩序,剥夺了人民的全部革命成果,把南斯拉夫变为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这一帮窃取政权、唯利是图的罪犯知道南斯拉夫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直到今天都只能用血腥恐怖和法西斯手段来维持政权。但是这样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南斯拉夫人民一定会找到走向自由、消灭铁托法西斯政权的道路。”

8月22日 伏罗希洛夫代表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解放7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15年来,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特别紧张的形势。世界帝国主义已经变得更加猖狂、更加野蛮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它得势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它正处苦恼中,正处在神经错乱中,想‘爬上一道墙,希特勒就是从这里滚下去而遭到可耻覆灭的。”

关于南斯拉夫,伏罗希洛夫说:“今日的南斯拉夫的命运是悲惨的。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出卖了他们极善良、极诚实的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与民主阵营而投向了资本主义最黑暗的反动的阵营。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可鄙的走狗——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及其同伙在南斯拉夫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逐渐取消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民主果实以后,为了他们外国主子的欢心及利益,铁托匪帮又实行了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但是,铁托匪帮对南斯拉夫人民的野蛮暴行与恐怖,明目张胆地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与鲜血,这些都不会太长久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会找到方法结束铁托的法西斯政权,会找到方法解放它们受尽苦难的祖国的。”

9月28日 斯大林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致电毛泽东。电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纪念日,主席同志,请接受我

友谊的祝贺。衷心地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您本人在人民民主中国的建设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友谊——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障永远巩固。

10月6日 斯大林答《真理报》记者就原子武器的提问,他说:“美国人士不会不知道,苏联不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而且还主要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大家知道,苏联曾几次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但是每一次都被大西洋集团的国家拒绝了。这就是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关于原子武器方面的国际管制,斯大林强调,“美国人士也谈‘管制’,但是他们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继续这种生产,而且其数量要同各国所拥有的原料的数量相适应。所以美国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禁止原子武器,而是要使这种武器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使战争挑拨者用原子武器来消灭几万几十万和平居民的那种权利,也成为合法的。不难了解,这不是管制,而是对管制的嘲笑,是对各国人民爱好和平愿望的欺骗。”

10月7日 库兹涅佐夫代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出席庆祝民主德国建国二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引用斯大林给皮克总统的电报说:“德意志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共和国的成立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无可怀疑,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与爱好和平的苏联并肩存在使得欧洲不再有新战争的可能,结束欧洲的流血,使帝国主义奴役欧洲国家成为不可能。”

库兹涅佐夫还说:“美英法三国外长华盛顿会议表明,这些国家政府已采取新步骤以便在德国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片面行动,其目的是在加速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并把西德拉入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总的来说,这个会议的决议并未提及对德和约,同时并规定无限

期继续占领西德。”任何关于所谓“结束对德战争状态的虚伪的话，以及建立所谓对西德的条约关系的说法，都掩饰不了这个事实。”美英集团粗暴地违反关于德国的国际协定，背信弃义地破坏对德媾和，阻挠建立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及与它缔结和约，并在缔结和约后撤退占领军。

库兹涅佐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议会要求召开全德会议以解决使德国每一个爱国者都感到苦恼的问题的建议，是特别重要及值得给予最大的支持的。这个建议符合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愿望。”

11月6日 贝利亚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作报告。报告分苏联和平建设工作中的新成就和苏联为和平而斗争两部分。贝利亚说“今年头10个月经济方面的工作成就证明：1951年国民经济计划一定能够完成而且一定能够超额完成。今年工业生产量要比去年高15%以上，相当于战前1940年生产量的两倍。和1950年相比，工业的基本生产资金将增加12%。”他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的目的是要增加一小撮剥削者的财富和利润。我们的国家和这些国家不同，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谋取劳动人民利益，国民收入一年年增加，工人、职员和农民的收入也随着增加。苏联今年的国民收入将比1950年增加12%。”“苏联政府执行有计划地减低一般消费品价格的政策，今年3月，食物和工业品的国家零售价格再度降低，这是几年来的第4次降价，结果使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进一步增加，并且由于工业品价格降低而减少了农民在这方面的支出。”

关于对外政策，贝利亚说：“苏联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国际威信。“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世界分为两极，分为两个吸引力中心的现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清楚，一方面是苏联，它领导着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成了全体进步力量的吸引力中心。……另一方面是美国，它领导着帝国主义阵营，成了全

世界侵略和反动力量的吸引力中心。一切力图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企图劫掠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力量，都聚集在它的周围。”在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中，过去一年是力量不断增长和集结的一年，在帝国主义阵营里，则是国内外矛盾不断加剧的一年。

11月 联共(布)中央发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4周年口号，计60条，主要内容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4周年万岁！向为反对侵略和新战争的挑拨者，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族人民致兄弟敬礼！

向正在胜利地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致兄弟的敬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友谊——远东和平和安全的坚强保证万岁！

全世界和平拥护者们！争取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揭露并粉碎美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不让战争贩子用谎言罗网去陷害人民群众、欺骗他们、诱惑他们参加新的世界战争。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阻止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避免战争和确保持久和平而斗争。

苏联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们，开展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早日完成1951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争取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强大的发展而斗争，为争取苏维埃国家的威力进一步增强而斗争。苏联的劳动人民们，让我们成功地实现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顿河和阿姆河上的伟大建筑工程，从而对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作新的贡献！科学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工作人员们，为苏维埃科学的更进一步发展而奋斗，更勇敢地在科学工作中展开创造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新的研究、发现和发明来丰富科学和工程学，改进为国民经济训练专家的工作。

苏联人民百炼成钢的先锋队、我们的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列宁—斯大林的党——伟大的共产党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

前进！

12月31日 斯大林致信给日本共同社编辑局长岩本清先生。信中说“苏联人士没有那种由外国总理向另一国人民表示祝愿的惯例。但是苏联人民对于因被外国占领而遭到不幸的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使我不能不破例答应您的要求。”斯大林指出：“过去苏联人民亲身经受过被外国占领的灾祸，这种占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参加过的。因此苏联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难，深切同情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同当时的苏联人民一样，获得自己祖国的复兴和独立。”斯大林向日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祝贺新年，祝他们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当年，斯大林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就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的确，只有丧尽了天良，才会硬说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逼我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自己的边境并力求收复被美国入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略者。”“原来作为维护和平的堡垒而建立的联合国，现在正在变为战争的工具，变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工具。”“联合国正在变成侵略战争的工具，同时它也就不再是权利平等的国家的世界性组织了。实际上，现在联合国与其说是世界性组织，还不如说是满足美国侵略者需要的美洲人的组织。”（该讲话苏联公开发表时缺准确时间——编者注）

1952 年

8 月 20 日 《真理报》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给联共(布)各级组织的通知。根据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定,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将于 1952 年 10 月 5 日召开。在通知中宣布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议程: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2. 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波·格·莫斯卡托夫;3.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 1951——1955 年发展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查·隆布罗夫同志;4. 修改联共(布)党章——报告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赫鲁晓夫;5.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通知还规定了代表名额和代表的选举办法:5000 名党员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 1 人;5000 名预备党员选举有发言权的代表 1 人;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党章的规定,以秘密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级党组织的代表由各省、边区和自治共和国的党代表会议选出。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由各省党代表会议还是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则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酌情决定;苏联的陆军、海军和国家保安部边防部队各级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党组织一起,在党的

1952年2—9月,最初以《对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为题,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1952年第18期上,10月3日、4日的《真理报》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总题目,转发了上述文章和信,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加和不断完善,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他改变了以往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着矛盾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斯大林还认为流通已开始阻碍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逐步过渡到产品交换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反对把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

10月5日——14日 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9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6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6013259名党员和868886名预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1951—1955年发展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修改联共(布)党章;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格·马·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从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欧和东南欧的几个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而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沉重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战后,苏联沿着由于战争而被迫中断的和平发展和逐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苏联在工业、运输业、农业、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苏维埃

制度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继续得到加强,斯大林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代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所有的兄弟党和团体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苏联共产党及苏联各族人民的支持,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活动条件做了分析,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由委员 125 人、候补委员 111 人组成,中央检查委员会由 37 人组成。

10 月 10 日 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查·萨布罗夫的报告,通过《关于 1951 年——1955 年发展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决议中说:由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给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关于 1951——1955 年发展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计划规定要高速度地发展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化和机器制造业,因为这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技术上长足进步的基础,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 70%,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2% 左右;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 80%,消费品的生产增长 65%。在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的产品生产大约增长 1 倍,电站的发电能力约增长 1 倍,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增长 2 倍。在农业生产方面,主要任务仍然是提高一切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增加公有牲畜头数,大力提高牲畜的产品率,增加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量与商品产量。为此,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庄公共经济,在把先进的机器和农业技术应用于农业的基础上改进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指示还具体规定了农业品生产的具体增长数量:谷物的总产量增加 40—50%,亚麻纤维增加 40—50%,甜菜增加 65—70%,马铃薯增加 40—45%,向日葵增加 50—60%,葡萄增加 55—60%,烟草增加 65—70%,上等茶叶约增加 75%。为了保证完成这一任务,规定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方面的投资比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约增长 1.1 倍,其中用在水利和改良土壤方面的投资约增长 3 倍。

10 月 13 日 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出修改苏联共产党的纲领的决议,决议指出:从 1919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现行党纲以来,无论在国际关系方面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党纲中的许多原则和其中规定的党的任务已经实现了,因此,它们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和党的新的任务,决议强调,修改党纲,应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决议决定成立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由斯大林、拉·巴·贝利亚、拉·莫·卡冈诺维奇、奥·维·库西宁、格·马·马林科夫、维·米·莫洛托夫、彼·尼·波斯伯洛夫、阿·姆·鲁勉采夫、马·查·萨布罗夫、德·伊·切斯诺柯夫、巴·费·尤金 11 人组成,斯大林任主席。党纲修改草案将提交下次苏共代表大会审议。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从今以后,把“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决议中说:我们党的双重名称“共产主义的”和“布尔什维克的”是由于在历史上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而形成的,目的是要同孟什维主义划清界限。可是,孟什维克党在苏联早已离开了政治舞台,党的双重名称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最能确切地反映党的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同日,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章作了修改,通过了新党章,新的苏联共产党章程共 12 章 71 条,概括了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党的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党章指出: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

会；不断地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国际主义、同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兄弟联系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员；竭力加强苏维埃祖国的国防，防止敌人的侵略，在党员的 11 条义务中，强调要“尽力维护党的统一，因为党的统一是使党强大有力的主要条件。”

10 月 16 日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新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并批准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斯大林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由斯大林等 25 名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主席团相当于原来的中央政治局。1966 年 4 月苏共召开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又将‘中央主席团’重新改为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又成立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由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5 人组成。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负责决策党和国家最重大最紧要的问题。

12 月 25 日 斯大林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详尽阐述苏联对苏美关系和朝鲜问题的立场。斯大林说：“我仍然相信：不能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在今后也能够和平共处。”

1953 年

1月13日 《真理报》等中央报刊报道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医生破坏集团。参与这一集团的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大林等人看病的维诺格拉多夫、沃弗西、柯岗、克林、耶果罗夫、费里德曼、格林施坦、爱金格尔、马约罗夫、希海里奥维奇等人。消息说，这个集团同犹太人国际组织有联系，他们曾害死了日丹诺夫，并企图使苏联的元帅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对这一案件的调查。1952年底，专为党政高级干部看病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工作人员丽吉娅·吉玛舒克曾写信给斯大林密告，说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许多著名的医生用不正确的医疗方法进行破坏活动。

3月5日 苏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因患脑溢血于晚9时50分逝世。当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告全体党员和全体苏联劳动人民书。告人民书中写道：斯大林是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是苏共和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斯大林毕生效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逝世对于党、对于苏联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是最沉痛的损失。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我国各族人民要在列宁和斯大林所建立和培育起来的久经考验共产党的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在这个友爱的大家庭中，“党认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具备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在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出坚毅不屈的精神。”

3月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党和国家的这个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的整个生活得到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因此就需要我们的领导保持最紧密的团结，防止任何不协调和混乱现象，以便彻底保证我们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能够顺利实现”。为此决定“必须采取若干措施，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决定把部长会议中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合并，成立部长会议主席团，其成员由以上 5 人组成。

建议由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什维尔尼克的这一职务，决定将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成立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部长，布尔加宁任军事部部长。

根据党章的规定，决定将苏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同时确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马·查·萨布罗夫、米·格·别尔乌辛；主席团候补委员为：尼·米·什维尔尼克、潘·康·波诺马连科、列·格·麦尔尼科夫、米·札巴吉罗夫，以上 14 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选举谢·捷·伊格纳切夫、彼·尼·波斯伯洛夫、尼·尼·夏塔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让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从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尼·亚·米哈依洛夫任苏共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拉·伊·勃列日涅夫调任苏联海军政治部主任，解除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联席会议最后决定于 1953 年 3 月 14 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来审议这次联席会议所作的各项应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决议。

3月14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以下决议:1.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2. 选举尼·谢·赫鲁晓夫、米·安·苏斯洛夫、彼·尼·波斯伯洛夫、尼·尼·夏塔林、谢·捷·伊格纳切夫等组成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3. 根据苏共党章第32条,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尼·尼·夏塔林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3年3月21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以上决议。

3月15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次会议,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6日联席会议关于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单的决议。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会上提出了关于部长会议组成名单的建议。建议中还提出将军事部和海军部合并组成国防部,由布尔加宁任部长。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建议。

3月3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定,规定自1953年4月1日起,再次降低食品和制成品的国家零售价格,减价幅度为5%至50%。其中面包和面粉降价10%,肉和肉制品降价15%,土豆和蔬菜降价50%,食糖和糖果降价15%,伏特加等烈性酒降价10%——15%,服装、鞋类、玩具和男子服饰用品普遍下调10%——15%。这是战后的第六次降低物价。

4月4日 苏联内务部发表通告,宣布今年1月间公布的医生间谍恐怖集团的控告“是不真实的”,决定恢复这个案件中的一切人的名誉,并予以释放。4月6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社论指出,“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是不合格的”。国家保安部部长斯·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盲目性……做了当时负责侦讯、现已被捕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罪恶冒险家的尾巴。”“柳明之类企图假手于他们所捏造的案情在苏联煽起民族仇恨。”社论还指出,“前国家保安机关穷凶极恶地违犯苏维埃法律”。

同月出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理论和政治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就“医生案件”发表编辑部文章。文章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冲突。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和社会集团。苏联早就消灭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剥削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在我国国内找到任何有力的社会支柱。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于4月8日解除保安部部长斯·德·伊格纳捷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7月2日——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7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全体会议的公报。公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听取和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拉·巴·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阴谋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以后，决定撤销拉·巴·贝利亚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7月11日，苏联各报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的公告。公告中还指出，贝利亚的案件将提交最高法院审理。

8月 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以显著地位发表未署名的文章《人民是历史的创者》。文章说：近年在宣传工作中，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宣传脱离了马列主义，在宣传中不是正确的解释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是常常陷入个人迷信”，降低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个人迷信的危害，首先在于它不是培植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而是散布消极等待的情绪，个别人物和领导替他们作好一切。……个人迷信不是以忠于党，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来培养干部，而是以盲目的崇拜和忠于个别人物的精神来教育干部。它破坏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等原则，阻碍展开自下而上的不顾情面的诚恳的原则性的批评。”文章强调：“要严格遵守我们党最高的领导原则

——领导的集体性。从宣传工作中铲除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说法。”

9月3日——7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分析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1. 国家集中力量忙于工业化，把主要的资金和精力用于重工业，使重工业、农业、轻工业没能同时迅速发展，没能为此“创造必要的前提”。2. 违背了作为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的物质利益原则。3. 违背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4. 技术设备利用效率低，不能使人满意。5. 农庄、农场和拖拉机站都缺乏有经验的或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及技术人员。6. 政治工作与经济任务脱节，没能使政治工作同完成经济任务结合起来。他在报告中提出苏联农业生产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并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食品供应，同时“把全体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到更高的水平”，“必须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作法”。

在此之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已于8月11日通过新农业税，规定从1953年7月1日起，不管集体农庄农户在私人经营方面获得多少收入，一律按照1%公顷土地的固定税率向他们征税。降低没有奶牛的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税额（1953年减征税额50%，1954年减征30%），同时取消他们过去对国家农业税的积欠部分。

9月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巨大潜力仍然没有很好地挖掘出来。“许多重要的农业部门中的情况是不好的，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

重大措施,把落后的农业部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地区提高到先进的水平,以保证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大发展。我们的任务是在最近两三年内充分满足我国居民对各种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充分保证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供应。”为此,决议制定了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是:1. 进一步发展畜牧业。降低庄员、工人和职员个人副业生产的畜产品的征购定额;在大力发展公共畜牧业的同时,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和农业的机关应该彻底纠正那种损害庄员在私有牲畜方面的利益的有害作法。2.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铃薯、蔬菜的增产和收购工作。广泛实行机械化和应用先进的马铃薯和蔬菜的种植法来大大地提高这些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3. 提高谷物、技术作物和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于谷物业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谷物业,特别是珍贵的粮食作物冬小麦的生产。4. 进一步改进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在发展集体农庄生产中的作用,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拖拉机站中培养出固定的熟练的机务人员,他们要能够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设备,从而保证集体农庄各部门的生产有进一步的大高涨。5. 改进对农业的领导,包括彻底改进苏联农业和农产品收购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领导。6. 农村中党的政治工作。农业的进一步高涨不会自发到来,如果不改进党组织的工作,仅靠为发展农业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和可能性本身,是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的。因此需要党组织大力加强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决议最后指出:苏共中央全会号召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努力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来完成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任务,同时深信,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苏联人民,在苏共的领导下将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一任务。9月13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项决议。

9月21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畜牧业和降低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所饲养的牲畜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定额》的决议。为改变畜牧业的落后状况,决议提出的具体措施是:1.鼓励私人发展畜牧业。(1)责成各级领导人协助农庄庄员购买牲畜、家禽,并通过按劳动日分配饲料和提供牧场的办法,保证农庄庄员私有牲畜得到饲料,同时责成地方有关部门在国家的空地上、国家林区的土地上、征用铁路和公路的地带以及工人住宅区的土地上,为工人和职员的私有牲畜拨出牧场和刈草场。(2)降低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私人副业现行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定额。(3)凡在1953年6月15日以前没有奶牛的农庄庄员,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全年免除向国家义务交售肉类。自1953年下半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工人、职员、个体农民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羊皮,免除城市居民和工人村居民应义务交售的牛奶。自1953年起免除农庄庄员和其他公民经营副业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乳酪。取消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经营副业在1953年1月1日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的积欠部分。(4)全部免除一些人员向国家交售肉、蜜、毛类和猪皮的义务,其中包括:农村中小学教师所经营的副业,具有专业知识并在农村中的企业、机关和团体里工作的各种农业专门人材和医务人员所经营的副业,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专业技术服务站、国营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站长、场长、副站长、副场长、工程技术人员所经营的副业(上述人员必须为该户户主或该户唯一的劳动力,私有牲畜牧数目又未超过一定限额者,始能享受此待遇)机关、企业和团体派往集体农庄工作的专家 and 实际工作者中被选为农庄主席者所经营的副业,等等。2.关于畜产品收购方法的改变。(1)必须从1954年起严格实行集体农庄按公顷计算的义务交售畜产品的固定定额。(2)提高国家的畜产品收购价格。(3)取消集体农庄在1953年1月及以前历年应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全部畜产品的

积欠部分。此外,还制定了一些措施,以保证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公共畜牧业方面的物质利益。

9月29日 《真理报》刊载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在1953年至1955年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尽快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的产量,以满足城镇居民及加工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从1953年起,提高这两种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其中内容包括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的生产;关于马铃薯和蔬菜作物的栽培和收获工作的机械化,以及关于有1953年——1955年间增加中耕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的生产;关于1953年收获收购和采购马铃薯与蔬菜的国家计划及提高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关于开展马铃薯和蔬菜的集体农庄贸易等问题。决定指出:现行的马铃薯和蔬菜收购价格在生产这些作物方面不能给集体农庄庄员创造必要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劳动日现金报酬和实物报酬都很低,这影响了马铃薯和蔬菜的生产。“在许多省、边区和共和国里,马铃薯和蔬菜作物的播种面积尚没达到战前水平,单位面积产量非常低,许多集体农庄未完成向国家义务交售马铃薯和蔬菜的任务。”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各省党委会、边区党委会、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区党委会以及乡村中党的基层组织,都应把发展马铃薯和蔬菜生产的措施作为极为重要的任务去解决。

10月1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除了现在实行的工作报酬和奖金制度外,拖拉机队的工作人员将自本年10月1日起获得现金报酬,并具体列出了不同地区的劳动日报酬金额。决议的内容还包括关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固定的机务干部,关于加强拖拉机站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关于培养农业方面的机务干部;关于改善对机器拖拉机站的利用;关于加强对集体农庄的农艺和动物饲养技术的帮助;关于农业的物质技术保证等方面的问题。决议强调:“苏

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对于改进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非常重视,特责成苏联农业及农产品收购部、各共和国部长会议、边区执行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省委员会和边区委员会改进对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保证扩大机器拖拉机站在集体农庄生产各部门的工作机械化方面的活动,提高机器拖拉机站的责任感以顺利完成农业当中的主要任务——大大提高所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增加公有牲畜的头数,并大大提高其产品率,增加农业和畜牧业的总产量和商品产量。”

10月19日 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历史学部和语言文学学部举行庆祝苏联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联合科学讨论会。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开幕词中说:“苏联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根除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和以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学思想的企图。党要求铲除在我们科学和宣传工作中占有地位的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作的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铲除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波斯别洛夫在《苏联共产党50周年》的报告中说:“个人迷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相容的、格格不入的,它与集体领导这一原则也是根本对立的。”康斯坦丁诺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报告中说:个人迷信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互不相容的,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反科学的。

10月2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贸易的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是:1.在两三年内,保证在每个城市 and 每个农业区不间断地销售居民所有必需的商品。2.以25%的超额利润作为企业和经济组织的临时补助费,对上缴预算的超额利润可以重新制定计划。

10月2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必须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力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以便生产足够的日用品,并且大量增加这些物品对居民的供应量。

10月3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规定在最近两、三年内要迅速提高肉类和肉制品、鱼类制品、油类、糖、糖果、罐头和其他食品的产量和供应量。

11月19日——12月2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各州、边区和各共和国的报刊主编和农业经济栏负责人会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对一些报刊提出批评。这些报刊“往往把事情说成这样: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全部任务都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好心肠只能给事业带来害处”。他要求“报纸应该尽量尖锐地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问题,激起广大劳动群众开展健康的批评。”

11月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和哲学史教研室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讨论围绕着奥库洛夫的报告《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展开。报告说: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议,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这一决议对劳动支付原则、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原则,以及集体农庄庄员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等原则,都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农业的许多重要部门落后的主观原因时指出,在这些原因中首先是违背了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关于个人利益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一问题应当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全面的研究。”会后,《哲学问题》第6期以《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看苏联哲学

家的任务》为题，发表对这次会议的报道。

12月17日 《真理报》发表文章《用业务熟练的干部加强农业地区的党委会》。文章指出：为了加强各地区的工作，必须更大胆地提拔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要正确地指导干部工作，经常向他们传授领导艺术，及时发现他们的错误并尽快帮助其改正，及时发现和支持重要的首创精神，从各方面支持他们的工作。

12月18日——23日 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原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部长贝利亚等人的刑事案件。法院确认贝利亚的罪状是：1. 背叛祖国，组织一帮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叛国阴谋分子，企图“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瓦解工农苏维埃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2.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即同“外国情报机关建立了秘密联系”。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靠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苏维埃国家活动加紧，以实现其反苏叛国的阴谋。3. 道德败坏，腐化堕落。4. “对忠实于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政治活动家进行恐怖迫害，并在1919年积极破坏巴库工人革命运动”。同时受到审判的还有原国家监察部部长弗·尼·麦尔库洛夫等人。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贝利亚、麦尔库洛夫、弗·德卡诺佐夫、布·柯布洛夫、斯·戈格利泽、帕·麦希克和拉·弗洛齐米尔斯基于23日被枪决。12月2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法院的判决就是人民的判决》的社论，其中指出：贝利亚案件又一次提醒人们，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常运行，党和政府曾采取了各种措施使党组织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包括内务部各机构在内的各级国家机构的工作，并采取措施严格监督苏联立法的执行。

1954 年

1月2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全苏农业拖拉机站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关键在于干部,而且仅仅在于干部。这是提高农业、改进拖拉机站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重要方面是落后的。”针对拖拉机站的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只受过初等教育,他强调“今后的方针是:拖拉机站站长一般都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不少拖拉机站站长不称职,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应当坚决撤换”。他还批评有些人对拖拉机站的意义及其在中央9月全会决议后所负的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那些组织能力强而没受过工程和农学教育的的人,应当送到训练班去学习。

2月11日 苏共中央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发表《告全体选民、男女工人、男女农民、苏维埃知识分子和苏联陆海军人员书》。其中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不倦地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力求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更广泛、更积极地参加管理国家。党已在进行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消除苏维埃机关的某些环节的各种官僚主义的繁文褥礼的表现作风,以纠正对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意见采取漠不关心的轻视的态度,党将不倦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保障苏联宪法所规定的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苏共中央希望共产党和非党联盟候选人被一致选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它号召全体党员,象选举党员候选人为代表一样,一致选举非党候选人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它希望,非党选民象选举非党候选人为代表一样,一致选举党员候选人为代表。

2月12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1954—1958年间进一步发展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植棉业》的决议。决议指出：乌兹别克的籽棉产量在1953年已超过战前水平的70%以上，但是“该共和国中进一步扩大棉花生产的巨大可能性仍然利用得不够”。决议批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国营农场部“对该共和国的水利建设事业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国家在这方面拨出的资金每年都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使用新灌溉土地的计划没有完成，土壤改良工作做得也很不够。”此外“机器拖拉机站在利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棉花收割机利用得非常不能令人满意。”

决议对乌兹别克的植棉业提出具体任务，“在1954——1958年至少将棉花产量增加180万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关于棉花生产、水利事业、农业工作的机械化、国营植棉农场移民、干部培养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2月15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干部问题具有特殊意义。事业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谁在主持农庄和农场。”“我们需要熟悉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干练的内行的干部”。“我们应该努力把有才能的生产组织者、首先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提拔到农庄、拖拉机站和农场的领导岗位上去。但也不能不注意积有丰富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应该让他们到训练班去学习。”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透露：从去年9月全会以来的几个月中，已派出2.1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到农业中去长期工作，还给集体农庄和农场派去了10万多名农艺师。

2月23日——3月2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与熟荒地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地方的党、

苏维埃、农业和收购机关的工作人员，集体农庄主席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时期起，经济建设问题就一直是它的对内政策的中心。”他还说：一般地说，我们的国家已能满足本身对谷物的需要，但谷物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一切需要，除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外，“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开荒，以扩大谷物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批评各地墨守陈规地采用草田轮作制，要求改正这方面的错误，扩大玉米播种面积。3月2日，苏共中央通过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苏共中央1953年9月全会以来苏联农业发展状况；2. 谷物生产的状况和增加谷物生产的任务；3. 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谷物增产的巨大潜力；4. 关于农业计划工作，改变播种面积的分配比例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其中包括扩大小麦、谷物饲料、制米作物和豆菽作物的播种面积，关于进一步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措施，关于谷物的收购和采购。5. 关于增加技术作物的生产和发展果园业及葡萄种植业；6. 关于加强畜牧业的饲料基地；7. 关于进一步发展国营农场和增加它们的盈利；8. 关于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和关于农村的政治工作。决议强调要在1954—1955年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在这两年要使谷物总收获量大大增加，使国家谷物征购量和收购量比1953年增加35%——40%。决议批评了现行农业计划制度“过分集中”，限制了农庄和农场的生产主动性，因此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国营农场与各加盟共和国商议并于两个月内提出改变农业计划制度的建议，提交部长会议审定。决议同时还规定了严格执行按公顷义务交售谷物的原则。

2月26日 苏共中央公布《关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决定》，要求党组织加强在妇女中间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对于她们的业务技术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予以不断的关怀，要求党组织更大胆地把妇

女提拔到党、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

3月5日 《真理报》为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发表题为《斯大林——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的社论。社论指出：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为我们党队伍的统一，为加强党的战斗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们党始终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着自己的统一，不断发展党内民主，严格地遵守久经考验的列宁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培养共产党员成为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的政治战士。

3月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批评了一些把很多精力用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决议和指示上的干部。他说，这些人习惯于坐在会议桌旁和写写决议，但是他们不喜欢而且也不能够和人民密切联系。他们不注意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不深入地分析情况，这些官僚们不通晓业务，但他们却喜欢发布关于各种问题，诸如，如何剪狗毛、如何挤鸡奶的指示。赫鲁晓夫认为“必须坚决地清除这种工作人员。”他还透露，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将采取措施从上到下改进和尽量提高政府的工作。“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培养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精神，必须努力消灭缺点，改进我们的一切工作。”

3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党已经公开表示了对集体领导原则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相信这种意见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实行集体领导原则，是正确而顺利地解决我们当前的切身重要的任务和正确而顺利地解决至关苏联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的必要保证。”

3月19日 苏共中央就苏联共青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发表贺词，其中指出：苏联仍处在由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共青团应该不倦地教育苏联青年具有忘我的为祖国服务和忠实

于党的精神。它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保证共青团员和全体苏联青年更积极参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参加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共青团必须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共青团机关应该坚决地整顿自己的工作，在领导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中铲除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在青年中做更多的具体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3月26日——27日 经济互助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例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主张各成员国搞生产专业化，同苏联的经济计划合作。

3月28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1954——1955年开垦生荒地与熟荒地以扩大谷物生产》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向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的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向这些地区的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一项最重要的国家任务，“即在1954——1955年内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的生荒地和熟荒地以扩大谷物播种面积，在1955年要从这些土地上收获11亿到12亿普特谷物，其中要有8亿到9亿的商品谷物。”决议规定了保证执行苏共中央1954年3月2日全会决议的42条措施。决议强调指出，要胜利地完成所订的开垦新地和在生荒地与熟荒地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计划，将主要有赖于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对这个全民事业的具体的、有效的领导，有赖于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有赖于动员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这一规定的任务。决议同时还号召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开垦新地的工作，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争取大力提高谷物生产，争取全部农作物丰收，争取进一步增加牲畜头数和提高畜牧业的产品率。

3月3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再次降低食品

和制成品的国家零售价格》的通知，这是战后第七次降价。

4月6日 《真理报》发表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关于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农业的成就，为了最迅速地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农业中先进生产者和组织者的先进经验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和实验机构的成就推广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中去，决定自1954年8月1日起，在莫斯科市设立一个常设的全苏农业展览会。决议具体规定了有权参加全苏农业展览会的机构和个人的条件。决议责成苏维埃机关、党组织和农业机关对集体农庄庄员以及机器拖拉机站、专业站、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的工作人员，广泛地宣传参加全苏农业展览的指标和条件，并领导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营林场、机器拖拉机站、专业站、工业企业以及各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同时还要领导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专业站、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农业专家和组织员相互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获得参加全苏农业展览会的权利，并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发展农业的计划而奋斗。

4月1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60寿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及其他一些组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各国共产党纷纷发来贺辞或贺电。

4月2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在1954—1958年间进一步发展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植棉业》的决定。决定对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土尔克明尼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批评，指责他们“没有保证该省所有集体农庄完成其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计划”，使塔沙乌兹省各集体农庄的棉花产量更是特别的低。同时还批评他们对该共和国水利建设、机器拖拉机站的利用、棉花收割机的利用等方面也有很大缺点。鉴于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进一步发展植棉业

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建议“将土尔克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总产量在1955年提高到40.5万吨,并于1958年提高到62.1万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决定》中就兴修水利、农业机械化、化肥、专门人材培养、棉花加工工厂、农业科研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

4月2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了一些国家机关作风不正,它们工作的重心不是如何组织工作,而是草拟大量各式各样的指示、指令和命令以及各种参考材料和表报等,举行许多使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会议。赫鲁晓夫还在报告中指责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及其他地方机构“改组得很慢,其机构仍然庞大,改组的结果是该部的每两个工作人员中就有一个首长。”他要求将部划小,人员不得超过未划分前的原部原有工作人员的数目。他要求各部必须大大减少过分的表报和文件往来,无情地根绝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文牍作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并以数量更少的人员把组织生产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也在会上作报告,其中包括给各部的领导扩权的问题。他说:为了提高政府各部的责任,使各部的工作发挥更大的效能,并保证及时解决经济问题,政府大大的扩大了各部部长、各署署长和部的各总管理处处长的权限。他还批评了个别部门的领导不是采取措施来解决随时产生的问题,而是在搞一些不必要的公文,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必须迅速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在这次会议上,伏罗希洛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5月12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部长会议《关于发展亚麻业和增加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庄员在扩大亚麻和大麻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措施》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亚麻业和大麻业处于不

可容忍的落后状态；纤维用亚麻和大麻的生产事实处于荒芜状态……长纤维亚麻的播种面积都急剧地减少了。许多集体农庄在亚麻和大麻方面的收入很低。工业部门最近几年来对亚麻原料感到极其不足，由于企业开工不足而遭到了亏损，而亚麻织物对居民的供应落后于日益增长的需要”。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机器拖拉机站对现有的亚麻收获机和亚麻加工机的利用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种植亚麻的省、边区和共和国中存在着粗暴地违反纤维亚麻的农业栽培技术的现象；在许多地区没有展开宣传和采用先地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生产纤维用亚麻和大麻的经验的工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增加长纤维亚麻和大麻的生产、亚麻和大麻茎秆工业加工车间和亚麻脱粒车间的建筑、1954 年长纤维亚麻和大麻产品的预购和收购等方面做了具体的安排，要求重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在生产长纤维亚麻和大麻种子方面的物质利益，尽快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这些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及提高商品率的产品质量。

5 月 19 日 《国营农场报》刊载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国营农场部各国营农场以及提高它们的赢利》的决定，决定指出：各国营农场所达到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水平是与国营农场所拥有的、用来进一步迅速提高生产和增加向国家上缴产品的技术装备和巨大潜力不相适应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国营农场部领导不力的结果，是该部对推行先进经验这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结果。”决定还对一些省、边区、共和国和区的党组织及苏维埃组织提出批评，指责它们“没有对领导国营农场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没有对它们的活动进行监督，没有要求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对国营农场的工作情况负责，没有具体帮助国营农场改进工作和派遣干部巩固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对的。”决定的其他内容是：关于增加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关于增加肉类、奶类、羊毛

和其他畜产品的生产,关于国营农场生产的进一步机械化和电气化,关于国营农场建设的措施,关于以熟练的干部来加强国营农场,关于废除国家给予国营农场补助金和实行国营农场农产品新的交售价格等。

6月3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4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饲料的采购的决定》。决定提醒地方的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现在已是采购饲料、进行饲用肉类质直根类作物、青贮饲料作物和其他饲料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的决定性的时候。现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保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全部牲畜饲料的供应,因为这直接关系着畜牧业发展计划和提高牲畜产品率计划的完成。”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责成省、边区和共和国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国营农场部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广泛使用干草收割机,努力完成上述任务。

6月6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1954——1960年间进一步发展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植棉业》的决定。决定中指出,1953年塔吉克的籽棉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的124%。但是,并“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潜力来进一步发展棉花生产,特别是细纤维品种棉花的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土壤改良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机器拖拉机站在利用拖拉机和机器方面有很大缺点”。为进一步发展塔吉克的植棉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决定“在1955年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棉花产量增加到431000吨,1958年——584000吨,1960年——677000吨。为达到这个目标,决定中就棉花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籽棉总产量、兴修水利、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

6月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就第十一届苏联工会代表

大会的召开发出贺电。贺电中指出：苏联工会应经常扩大和加深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根除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提高所有职工的积极性和独立负责的精神。这次代表大会于6月7日至15日举行。会议选举什维尔尼克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索洛维耶夫为副主席。

6月24日 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春播总结、作物田间管理、收获准备和保证完成1954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关于作物田间管理；2. 关于保证牲畜有充足饲料的措施；3. 关于收获工作的准备和进行；4. 关于保证完成国家采购和收购农产品的计划。决议指出：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任务得到了集体农庄庄员、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以及城市居民的热烈支持，并已成为全民的事业，现已有14万多人响应党和政府关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号召，来到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积极参加工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超额完成国家对生荒地和熟荒地播种任务。决议认为，想方设法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加强集体农庄劳动纪律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是顺利地进行作物田间管理、收割干草、收获农作物和采购谷物及其他产品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为了促进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谷物和油料作物的生产，规定1. 自1954年收获时起，降低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和油料的现行定额，并增加按照提高了的收购价格对这些产品进行的国家收购；2. 自1954年收获时起，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副业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3. 勾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体交售者的私人副业在谷物义务交售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实物报酬方面的全部积欠。

6月27日 《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1954年6月全会的公报，公报说：最近几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春播总结、作物田间管理、收获准备和保证完成

1954 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问题。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农业部部长伊·亚·别涅季克托夫、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部长帕·帕·洛巴诺夫、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阿·伊·科兹洛夫、俄罗斯联邦国营农场部部长吉·亚·尤尔金、苏联采购部部长列·罗·科尔涅茨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除原订的开垦 1300 万公顷荒地外，应当再开垦 1500 万公顷。他针对某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人说，“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他认为今后一两年内，要减少中央对非黑土地带各州的技术设备的供应，而把大部分设备送到新垦区是绝对合理的，因为最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就是利用荒地。往那里投资是最有利的，今后粮食的主要来源将是西伯利亚、哈萨克、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而现在的主要产粮区则改种其他收入更多的作物。8 月 13 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谷物生产》的决定。12 月 25 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措施》的决定。

8 月 7 日 《农业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 1955—1960 年间进一步发展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的措施》的决定。决定中指出：1953 年阿塞拜疆的籽棉生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的 50%，蔬菜瓜类作物、果类和葡萄的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的 33.3%。但是，“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充分利用各种可能性来进一步扩大棉花、果类、葡萄、蔬菜和瓜类作物的生产。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在收获庄稼，特别是收获棉花、谷物和蔬菜时损失很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国营农场

部对于农业水利建设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国家对这方面拨出的资金没有充分利用,使用新灌溉土地的计划没有完成,土壤改良工作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在决定中提出了阿塞拜疆在农业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任务”：“在 1955——1960 年内将棉花的生产量增加 188000 吨；在同时提高现有的果园和葡萄园的产量的条件下将果树、胡桃树、葡萄园和桑树的栽培面积扩大 51000 公顷，将蔬菜瓜类作物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扩大 27000 公顷，以充分保证共和国各城市 and 工人住宅区的居民对新鲜蔬菜和瓜类作物的需要。”为实现上述任务，决定中具体规定了关于棉花生产，关于谷物、蔬菜、瓜类作物和马铃薯的生产，关于果园业、葡萄种植业和养蚕业，关于水利事业、农业机械化、国营农场、干部的调动和培养等方面的问题。

8 月 12 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以增加谷物生产》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党和政府关于开垦荒地，增加谷物生产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生荒地和熟地上已建立了 124 个用现代农业机器装备起来的新的的大型谷物国营农场。15 万以上农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农学家积极投入了这一工作。1954 年，“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种了 360 万公顷小麦和其他谷物，而计划只规定 230 万公顷。集体农庄完成了在生荒地和熟荒地上谷物播种计划的 156%，国营农场完成了 176%。”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 1954 年开垦荒地的经验，“号召集体农庄庄员、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地方党组织及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在 1954 年大量地超额完成规定的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任务，以便保证在 1955 年超过原订计划 1300 万公顷至少可以在 1500 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上播种谷物和其他农作物。”希望数以万计的熟练的工人、农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特别是苏联的青年，像在 1954 年春天一样，“热烈响应号召，自愿参加开垦工作”。

8月2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责成国家银行对企业和组织的生产、贸易和积累计划的完成情况，降低成本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它们自己的和借贷的流动资金专用情况，以及对支付制度的情况加强监督；在经常监督的基础上揭露企业和组织的经营和财务活动中的缺点，要求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健全经营和财务工作，向部长提出那些玩忽职守的领导人的问题，要求他们制定出具体措施使这些工作薄弱的企业和组织真正健全起来。2. 必须修改对企业和组织的贷款制度，取消现行的对好的和不好的企业以同样条件给予贷款这种不正确的贷款办法。3. 让国家银行有权对那些没有完成降低成本任务、没有完成积累计划、造成超计划亏损和没有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企业全部或部分地实行一种特殊的结算贷款制度。4. 为了对那些完成规定的积累任务或没有超计划亏损和保持自己的流动资金的工作良好的企业和组织给予临时的财务帮助，国家银行机关可以在贷款方面给它们以优惠。5. 授权国家银行可以提供基建投资计划未规定的机械化和采用新技术所需要的贷款，及时划拨预算交款，规定由企业的结算户和往来户划拨款项的手续。

9月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措施》的决议。苏共中央对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决议说：解决培养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这一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科学院的毕业生不符合在目前条件下党对思想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许多毕业生科学水平不高，不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陷入教条主义和学究习气，没有很好用必要的知识武装起来去反对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

11月11日 苏共中央《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在《真理报》发表，决议指出：有些地方对居民进行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时犯了粗暴的错误。决议责成各级地方党组织坚决消除这些错误,并在今后“绝对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侮辱教会执事的感情以及用行政手段干涉教会活动的事情”。

12月15日——26日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开幕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党政领导人会见苏联作家。在开幕式,苏共中央为大会的召开致祝词。祝词中说:文学应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和从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服务。作家应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不仅要反映新事物且应尽力帮助新事物取得胜利,祝词对“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要求作家应坚决地同离开党和政府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祝词还要求大会要研究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指出苏联文学进一步向新的高峰前进的道路。

1955 年

1月5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对党内“缺乏创造精神，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提出批评。社论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以党组织固有的方法解决经济任务”。“这就要求他们善于把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1月25日——3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首先强调了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马林科夫等人不指名地提出批评。他说：近来一些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它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经宣传过这种观点。”关于发展谷物和畜牧业生产、改进农产品收购工作等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必须使谷物总产量达100亿普特，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及国家必要的粮食储备。他还提出，从今年开始，必须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编制关于播种面积和发展畜牧业的计划，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地，由上级发给每一地区一个种植谷物的计划和一个按照牧畜品种

发展畜牧业的计划的办法，而实行意味着农庄和农场将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为出发点的制定计划的新方法。

1月3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的生产的决议》。这项决议是根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的报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1.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以来的苏联农业发展状况；2. 进一步增加谷物生产是发展畜牧业的决定性条件；3. 关于增加肉类、奶类、蛋类、羊毛及其他畜产品的生产；4. 关于加强饲料基地；5. 关于畜牧业中费力工时劳动的机械化；6. 关于集体农庄畜舍和饲料青储设备的建筑；7. 关于增加国营农场畜产品的生产；8. 关于畜产品的收购；9. 关于改进对农业的领导和农村中党的政治工作。2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这项决议。

决议批评了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国营农场部对自己工作的改组进行得极为缓慢，它们在领导和发展畜牧业的工作中至今还没有摒弃那种已经被党批判的一刀齐的办法，继续用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法进行领导。决议提出：为了完成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任务，不断增进苏联人民的福利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急需在今后几年内大大增加谷物、马铃薯、蔬菜、技术作物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决议规定，到1960—1961年使谷物总产量达到100亿普特，以使用40亿普特谷物发展畜牧业；同1954年比较，到1960年肉、奶、油脂产量应增加1倍，蛋类增加1.2倍，羊毛增加80%。征购量应增加：肉——最少60%，猪——1.8倍，奶——80%，蛋——2倍以上，羊毛——1倍，决议还认为，现行的集中供应畜牧产品的制度有很大的缺点，严重地损害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工作。“到目前为止，集中供应并不是根据某一个共和国的产品生产和收购的水平，也不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生产潜力而实施的，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意味着产品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它是和社会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因此，责成苏联国家计委、农产品收购部、苏联农业部和苏联商业部同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

议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5年7月1日以前将修正供应办法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查。

1月 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第1期发表专论《争取苏联文学思想、艺术水平的新高涨》。专论说：苏共中央致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是“苏联文学进一步高涨的纲领”，将长期决定着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专论提出苏联文学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则为基础，要求更多地塑造普通的劳动者，即“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普通代表”。在文学创作问题上，专论要求各种流派之间展开竞争，应有勇气提出艺术创作问题，反对“毁灭性的批评”。

2月3日——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四届第二次会议。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8日向会议提出解除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书。申请书说：为了加强部长会议的领导，由另一位对领导国家工作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是适当的。还说：“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和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所要负的责任。因为在这以前的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机关的工作以及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在农业方面的工作。”“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下，已经制订出了关于克服农业中的落后状况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的总纲领。这个纲领是以这样一个唯一正确的原则为依据的，即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的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的申请，2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解除格·马·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马林科夫的申请，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日，马林科夫被任命为

苏联电站部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 8 日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月 18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至今有 30% 的集体农庄是由能力不强的人领导的，应该撤换他们。他提出可任用 3 万名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去农庄工作。每人每月 2000 卢布先由国家开支，然后逐步由农庄全部承担下来。他说，“应当调整集体农庄主席的工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物质待遇取决于集体农庄的生产”。他强调经济领导干部应“有工农业方面的高深而专门的知识”，要“善于解决增进人民福利的实际任务”。“对社会的一切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共产主义就是物质资料与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因此，只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不会解决经济任务是不行的。

3 月 11 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计划办法的改变》的决定。决定中对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农产品收购部提出批评，指责他们“在农业计划的实践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过于集中以及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规定了过多的指标，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为了保证使国家有各种农产品，完全不需要从中央布置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各种作物的播种计划，并规定牲畜种类和牲畜头数，这样就不能使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主动精神来更正确、更合理地管理经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强调：“现有的农业计划方法是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它既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集体农庄和庄员的利益”。这种方法是“官僚主义式的、过于庞大的脱离实际生活的”。因此，必须“在集体农庄中实行新的计划方法，其中商品产品量应为计划的出发点。”为此，决定中制订了为实行新的农业计划办法而应采纳的具体措施，同时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

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农产品收购部和苏联中央统计局会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 1955 年 10 月 15 日以前拟出关于按每 100 公顷农业用地计划最重要的农产品和畜产品的方案，以及关于计划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长期的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的方案，并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核。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制订农业计划的新办法可使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善固定给他们的土地的使用，并急剧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

3 月 30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央黑土地带各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各地的集体农庄主席现在已经有权自己编制自己的生产计划了，要充分运用这种权利。“自行编制计划的制度，对于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是争取巩固集体农庄经济的强有力的手段。它能够从单位面积上获得最高产量出发进行安排。”

5 月 21 日 《农业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 1955 年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队队员在增加玉蜀黍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决定。决定的主要的内容是：1. 为了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和拖拉机工作队队员在增加玉蜀黍方面物质利益，建议集体农庄根据全体大会的决定，按劳动日发给集体农庄庄员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队队员以奖金。2. 建议集体农庄根据全体大会的决定，对从事玉蜀黍杂交种子的工作队或小组的集体农庄庄员和拖拉机工作队队员以实物奖金。3. 建议集体农庄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的决定，发给组织和进行栽培、收割和青贮玉蜀黍工作的成员附加工资。4. 对进行栽培、收割和青贮玉蜀黍工作所规定的附加工资，集体农庄应以按规定扣除预付劳动者和用于农庄内部需要后所剩余的玉蜀黍来支付，而不管该集体农庄是否完成了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5. 建议集体农庄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和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的自愿，将本决议第 1 和第 3 条规定应偿付的玉蜀黍和青贮饲料折成其他产品或按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决议规定的现金额支付。

5月27日——6月2日 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和布莱俄尼岛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宣言》的联合公报。公报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具体协议，主要内容是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发展文化关系；互设新闻机构以加强新闻报道；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加强民间往来等。这项联合公报的发表，为恢复苏南两党关系奠定了基础。

7月4日——1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 布尔加宁作《关于进一步提高工业、实现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组织的任务》的报告。2. 关于春播的总结、作物的田间管理、庄稼的收割和保证完成1955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问题。苏联农业部副部长弗·弗·马茨凯维奇、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伊·亚·别涅季克托夫、苏联采购部部长列·罗·科尔涅茨、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部长彼·伊·莫罗佐夫、俄罗斯联邦国营农场部部长吉·亚·尤尔金、俄罗斯联邦采购部代表卡拉什尼科夫就这个问题分别做了报告。3. 赫鲁晓夫作《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会谈结果》报告。4. 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全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这次中央全会增选阿·伊·基里钦科、米·安·苏斯洛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增选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利亚耶夫、德·特·谢皮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7月13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1955年7月全会公报。

7月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春播的总结、作物的田间管理、庄稼的收割和保证完成1955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决议》。决议公布了1955年春播作物的面积比1954年增加了2100万公顷，其中小麦的播种面积增加了1100万公顷，玉米的播种面积达1790万公顷，比去年增加1360万公顷，在生荒地和熟荒地上播种的任务大大超额完

成了。苏共中央在决议中向各地党政机关、农业机关、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很好地进行作物的田间管理，及时地无损失地收割庄稼，提前完成农产品的采购和收购计划，留足种子，充分保证畜牧业的饲料供应，争取在加强集体农庄公有经济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劳动日的现金报酬和实物报酬以及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福利。”

7月11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提高工业、实现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组织的任务的决议》。这项决议是根据布尔加宁在中央7月全会上的报告通过的。布尔加宁在报告中曾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曾企图证明，现阶段似乎已没有必要比较快地发展重工业了，“这种论调是极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企图修改党的总路线。”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关于工业工作的某些总结；2. 争取在工业中进一步实现技术进步；3. 争取扩大工业中的专业化和协作；4. 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的基础上，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新的水平；5. 改进工业管理；6. 改进对工业领导干部和专家的工作；7. 国家计划是每一个部、总局和企业法律；8. 消除全国生产力分布状况中的缺点；9. 提高党对工业的领导水平。决议中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总产值方面的任务，到1955年5月1日就完成了，即以4年零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是苏联人民在争取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我国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迈进中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决议特别强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重工业作为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产资料的生产到1955年年底将比1950年增长84%以上，并将占到苏联全部工业产品的70%以上”。“最近几年工业工作的总结，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的正确。党坚定地执行这条路线，……重工业今后仍然应当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得快些。在我国，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高涨的重工

业的发展水平愈高,我们就能愈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就能愈迅速地制造丰裕的消费品和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7月12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苏南会谈结果的报告的决议》。决议中说:“苏共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所作的关于苏南会谈结果的报告,决定:赞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结果。”1955年7月13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上述决议。

7月12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决定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 批准大会的议程是:(1)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彼·格·莫斯卡托夫;(3)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

信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信中说：他在1955年2月8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就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说法，即“和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苏联一道，还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采取了只是初步的然而十分重要步骤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这种错误的说法导致了不正确的推论，好象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同许多党的文件中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结的历次评价是相违背的。1932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曾指出，苏联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建设，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也指出，苏联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莫洛托夫认为他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4期发表了这封信。在发表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社论《理论同实践的联系和党的宣传工作》，对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社论指出：把早已过去的阶段上所运用的公式和定义搬到现阶段上来，是错误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原理，揭露了个人迷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在政治上的危害性。”“党认为某些领导者的沾沾自喜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他们脱离群众的事实，是不能容忍的。”

1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发表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不点名地提出批评，称他是“可怜的理论家”。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谈到文艺中典型问题时说：“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有意识地

夸张和突出地刻划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认为马林科夫的上述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违背我们党的指示”的繁琐哲学的公式。把典型看成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体现,其结果是会使艺术作品“失去生活的个性的多样性”,会引导艺术家去“图解一般的原理”。此外,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典型形象,“在任何时代都使不同的社会集团的人感到激动。这些形象不仅仅取决于社会本质,而且具有“全人类所共有的特征”。专论还批评把典型归结为政治,是机械地在文艺艺术搬用列宁关于哲学中党性的论述,因为文艺中“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的主观意义跟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同情心”,有时“是矛盾的”。此外,专论还批评关于艺术形象的夸张问题,认为这样将会“助长一些粉饰现实的作品出现”。

1956 年

1 月 21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苏联共青团和青年优秀垦荒者会议,并代表苏共中央发表讲话,赫鲁晓夫说:“党和政府提出的开荒地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是完成了。开垦出来的大地不是我们在号召的时候所说的 1300 万公顷,而是比它多得多。现在,在垦荒地区已经开垦了 3000 万公顷土地,而在全中国共开垦了 3300 万公顷土地。”赫鲁晓夫在谈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他说:“发展重工业是我们国家的基础。它使我们可以创造机器,保证农业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和肥料,使我们能够发展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

1 月 30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生产量及收购量》的决议,从 1956 年起,提高马铃薯和蔬菜的收购价格,其中蔬菜提高 70%。

2 月 14 日——25 日 苏共举行第 20 次代表大会。1349 名正式代表和 81 名列席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 7215505 名党员,55 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列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总结报告;莫斯卡托夫代表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作总结报告;阿里斯托夫作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布尔加宁作苏共二十大关于 1956——196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作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2. 苏联的国内状况;3. 党。报告中指出:列宁的关于社会制度不同国家

的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目前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面临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没有其他出路;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社会主义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空前增长,已经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的轻举妄动,因此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由于形势的发展,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使议会成为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权。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应该加强同社会党的团结和合作。关于国内经济建设问题,赫鲁晓夫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党的总路线。发展工业头等重要的任务是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他批评了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认为“整顿劳动报酬制度是我们目前一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我们必须彻底实行对工作人员个人的物质鼓励原则”,这是使生产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党的工作,赫鲁晓夫强调评价党的负责人的工作,首先要看他负责的那个经济单位发展的成绩如何。没有能力领导发展经济的干部应该及时撤换,“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若不同改进生产的任务联系起来,就等于白做。”他还强调“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大会选出 133 名中央委员和 122 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还选举了由 63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2 月 16 日 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时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目前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原则性问题,如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同

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都是有重大意义的。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具体的范例。关于党的组织工作，苏斯洛夫说：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个人崇拜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前得到了传播，这给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种理论和实践缩小了人民群众和党的作用，减弱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党内民主，压制了党员的积极性、首创性和主动性，造成放任自流、不负责任，甚至造成个别人员工作中的专横独断，阻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产生了片面的、有时是错误的解决问题的现象。……必须力求完全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害理论和实践，并且在所有党的机关的工作中严格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党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应当彻底了解集体领导原则的意义，这是党的统一、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胜利地实现这些政策、正确地培养干部和进一步提高整个党的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发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他说：“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的主要特征，就是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

“我们党现在有坚强团结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是由那些在革命斗争中长期一同工作的同志组成的，这当然很重要，但主要的是在于，这个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的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的党内生活的准则。

“集体领导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我之所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斥责过的个人崇拜，这当然不能不对党内状况和党的工作发生极不良的影响。现在，当最近3年

来在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共产党的集体领导的时候,就体会到列宁的领导方法的一切好处,最近几年来赋予我们党以新的力量的主要源泉也就在这里。”

米高扬还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批评。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后,‘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这一大家知道的论点,在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时候,对我们未必有所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这些论点并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的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以及战后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事实。”

2月2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作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2. 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3. 为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经营而斗争;4. 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 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配置。布尔加宁在报告中提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地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布尔加宁在报告中强调,苏联在绝对产量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方面现阶段的特征还在于,和战前时期不同,现在的国家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来解决这一任务,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单独地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竞赛,而是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在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

2月24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部分修改苏联共产党党章的决议》,决议从7处对苏共党章作了修改。其中规定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

4个月举行一次,而党的专区委员会、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3个月举行一次。考虑到地方党组织的希望,规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边区、省、专区和有一级建制的市的党代表会议每2年召集一次。有省一级建制的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可以每4年召集一次。鉴于党委书记的人数可以根据具体工作条件加以变动,因此认为继续保存党章中关于党委书记人数的规定是不恰当的。规定党委书记人数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

2月24日夜——25日晨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一次秘密全体会议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的内容没有预先提交主席团批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们此刻要说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即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到某一特殊阶段竟成为一系列极其严重地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赫鲁晓夫还说:我们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方面,无论在实际工作方面,都要做适当的结论。

第一,布尔什维克式地斥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个人崇拜在任何形式下的复活。……因此,我们面前摆着巨大的工作,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因个人崇拜而广泛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

第二,一贯地坚决地继续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来所进行的工作,即在一切党组织中从上到下地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最高原则——集体领导,遵守我们党的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的列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一切乱用职权的人们的专横行为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的恶果所造成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具体说明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的情况。他说:“已经查明,第17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决(大部分于1937至1938年)。”遭到同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有第17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即1108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第17次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犯有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荒唐、野蛮和违反常识。”赫鲁晓夫说:“采取大规模镇压完全不是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结果给党造成了重大的干部损失。……从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在死后恢复名誉的。”

2月25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草拟苏共新党纲》的决议。决议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在我党的历史经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且考虑到在编制中的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苏联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远景计划,草拟苏联共产党的党纲草案。

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之前,预先公布党纲草案,以便继续进行广泛的讨论。

同日,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主要内容有工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农业;运输和邮电事业;基本建设和建筑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各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配置。关于“六五计划”的指示中提出：“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从上述基本任务出发，规定5年内工业产量增加65%左右。其中第一部类生产大约增加70%，第二部类生产大约增加60%。在农业方面，1960年谷物总收获量必须达到18000万吨（110亿普特）。在“六五期间”将大大发展国营农场的农产品生产，1960年国营农场和副业企业必须向国家缴纳91500万普特谷物、150万吨肉类、680万吨牛奶、79200吨羊毛和20亿个蛋。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成增加生产的任务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决定性条件。为此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劳动生产率至少应提高50%；国营农场和国营农业副业企业方面，应提高约70%；铁路运输方面提高34%；海上运输方面提高40%；内河运输方面提高35%。指示最后强调：必须根据本指示在最短期间内按部、主管机关、加盟共和国和经济区拟定1956——1960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能在1956年贯彻到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建筑工地，这将有助于发挥群众实现五年计划的创造积极性，有助于发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内部潜力和对计划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

2月27日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选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有：尼·亚·布尔加宁、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阿·伊·基里钦科、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米·格·别尔乌辛、马·扎·萨布罗夫、米·安·苏斯洛夫、尼·谢·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有：格·康·朱可夫、勒·伊·勃列日

涅夫、努·阿·穆希金诺夫、德·特·谢皮洛夫、叶·阿·福尔采娃、尼·米·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里亚耶夫、勒·伊·勃列日涅夫、彼·尼·波斯伯洛夫、米·安·苏斯洛夫、叶·阿·福尔采娃、德·特·谢皮洛夫。这次中央全会还选出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和普·特·科马罗夫任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普·格·莫斯卡托夫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3月6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以下决议：1. 由于集体农庄经济的发展，1935年制定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已不适当当前的情况，往往还限制了农庄在建立最符合集体农庄工作具体条件的新的制度方面的主动性。因此，建议各地集体农庄自行补充和修改《章程》的个别条款。2. 按月预付一部分现金报酬，同时改变过去各地实行的按同一标准付给超额完成计划附加报酬的制度，实行只给优秀工作者奖励附加报酬的制度，以加强对劳动的物质刺激。

3月28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评论《为什么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文章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文章写道：斯大林缺乏个人的谦虚，他不仅不阻止那些对他的讴歌和颂扬，反而竭力加以支持和鼓励。说这种个人崇拜日益畸形地发展，给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评论指出：个人崇拜促使在领导党和经济的工作中流行一种恶劣的方法——单纯的命令主义，造成轻视来自下面的主动性的作风。文章还写道：从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消除和克服这种个人崇拜的极有害的残余，是党和一切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要彻底排除个人崇拜以某种形式复活的可能性。

4月11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全苏青年建筑人员会议，并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在会上说：“我们今后在实现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方面，在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方面，还要做很

多事情。现在,甚至我们的死敌也不再怀疑,苏联人民将成功地完成已经拟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我们执行同资本主义实行经济竞赛的方针,这使他们惊慌不安。他们害怕这种竞赛。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们说:你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发展个人主动性,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我们不想强迫你们接受我们的制度,但是我们也不允许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因此,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和平竞赛。”

4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社论说: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将随着我们成就的扩大而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断,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状况的。而党所认为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苏联形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的理论才正确地反映了苏联的实际情况。社论指出:斯大林完全没有考虑到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转向了国际舞台。

同期还刊登了署名文章《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群众、党和领导人》。文章说:“斯大林在战火还在欧洲燃烧、希特勒德国显然准备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防御能力”。

5月13日 苏共候补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逝世,苏共中央发表讣告,说他“因酒精中毒,在精神抑郁中自杀而亡”。法捷耶夫于1918年入党。1921年出席苏共第十次党代会。在第十八、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39年和1951年两次获列宁勋章。

5月17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研究增加肉类生产和收购问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增加肉类生产和收购的任务是目前最迫切而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居民的牛奶和乳制品的供应状况正在好转,那么肉类和肉制品的供应状况还远不能令人完全满

意。”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应采取的方针是：“逐步做到不再向个体交售者收购肉类和牛奶，而把整个担子放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身上，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并且可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我国的社会主义大经济比个体经济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一再强迫集体农庄庄员发展自己的个体经济，一再要求他们向国家交售畜产品，这终究不是个办法。应该首先发展并且主要发展公共经济。”

6月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决议，决定把苏联许多部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加盟共和国管理，以加强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的作用，并更有效地管理企业。在此之前，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在5月30日通过了撤销全联盟司法部，把它在领导加盟共和国审判和司法机构工作方面的职责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司法部的决定。

6月19日 莫斯科举行苏南友好群众大会欢迎南斯拉夫总统、南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铁托访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去年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来改善在1948年遭到破坏的苏南关系。我们在这方面表现了主动性，为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恢复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曾经访问了南斯拉夫，我们要恢复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兄弟友谊的真诚愿望，得到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发展苏南友好合作，在加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友好的。”

6月20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铁托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宣言》。宣言强调：“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

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友好批评以及就两党的争执问题进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为基础。”宣言还指出:苏共和南共联盟的合作,是他们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接触的组成部分。

6月30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7月2日《真理报》全文刊登。决议说:党和政府“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以异常的果断和决心来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斯大林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实现列宁遗训而积极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的一切伟大胜利从此都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不,开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决议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在1937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2.斯大林在晚年以个人监督代替了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的监督。往往以个人决定代替司法准则,造成“对苏维埃法制的严重破坏”和“大规模的镇压”,使“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苏联人遭到诬告,无辜受难”。3.个人崇拜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在内外政策方面都有严重后果,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如“他的粗暴专横行为造成了”战后苏南的冲突。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妨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4.斯大林把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在一个时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局限在后来“变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粗暴地践踏了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他“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

7月2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哈萨克农业工作

者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谴责了个人崇拜,并且采取了消除其后果的措施。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建立起了集体领导。苏联的领导人集体是党和人民选出来的。人民选举了他们,人民在监督着他们,他们要向人民汇报工作,他们所享受的权利是同全体苏联人一样的。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7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0期发表文章《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文章对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提出批评。文章说: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积极保卫自己的基础的公式“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对对抗性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的理解,使它成了一个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的体系”。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的著作就试图把社会思想史、艺术史中的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文章认为,“在任何对抗性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上层建筑不仅以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的形态出现,而且以人们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社会生活中所有问题的观点的体系的形态出现,以表现在这些观点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态出现。”文章还认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部著作中所规定的关于“消灭旧的上层建筑”的公式,并没有阐明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新的更替旧的上层建筑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而且这一公式会促使否认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的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和理论复活”。

8月31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新版〈列宁传〉》的决议和《关于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通俗教材》的决议。决议中说:第二版《列宁传》中表现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对列宁的某些重要的纲领性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战略和策略、民族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阐述得不够,“书中没有充分表明作为人的列宁的特点。”决议要求《列宁传》在彻底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起重要作用。在新版的《列宁传》中要阐述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等等。

8月 《共产党人》第12期发表署名文章《深刻地研究苏联文学史》，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严重危害。文章的主要内容是：1. 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艺术性极低，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判断一个作品“不是根据作品的生命力，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斯大林的言论”；2. “个人崇拜”对阐明和研究苏联文学的方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简单地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生这一点上，而且由于文学中充满了与个人崇拜有关的‘歌功颂德的情绪’，出现了‘无冲突论’等错误论点。3. 要求为叶赛宁、巴格里茨基等人恢复“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认为过去对他们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强调“不根除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人云亦云的作风和教条主义，就不能把文艺学推向前进”。4. 描写斯大林形象的作品“违反历史的真实”，要求“必须坚决地消除近几年出版的苏联文学史著作中所存在的歌功颂德和粉饰现实等缺点”。

9月8日 《文学报》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给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方面最优秀的工作者颁发列宁奖金的决定。1925年6月23日设立的列宁奖金，用以奖给科技、文学艺术、报刊杂志、政论方面最优秀的成果，但最初只授予科学论著。1953年以后停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恢复该项奖金，并用以奖给科学、技术和生产方面的最优秀的工作者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最优秀的作品。《文学报》同时还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将国际斯大林奖金改为“为巩固世界和平”的国际列宁奖金。

10月16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的决议。决议提出：在纪念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广播、报告、讲演中，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指出他在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在反对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分子、新康德主义者、庸俗唯物主义者等——的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同时必须说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

义,他在1905年至1907年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特别是1917年政治上的变节。”决议认为,普列汉诺夫活动的弱点是不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纪念普列汉诺夫诞辰100周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2月出版了5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苏联外文出版社用多种文学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许多报刊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了列宁致普列汉诺夫的未发表过的书信。

11月4日 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并向匈牙利人民发出号召书:“我们应当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横行霸道!行动的钟声敲响了!我们要捍卫工农政权和人民民主的成果。要在我国建立秩序、安全和安宁。”同日,苏军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进入布达佩斯。苏联的武力援助是根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提供的。

11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纪念十月革命39周年的报告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他在指出苏维埃民主原则的实践中存在缺点的同时,强调今后必须不断地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必须使苏维埃的工作建立在全体代表积极参加以及他们同选民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必须坚决无情地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为进一步发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为使工人、工程师和职员更加有效地直接管理企业和经济组织的工作,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

11月8日 莫斯科举行庆祝共青团荣获列宁勋章大会。赫鲁晓夫受苏共中央委托到会发表讲话。他说:三年前,党采取提高农业的有力措施,动员苏联人民去解决粮食问题,以及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已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我们已开垦3550万公顷新土地,我认为在今后两年内,还至少可以再开垦500万公顷。由于开垦生荒地,粮食生产急剧增加,到11月5日已收购粮食32.81亿普特。对于最近的

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说：“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匈牙利反革命的被粉碎，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其破坏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的阴谋中，把希望特别寄托在青年身上，企图用虚伪的号召来欺骗青年，使青年脱离正确的道路。因此，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多注意对青年的正确教育。”

11月17日 赫鲁晓夫在招待波兰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关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围绕着匈牙利问题大叫大嚷。匈牙利国内和国际的反动派利用匈牙利发生的错误和困难，企图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在那里建立霍尔蒂的法西斯政权。反革命匪帮在国内实行血腥恐怖政策，对工人、共产党员、社会政治活动家，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保卫者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向苏军指挥部请求帮助。经过共同的努力，匈牙利的反革命被粉碎了。现在匈牙利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无疑匈牙利人民在克服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后，将会顺利地负起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任务。”

11月1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联合声明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了过去几年双方还没有清理的若干财政帐目。苏联政府同意给波兰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同时1957年以赊卖的方式向波提供140万吨谷物。关于苏军暂驻波兰领土问题，“双方将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磋商苏军驻留波兰境内及其人数的编制的问题”，同时还明确：驻扎在波境内的苏军不得触犯波兰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波兰内政，必须遵守波兰的法律，如有到其驻地以外的调动，需经波兰政府及波兰其他有关政权机关的同意。联合声明还表示，“苏联有关机关将协助进一步遣返家在波兰的波兰人，帮助那些由于不取决于他们的原因而未能享受1945年苏波协定所规定的遣返权的人返回波

兰。”

赫鲁晓夫出席波兰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如果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困难，或者将来不会有困难，那是不对的。”“既然谈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道路上的困难，我想说说匈牙利，那里在不久前曾组织了反对人民的反革命阴谋。反革命分子企图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领导的错误而产生的困难。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些错误把群众吸引到他们方面去，造成了使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切成果受到威胁的危险局面。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请求我们帮助镇压猖狂的反革命，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不得不给予这种帮助。我们相信，匈牙利人民会了解到匈牙利叛乱组织者的真正目的。我们深信，匈牙利的反革命将被彻底粉碎，匈牙利工人阶级将获得胜利”。

12月20日——2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 尼·康·巴伊巴科夫和马·查·萨布罗夫《关于完成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以及关于确定1956——1960年的控制数字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方针》的报告。2. 尼·亚·布尔加宁《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报告。会议就以上讨论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在《关于完成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以及关于确定1956——1960年的控制数字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方针的决议》中，苏共中央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部委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由于他们工作不力致使煤炭、金属、水泥、木材、住房建筑在1956年都没能完成计划。苏共中央要求在1957年上半年把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批。在完成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时，“应当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五年计划主要任务为依据……在解决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按人口计算的产

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前进一大步。”

在《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中，苏共中央指出：“在国家计划工作中，首先是在当前的计划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各部对各个生产部门的情况研究得不够，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同企业和科学机关的联系很差，在编制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物资技术供应计划中有严重的疏忽和错误，没有很好地担当起检查国家计划执行情况的职责。”苏共中央决定从六个方面改变上述状况，主要内容是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进苏联国家经委制定当前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消除在经济领导方面的过分集中，精简管理机关；采取组织措施彻底改进各部和主管机关对企业供应物资和技术设备的工作；经济工作干部和生产领导者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顽强地掌握技术知识，扩大经济眼界，改进管理生产的办法；提高工会在企业生产、工资、改进企业安全技术和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等问题中的作用；改进企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提拔优秀干部。

由于德·特·谢皮洛夫已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全会决定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2月 苏共中央决定出版 55 卷本《列宁全集》，以代替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一版和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四版。

1957 年

1月12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从5月份起出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刊物《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其基本任务是探讨苏共党史问题,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党的历史问题。

1月1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中国驻苏大使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在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的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甚至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的悲剧也就在这里”。他还说:“共产主义的敌人企图抓住我们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利用这种批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企图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引向反对我们制度的基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2月1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莫斯科州农业先进工作者集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赞扬了1956年曾访苏的美国农场主加斯特后说: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精通自己那一行”。“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学习,吸取一切适合于我们的东西”,并不丢人。他强调“必须坚决地面向经济”,“要学算帐,学会合理经营,要做到有盈利。”

12月13日——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全会选举弗·罗·科兹洛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选举德·特·谢皮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必须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各个环节上改进管理组织的形式,以便使这种形式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国民经济任务和要求。为此,必须放弃工业领导方面的某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以便避免进一步分散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采取能够充分地考虑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特点的更灵活的管理国民经济问题的形式,同时要改组经济管理,使经济建设领导形式能把地方上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同严格遵守全国范围内集中的计划原则充分地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通过各专业部的主管机关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新的分区管理的形式”,即取消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共和国部而在工业发达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它们变成“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

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苏共中央全会决定:

一、认为有必要实行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措施,使工业和建筑业适应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国民经济的任务和要求,使领导接近经济区,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权力,提高地方党政机关以及工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更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生产管理。

考虑到现行的通过专业化的部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形式造成了各机关之间的隔阂,从而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巨大潜力的充分利用,而且不能保证对企业和建筑工地进行具体的有效的领导,因此应当制定新的领导经济建设的形式来代替原来的形式,在新形式下,按经济

495

区实行具体有效的领导将同在全国范围内严格遵守集中的计划原则更充分地结合起来。

二、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拟定按照上述方针改组工业和建筑业领导的具体建议。考虑到这一问题具有巨大的国家意义,应将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查。

2月16日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举行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批评库尔斯克州雷耳斯克区“把五个村庄合并起来”后,“竟让一位文化修养不够的主席来领导”。他说,“固然,据(州委书记)叶弗列莫夫同志说,这位主席人还不错。但是,评价一个工作人员要有尺度。他人不错,然而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他只上过三年学”。交给这个文化修养不够的农庄主席经营5000公顷耕地,可是他的能力和知识却只配经营1000公顷。要区别对待每个人,要他量力而为,这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必须量材使用。

2月1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为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苏共谴责了同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错误和不正常现象。这样做是出自原则上的考虑,也是列宁早就坚决批评过的。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他忠于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苏共决不把他看成是敌人。

3月8日 赫鲁晓夫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3月12日在罗斯托夫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两次讲话都重点谈到了工资问题,他说:必须让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根据所生产的产品取得工资,必须让工资制度刺激他们的工作,必须让你们,国营农场场长同志们,不是靠压低计划,而是靠进一步钻研业务、妥善地组织工作来得到高额薪金和奖金。“现行的报酬制度无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制度已经过时了”,“要定出一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计酬的报酬制度。”他还提出“定出一种中等或最

低工资,然后再根据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定出奖励工资。实行这种制度,工作用心的人就会得到好的报酬,工作不好的人就要倒霉。这种制度可以推动领导人进行集体经营”。“今后应该根据每百公顷农业用地所得的产品”来计算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国营农场场长的工资。“一句话,要给工作不好的人配钥匙上锁,让他们得不到不应得的东西。同时……给予工作好的人以高额报酬和荣誉。”

3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认为该杂志“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1. 某些社论和文章,如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样的问题上,抹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美化孟什维克在1905—1907年革命中的作用。2. 有些文章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力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的作用,客观主义地解释党的政治、思想斗争问题。3. 有些文章实质上削弱同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4. 取消了对南斯拉夫报刊上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的批评。6月中旬,《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布鲁日阿洛夫和其9名工作人员被免职。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7月上旬,《历史问题》第3期发表社论说:“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党和人民的政策和活动相提并论,这是重大的错误。这种解释只会使人低估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社论还说:“杂志编辑部在阐述一些重要问题时,犯了严重的方法上的错误,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陷到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编辑部人员错误地理解二十大在思想工作方面所提出的任务。二十大提出和平共处的可能,但某些杂志工作人员却把这一方针理解成可以‘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敌人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和平共处。”

4月3日 赫鲁晓夫在中央黑土地带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认为,对区一级工作人员,包括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内,

应当规定奖金制度,即肉类和牛奶产量达到一定指标就可以获奖。”某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似乎党的工作者不该奖励,好象这是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这是错误的。“对苏联人,包括党的工作者在内,实行物质鼓励并不违背我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仅如此,物质鼓励,这还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新社会的理论中得出来的。”

4月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高尔基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讲到公债问题。他说:苏联人民认购公债2600亿卢布(合新币260亿卢布)。国家每年要拿出160—180亿卢布(合新币16—18亿卢布)来还本付息。“如果公债继续发行下去,那么到1967年,国家每年就要拿出250亿卢布(合新币25亿卢布)来偿还公债”。因此国家准备停止发行公债,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国家必须向人民偿还早先发行的2600亿卢布(合新币260亿卢布)公债,并且还要拿出价值相等的商品来,“如果还这样,物价就要上涨”,“生活费就会有上涨的巨大危险”。因此,国家准备从1958年起,除利率3厘的自由流通公债外,停止发行公债。但同时也要停止支付早先发行的公债本息,把公债偿还期暂缓20至25年。

4月1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起停止发行公债,利率3厘的自由流通国内有奖公债除外,但1957年还需发行一次总额为120亿卢布(合新币12亿卢布)的公债,而且立即停止进行过去发行的国家公债抽签发奖工作,将这些公债的还本日期延长20年,即自1977年开始分20年平均付还。

4月22日 莫斯科举行纪念列宁诞辰87周年大会,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在会上作报告,她说:“现在以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幌子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中心论点,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宣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即行消亡,而不考虑帝国主义阵营的存在”。“不久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工

人阶级专政稍有一点削弱,就会被国际反动派唆使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用来反对人民政权。这是对一切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历史经验而指望不要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警告。”“否认或贬低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的企图,正是陈旧的、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谴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说法的复活”。

4月2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缩短黑色冶金工业企业工作日和调整这些企业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人工资》的决议,主要内容是:从1957年起,地下采矿工人(清理工和掘进工)实行6小时工作制,其余地下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露天采矿人员实行7小时工作制;调整和提高他们的工资,以提高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对生产成果的关心,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

5月14日 苏共中央书记谢皮洛夫出席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三次全会。会上宣读了作协理事会书记处的集体报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报告说:“斯大林在巩固我国文学的社会主义精神的事业上起过巨大作用,然而,个人崇拜对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特别在战后年代,是无可怀疑的。”但报告又强调,不应夸大个人崇拜的有害影响。40余名作家在会上发言,强调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要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认为不能指责写正面人物的作品是“粉饰现实”,要求对国内外的错误言论进行批驳。会上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作协理事会的报告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文章,只谈人们共知的道理”。会议结束后,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见一些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讲了话。

5月22日 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在列宁格勒市举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取消集体农庄农户义务交售产品问题,他说:早在1953年

就已作出关于减低集体农庄的农户的农产品交售定额的决议。同1953年相比,集体农庄的农户义务交售的肉类已从40——60公斤降为30公斤,每头奶牛牛奶交售量从平均223公斤降为101公升,鸡蛋、羊毛、马铃薯交售定额几乎减少了50%。现在,集体农庄的农户交售的农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其中肉类、牛奶、羊毛、鸡蛋、马铃薯分别占10.2%、7.1%、2.6%、18.5%、15.9%。“因此,产生了一个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考虑的问题:国家停止收购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他说:停止向集体农庄农户收购产品可以在农村造成良好的政治气氛。“集体农庄庄员的负担减轻了,但是必须使集体农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集体农庄农户免纳的那一部分产品承担起来”。赫鲁晓夫还说:取消义务交售之后,庄员将把自产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大家知道,在算术中,几个相加数的位置变更,其和不变,东西总会出现在市场上。”

5月2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因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而精简的管理人员的工作安置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应合理分配各种专业人员到有关生产企业;对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短期训练,训练期间保留不超过1000卢布(合新币100卢布)的工资;对一切被精简而重新安置工作的人员发给一次补助金;重新安置工作的间歇时间不超过3个月者得以计算连续工龄。

6月7日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波伊佐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说:二十大关于恢复由于过去流行的个人崇拜而被破坏了的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指示对党的一切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对审理过去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向二十大提出的申诉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些前党员认为过去就他们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苏共州委会受权可以恢复被开除的人的党籍,而

不管过去是哪一级党机关作出开除出党的决定的。”波伊佐夫说：二十大以后提出申诉的前党员有一半以上被恢复了党籍。他还说，过去的一些反列宁集团的成员也提出了申诉，党的有关机构最近时期也在研究他们的申诉。

6月14日——22日 苏共中央召开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和研究》的报告。他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20年来，科学研究工作多半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的解释。对于党史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苏维埃时期（包括从1938年到现今这个充满了极其重要的事件的时期）党史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很少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个人崇拜所起的束缚的影响对于苏共党史研究工作起了特别不好的作用。”还指责政治经济学、哲学教学工作中同样没有根除“教条主义和学究气”，另一方面，他批评有些教员在反对个人崇拜时又违反了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有些高等院校在反对个人崇拜时，把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原则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忘记了。

6月22日——29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撤销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解除了谢皮洛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的资格（7月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的职务、卡冈诺维奇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监察部部长的职务）。

全会选出由下列人员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委员：阿·鲍·阿里斯托夫、尼·伊·别利亚耶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尼·亚

·布尔加宁、克·叶·伏罗希洛夫、格·康·朱可夫、尼·格·伊格纳托夫、阿·伊·基里钦科、弗·罗·科兹洛夫、奥·维·库西宁、阿·伊·米高扬、米·安·苏斯洛夫、叶·阿·福尔采娃、尼·谢·赫鲁晓夫、尼·米·什维尔尼克。主席团候补委员：努·阿·穆希金诺夫、彼·尼·波斯伯洛夫、杰·谢·科罗特钦科、扬·埃·卡恩别尔津、安·帕·基里连科、阿·尼·柯西全、基·特·马祖罗夫、瓦·帕·姆日阿瓦纳泽、米·格·别尔乌辛。

全会补充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选出奥·维·库西宁为中央书记。

6月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一致通过，莫洛托夫弃权。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反对党的路线的派别活动。”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集团使用反党的派别活动的方法，力图更动苏共中央全会选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决议认为反党集团：1. “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边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2. “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反对“党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精简庞大的国家机构而采取的措施”，“反对民主集中制”。3. “顽固反对并且力图破坏改组工业管理和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的措施。4. “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他们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度，反对采取一种足以发挥集体农庄在经营经济方面的主动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反对在今年年底废除征购在集体农民个人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反对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

产量赶上美国的号召,莫洛托夫“反对开垦 3500 万公顷的生荒地”。5. 反对“为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为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为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6. “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表现了墨守成规,并且多方阻挠执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普遍和平的迫切的新措施。”决议具体地列举了莫洛托夫“一再出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阻挠同奥地利的国家条约的缔结”、“一再反对苏联政府为了保卫和平和各国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的步骤”等方面的问题。

决议指出:“面对着中央全会对这一集团的反党活动的一致谴责,又处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委员一致要求撤销这一集团成员的中央委员资格和把他们开除出党的情况下,他们承认了存在着共谋,承认了自己的反党活动的危害性,并且保证服从党的决议。”

7月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庄员、各种合作社社员、工人和职员私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7月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电力工厂职工大会发表讲话。除重申中央六月全会决议的内容外,还指出“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千方百计地阻挠实施有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措施。他们最欣赏的是‘拧紧所有的螺丝钉’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违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英明政策的”。他说:“他们哪里还懂得列宁主义的实质!他们习惯于一套旧观念和旧方法,对新的条件顽固地熟视无睹,死死抓住一套过时的、不符合于我国向前发展的利益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他们在内外政策问题上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以死气沉沉的的书呆子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强调,清除这个反党集团有利于顺利地实现二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因为千方百

计地企图阻挠实现这些决议的势力被清除了。”

7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0期发表专论《在文学艺术问题上维护列宁的原则性》。专论说,对一部分文艺界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的不健康倾向应该负责任的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宗派主义分子谢皮洛夫”,因为“他离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文学艺术问题所规定的路线,采取了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在公开言论中,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不健康倾向表现了妥协态度”,“向无政府主义分子让步”。专论还说,谢皮洛夫对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决议的煽动分子,“根本没有驳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企图贬低和损害苏共中央1957年5月同作家举行的会议以及党政领导人接见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意义。

8月28日 《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5月13日在苏共中央召集的作家会议上,5月19日在作家、美术家、作曲家招待会上,7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的摘要汇编,题为《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赫鲁晓夫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过时的、旧的东西应当加以粉碎。我们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生活,我们必须前进。”思想战线中也有“老顽固”、“墨守成规”、“脱离生活”的人。这些人,“是陈腐观念的俘虏是书本上的公式、教条和定理的俘虏”。“应当承认,书本上的繁琐哲学的观念是相当顽强的。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常常感到有这些东西,抱有这些观点的人害怕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大声叫喊和喧嚷,他们惊慌失措,失去了冷静分析情况的能力,没有能力理解必须实现社会发展过程所要求采取的措施。”2.批评“斯大林在晚年时,理论脱离了实践”。“在中央,没有谁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实情况”,农业中“物质利益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对斯大林个人的不客观的片面的描绘”。同时指出“革些同志片面地和不正确地理解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的实质,他

们企图把这个批评说成是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笼统的否定”，他们“怀着成见，只寻找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史上的阴暗面和错误，而忽略了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3. 批评“在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有时候丧失立场”，“他们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仿佛文学艺术的使命只是寻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则闭口不谈”。4. 强调党员作家和艺术家要按照党章党纪行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反革命为了自己的卑劣目的利用了某些作家，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党坚决地谴责并且正彻底纠正个人崇拜时期在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在思想工作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党同时也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利用过去的这些缺点来反对党和国家领导文学艺术的人。”

9月9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火〉杂志内容的严重缺点》的决议。决议指出《星火》主编索弗朗诺夫“犯有严重错误”，批评该杂志不积极阐述党和政府的重大经济文化任务，尤其是不阐述中央全会关于工农业问题的决议，不充分反映苏联人民为实现这些决议所进行的劳动，而用过多的篇幅刊登“游记与国外旅行特写，以及象奥瓦洛夫的侦探小说《铜钮扣》之类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批评编辑部人员自己撰写大部分稿件以追求高额稿酬。苏共中央指出《星火》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阐述我们国内的生活与重大的国际事件”，发表的材料在政治上应是尖锐的、迫切的，要以鲜明而吸引人的形式反映共产党的国内外政策的成就”。

10月21日——25日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学术会议。学院院士道罗舍夫致开幕词后，在学术委员会大会上，听取了两个报告：基姆作《十月革命的一般历史特点与民族特点》，茹科夫作《伟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该院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会议上，加克作报告《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与现代历史发展时期》。在哲学史教研室会议上，奥库洛夫作报告《苏联哲学 40 年》，敦尼克作报告《苏维埃政权时期苏联哲学史的研究》。

10 月 29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撤销了格·康·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在此之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 10 月 26 日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国防部部长，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苏共中央《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指出：进一步改善苏共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对解决苏军面临的任務有特別重要的意义。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使命是：“加强我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把全体军人团结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以无限忠于苏维埃祖国的精神，以苏联各民族友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军人。然而，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时还公然表现出对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估计不足。”决议指出：“前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党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列宁主义原则，他所执行的路线是收缩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对于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中央全会查明，在格·康·朱可夫同志的亲自参加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的个人迷信，……过分地夸大他个人和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狂妄地以为他是我国人民和我国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的唯一英雄。”朱可夫“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他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无论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方面以及在领导国防部的工作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11月2日——2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会见了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重大争论。经多次讨论后，与苏共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以下两点作了修正：1. 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2. 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的同时，也强调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了更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于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11月3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时，转述了苏联前国防部长朱可夫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朱可夫说：我认为全会对我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次批评是对我个人和其他军事工作人员的党内的、同志式的帮助，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党在正确领导陆海军问题上、在对武装部队人员进行正确的党和政治教育问题上的要求和路线。有些同志在提出处分时说，在1946的期大林在世时我曾经一度被解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并且说我没有认识到纠正当时造成解职的原因的那些错误的必要性。同志们，当时我不能承认，也没有承认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是正确的，也没有承认当时对我提出的指责是正确的。现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承认自己的错误，现在我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决心彻底纠正我现有的缺点。”

11月6日 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气勃勃、不断发展和臻于完善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保持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它也在随着共产主义的前进而不

断发展,不断改变其面貌。他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说: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原因是“不允许用教条主义、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保证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在过去和将来都同所有……在批评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诋毁斯大林的人作斗争。”他认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在报告中,赫鲁晓夫还第一次提出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谈,开展“和平竞赛”,“在15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的国家逐步消亡等问题。

11月14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见合众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夏皮罗。在回答夏皮罗的提问时,赫鲁晓夫说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经在进行,“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某些强制机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国家机关消亡是逐渐地、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发生。如果说苏联现在就削弱国家管理机关,废除强制机关,那就大错特错了。苏联的强制性的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他还认为和平进步的力量已经能够防止战争的爆发。当夏皮罗问“在苏联是否可以扩大文学艺术方面的各种流派”时,赫鲁晓夫说:“在我国的艺术中,除了苏维埃派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派别”,不能让一撮投靠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人,“在我国国内组织他们肮脏的派别”。

11月14日——16日 在莫斯科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12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未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1957年莫斯科宣言》,11月16日至19日,在莫斯科举

行 64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23 日发表了《和平宣言》。

12 月 4 日 苏共中央俄罗斯局作出决议，接受苏作协理事会与俄作协筹委会于 1958 年起出版《文学与生活报》作为俄作协筹委会机关报的建议，确定该报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宣传共产党与苏联政府关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政策，同歪曲政策的各种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决议批准由波尔托拉茨基—波戈斯金为该报主编。

12 月 16 日——17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 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报告人米·安·苏斯洛夫）；2. 关于苏联工会工作（报告人维·瓦·格里申）。会议就上述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全会选举努·阿·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尼·格·伊格纳托夫、阿·伊·基里钦科、努·阿·穆希金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12 月 17 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 64 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极其重大的胜利”。“两项宣言贯穿着这样的精神：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对普遍和平的命运和对全人类光辉的未来负有崇高的责任。”“苏共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苏共中央决定：1. “完全赞同会议所通过的历史性文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2. 批准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人会议上的活动。3. “建议各级党组织向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广泛宣传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义和会议所通过的两个文件的内容。”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联工会工作的决议》。决议强

调,苏联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上始终在劳动人民中进行多方面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团结和动员他们完成党所提出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联工会作为一个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了 4900 多万职工的苏联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来说,它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大了”。苏共中央认为大力改进苏联工会的活动主要是在以下 6 个方面:1. 提高工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2. 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3. 改进工会的教育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4. 提高工会的组织工作的水平;5. 进一步扩大苏联工会的国际联系;6. 改进党对工会的领导。苏共中央强调,第 2 方面的工作“是工会最重要的任务”。还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应表现在密切地注意它的工作内容,保证它更积极地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参加国家的全部社会政治生活。

1958 年

1月22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要大胆地提拔新成长起来的既懂业务又有经验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干部,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注意他们的成长,在工作中帮助他们。党的领导人在这件事上负有崇高的使命。他强调指出,事业的成败一向决定于干部,这在今天也仍然如此。选拔干部和对干部进行工作,是党组织工作的重要之点。

2月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招待知识分子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更为勇敢,更注意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下更大决心来面向现代生活”,“抓现代的重大主题”。他认为文艺界“表现了思想上的高度成熟”,“能正确理解党为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而进行的斗争有关的复杂问题,认为作家积极参与了党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表现的斗争,同党的团结更加巩固了”。赫鲁晓夫在会上对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表示赞赏。

同日,苏共中央发表《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苏维埃国家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其经济和文化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这些年来苏共一直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发挥亿万普通人的天才和能力,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才能象春潮般汹涌地发挥出来。还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民主表现在它的符合一切民族根本利益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

2月19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全苏植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发表精彩的讲话,而不采取应有的组织措施,即没有正确地安排干部,不用有能力的、懂业务的好的组织者去替换不能很好地组织工作的人,那么产量是不会增加的。他强调指出,必须在各共和国、州和区里挑选优秀的干部,用他们来加强落后的单位。应该注意和关心农艺师、畜牧师、育种师、各种专家和科学家,尽力支持他们的倡议,关切地倾听他们的要求。

2月25日——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赫鲁晓夫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报告提纲,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为了发展集体农庄制度,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術服务的现行制度,把那些过去虽然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现在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职能的机器拖拉机站逐步地加以改组,是适应的。现在,当大多数集体农庄都有能力购买,并能够正确地、更富有生产成效地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些机器直接转卖给集体农庄。”同时“应当根据各区和集体农庄的特点,分期地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技术修理站的主要任务是修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为集体农庄进行技术服务,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通过出售办法)以新技术、备件、燃料、肥料、农药及其他物资。”决议还强调,对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要作修改,提高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利益,实行新的计划制度,进一步调动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创造精神。

苏共中央认为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问题十分重大,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审议,批准赫鲁晓夫为这个问题的报告人。在把这个问题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之前,决定对有关这个问题所制定的各项措施进行公民讨论。苏共中央强调,为执行党的二十大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提出关于进一步发

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建议是正确的和及时的。

2月28日——3月4日 苏文化部和影协筹委会在莫斯科联合召开全苏电影工作者代表会议。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到会宣读苏共中央致大会的祝词。祝词中说：电影工作者的职责是“刻划近年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并对我国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事物”。这次代表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当代电影艺术的重要问题，并确定完成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赫鲁晓夫讲话所提出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强调，应竭尽全力在影片中反映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新事物。

3月14日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登记在册的联盟院和民族代表候选人有1378名，其中614人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即占全部代表候选人的44.6%。就社会地位来讲，代表候选人当中有60%以上是工农代表，其余的是劳动知识分子代表。所有代表候选人都是党和非党联盟的代表。在被提名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当中，有26.4%是妇女。他说，上述材料反映了真正的苏维埃民主。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和优点不仅在于人民自己已直接确定立法机构的组成，而且在于国家机关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人民利益。

3月27日——3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致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称“遵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70款并有鉴于苏联政府的构成须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加以考虑的事实，本届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自己已不再拥有各种权力并将这些权力交还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表示接受这一信函，伏罗希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建议赫鲁晓夫出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会议一致通过这项建议，并决定由赫鲁晓夫组织政府。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他重申了在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所决定的有关内容时,强调“在苏联发展的现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随着工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这个最重大、最刻不容缓的国民经济任务就被提到了首要地位。”3月31日会议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以及《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法律。主要内容是:1. 赞同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拖拉机站的措施;2. 把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把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3. 委托部长会议研究关于扩大农庄生产费用贷款的问题。

4月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作出决定,从1958年起将重工业部门的工作日缩短为6小时和7小时,并调整这些部门的工资及进一步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缩短最高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提高工资率在工资中的比重,广泛采用有技术根据的新生产定额和经济上有效益的工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具体措施,切实保证在缩短工作日和调整工资时不使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并不使工资基金超支。

4月12日 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脱离实际,阻碍建筑业的发展,妨碍了新的科学干部的成长。他说,要把某些科学机构内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障碍和绊脚石打得粉碎,必须给建筑科学的机体注入新鲜的血液。要为有才干的人创造必要的条件。对于那些只想求得科学家称号,而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必须把他们调到生产岗位上去,他们在那里才会复活。他强调指出,学位的授予应当根据科学工作在生产中的应用情况来决定。

4月1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改进国民经济物资技术供应》的决议。决议说,中央有关各部撤销后,各产品销售总

局改组为共和国间产品供应总局。产品物资的供销一般应由供需双方企业直接订立合同来进行,合同不能超越上级规定的限额。

4月1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定,主要内容是:1.自1958年起把新的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自由地卖给农庄,或者现金交易,或者赊购,2—3年还清。2.对国营农场也采取自由出卖机器的方式,不再实行调拨。3.规定技术修理站的职权范围,确定技术修理站实行经济核算;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有关拖拉机手和农机手也下放到各农庄。4.对集体农庄和技术修理站实行新的拨款和贷款制度。

5月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工作》的决议。主要内容是:1.从1959年起废除现行的制定和批准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办法。2.国民经济计划应以长期规划为根据并分别按年度、部门、加盟共和国、经济区企业和建筑机构进行编制。3.各企业、各建筑机构、各经济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各部门根据五年或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自行编制的计划是整个计划体系的基础。4.大大缩减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和控制数字的项目,大大缩减须经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批准的指标项目。

5月6日——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我国重工业和科学技术达到的水平,已经使我们能够在无损于重工业和国防力量进一步优先发展的情况下,以高得多的速度增加消费品生产,以便在最近五、六年充分保证居民对纺织品、衣服、靴鞋及其他商品的需要。加速发展化学工业对于解决这项任务有着巨大意义。”“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措施中规定要更加迅速地发展化学工业,首先是合成材料的生产,这将是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和重工业进一步高涨的最重

要的因素,是消费品生产的新的巨大原料来源。”决议明确规定:“到1965年年底,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要比1957年提高3.6倍,塑料和合成树脂的生产能力要提高7倍,合成橡胶的生产能力要提高2.4倍。”决议强调,完成这些任务,“有着巨大的国家意义和政治意义”。

5月2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决议说:把《伟大的友谊》称为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的标本是毫无道理的,把有才能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谢巴林、波波夫、米亚斯科夫斯基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个人崇拜时期所特有的不良现象”,这是不公正的和无理的指责。决议还说,“1951年《真理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反映了对某些艺术作品的主观态度。大家都知道,在决定这些问题方面,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斯大林起了不良的影响。”

6月8日 《真理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并发表社论《苏联音乐的道路——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认为“新的党中央决议完全纠正了对个别作曲家创作方面评价的错误。”过去受过批判的肖斯塔科维奇和哈恰图良在莫斯科作曲家、音乐家大会上发言时说,5月28日决议是苏联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二十大制订的列宁主义路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6月17日——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了赫鲁晓夫的《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新的农产品采购制度、采购价格和采购条件》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还选举尼·维·波德戈尔内和德·斯·波利扬斯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1.从1958年起,取消集体农庄向

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以及对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和集体农庄中的专业站所完成的工作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是适合的。2. 同意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并且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论述的关于新的农产品采购制度、采购价格和采购条件的建议。3. 勾销集体农庄过去一些年在义务交售、合同订购以及对机器拖拉机站和专业站工作的实物报酬等方面的积欠。4. 采购组织采购农产品的费用仍然很高，农产品发生大量损失和腐坏，运输不合理，“降低采购农产品的费用应当是各地党政机关和采购组织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5. 责成党政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广泛地向集体农庄男女庄员以及技术修理站、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的职工和主体劳动者说明所制定的措施对于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城乡劳动者物质福利的特殊意义。6. 取消义务交售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实行新的农产品采购制度和采购条件，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集体农庄和庄员在最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 100 公顷农业用地的总产量和商品产量，降低集体农庄产品成本等方面的主动性。这将改善对国家的农产品供应，保证居民有必要数量的粮食，保证工业有必要数量的原料，并且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和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

6 月 30 日 苏联部长会议根据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及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和关于农产品收购工作新情况、价格等问题》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从 1958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粮食、油料、马铃薯、蔬菜、肉、奶、蛋、羊毛、饲草的制度；同时取消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专业站交纳实物报酬的制度。从 7 月 1 日起集体农庄根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这些机构交纳现金。2. 从 1958 年 7 月 1 日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办法，收购量仍然根据耕地公顷数计算，但要订出更合理地

分等计价的标准。3. 最好按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州、区、各农庄或国营农场确定农产品收购的长期计划(5——7年),分列年度数字。4. 确定新的详细的按共和国分级的农产品收购价格。5.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机构可以给出售农产品的农庄预付20%——25%的价款。6. 从1958年7月1日起按新的降低了的价格向农庄出售拖拉机、农业机械等。

8月13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就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和农产品价格问题,在斯摩棱斯克州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实物报酬制度,规定了统一的国家收购形式,改以货币计价收购产品,这是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现在,已经规定了今年的过渡性的统一价格,只要合理经营,这种价格就能保证迅速提高集体农庄的生产和全面发展集体农庄经济。卢布将会显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个领导人的才能,因为今后想要获得高额的收入和优厚的劳动日报酬,就必须善于经营,必须努力降低产品的成本”。

8月17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社论说,党的文件《文学艺术要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全面规定了苏联文学的发展路线。文学的使命是表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创举,表现近年来人民生活中的新事物。社论对文学创作要同生活保持一段距离的说法提出批评,强调苏联文学当务之急是检查文学作品反映当前现实的情况,总结文学创作体现现代题材的经验。

9月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以审查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全会还免除了尼·亚·布尔加宁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苏共中央《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1. 定于1959年1月27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议

程是：作《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报告人。在报刊上公布关于 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2. 确定出席苏共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如下：6000 名党员产生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6000 名预备党员产生 1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 根据党章，党的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决议具体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各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党组织的代表、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苏联陆海军、公安警卫部队和边防部队、驻国外的苏联陆海军部队的代表的产生办法。4. 在 1958 年 12 月和 1959 年 1 月上半月举行各州、边疆区党代表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来选举出席苏共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讨论关于 1959 年——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

9 月 21 日 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书《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中指出，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的根本缺点是脱离生活。为此，必须改革高等教育，应当使它接近生产，并且能真正地同生产相结合。各高等学校应当招收已经有生活经验和做过一定时期实际工作的青年去学习，高等学校应当接受有较大才能并愿意升学的青年去学习。这里不仅要考虑考生个人的志愿，并且要考虑社会团体对他的工作的评价。

9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 12 期发表社论《迎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社论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速度方面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二十大的决议的实现使苏联向共产主义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并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期。社论强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还在迎接第二十一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必将开辟苏联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的宏伟前景，必将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展示社

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并将大大加快我国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速度”。

10月31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就新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国家一律按统一的地区价格收购产品。今后就要到价钱便宜的地方去收购了。“许多人还用旧眼光看待国家和集体农庄的经济关系，还没能摆脱纳税和义务交售的习惯，其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实行了按统一收购价格购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办法。谁卖的多、谁赚的钱就多”。他还说，改组拖拉机站的决议以及关于确定农产品统一价格的决议有重大意义，“它们标志着农业发展中的新阶段”。

同日，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恳求不要对我采取极端措施”，并声明“自动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在此之前，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俄作协筹委会执行局、莫斯科分会理事会主席团已于10月27日作出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协会籍的决定。决定谴责帕斯捷尔纳克是叛徒，已变为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并指出《日瓦戈医生》是反动小说。决议作出的第二天，苏共青团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出面，发出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警告。11月4日，《真理报》公布帕斯捷尔纳克致赫鲁晓夫的信，并发表了塔斯社的声明。声明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愿意到国外领奖，苏联国家机构将不进行任何阻挠，即使一去不返，苏联政府也不会予以留难。声明指出，“资产阶级报纸造谣说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剥夺出国权利，这是拙劣的捏造！”

11月3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在机器制造、石油和瓦斯工业企业缩短工作日并调整职工工资》的决议。

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下列问题：1. 赫鲁晓夫将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

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草案；2. 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关于第一个问题，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赞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 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草案；在报刊上公布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并在代表大会之前在全国对这一提纲进行广泛的讨论。关于第二个问题，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赞同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草案；在报刊上公布这一提纲草案供全民讨论；把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问题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

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尼·伊·别利亚耶夫当选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全会免除了尼·伊·别利亚耶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1月16日《真理报》全文发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提纲《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提纲指出：“生活对学校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的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还落后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要求，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中主要是教育与生活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国民教育制度的这种缺点，越来越使人不能容忍。”提纲就学校和共产主义建设、关于中等学校、关于职业教育、关于中等专业教育、关于高等学校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提纲还强调各共和国民族学校要学习俄语，提纲最后指出：“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利益，关系着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完成这一任务，对于苏联社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从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和通过的那些伟大计划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使学校接近生活，定将为更好地培养将

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和劳动的正在成长的一代造成真正必要的条件”。

11月19日 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作出《关于地方报纸在转载惊险与幻想作品方面的错误倾向》的决议。决议对近来苏联报刊上刊载趣味庸俗的作品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在州、区报纸发表了许多以惊险事件与日常生活琐事为主题的小说,不厌其烦地摘写间谍与破坏分子的活动、暗杀、形形色色的犯罪及道德堕落等。为此,决议要求州委、区委要对报刊进行监督,提高报刊的水平。

12月15日——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和讨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最近5年来农业发展的总结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生产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党组织的领导人、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科学研究机构和农业机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报告讨论。

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执行九月全会(1953年)和后来历次中央全会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方面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决议认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起决定性的作用,重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的基础,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同时党也考虑到,加速发展农业对于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迅速发展农业的任务被宣布为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共产党开展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了迅速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全民斗争”。

决议还谴责了“脱离人民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反党集团,反对人民的切身利益,反对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和以后各次全会的决议,企图阻挠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对内对外政策的各项重大问题所制定的方针的执行”。在农业方面,

“反党集团反对党的垦荒政策，反对新的农业计划制度，企图压制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了尽快发展畜牧业、为了实现在最短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而倡议的爱国主义运动，反对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家庭副业交售肉类、奶类、土豆和其他农产品的任务”。

决议还就关于增加谷物生产，关于增加经济作物、土豆、蔬菜和水果的生产，关于发展公有畜牧业，关于改进国营农场的工作，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和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关于加强集体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庄员的物质福利，关于七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和农业领导中的某些问题等作了具体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苏共中央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工会、共青团组织抓紧对农业劳动者的教育，支持他们的创新精神和革新运动，广泛地“发展争取胜利完成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

1959 年

1月22日——2月5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26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6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主要议程是审查《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报告人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决定性阶段和当前国际形势；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共产党是苏联人民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同时日益充分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即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国家机关的许多职能应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准则的问题也应该逐渐转归社会团体处理，现在民警已大大裁减，保安机构人员裁减特别大。国家消之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社会团体履行国家的许多职能，将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干部问题，赫鲁晓夫强调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

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必须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把青年干部同老年干部结合起来,这是一条使工作取得更好成果的正确道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指出,党组织要加强对工会的领导,给它们的工作以更大的帮助,工会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更有力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更广泛地吸引群众来管理经济。

赫鲁晓夫再次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指出他们顽固反对党的总路线,采用“最卑劣的派别分裂斗争的手法,企图破坏党的团结,阻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使党和国家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党粉碎反党集团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自己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1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发言谈到国家的职能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主要职能是从事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自然保持着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职能。国家在组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互助和交流经验方面的职能还在日益发展。苏斯洛夫还说:国家机关的工作方法在改变,组织和说服群众的工作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现在,强迫的范围日益缩小,它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特务,以及小偷和骗子手、盗窃社会财富的人、寄生虫、凶恶的流氓和其他反社会分子。

2月2日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在苏共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发言谈到健全法制时说:党彻底纠正了过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各级党委、监察委员会根据材料证实,对某些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所采取的迫害手段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破坏。这种破坏是由于个人崇拜及其

后果而引起的。因此,对那些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处分的共产党员已回到了党内,根据法定程序恢复名誉和恢复了他们的党籍,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党的处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什维尔尼克说,监察委员会应该加强检查共产党员遵守党和国家纪律的情况,应该坚决为合理地、节约地使用物资和国家资金而斗争。应该及时地、迅速地处理劳动人民的来信和申请书,关切而慎重地对待他们的需要,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纠正某些党组织、经济机构、苏维埃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中所出现的缺点。

2月4日 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发言时说:“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都深深地感激苏共中央以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感激他们揭露并粉碎了反党集团,“从而没有使他们给我们国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武装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害”。他还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对我们解决武装部队当前任务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决议本着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和列宁的领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武装部队的全面的纲领。苏共中央非常及时地发现了前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有使军队脱离党的意图,并狠狠地给了这个新出现的‘拿破仑’当头一棒。”

2月5日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一致批准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主要内容是:1.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些成果;2. 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3. 生产力的配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4. 苏联人民福利的增长;5.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国民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6. 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国际意义。7. 共产党是苏联人民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苏共在该文件中指出:“团结在自己共产党周围的苏联人民,达到了这样的高峰,进行了这样的改造,以致我国现在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同时日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将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竞赛的决定性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历史任务，必将实际完成。苏联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充满信心，确认这项任务一定能胜利完成”。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苏共认为，“党在今后也应该遵循列宁的领导原则，不断地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更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每个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主动性，加强他们对于完成国家任务的责任感，提高各级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在实现共产主义建设计划方面的作用”。

同日，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对赫鲁晓夫所作《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的决议。决议说：代表大会对于会前讨论赫鲁晓夫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的过程和结果，表示深深的满意。这次讨论强有力地显示了苏联人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提纲和报告；批准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以及在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前讨论提纲的基础上提出的修改和补充；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对依据代表大会批准的控制数字所拟定的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作必要的订正”。

决议从经济、政治、思想、国际关系方面具体规定了党在今后七年中的主要任务。苏共认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并且认为七年计划中必须规定工业总产值大约增加80%，其中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85——88%，第二部

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增加 62——65%。规定在 1959——1965 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加约 8.6%，第一部类为 9.3%，第二部类约为 7.3%。“七年中农业总产值将增加 70%，而某些最重要的产品产量应达到如下水平：谷物——100 亿到 110 亿普特，甜菜——7600 万到 8400 万吨，籽棉——570 万到 610 万吨，肉类(净重)——至少 1600 万吨，奶类——1.0 至 1.05 亿吨，马铃薯——1.47 亿吨，蔬菜的数量要充分满足居民的需要”。七年中，“国民收入增长 62——65%，这将保证人民消费的大大提高，七年之内人民的消费总额将增加 60——63%；七年之内职工的实际收入，按每个职工平均计算将提高 40%，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至少也将增加 40%；在最近几年内取消对居民的征税”。

决议最后明确指出苏共和苏联人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无条件地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今后七年的各项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力量将有巨大的意义。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是和平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完成这个计划将同时更加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使它有更多的准备，以便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任何侵犯社会主义伟大果实的行为给予毁灭性的反击”。

2 月 24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市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讲话时说：为了改进苏维埃的工作，加强它们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更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参加苏维埃的实际工作，必须大大增加地方苏维埃代表的名额。同时他指出，苏维埃代表的职责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利益，苏维埃代表的力量就在于代表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苏维埃代表本身就是工人、庄员、职员、科学家、文艺工作者，他们与人民是血肉相联的。赫鲁晓夫还指出，党组织的任务就是帮助苏维埃进行工作，引导它们的活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但是不能代替它们，不能行使它们的职

能。

3月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莱比锡出席第九届德国工人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民族和部族都是平等的,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生活,在同样的程度上满足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部族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关于民主问题,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真正的民主政治,保证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参加解决管理国家和国民经济的一切问题,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劳动人民最广泛地参加管理国家,参加解决一切最重要的国家的和国民经济的任务。

3月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关于劳动人民参加保卫国家社会秩序》的决议。决议指出:“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作斗争不仅应该由行政机构进行,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广泛地吸引劳动人民和社会团体来保卫国家的社会秩序”。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接受了劳动人民提出的关于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保卫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的许多建议,并批准了纠察队临时条例草案,根据草案,纠察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制止破坏秩序的现象。

5月19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教研室根据苏共二十一大的决议和文件提出的任务,改组全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把全体研究生、教授和教员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创造性地研究和概括代表大会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讨论问题。

5月22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是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他既反对“粉饰家”的提法,也反对“非粉饰家”的提法,强调表现“正面的现象”。他自己“要站在那些由于在作品中以表现正面人物为主而被称为‘粉饰家’的作家一边”。他认为应写正

面人物，“必须以好的榜样来教育人，必须表现生活中的正面现象，来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他对反斯大林小说《不单是靠面包》的作者杜金采夫提出批评，但又强调小说中有值得注意的章节，说杜金采夫“从来不曾是我们的敌人，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文学界中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修正主义情绪的代表在思想上已遭到完全的失败”。他号召要“不念旧恶”，团结各种力量。他说，“在我们这个没有敌对阶级和敌对集团，整个生活都建筑在同志友爱和友谊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那些不幸‘给鬼迷了心窍’的人需要更加关心”。要关心人，相信人，对过去的刑事犯和杀人犯更要关心，因为“犯罪，这就是脱离社会上公认的行为准则，常常是由于一个人精神混乱所引起的”。

6月24日——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各州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主管工业、运输业和建筑业问题的第二书记，大工业中心的市委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各区委书记，大工业企业和建筑公司党委书记和其他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州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各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工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中央报刊的编辑；大企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主任设计师和科学工作人员；先进生产者、著名的发明者和合理化建议者；其他地方领导人；苏联各部和其他中央主管机关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都应邀参加了中央全会的工作。

全会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党和苏维埃组织以及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工业和建筑业的技术进步的决议方面的工作（关于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在

工业和建筑业中实行综合机械化和生产自动化,建立流水作业线,更换陈旧的设备、压模和工具,以便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建筑工程造价的决议的措施)——莫斯科市、列宁格勒、斯大林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化学委员会关于报告苏共中央全会 1958 年 5 月 7 日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的决议的报告;关于进一步提高纺织工业的措施的报告。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会议上共有 52 人发言参加讨论。关于社会监督问题,赫鲁晓夫说,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应加强监督党的决议和苏维埃法律的执行情况,检查机关必须经常对遵守苏联法律的情况实行监督。同时,还应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关于干部问题,赫鲁晓夫说,必须让青年人有机会做更多的工作,应当大胆而明智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应吸引那些有经验的和通晓业务的人参加到事业中来。会议就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苏共中央全会告苏联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和全体劳动者的号召书《以英勇的劳动建设宏伟的共产主义大厦!》

6 月 26 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以便执行党组织对企业行政活动的监督权利的决定》决定说:“现行的监督组织形式已不完全适合苏共二十一大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企业工作的特点和条件,党组织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监督完满地及时供应其他经济区、对外贸易和国际工业所需要的产品,监督产品质量、实施新技术、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等问题。在商业机构中,委员会对保证商品供应、遵守商业规定、缩减流通费用等实行监督。苏共中央同时还发布了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条例。条例具体地规定了委员会的任务、权利和义务,以及委员会的组织办法。

6月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和苏维埃组织以及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工业和建筑业的技术进步的决议方面的工作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而斗争是顺利完成七年计划的决定性条件。2.改建、扩建和技术上重新装备现有企业,是一项极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3.生产的综合机械化和自动化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4.关于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专业化和协作。5.提高科学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加速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就。6.党组织在争取技术进步的斗争中的任务。

决议强调: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七年计划的实现,“将会进一步加强作为和平和进步的强大堡垒的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将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最伟大的胜利。这将是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在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中的一个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决议指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组织工作、党和经济部门对推广先进技术的领导提高到与新任务相适应的水平。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工会、共青团应集中精力消除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技术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阻碍技术进步的严重缺点”。领导社会主义竞赛时,要注意争取实现技术进步的问题,评定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总结竞赛,必须把是否完成计划规定的采用新技术的任务当作极其重要的指标。

6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发表社论《在社会生活中消除世界战争》。社论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世界形势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现代就可能制止战争的原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和它在保障和

平和普遍安全的斗争中的巨大动员力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分析新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对于地球上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在地球的一部分还保留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将出现消除战争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段的现实可能性”。

7月2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坚决调整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奖励办法》的决议。决议指出:现行的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办法有严重缺点,这种办法是根据企业完成超额生产计划而给予奖励的。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能促使上述人员充分挖掘潜力,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某些企业领导人为获取高额奖金,用不正确态度对待工作,甚至压低生产计划。因此,必须予以改进。决议分别为各部门(工业、建筑业、农业、交通邮电)规定了对上述人员的奖励条件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7月31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哲学问题》杂志的决议。决议认为该杂志存在严重缺点。“在科学地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方面,在创造性地概括和大胆地解决生活、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所提出的新理论问题方面,在研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性方面,《哲学问题》杂志还没有居主导地位”。决议指出该杂志发表了一些有错误见解的文章。“谢尔苏诺夫和谢格诺夫的《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矛盾的特殊性》一文,实质上歪曲了我国矛盾的真正性质,错误地、片面地、歪曲地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切尔卡申的《论宗教的社会根源》一文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助长宗教偏见的那些原因。”决议还批评杂志对科学家领会马克思主义和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帮助很少;近年来削弱了反对现代自然科学中、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中唯心主义流派的斗争,而是探讨了一些同现代自然科学的根本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专

门问题；几乎完全没有发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讨论文章；编委会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创作集体来工作。

8月 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拉齐斯在苏共中央半月刊《党的生活》第16期发表文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些领导人，他们企图使共和国脱离正确的发展道路而把它引向民族主义狭隘性和闭关自守的方向。“例如，前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同志在讨论七年计划草案时，公开反对党的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坚决拒绝在拉脱维亚共和国内扩建车辆和柴油发动机制造厂，主张扩大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而这两个部门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共和国的需要”。文章还说，别尔克拉夫的意见的实质，“是力图导向自给自足，导向民族主义狭隘性和闭关自守。接受了这些做法就会危害全国利益，危害拉脱维亚人民的利益，就会破坏拉脱维亚同其他共和国的经济联系，阻碍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共和国党中央对这些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打击。”

据1959年8月25日《真理报》报道：苏维埃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由于犯有“民族主义”错误，已于8月24日被免职。

9月3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为武装部队军事学院毕业生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进一步加速技术进步是解决创造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这个任务的基本环节。在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我们就在这匹马上下赌注”。他强调苏联党和政府要经常关心加强国防力量，采取一切措施使武装部队保持现代化水平。为此，他要求加强党在陆海军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努力改善党组织的工作，同时提出“军官必须精通迅速发展发展的技术”，“在自己的下级中间树立崇高的威信”。

9月19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从1959年第四季度到1960年第四季度这一时期内，完成缩

短职工工作日的工作,使全体职工都过渡到7小时工作日,以地下工作为主要职业的工人则过渡到6小时工作日。决议还决定调整职工的工资,把最低工资额提高到400—450卢布(合新币40—45卢布)。

10月1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接见梁赞州集体农庄女庄员和国营农场女工代表团的讲话中,称赞该州州领导机关大胆提拔青年干部的作法。他说,应该信赖青年,帮助青年人,一个还没有经验的青年人被提拔起来,一旦发生了什么差错,立刻就把他“推出去”,这样做是不好的,他还对把新提拔起来的干部随意调来调去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11月14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新闻工作者时说:苏联没有因犯政治罪而受法律审判的事实,因为苏联国内没有阶级斗争和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他同时还说,只要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生活和相处,社会主义的敌人就会往苏联派间谍,因此应该保持警惕,对敌人间谍的阴谋诡计给予回击。

12月22日——2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各州和边疆区党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不是苏共中央委员的第一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边疆区、州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边疆区、州党委农业部门的领导人,某些区党委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管农业的副主席,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各边疆区和州农业局局长,各加盟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某些国营农场托拉斯和国营农场的经理;科学家,集体农庄主席,农业先进生产者;国家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设计局和专业化设计局局长和总设计师,工厂总工程师,拖拉机工厂厂长和总工程师,以及主要的农业机器制造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所领导人,各部和中央主管机关其他领导人;中央报刊编辑;苏共中央机

关负责工作人员都应邀参加了中央全会的工作。

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检查关于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十二月全会有关发展农业的一系列决议的实施情况。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农产品的决定性条件”。他对一些农业领导人提出批评,并说:“既然套上了轭索,那就别说吃不消,拉吧!如果你感到拉不了,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有的是出色的干部,有人替换,这并不是威胁。一个不能胜任所委托的任务的工作人员被更有能力的人,被更有经验的组织者所接替,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赫鲁晓夫还提出“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的问题,“由每个集体农庄自己决定调整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额”,“不取消对集体农庄庄员进一步发展公有生产的物质刺激”。在会有 38 人发言就报告进行了讨论。全会就讨论的问题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2 月 25 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议》(关于执行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十二月全会(1958 年)关于提高农业,增产谷物、甜菜、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土豆、蔬菜、水果、葡萄和其他产品的决议;关于发展公有畜牧业,增产肉类、奶类、毛类、蛋类和其他畜产品决议;关于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决议;关于加强集体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庄员的物质福利的决议的措施)。决议指出:“我国现在已经为进一步大力发展各农业部门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根据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倡议开展的争取最近几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奶类和油类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全民运动,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内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表明,七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的任务能够提前完成”。

决议提出地方党政机关、农业机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最重要任务,是把谷物生产增加到每年不少于 100—110 亿普特,以及

为形成更稳定的商品谷物资源创造实际的可能”。“为此需要扩大谷物的播种面积，其办法是开垦新的土地，在雨水多的地区把全休闲地改为半休闲地，以及修改播种面积结构，用产量较高的作物来代替低产作物，扩大玉米播种面积”。决议还提出，为“解决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生产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每年必须生产 2000——2100 万吨的肉，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七年计划任务之外，再多生产 400——500 万吨的肉，作为社会主义竞赛中承担的义务”。

12 月 30 日 赫鲁晓夫回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的问题时说：1960 年“将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伟愿望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12 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 18 期发表编辑部文章《约·维·斯大林》。文章说：“斯大林是我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卓越和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他执行了党的崇高的托付，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 30 多年，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功绩”。

文章还说：“在党和苏联人民获得巨大成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 1934 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便逐渐开始形成和发展，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成绩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多地被归于斯大林的名下。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依据客观的社会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胜利，被说成是一个人的性格、意志和才能的结果，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看法”。

“在苏联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个人崇拜达到了极大的程度。由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制度加强了，苏

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提高了。但是所有这些成绩也被算作斯大林个人的功劳。过分的歌颂冲昏了斯大林的头脑，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能，他相信自己是毫无缺点的，于是自我赞扬、自我欣赏在他的性格中越来越发展了”。“应该指出，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和理论中不止一次地尖锐反对个人迷信，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作用的看法。……但是在实际上，他越来越言行不一，特别是涉及他个人的时候”。

文章认为，斯大林关于随着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内国内民主的发展，给人民的利益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斯大林的这个错误论点，成了破坏革命法制，进行无端迫害的理论基础。

1960 年

1月1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新年宴会上的祝酒词中谈到苏联在联大提出的裁军计划时说：“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我们准备随时解散我们的军队”。“但是如果‘冷战’拥护者要把我们拖进无穷无尽的争论迷宫中去，我们是不是走上他们想把我们推上去的道路呢？我们自己不妨单方面地考虑和裁减我们的武装部队，而用火箭保卫我们的边界”。

1月9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党的宣传工作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党的宣传工作在“全面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党组织采用了一系列措施克服“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造成的宣传工作的缺点，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决议认为，“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缺点仍然是没有彻底克服脱离生活、脱离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倾向”。决议指出，应重视在解决实际任务的过程中，培养未来共产主义新人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等等。“党的宣传工作同人民的创造性活动和生活及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得愈紧密，它的结果、它的影响与教育作用就愈大”。苏共中央认为：“考虑到当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刻地领会党的政策并争取其实现的迫切需要，“必须扩大宣传工作的范围”，“更积极地运用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思想与审美的影响”。

1月14日 赫鲁晓夫在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党和政府遵照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始终不渝地实现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的措施,吸引着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各加盟共和国、地方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的扩大以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群众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也在不断增长。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赫鲁晓夫指出:苏联的国家职能越来越开始由社会团体履行,公众在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方面、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的作用在日益提高,如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撤销苏联内务部的决议,并把这个部所处理的一切问题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精减机构,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公众在同破坏法制的现象进行斗争中的作用,给地方机关以更大的权力。

关于苏军的建设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在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的条件下,空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苏联武装部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用火箭核武器。当前决定国际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决定性地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赫鲁晓夫说:“目前,政府和党中央正在考虑和研究以后在建军方面过渡到地区制度的问题。地区制度将能保证必要的干部和受过军事训练并能掌握现代武器的居民名额。我们有可能按照地区原则编制成军队。我们的人员将不脱离生产地掌握军事技术,一旦必要,相应的运输工具——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就可以把军队集中到我们境内所需要的地方”。

根据赫鲁晓夫的上述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月15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把苏联武装部队再裁减1/3,即120万人》的法令,并将裁减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削减军事开支。

1月1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设施和保护居民健康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说:政府将把从再次裁

减武装部队而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改善居民的医疗设施。

1月20日 哈萨克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解除了别利亚耶夫的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哈萨克党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选举库纳耶夫为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选举索科洛夫为哈萨克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党中央书记。

1月2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根据最高苏维埃再次大量裁减武装部队 120 万人的法令,通过了《关于陆海军复员军人劳动安排和物质生活保障》的决议。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各级党委会、各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苏维埃,自复员军人到达居住地的时候起,在一个月內,应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工作经验作好劳动安排。

1月28日 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组织问题,全会解除了列别杰夫的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别利亚耶夫为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2月1日 《真理报》报道:吉尔吉斯党中央近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干部工作问题。全会认为党组织在提拔干部方面存有错误,选拔干部不是根据业务和政治标准,很少提拔年轻有为的、受过训练的人担任领导工作。为此,中央全会制定并通过了改进干部工作的措施。

3月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消除在办理公民就业手续及解决生活需要问题时文牍官僚主义弊病的决议》公布。决议指出:苏联法律以及机关、企业内部的劳动规章规定,接受新的工作人员应交验身分证及劳动手册,而初次参加工作者应交验身分证及房管所或村苏维埃关于近期活动的证明,但事实是,很多机关、企业除了要求新工作人员交验上述文件外,还要交验过去工作、工资、家庭状况、住房状况和户口等材料,以及书面鉴定。在分配住房时,也常常要有鉴定。在确定残疾程度时,也要交验劳动手册的存本及生产鉴

定。此外，进学校学习、退职、休假、送孩子进托儿所及幼儿园、买火车季票、领取燃料费以及解决其他问题时，都要交验许多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决议认为以上做法是官僚主义的，各级党政机关应消除这类不正常现象；如果身分证、劳动手册、出生证明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就不应该再要其他的书面材料。

3月17日 《党的生活》第5期出版，谈苏共党建情况。截止到1960年1月1日止，苏共有正式党员8017000名，预备党员691000名，文章指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大改善了党员成份的构成。在1959年吸收入党的职员中，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专家占65.2%，而这些专家过去大都是工人和庄员。目前正注意吸收重要工业部门中的先进生产者入党。

3月 《共产党人》第10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对人的社会主义关怀》。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是“高度人道主义的，是以关心人为最高原则的正义制度”，“它是人类最先进的、人道传统的实际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一切进步，除了关心人的福利，关心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公民的全面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近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贯穿着一个思想：使苏联人的生活更富裕、文明和幸福”。文章强调：“人道主义、人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活动的主导原则之一”。“社会主义是这样的社会：那里人们的同志关系、兄弟关系、友好关系成了法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利益永远失去了对抗性的矛盾”。

4月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计划工作和国民经济领导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家计委专搞年度计划工作，协调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方面的活动，协调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决议要求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负责长期规划工作。

4月15日——16日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为纪念列宁诞辰90

周年举行学术会议。该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弗兰采夫主持了开幕式，并在发言中论述了在社会科学发展中列宁阶段的基本特征，格列则尔曼作了题为《列宁论共产主义幼芽的发展》的报告。

5月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问题和组织问题。

全会发表的公报说：全会选举阿·尼·柯西金、尼·维·波德戈尔内、德·斯·波利扬斯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解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阿·鲍·阿里斯托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彼·尼·波斯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的工作”。全会解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尼·格·伊格纳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因为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全会解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什·阿·福尔采娃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因为她被任命为苏联文化部部长。

全会解除了尼·伊·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解除了阿·伊·基里钦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5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解除了他的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鉴于科兹洛夫已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任命伊格纳托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任命福尔采娃为文化部部长，任命诺维科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解除米哈伊洛夫的文化部部长的职务。

5月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关于提高卢布购买力和含金量》的决议。决议说，自1961年1月1日起将发行新币，旧币10卢布折合新币1卢布。1卢布的含金量从0.222168克提高到0.987412克。

5月5日——7日 赫鲁晓夫出席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取消工人和职员的赋税以及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其他措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1950——1960年期间，苏联预算的资金总额增加80%以上。由于最近几年改组了企业管理和提高了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预算总额在全国预算中的比重从26%上升到52%，“国家预算中4/5是用作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由于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财政和货币流通的稳固，苏联拥有一切必要的财力，使得在今年就可以着手开始分阶段取消对职工工资的征税”。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职工赋税》法令，规定从1960年10月1日开始到1965年，分阶段停止向职工征收所得税以及单身者、无子女者和少子女者的捐税。首先取消工资比较低的职工的赋税，然后逐步停止向所有劳动人民征税。

赫鲁晓夫在会上还提出决议案：同意伏罗希洛夫提出的因健康状况不佳，解除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请求。他代表苏共中央建议选举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由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还建议，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以及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决议案，最高苏维埃于7日通过决议。任命勃列日涅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了伏罗希洛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时致闭幕词时透露，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苏联的陆军和海军正式向火箭武器过渡，实际上已经过渡到火箭武器了。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涅杰林元帅被任命为火箭部队总司令。

5月11日——14日 苏军举行党的基层书记会议。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作报告说：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

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不管军事技术的威力和有效性多么大,没有人,它就毫无用处。技术是人来运用的。必须得出结论,军事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全体官兵的政治教育、战斗准备和技术训练结合起来。

5月 《哲学问题》第5期就新版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发表编辑部文章《历史科学的发展问题》。文章认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苏共思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探讨党史主要问题和发展社会科学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文章同时指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在阐述理论问题时存在着个别主观主义的解释和公式化”,“包含着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事实错误和歪曲”,“书中的所有原理被当成是最高评价,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阻碍了历史科学的发展”。文章还指责斯大林在世时出版的苏共历史方面的著作违背了历史主义,不是把事实绝对化,就是进行歪曲。文章强调,新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对党在中央领导下按赫鲁晓夫的建议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及消除其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后果、改进党的领导方法的斗争进行了科学总结”。

6月24日——26日 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各党代表散发或者宣读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严正指出:“我们党只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7月16日,苏联政府宣布,将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之间几百个协议和合同。

6月25日 尼·伊·别利亚耶夫继今年5月被免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后,又被免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别利亚耶夫在今年1月被免去哈萨克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时

还被免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时他被指责为在领导那个地区的经济工作时,犯有“过失和错误”。阿·伊·基里钦科在今年5月被解除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后,出任罗斯托夫州的第一书记,后在6月15日被免职。

6月2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军事学院毕业生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你们不仅同技术打交道,而且要同人打交道。进行战斗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掌握技术的人。因此必须关切地、公正地对待部下,要不惜花费力量和时间来培养自己具备一个指挥官和教育者的高贵的党的品质,要善于通过思想工作对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纪律,提高军队的警惕性和战斗准备。关于部队中的一长制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它在发展中将不断得到加强。加强一长制必不可少的条件应是司令员首长越来越多地依靠群众,不能使部队领导工作的个人责任有任何降低。近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党在部队的领导作用。最近举行的全军党组织书记会议,对于提高陆海军党组织的作用有巨大的意义。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改善党组织工作,加强它们对陆海军各方面的影响。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发表讲话。他说: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一些高等学校有预见地适时地向火箭专业过渡。这是由于武装部队中风起云涌地采用战术火箭、作战战术火箭和战略火箭而引起的。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7月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对企业的经济鼓励以及关于加强工业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创造和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规程、关心使生产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增加从超计划利润中拨归企业基金的提成额,准许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设立掌握新技术的基金。根据决议,从1960年10月1日起,对工业企业、建筑、运输和邮电工作者以及地质勘探、科学研究和设计机构实施新的奖励制度,凡采用新技术完成

工作者给予奖励。

7月13日——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研究了关于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执行情况,关于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在生产中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问题。全会听取并讨论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克麦罗沃国民经济委员会、卡拉干达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自动化和机器制造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帕顿电焊研究所的报告。全会就讨论的问题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听取了《关于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的报告之后,赞同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以及会议公报。

由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列勃列日涅夫已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全会免去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全会根据克·伏罗希洛夫本人的请求,免去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7月15日 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报执行情况,关于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在生产中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苏联人民在实现七年计划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2. 更加充分地利用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速度;3. 提高经济工作的水平,加强争取改善工业和运输业各个环节的质量指标的斗争;4. 尽力扩大消费品的生产,更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5. 不断改进党组织对工业和运输业的领导。

决议指出:“国际关系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个结论就是:现在,当存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就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苏联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祖国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决议认为,“从过去一年半工业和运输业的工作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苏共第二

十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宏伟计划正在顺利实现。党政机关和经济组织,以及我们祖国的全体劳动人民正在进一步发掘和动用巨大的潜力和可能性,从而使我们能够加速实现代表大会关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生产力和提高苏联人民物质福利的决议,并且为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创造条件。为了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决议要求党组织在解决具体的经济任务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深入地、具体地和内行地研究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工作问题,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和落后现象,大力支持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并且推广他们的经验。”

7月16日 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决议首先表示,“完全赞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以及会议公报”。关于国际形势,“苏共中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顾人民意志,企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加紧对和平事业的破坏活动,美国帝国主义破坏了最高级会议。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今后应该继续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诡计和侵略阴谋,提高各国人民的警惕性,加强我国的威力和改善我国的国防,坚定和始终一贯地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方针,争取和平调解国际争端”。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决议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现代局势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再一次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的兄弟党准备继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产党和工人党表示要坚决反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背离,反击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它。”决议还强调指出:苏共中央完全拥护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关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仍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等任务的声

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宣言所申述的“现代战争可以防止,和平可以维护住”的观点仍然完全有效。

7月17日 苏共领导人接见科技界和文艺界的代表。赫鲁晓夫在讲话时说:“斯大林死后的时期,是我们苏联国家生活中清理和扫除的时期”。自1958年3月党政领导人会见知识界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共中央和知识界对“目标和任务的理解,现在有着完全的一致”。苏共和苏联政府对知识界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永远是共产党全部事业的忠实助手”,要求他们在艺术创造中为实现苏共的政策”贡献出自己、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才华”。赫鲁晓夫还说,当代苏联已“很难区分党员和非党员”,苏共政策是“最富于人性的政策”。苏联作家、作曲家、画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全部创作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奋斗。文艺批评应帮助文艺工作者,在艺术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切伟大之处。艺术家应深入生活,敏锐地抓住和忠实地理解我们现实生活中新的、决定性的事物,深刻了解苏维埃人”。

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所有的人过最好的生活。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过得更好。甚至鸟儿也要为自己的小鸟寻找美味的食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不论他处于何种地位和从事何种劳动,都是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知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因而也就是为作为这个社会成员的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一个人只要一出生就必然要在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生存。”“现阶段的任务是为争取人的幸福、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条件,发展人的一切能力和才能而斗争。”

8月3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最近举行了会议。会议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党组织的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经济知识的宣传,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特别是对建立共产主义的

物质基础和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的道路进行深刻研究”。全体劳动人民都应掌握经济知识的基础,这是今天主要的事情。

11月10日——12月1日 出席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国际局势和今后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迫切问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声明强调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重申它仍然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声明就我们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任务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6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会后,苏共中央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邀请。

11月21日——12月13日 苏共一些州委召开全会,六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被解除职务。11月21日,苏共利佩茨克州委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茹科夫的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的职务,全会选举普齐科夫为苏共利佩茨克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11月24日,苏共布利亚特州委召开全会。鉴于哈哈洛夫调任其他工作,全会解除了他的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原布利亚特部长会议主席菲利普被选举为州委第一书记。11月26日,苏共斯大林格勒州委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热加林的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职务,什科尔尼科夫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同日,苏共沃罗涅日州委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什科尔尼科夫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的职务。原沃罗涅日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希特罗夫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11月29日,苏共沃洛戈德州委举行全会,全会因拉图诺夫另调工作,免除了他的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的职务,米洛夫被选举为州委第一书记和常委。12月13日,苏共布利安斯克州委举行全会。州委第一书记彼图霍夫被解除职务,全会选举克拉赫马列夫为州委第一书记。

12月26日 《党务工作人员手册》1961年第三版发表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证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不间断性》的决议指出：15——20年的总体计划是计划体系的基础。在制订本年度计划时，要同时制订下一年的产量、产品品种、投资额和生产能力4个指标的控制数字，还要制订从当年算起的第5年的主要指标。

12月29日 亚美尼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解除了托夫马相的第一书记和中央局委员的职务，选举托罗卡为亚美尼亚党中央的第一书记。

1961 年

1 月 6 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等党组织的会议上说：“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上和经济学上的可能性”。

1 月 10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的经济和财务状况的措施》的决定。其中规定：1. 1961——1965 年对集体农庄出售各种畜产品的收入的 80% 免征所得税。2. 从 1961 年 2 月份起，分别降低卖给集体农庄的各种机器零件的售价，同时降低汽油零售价格。3. 卖给集体农庄的农业机器可以分期付款。4. 集体农庄可以延期偿还国家银行的长、短期贷款。

同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二次例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1961 年 10 月 17 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二次例行的代表大会。2. 确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 赫鲁晓夫作苏共中央总结报告。(2) 亚·费·戈尔金作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3) 赫鲁晓夫作苏共纲领草案报告。(4) 苏共中央书记弗·罗·科兹洛夫作关于修改苏共章程的报告。(5) 选举党的中央机构。3. 规定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名额，每 2000 名党员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每 2000 名预备党员选出有发言权的代表一人。4. 根据党章规定，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由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用无记名投票(秘密投票)方式选出。5. 各州、边疆区党代表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应于 1961 年 9 月举行，会上除了作总结报告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以及选举出席苏共第

二十二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外，还将讨论苏共纲领草案和苏共章程草案。

1月10日——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 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2. 关于1960年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关于生产和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的社会主义义务的执行情况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由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和乌克兰、哈萨克、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爱沙尼亚的党中央以及新垦地边疆区党委作报告。3.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

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之后，赞同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活动。全会就讨论的全部问题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选举根·伊·沃罗诺夫（苏共奥伦堡州委书记）和维·瓦·格里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提高人民物质福利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可以在不妨碍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加强国防的情况下，拨出更多的资金发展农业”。为了发展农业，除增加农业投资外，赫鲁晓夫还具体提出发展水利灌溉，改良土壤；改组农业部；成立以经济核算制度为基础的全苏联合机构；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供应技术设备和肥料；建立国家采购委员会，修改采购制度；大种玉米；进一步挖掘新垦地的生产潜力；加强物质刺激等方法。

谈到干部问题时，赫鲁晓夫强调必须培养和支持年轻干部，同时也必须关心有经验的老干部，更好地运用他们的才智和经验。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指出，必须同畸形的、危害社会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根除过寄生生活、对劳动漫不经心、私有观念的坏现

象。他说,要同资本主义的残余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中必须把社会影响措施同行政上严格地惩处措施结合起来,主要是对人的教育。

1月18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60年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关于生产和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建立重工业,不实行国家电气化,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没有能为人民提供丰富产品的很发达的农业,也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农业发展问题应当始终是我们党注意的中心,没有发展良好的农业,没有丰富的农产品,就不可能有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农业的不断高涨而奋斗——这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条件,这是真正的全民事业。”苏共中央决定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农业以及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特别是大力生产化肥、除莠剂农药和其他化学制品及农业机器制造业。决议强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最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潜力在今年和最近几年大力增产谷物、经济作物、土豆、蔬菜、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决议认为发展谷物经济和增加谷物方面的主要潜力是:增加玉米粒;在垦荒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进一步开垦荒地以增加商品粮食的生产;在非黑土地地区扩大播种面积,特别是提高单位产量;在提高耕作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全国各地区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则要增加奶牛数;大力发展养猪和养禽业;提高畜牧业的产品率,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在发展经济作物生产方面,首先是发展棉花、甜菜、向日葵、油用亚麻和土豆、蔬菜、茶叶、水果、葡萄等。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决议认为。“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事件”,“81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详尽地、创造性地讨论当代的迫切问题，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这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极其巨大的胜利”。

决议指出：“会议肯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忠于 1957 年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并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对于由于事态的发展以及由于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提出来的问题集体作出的估计和结论，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决议还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应关系的原则写道：“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出现导致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这是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苏共中央在决议中还作出以下决定：1. 同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政治路线和活动。2. 同意会议通过的声明和告全世界人民书；认为在苏联共产党各方面的活动中必须遵循这两个文件所作的估计和结论。3. 建议各级党组织讨论并向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解释会议的结果以及会议通过的文件的内容和意义。号召苏联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的任务。

1 月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科学会议。除该院的科学工作者外，科学院和其他科研单位及大学的理论工作者、教师、党的工作者、集体农庄主席、宣传员等也出席了会议。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苏共中央《关于现代条件下党的宣传任务》的决议中，曾指出对劳动的精神鼓励在不断增长。某些头脑发热的人由此便开始说什么对个人物质关心的作用在缩小。他说：“在苏联不存在出现私有制残余的社会基础”，“必须同各种平均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伊利切夫认为必须发展“社会消费基金”。他说，每个苏联家庭依靠社会基金的消费部分不断

增长这个事实,使每个苏联人都关心提高全社会的福利,使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原则充满了新的社会内容。

2月2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根据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改组农业部,成立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决议指出: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具有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的权力。

2月23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干部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在工业和农业部门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精通业务、善于运用新技术和科学成就的工作者,现在有条件不靠过分紧张的体力劳动和弯腰折背,而是靠知识和智慧来顺利解决发展国民经济最复杂的任务。

2月2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和改进国家采购农产品的组织工作》的决议,决定从1961年起,对粮食、肉类、牛奶和经济作物的采购都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国家采购组织同农庄、农场签订的采购合同一般为期2—5年。合同每年调整一次。合同中规定买卖双方的义务;在区或两个区之间建立农产品采购监督组织。

3月21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哈萨克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加强民族团结问题。他说,在苏联各建设阶段上,党特别重视民族问题。苏联各民族是平等的,不容许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存在。只有在国际主义和各族人民友谊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任务。

4月16日 据塔斯社报道:塔吉克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乌尔札巴耶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开除出党;取消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胡多耶夫的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在收购棉花时虚报产量,欺骗国家。党中央第二书记奥勃诺索夫被指责为“政治上没有原则和无能”,也被取消其党

中央委员的资格,开除出党。从2月到4月,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卡卢加州、亚罗斯拉夫州、阿斯特拉罕州、基洛夫州、伊凡诺沃州等州的州委第一书记、书记或苏维埃主席,因“没有按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要求和赫鲁晓夫的指示改进工作”,“在领导农业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保证对州党组织的领导”,而被撤职,甚至被开除出党。

4月26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苏联经济区划和组织大经济区的协调和规划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进入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不仅要求在一个经济行政区内,而且要求在一些共和国和行政区内加强经济联系,为了更顺利地解决这些国民经济任务。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通过建立大经济区的途径来实施苏联经济区划。

决议规定将全国划分17个大经济区,每个大经济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以便协调当时的100多个国民经济行政区,在此之前,苏联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起,全国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一直是按13个大经济区来制订的。1957年。赫鲁晓夫将全苏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

决议强调:大经济区有可能广泛发展所有工业部门的协作化,按大经济区来制订发展和分布生产的计划,是“从地理上合理分配劳动力、同各种地方倾向作斗争的最有效的办法。决议要求大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协调和计划委员会研究综合发展经济的基本问题,并向各加盟共和国计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提出建议。

5月29日 据塔斯社报道:摩尔达维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解除了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久克的职务,选举鲍久尔为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6月12日——1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召开全苏科学工作者会议。苏联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主席鲁德涅夫致开幕词,苏联科学院院

长凯尔迪什作题为《苏联科学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报告。费多谢耶夫在《哲学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发言中说：“依据苏联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验来研究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性，已成为经济学、哲学、法学的研究所和教研室以及人文科学机构活动的中心”。米丁在《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研究的任务》发言中说：“从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月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除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的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和全联盟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也出席了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书记弗·罗·科兹洛夫《关于苏共章程草案》的报告。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全会通过的《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决议》指出：全会一致赞同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并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审查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苏共纲领草案将于1961年7月30日在报刊上公布，以供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全体苏联劳动人民普遍了解和讨论。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州、边疆区、市和区党委在基层党组织中，在区、市、州和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在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对苏共纲领草案组织广泛的讨论。

根据弗·罗·科兹洛夫《关于苏共章程草案》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苏共章程草案的决议》指出：1. 基本上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审查的苏共章程草案。2. 苏共章程草案将于1961年8月20日在报刊上公布，以供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全体苏联劳动人民普遍了解和讨论。3. 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州、边疆区和区党委在所有的基层党组织中，在区、市、州和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在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对苏共章程草案组织广泛的讨

论。

6月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培养科学干部和科学教学干部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对一些科学家“很少对工农业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进行科研工作时,对问题的经济上的依据注意不够”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决议强调应按照国民经济的要求提高科学干部和科学教学干部的水平,决定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进行关于重要国民经济问题或理论问题的研究。

8月9日 《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社论《党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的组织武器》。社论认为,随着苏维埃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向建设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过渡,苏共——我们社会全体劳动阶级和阶层利益的体现者——的人民性越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社论指出:现在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全体苏联人,他们把它认作是自己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伟大运动的先进部队。党不仅以已成为劳动人民共同目标的最终目标去接近劳动人民,党还在组织上接近人民,它吸收了将近1000万名工人、集体农庄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代表。它还在自己的活动方法上接近人民。这些方法愈来愈充满着深刻的民主性成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的关系的榜样。

8月18日 《真理报》于8月5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供苏共党员和劳动群众讨论后,今天发表编辑部文章《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文章说:工人阶级的思想现已成为全体居民阶层的思想,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任务。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如今已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它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着先进的、最有觉悟和积极性的人们,是所有居民阶层的代表。

8月3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已构成对苏联的直接威胁,

为此责成国防部下令：在对德和约缔结以前，暂缓把到1961年服役期满的士兵、水兵、军士和士官转为预备役。次日，苏联政府宣布，苏联已研究出制造2000万、3000万、5000万和1亿吨级核弹的方案。

9月5日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3期发表文章《行动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文章写道：国家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丧失了自己的本质的阶级特点而获得了管理社会的全民组织的性质。这种情况使人民的概念本身在苏联发生了变化。在我国，这一概念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充满了真正全体人的内容。由于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根本利益一致。苏联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政治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苏联人民是一个统一的磐石般的整体，是一支奋发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团结的队伍。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共同目标，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共同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把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联结在一起。

10月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 关于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2. 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讨论结果；3. 关于苏共章程草案的讨论结果。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和弗·罗·科兹洛夫就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批准了提交全会审查的苏共中央全会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讨论结果的决议》。决议指出，900多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总共8200多万劳动者都讨论了苏共纲领草案，“苏共新的纲领草案得到了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和热烈的支持。”“纲领草案的讨论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了空前的积极的创造精神，显示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团结，显示了在苏联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纲领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讨论过程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

士对纲领草案提出的大量建议,充满了对增加共产主义建设成果的崇高关心。”全会决定批准经过补充和修改的苏共纲领草案,并将这一草案提交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审查。

全会还一致通过了《关于苏共章程草案讨论结果的决议》。决议批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苏共章程草案,并把苏共章程草案提交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审查。

10月17日——31日 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394人,有发言权的代表405人,由于有正当理由缺席的代表14人。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极查委员会主席戈尔金。3. 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报告人赫鲁晓夫。4. 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报告人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5. 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0月17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苏共中央总结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当前的世界形势和苏联的国际环境;2. 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3. 列宁主义的党——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组织者。赫鲁晓夫说,在现在的条件下,苏联阶级间的相应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民主正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已接近列宁提出的目标——毫无疑例外地吸收全体人民参加行使国家职能。数以千万计的苏联人在苏维埃及其委员中,在合作社、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选举产生的机构中参加管理国家事务,执行社会的委托。每个苏联人都应当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参加者。苏共一方面把发展国家机构、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改造为社会自治机构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将继续执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交给社会团体的方针。不是从形式上更换牌子,而是从实质上进行改造。把已经不再重要的国家职能转交社会组织,逐渐把说服和教育的力量作为调节社会的主要方法。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益充分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党的政策贯穿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谈到“克服个人迷信的结果，发展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的问题时，赫鲁晓夫说：“一个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赫鲁晓夫认为“对于许多大规模迫害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军事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事件，以及在个人迷信时期发生的其他类似现象，他们本人负有责任”。当全党贯彻党的二十大路线时，反党集团开始积极活动，“反党集团参加者感到他们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拼凑了数学上的多数，于是便展开了公开的攻击，力图改变党内和国内的政策、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政策”。

10月18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赫鲁晓夫说：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上第一次在苏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赫鲁晓夫在讲到全民国家的职能时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后，国家还要在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国家消亡将是很长的，它包括整个历史时期，只有社会完全成熟到自治的程度，它才能结束。在一定时期内，国家领导和社会自治的特征将互相交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内部职能将发展和变化，并逐渐发挥其政治性质。只有在建立了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取得胜利和巩固的条件下，国家才不再

有存在的必要，它也就要消亡了。

赫鲁晓夫说到全民党的问题时说，苏共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履行着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领导者的使命。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马列主义的党，现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他认为，经常更换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应成为一种制度，政府和社会团体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组成也采取更换的原则，向这种制度的过渡，将是发展民主制的一大步骤，在这基础上，为更彻底地实现集体领导制原则创造新的可能性。

10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发言时说：在急剧的转折关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以及全面发扬民主对我们党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恰恰在这个急剧转变的关头，同人民断绝联系的派别活动分子，教条主义者和信念不坚定分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开始进行的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制订的列宁的方针的反党勾当。他们被过去的包袱和在这个基础上犯下的和应为此向党和人民负责的错误和罪行拖住了腿，他们对恢复列宁的生活原则和准则，对我们党的政策不肯顺从。无论在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修正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死死地抓住过时的旧方法，反对一切由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从苏维埃社会的利益和发展中出现的新东西”。

勃列日涅夫强调：“我们离开过去的事件时间越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和我们中央委员会为保卫列宁的思想的纯洁、反对企图阻碍我们前进的这些阴谋家而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历史意义就越明显。这是一场原则性的、党的斗争，是为保卫列宁主义中召唤我们前进并给我们新的力量的有生气的、革命的东西而

进行的斗争”。

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柯西金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发言时说,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逐渐地消除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差别,在苏联形成了人民紧密的、牢不可破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一致,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建设共产主义,现已成为全体苏联人的使命,而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

10月26日 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伏罗希洛夫发表《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他说,我因为健康状况不能在我们伟大的列宁的党的这一历史性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我认为作如下的声明是自己的党员的义务。关于反党集团问题,伏罗希洛夫写道:“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其他人的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这里在派别分子中间也指出了我的姓名。是的,我过去承认了现在也承认,在开始同这一集团斗争时,我支持了它的个别成员的某些错误的和有害的言行,但是直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57年)研究这些‘派别分子’的行为的过程中,他们的真实面目被查明并且他们自己承认了自己的派别活动之前,我对于这一集团的派别活动一无所知。在这以后,我立即声明,我关于此事从来都不知道,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集团,我在任何地点都一次也没与这类人有过交道和来往。我在深深地意识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给我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之后,我坚决谴责这一集团的旨在使党离开列宁道路的派别活动。我完全理解我在支持反党集团成员的有害言行时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伏罗希洛夫同时还写道:“在我们光荣的共产党队伍里我所度过的58年过程中,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违反过

党章、党纲的要求，也没有违反过我党党员的准则，从来也没有背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原则，从来也没有参加过并且也不会参加反党的——不管它们被称作什么——集团。”

10月2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自己工作的全部内容，证实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忠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路线，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消除了个人迷信时期的一切积垢之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认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在新纲领和章程中，把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排除重犯个人迷信的可能性的原则固定了下来”。

赫鲁晓夫在总结发言中讲到“许多无辜死去的著名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及著名的军事首长”，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鲍列维奇、科尔克、叶戈罗夫、埃德曼、布鲁赫；奥尔忠尼启泽、斯万尼则；楚巴尔、科西奥尔、鲁祖塔克、波斯季谢夫、艾赫、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等。当有人建议要永远纪念在个人迷信时期毫无根据地被镇压的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时，赫鲁晓夫说：“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委托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来肯定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适宜的。也许应该在莫斯科建造纪念碑，来永远纪念成为专横的牺牲者的同志们”。

赫鲁晓夫讲到苏联报刊及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他个人的作用时说：“我理解这些同志的善意。但是，请允许我十分有力地强调指出，所有关于我的话都应该是对我们列宁主义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说的。因为我们任何一次重大的措施、我们任何一次重要的行动都不是按某个人的指示进行的，而是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结果。现在这个总结发言也是经过集体审查批准的。同志们，我们伟大的力量就在于集体领导，在于集体解决一切原则性的问题”。

10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中说：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领导的集体性，它保证党及一切党的机关不致采取片面的主观的决定和行动。只有集体领导才能为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创造条件，保证正确地教育干部。领导的集体性丝毫不削弱工作人员对委托给他的工作，对执行集体通过的决议的个人责任。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领导集体性的原则、经常地更换党的机关的成员，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监督的情况，保证新生力量源源注入党的领导机关，把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正确地结合起来。

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科兹洛夫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所纠合的反党派别集团”激烈地反抗苏共二十大方针，“这个集团的参加者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他们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反党阴谋，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他们举行秘密集会，拟定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党的政策的计划。莫洛托夫等人想要回到那个对我们党和国家是沉重的时期，那时，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恶劣方法和行为曾占统治地位，谁也不保险不遭到专横的对待和迫害。”

科兹洛夫还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参预了对许多无辜的人、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的杀害，这证明他们执行了野心家的政策，背离了列宁主义，从而促成了个人崇拜的形成和盛行。”“我完全同意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如果这些背叛者占了上风，那么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会镇压正直的、清白无辜的人们。同志们，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反党集团已不能为害了。”“在反对反党派别集团的斗争中，在保卫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事业中，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

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原则性”。

10月31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通过，决议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代表大会在听取和讨论了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之后，决定：整个地、完全地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方针和实践活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所包含的结论和建议。”

关于苏联的国内的政策，决议说“共产主义建设速度的加快，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时期的最重要特征”。“开垦荒地是苏联人民劳动的丰功伟绩，它将万古流芳”。“七年计划的完成将使苏联的经济达到这样的境界，即再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在按人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也超过美国。这将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关于苏共的活动，决议认为最重要的是“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以及党和国家各个环节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公开地、大胆地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决议还严厉谴责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伏罗希洛夫犯的严重错误，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共产党员的意志宣布，党仍将坚持不懈地贯彻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和纯洁的列宁主义法规，毫不调和地同任何派别活动和集团的表现作斗争。

决议还强调指出监督制度是在真正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工作的有效手段，是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的可靠武器，是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校。为了加强监督工作，必须建立地方党机关向上级党机关和党员群众汇报党的决议执行情况的严格报告制度。

10月31日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新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全会选出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如下：

主席团委员：列·伊·勃列日涅夫、根·伊·沃罗诺夫、弗·罗·科兹洛夫、阿·尼·柯西金、奥·维·库西宁、阿·伊·米高扬、尼·维·波德戈尔内、德·斯·波利扬斯基、米·安·苏斯洛夫、尼·谢·赫鲁晓夫、尼·米·什维尔尼克。

主席团候补委员：维·瓦·格里申、夏·拉·拉希多夫、基·特·马祖罗夫、瓦·帕·姆日阿瓦纳泽、弗·瓦·谢尔比茨基。

会议选出了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有：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弗·罗·科兹洛夫、彼·尼·杰米契夫、列·费·伊利切夫、奥·维·库西宁、鲍·尼·波诺马廖夫、伊·瓦·斯皮里多诺夫、米·安·苏斯洛夫、亚·尼·谢列平。

全会选出了尼·米·什维尔尼克为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齐·季·谢尔久克为党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10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的决定》。“1. 为永久纪念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不朽的创始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而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上建造的陵墓今后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2. 认为在墓中继续保留的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留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12月5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共产主义和国家》。文章谈到苏联全民国家的形成时说：当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被实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转变为依靠社会所有阶级和阶层的社会主义的全民的国家。在我国社会早已没有剥削阶级，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

识分子政治和思想的一致。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成为苏联人民的世界观和思想,因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创造了经济和政治条件。文章指出:“我国工人阶级现在应当对什么阶级实行自己的统治和自己的专政呢?在我们社会里没有这样的阶级”。因此,“全民国家这个概念最好不过地表达了我国现代国家的实质”。

12月25日 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作长篇报告,批判斯大林在理论上犯的错误。在哲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不存在对立的统一这一错误观点。在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在对待哲学遗产的问题上制造了混乱;取消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以“辩证法特征”来一般地代替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不断胜利而尖锐化的规律。在经济理论方面,在关于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途径问题上,在关于商品流通缩小和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问题上,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总是要超过生产的问题上,斯大林都提出了错误的理论观点。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原因的解释以及把生产资料排除于商品生产范围之外都是不正确的,关于在战后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产值不可避免地降低的论点及其他论点也是错误的。在法学方面,斯大林通过维辛斯基(苏共中央委员,曾任苏联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企图从法律上将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错误理论固定下来,并力图利用法学为专横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辩解。在党史科学方面,斯大林为搞个人崇拜歪曲历史,贬低列宁的作用,抹杀党和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伊利切夫认为:没有任何根据认为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贡献,更谈不上是伟大的贡献,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犯有许多理论上的错误,作了主观主义的判断。

12月 《共产党人》第18期发表约夫楚克的文章《苏联伟大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文章对那种认为在30年代末期就已完成了文化革命的观点提出反驳。作者认为文化革命的完成应与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一致。“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成长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全民的全人类文化的开始”。文章指出:“文化革命现阶段的最主要的过程之一,就是把所有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不断地提高到知识分子水平”。“在未来20年内,随着文化革命的完成,在劳动条件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即在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一般文化水平上的根本差别将会基本消失。”

1962 年

1月1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扎波罗热奥尔忠尼启泽炼钢厂党委在生产中组织推广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劳动方法的经验》的决议。决议要求苏共党员在各项工作中成为群众执行党和政府决议的带头人和组织者。党委要不断完善党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使加速技术进步的措施得到实现。要更加严格地要求工厂的经济领导人在生产中推广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劳动方法,教育他们严格遵守国家纪律,对缺点不迁就姑息,要竭力扩大促进技术进步的社会形式,积极吸收劳动者参加改进机组和机械结构,完善工艺、提高生产和劳动组织水平的创造性工作。

1月18日 《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50周年。文章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浸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本书是斯大林在理论领域中的专横和斯大林不重视列宁原理的结果。文章说,党史中有斯大林支持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话,但实际上,斯大林当时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和不一贯性,没有懂得列宁反托洛茨基集团斗争的全部重要意义。

1月25日 《真理报》发表文章,为1933年因反斯大林而自杀的斯克雷普尼克恢复名誉。斯克雷普尼克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文章说:虽然斯克雷普尼克有过个别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他是忠实的列宁追随者。由于中伤和夸大他的错误,他被迫自杀。苏共二十大恢复了他的名誉。

1月27日 《真理报》就苏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发表文章说：党组织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提拔了许多内行的、善于创造性地解决经济、文化、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任务的有才干的群众组织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更多的是工农业专家。经常更新由选举产生的机关，这是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破坏的准则。评价党机关领导人工作的主要标准是工厂和建筑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科学机关以及区、州、共和国的具体工作成果。苏共中央党的组织工作问题会议是同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

1月30日——2月2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苏联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和伊利切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党政机关领导人共2600余人出席了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作《苏共二十二大与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的报告。苏斯洛夫说，斯大林“垄断理论的野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少有害后果，为了推崇斯大林，他的著作，文章和讲话被不恰当地称颂为“天才的”、“有历史意义的”。苏斯洛夫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批评，认为这些著作吹捧斯大林个人，导致哲学研究的贫困化。苏斯洛夫还说斯大林在理论方面有些功劳，对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幌子下，企图粉饰托洛茨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民族偏差主义的种种作法，必须给予坚决回击。苏斯洛夫提出今后的任务时，要求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应“向计划机关和领导机关提出经济政策和实践、完善生产和法律关系、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会议强调“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是发展理论思想的最重要的条件”，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决议和新通过的党纲，会议讨论了修改过的苏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哲学教学大纲，会议决定在苏联高校开设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课。

苏斯洛夫的报告于2月在《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刊出。

3月5日——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针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发展农业方面存在的重大缺点,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苏共中央告集体农庄男女庄员、国营农场男女工人、农业专家、科学家、工业职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联全体劳动者书》。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苏联农业状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表示“严重的不安”。他针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指出“现在不能确切算出究竟哪一年能解决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任务”。他说,“由于对农业领导的放松,农产品生产的七年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威胁”,“如果再不解决农业任务,那全国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3月9日 苏共中央根据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通过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从1953年到1961年整个农业的总产值增加了60%。但是,“谷物、肉类、奶类及其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水平,仍然是很不够的。这种水平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潜力、对农产品的需要的增长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提高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提出的巨大任务不相适应的。”

决议认为,“必须认真改组农业领导工作”,强调“共产主义建设的一项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在最短的时期内保证充分满足国家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责成全国各级党组织在农业方面执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新纲领的活动中,遵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制订的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具体措施”。“责成苏

共中央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改组全国农业管理工作,在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建立领导农业生产的地区性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这要看以哪种形式为主——是集体农庄还是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和农业委员会。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农业委员会分别由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党委的第一书记领导。认为在中央建立全苏农业委员会是适宜的”。

决议还严厉批评了草田农作制,“认为这种制度从科学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是不适宜于社会主义农业的,必须坚决从草田农作制改为更集约的农作制,广泛种植玉米、甜菜、胡萝卜、豌豆、饲用豆类等高产中耕作物及豆类作物,借以根本改善对土地的利用,必须保证有丰富的饲料,生产必要数量的谷物、肉类,奶类及其他产品。必须抛弃死板的草田农作制公式,而代之以富有活力的、目的性明确的播种面积结构,以便使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和资金最少,而从每公顷土地上获得的农产品最多。”

决议最后指出,实现现在制订的改进农业领导的各措施,就可以达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就将在实现苏共的纲领的斗争中取得历史性和胜利。

3月20日 苏共中央《关于塔什干纺织公司党组织在执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生产和改进产品质量的决议方面所做的工作》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责成党委会和经济领导采取措施,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要争取使每个工段都由高度熟练的专家领导。大胆地把妇女和青年专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还必须更积极地吸收当地民族工人参加公司的工作。公司党委要改进对本车间党组织及党小组的领导,提高党员大会的作用,把职工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提交党员讨论,对工作中的缺点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做好党组织书记和小组长的工作,要更加注意吸收先进工人,特别是主要工种的女纺织工和工长助手入党。

3月2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农业管理的决议》。决议指出,将成立农业管理机构来从事计划工作,并对农产品的生产和采购情况实行监督。决定在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成立领导农业生产的区域性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

3月 《共产党人》第5期发表署名文章《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过渡》。文章说:在30年代中期以前,苏维埃国家具有鲜明的并为法律所确认的阶级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逐渐改变其性质,越来越从阶级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个人崇拜延缓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国家的过程。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过程,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向国家的完全消亡又跨出了一步。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止,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局面,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

4月5日 《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苏维埃全民国家》。文章认为斯大林歪曲和贬低了列宁的国家学说。“现在还有人大肆赞扬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并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全民国家的思想抱怀疑态度。这些人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但社会内部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对社会关系作一次革命性的破坏。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仍要作为无产阶级反对自己敌人的斗争工具而保存下来”。文章批评了上述观点,认为工人阶级虽保持领导作用,但它不论在选举方面或是在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中,都不享有任何优先权。“社会主义民主对整个社会,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而不论其社会成份如何”。作者强调“全民国家是全民的权力机关。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并且是国家一切事务的主宰者”。

4月10日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对科学研究所党

组织的领导》的决议指出：党组织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完成苏共二十二大和新党纲对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上。要加强对科研机关活动的协调工作，消除不必要的重复和狭隘的本位主义，决议认为，党组织必须进一步改进培养科研干部的工作，要求培养科学工作者和专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精神。党组织要尽力支持青年专家，为他们的深造创造条件，努力把青年学者提拔到独立的工作岗位上去。

4月1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农艺师、畜牧师和其他农业专家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的作用》的决议。决议认为，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农艺师应该对组织生产及其最后成果负责。农艺师和畜牧师对生产问题的指示，象工厂里工程师的指示一样，同样必须执行。

4月20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接见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尔斯时说，在没有建立富裕的条件前，让集体农民保留辅助的园地吧。这些园地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在某种时期是对从集体经营中得来的基本收入的补充。赫鲁晓夫还表示，苏联不打算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他说：“尽管我认为，这些宅旁园地的主人将来会亲自取消这些园地。但是这要等公有经济发展到能充分满足集体农民需要时才会发生。那时，他们对自己的小块的宅旁园地不感兴趣了。我们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4月25日 赫鲁晓夫在第六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制订苏联新宪法的报告。赫鲁晓夫认为修改现行苏联宪法的原因，是因为苏联社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国家发展的新阶段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所以，新宪法应该是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是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宪法，它应当适应国家

生活的新的历史时期。

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这些对所有人民说来是神圣的原则，应该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宪法的基础，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明确了新宪法的基本任务是：反映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把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建立更加牢固的保证，为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建立保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准备条件。

4月26日 《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1962年四月全会《公报》。公报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进行期间，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全会审查了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一些问题和组织问题。

全会选举安·帕·基里连科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鉴于伊·瓦·斯皮里多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全会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5月1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科学干部选拔和培训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允许科学院各研究机构在批准的劳动计划范围内，在自己的编制中设立实习研究员职称，其他部委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征得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同意后，也可以这样做。得到实习研究员职称者，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专家。实习研究员每年考核一次，实习期满，按规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办法分配工作，派送的专家则回原地工作，也允许科学研究机构将其中在科学活动中表现最好的专家留下来担任固定的工作。

决议指出：各研究机构，应将有能力青年科学家提升到学术领导岗位。担任科学组织领导职务（包括研究所所长和副所长、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系主任、大型研究室和教研室主任）的人不得超过65岁，在个别情况下，经上级的专门研究决定才能例外。决议还允许在

科研机构中设立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职称，授予有权取得养老金的科学博士和教授。

6月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告人民书，说“党和政府认为有必要直言不讳地说明在供应城市居民肉食品方面所产生的各种困难。”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把牛、猪、羊肉和家禽的采购价格平均提高35%，把肉类和肉产品的零售价格平均提高30%，动物油的零售价格提高25%。

6月22日——24日 《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即将出版的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文章说：多卷本党史应以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为基础，应当贯彻苏共纲领的精神。文章强调，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许多党史书籍，特别是以个人崇拜观点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了许多极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完全克服由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造成的任何影响。

6月2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管理局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什么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首先，这是在最现代化基础上改造农业，保证工业和农业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改造生活和文化，不断地关怀整个社会和每个劳动者物质福利的提高。共产主义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得到满足。如果有足够的肉、牛奶、黄油和其他物品，对于政治上精神上的满足来说就更好了”。

6月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苏联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文章说：苏共的成分反映了它的人民性。在1961年入党的人当中，工农占63.3%。在被接收入党的人中大约70%是工程师、农学家、教师、医生和其他专家。党员中专家的人数已超过了300万人。

7月 《共产党人》第10期发表格列则尔曼的文章《共产主义和

社会进步》。文章说：马克思说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的规律是指资本主义及其以前文明进步的规律，这个规律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已不再发生作用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不再分裂为反动的阶级和进步的阶级，所有的社会集团都关心向共产主义前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同全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增长完全吻合；社会进步同平等、公正、人道等理想之间已无冲突的基础”。

8月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关于个人和合作社建造住宅》的决议。决议规定：在今后若干年内，在城市和城市类型的村镇中，从个人建造单幢住宅逐渐过渡到吸收居民投资合作建造设备齐全的多套住宅。建议建设银行向住宅建筑合作社提供占造价60%以下的住宅建筑贷款。

8月15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纪念前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鲁祖塔克，为他恢复名誉。文章说：“在1938年个人崇拜时期，扬·鲁祖塔克成了无理迫害的牺牲品。”文章认为鲁祖塔克“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毫不动摇地贯彻了党的路线。”

8月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发展艺术影片的领导措施》的决议。决议批评苏联影片中存在着严重缺点，摄制了许多思想艺术质量不高的影片，很少看到当代苏联人的形象，某些影片的作者离开了正确的立场。苏共中央要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部、影协筹委会“彻底改变发展艺术影片的领导工作”。决议提出的具体措施是：组织一批“最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的定货”，成立电影生产总局和各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自1963年1月起出版《苏联电影》杂志作为文化部与影协的机关刊物等。

9月9日 《真理报》发表经济学博士、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文章提出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的生产发展。这一建议在全苏引起广泛反响。并得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支持，开始

在乌克兰的一些工厂试行。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说,“苏共纲领提出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得企业迫切关心接受最高的计划任务,采用新技术和改进产品质量,总之,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必须找到既简便而有根据的解决这一任务的办法”。“我们认为,如果只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注意供货单位和使用单位之间的直接联系。”利别尔曼反对将突出利润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说:“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利润同资本主义的利润毫无共同之处。象利润、价格和货币这样的范畴的实质,在我们这里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正成功地、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劳动产品实行计划价格和净收入的利用是为整个社会造福的情况下,我们的利润既是劳动消耗的结果,同时又是劳动消耗实际效果的尺度(以货币形式表现)。”

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在南斯拉夫访问时发表讲话说:“我们党公开而大胆地揭露和批判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事,对于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有重大意义。消除个人崇拜及克服其有害后果为大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政治和劳动积极性,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创造力和使其更快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开辟了广阔天地”。

9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发表编辑部文章《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文章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了,社会对抗永远消失了,人民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统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客观上使得社会利益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就把人们团结和联合起来,为所有的人都形成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创造了社会的、经济的前提”。

10月21日 《真理报》就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的出版载文说,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当时列宁签订和约的方针,斯大林也采取了错误的、实际上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方针联成一气的立场。

10月31日 苏共中央审议了《关于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党委会在技术进步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的问题,并通过了决议。决议认为,党委应特别重视加强车间和各科室党组织,以及所有生产环节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要使质量检查委员会在制造优质产品和加强技术进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1月2日 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长文《领导社会发展的科学基础(发展社会科学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是他在10月13日至20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彻底铲除个人崇拜的后果,使党的创造精神占统治地位。文章认为,经济学家不重视研究实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的理论脱离实践的观点起了作用,使理论迁就了实践中的缺点,并为它辩解。在历史学方面,“吹捧斯大林而离开历史真实的情况还很多,首先是缩小历史课题,提到首位的总是那些有斯大林参与的事件,把列宁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变成了斯大林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文章还说斯大林“犯了许多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在语言学方面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混乱的,应从根本上改进语言学方面的整个科学工作。

文章还具体说到了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任务,首先是彻底摆脱斯大林的公式和概念。伊利切夫认为,“研究共产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问题,是目前条件下社会科学的最迫切的问题”。

11月19日——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并通过了

相应的决议。

中央全会还研究了组织问题。全会选举列·尼·叶弗列莫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全会决定瓦·伊·波利雅夫和亚·彼·鲁达科夫由苏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正式委员。

全会还选举苏共中央工业和建筑局主席亚·彼·鲁达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瓦·伊·波利雅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组织党务问题委员会主席维·尼·季托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批准任命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杰米契夫为苏共中央化学和轻工业局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列·费·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亚·尼·谢列平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

鉴于成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会决定把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

批准任命尼·实·什维尔尼克为党务委员会主席，齐·季·谢尔久克为第一副主席。

赫鲁晓夫在全会作了报告。他认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从组织上改组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他认为党兼管工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提出必须把生产原则作为自上而下地建立党的机关的基础，以便保证党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更具体的领导。赫鲁晓夫主张取消现有区党委，建立农业管理局党委和工业生产党委，主张在州和边疆区分设领导工业和农业的党委，苏维埃及其执委会也分成两套。共和国党中央主席团下设立两个局分管工农业，强调这两个局有广泛的自治，主席团不要干涉和监督。报告还提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设立领导工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和领导农业生产的苏共中央局。

在报告中，赫鲁晓夫还提出“解决经济生活真正国际化的任务”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各国的民族经济愈来愈密切地接近，是它们的生产力国际化的进步过程，“应当着手建立一个包括经互会成员国代表在内的统一计划机构”。

11月2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并把这项任务当作党的头等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还必须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进行党的领导，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党的作用无比增长，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进行组织上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决议认为“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为了保证对工农业生产的更具体的领导，苏共中央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

这一改组的具体内容是：在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

——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学校、科学研究所、设计机构以及其他为工业生产和建筑业服务的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

——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试验站、农业学校和科学研究所、农业原料加工企业、采购机构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机关和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也成立一个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

在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分别设立：

——领导工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

——领导农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

为了改进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认为在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是适宜的。

为了解决具有全共和国意义的问题和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作，

在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

12月1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观美术展览和抽象派画展。赫鲁晓夫对展览中表现出的形式主义倾向，当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美展的举办者“采取了自由主义”，被人“牵着鼻子走”。针对抽象派画家法里克、什捷林贝格等人展出的《裸女》、《静物》、《青鱼》等，赫鲁晓夫说：“这些人自称为艺术家而创作出这种‘图画’，你简直不懂得是用人的手画的，还是用驴尾巴涂的！”

12月5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贺词中说，苏共十一月全会通过的按生产原则建立党领导机关的新结构，能够使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生产问题上。我们党实行改组是为了保证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进行具体的领导。“全会决定建立统一的党和国家的监督。这种监督应该保证系统地检查对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加强国家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协助党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勃列日涅夫还说，“当我们在谈论克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时，我们指的不单是消除和纠正对革命法制的破坏，而且要在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克服思想上的停滞和保守，要完善国家和党的领导形式”。他认为“十一月全会的决议，是我们的列宁主义党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建立一套完整而和谐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路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12月17日 苏共中央领导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伊利切夫等会见苏联文艺工作者。赫鲁晓夫认为这种会见“有助于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表讲话时说，人民性和党性是发展文化的政策基础，他要文艺工作者遵循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路线。不然，“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他对苏联文艺界出现的抽象派、印象派等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是对西方的“可怜的模仿”，

是“病态的矫揉造作”。他还批评音乐界“醉心于各种外国爵士乐的怪叫”，电影界拍摄故意雕琢和复杂化的影片，文学界“常常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指责“某些文艺工作者完全热心于在后院捡垃圾，不愿去看我们发展的主要干线上发生了什么”。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

伊利切夫强调：“如果我们在批判个人崇拜后果的幌子下，打击了我们的社会 and 我们的思想意识，那我们就不是创建共产主义的伟大艺术，而是丢掉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他认为，“不能容许有任何脱离我国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高标准，它的核心是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多么严酷”。

12月20日 莫斯科就肃反委员会成立45周年举行集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严重地反映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中。他说，党对这个机关的监督逐渐被斯大林的个人监督代替了，以致这个机关的活动中产生专横和非法行为。报告说，从肃反机关中心清除了破坏法制的人，从党、政、团积极分子中选拔出了新干部来加强这个机关。

12月24日——26日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召开青年作家、画家、作曲家、电影和戏剧工作者会议。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在会上作了题为《青年创作力量要为伟大理想服务》的长篇报告。他强调“文艺在我们国家发展不能没有舵，没有帆”，“为最人道、最正义的社会——共产主义——在人世间胜利而满腔热情地战斗，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学艺术的主要使命”，“党主张勇敢的、英勇的、真实的艺术”。伊利切夫以《山外青山天外天》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例说：“我们党历来支持真实的、具有最尖锐的批判倾向的作品，只要这些作品站在自觉的立场，贯串

着我们社会的理想”。同时他又强调不能把个人崇拜题材“变成耸人听闻的消息”，“不能贬低苏联人民的生活、历史、伟大成就和美好志向”。

伊利切夫在报告中批评叶夫图申科等人写了一些迎合庸俗情调的东西；电影界出现了歪曲生活真实的影片；戏剧界出现了形式上故弄玄虚、卖弄噱头的戏，舞台上出现下流的行话；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有人竭力为异己现象“奠定理论基础”，如图尔宾的《时间同志，艺术同志》。他还对“民族的孤立和限制的倾向依旧存在”表示遗憾，认为“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特殊化和因循守旧，反对民族主义的残余和偏见，不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如何”。伊利切夫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根据苏共新纲领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立场，同时强调：“党在艺术领域里过去执行了，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

1963 年

1月1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斯大林不仅是在我国内部，而且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苏共以及其他马列主义的党批判斯大林，使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内部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纯洁。

2月8日 《共产党人》杂志总编辑斯捷潘诺夫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批判斯大林的农业政策。他说：斯大林不能正确地对待农业，在领导农业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严重地损害了工农联盟。斯大林的实际活动和对农业的政策常常脱离列宁的结论和指示。文章指责斯大林“不熟悉农村，也不懂农业，他把农民与其说看成是劳动者，不如说看成小私有者，他执行了不正确的低价征购农产品的政策，过多的征税，不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创造主动精神。结果，农业处于荒芜状态，使工农业联盟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的威胁”。

2月16日 根据苏共中央1962年11月全会关于按照生产原则加强对经济的领导的决定，苏联部长会议将全国经济行政区又加以调整，合并调整后共成立47个经济行政区，设立47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3月7日——8日 苏共领导人会见文艺工作者。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是苏联文学艺术的伟大力量》的讲话。伊利切夫发表了题为《关于艺术家对人民的责任》的讲话。

赫鲁晓夫说，这次会见对苏联文化和文艺朝着苏共党纲所确定

的方向发展具有原则性的意义。他认为苏联文艺的任务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再现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而英勇的时代,反映新的共产主义关系的确立和胜利。他谴责写阴暗面的人是“按照厕所的气味来判断现实”,“只能使人们陷入沮丧、忧郁和没有出路的境地”。赫鲁晓夫认为近年来文艺界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个人崇拜时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同时又说“那些年月并不象敌人所设想的那样是苏维埃社会发展中停滞的时期”,“那些极端片面地评价我国生活中的那一阶段,力图把一切事情都说成漆黑一团、用黑色颜料来描写的作家,是不正确的。”他在批评斯大林“晚年成了多疑症和迫害狂的严重患者”,“粗暴破坏党内生活准则、专横和滥用权力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同时,又强调“对于斯大林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党也予以应有评价。我们现在仍认为,斯大林是忠于共产主义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伊利切夫在讲话中说,自从1962年12月17日会见后,现在一切都上了轨道。人们理直气壮地谈论着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谈论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仍有人继续固执己见,心怀不满,对目前发生的事都啧有烦言,有的则保持“沉默”。他还说,保证对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对自然主义的大赦。“必须防止有人企图借反自然主义打击现实主义艺术家,正如同指责在现实主义艺术中探求新形式的人犯形式主义一样”。

同月11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赫鲁晓夫的讲话“表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最重要的理论原则”。

3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认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领导国家工业和建筑业的最高国家机关,向政府报告自己的活动,并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颁布对所有国家机关(不管其隶属关系如何)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和指令。苏联最

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国家经委主席，国家建委主席及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主席均由最高苏维埃任命。会议任命德·乌斯季诺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4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吉尔吉斯党组织在完成工业、建筑业和农业七年计划任务方面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责成吉尔吉斯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部门工作的监督，指导它们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同盗窃人民财产、诈骗、受贿行为，同过寄生生活、进行投机活动和私人企业主活动的人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广泛吸收劳动者的社会团体参加这一斗争。

决议还要求吉尔吉斯党中央始终不渝地完善党委会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对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构的状况，对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所应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同时反对宗教残余及对待妇女的封建贵族态度，反对地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各种苗头。应把对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进行国际主义和各民族友好教育的问题摆在党组织注意力的中心。

4月24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俄罗斯联邦工业和建筑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赫鲁晓夫说：“十一月全会以后，全国完成了按照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的工作，党—国家监督机构已开始活动，要严惩各种犯罪活动。要求所有公民都应当帮助党—国家监督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的工作，他指责个别作家从党所进行的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工作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这就是“削弱领导、削弱对国内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有组织的管理”。“这些人不懂得，这种斗争不能解释为否定权威，贬低领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过去和现在都说：我们赞成权威。工人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应该有当之无愧的权威人物和领袖。我们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

就是苏联久经考验的领袖，被选入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是我们党内和国内最有威望的人物”。

4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8期公布苏共二十二大以来发展党员情况。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苏共党员增加67万多人，到今年1月1日，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为10387000余人。文章强调吸收新党员要看他的生产成绩。文章说：“去年被吸收为预备党员的每100人中，就有86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

6月18日——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武器》的讲话；伊利切夫作了《党的意识工作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全会讨论了“关于中共中央为一方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的问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全会的全体参加者都看到了分发给他们的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来信。全会通过了《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决议。

全会还研究了组织问题，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和尼·维·波德戈尔内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收到了宇航员瓦·弗·捷列什科娃和瓦·费·贝科夫斯基从东方6号和东方5号飞船上向全会发来的贺电。

6月21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表讲话时说：为了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克服个人崇拜带来的有害后果，苏共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因为二十大讨论反对个人崇拜时，苏共领导人中有过尖锐的斗争，有些人感到自己同斯大林一起犯过许多罪恶，害怕自己被揭露，经过很久争论他们才同意将这问题提到党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党，为了党的纯洁。赫鲁晓夫还强调

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他认为“谁要是想置身于党的政策之外,否认意识形态中的党性,那就等于组成一个非党人士的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党。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反对我们的现实”。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的思想和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和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决议对一些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思想工作提出批评,指责它们没有充分利用苏联社会所具备的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条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克服思想工作与生活相脱离,徒具形式和只根据所采取的措施的数量来评价工作结果的现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往往不考虑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民族区别和年龄。”

为了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今后进行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使劳动人民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克服苏联人意识和行为中的旧残余;对积极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进行劳动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和文化程度;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对反共宣传;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形式进行坚决的斗争。”

决议认为,提高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必须使全体人民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大力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决议强调必须提高科学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和在对人民进行思想科学教育方面的作用。“社会科学工作者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总结群众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活生生的实践和历史经验,大胆地、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为革命理论在思想上的纯洁性而斗争;同时就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的主要问题

以及其他科学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讨论。”

在对全体苏联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提高它们对贯彻苏共纲领和章程、对人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对实现道德规范的原则、对提高每一个苏联人的劳动和政治积极性的责任感。”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中央全会完全和一致赞同赫鲁晓夫“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中央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2. 赞同苏共中央今年6月18日对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来信的声明。3. 责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即将举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会谈中遵循下列各点:“坚定地执行我们党在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所采取的路线,这条路线已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并且被实际生活、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践和国际事态的进程所完全证实。”

决议提出“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中共中央方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遵守已经达成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7月2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选举谢列斯特为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全会鉴于波德戈尔内已提升为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了他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7月14日 苏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发表公开信。公开信首先说: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1963年6月14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公开信写道:“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

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们党在第20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

关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信中写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动。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崇拜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公开信还谈到“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苏共中央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由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决定，它的形成和道路取决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利用现有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公开信还指出，“苏联共产党人知道，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过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而且要继续说这一点，但是，象中共领导人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赶开并推入帝国主义阵营，是不正确的。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

7月19日 赫鲁晓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匈友好大会，并发

表讲话，内容涉及到战争与和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匈牙利问题、斯大林问题、与中共的关系等。

赫鲁晓夫说：“我们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消除了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并发生了向列宁主义原则的转变”。“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很多信，工人、农民、知识界人士在信中写道，现在苏联人民生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如果斯大林早10年离开领导工作，就有可能更早地开始现在党所进行的工作，那么，苏联人民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好！”“在那个时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上班去了，但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再回家，是否能再看到自己的妻子，是否能再看到自己的孩子”。“斯大林不仅向敌人，而且也向自己人，向朋友，向革命的老战士射击。因此，我们谴责他，谴责他的专横、滥用权力。谁也不会去粉饰个人崇拜时期的这些肮脏的事情。”“因此，那些想改变我国的秩序，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行为大加赞扬并加以保护的人，是白费力的”，“谁想把斯大林抬到宝座上并让斯大林牢牢地坐在那里，那么，他所要的就不是我们党、我国人民所要的东西”。

赫鲁晓夫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过理智很好地理解到这点。有人在评价生活时只根据他所获得的福利多少，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肚皮来领会生活的”。当苏联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方面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甚至仅仅通过胃感觉到生命的人也会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制度。

8月7日——1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工作干部会议。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致开幕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作专题报告；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发言，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斯纳斯金作会议总结。会议根据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讨论了政治教育的任务，认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苏共二十二大、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和六

月全会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任务,研究现时代的迫切问题。”会议号召哲学工作者要“了解党同‘左’倾和右倾进行斗争的历史”,“学会看穿隐藏在大喊大叫的‘极端革命的’词句背后的现代教条主义者的观点”。

8月24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哈萨克斯坦捷米尔塔马市党委会对工业和建筑业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组织要改进选拔和培养干部的工作,用能干的组织者去加强落后的单位。提高干部对所委托的事业的责任心,教育他们无条件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对于那些弄虚作假、蒙混欺骗、滥用职权、道德败坏的领导人员要严肃处理,撤销其职务。要采取措施使干部在企业 and 建筑业中稳定下来。

9月2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在北高加索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由于气候不好,1963年粮食产量受到影响,出现了困难局面。收获不到预计数量的谷物,“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他还说,“增产谷物的任务,我们主要是靠扩大播种面积来解决的……这曾经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当时国家没有化肥,很难把单位面积产量增加1倍到2倍”。“现在情况在改变。党为农业化学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急剧提高谷物和其他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及生产集约化就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总方向了。”今后粮食增产的“两个实际源泉”,是增加“化肥的生产和扩大水浇地的谷物生产”。赫鲁晓夫强调肥料生产是现在农业高涨的基础的基础”,1970年要达年生产1亿吨的水平。

11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社论谈苏共改组后领导干部的情况。社论认为,改组后党的领导干部组成得到了加强。“州和边疆区的工业党委书记中有98.6%受过高等教育,农业党委书记中有96.2%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大多数是专家,有很多副博士和博士”。

同月，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开会讨论剧院“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和剧院演出的思想艺术性”。该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鼓舞人民建树功勋的艺术》的长篇讲话。伊利切夫批评一些剧本离开历史真实，歪曲时代的特点，“对个人崇拜后果的批评往往在客观上转化为给苏联社会的生活方式抹黑的偏见”。剧本中常常出现充满怀疑情绪的青年人，他们轻蔑地唾弃一切，批评一些“戏剧家在时髦的、实质上是庸俗的理论家面前低头，同青年调情，并放弃作者立场的原则性和思想明确性”。伊利切夫要求戏剧家明确“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典型的特点”，反对因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而把苏联人民的劳动及其世界历史性的胜利一笔勾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他批评一些剧作家鼓吹“善良”和“忍让”，说什么“需要善良，需要以善良的态度对待人”，“没有比不忍让的精神更坏的了，……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伊利切夫认为上述种种问题的出现，表明作家“缺乏哲学修养”，戏剧评论的“总的思想水平极低”，而且往往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

12月9日——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加速发展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的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还研究了组织问题。全会解除了弗·瓦·谢尔比茨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选举彼·叶·谢列斯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2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加速发展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的决议》。

决议指出：“共产党认为经济建设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而坚持不懈地改进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领导。根据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决议，党的机构按照生产原则进行的改组，使各级党组织能够更

加具体和目标明确地领导工业、建筑业和农业。党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技术政策的集中化,更加正确地组织基本建设和提高整个经济工作的水平”。决议认为,在当前条件下,优先发展最先进的、能够在短期内从投资中收回最大经济效果的国民经济部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现在,在发展我国经济方面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化学工业,它是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门以及提高人民福利的最重要的杠杆”。

决议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今后7年(1964—1970年)进一步发展化学工业的具体计划,认为“实现这一计划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决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委、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1970年增产的幅度如下:化肥7000至8000万吨;除莠剂和其他农药80至90万吨;化学纤维135万吨;塑料和合成树脂350至400万吨;汽车轮胎4400万个;颜料240至280万吨;增加合成酒精和合成脂肪代用品的生产,使它完全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并完全代替技术用粮。

到1970年,纺织品达到123亿米,比1963年增加将近50%;长短袜子达到22亿双,增加近1倍,针织衬衣达到16亿件,增加近2倍;针织外衣达4亿件,即增加2倍;靴鞋达6.5亿双,比1963年增加近50%。

12月2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谈进一步改进干部工作。社论说,要大胆提拔青年人,在工作中成长起的人。应该严格执行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关于系统地更新被选出的机构的成员,绝对遵守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1964 年

1月29日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苏联电影创作问题。会议对批判斯大林的影片《寂静》和《生者与死者》等表示赞扬,认为电影的任务就在于坚决地揭露我们意识形态的敌人、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伪造、诽谤和谎言;就在于以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在创作中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确立我们的意识形态——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该委员会强调,艺术家应“扩大眼界,克服僵硬概念的狭隘性,敏锐地觉察在人民生活中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中正在诞生和发生的新事物”。

2月10日——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关于在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实现综合机械化、采用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农业生产集约化来尽快增加农产品生产的问题;2.讨论苏斯洛夫《关于苏共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赫鲁晓夫在会上讲话说:在农业收成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现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只有死硬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在这里看到什么放弃总路线”。

2月15日,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实现综合机械化、采用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农业生产集约化来尽快增加农产品生产的决议》。决议指出:“党提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在最近几年内增产谷物50——70亿普特,即到1970年把谷物总收获量提高到140——160亿普特。增产谷物是发展整个农业

的基础。”决议强调“集约化是提高农业的总方向，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康庄大道”。实现农业集约化的主要措施是：1. 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广泛化学化；2. 大力发展农业灌溉；3. 实行综合机械化。“农业的集约经营要求在生产中最广泛地采用科学成就和先进经验”。决议认为“提高落后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农业机关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近年党政机关和农业机关采取了大量措施帮助落后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在短期内克服经济上薄弱的集体农庄的落后状态，提高落后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全国全党的大事”。

2月15日，全会在听取和讨论了苏斯洛夫的报告后，通过了《关于苏共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苏共意识到共产主义团结一致的历史重要性，最近期间采取了一些新的步骤来克服或者哪怕初步缩小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以及巩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兄弟党也进行了阻止分歧加剧的尝试”。决议认为，“兄弟党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运用于当代条件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努力作出的新的估计和结论都被中国领导人加以歪曲。这些新的估计和结论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关于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实践的可能性；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决议最后表示，“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和一致拥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了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保证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以及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并且责成中央主席团今后仍坚定地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力求加强当代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

2月2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决议》。决议允许大学教授和教师在企业和科学单位兼职,给他们额外贴补50%的工资。

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执行中央二月全会决议的具体措施》的报告。他说:必须大胆和坚决地沿着从物质上鼓励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关心的道路前进。不能在直接生产产品的人们的物质刺激方面节约,要反对平均主义。他还提出了制订物质鼓励制度的实际建议,他还批判斯大林执行了有害于农业的价格政策,批评某些地方机构违反了1955年苏共中央决议,把作物的播种计划强加给集体农庄,在农业技术中硬套死板公式。

3月16日——18日 苏共中央召开各加盟共和国社会治安部部长、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中央党、政、工、团和公检法的负责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苏联总检察长鲁金科作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国家法制》的报告。与会者讨论了这一报告,并就党委协助公检法机关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方面,在吸引社会团体和劳动人民集体参与维护法制、在未成年的人中消灭犯罪行为以及在改进劳动感化机关里的罪犯的工作等方面交流了经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3月2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计划在工作实践中遭到粗暴破坏的不正常现象的事实》的决议。决议认为“商品产品量应是新的计划制度的起点,并作出如下决定:1. 谴责危害和阻挠农业生产发展的公式化计划工作以及从上面把播种面积、结构、牲畜头数和其他生产指标强加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做法。禁止在国家计划之外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规定任何指标的生产任务。责成各级组织向侵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订生产计划的权力的工作人员严格地按党纪国法追究责任。这种侵

犯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应由那些把农场推到亏本道路上去的人赔偿。2. 作物的收获量、播种面积的多少、牲畜的头数、完成农业工作的期限、农业和畜牧业方法以及利用科学和先进实践经验的措施,应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专家和领导人根据当地条件直接在那里确定。3. 必须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传达的只是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计划,而生产计划要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自己来制订,其出发点是必须保证完成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计划。在制订计划时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同生产管理局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最后的决定要由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和国营农场场长作出,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55年3月的有关规定宣布无效。4. 在规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计划任务时,必须考虑到每个单位的经济在专业化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高涨的利益,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建立保证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基金,严格遵守关心物质利益这一发展经济的极重要条件的原则,等等。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发表彼得连科关于苏共干部问题的文章。文章说,在1963年的总结和改造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新了1/2以上。市委、市属区委选出了3/4以上的新成员。由于更新,干部的质量有了很大改善。约有99%的工业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书记受过高等教育,96%以上的农业州党委与边疆区党委书记也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国民经济专家。一半以上的市党委、市属区党委、工业生产党委会书记是受过高等和中等技术教育的专家。文章还说:虽然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来提拔有能力的生产领导者,有威信和群众引路人,然而挑选有才能的组织者的工作在有些地方还是进行得缓慢。党的机关、领导人需拿出最大限度的敏锐、机智,以事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更换教育水平低的人。

4月24日 《真理报》发表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

于与实现党的农业集约化方针有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书。意见书指出：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中间不应该有不懂业务的冒牌专家。苏联正在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它要求每个专家和每个领导人都要精通委托给他们的工作。赫鲁晓夫认为，有些农庄落后的原因在于个别领导人用空话来使农庄摆脱落后状况，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认真的组织工作。意见书强调指出必须善于挑选和培养干部，不要害怕提拔青年干部，青年们早已得到老一辈的承认，他们用自己英勇的劳动博得了这种承认。

赫鲁晓夫认为西方资本家在建立商品率高的畜牧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此应深入研究和吸收美、英、丹麦和联邦德国等国的好经验，“把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的东西都运用到农庄、农场中”。

赫鲁晓夫最后建议改变现行的劳动报酬制度。他对萨马尔斯基农场的建议——根据所收获的庄稼实行每公担产品的直接报酬——表示满意。

苏共中央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意见书，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5月15日——16日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赫鲁晓夫与文艺界人士会见后一年来的情况。会议认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在创作组织中有了健康的气氛，文学艺术力量在原则的思想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团结。会议强调党和人民需要“能够巩固共产主义阵地”、“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并团结人民的力量”的作品。该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作了报告。他说：“我们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在社会主义美学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反对那些妄想抹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资产阶级现代派之间的根本区别的企图。最重要的任务，要为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的概念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们企图把学究式的庸俗教条强加给社会主义文化。”

6月5日——6日 苏共中央举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的学术会议。伊利切夫和波诺马廖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伊利切夫说：“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运的团结而斗争，是苏联社会科学各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苏联科学家应当感到，最主要的是，应当象意识形态阵线的积极战士那样行动，著述创造性地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各个方面的新著作，其中包括著述当代各种基本问题的科学通俗读物”。康斯坦丁诺夫、波斯别洛夫、托尔库诺夫、尤金、加托夫斯基等学者在会上也发了言。

7月8日 赫鲁晓夫向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讲话。他在指出苏联已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同时，强调“无论军事技术及其歼灭作用有多大，无论军队机械化和自动化达到什么水平，人还是占第一位”。赫鲁晓夫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人有坚忍性和果断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并说“我们发誓保卫我们祖国的边界不受侵犯，准备随时对那些侵犯苏联以及我们的盟邦和朋友的边界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毁灭性的打击”。

7月13日——15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执行苏共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的纲领的措施》。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问题，其二是关于提高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问题。他说，“在形成和确立新的共产主义结构的时代里，经济事业被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身提到首要地位”，否则“完成了革命的人民就不能尝到革命的现实成果”，“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利，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两项法令：《关于提高教育、卫生、住宅—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以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关于集体农庄庄员优抚金和补助金》。

7月15日 会议选举米高扬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解除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会议因勃列日涅夫调任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了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8月1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再度修改普通学校学制》的决定在《教师报》上发表。在此之前,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阿法纳辛科在一次报告中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1年并把这个时期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情况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期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谓地浪费时间……这种状况常常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根据这一决定,12月5日公布了具体措施。普通学校的学制从11年制改为10年制,大幅度压缩普通学校的劳动时数,放弃普通学校实行职业教育等。

9月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赫鲁晓夫说:“编制最近时期的远景计划时,必须依据这样的方针: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如果说在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和战后年代,我们把重点放在发展作为全国经济高涨的基础的重工业和加强国防能力方面,那么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由于国防水平达到了应有的水平,党提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的任务。”“我们应当把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摆在第一位。”

10月1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公报说:“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

准了赫鲁晓夫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任命阿·尼·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解除了他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10月19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欢迎宇航员大会并发表讲话说:我们党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勃列日涅夫指出国内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10月25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苏共领导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及西伦凯维兹等,在波兰边境比亚沃维斯卡森林的普什哈举行会晤。苏共领导向哥穆尔卡等解释了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并希望得到波党的支持。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发展苏共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关系的问题,以及发展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全面合作的问题。哥穆尔卡认为,“由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规定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政策的总路线,以及苏联对一切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对我们党、我们政府和我国人民是完全适合的”。

10月26日——2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苏共领导,同以法共中央书记马歇率领的法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苏共领导在会谈中表示,苏共的政策不会因赫鲁晓夫被解职而有任何改变,苏共在赫鲁晓夫任苏共第一书记时“所公布的一切文件”和“致兄弟党的信件仍然有效,都不会改变。这一切都是主席团同意的”。马歇在向法共中央全会作报告时说:“苏联领导人否认了这种暗示:苏共将设法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妥协”。

11月1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艺术创作的鼓舞人的思想》。这是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党中央机关报就文艺问题发表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苏共纲领规定的文艺方针是苏联“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苏联的艺术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人”。社论要求“艺术界和知识界要为党性和人民性，为文艺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而斗争”。

11月5日——13日 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会见了苏联党政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苏共新领导表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

11月6日 《真理报》和莫斯科各报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斯大林时期被处死的佐尔格以“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真理报》同时发表文章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佐尔格的功绩被遗忘了”。

同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并作报告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苏联正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我们国家里早就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联盟日益加强。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被思想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一致凝结在一起的苏联人民，体现着摆脱了社会对抗和民族对抗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的一致”。

“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它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愿望，保护他们的利益”。“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理想，党的纲领成了全体人民实际行动的纲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

关于苏联的经济政策，勃列日涅夫强调“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其中最先进的部门；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电气化和化学化；加速发展农业和提高其收入；扩大消费品生产和改进对居民各方面的服务。我们整个计划工作和经营工作应当建筑在客观估计和准确情报的巩固的基础上，建筑在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科学成就上。生活已经一再表明，凡是以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决定来偷换对事情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地方。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勃列日涅夫认为发展生产，“必须广泛地采用经济刺激”，“更加充分地运用使集体农庄和庄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的原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忽视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为满足本身需要而从事私人副业的条件，是不正确的”。

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等联名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纪念1938年6月因个人崇拜受害者奥金佐夫75岁诞辰。奥金佐夫曾任副农业人民委员。文章称赞他是诚实、谦逊和处处表现出高度原则性的共产党员，是舍身忘我地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榜样。11月14日，莫斯科作家为已恢复名誉的作家巴别尔70岁诞辰举行纪念会，全苏作协第一书记费定发言时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没让巴别尔唱完自己的歌。

11月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尼·维·波德戈尔内《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工业苏维埃机关和农业苏维埃机关合并》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选举彼·叶·谢列斯特、亚·尼·谢列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彼·尼·杰米契夫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由于重病需长期治疗”，全会解除了弗·罗·科兹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全会还解除了瓦·伊·波利雅

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全会还通过决议：“由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把阿·伊·阿朱别伊同志开除出苏共中央”。

全会决定把下列 8 人从苏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苏共中央委员：阿·阿·叶皮谢夫、弗·费·日加林、瓦·伊·科诺托普、伊·康·卢塔克、彼·米·马谢罗夫、格·伊·波波夫、弗·叶·谢米恰斯内、根·费·西佐夫。

11 月 16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加强党及其地方机关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更加顺利地解决每个州、边疆区及共和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任务，认为必须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党章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原被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州和边疆区，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把州和边疆区的所有共产党员，不论他们是从事工业工作，还是从事农业生产，都联合在一起。边疆区、州的党组织建立统一的边疆区、州的党委会。”“必须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改组为区党委会，集中对各级党组织、包括该区的工业企业和建设单位党组织的领导。撤销以前在农业地区、州中心和共和国中心建立的工业生产（地区）党委会。”

决议指出，“凡是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会和州党委会的边疆区和州，于 1964 年 12 月分别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选举相应的党的机关”。决议“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合并边疆区、州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办法和建议。委托中央主席团研究和解决有关在边疆区和州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以及有关恢复统一的苏维埃机关的一切组织问题”。

11 月 18 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忠于列宁的组织原则》。社论

就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作了具体论述。社论指出：“两年前，根据所谓生产原则，对党组织进行了改组，结果把绝大多数边疆区和州的统一的党组织分为两个党组织：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成立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和工业生产（地区）党委来代替农村区党委。后来，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进行了同样的改组。生活并没有证实这种改组是适宜的，这种改组是在缺乏应有的准备，不考虑它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地匆匆忙忙地进行的。……把党组织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引起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改组同生活发生了矛盾。生活表明，实际上不可能划清工业党组织同农业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用所谓生产原则代替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客观上使党政机关和经济组织的职能、权力和义务相互混乱，使党委会代替了经济机关。改组的结果，作为行政经济单位的区，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应付不过来”。

“由此可见，把州和边疆区的组织分开，以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会代替党的区委会，建立工业生产党委会，这些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如此，在许多极其重要的经济建设单位，这种改组还削弱了党的机关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因此，中央委员会在详细权衡了当前形势之后，考虑了地方工作者、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意见，得出了结论，必须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原则”。

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为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科西奥尔恢复名誉。文章说他是党和国家的卓越活动家，“这位波兰农民的儿子，也遭到了列宁的许多学生同样的命运，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专横的牺牲品”。

11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柯西金出席土库曼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一切成绩，都是由于实

现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共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它是不可动摇的”。

12月3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捷友好大会，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总统诺沃提尼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勃列日涅夫在讲话时说：“我们有明确的和正确的前进方针。这就是我们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确定的、载入党纲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改变已经确定了的道路——建设共产主义道路”。苏捷联合公报还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将是朝着克服国际共运困难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12月6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文章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人民群众的作用被贬低，列宁的国家管理方法遭到歪曲，妨碍了彻底贯彻苏联宪法的真正民主的原则”。“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文章强调，“个人崇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苏共在谴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和滥用职权的同时，在“设法建立可靠的保证，防止这种现象”。苏共近十年来在发扬民主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其“目的是克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

文章指出，持有“在剥削阶级本身消灭后，阶级斗争还存在（甚至在加强）”这种观点的人，这是在“为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实践所特有的唯意志论、专横和目无法制进行辩解的典型手法”。“个人崇拜的维护者是不喜欢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全民国家的活动的”，他们“想一笔勾销全民国家的思想，勾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使我国回到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制度中去，这种企图尤其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苏共的性质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局

势。工人阶级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党的性质也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

文章还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改组措施,认为这种改组太仓猝,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讨论,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的、有计划的领导造成了困难”。

12月7日 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尤苏波夫被解除职务。原哈萨克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接任第一书记,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伊谢巴耶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

12月12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召集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通告》。通告说:为了更好地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原订于12月15日召开,由于许多党反对,其中包括东欧一些党的反对,苏共中央决定将会议延期。在发出这一通告前,苏共中央已于11月24日将通告内容写信通知中共中央。

1965 年

1月6日 《党的生活》杂志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苏共纲领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其发展》。文章说：“国外有人猜测，甚至断言，十月全会以后，看来苏共会放弃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会重新审查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订的总路线。这是徒劳的打算。相反，我党关心的是要彻底埋葬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做法，根除其复活的可能，并更坚定地推行自己的总路线。由党的二十大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可能也不会重新回到老的做法上去”。

2月22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教育青年是党的事业》。文章说，近年在口头和报刊的宣传中，“时而出现对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的片面观点，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位，遮住了苏联人民伟大的、真正的英雄事业”。一些人“有时过于醉心于描写个人崇拜时期的专横、无辜被判刑的人们的精神感受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会混淆苏联人的视听，尤其是对青年，有时过份地和不适当地赞扬这种作品，而批评它们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如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3月1日——5日 苏共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原拟将其开成26个党“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1964年7月提出），由于7个党拒绝出席，后改称“协商会晤”。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称，要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创造条件。会晤还通过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

3月3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米高扬、波利扬斯基、谢列平、伊利切夫等出席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基里连科代表苏共中央致词祝贺。苏共中央在祝词中号召“对思想动摇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情绪及抹黑的种种表现毫不妥协，坚决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做法”。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真理报》就代表大会的召开发表社论，社论强调“苏联作家的崇高使命是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那些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美学理论进行不调和的始终不渝的斗争”。

3月24日——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 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报告人勃列日涅夫；2. 关于1965年3月1日至5日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结果——报告人苏斯洛夫。全会就上述问题一致通过了决议。

全会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全会将基·特·马祖罗夫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递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全会选举德·费·乌斯季诺夫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解除了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全会解除了列·费·伊利切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被任命为副外长）。

3月24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作《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近几年来农业发展的基本总结；2. 改善农业产品征购制度；3. 关于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4. 使科学和先进的实践为尽力发展农业生产服务；5. 进一步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一些问题；6. 提高党的农村工作水平。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指出：“如果说在1959年以前农业有显著提高的话，那么后来这个时期它实质上

是在原地踏步”。他强调所以在这次全会上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问题,是“由于近几年来在农业领导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近几年农业领导的实践中纯意志性的行动越来越占上风”,在计划工作、规定价格,财政拨款和贷款等方面都是如此。勃列日涅夫要求“必须更快地纠正在农业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应当在广泛的经济基础上利用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来发展生产”。

3月24日——25日 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里亚乔夫、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赫鲁晓夫,这是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赫鲁晓夫。

戈里亚乔夫说:在这次全会上明确阐述了党内工作的任务,这实质上是近年来的第一次。“以前,改进党内工作的措施只是经济任务的形式上的附加物,这引起了党内工作者理所当然的不满情绪,而且也没有使报告的内容更为丰富。对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特别是思想工作者的劳动的评价,有时甚至是侮辱性的。我记得在中央六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同志责难他们说:‘他们不播种也不收割,光是啃面包。’最近几年,挑选干部去做党的工作,例如,做国营农场党组织书记,发生了困难,虽然以前这是光荣的事情”。

姆日阿瓦纳泽说:“1962年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按生产原则分开,是同我们党章的要求相违背的。这在当时也是很清楚的,这种企图是病态的幻想的结果,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这是一种要在幻想出来的短时间内围抱住无法围抱的东西的愿望。是不是仅仅在农业中才是这样呢?大家知道,当州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分家时,许多中央委员都说这个问题。我所遇到的党中央委员当时对这个问题都表示愤怒,他们对赫鲁晓夫说,这会使工作复杂化,不能这样做,但是他不想听任何人的意见”。

库纳耶夫在回答勃列日涅夫问为什么撤销农村建筑部时说：“必须给我们的国营农场场长、我们的科学家的坚定性以应有的评价。我们留下了休闲地，我们坚决拒绝种豌豆和大豆。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就会断送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您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有人来了，指示一番，指挥一通。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我们说得还很温和，但大家知道，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干的”。

3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近几年来农业增长的速度减慢了。农业发展计划没有完成。农作物收获量提高很慢。在这段时间内，肉类、奶类和其他一些产品的生产同样增加得不多。这一切给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决议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经济规律，破坏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在提高公有经济方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以及破坏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

决议指出，“在短时间内纠正在领导农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党、政和经济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为此，苏共中央在决议中提出：“必须坚决抛弃行政命令、包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者和专家的工作的做法，根除华而不实和喧嚷的表现”。“必须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实现经济政治任务，保证正确地选拔、安排和培养干部，经常监督对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决议强调“发展农业科学”对改变苏联农业的落后状况有特殊的意义。“扩大理论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和成果，为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一切部门而尽力帮助它们广泛采用科学成就和先进的实际经验这些科学工作人员的职责”。与此同时，决议要求党政和农业机关“坚决加强集体农庄制度的民主基础，严格遵守农庄事务管理原则，使集体农庄庄员广泛参加解决集体农庄生产的主要问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整顿土地

的利用,制止浪费土地的现象。”

决议最后表示,实现上述措施,改变苏联农业现状,对于加强工农联盟、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有重要的意义。

3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65年3月1日至5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结果的决议》。决议表示完全赞同会晤所通过的两个文件——公报和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以及苏共代表团的的活动。决议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强统一的主要途径是:“每个共产党提高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积极参加联合行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统治,争取普遍和平和争取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关于越南问题,决议认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根据同越南劳动党领导的协商采取的进一步援助和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御力量以击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措施是正确的,并且完全赞同这些措施”。

决议强调,苏共象参加会晤的其他兄弟党一样,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统一”。

3月30日 鉴于马祖罗夫已调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解除了他的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马谢罗夫当选为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

4月10日——19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三月全会的决议,先后通过了14项决议和法令,规定从5月1日起提高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农庄在自己的纯收入中扣除15%的利润以后,再按12%的税率交纳所得税;责成银行免除农庄21.1亿卢布的债务及农庄为购买机器欠下的1.2亿卢布的债务。从1965年起,国家将每年拨出专款以补助农庄庄员的养

老金。

5月8日 勃列日涅夫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纪念会,并作报告。他说:“在非常的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在动员我国所有力量方面作了巨大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强调,“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

5月10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就战胜法西斯德国20周年发表告世界各国政府、议会和人民书。其中说:“热核战争将使我们的星球遭到与过去历次战争的后果所不能比拟的灾难”,“现在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使人类遭到热核惨祸的新的世界战争”。该文件向世界各国呼吁,“采取有效措施来消除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制止能够变成一场世界性灾难的局部战争。

6月18日——7月1日 南共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苏,同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苏南发表联合声明说:社会主义采取日益多种多样的形式是当前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向,双方认为,只有在普遍和平得到维护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够顺利实现。

6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0期发表社论《党内民主和共产党人的责任心》社论说:共产党员要遵守严格的纪律,要有责任心,任何人都没有例外,这是“党内民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应“教育党员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这是党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没有纪律就没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社论认为“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议成了经济建设中全党活动的基础,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违反的法律”。社论对一些现象提出批评,如“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力图用领导经济的狭隘的行政办法来代替新的经济方法,对利润、价格、经济刺激的作用

估计不足，一句话，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社论强调任何人，从工长到部长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决议。

9月3日——11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罗友好大会上讲话说：争取共产党人的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必要。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如今把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分歧上面，这对谁都不是秘密。苏罗发表联合公报说：加强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行动一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过程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每个党有权就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

9月21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组织选拔、调配和教育建筑业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该共和国“违反苏共中央关于严格遵循列宁主义领导干部原则的指示的事件”经常发生，指责该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和经济部门领导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建筑专家在生产单位稳定下来，对青年专家关怀不够。该共和国建筑人员队伍的流动性极大，这对组织劳动、使用技术设备以及保证工程质量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决议提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要以精通业务的专家来充实建筑业的关键部门，要使各级党的机关集中力量改善建立干部后备力量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培养熟练、能干的工作人员；各级党的机关在选拔工作人员担任领导职务时，必须严格遵循下述列宁主义原则：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工作态度、政治上的成熟程度、业务知识和组织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了解党内外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在选拔工作人员担任领导职务以前，应该对他们的缺点进行客观而仔细的研究，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经常关心青年专家，合理地使用他们，为他们在生产中进行更富成效、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提供

一切必要的条件,而且更大胆地把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应该更多地帮助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员获得专业知识。

9月27日——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关于改善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报告人柯西金。2.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人勃列日涅夫。全会就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全会选举费·达·库拉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全会解除了维·尼·季托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因他调往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工作。

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工业的发展和对经济领导的新要求;2.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其中包括改进工业计划工作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和巩固经济核算制,加强工作人员对改进企业工作的物质关心的措施等问题;3.改进工业管理的组织;4.有组织地实现工业的计划领导的新体制。

柯西金说:“向工业中新的经济组织方法过渡,无疑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生积极影响。这有可能把整个经营制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可以进一步调动各种来源来增加我国的物质财富和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说:“我们的敌人硬说这是我们社会生产制度的破产,说苏联回到资本主义经营的立场,说我们以市场调节的自发势力来代替计划原则”。这是“徒劳的希望!”

9月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规定:1966年3月29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三次例行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是:1.苏共中央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

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诺·亚·穆拉维耶娃。3.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1966——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4.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决议还规定了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每 2500 名党员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 1 人，每 2500 名预备党员选出有发言权的代表 1 人。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

决议还规定了苏联陆海军、公安警卫部队、边防部队和驻在国外的陆海军部队选举出席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

9 月 29 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决议认为，现行的工业管理组织机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方法，“不适合现代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领导工业中行政方法盛行而排挤了经济方法，这是工业领导上的严重缺点。企业的经济核算在很多方面徒具形式；企业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力受到限制”。为了改变上述情况，完善计划工作的方法，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提高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改善企业工作的结果，决议要求“必须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全联盟部。”决议还要求“取消对企业活动的多余规定，减少上面给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数目，给予它们发展和完善生产的必要资金，改善对利润、价格、奖金、贷款这样一些极重要的经济杠杆的利用状况。”

决议指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性的同时，对于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投资、价格、劳动报酬和财政的主要方面，今后仍将奉行统一的计划价格。

10 月 9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为执行苏共中央

九月全会《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 改进工业管理，其中除改变工业管理机构体制的措施外，还确定了新成立的各部和其他一些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方针；2. 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规定国家计划要同企业的经营主动性正确结合起来，扩大它们的权力，按生产盈利和完成提供最重要种类的产品的评价活动的结果。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通过决议，规定将某些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交给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解决。

10月14日 《消息报》主编斯捷帕科夫调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原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列夫·托尔库诺夫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

11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在庆祝十月革命48周年集会上讲话，表示苏联主张和平竞赛，反对革命输出。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固有的优越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斗争都不需要外来的推动。我们党一向反对输出革命的主张，正如它反对反革命的输出一样”。“哪个制度比较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应当通过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来决定，而应当在和平竞赛中决定”。

11月22日 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经济报》编辑部、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联合举行科学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规律和经济领导、目前条件下的经济宣传”。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斯捷帕科夫在会上发言说：应当更坚决地宣传中央九月全会决议，特别是作为全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提高利润的作用”问题。他说：“难道物质关怀不正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熟练程度，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接近，提高劳动生产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的因素吗？”“我想再重复一下：需要、而且非常需要用卢布来教育

人”。要“看到钱币的两面，即要看到表示币值的一面，也要看到画着苏联国徽的一面”。

12月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66年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苏联1966年预算》的报告。

在讨论中发言的有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瓦·帕·姆日阿瓦纳泽、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瓦·谢·托尔斯季科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亚·帕·利亚什科、苏联交通部部长鲍·帕·别谢夫、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图·乌苏巴利耶夫、苏联商业部部长亚·伊·斯特鲁耶夫、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巴·奥维佐夫、苏联重型、动力和运输机器制造部部长弗·费·日加林和苏共萨拉托夫州委第一书记阿·伊·希巴耶夫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也发了言。

全会还讨论了关于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成人民监察机关。勃列日涅夫就这一问题在会上作了说明。

全会就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关于1966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和苏联国家预算的决议》中指出，“基本上赞同1966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苏联国家预算草案”。在《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决议》中写道：“为了广泛吸收劳动人民参加检查和监察工作以及提高他们在监察机关中的作用，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为人民监察机关，人民监察机关应当成为党和国家在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保证经常检查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以及加强国家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全会选举弗·瓦·谢尔比茨基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选举伊·瓦·卡皮托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12月6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就完善现行监察制度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苏维埃监察制度是最民主的、真正人民的制度,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权力,其中也包括监察权,都属于人民,他们是自己国家的唯一的主人”。谈到人民监察机关和党组织的关系时他说:“不言而喻,完善国内的监察、建立人民监察机关,决不会取消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对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责任。还必须注意一点,人民监察机关并不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党的机关的工作由党内监察系统根据党章进行监督。因此,必须使各级党委也积极开展自己的工作,必须根据苏共党章检查苏共党员和候补党员遵守党纪的情况,对违反党纲和党章,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党员以及违反党的道德的党员给予制裁”。

12月30日 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从1966年1月1日起,农村地区糖、糖果、点心食品、棉织品、针织品和其他商品的国营零售价格将下降到城市里现行的零售价格水平。并将按对工业及其他需要者的现行批发价格向各农庄出售汽车、拖拉机、拖车及农业机械等,轮胎、电力设备的批发价下降20%,拖拉机备件批发价下降10%。

12月 《苏联人民战斗的先锋队》一书由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苏共组织情况:到1965年,有党员11758169人,其中42.8%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入党的。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占37.2%;农民党员占16.5%;职员和学生党员占46.2%,专家党员有4063000人,占34.6%。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下的占20.9%,30—40岁的占33.1%,40—50岁占24.8%,50岁以上的占21.2%。关于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共和国党中央14个,边疆区委7个,州委133个,民族专区委10个,市委738个。

1966 年

1 月 15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干部和农业专家的进修制度》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农业部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部长会议在 1965——1966 学年将培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干部的一年制学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干部进修班和农业专家进修班改组为高等院校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干部与农业专家的进修系。派进该系学习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下述人员：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在各系统工作的农业专家和农业建设专家。上述人员通常应每 5 年进修一次。这些人在进修期间，除保留原工作地点的月平均工资外，每月另发 40 卢布助学金。

1 月 26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出席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苏联人民正全力以赴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力，提高苏联人的物质福利，完善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一切条件来发展人的个性，以及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经济改革预定要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和责任心，加强工会和一切社会团体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方面迈进一大步，把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关改组为人民监督机关，同样也是这方面的一项措施，目的是更广泛地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和管理国家事务”。

2 月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改编的第 3 版《列宁传》由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有 14 处提到斯大林，其中 8 处对斯大林进行

了批评,指责他在1906年维护分裂派的错误观点;1919年在和平问题上支持临时政府的压力政策;在党的六大时对资产阶级要列宁出庭这件事抱有幻想;1922年建议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及其他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合并到俄罗斯联邦;1923年列宁批评他“粗鲁、任性、不忠实”;列宁逝世后,“破坏了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滥用权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大规模镇压”。与此同时,也在一些方面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说1912年选出斯大林等坚强和英勇的中央委员;1917年选出斯大林等组成的军事革命中心。还说斯大林忠于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家和主要组织者,领导了反托洛茨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斗争。

2月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对1966年到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全会听取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了话。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还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叶·谢列斯特,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金·阿·库纳耶夫,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格·叶戈雷契夫,苏共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齐·努·努里耶夫,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吉·雅·基谢廖夫,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伊·波波夫以及苏共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米·谢·索洛缅采夫。

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对1966年至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同意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对1966年到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2. 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关于《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对1966年至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3. 在各级党组织、劳动人民大会和报刊上讨论苏共

中央关于《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对 1966 年至 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

2 月 24 日 苏共中央写信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3 月 22 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这一邀请。信中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

3 月 11 日 《真理报》报道，亚美尼亚党中央全会选举原部长会议主席科钦扬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原党中央第一书记札罗比扬于 2 月份被免职。5 名中央书记中有 4 人同时被撤职。

3 月 15 日 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乌克兰党的二十三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说：“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寻找不存在的矛盾，并且竭尽一切努力来恶意抨击列宁的民族政策和十月革命的宏伟成果。为了达到这种肮脏的目的，帝国主义宣传还利用了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信仰和真理，去为帝国主义服务。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应当更加不调和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宣传企图在社会主义各民族之间散布不信任情绪和通过复活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残余的途径来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3 月 26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审查了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勃列日涅夫就这个问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全会一致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

3 月 29 日——4 月 8 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各边疆区和州的党代表会议选出了 4943 名出席二十三大的代表，其中包括有表决权的代表 4620 人和有发言权的代表 323 名。有 4942 名代表出席大会，勃列日涅夫作苏共中央

总结报告；诺·亚·穆拉维耶娃作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柯西金作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1966——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

大会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关于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

大会还选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于 4 日和 7 日分别作了总结发言。勃列日涅夫在 8 日闭幕式上致了闭幕词。

3 月 29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苏共中央总结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苏联的国际地位，苏共的对外活动，其中包括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苏共为加强这一体系的团结和威力而斗争，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加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苏共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而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我们党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斗争。2. 党为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斗争。3.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和文化的发展。4. 苏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领导作用的提高，其中包括党的巩固及党的政治组织工作水平的提高。关于苏共党章的若干修改。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等。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苏共认为争取改善国际局势最重要的措施是“结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从南越撤出美国和其他外国的一切军队，让越南人民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保证严格执行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签订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彻底消除以核武器装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以任何形式使它获得核武器的问题；实现各国人民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的愿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义务；签订关于禁止地下核爆炸的协定。”“着手谈判欧洲安全问题。讨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关

于缓和欧洲的军事局势和裁减军备,关于发展所有欧洲国家间的和平互利的交往的现有建议。为此目的,应当召开相应的国际会议”。

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决议认为“举行兄弟党的多边和双边会晤,经常交换意见和同志式地讨论迫切的任务,这已经证实是正确和有益的做法,同时也是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良好途径,苏共和大多数兄弟党一样,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新的国际会议是适宜的。”

决议强调,“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三月和九月全会(1965年)的决议。这两次全会揭示了在发展经济方面产生缺点的原因,并确定了领导国民经济的新方法”。

同日,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1966——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 苏联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总结。2. 苏联1966年到197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3. 工业。4. 农业。5. 运输和邮电。6. 基本建设。7. 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水平。8. 生产力配置和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发展。9. 对外经济联系。党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新的五年计划应该保证我国社会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保证进一步发展物质技术基础,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党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在尽力利用科学技术成就、用工业方式发展整个社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工业进一步的巨大增长和农业稳定的高速度发展,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使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在工业方面,基本任务是“提高生产效率及其技术水平,改善结构,不断地、迅速地采用技术上新的产品,提高质量,以便更充分地供应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更完善的生产资料——生产效率高的机器、设备和仪器、高质量的原料和材料,更充分地供应居民品种繁多的商品,以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农业方面,主要任务是“大大增加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以更好地满足居民对食品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解决这项任务的基础应当是始终不渝地贯彻苏共中央三月全会(1965年)制订的一整套经济措施。”“在1966年至1970年内,使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比过去5年的平均年产量增长25%”。

同日,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声明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表达苏联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和心情,愤怒地谴责美国对兄弟的越南人民的野蛮侵略。”“代表大会坚决声明:侵略者如果把反对越南人民的可耻战争‘逐步升级’,他们将会看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朋友与兄弟们对越南的日益加强的支持。越南人民必将成为自己全部国土的主人。任何人都永远不能扑灭越南民主共和国高举的社会主义火炬。”声明强调:“越南问题只有在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正义要求的基础上才能解决”。

同日,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在进一步改善被吸收加入苏共的党员质量和提高党组织对接受新党员的责任感,以及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和提高共产党员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的责任心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如23岁以下的青年只有先加入苏联列宁共青团然后才能入党。入党介绍人应有5年以上的党龄。基层党组织关于接受新党员的决议,只有通过表决得到到会的2/3以上的党员的赞成才算通过。

决议还规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领导党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的工作;选举书记处,领导日常工作,主要是挑选干部和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设中央政治局代替原来的中央主席团,设中央总书记代替原来的中央第一书记。

同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

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安·帕·基里连科、基·特·马祖罗夫、尼·维·波德戈尔内、米·安·苏斯洛夫、彼·叶·谢列斯特、根·伊·沃罗诺夫、阿·尼·柯西金、阿·雅·佩尔谢、德·斯·波利扬斯基、亚·尼·谢列平。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维·瓦·格里申、丁·阿·库纳耶夫、瓦·帕·姆日阿瓦纳泽、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彼·米·马谢罗夫、夏拉·拉希多夫、弗·瓦·谢比尔茨基。

苏共中央全会选出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列·伊·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伊·瓦·卡皮托诺夫、费·达·库拉科夫、亚·彼·鲁达科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安·帕·基里连科、鲍·安·波诺马廖夫、米·安·苏斯洛夫、亚·尼·谢列平。

阿·雅·佩尔谢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4月15日 拉脱维亚党中央全会选举阿·沃斯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接替在苏共二十三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阿·雅·佩尔谢。

5月1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共青团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大胆地使用和提拔青年人，他说：“卓越的、劳动的、有文化的青年一代现在登上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的一切主要方面占据着应有的地位。党大胆地提拔青年，在各项事业中依靠青年”。

5月1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建议，集体农庄从1966年1月1日起实行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现金和实物）。在确定这一报酬时，将对国营农场工作人员规定的生产定额为依据。“发现金一月不少于一次，发实物的时间要由所得产品的情况来定。党中央和政府建议集体农庄要根据最后成果——产品质量

和数量或农庄全年收入来支付劳动报酬”。

5月1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授奖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滨海边疆区对全体苏联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苏联的滨海地区,是具有英雄历史的土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颂扬着俄国人的勇敢、大胆和爱国精神。“滨海地区在我国地图上占有某种特殊的位置。”“滨海边疆区今天得到的奖励,也是对陆海军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在履行军人职责时表现的勇敢精神和高度爱国主义的奖励。”滨海边疆区是5月18日被授予列宁勋章的。

5月25日——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关于广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争取谷物和其他农作物高产稳产的问题。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部长叶·叶·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了话。他说:土壤改良是现在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了解并且向全党全民肯定地说,这不是一个暂时的运动,这是一个农业方面的长期规划,是要求付出巨大努力和不少投资以及物质技术材料的规划”。勃列日涅夫就有人提出通过一项土地使用法时说:“我想这一建议是值得支持的。在这项法律中,应当规定一个制度以及所有的组织对正确使用土地的责任”。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广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争取谷物和其他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决议。

5月2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广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争取谷物和其他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决议》。决议指出:1.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制订的关于广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争取谷物和其他作物高产稳产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最近10年内使灌溉地面积增加700万至800万公顷,排干地面积增加1500万至1600万公顷,同时,到

1975 年全国经过土壤改良的土地总面积将增至 3200 万至 3900 万公顷。2. 完成党制订的关于提高土壤肥力和广泛实行土壤改良、关于有计划地彻底地实现农业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纲领,将使得有可能提高农业一切部门的产品率,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3. 在实行规定的广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纲领时,应当更充分地利用党中央三月全会和九月全会制订的各种经济措施。4. 在进一步巩固全国一切地区的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要采取具体措施为非黑土地带和灌溉农作地区的专业化机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装备土壤改良机器和掘土机,向它们提供必要数量的化肥、植物化学保护剂、设备、建筑材料及其他材料。5. 要求苏联国家计委、农业部、土壤改良和水利部、苏联科学院、全苏列宁农科院以及其他科研及设计机构共同解决实施改良土壤的理论和方法,6. 强调科学在实现增产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的土壤改良措施方面的作用,委托苏联农业部、科学院、农科院和国家计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会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 1966——1968 年编制出会后 10——15 年全国各自然区农业进一步发展方向的经济上有根据的建议书,并于 1969 年 1 月 1 日前提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7. 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区党委以及基层党组织向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作人员、农业专家和全体苏联人民广泛解释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为实现决议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

5 月 31 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致词说:在现代的军事技术情况下,欧洲是一座太拥挤和太容易着火的房屋,所以它的住户不能允许任何人在自己的房屋里玩弄战火”。他还说:如果西德复仇主义集团把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企图“放进历史档案库”,如果外部势力停止对欧洲事务的不断干涉,欧洲“军事威胁的问题将从日程上取消”。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对危险的复仇主义政策坚决回击的同时,

“主张西德参加欧洲国家的和平合作”。

6月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在选民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随着群众直接参加生产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所有形式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高度。”完善苏维埃民主同加强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加强一切生活领域里的社会秩序，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近几年来在加强社会秩序和法制、改善法院、民警局的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民警的人数增加了。”他强调说，“如果认为，既然共产主义最终应当导制国家强制机关的消亡，那么现在就已经可以不关心加强社会秩序，就可以削弱对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的强制措施，或者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那是不正确的。”

6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选民大会上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作用。这就是完善所有苏联劳动人民代表的活动，……这就是使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国内和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使大家更广泛地了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这就是完善立法和加强法制，这就是同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切表现作斗争”。“人民政权不能对危害社会的人姑息，无论是流氓还是罪犯，无论是官僚还是懒汉，无论是寄生虫还是人民财产的盗窃者。他们在苏联社会里没有存在的余地。”勃列日涅夫强调：“民主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人民的政权。我国确实是人民掌握政权，人们享受着最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但是，人民的政权同时又是严格的政权，要是没有自觉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那是不可思议的”。

7月26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决定成立联盟—共和国社会治安部，以保证对社会治安机关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中的活动进行统一有力的领导。公告说：“已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加强同街道、体育场、公园、俱乐部和其他公共场

所的流氓行为作斗争的措施,国内最大的城市将增设专门的摩托化民警卫队,巡逻放哨以维持社会治安。民警人员在制止威胁公民健康和侮辱公民人格的犯罪行为方面的权力扩大了。规定了改进追查逃避审讯和法庭的人的措施,以及加强同寄生行为作斗争的措施”。“为了加强对累犯行为的斗争,认为有必要根据已批准的条例让民警机关对从剥夺自由的场所释放出来的一定种类的人建立行政监督,将对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事立法的基本条款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便对那些由于犯有严重罪行已被惩处的人提出的假释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作进一步的限制”。

公告还规定,为了教育违法乱纪的少年,可设立社会教养院,并加强人民纠察队的活动”,公告同时还强调,“公民为制止侵犯的罪行和不放走罪犯而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行为,并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其他责任,即令这些行动被迫使罪犯遭受损害”。

据塔斯社9月17日报道,原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谢洛科夫被任命为社会治安部部长。

8月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审查了第七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问题。8月2日——3日,第七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柯西金连任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连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在会上说:“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的任务,要求在发扬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完善从地方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这整个苏维埃系统的工作”。柯西金发表了政策演说,他说:“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力求加速发展工农业的主要部门。”经济改革“应当不断地普及到国民经济一切部门”。

9月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改进专家的培养工作和完善对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领导》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改进高、中级人才的培养工作,为了加强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高等和中等教育领域中最重要

任务是根据现代生产、科学、技术、文化的要求及其发展前景进一步改进专家培养工作的质量。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专家应被教育成为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人,应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有组织群众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能力,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党委对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党、团、工会组织的活动要加强监督,使他们集中力量完成提高学习质量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决议还指出:为了吸收高等学校中水平很高的教授和讲师参加科研工作,准许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在全国 25 所负责完成具有重要国民经济意义的科学研究任务的重点大学中,按照各校应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增加教授和讲师以及教学辅助人员的编制,同时要注意减去参加科研工作的科学家的一部分教学任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更好地培养最有才能的青年人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责成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制订并采取措施,广泛吸收大学生在高等学校的教授和讲师以及研究所,工厂实验室,农业实验站的科学工作者的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

决议还规定:“用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集中基金奖励高等学校的教授和教师创造和采用新机器”,“委托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制订关于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规章草案,其中规定学校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学校领导人的权利,给予他们在解决教学科学和经济活动问题上更大的独立性”。

10月6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一项决议,决定把列宁奖金由每年颁发一次改为隔年一次,同时提高了奖金额,由原来的7500卢布提高到10000卢布。同时扩大奖金的名额,增设一项新的得奖人数为60人的国家奖金,奖金金额为5000卢布,每年颁发一次。

为了扩大奖励名额,各加盟共和国也都设立了国家奖金。

11月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第比利斯举行

的授予格鲁吉亚列宁勋章的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到民主管理时说：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要求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和发挥主动性，要求在企业管理中发扬民主原则。这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向他们解释党的经济措施的意义，动员群众贯彻党的决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培养经济干部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必须精通经济知识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各级党组织应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使用干部，培养干部，正确配备干部，大胆提拔有才干、对新事物有敏感的人，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我们党的整个工作的一个主要环节”。

11月25日——12月3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匈牙利社会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在致词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说：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在当前“有着特殊的意义”，绝大多数共产党都认为共产党人进行新的集体讨论的条件已越来越成熟，而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加强，“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举行共产党的会议的目的是把什么人从我们的运动中‘开除出去’，这是帝国主义挑衅性的谰言”。

12月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在法国外交协会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苏联丝毫也没有排犹主义、排犹现象。他认为“这是一些人想象的结果，他们企图以相应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因而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对所谓有某种情绪的人做工作”。在苏联的犹太人想离开苏联去同家人团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强调“苏联不存在尖锐的民族问题，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民族受到任何程度的歧视，”所有民族在苏联都是平等的，这“完全适用于犹太民族的公民”。

12月12日——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以下问题：1. 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2. 关于1967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3. 关于1967年苏联的国家预算。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第一个问题作了报告。中央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决议。

中央全会还听取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 1967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草案》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 1967 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央全会就这些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选举米·谢·索洛缅采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12 月 13 日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后，通过《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决议》。决议说：“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了实现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制订的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而执行的政治路线和进行的实际活动”。“中央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执行的路线和进行的实际活动”。“中央全会重申我们党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全会认为必须坚决揭露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和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针，必须加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会议制订的总路线的斗争”。

12 月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决议对一些州的党组织提出批评说：“许多州的党组织不注意提高经济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对加强纪律和生产秩序的责任感，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影响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来对付旷工者和破坏纪律者”。

1967 年

1月4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筹备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50 周年》的决议。关于民主问题,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作用,在实现经济与文化建设任务中充分行使它们的权力,发挥人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积极作用,加强行政机关、代表和公职人员对人民的责任感”。决议还要求《真理报》、《共产党人》等苏共中央及地方报刊、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马列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高级党校等学术和宣传机关采取各种方式和措施筹备庆祝十月革命 50 周年。

1月18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谈干部问题。社论说:近年苏共提拔了许许多多思想上经过锻炼、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去担任领导工作,党的干部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多数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是具有某种知识、经历过实践活动考验的专家。”“党十分重视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和业务水平的提高。苏共中央委员会不久前通过的《关于从 1967 年 2 月份起举办党政领导干部常设进修班》的决定就是这方面的证明。”“举办这种为时一个月的训练班是为了提高广大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将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基础上组织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各部部长以及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报纸的编辑的进修班”。

1月3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进行领导干部工作的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爱沙尼亚党中央近几年采取一

系列措施,已把一批熟练的、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充实到党和苏维埃机关及国民经济的一些部门中,领导干部队伍的素质已有所改善。但是,爱沙尼亚党中央的干部工作并不完全符合苏共二十三大的要求,“许多党委还没有把挑选、提拔和教育干部的问题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没有认真遵守列宁主义的干部原则。

为改变上述情况,苏共中央要求爱沙尼亚党中央拟定并实行彻底改善领导干部工作的具体措施,把选拔和教育干部的工作提高到全党、全国的工作水平。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政治品质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更加积极地把那些经过地方实际工作锻炼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保证使有经验的领导人与年富力强的工作人员合理地结合起来。各级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部门对建立得力的后备干部队伍的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要挑选那些按其素养在今后有可能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担任领导人的副职工作。要提高基层党组织对选拔和配备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在对工作人员任命时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更加大胆地选拔妇女担任领导工作。

决议还责成爱沙尼亚党中央各级党委更加注意对苏维埃干部、工会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选拔和教育工作的。

3月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善村、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村、镇苏维埃在行使国家权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它们没有充分运用被授予的权力,没有给予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机关以应有的影响。为此,苏共中央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采取措施,活跃、村、镇苏维埃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以及解决地方性问题方面的工作。苏共中央建议各级党政机关共同采取必要的措施,用训练有素的,富有经验的干部来加强村、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改善这些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进修工作。各加盟共和国和

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主席团、部长会议,边疆区、州和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必须更加深刻和经常地改善村、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管理村、镇经济文化具体方面的工作,完善其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与各共和国机关要共同研究有关可能扩大村、镇苏维埃在解决经济、财政和土地问题,在领导地方工业企业、居民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服务业方面的权利,以及有关加强其物质财政基础的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出相应的决议。

3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见选民时,就完善苏维埃制度和发扬民主管理等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地方政权机关的最基层单位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工作的决定。在这项考虑到苏维埃代表和工作人员的许多愿望和建议的决议中,规定了一些措施,改进地方苏维埃整个组织工作作风的方法,提高村镇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学识修养,给他们增加工资。党中央的出发点是,这些旨在改善地方苏维埃工作条件的措施,将使它们的活动更加活泼,尤为重要,在完成苏共二十三大提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以及愈益广泛地吸收劳动人民管理社会事业方面的任务中,地方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起着重大作用。

4月1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要扩大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经营独立性。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同时,可以自行决定生产经营活动问题,决议还要求减少上级机关给这些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数目。国家的规定仅限于下列指标:1. 生产方面,只规定向国家出售最主要产品的数量,其余生产指标均由企业自行决定。2. 劳动方面,只规定工资总额。3. 财务方面,只规定利润总额,预算拨款总额和农业用的固定生产基金的付费额。4. 投资方面,只规定集中投资总额。5. 物资技术供应方面,拖拉机、汽车、农业机器、设备、肥料、建筑材料和由上级组织

分配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供应数额由国家规定。

决议指出：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生产农产品的经济刺激，使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对改善企业工作成果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决议强调，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农业企业年获得的利润，除按生产基金的10%上交基金付费外，几乎全部归企业使用和支配。

4月24日——26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最高级会议，有24个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被邀请的党中，阿尔巴尼亚、荷兰两党拒绝参加、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挪威、冰岛四党不参加。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同社会民主党密切联系的问题。他说：除了共产党之外，社会民主党人也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致行动，能够给反动势力和侵略势力设置严重的障碍。会议通过了《关于欧洲安全与和平问题的声明》。声明希望欧洲能达成裁军协议，从欧洲撤出外国军队，同时废止欧洲的两个军事组织，召开欧洲各国讨论欧洲安全与和平合作问题代表会议和召开欧洲议会代表会议。

4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7期载文说：“1966年开除了62868名党员出党，接受了17244名党员的退党要求。”“1966年拒绝了约3.6万人要求作为正式党员的申请和1.2万多人要求作为预备党员的申请”。到1967年1月1日，在苏共党员中，工人占38.1%，农民占16%，职员占45.9%。在1966年接收的预备党员中，工人占46.8%，农民占12.6%，职员占40.6%。入党职员中，3/4是工程技术知识分子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家。

5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10期发表苏共中央《关于鄂木斯克州委会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批评鄂木斯克州党委会的活动“并不完全适应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三月和九月全会提出的任

务。”批评该州“1966年从工人中吸收的预备党员的总数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甚至降低了。”决议还指责了州委在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说近两年以来，“在企业、工地、农庄和农场更换的领导人总数中，因不能胜任委托的工作或因滥用职权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几乎达1/3。”“共青团区委书记，几乎全部被更换，在州的共青团组织中，工农青年减少了”。

6月10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说“现在已有3600个以上的企业按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工作。它们的产量将占全国工业总产量的26%。”这些企业主要是生产计算机和组织生产的技术设备、半数的有色金属和将近40%的黑色金属，一半以上的轻工业产品和1/3的农业机器。社论认为现在应该在盈利较少的规模较小的企业进行改革，成立区域性生产联合公司。“成立联合公司并不是企业的简单融合”，“这一经济整体的各个单位应当在专业化和始终一贯的分工基础上在经济和工艺规程方面联合起来”，逐步过渡到经济核算制，并运用经济杠杆来加速影响生产过程。

6月20日——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2.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提纲。关于第一个问题，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的报告。全会讨论并且同意了苏共中央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提纲。

全会选举尤·弗·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鉴于尤·弗·安德罗波夫调任其他工作，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6月2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赞同苏共中央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1.斗争和创造的英勇道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完全彻底胜利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总结。2.建设共产主义是十月革命伟大事业的继续和发展。

苏共中央在提纲中写道：“苏联人民和列宁的党在世界高高举起了伟大十月革命所点燃的社会主义火炬，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 19 世纪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成为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前提。“在发展科学技术、机械化和自动化，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苏联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

关于批判个人崇拜问题，提纲指出：“党执行进一步发扬社会民主的方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坚决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表现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对一个人作用的颂扬，背离了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没有根据地进行镇压以及给我们社会造成损失的其他违背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等方面。这些反常现象，尽管十分严重，但却改变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动摇不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党实行了消除个人崇拜在各方面的后果以及遵守列宁主义党内生活准则和原则的措施。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在解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方面的权力以及企业领导人的权力扩大了。这一切使得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使得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各部门的工作有了起色”。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联对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的政策决议》。决议指出，“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了制止以色列侵略，支持遭到进攻的阿联、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防止侵略的危险后果，保卫普遍和平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进行的实际活动。”决议还说，“中央全会完全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府今年 6 月 9 日的声明，并且宣告，苏联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援助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利,扑灭近东的战争火源,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决议表示,“今后仍须加强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阴谋,揭露帝国主义反人民的真面目,反对毛泽东集团旨在瓦解反帝力量、破坏阿拉伯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信任的诽谤活动和分裂行动”。

6月27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被解除职务,格里申被选为市委第一书记。据6月2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报导,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后,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先后开会,表示拥护中央全会的决议,唯独莫斯科市委没有召开会议。

7月1日 莫斯科市举行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传达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会议听取报告后,通过了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工作结果及其决议的决议,并表示以其“作为坚定的指南加以执行”。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写信给苏共中央说:“莫斯科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更紧密地团结在苏共中央的周围,以新的精力动员劳动人民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全力提高苏联人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惕,为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斗争”。

8月14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坚持原则,坚定立场。”决议认为,“揭露在‘研究’苏联和苏共历史问题、世界共运、工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进行活动的职业反苏分子和反共分子,是苏联科学家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决议对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下降提出批评,认为这是由于苏联科学院、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没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组织、计划和协调等方面的新形式。社会科学的学

术情报状况严重落后于当代的要求。

为克服上述状况,决议要求“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和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历史学、法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注意更有效地和全面地研究巨大的理论问题”。决议还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苏共党史和其他历史科学方面以及法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决议委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协调党史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决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委、科学院等单位在1968年1月1日以前把根本改变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计划等方面的方案提交苏共中央审查,还责成这些机关提出建立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具体方案。

8月2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对劳动人民来信处理和来访接待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劳动人民的来信是加强党同人民的联系、居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反映社会舆论的手段,是报道国家现实生活的源泉。必须把处理来信的工作视为本单位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决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和市委、区委经常监督党、苏维埃、工会和经济组织及时地和认真地处理来信;严格要求企业、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重视这一工作,对以不正确态度错误对待劳动人民来信的人;必须严加惩处,责成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的编委会系统地公布读者的来信以及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控告和值得引起警惕的问题作出的决议,并指出对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检查和处理的具体结果,报道处理来信工作方面的好经验,改进编辑部对申诉处的处理工作。

9月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措施》的报告。全会还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68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计划草案以及 1969 年和 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苏联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 1968 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全会就这些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洪多夫、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里亚乔夫、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沃斯等在全会上发了言。

鉴于谢列平已出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中央全会解除了他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9 月 27 日 《真理报》公布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 196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新措施。主要内容是：1. 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人和职员的最低工资额增加到每月 60 卢布。2. 对于目前没有规定工资系数的远东和欧洲北部地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和组织教育、卫生保健、住宅公用事业、科学、文化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工人和职员，实行工资系数制。3. 扩大对极北地区和相当极北地区工作人员的优待，对在新开垦地区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在劳动报酬方面给予照顾，对上述人员实行其他扩大优待的措施。4. 对于目前休假期总数为 12 个工作日的职工，休假期增加到 15 个工作日。5. 职工工资税继续降低和取消。6. 提高职工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补助金标准。工龄在 8 年以上者提高到工资的 100%，工龄在 5 至 8 年者提高到工资的 80%。7. 改进优抚金制度，提高优抚金的最低限额。

10 月 6 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工作人员培养和进修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 1968——1969 学年开始，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及跨共和国的高级党校将大幅度增加招收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学习，派往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应是各加

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领导人员,各边疆区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员以及市、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派往跨州的共和国的高级党校学习的应是各州和边疆区执委会机关的负责人员,各市(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各部门负责人。

决议指出:在高级党校中研究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与法的问题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刻掌握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关于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上,同时对苏维埃在解决有关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迫切任务方面,以及在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取得的工作经验进行全面的研究。

10月10日 《真理报》载文介绍苏共党员情况。1967年上半年,共吸收预备党员339371人,到1967年7月1日;苏共党员总数为12947926人。近10年来,党员专家人数增加了250万人以上。

10月18日 苏共中央就格瓦拉牺牲发表讣告。讣告说:“格瓦拉多年来积极参加了拉美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表现了对人民革命解放事业的深厚忠诚和个人巨大的勇敢和无畏精神”。苏共中央还给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发了唁电。唁电说:格瓦拉是为争取各国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他将永远作为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比的忘我精神的人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同由美国训练的玻利维亚政府军作战时受伤被俘,后被杀害。

11月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在题为《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50年》的报告中,就“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志和特征说:“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着整个国民经济在现代技术水平上有计划地稳定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改变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性质,它还根本改造了构成我们社会的阶级的面貌和组成”。“现在,当剥削阶级早已被消灭,当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导致我国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牢不可破的一致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诞生的苏维埃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成了在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下的全体人民的政治组织。”“生活在前进。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在提出自己的问题。过去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顶住阶级敌人的进攻,克服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在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11月4日——5日 《真理报》刊登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讲话。

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说:白俄罗斯的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今后仍将象儿子一样忠于自己亲爱的党,忠于自己的不倦地加强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的神圣职责。”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说:“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有原则性的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由于历史命运的意志,哈萨克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伟大俄罗斯的忠实儿子”。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科说:“立陶宛共产党给予任何民族主义表现以坚决的回击”,它“一向神圣地维护、今后仍将维护和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友谊”,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鲍久尔说,“在同伟大俄罗斯人民的永世牢固的联盟中,体现着我们的力量和未来胜利的保证”。

11月25日 苏共等18个党发表《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正式公报》。公报宣布将于1968年2月在布达佩斯举行协商会晤,以便就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集体交换意见。公报“呼吁所有兄弟党支持这一倡议并参加这次会晤”。

11月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别兹尼科夫在《哲学问

题》第 11 期发表《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作者于 9 月 15 日在社会科学家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长篇报告。特拉别兹尼科夫在报告中较全面地介绍了本年 8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他说：这个文件是经过了长期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制订的。为了制订这个文件，按社会科学各学科组成了委员会，参加各学科委员会的有 400 多学者。学者们帮助苏共中央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及教学情况。这个文件“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个关于所有社会科学部门发展的决议。它的目的在于保证整个社会科学的提高，解决其发展的共同问题，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2 月 8 日——10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应捷共中央和捷政府的邀请，到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短期友好访问。勃列日涅夫同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中央主席团进行了会谈。会谈公报说，双方讨论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双方进一步友好合作的问题。公报强调这次“会谈是在两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关系中所特有的同志式的真挚和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12 月 23 日 勃列日涅夫出席庆祝苏维埃乌克兰建立 50 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说：“共产党用列宁的民族问题纲领，用工人阶级鲜明的民族团结立场以及各族人民平等、友好和博爱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对抗无原则地玩弄民族感情的做法。这种思想一直在我国占上风”。他还说：“各民族彼此接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里不允许有轻率的急躁，不允许有人为的强制，不允许任其自流。在这件事上，既应当考虑到各个社会主义民族的利益，也应当考虑到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12 月 26 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为投产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培养干部的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制订这一措施

同发展轻工业及食品工业,提高人民的福利有密切关系。苏共中央责成苏联轻工业部、苏联食品工业部、苏联国家计委在本5年内制订措施克服培养熟练工人方面的落后现象,要求扩大职业技术学校 and 工厂艺徒学校网和加强这些学校的教学生产基地,给投产的企业充分配备熟练的工人干部,提高工人干部的技术教育水平和一般文化教育水平。决议还要求共青团中央协助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新建企业挑选青年到新的企业中工作,号召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到这些部门的技术学校去学习。

1968 年

1月9日 苏共中央发表将参加18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说：苏共接受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参加布达佩斯协商会晤的邀请，这次会晤预定在今年2月26日举行。

1月1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证向基本建设提供干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建筑业生产的组织工作中，仍然没有消除严重的缺点。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投资计划，没有克服新生产设备投入生产方面的落后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固定的技术熟练的建筑干部。

为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部长会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各部和主管机关、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克服建筑业干部中的缺点，改进在培养、教育和稳定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方面的工作。党政机关和工会应把克服建筑组织和安装组织中工人的流动性看作是重要的任务。

决议认为，考虑到建筑施工的特点和为了创造条件使建筑单位有稳定的干部队伍，必须首先在建筑业实行苏共二十三大提出的提高中等收入的工人工资的规定。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和主管机关根据需要进一步多培养一些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水平的建筑专家。

1月22日 苏共召开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各部部长、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区、州党委书记和主管意识形态的各部门负责

人以及中央报刊的编辑,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苏维埃政权 50 周年和党组织在文化方面工作的某些问题”。

1月30日 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抵东京,同日共中央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两党从 1964 年 3 月中断了的关系问题,并就两党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在独立、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党的正常关系。

2月1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列宁格勒州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经济是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主要战线,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他认为苏共二十三大和 1965 年以后的历次苏共中央全会所制订的发展工农业的经济措施是卓有成效的,“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方面的情况也有了显著好转”。

关于干部问题,他认为苏共培养了一批“精通业务,精力充沛、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提拔他们担任党、国家和经济工作各部门的领导。最近几年,随着全体人民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也根本上改观了。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90%以上的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现在都具备高等教育程度。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家”。

2月26日——3月5日 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苏斯洛夫在讲话中提出在 1968 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说当前的国际局势“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完善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丰富自己的战略”。他建议国际会议通过具有政治结论性的文件。他还说,在国际会议筹备和举行的时候,不存在谴责某个党或把它革除出共运的问题,“新的会议的主要口号和基本目的是团结、再团结”。

2月2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苏共中央高级函授党校开设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三年制函授班》的决议。决议规定：学习期限为3年，招收的学员是：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书记和各部部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及边疆区和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报社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编辑，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各部副部长、各处处长和其他负责人员，以及受过高等教育但根据招收条件不能录取到两年制高级党校的各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市和区执委会主席。

决议规定：学员经考试合格者，发给他们相当于高级党校两年制的毕业证书。委托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高级函授党校于1968——1969年内编写好供苏共中央高级函授党校学员使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3年制函授班学员享受与现在苏共中央高级函授党校学员同样的待遇。

3月6日——7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宣言，要求美国接受越南的建议，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一切其他战争行动，开始谈判和平解决越南问题。除罗马尼亚外，6国发表了声明，支持苏联1968年1月18日提交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的“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主张按规定期限（1968年3月15日）在裁军委员会会议结束谈判。

3月29日 勃列日涅夫出席苏共莫斯科市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谈到苏共的领导作用时说，当苏维埃国家在解决新的历史任务时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就更加提高了。这是由于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只有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准确地制订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最迫切的方针，才能顺利地完成国家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他强调要加强

党的纪律,作到“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无论在什么时期,包括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都需要有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对违反党纪国法的干部,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过去有什么功劳,都要严加处分。

关于干部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把中央集权同地方的首创精神,把计划工作同经济刺激,把委员制同个人负责更好的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提拔和培养干部的意义就更大了。他说,在党内,在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内,一直在进行更新和培养干部以及用新的工作人员充实干部队伍的自然过程,将用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用青年和妇女中的那些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好的优秀人物来充实领导干部队伍。

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还阐述了苏共同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在经济问题上,他要求“在今年完成工业、建筑和运输部门向新的经营管理体制的过渡”。“各级党、政、军组织在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方面面临着更大量的工作”。

4月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弗拉基米尔州委选拔、教育商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干部的工作》的决议。决议提出:弗拉基米尔州近年商业部门的干部状况有所改善,但该州从事商业和服务业干部的工作水平还不符合已增长了的任务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苏共中央责成该州委及其各市委区委采取措施改进商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干部工作,用熟悉业务的、能够保证提高服务水平的工作人员加强这些经济领域的重要部门;提高生活服务业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对选拔和教育干部的责任感,注意全面细致地审查那些被委派去掌握物资的人员办事能力和政治品质;要更大胆地提拔妇女和年轻的专家担任领导工作。该州委会和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保证改进商业和生活服务业领导人员和一般服务性行业职工培训和进修工作,提高他们的普通教育水平和业务能力

决议还委托苏联商业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等单位拟定并向部长会议提交关于为国营和合作商业企业扩大培训一般职业干部的建议。

4月9日——1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会讨论了这一报告并通过了决议。

全会选举康·费·卡图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全会还将下列5人由苏共中央候补书记递补为正式委员，他们是：尼·瓦·班尼科夫、叶·费·洛吉诺夫、谢·列·索科洛夫、亚·谢·谢列麦托夫、尼·安·谢洛科夫。

4月10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全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在国际政治方面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全会“表示完全赞同布达佩斯协商会晤的结果。这次会晤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苏共中央全会认为，筹备和举行定于1968年11月——12月召开的共产党的工人党会议，是最近时期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斗争的中心环节”。

决议还涉及到以色列的侵略行动在近东形成的严重局势、西德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问题。决议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斗争急剧尖锐化。现在，整个庞大的反共宣传机构，都用来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离间现代的进步力量，企图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

决议谈到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和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时指出，这一筹备活动“应当成为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和广泛宣传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强大的推动力”。

决议最后指出：“目前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积极地、一致地行动。苏共方面今后仍将奉行坚决反击帝国主义和防止世界战争的政策，奉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反帝力量团结的政策”。

4月22日 《真理报》就列宁诞辰发表社论。社论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急剧尖锐化的条件下，加强每个共产党员和苏联人的共产主义信念，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培养思想的坚定性和抵制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影响的能力，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5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卡尔·马克思——工人阶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他说：在苏联已“取得了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充分保证。从国际上看也取得了不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保证。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他认为苏联“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将达到马克思提出的最终目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对“左倾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抨击，指责他们“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歪曲社会进步的概念，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观点看用一种更高的经济形态代替另一种经济形态的概念”。

6月15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任务、机构和编制的决定》。决定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持续不断收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苏共党史材料的时候，应当同时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共历史和党的建设、科学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迫切问题的创造性研究。学院应与其他科学机构一起创作有分量的总结性著作，这些著作将包括有新的科学根据的结论和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建议”。

7月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全苏教师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说,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是苏联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客观规律,它要求劳动群众广泛地和日益直接地参与解决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我们的民主给予社会成员充分的权利,使他们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享受这些权力和自由,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权力,而且是公民的崇高责任。这种权利越广泛,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也就越崇高。因而,培养政治积极性,崇高思想性、自觉纪律性,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

勃列日涅夫还说,我们反对想要消灭艺术家个人特点的企图。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揭示困难、不良现象和错误。但是,对生活及其矛盾以及新与旧的斗争的深刻过程的艺术描绘,同被我们的敌人称之为所谓“自由”的艺术创作顶峰的那种仅仅片面地揭示阴暗面的现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7月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为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我们奉行和平政策,但是我们应该对局势的任何剧变作好准备,鉴于当前的整个形势和意识形态战线上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提高了。”

7月15日 苏共和保、匈、民德、波5国共产党人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首先表示,写这封信“是出于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挚友谊,出于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对加强社会主义阵地的安全,加强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怀”。

信中指出:“你们国家事态的发展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派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基础的进攻,使你们国家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因

而也使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受到威胁”。信中强调,苏共等无意干涉纯属捷党和国家内部的事务,无意破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尊重、独立和平等原则,但是“不能同意敌对势力使你们国家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造成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争夺过去的危险。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的事了。这是用联盟、合作和友谊联合起来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国家的共同事业”。信中还说:“我们各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争得了自由和独立以及沿着进步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世界的疆界已经转到了欧洲中部,达到了易北河和舒马瓦山脉。而我们决不会同意让社会主义的这些历史成果、我们各国人民的独立和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决不会同意让帝国主义通过和平或非和平途径,从内部或外部在社会主义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使欧洲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他们自己”。

信中强调,“坚决回击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共势力和坚决为保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不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我们的任务”。

在信中署名的有苏共中央领导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谢列斯特、卡图谢夫,还有保、匈、民德、波4国党的领导日夫科夫、卡达尔·亚诺什、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等。

7月1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华沙会晤结果》的报告。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库利钦科、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塔斯社总编辑拉宾等在会上发了言,全会就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华沙会晤结果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高度评价并一致赞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于1968年7月14日到15日在华沙举行的会晤结果，以及会晤时通过的兄弟党致捷共中央的信。全会完全赞同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晤中的活动，完全赞同会晤参加者为了表明要进一步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关系和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的坚定意志，而作出的必须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坚决斗争的结论”。

决议认为，“在华沙通过的兄弟党的信，将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被看成是上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真诚友好的国际主义援助的表现，并将有助于加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苏联人民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民之间的友谊”。

7月19日《真理报》就捷克斯洛伐克形势发表社论说，“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存在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对捷极右势力“表现犹豫不决就意味着大灾难”。社论号召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们应坚决而勇敢地进步，表示苏联准备在这方面“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南共联盟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反对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

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建议在7月22日或23日举行两党最高级双边会晤，地点在苏联的莫斯科、基辅或利沃夫。7月22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同意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双边会晤，提出地点应在捷克斯洛伐克。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答复捷共中央主席团，同意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双边会晤。

7月29日至8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捷边境城镇切尔纳举行双边会晤。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会谈是在完全开诚布公、真诚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两党商定，8月

3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将举行苏、捷、波、保、民德、匈6国党代表会晤。

7月23日 苏共中央作出《关于筹备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决议。决议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各人文科学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建设共产主义的经济问题、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以及从理论上概括革命解放运动和整个世界发展的过程上。

7月 《党的生活》杂志第7期《1967年内接受新党员工作总结和苏共成份变化情况》的统计材料。1967年接受的预备党员1/3是职员。这些职员中的70.4%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教员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其他专业人员。

到1968年1月1日止，苏共党员的38.8%是工人，15.8%是农民（集体农民），45.4%是职员。职员党员中的2/3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业人员。

8月19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全会决定对捷进行军事干涉。同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工人阶级的敌人继续向捷社会主义成果发起进攻，而捷共和捷政府却不予还击。

8月21日凌晨，苏联以及波兰、民德、保加利亚、匈牙利军队占领捷全境，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说，苏联和波兰、民德、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军队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这一行动是应捷党和国家活动家提出的请求。“这一请求是由于同敌视社会主义的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对捷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威胁所引起的”，这“完全符合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缔结的同盟条约所规定的各国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的条款。

9月11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选拔、配

备和教育工业领导干部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对伏尔加格勒州的各级党组织解决干部的选拔和配备的工作提出批评。指责他们未充分考虑工作人员的知识和能力,把某些重要的生产部门交给一些没受过足够的技术教育、缺乏经济知识的人去领导;一些经过训练、受过专业教育、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有组织才能的工人没有作为提拔的后备人员使用。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改变这一缺点,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干部后备力量的工作,更大胆地提拔专家和有组织才能、有理论素养、经过良好实际锻炼的工人担任领导工作,为实际工作者获得专业教育和提高业务能力创造条件。

9月15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提高地方报纸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决定。决议要求报刊在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方面起积极作用,为此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改进各级党政机关对报纸的领导,提高报纸的思想水平。

9月2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提高科研组织工作效率和加速在国民经济中采用科技成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69年起,对科研组织、设计组织、方案设计组织、工艺组织和高等院校的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考核。考核定期举行。每3年1次。考核委员由本机关的学者和专家以及党和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根据考核结果,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评价工作人员工作的客观标准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对工作中有成就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对因业务能力不称职的人在工作上应给予降职,或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解除其职务。

10月2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庆祝苏联共青团城成立5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谈到吸收苏联青年参加社会活动时指出:必须巩固和发展苏联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和创造力,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苏维埃制度为青年参加社会活动和国务活动

提供了广泛的条件。在苏联、苏维埃、工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如果没有共青团员参加是不可想象的。有近 35 万名青年人被选为地方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10 月 30 日——31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还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对外活动》的报告。全会就上述两个问题通过了决议。

关于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党的农业决议正在顺利实施,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有不少的缺点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在五年计划剩下的几年里,我们需要急剧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全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一些措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他还认为大力加强物质基础,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基础。他明确肯定了“建立在固定计划和超计划出售谷物的物质刺激基础上的农产品收购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原则能“更充分地满足国家对食品和原料的需要,能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不断提高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

10 月 31 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1965 年至 1967 年农业的年平均总产值为 750 亿卢布,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产品产量增长了 11%,“在农业发展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如许多产品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高、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缓慢、畜牧业产品的成本过高、土壤改良中有许多缺点,以及粮食和蔬菜、水果的采购、贮藏工作需大大改进。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农业机构,以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党组织和领导人采取措施,“克服农业发展中的缺点,更

好地利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一切潜力,以便保证完成五年计划任务”。

决议认为:“加速发展农业,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我国农业生产大大超过现有水平,是全党和全国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注意的中心同以往一样,应当是在显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大大增加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大力发展畜牧业,并且经常关心产品质量的改善”。

决议强调:“提高作为加速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效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必须大力改进农业科学机关和学校的工作,要集中科学家的力量解决创造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培育新的畜禽品种,以及农业化学化,土壤改良,生产过程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植物的生物学保护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经营以及科学的劳动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要提高科学团体和科学家对正在研究的问题和建议的质量,保证完成期限,并加强在生产中应用时应负的责任”。

10月3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对外活动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一致赞同和完全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中央全会极为满意地指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得到我们全党、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和赞同。”

11月3日 《真理报》就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对外活动的决议》发表社论《战斗的纲领》。社论指出:“最近,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帝国主义疯狂攻击的目标,在那里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际的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形成了威胁,并力图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遵循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原则和同盟公约，援助了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捍卫其社会主义成果，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而共同采取的措施，包括军事援助，是正确和及时的，这些措施有助于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阴谋，它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援助。”

社论强调：“苏联共产党员、我国全体人民完全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共和捷共、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全面合作和友好关系的措施。我们的党和人民深信，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洒下的鲜血结成的兄弟合作、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传统关系，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极为一致的基础上，得到顺利的发展和巩固。”

社论最后号召苏共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苏共中央周围，以对付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阴谋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破坏行为。

11月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祖罗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性的专政变成“国际性的专政”。他说，“列宁预见到，历史的发展将提出这样的任务：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性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影响的国际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遵循列宁的遗训，并为此而联合起来，建立了平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以便共同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保卫劳动人民的历史成就，在国际舞台上奉行工人阶级的政策——社会主义政策。”

11月11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提出“有限主权论”。他说：当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方向的时候，当出现了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

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当然,象对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这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它只是由于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由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那种行动所引起的”。

11月2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苏联民警措施》的决定。与此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社会治安部改名为内务部。决定说:社会治安部及其地方机构的现有名称没有反映它们在国家机关系统中所履行的一切职能。决定给内务部及其地方机构提出了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工作的任务。决定认为,最近几年来在改进民警、检查机关和法院的活动方面实行了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许多城市的法制。

12月7日——8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胡萨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等在基辅会晤。两党会晤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捷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和决定联邦议会主席的人选。

12月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关于1969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2.《关于1969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报告人苏联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全会就这些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表示基本赞同1969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1969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

12月17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在执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方面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对塔吉克党中央提出批评,指责他们在干部工作上有严重缺点,常常把一些没有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苏共中央责成塔吉克党中央改进干部的选拔、配备和教育工作,经常关心以业务熟练、

政治成熟和精明能干的领导的来加强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在提拔工作人员时,要充分考虑基层党组织、各级党委和社会各界的意见,更大胆地提拔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良好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青年和妇女担任领导工作。对干部提高要求,以对党和国家忠诚老实以及完成党和国家所委托工作的个人责任感的精神来教育工作人员,更多地帮助他们掌握政治和经济知识以及做人的工作的经验,对干部加强监督等等。

12月1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苏联人民监察机关条例》。条例规定:人民监察机关的活动主要是帮助党和国家机关系统地检查苏维埃机关、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实际执行党和政府指示的情况,进一步改进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国家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人民监察机关活动的具体内容是:1. 系统地监督国家计划和任务的执行过程;2. 大力掌握和利用国民经济的潜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节约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生产中推行一切先进的新措施;3. 坚决反对违反国家纪律的现象、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表现、经营不善和浪费现象、任何欺骗国家和侵犯社会主义财产的企图;4. 严格制止官僚主义和拖拉现象,力求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节省机关开支,采用科学的劳动组织和管理组织,明确地安排好机关内部的监督。

条例指出人民监察机关最重要的任务是:“及时提醒干部防止工作中的错误和疏漏,努力清除已发现的缺点。为此目的,人民监察机关根据公开原则进行工作,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工具。它的检查结果和据此采取的措施,通常都要通知有关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团体的职工。对犯有过错的人、人民监察机关既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通过追究他们的责任来进行教育”。

12月31日 《消息报》刊登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关于给建筑业职工加薪的决定。决定说:考虑到必须

加强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缩短建设期限,改进建筑工程质量和加快建筑材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决定从 1969 年起,分期分批把建筑业工人的各级工资平均提高 25%,建筑材料工业提高 23%,并把建筑业中等工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各级职薪平均提高 12%,建筑材料工业职工的工资提高 9%。在提高工资的同时,提高生产定额。决定指出:“在规定提高了的新的各级工资的同时,将重新规定现行的生产和服务工作定额,其中要考虑到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和劳动组织工作水平”。

1969 年

1月7日——2月6日 苏共中央举办为期1个月的意识形态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以及各军区政治部主任。学员们广泛听取了关于苏共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的报告。

1月29日 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少尉维克托·伊利英化装成警察，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罗维察大门附近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开枪，企图枪杀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正准备在克里姆林宫为苏联宇航员授勋。克格勃得知伊利英失踪，并携带武器乘飞机来到莫斯科的情报后，临时改变了勃列日涅夫的行车路线，使伊利英的刺杀没能成功。伊利英在几个月后被医生鉴定有精神病，强制住院治疗。1990年春被强迫退役，转为预备役。据俄罗斯《红星报》1992年5月16日消息，圣彼得堡法院裁定，向在1969年试图枪杀勃列日涅夫的前少尉维克托·伊利英支付2.4万卢布的赔偿金。伊利英要求赔偿6万卢布，他认为他“以行刺勃列日涅夫的壮举，加速了苏联改革时代的到来”。

1月24日 《立陶宛真理报》总编辑齐曼纳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立陶宛各级党组织思想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对任何公开的和隐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表现展开斗争”，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常常反映在对人民的历史、对人民的过去的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中”，民族主义残余的特别危险之点是常常以党的政策作为掩护，而克服民族主义残余需要很长时间。齐曼纳还认为“最危险和最有害的

东西是对待民族主义残余及其代表者的调和主义”。

同月,《党的生活》杂志第1期发表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涅奇库斯的文章。文章指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要使立陶宛脱离苏联,拒绝同俄罗斯人民友好”。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署名文章《阐述苏共历史要坚持列宁的党性》。文章批评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党史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错误和缺点上”,他们“企图修改经过生活检验的真理”,“修改党对历史事件所作的原则性批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1. 贬低党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集团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头目恢复名誉”。2. 利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把那些年代描绘成全部是错误和挫折。3. 以保卫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捍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抵触的不正确论点”,要求“深入阐明”党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4. 把机会主义的分裂活动同列宁与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混为一谈。5. 歪曲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6. 忽视在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党为反法西斯侵略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3月2日 中国边防站巡逻组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时,遭到来自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的苏联边防军的阻拦,发生武装冲突。3月4日《真理报》发表苏联政府3月2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坚决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杜绝任何破坏苏中边界的事件”,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并最严厉地惩办这一挑衅的肇事者。”3月15日和17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再次发生战斗。3月15日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立即照会苏联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苏联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和武装挑衅行为。3月16日《真理报》发表苏联政府声明,“如果苏联的合法权利将遭到践踏,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卫自

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即使根据不平等的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领土。苏联政府的抗议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

3月17日——22日 苏共和其他6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这次会议再次延期到今年6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还为6月份召开的会议起草了一份题为《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

3月18日 苏共滨海边疆区党委举行全体会议,选举维·洛马金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瓦·切尔内晓夫调任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3月2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5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发言。他说: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也有错误,共产国际不总是正确地考虑各个党进行活动时所处民族条件的差别,有时下达一些完全不合理的建议。由于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把主要矛头对准社会民主党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实质上是宗派主义倾向的表现之一。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后几年里,个人崇拜的后果也起了不好的影响。

5月2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建筑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70年起,建筑安装业将实行新体制。实行新体制后,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有以下内容:确定生产能力和项目的投产期限;确定建筑安装工程量;全年度的工资基金;利润、预算缴款和预算拨款。

在建筑安装行业中建立物质奖励基金、发展生产基金、社会文化设施和住宅建设基金。以上基金由利润中提取。规定提高对生产能力和建设项目按期投产的奖金。提高信贷的作用。决议还责成国家

计委和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在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规定未完工建筑的指标,从1971年起,每年确定总投资额。

决议强调,基本建设对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和解决苏共二十三大的主要经济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情况下,“大力提高投资效果,缩短投资回收期限,保证花掉的每个卢布的投资都能使产量得到最大的增长,具有特殊意义”。

6月4日 苏共塔什干市委举行会议,讨论“对流氓行为加强斗争”问题。6月12日,乌兹别克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加强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问题。在此之前,4月份在塔什干举行的一次足球比赛中,乌兹别克人打死了15名俄罗斯人。有“流氓行为”的人被逮捕判刑。

6月5日——17日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有75个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5日致开幕词,7日作了长篇发言。勃列日涅夫说:“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帝国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在历史上必然走向自由、和平与民主胜利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现在变得“更加反动和富有侵略性”。他在发言中否认“苏联想要进攻中国”。“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来影响国际革命”。苏联的防御能力与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可能性,都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就。“我们支持整个世界的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可能性也取决于这些成就”。

谈到苏联的经济改革时,勃列日涅夫认为这一改革对国民经济已“起了良好作用”。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时,必须首先注意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任务,同时还将解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勃列日涅夫还强调:苏联国内社会政治领域里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完善我国民主的立法基础”,“对人民思想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所有大小民族的联盟”。

勃列日涅夫还说，上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开过之后的8年多时间里，苏共增加了450多万人。现在它的队伍总共约有1400万共产党员。半数以上党员是工人和农民。意义重大的是工人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这符合苏共的本质，以及工人阶级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集体农庄庄员在党的生活中也起着很大作用。团结在党内的还有几百万国民经济专家、科学家、文化界人士以及对苏联的社会进步、科技进步和文化进步作出很大贡献的其他知识分子的代表。

6月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的报告。

在讨论时发言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苏共雅库特州委第一书记奇里亚耶夫、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库利扎诺夫、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

中央全会就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苏共代表团在1969年6月5日到1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工作”，会议认为，这次会议通过的题为《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工人党、一切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的文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决议说：“全会一致肯定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的立场。苏共将为反对中国现在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反对他们的分裂主义政策和大国主义对外政策方针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苏共将尽一切努力来保卫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免受

任何侵犯。同时,苏共的出发点是: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符的。苏共今后仍将致力于维护和保持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无疑是中国人民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怀有的那种友好感情。”

苏共决定将加强“对当代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共同规律和特点进行深刻的理论概括,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帝斗争的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为此,将广泛地举行国际理论会议和学术会议。

7月15日 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维利·阿洪多夫被解职,改任阿塞拜疆科学院副院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利耶夫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7月20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集体农庄市场》。社论强调集市贸易“在满足居民食品需要方面有巨大意义”,全苏有7500个集体农庄市场,每年交易额约40亿卢布。在罗斯托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市场交易额占职工购买食品总额的20%——21%。1968年有100个市场试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新方法,即自行确定服务人员人数、工资额和大修费用等等,现在自负盈亏的市场全部采用这种方法。社论要求加强集市贸易的物质技术基础,如建造各种设备、旅馆、提供运输汽车等,批评有些地区没有把发展集市贸易当作十分重要的事情来做。

8月14日 哈萨克党中央书记季托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号召在该共和国加紧备战工作。他说现代战争可能扩大到辽阔的区域内,“不仅巨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连平民也会被卷入战争的轨道”。“工业、运输、邮电和农业工作将受到严格检验”,要预先保证民防的可靠性。他指出“民防是成套的措施,其中包括准备防护建筑,从大城市疏散职工和居民,在各个生产部门组织特殊编制——支队、小队和小组,提高他们的行动准备”。他号召要普遍进行民防教育,季托夫在文

章中透露，卡拉干达市已成立“常设防御委员会”，地方苏维埃“正在讨论民防问题”。

8月19日 苏共中央通过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在1969年建立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高级团校的建议。高级团校的任务是：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的干部以及为青年阅读的报纸和杂志工作的干部组织理论上的培训和进修；就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列宁共青团团史、当代国际青年运动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各地区团校和共和国团校的工作进行教学法的领导。发给全苏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高级团校四年制毕业生统一的毕业证书。

8月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阶段》。文章认为6月份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会议通过的文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同战斗的现实性结合起来了，把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同兄弟党在本国具体条件下的斗争策略结合起来了”。“会议指出了争取当代革命进程的主要潮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堡垒内部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团结斗争的基本方向，拟定了它们行动的途径”。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许多党在会议上支持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就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所采取的国际主义行动。也有党在会议上表示不同意这一行动”。但认为“必须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职责”。

9月6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附设预备科》的决议，决议规定：“从先进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复员军人中挑选有中等学校毕业程度、并有一年以上工龄的人”，经工厂、集体农庄和部队的党、团、工会推荐，可在预科学习8—10个月，经过考试后升入大学一年级学习。

9月1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时，在北京机场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会见中，双方就边界问题、贸易问题以及两国关系中的其他一系列问题达成谅解。双方一致同意：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为此应该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就临时措施的基本内容达成了协议，并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国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但柯西金回国后不久，苏联即否认两国总理曾就争议地区等问题达成过谅解。

10月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动员全体劳动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的工作经验》的决议，并要求国家有关部委推广这一经验。决议指出，这个厂的主要经验是用兼任工种，增加管理机器台数，合并机构，更新设备等办法来加强劳动强度，减少职工人数，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该厂还规定工资基金几年不变，由于缩减人员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大部分用作奖励基金，个人所得奖金不得超过工资的30%。

10月24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完善管理机构和减少其开支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对现有管理机构提出批评，要求各部门改变庞大、重叠状况，各部门要裁减多余的编制，把1970年的行政开支减少到17亿卢布。

11月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德戈尔内在十月革命52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新体制几乎已推广到全部工业企业的3/4，整个工业83%的总产值和90%以上的利润都是从这些企业获得的。他说，应该“把改革的原则推行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在逐步扩大新体制范围的同时，调整和完善新体制的整个结构。

11月25日 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苏联农业政策的主要方针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机器技术基地、广泛进行土壤改良和农业化学化，这一政策的重要特点是收购农产品的新的计划制度，以及对农业生产经济刺激”。大力发展农业和加强其物质技术基础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个环节工作的协调，更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需要组织性、纪律性和责任感”。勃列日涅夫强调了谷物生产问题，他说这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农业工作应“注意的中心”，要逐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收购量和总产量。与此同时，应使畜牧业、农业联合企业得到发展。他还提出建立集体农庄理事会的问题，认为通过它可以“发扬集体农庄民主，集体讨论农庄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总结组织生产方面的经验，提出建议等”。

11月30日 《真理报》发表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章程涉及到农庄的任务、庄员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共12部分。

章程规定，农庄按照全体庄员通过的计划经营，其基本要求是必须扩大公有经济再生产、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和其他订购合同；农庄也可建立和发展各种辅助性企业和各种手工业，可以同工业企业和商业组织建立合同关系。

农庄的生产和劳动的组织形式是工段、牲畜饲养场、生产队、小组和其他生产分队。农庄的劳动报酬制是计件工资制、包工工资制、计时工资和计时奖励工资制。除了基本劳动报酬外，还实行额外报酬及其他形式的物质刺激。

章程还规定，庄员宅边园地的面积在0.5公顷以内（包括房屋占地），如果是水浇地则在0.2公顷以内。庄员家庭可以拥有一头带有一岁以内的小牛的奶牛，一头两岁以内的小羊，一口带有三个月以内

的小猪的母猪,或是两口肥育猪,10头山羊和绵羊,以及蜂房、家禽和家兔。

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0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

在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发言的有: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尔比茨基、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弗·费·普罗梅斯洛夫、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卡扎涅茨、苏联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高尔基汽车厂厂长基谢寥夫、苏联石油开采工业部部长沙申。

全会还听取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实际活动》的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就讨论的全部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表示基本赞同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1970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全会表示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

12月21日 《真理报》就斯大林诞辰90周年发表编辑部文章说,对斯大林的评价仍遵循1956年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文章称斯大林是“理论家和组织者”,领导了反对托洛茨基等人的斗争;他的著作和实际工作对列宁主义思想作了重要贡献;在斯大林时代实现了“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发展文化”;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文章又指出斯大林“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犯过错误,这种错误在他晚年具有严重的性质”;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过高地估计个人功劳,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结果出现了没有理由地限制民主和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没有根

据地迫害党、政、军干部的现象”。

12月23日 苏共中央发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提纲，提纲内容涉及到苏联内外政策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政策等广泛内容。

提纲说：社会主义全民国家正在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苏共坚决谴责个人崇拜，也谴责无视社会发展规律和集体领导的意见，用唯意志论来代替科学领导的主观主义。苏共是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方面非常国际化了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

提纲认为“在两个体系竞赛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影响世界革命的主要杠杆是它的经济政策”。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它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工业有进一步的显著发展，保证农业有稳定的高速度发展，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苏共中央在提纲中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即“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和所有民主力量、解放了的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

12月25日 土库曼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举原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加普罗夫为中央第一书记，原中央第一书记巴·奥维佐夫被解职后出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70 年

1月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发表文章《列宁和文学艺术的党性》。文章说：文学艺术是紧张的意识形态搏斗的重要战场。在当代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具复杂性和具有多面性。“它需求我们具有党的不妥协性、进攻性、周密性和明确的政治方向”。文章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维护、捍卫、发展和丰富真正的艺术这一优秀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传统。文章强调现阶段艺术界任务的特点是：“以最好的方式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提高理论工作水平和改善文艺评论”。谈到苏现代民族文化时，他批评“有时对以往的赞赏是盲目的，它转化为某种复古的浪漫主义幻想，直至对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迷恋”。

1月13日 《真理报》就1969年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发表社论。社论说：十二月全会提出了党政机关和全国人民都应克服的困难和缺点，批评许多工业部门发展迟缓，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得缓慢。基建往往突破了预算拨款，非生产性项目的建设“经常超出国家计划”。

社论认为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不容许按老办法工作，而需要采取新方法作出新决定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全会十分重视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苏联经济远景发展的中心问题”。“党正确地确定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这就是坚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今后必须首先依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素，即提高

国民经济的效率和集约化程度”。

1月1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石油开采工业》的决议。决议说,“1970年这些油田至少将开采3000万吨原油”。要求在1975年保证使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量达到1亿至1.2亿吨,在1980年达到2.3亿吨到2.6亿吨。决议还提出,交通部门应“保证在1974年使跨过鄂毕河的秋明——苏尔古特铁路线交付使用,在1975年使苏尔古特——下瓦尔托夫斯基——斯特列热沃耶铁路线交付使用”。

1月22日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在图拉举行全苏学习谢基诺经验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各部、各州、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和各企业经理。会议认为,学习的主要经验是:实行有技术根据的劳动定额,一身兼数职;扩大看管范围和充分利用工作日;完善管理机构;合并车间和生产部门;技术设备修理的集中和专业化等。

2月3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肉品和奶品工业部党委工作的决议》。主要内容是:1. 批评该部党委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大大落后于要求,缺乏锐气和战斗性,没有形成互相严格要求和对缺点不容忍的气氛。2. 批评该部近年基金回收率降低,完不成生产计划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执行党和政府关于削减行政管理人员的指示。3. 部机关没有很好地称职地监督组织,不能按时完成政府的委托。4. 部党委常委表现出自由主义和无原则性,对某些党员丧失责任感,对破坏国家纪律的现象没有从政治上给予尖锐批评。苏共中央要求该部根据苏共中央1969年十二月中央全会的精神,重新安排党组织的工作。

2月6日 《苏共党史》增订本第3版出版。该书内容包括1969年6月以前苏共的历史。《真理报》就此书的出版发表书评。书评认为这本书“反映了苏共同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自右和‘左’的修正

主义进行的原则斗争”。书评还说,“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是党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中的主观主义错误得到克服,结束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中不正确的改组”。

2月12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写信给各级组织和广大劳动人民。公开信的题目是《关于改进挖掘生产潜力和在国民经济中加强节约制度》。信中指出,国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五年计划指示的规定,生产效率不高。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五年计划指示的规定,其中包括燃料、电力、冶金、农机等,相当大一批工业企业、建筑和运输组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1969年一系列地区的肉、蛋、奶减产,农业产量和畜产品率不高,破坏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开信强调“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核心问题”。号召“全体劳动人民积极投入争取胜利完成五年计划的全民斗争中去”。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共产党的党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原则》。文章对苏联哲学界“表现出某种不良倾向”提出严厉批评。文章认为,这种不良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采取了非辩证的态度”。“有些哲学家毫无根据地怀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的学说)的对象的理解,他们这样或那样地缩小哲学研究的任务,实际上把哲学的对象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对后者的解释也是片面的)”。文章批评有些人企图不加批判地从专门科学领域抄袭一些名词来“丰富”和“发展”范畴,实际上是“使哲学范畴的内容变得贫乏了”。文章对《哲学百科全书》第4卷有关异化的条目,对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有关道德的谈话》,对彼得洛夫1969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点名进行了批评。

4月2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

于完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制度》的决议,对现行的劳动报酬制度作了修改。规定生产队(生产小组)工人的劳动报酬实行按完成的工作量和得到的产量的计件奖励制,对领导人员和专家按取得的利润进行奖励。

4月1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哈尔科夫州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颁发列宁勋章。他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要增加产量和改进产品质量,不仅应该依靠新的投资和增加工作人员,而且应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充分地 and 合理地使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依靠对每一分钟工作时间、对每一部机器和机械、对每一克原料和燃料采取精打细算的态度”。他认为在两个世界体系经济竞赛中要领先,“首先是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在生产中广泛而且及时推广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性”。“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完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他说:“现在对管理结构也正在进行重大改进。这种改进可以使管理结构更加合理,摆脱不必要的环节,找到各级权利和义务、权利和责任的正确关系。多余的层次只会误事、拖延重要问题的解决、浪费时间去作各种各样的‘协商’”。勃列日涅夫还对许多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和纪律性提出批评。

4月21日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大会。有66个外国党的代表出席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长篇报告。关于苏联的现状,他强调“是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和各代人的友谊合作”,“苏联社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现实体现”。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全民国家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不断地加强这个国家,改进整个管理社会的体系的原因。苏共经常不断地、目标明确地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把千百万劳动人民吸引到自觉的历史性创造中、吸引到管理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中去的手段。在苏联,所行使的民主是每

个公民、每个集体、每个共和国参与解决社会生活问题，同偏离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准则的现象作斗争，以及批判缺点和积极参与消除缺点的权利，党经常不断地完善人民代表制，完善人民监督机关和管理机关活动的形式。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向劳动人民提供的广泛权利，同公民的义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勃列日涅夫说：在苏联没有也不能有另外一种政治力量能够象苏共那样，如此充分而一贯地考虑到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各个大小民族、苏联社会的各代人的利益和要求，并且使这些利益和要求相互结合与协调起来。党是整个社会体系的组织核心，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集体智慧。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的艺术，“就在于及时发现产生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估计这些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党深刻而周密地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大胆地揭露困难和矛盾，指出克服的方法，从而开辟共产主义建设的航线。勃列日涅夫强调：“我们生活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共产主义建设的速度在加快，规模在扩大。科学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作用在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国际作用和国际主义的责任日益提高。这一切都导致苏维埃社会领导力量——共产党的作用日益增长”。任何贬低党的作用，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的表现，都会造成严重挫折并使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

5月6日 苏共中央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同捷共中央领导胡萨克、什特劳加尔在布拉格签署“苏捷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双方表示，将忠于1943年12月12日缔约、1963年11月27日延期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条约规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欧洲国家边界不可改变，双方决心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一道，保障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条约还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武装进攻，缔约另一方视为对自己的侵略，应立即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援助，并

给予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行使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规定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

5 月 8 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 25 周年大会。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报告中说:“现在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掌握着历史的主动权,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的进攻阶段”。他还说:“祖国的利益,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使我们还必须从远东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得出最严肃的结论,我们已经采取、今后仍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我们的国防,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东部,都是坚固和牢不可破的”。

5 月 26 日——30 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出席共青团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对青年提出的要求是保卫父辈的成果,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掌握科学知识,关心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成为意识形态战线上的积极战士。

5 月 28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民经济管理学院》的决议。决议指出,该学院直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提高国民经济领导人在运用经济数学方法和计算设备以实现现代化管理、组织生产和制定计划方面的业务能力;规定国民经济管理学院学员的学习期限为脱产学习 3 个月,国民经济领导人员的进修按教学计划和大纲进行,并应完成课程论文。规定国民经济管理学院学员的学习从 1971 年 1 月开始。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技术委员会,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以及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应拟定选派学员到学院学习的制度,并于 1970 年 11 月 1 日前提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5 月 28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就完善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煤炭工业和管理结构分别作出三个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把

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由联盟—共和国部改为全联盟部,这两个部的管理体系是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企业,并建议进一步减少行政开支。决议规定煤炭工业部的管理体系是部——联合企业——企业的三级管理体制。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新的组织机构将能改进对工业的领导,加强生产的集中和专业化”,“这种经验将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推广”。

6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为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在列宁格勒市基洛夫选区向选民发表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说,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人民的机构,它代表着全体人民并表达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它创造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吸引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自觉地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参加管理社会和国家的全部事务。苏维埃代表的成份也证明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真正民主性,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成员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就占了46%。多民族国家苏联的各族代表都积极参加管理苏维埃国家。在苏联,还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关于吸引妇女参加管理的原则,有463名妇女已被登记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优秀青年也被广泛地选进了苏联最高苏维埃。

6月1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为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向选民发表讲话。他说,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逐个实现经济改革,改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已有了重大的积极成果,他强调指出:如果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还说,“科学空前密切地同生产结合在一起,在科技进步的现阶段,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这一任务变得特别迫切。他认为,苏联“已创建了一种强大的经济潜力;它足以使我国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应有的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6月1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在莫斯科巴乌曼选区向选民发表讲话。他在谈到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时说,苏共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看作是向共产主义顺利推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党和政府在完善国家机器和全套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方面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其基础正是这一原则。苏联法制以概括而集中的形式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主要方面,保证社会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进。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的立法活动充满了深刻的民主精神,参与制订法律的有关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苏联社会人士,一些最重要的法律提交全民讨论。所有这一切确保苏联法律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的需要,真正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最近几年,最高苏维埃制定并通过了一些法律,实际上涉及全体苏联人的利益。这是有关保健、巩固家庭、土地规划以及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律。完善苏联法律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使它不落后于生活,使苏联的法律既能持久稳定,又能正确地反映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过程。法律只有当它被执行时才有生命,才起作用。法律对人人都有约束力,人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不因地位、头衔和等级而异。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法律秩序,是社会及其公民和正常生活的基础。

勃列日涅夫还指出:中央和地方苏维埃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提高了。要解决苏联所面临的任务,就要求全体代表和各级苏维埃特别注意完善自己活动的民主原则——如向选民汇报工作,公布工作情况等,并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

7月2日——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勃列日涅夫《当前党在农业方面的任务》的报告。

在讨论时发言的有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鲍久尔、吉尔吉斯共产

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沃斯、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苏共阿尔泰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基耶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计划主席巴伊巴科夫、苏共新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戈利亚乔夫、苏联化工部部长科斯坦多夫、苏联农业部副部长马茨凯维奇、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部长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等。

全会一致通过了《当前党在农业方面的任务》的决议。

全会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先后召开中央全会，贯彻七月全会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陆续通过了《关于对土壤改良系统的管理》、《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改变国营农场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增加马铃薯、蔬菜和水果产量》、《增加饲料生产》、《加速发展微生物工业》等决议。

7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作题为《当前党在农业方面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2.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内容包括：关于农业投资问题，关于加快农业化学化的速度，关于发展土壤改良，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提高科学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等问题。3. 改进党对农业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强调：“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率，更好地利用内部潜力和拨出的物资，加强同违反纪律、责任心不强、浪费和经营不善等现象作斗争。农村党组织在这方面也面临重大任务”。他认为“区一级在领导农业中具有重大意义。最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各农业区党委、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提高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任务今后仍然是完善这一级的机构，改进它的工作。不久前，区农业生产局改组为区执委会农业局。现在这个局的局长同时也是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我们认为，这一措施将有助于提高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认为“进一步发展农业仍然是我国主要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之一”，“中心问题仍然是大力增加谷物产量”。不仅谷物生产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居民对畜产品，特别是对肉类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在此情况下，对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7月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当前党在农业方面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赞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当前党在农业方面的任务》报告中阐述的结论和建议。2. 农业方面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全民去争取提高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保证谷物、棉花、制糖甜菜、向日葵、蔬菜、土豆及其他产品产量不断增长。在下一个五年中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每个农庄和农场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从而使全国每公顷增产谷物不少于4公担”。“增加谷物产量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谷物每年平均总收获量应为19500万吨”。“规定1971年至1975年固定不变的谷物收购计划为每年6000万吨”。3. 进一步增加畜产品生产。“赞同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在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增加肉类、奶类、蛋类和毛类的生产量和国家交售量的物质兴趣方面采取的措施”。4. 正确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定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计划。5. 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新的五年期间为农业需要拨款的决定，为生产建设、住房建设和文化生活设施建设以及为购买技术设备拨出国家基建投资776亿卢布。6. 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使化肥产量至少达到9000万吨，植物化学保护剂至少达到45万吨。为农业提供的化肥，1975年最低限度要达到7200万吨，饲料用磷酸盐达到300万吨。7. 发展土壤改良事业。8. 进一步发展拖拉机、农业机器和土壤改良机器的制造业，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应该积极地参加解决对农庄和农场生产的设备革新、增加农业机器产量的任务。9. 1971年至1975要为农业提供170万台拖拉机、110万辆卡车、54.1万台谷物联合收

割机、23万台青贮料联合收割机和6万台甜菜联合收割机、150万辆拖拉机挂车、8.7万台掘土机、8.2万台推土机、42500台铲运机和价值150亿卢布的农业机器,其中包括用于畜牧场和饲料储藏机械化的价值60亿卢布的农业机器。10.采取措施大力扩大农产品和农产原料的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11.采取措施加强苏联农村建设部的生产基地。12.进一步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事业,扩大和加强科学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联系。13.各级党组织,党和国家全体干部注意必须提高纪律性,必须提高对担负的工作、对严格遵守苏联法律的个人责任。14.中央全会强调指出,要解决农业方面的重大任务,就需要党及其各级组织作出巨大努力,需要提高它们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水平,广泛开展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竞赛。

7月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四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这个问题发了言。中央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还讨论了第八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一些问题。

全会通过的《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四次例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1.定于1971年3月召开苏共第二十四次例行代表大会。2.确定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1)苏共中央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3)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1971——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3.规定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如下:每2900名党员选出有表决权的代表1人,每2900名预备党员选出有发言权的代表1人。4.根据党章,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用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的哈萨克的共产党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州的党代表会议

上选举。

苏联陆海军、公安和边防部队党组织的党员，同有关地区党组织一起，在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苏联驻在国外的陆海军部队党组织的党员，在该部队的党的代表会议上选举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7月3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法院和检察院机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加强法制、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教育苏联人坚决遵守法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准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是，法院和检察院机关的工作水平还不能充分适应党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国家纪律、预防和根除犯罪的决定。

为了改进法院和检察院机关的工作，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苏联检察院和苏联最高法院对法院和检察院机关的工作加强监督，保证它们在完成最重要的国家任务即进一步加强苏维埃法律程序和社会主义法制、加紧同犯罪现象作斗争方面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水平，提高法院和检察院在预防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加强并扩大它们同社会和国家组织、同劳动者集体的联系；为了加强国家对法院和其它司法机关的领导，有必要设立苏联（联盟—共和国部）司法部、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司法部以及边疆区和州司法局；责成苏联检察院、苏联最高法院和苏联司法部采取措施改进法院和检察院机关的工作；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苏联检察院、苏联司法部和苏联最高法院要改进法院、检察院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干部工作，保证向这些机关选调优秀干部，来加强这些机关的工作。

8月28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出席哈萨克党和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大会。他在讲话中说：“哈萨克过

去是沙皇俄国荒芜的、落后的民族边区，现已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50年代进行的垦荒将永远作为全民的功绩而载入史册。”

他针对西方报刊宣传“苏联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后可在东方放手加强对中国的压力”说：这是“捏造和诽谤”，“在西方国家集团中有不少人希望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并且象通常所说的，想从中捞一把，然而，这些先生看来是打错了主意。他们的打算是建立在不理解，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建立在有意歪曲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真正目的和原则上的。”在此之前，柯西金在8月7日答印度《爱国者报》记者的提问时曾说：“所有所谓苏联正准备进攻中国的说法都是企图进行肮脏的挑衅，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9月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成立司法部（联盟一共和国部）的决议。决议认为，司法机关和检查机关的工作不能完全符合加强法制和国家纪律。防止和消除犯罪行为的任务。决议要求检查机关更加积极地揭露和杜绝经营无方、浪费和破坏纪律等事实追究责任。

弗拉基夫尔·捷列比洛夫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

10月20日 苏共中央《关于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党委工作》的决议在《党的生活》杂志第21期发表。决议对研究所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指责“党委会在教育科技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对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分析不够”，“对资产阶级学者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作斗争时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苏共中央要求该研究所党委要进一步完善思想工作，“教育科学家不调和的态度去对待反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工作。

11月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当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采用科学成就、最新技术和最新

工艺,不断完善生产结构,改进劳动组织,充分利用现有一切设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社会生产效率。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这就是工业以及农业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经济改革问题,他认为这是“把集中计划的优越同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采用经济杠杆和刺激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应当提醒注意的是,我们党过去从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经济刺激作用是唯一有效的”,“必须善于把经济刺激制度同对集体或每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苏斯洛夫还着重论述了“生活方式”问题。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立了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根本不同的苏维埃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本身,以及每个人为大家、为社会利益而进行的诚实而高效率的劳动”。

11月14日 美国《生活》周刊宣布,将从11月23日开始连载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赫鲁晓夫于11月16日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表示他“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过任何人”。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这部回忆录是阿朱别伊夫妇通过维克托·路易斯弄到西方去的。

11月20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1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致词时说,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正在越来越紧密地协调努力。在经济方面有必要和可能把经济合作提高到新的、质量更高的水平。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他认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将把社会主义国家引向新的胜利。

12月3日 阿塞拜疆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说:苏共二十三大规定阿塞拜疆工业总产值要增长60%,而实际上只增长37%。关于发展极重要的工业

部门和增加极其重要的消费品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都不能完成,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石油机器制造、电机、冶金、动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轻工业发展速度下降了近 1 / 3,居民所需的食品供应情况很糟,大宗日用必需品无货。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委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造成的。

12月1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 1971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 1971 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 1971 年 3 月 30 日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例行代表大会。

在全会闭幕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讲了话。全会就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基本赞同 1971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苏联国家预算草案,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将 1971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苏联预算草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

1971 年

1月27日 《真理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国民经济中法制工作》的决议的部分内容。决议强调：“新体制”扩大了企业的权力，有必要加强国民经济中的法制。决议批评一些单位、企业和市、区苏维埃对法律工作估计不足，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广泛利用法律手段来有效地解决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加强国家纪律、完成计划任务和合同义务”。决议提出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条例来改进各企业在缔结和执行经济合同工作方面的领导。

2月11日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解除了瓦杰尔的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职务，瓦杰尔改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原苏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列别杰夫为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和中央常委。

2月22日 苏共中央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家计委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巴伊巴科夫和党政领导人近日多次强调，“反对贬低集中计划的作用和夸大市场作用”。“在加强国家集中领导”的同时，必须发挥地方机构和企业集体的创造积极性。制定国家计划时必须坚持“部门和地区性原则”。

3月4日 《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以显著地位报道原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90诞辰。《真理报》在刊载他的传记时，称他是列宁主义革命家。在苏共二十二大时，

他曾被指责参加反党集团,反对同个人崇拜作斗争,并“应对许多无辜领导人、特别是军队领导人遭到的报复负直接责任”。

3月12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区和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批评了区、市苏维埃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形式主义成份,如对缺点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对遵守法制监督不够,没有同破坏国家纪律的现象作应有的斗争。决议强调区、市苏维埃的使命是:“解决其所属境内的一切地方性问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协调和监督所有企业和单位的工作”。

决议指出,克服区、市苏维埃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进一步改进它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是同完善党对苏维埃机关的领导的必要性相联系的。苏共中央责成各级党委要进一步改进区、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提高它们的作用,对苏维埃机关中党员的工作要加强监督。

3月15日——19日 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组成的苏共代表团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西泽富夫,政治局常委、《赤旗报》总编田耕一郎,政治局委员、中央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砂间一郎组成的日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党发表的公报称,两党愿意在独立、平等和互不干涉内事务的基础上解决两党之间发生的问题,并且商定了消除关系正常化障碍的具体措施。两党一致表示,愿意发展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

3月20日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奥·爱·沃斯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谴责国际反动势力在侨居国外的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下,企图“破坏拉脱维亚人民与苏联各族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的友谊”。他强调,不能对某些人的观点和情绪中的地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狭隘性置若罔闻。他批评某些人反对在拉脱维亚建立大型工业和其他项目,理由是这会使拉脱维亚加盟共

和国的非拉脱维亚人数增加和共和国的民族成份混杂。

3月2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这个问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

全会一致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全会还讨论了《关于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对1971年至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草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全会一致批准了《关于苏共向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对1971年至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

3月30日——4月9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代表有4963名,其中包括有表决权的代表474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2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是4949人,有14名代表缺席。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1.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作总结报告,报告人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2.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报告人是苏共中央检委主席西佐夫。3.柯西金作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1971——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作了总结发言。

代表大会讨论了有关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通过了《给印度支那人民自由与和平! (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声明)》和《争取近东的公正持久和平! (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声明)》。

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康·乌·契尔年科由中央候补委员提升为中央委员,米·谢·戈尔巴乔夫新当

选为中央委员。

3月3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苏联的国际地位,苏共的对外活动,内容包括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社会进步的敌人,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斗争,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2. 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中的主要问题,内容包括第八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结果和党的经济政策的任务;提高人民福利是党的经济政策的最高目的;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更加充分利用各种潜力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完善经济管理体制。3. 苏联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和党的任务,内容包括社会结构中的变化,苏联人民团结的进一步加强;加强苏维埃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造就新人是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主要任务之一。4. 党的发展和党内生活的某些问题,内容包括苏共队伍的壮大和党内民主的发扬;加强党的组织,选择和培养干部;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强调,苏共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日益广泛地吸收劳动群众参加生产管理。苏联人有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有自己发扬民主的原则和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和内容,就是日益广大的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苏联国家的基础及其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最充分的体现。他还强调完善苏联法律和加强法制有重大的意义。任何违反和逃避法律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

4月6日 柯西金作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1971——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2. 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社会经济任务。3. 发展物质生产。4. 完善管理和计划工作。5. 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6. 对外经济联系。

柯西金说：“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在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他强调指出，这一任务的提出，是以过去社会主义生产的整个发展所建立的实际潜力以及我国国民收入所反映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了的资源为依据的。

柯西金说，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规定国民收入将增长37%—40%，工业产值将增长42%—46%，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41%—45%，消费品生产增长44%—46%。农产品年平均产值将增长20%—22%。到1975年，钢产量要达到1.42亿吨至1.5亿吨，石油达到4.8亿吨至5亿吨，全国谷物产量不少于1.95亿吨。

柯西金宣布，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物质生产部门与服务行业中的经济核算单位将完全改行新体制。“国民经济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合理化”是五年计划中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强调两级或三级的管理组织体制是最适宜的，生产联合公司的建立，是完善管理体制的新的因素。

4月9日 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所包含的建议和结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议指出：“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如下活动：同兄弟国家一道，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国际主义援助，以捍卫其社会主义成果不受国内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经验再次提醒人们：必须对帝国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代理人的阴谋提高警惕，而始终不渝地同在‘改良’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力图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并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扫清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苏联国内情况,决议强调加强法制。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进民警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工作。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都应该争取使全体公民和负责人员严格遵守法律,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法律教育。必须改进人民监督的工作,使列宁关于广大群众要进行经常而有效的监督的思想得到坚决的贯彻。

决议还重申,苏共的干部政策,今后仍应当是在爱护老干部,最大限度地运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的同时,致力提拔年轻的、有前途的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的原则性要求同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结合在一起的原则,今后仍应贯穿于整个干部工作之中。对那些破坏纪律、不能从批评中得出结论、品行不端的人,必经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定》。决定规定:苏联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每5年至少召开一次;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每5年至少召开一次;边疆区、州、专区、市和区例行党代表会议,由党的相应委员在两次苏共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期间召开两次,即每两三年召开一次。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对执行党的政策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加强它们在本单位劳动者中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对现行党章和部分条文作了修改。

同日,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出苏共中央政治局由下列15人组成:列·伊·勃列日涅夫、根·伊·沃罗诺夫、维·瓦·格里申、安·帕·基里连科、阿·尼·柯西金、费·达·库拉科夫、丁·阿·库纳耶夫、基·特·马祖罗夫、阿·雅·佩尔谢、尼·维·波德戈尔内、德·斯·波利扬斯基、米·安·苏斯洛夫、亚·尼·谢列平、彼·叶·谢列斯特、弗·瓦·谢

比茨基。

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下列 6 人组织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彼·尼·杰米契夫、彼·米·马谢罗夫、瓦·帕·姆日阿瓦纳泽、夏·拉·拉希多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当选为中央书记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彼·尼·杰米契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康·费·卡图谢夫、安·帕·基里连科、费·达·库拉科夫、鲍·尼·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

阿尔维德·佩尔谢当选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根纳季·西佐夫在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4 月 20 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改善劳动条件和巩固农业机械干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农机手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决定改善农机手的居住条件和日常文化和生活条件，同时提高拖拉机手的工资定额，并根据他们的连续工龄规定每年额外的、工资照付的假期，以及较高的补助金。

4 月 25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在工业基础上发展畜产品生产和进一步扩大蛋类和禽肉生产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目前这个五年计划里，完全有可能扩大大型综合畜牧场和养禽厂的建设，为此，要建造 1170 个在工业基础上生产肉品和奶品的大型国营综合企业，以及建造和扩建 585 个养禽厂。

5 月 14 日 苏共领导勃列日涅夫和格里申等在第比利斯出席格鲁吉亚党和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苏联的内外政策。他在谈到格鲁吉亚无产阶级革命家时，提到了斯大林。他还说，由于消除了个人迷信以及主观主义错误的后果，在党内和国内造成了一种有利于良好而和谐的工作的道德气氛。他号召加强苏维埃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民族局限

性和民族沙文主义。

6月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莫斯科总发展计划的决定。到1985——1990年,莫斯科将成为具有完美布局、现代化建筑、高级公用设施的共产主义模范城。

6月11日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巴乌曼选区会见选民时谈到完善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时说:苏维埃,特别是地方苏维埃,是普通苏联人最经常接触的政权机关。劳动人民由于自己的日常需要,经常出入苏维埃,他们希望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只有依靠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获得成效。现在几百万人成了各级苏维埃的积极分子,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是件好事情,是体现苏维埃工作的真正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各级苏维埃的周围建立广泛的积极分子队伍,这还远远不是要做的全部工作,还要保证苏维埃同全体选民群众的经常联系。苏共中央今年3月5日的决定强调指出,必须保证这种制度,使居民和选民熟悉各级苏维埃的所有实际工作,并积极参与讨论各级苏维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各地区和各城市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生活问题应当提交企业、机关和各居民区的劳动人民讨论。争取使这一点成为各级苏维埃的法则和活动准则,这是新当选的代表们的直接职责。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吸收尽可能广泛的劳动群众积极参与解决社会事务。正是各级苏维埃应当首先贯彻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这一原则。

7月16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1971——1975年发展铁路运输的决定》、《关于改进工业铁路运输的工作》的决定。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铁路运输和地下铁路职工的低工资、提高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额以及减少铁路运输干部的流动性的措施》的决定。

8月1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完善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进修

课程体系的措施》决议，决议指出：遵照苏共二十四大关于完善党和苏维埃干部进修体系的指示，苏共中央决定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共政策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及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常设进修班的工作基础，提议向学员介绍科学管理经济的基础知识以及科技和文化的最新成就。为此，建议直接在先进的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科研机构和组织内实行讲课。苏共中央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指定一些组织、机关、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作为进修班学员在那里研究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实践的场所。应采取措施，吸收党和苏维埃领导人、著名学者、精通业务的高等学校教员参加教学，以便改善讲课的质量。苏共中央认为，必须使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各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州（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中央和共和国一级的机关、组织、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定期到进修班讲授党和苏维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领导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经验。

决议要求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负责协调党和苏维埃干部进修课程体系的全部教学和教学法工作。为此，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基础上成立由进修班的领导人、党的工作者、有经验的教员组成的教学和教学法委员会。委托跨州的共和国的高级党校负责对本地区的地方进修班进行教学法的指导。苏共中央已批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进修班1971——1972学年的工作计划。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制定地方进修班的干部进修计划。

8月20日 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认为新体制会自动发挥作用是不对的。新体制在不断完善，但是新的经营方式的优点并没有充分地运用，有时甚至被歪曲。个别企业不认真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及时完成协作供货，一味追求利润，毫无理由地提高产品价格。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应过问违反国家纪

律和计划纪律的现象。

9月11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名发出讣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病故。讣告称他是“领取特别养老金者”,赫鲁晓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9月16日 《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教育》的决定。决定对经济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宣传工作的内容和规模都不符合苏共二十四大的要求,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对执行计划和义务怀有责任感。决定要求采取措施来根本改进对国民经济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经济教育。

9月29日——10月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波诺马廖夫等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苏斯洛夫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发达的社会主义具有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体现充分民主的全民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要确立“单一性的社会”;要把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拉平,保证苏联各民族人民全面地发展社会进步;强调苏共的领导是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一切问题的必要条件。他还要求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研究。

10月18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物质生活和住房条件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规定,从1972年9月1日起,把大学生的奖学金平均增加25%,把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奖学金平均增加50%。使奖学金稳定在下列数额内:高校学生按其专业与年级的不同,每月40——60卢布,中等学生按其专业不同,每月30——45卢布。

对各门学科考试成绩都得5分,在社会工作与科学技术工作中表现良好的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除规定的数额外,再增发25%的奖学金。在个别情况下,在已批准的学校学生奖学金基金范围

内,在共青团和工会的参与下,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有权对那些学业成绩得5分、4分并在社会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中表现良好的学生,按规定的数额再增发15%的奖学金。为了增加奖学金和领取奖学金的人数,国家要在这个五年计划当中增加15亿卢布拨款。

决议还规定,要采取措施大大增加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的建筑面积。在五年计划期间建成总面积为570万平方米的学生宿舍。决议还提出,要采取措施大大改善学生和公共饮食和医疗服务工作。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地方党机关、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以及苏联辖有学校的各个部和主管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执行本决议规定的各项措施。

10月19日 苏共中央领导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波利扬斯基、格里申、库拉科夫、杰米契夫、乌斯季诺夫、卡皮托诺夫、卡图谢夫和波诺马廖夫、叶皮谢夫等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大学生代表会议。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说,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要求苏联青年进行一场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接力赛,号召青年走在争取生产与生活的高水平、争取在实际生活中确立共产主义准则的战士的最前列。他还强调加强苏共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作用,认为高等院校工作中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都不应为党组织所忽视。

10月29日 苏共中央召开中央报纸、杂志、电视、电台、通讯社和出版社领导人员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会议讨论了群众性宣传机构在实现二十四大决议方面的任务,宣传工作应服从于顺利完成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的计划任务,完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发扬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精神,提高管理水平、纪律性和干部对经营结果的责任心。

10月29日 《真理报》公布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障进一步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措施》的决定。决定强调要保证消费品的

生产。各部和主管部门的企业,只有征得苏联商业部的同意,才可以取消某些消费品的生产或减少这些消费品已经达到的产量,要坚决制止取消或缩小人民所需要的商品的生产。

11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科理论工作者在各方面的任务。他说,苏共二十四大为社会科学家确定的主要方向是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科学论证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长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在经济方面的任务是,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生产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等。在社会政治方面,主要是克服三大差别、各民族的接近、加强国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斗争等问题,在国际政治方面,有苏联同各类国家的相互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团结等问题。

11月22日——23日 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1年至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以及苏联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2年苏联国家预算和关于1970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会就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还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国际活动》的报告。全会就这个报告一致通过了决议。

全会推选米·谢·索洛缅采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11月2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中央自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国际活动的决议》。决议表示,“一致赞同和完全

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贯彻执行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外政策纲领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全会赞同为实现另一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而采取的实际行动。“高度评价中央政治局为在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之一——确保欧洲紧张局势的缓和、继续在实践中运用欧洲各国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原则而进行的活动”。决议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抗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当代解放运动的强大支柱。苏共把大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看成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看成是自己国际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

12月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发展肉品和奶品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决定》公布。决定规定了1971——1975年肉品和奶品的总产量将增长40%，并制定了使现有肉品和奶品工业进一步专业化和技术改造等具体措施。

12月5日——11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发言中就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中产生错误的原因说：“历史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不能避免个别的疏忽和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性质，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基本原则，相反，它们的出现是由于在某一点上离开了这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些原则。因此，要能够以自我批评的态度估价自己的工作，并且作出必要的实际结论”。他还说：我们尊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于纠正曾经出现过的消极现象所采取的原则性的和勇敢的态度。

12月24日 苏共中央召开哲学工作者会议。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院长费多谢耶

夫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家学者及党的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哲学协会正式成立。会议强调哲学家在完善思想工作和教育新人方面应起积极作用，要在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多做工作。

1972 年

1月21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决议对苏联文艺评论工作提出批评。认为目前批评界的状况尚未完全符合文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日益增强的作用的要求,许多文章、评述和评论都很肤浅,存在着“对思想和艺术次品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主观主义及出于私情和派别的偏袒风气”。决议认为文艺批评在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人道主义理想方面,在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和彻底。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苏共中央责令党政主管部门和文艺团体“必须注意提高文艺批评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积极性和原则性”,要求“调配业务熟练、政治敏锐”的干部去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决议还规定了对文艺批评、文艺学等方面的优秀著作的奖励形式,同时决定创办群众性的文学批评和书评杂志。

《真理报》于26日发表社论,认为决议不仅指出了文艺批评的最重要的缺点,而且确定了最重要的任务。《文学报》、《文学问题》等报刊强调,苏共的决议是长期的行动纲领,将在很多年里决定苏联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

1月30日 苏共中央就改进商业和商业技术装备问题作出决议,对商业机关没有很好研究供销关系以致某些商品供销脱节提出批评。决议指出,一些共和国的批发部门没有完成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供应任务。建议各共和国推广自动售货方法来出售食品和其他商品。

批准国家银行可以为建造城乡集体农庄市场和食品工厂仓库提供长期信贷。

2月8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完善农庄和农场的管理》，主张在农庄、农场改行部门管理体制以代替地区性管理结构。社论介绍了某农场组织4个经济核算部门：种植业部门、畜牧业部门、机械化部门和建筑部门以代替过去的生产队。社论认为，在土地集中、专业化较深、生产积聚水平高和干部受过专业训练的地方实行部门管理结构“效果最大”。

2月22日 苏共中央发展《关于筹备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决议，提出宣传要点，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拟定庆祝计划。

宣传提纲的主要内容是：1. 强调民族问题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正确解决。2. 宣传联盟带来的“丰硕成果”，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民族对抗已经消灭，各民族自愿选择俄罗斯语言作为民族间交往和合作的通用语，现在已经出现了苏联人民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共同体”。3. 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已取得了完全胜利，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具有“巨大国际意义”。4. 阐述民族问题是国际上和思想领域的尖锐战线。“资产阶级宣传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及时从政治上对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点的企图作出评价，坚决揭露反共思想家、‘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2月 《党的生活》第4期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减少浪费工作时间和消除违反职工工作作息制法令的措施》的决议。决议针对一些单位职工旷工、迟到、早退等现象多，要求加强劳动纪律。

3月6日 苏共中央发表《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在执行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批评第比利斯市委在执行苏共二十四大决议中存在的严重缺

点,在干部工作中,“没有经常考虑到党的要求,即评价工作人员的主要标准应是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业务水平、道德面貌以及在现代条件下领导群众的能力。在解决干部问题方面,有时表现出没有原则性,自由主义,不注意集体和党组织的意见。市委没有做到把对干部的信任和尊敬同对干部严格要求正确地结合起来,对某些履行职责很糟、犯有官僚主义、轻视劳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领导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针对上述情况,决议提出:市委和区委在选拔、配备和教育市党组织干部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列宁主义原则,经常关心使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的各个岗位都由有政治素养的、通晓业务的、有才能的组织者来领导。要使每一个领导人都掌握现代领导方法,在工作中表现出精明能干,把组织者的品质和教育者的品质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使工作人员能够批判地看待成就,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所负工作的严格要求和个人的责任感,严厉处分那些违犯党纪国法和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

3月1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防止未经净化的废水污染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流域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要求“俄罗斯和哈萨克部长会议采取措施,使以上两河流域的所有城市在1980年前停止排泄未经净化的生活废水”。

3月2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到工会的职能时说,工会是党在群众工作、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方面的可靠助手。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已取得胜利的社会里,工会已越出了“保护性职能”,因为苏联早已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工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们直接地积极参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参与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国民经济。

勃列日涅夫强调党对工会的领导,他说,近几年来,根据党中央

委员会的倡议通过了一些法令,这些法令显著地扩大了整个工会活动的法律基础,尤其是同关心劳动人民利益有直接联系的那些方面的活动的法律基础,他还说:党的方针是使职工通过工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企业管理。生产会议和讨论工厂、国营农场工作计划、社会发展和其他问题的工人大会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监督和实际吸收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重要形式。

4月4日——27日 据《东方曙光报》报道,格鲁吉亚党中央和第比利斯市委接连举行会议。会议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格鲁吉亚民族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泽的《格鲁吉亚1917——1921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受到批判。批判者认为这部著作错误地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把当初脱离苏联的“格鲁吉亚独立”说成是进步的行动,“是在为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西达莫尼泽及该书的编辑受到处分。

11月25日,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洛拉什维利被撤,由格鲁吉亚内务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接任。

5月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然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全会还听取了苏共中央书记伊·瓦·卡皮托诺夫《关于更换党证》的报告,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选举苏共中央书记鲍·尼·波诺马廖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决议表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采取的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事业的实际活动。

决议指出:“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得到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苏联具有原则性的、始终如一的对外政策

符合苏联、世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利益，积极地促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并有助于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今后仍将坚持不渝地实施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和平纲领，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各种形式的方式实现这一纲领，把解决当前的日常直接任务同长远的前景，同争取各国人民和平、自由与安全以及同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5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更换党证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1973年至1974年更换苏共党员党证。在此之前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决议认为，“更换党证应作为一项重要的组织政治措施来实行，使它从属于进一步巩固党以及提高党员积极性和纪律性的任务”。

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当做到：使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严格遵守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要求，在生产中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切实起到自己的先锋作用，认真对待党的委托，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做遵守苏联法律、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和社会主义集体生活秩序的榜样”。

决议还规定，区委和市委其他书记同区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一样，都有权签署共产党员的党证。

6月8日——30日 苏联各地相继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贯彻苏共中央五月全会的决议。在各地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主要强调完全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突出宣传苏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作用，要求苏军对当前国际形势有正确理解，提高政治嗅觉和警惕性，明确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和平共处”。

6月13日 苏共中央公布《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责

成各级党组织同酗酒行为坚决斗争,要求采取措施加强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工作,妥善安排群众的业余休息时间。

为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苏联部长会议于6月15日公布反酗酒的具体措施,规定缩减烈性酒的生产和销售,缩短出售时间,因酗酒致病请假不发工资。

6月20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成向青年普及中等教育的过渡和进一步发展普通学校的决议》。决议指出。苏联教育部、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国民教育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克服缺点,“努力完成苏共二十四大在进一步发展教育、完成向普及中等教育的过渡和提高对新一代的教学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决议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力求做到使苏联学校授予学生有关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深刻而巩固的知识,使他们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培养青年具有积极从事劳动和社会活动、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和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志愿”。因此,要“采取措施使青年人普遍地接受中等教育”,大力发展、完善劳动和综合技术普通学校、夜校、函授学校、职业技术学校。

6月23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二十四大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更新生产设备方面提出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改进职业技术教育和提高熟练工人的培养质量”。苏共和苏联政府对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指责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充分保证对学生教学与教育的统一,没有经常考虑到工人劳动内容发生的变化和提高他们思想政治觉悟的必要性;对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科学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

为此,决议“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及各部和主管部门采取措施,消除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中的缺点”。决议明确规定,“苏联职业技术学校的使命是培养全

面发展的和具备技术知识的青年工人,即培养思想坚定、技术高超、能够掌握和改进新技术并能发扬站在共产主义建设者前列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劳动传统的青年工人”。

决议提出了进一步改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扩大和加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发展向读完普通中学的青年传授一、两种技能的技术学校;改进培养一般专业技能人员的1——2年制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并为学生在青年工人夜校(或轮班制学校)继续接受普通教育创造必要条件。

决议还要求苏联国家计委、苏联部长会议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及各部和主管部门,在制订国家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应考虑到进一步发展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网的问题,做到使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向培养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过渡。

6月2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更换党证》。社论指出,更换新党证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措施,而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这项同更换党证有关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其全党性意义首先就在于,要进一步提高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纪律性,加强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先锋作用”。

社论强调指出:“现在党正带领人民去完成伟大的任务,这些任务的特点是具有新生的、增长了巨大规模和复杂性。我们的建设活动的规模越是广泛,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和思想问题越是复杂,带领群众前进的党的作用和责任就越大。”“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拟定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路线,目的在于改进党的领导方法,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在于进一步使党的队伍团结一致并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培养党员思想上的坚定信念,提高他们遵行党纲和党章要求的责任心。在代表大会为此目的而详细拟定的一系列措施中即将进行的更换苏共党员党证工作具有巨大意义。”

6月26日——28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工作会议,研究筹

备庆祝苏联成立 50 周年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致开幕词时说，要同敌视社会主义的侵略势力和资本主义雇佣奴役制度进行长期的坚强斗争。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应是积极的、进攻性的、具体的和不妥协的”。

7 月 11 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阿尔泰边疆区委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中提高专家作用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取得较大成绩，同一贯重视专家工作，提高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边疆区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在解决生产任务中给专家们必要的帮助，支持他们的创举；发挥他们作为生产组织者和工艺师以及农村科学技术进步传播者的积极性。近几年，专家们的威信以及他们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状况的责任感大大提高了。

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尽力维护专家的威信，提高他们作为农业生产组织者和农艺师的作用，帮助专家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积极地发挥和利用增加农产品生产的潜力，不允许代替专家解决问题；每个专家也应当迅速掌握新技术和新工艺。

决议要求各级党委、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会组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专家，经常关心和改善他们的居住和文化生活条件，增建供他们使用的设备和交通工具。

7 月 12 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筑业中施工队经济核算新形式》的决议。决议认为，“施工队经济核算新形式具有高度的经济效果”，要求大力宣传这一方法，并为普遍采用这一方法创造必要的条件。据 7 月 16 日《消息报》报道，苏联建筑部及安装和专业建筑工程部发布了《关于建筑施工队和专业施工队改行新的经济核算形式——施工队承包制》的命令。现在全国已有 800 个施工队采用了这种承包制。

7 月 18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国

家高等教育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高等学校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日益增长。但“某些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不符合提高了的科学和生产的的要求。对教学教育过程的现代科学组织方法及教学技术设备的研究和应用,进展依然缓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在个别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在学习质量和遵守纪律方面未能经常从严要求大学生。函授和夜校形式的高等教育有待改进”。

为改变上述状况,决议要求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辖有高校学校的部和主管部门及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把各高等学校的力量集中起来去胜利地完成苏共二十四大大力发展高等学校方面所规定的任务,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科学文化部门所需干部的培养质量,以及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力求做到使青年专家掌握马列主义科学原理,具有高深的理论和专业水平,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善于做人的工作,并成为党的政策的积极贯彻者,高等学校有责任使专门人材树立不断充实和更新已有知识的志向,要使这一点成为他们终身生活与工作的确定不移的准则。

决议还具体提出,在1972——1974年期间,要加强学生一般科学和一般技术学科的学习和实习,在科学组织劳动和管理方面,在工程心理学、工业美学和电子计算技术等方面改进对专门人材的训练,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积极应用新的技术工具和方法。

7月27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在会上作报告时,批评一些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存有严重缺点,如在宣传民族政策的成绩时没有必要的深度,在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时缺乏进攻性。

8月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塔什干市党组织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问题》的决议。决议批评塔什干市委没

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该市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经济教育工作符合苏共二十四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学习往往流于形式,限于纯粹知识性,脱离生活和先进经验,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成长和对他们形成崇高的政治道德品质影响不大。

苏共中央责成塔什干市委制定和实施根本改进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的措施,并把它作为加强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提高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对该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导水平的最重要手段。苏共中央要求塔什干市委重视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教育,明确地规定教育方式,拟定在企业、区和全市范围内进行经济学习的远景计划,保证吸收专业教员、经济机关和科学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教学。

决议还提出,必须认真改进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工作,及时坚决地杜绝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严厉惩罚那些欺骗党和国家,滥用职权的干部。要结束把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调来调去的做法。

8月19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决定从9月1日起,增加教育和卫生部门职工的工资。医生、教师和保育员的工资分别增长23%、21%和29%。约有490万人增加工资,每年增加开支约12亿卢布。

8月22日 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事业的措施》发表。决议对苏联电影事业现状提出批评,指责一些影片缺乏思想性和鲜明的阶级立场,错误地解释历史和现实,批评国家电影委员会对电影事业领导不力。

原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被撤职,《苏维埃文化报》总编辑叶尔马什被任命为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

8月3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黑色冶金工艺流程自动化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这一部门的自动化工作严重地落后了,批评有关部门没有搞好重新装备黑色冶金工业的工作,各部行动不协调,彼此不负责任,不能严格要求。决议对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重型、动力

和运输机器制造部,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部,电机工业部,安装和专门建筑工程部等部的部长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尽快克服缺点。

8月 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马谢罗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发表文章,批评有人在谈到“民族繁荣和接近的两种趋向”时,把这个问题搞混乱了。他们认为“各民族的繁荣和相互接近之间存在着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界限”,“民族繁荣是在自主的、长期发展阶段的轨道上前进的,只有在这完成之后,各民族的相互接近才是可能的”。

9月29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会。全会宣布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退休,原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升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0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和组织问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奥夫恰连科被解除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而由亲俄罗斯的马兰丘克接任。

10月24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联名写信,祝贺远东解放50周年,信中认为远东自古以来就是俄国领土,要求远东人民“一如既往地不断巩固防御能力,警惕地捍卫祖国的边疆”。

10月3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言论集《遵循列宁主义的方针》第3卷出版。言论集收录了1970——1972年间的言论和文章。《真理报》于11月1日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言论集的出版,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帮助党员、干部和人民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政策中的重要问题。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的又一部言论集《苏共为一切革命力量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出版。言论集收录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文章和言论。《真理报》12月9日发表文章说,这部言论集的出版是对“发展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11月2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配合饲

料工业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承认新建饲料厂和生产蛋白原料企业“落后于规定的时间”,原料资源分散影响配合饲料工业的发展。决定规定,从1973年起实行配合饲料统一分配,由国家规定出售价格。

11月3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7期发表长篇文章《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文章强调现阶段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全面综合发展经济,这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为科技革命使生产出现新的规模;经济要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同提高人民福利有关的任务,要把分配额同劳动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对计划和整个经济领导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

柯西金强调1973年是五年计划的决定性的一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加速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生产力的方针,在那里正在执行重大的全苏性的任务,要调动各种潜力完成五年计划。

12月5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争取1973年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开展全苏农业工作者社会主义竞赛》的决定。决定对竞赛的优胜者具体规定了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的办法,如授予红旗、奖状和奖金等。中央给共和国、州、级的最高奖金为15万卢布,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还可得到勋章和奖章。

12月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73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3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

全会就这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基本赞同1973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1973年苏联国家预

算草案,并将这两项草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全会选举弗·伊·多尔基赫为苏共中央书记。全会因瓦·帕·姆日阿瓦纳泽同志退休,解除了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2月21日 继各加盟共和国在本月上旬已相继开会之后,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25人会部出席了大会。115个外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说: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后,逐渐地变成了仍由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

他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在政权建设和发扬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基本方针,这就是群众更加积极地参加管理;各级苏维埃在领导社会生活方面更加充分地行使自己的多种职能,更加坚定地实行各执行机关应向各代表机关报告工作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进人民监督的工作。

关于民族问题,勃列日涅夫说革命前辈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但“民族主义偏见、夸大或歪曲民族感情的现象是极难消灭的”。他说,在文化建设,发展教育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了各加盟共和国以巨大援助,各民族共和国、民族州和民族区曾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各大中心城市的高等学校学习,各共和国本身也开办了几十所高等院校,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修改1936年宪法。新宪法草案预定于苏共二十五大前提交全民讨论。

大会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

1973 年

1月5日 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决议,对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全体职工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在多、好、省的口号下为提前完成1973年经济计划开展劳动竞赛。决议规定了对竞赛优胜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奖励措施。优胜集体最高可获奖金18万卢布,凡节约原材料增产者,奖金外加25%。优胜个人可免费在国内外旅游。全苏1973年拨给生产性部门的竞赛奖金额从工资基金的0.5%增加到1%。

1月9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保护环境和改善天然资源利用状况》的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制定1973——1975年净化废水、废物和减少汽车发动机污染的措施以及1973——1974处理垃圾的措施,并规定1974年要建造加工垃圾和烧毁垃圾的工厂,制定1973——1980年市区和郊区的绿化规划。

2月18日 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规定从今年3月1日起开始更换党证。3月1日,勃列日涅夫给列宁签发第一号党证。3月2日,苏共中央将二号党证发给勃列日涅夫。同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发表社论,强调更换党证不是清党,但“将把不履行苏共纲领和章程的党员清除出党”。2月29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开始更换党员证件》的社论。社论指出,在进行更换党员证件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共产党员相互提出的要求的严格性加强了。各级党的集体都开始更坚决地剔除那些以其行动玷污了党员这一崇高称号的人。

2月20——22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第一书记谢

瓦尔德纳泽在会上作了关于改进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报告。他谈到工农业方面的落后状况时强调,这是“政治组织工作薄弱造成的”。他还批评某些领导人“划分势力范围,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利用手中的权力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有5个区委书记和一些企业的领导人被点名批评,他们有的受撤职处分,有的被开除党籍或拘留查办。

中央书记恰努克瓦泽被全会解除了职务。4月中旬,又有一些市、州和区委书记在反贪污腐化运动中被解除职务。

2月28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社论,重申苏共二十四大制定的农业路线和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社论认为改善经济体制和部门比例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对一些工业部门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尖锐批评了国家计委和有关部委,社论指责国家计委和各部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只顾“本位利益”,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社论强调,改善中央计划和经济部门的工作是完善经济管理的根本问题。

2月 为贯彻苏共中央1972年十二月全会精神,确定各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任务,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都举行了中央全会。这些中央全会透露了十二月中央全会的一些内容和各共和国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工业方面,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没有达到要求增长的指标,生产设备利用不好,消费品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要求,基建的资金和人力分散,未完成的工程项目逐年增多。

3月22日 亚美尼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解除了党中央第二书记捷尔—加扎里茨扬的职务,由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原副部长阿尼西莫夫接任。4月23日,亚美尼亚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解除了该党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中央局候补委员斯捷潘尼扬和中央局候补委员萨基扬的职务,中央第一书记科钦扬对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不守纪律、营私舞弊、侵占国家财产提出尖锐批评,并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撤换这类人。

3月27日——2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等出席苏军第五次党组织书记会议。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国际形势复杂和意识形态战线上斗争的加强，对武装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在解决重大国民经济任务时，总是把国防问题当作注意的重点，没有那一个问题不是由党中央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直接过问的。他强调加强武装力量，认为世界战争一旦发动起来，将是一场最激烈的阶级冲突，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会议强调，今后将进一步提高党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和全体人员做思想工作，保证陆军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地方居民中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和防御工作，积极参加对青年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加强军纪、遵守条令规定的制度，根除事故和同不道德现象作斗争。

3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刊登书评，介绍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鲍久尔所著《城乡接近的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鲍久尔认为，城乡之间的社会差别不因过渡时期城乡对立的消失而消失。这种差别将继续存在，直到共产主义建成。鲍久尔认为，要使城乡接近，“必然要求农业变成一个同工业相接近的物质生产部门”，“把农业劳动变成一种工业劳动，同时扩大和全力发展农工联合企业和综合体”。

书评中说，苏共中央支持摩尔达维亚为完善农村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措施，即把领导集体农庄以及集体农庄合办的联合企业的生产活动的职权交给该共和国的和区的集体农庄理事会。

4月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要求在1973——1975年工业改行二级或三级管理体制，即部—生产联合公司或部—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取消总局。某些部门也可实行四级管理制：部—加盟共和国部—

加盟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联合企业、企业。决定认为，工业各部门在取消多级制后，大部分生产经营问题直接集中到企业和联合公司解决。《真理报》在4月4日发表社论，认为这一改组可以使现在经济活动中的大多数问题将直接在企业、联合企业和联合公司中解决，使行政领导机关接近生产。

《经济报》第14期发表了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全苏的和共和国的工业联合组织总条例》。

4月4日 《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激烈批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文章指责他在1970年写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是将乌克兰哥萨克理想化了，过多地渲染过去的乌克兰，而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轻描淡写，“脱离苏联整个发展来探讨乌克兰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章还批评谢列斯特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不提各民族的合作和互助、强调共和国经济自给自足，同时还以全人类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解释一系列文艺概念和现象。

4月17日——18日 乌克兰党中央举行全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在会上作报告时，批评“某些领导人对民族局限性和地方主义表现采取无原则的容忍态度，从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他说要坚决制止任何企图宣扬民族主义观点的行为。

谢尔比茨基批评许多部门的干部有“严重错误和缺点”，点名批评敖德萨、赫尔松等州“严重违反党的干部工作原则”。

4月26日——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为实现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开展的国际活动》的报告。在讨论报告时发言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

奇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等人。莫斯科伏龙芝棉纺织厂女工玛·谢·伊凡尼科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乌斯季拉宾斯克区库班集体农庄综合生产队队长米·伊·克列皮科夫也发了言。全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议。

全会因彼·叶·谢列斯特和根·伊·沃罗诺退休，解除了他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全会提升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弗·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葛罗米柯和格列奇科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格·瓦·罗曼诺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月2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中央为实现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开展的国际活动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全会完全同意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并强调指出报告里所提出的苏共在国际活动方面任务的迫切性，决议认为“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阵地及其团结大大加强了，这些国家协同一致的政策对国际事态进程的影响增强了，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原则得到了广泛承认，正在发生由‘冷战’向和缓紧张局势的转变，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已被停止”。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决议强调“苏共中央始终不渝地主张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实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重申苏共决心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将举行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同时认为“中国领导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对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努力，以及北京的反苏方针，给和平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

5月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7月11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时,就苏联对外政策发表讲话。他说,今天出现了战后整个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就是:由国际生活中的敌我对抗时期,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日益稳定的和平共处以及在互利和同等安全基础上实行明智的和平合作的时期。他强调苏联的“新目标”是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力发展同已取得独立的亚非年青国家的关系;消除近东的侵略策源地;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发展同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要做许多事情。他还强调对裁军问题也应给予应有的注意。

5月 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召开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学校研究所所长、大学有关系的系主任、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一些州委的科学部主任和副主任,以及一些部和主管部门、中央新闻出版机关的负责干部。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执行苏共中央1967年8月14日《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决定工作的情况;关于苏联哲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专家的任务。会议在肯定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了克服现有缺点的方法。

6月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向选民发表讲话。他说:苏联“创造了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组成苏联社会的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越来越接近。“这里已形成了人民的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这就意味着,苏联人在举止、性格和世界观方面不受社会和民族差异影响的共同特征变得越来越显著。这意味着,始终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阶级同早已坚定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政治和思想团结中得到了发展”。

7月6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农村普通中学工作条件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说,农村中学有2200万学生,占全国中学生的一半,而教学水平落后于当前的要求,为了普及中等教育,强调每个农场和大的农庄应办中学。决议就扩建农村中学规定了具体的措施。

7月13日 勃列日涅夫出席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民国家,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国家走上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勃列日涅夫还说:“苏共国际政策的成绩是确实显著的。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方针的实现,对整个世界形势起着良好的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正在不断增长”。他认为“苏联和平纲领的实施,使人类逐步接近这样一个阶段,达到这个阶段将减少爆发新战争的危险,保障各国人民有可能真正和平发展”。

7月26日 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共和国党和经济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干部问题时说,苏共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干部。广泛分布的各种党校和供党的工作者进修的学习班,对党的干部有很大帮助,今后仍将对党的工作者进行这样的培训。党执行正确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各个岗位上的干部,是非常重要的。苏共力求做到,在任何地方对干部既要爱护、关心和尊重,又要严格要求。如果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不稳定,经常更换,那是非常不好的,应尽量不这样做。但是。如果让那些工作得不好、对自己的职责不能胜任的人过久的留在他们的岗位上,那就更糟。这种干部应该让位于更有水平、更有才干、更有干劲、业务和组织能力更强的人,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爱护优秀、勤恳、有用的干部。

7月28日——30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党中央第

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在格鲁吉亚“出现了在经济上有特权的分子和集团”,在他们手中聚敛了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的大量收入,已揭露了一伙伙有组织的犯罪分子、阴谋家和贪污分子、诈骗犯及其他危害社会的人。他说,格鲁吉亚人民拥护整顿共和国秩序的各种措施,广大人民要求进一步加强纪律和社会秩序。

8月15日 《真理报》发表社论,对一些地区和部门抵制成立联合公司提出批评。社论指责有“许多部门对建立联合公司采取了畏首畏尾的态度”,“未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轻工业部,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受到点名批评。社论认为,妨碍成立联合公司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如一些已经成立了的联合公司在专业化的借口下,又被肢解成许多小单位。

8月28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关于轻工业部工作》的决议。决议对轻工业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提出批评,如“产品不合规格”、“品种不符合市场要求”、“许多种产品没有销路”、“许多工厂中生产纪律和工艺纪律的水平仍然很低”等等。苏联轻工业部部长,化学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食品工业机器和日用器械制造部部长受到点名批评。

8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发表社论,指责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院士“已滑到同世界和平与安全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地步”。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等40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萨哈罗夫发表“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内外政策的言论”,“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蓄意指责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成了敌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肖洛霍夫等31各作家也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批判萨哈罗夫的反苏活动。

9月29日 《真理报》公布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吸收退休职工参加劳动及给他们以优惠待遇》的决议。决议具体规

定了退休职工参加劳动的补充优待办法。

10月29日 格鲁吉亚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党组织工作和加强党纪国法问题，一名中央委员和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因贪污巨额公款和出卖毕业文凭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

11月 苏共中央召集经济学家开会，讨论苏联经济学当前的迫切任务。会上强调必须进一步探讨用经济数学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模拟和预测的理论和方法论原理。

12月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提前偿还公债的决定。决定规定，1974年和1975年每年偿还10亿卢布。居民当中共持有258亿卢布公债。

12月6日——7日 为讨论军队贯彻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苏军召开全军干部部门工作人员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他说：在充分利用有丰富经验的军官、特别是卫国战争参加者这些宝贵财富的同时，必须大胆提拔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好的年轻军官担任高级职务。

12月10日——1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74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以及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4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中央全会经过对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表示“基本同意1974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1974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并将它们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全会认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4年计划对顺利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将为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潜力以及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创造条件。

全会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以及所有党组织,遵循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开展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完成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

12 月 10 日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表长篇讲话。关于苏联农业问题,他在讲话中说:“在指出农业发展中的成就的同时,警惕自己不要陷入自我安慰是重要的。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许多重大问题”。他强调当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其基础越来越牢固的时候,“农业生产集约化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解决这项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进一步集中,把农业转到现代工业基础上去,这里是具备巨大的潜力的”。

勃列日涅夫认为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巨大而又复杂的任务,要求“建设大型畜牧场和联合企业,建设许多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仓库和许多其他项目”,同时“生产各种农业技术设备、肥料、化学制品、饲料,进行土壤改良工作;加强农村建设和满足农村对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加强对农产品的保管、加工和运输系统。勃列日涅夫要求党、政和经济机关密切注意克服这些缺点,密切注意制定为了更加胜利地前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坚持不懈地为在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树立一种真正党的工作作风和党性的态度而斗争。

12 月 16 日 《真理报》就苏共十二月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发表社论《全党全民的事业》。社论表示完全拥护勃列日涅夫讲话中所阐明的原则和结论。社论指出:苏联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阶段,质量、提高效率和加速技术进步等成了第一位的问题,而解决新任务常常受到习惯势力和经济机构不灵活的阻碍。社论要求在经济领域中确定党的工作作风,不能以经济主义、技术至上等观点来对待经济领导工作,要同官僚主义作风、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不负责任和形式主义等表现作不调和的斗争。

12 月 27 日 《消息报》公布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

于在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进一步发展经济核算制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所有国营农场的农业部系统的其他国营企业在 1974——1975 年全部转为经济核算制”。

1974 年

1 月 28 日——2 月 3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古巴，同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苏古两党的立场和目标完全一致，反对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双方表示首要的任务是加强两党间的团结。苏联表示，今后准备对古巴建设新生活继续给予帮助和支持。

勃列日涅夫还出席了哈瓦那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言时表示，把全力支持古巴看作是神圣的义务，要帮助古巴巩固国防。

1 月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共中央委员费多谢耶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 2 期发表文章《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费多谢耶夫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它由两个时期构成。第一个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而到来，一直持续到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建设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已经确认：社会主义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之交达到了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而后，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等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具有了成熟的形式”。

费多谢耶夫认为“随着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第二个进期，即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从‘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时期。这次过渡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是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实现

的”。

费多谢耶夫认为苏联发达社会主义“有可能实现两大社会生产部类迅速而平衡的增长,保证生产与消费更加紧密的联系”。“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完善,为使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深刻的质变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3月1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纪念开垦荒地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当党正在解决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改善国民经济经营管理制度的时候,更加广泛地吸收劳动人民积极参加管理工作,更充分地运用劳动人民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党的二十四大明确制定了进一步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苏联过去和今后都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力求把群众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通过国家机构和广泛的群众性社会组织网使管理社会的形式愈益丰富。群众越是广泛深入地参加这一全体劳动者的事业,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就越巩固,苏联人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也就越顺利。

4月3日 《真理报》公布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地带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全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广泛实行土地改良、实现综合机械化和化学化、在生产中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保证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地带农业高速发展是全国的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要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地带各州的自治共和国的党、苏维埃、农业和水利机关应保证做到:更充分而合理地使用土地、物质技术和劳动资源,实行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把农业生产转到工业基础之上,建立集体农庄的联合组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大幅度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和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大力增加谷物生产。此外在发展土豆和蔬菜种植业、亚麻纤维生产、甜菜的生产、扩大豆类和牧草的播种面积、发展畜牧业和养禽业、土壤改良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决议强调在发展农业中应重视科学的作用。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建议苏联农业部、苏联土地改良和水利部、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组织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力量,集中研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地带育种和种子生产,土地改良,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样一些迫切的问题。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调整学术机构网及其专业设置,建立育种中心,为这个地带培育高产的谷类作物、牧草、亚麻、土豆和蔬菜的品种和杂交种,培育高产的牲畜和家禽良种。

4月16日 《真理报》为纪念康德诞辰250周年发展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康德“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始祖”。“康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行者,而不是它的反对者。把康德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这是阉割他的学说中的一切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文章认为,“只是由于在理论上和在世界观上掌握导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上的革命转折的那条漫长的历史道路,康德的伟大才显示出来”。

4月1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为争取欧洲安全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现阶段”。勃列日涅夫及其他与会国党政领导表示,各国领导人应以自己的努力推动缓和的进程和欧洲局势的正常化。

4月2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轻工业商品生产的计划和经济刺激的若干措施》的决定。决定说:商业系统积压了大量无销路的产品。原因之一是,在轻工业商品生产的计划和经济刺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上级机关按数量指标给该部门各企业

规定产品产量,不许可在这些指标的范围内,“在足够的程度上考虑商业订货和根据居民需求和市场行情来保证商品的生产”,“评价各工业企业的活动,没有对其产品在市民中需求给予应有的考虑”。因此。各企业主要关心的是保证生产出计划规定的产品的产量。决定指出:“为了提高苏联轻工业部系统各生产联合组织(企业)对满足居民商品需求的责任心和发挥它们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授权上述联合组织(企业)在商业机构的订货和商品供应合同的基础上……自己确定用于出售给居民的以实物表示的商品产量”。

4月2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共青团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共青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党的战斗后备军和可靠的助手。现在新入党的人中,2/3是共青团输送的,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中,3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1/5,在地方苏维埃中,青年的比例更高——几乎占1/3。青年人在工会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组织中积极工作。相信青年人,依靠青年人所固有的热情和为共和国利益而劳动的崇高理想,同时帮助他们正确地树立生活目标,用先辈的知识和经验武装他们,这些从来都是共产党人的传统。党今后仍将发扬这种传统,发挥青年的积极性,更广泛地吸收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社会事务的管理工作。

5月2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人民志愿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的决议。决议批评人民纠察队的水平与效率还是很不够的,在保证街道和其他社会场所的秩序方面,在反对流氓行为、反对酗酒、反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方面,在预防未成年违法乱纪方面,在对居民进行法制宣传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州、市和区党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边疆区、州、市和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消除领导

人民志愿纠察队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建议各级党委和苏联维埃机关在进一步改善人民纠察队活动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责成苏联内务部采取措施，加强内务机关同人民纠察队的联系，积极吸收纠察队员参加实行共同措施，维护社会秩序，反对违法行为；委托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采取措施，更好地向纠察队及其指挥部提供住房、电话和有关文件，必要时还要调拨出交通工具，供纠察队值班巡逻使用。

· 6月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对选民发表讲话。他说，“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两句简短的话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共产党活动的目标”。“它把提高苏联人的福利置于党的实际政策的中心”。“我们以亿万人的顽强而豪迈的劳动创造了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这里已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意味着，苏联人在举止、性格和世界观方面不受社会和民族差异影响的共同特征变得越来越显著”。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加强法制问题时说，最高苏维埃近几年来通过的劳动立法原则、教育法和保健法以及保护自然资源法，都继承着我们的原则性方针，即不断扩大和充实个人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大体上可以说，苏联的立法近几年来大大地更新了，变得更加稳定和民主了。所谓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指两个方面：第一、严格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允许（包括官员在内）发生任何横行霸道的现象；第二、全体公民要严格地遵守苏联的法律和社会规则。犯罪和各种反社会利益的行为是社会的祸害，因此，必须经常同他们进行斗争，坚决而果断地进行斗争。

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谈到了有关改进国家机关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等问题。

· 6月24日 《真理报》摘要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和萨拉托夫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在提高社会科学教

学的思想理论水平方面的工作》的决定。决定认为这两所学校在社会科学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为“对于决定整个教学过程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倾向性的讲课质量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苏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的讲述有时是很肤浅的,缺乏应有的论据和科学的总结;对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以及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不够尖锐有力和有说服力,没有经常考虑到现阶段意识形态的特点”。此外,这两所学校“理论问题的研究同现实生活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同培养用阶级观点来评价当前社会生活各种事件和现象一事的联系很差”。“在社会科学教学中,使青年养成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劳动教育和对同苏联生活方式相对立的一切持不能容忍的态度的问题,均得不到应有的反映”。“教研室没有就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及其教学方法问题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组织综合研究”。

为了改正上述的错误和缺点,苏共中央要求“要保证进一步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制度和使年轻的专家们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社会科学教员必须把理论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同当前党的政治活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坚决做到使高等学校的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愿意不断充实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实现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始终不渝的战士”。

6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第6期发表题为《世界形势与革命进程》的文章,宣传智利事件首次提供了革命和平发展的经验。文章说:智利事件首次提供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长期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有很大的价值。尽管阿连德总统在军事政变中殉职和智利革命失败,但不应抹

煞智利经验的“积极方面”。

7月2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全会上讲了话。全会审查了第九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8月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机关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干部及专家进修和深造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强调。应特别重视加强农业生产中主要环节的干部力量,要在最近期间做到,由技术熟练的农业专家以及对新事物敏感性强,既精通现代工艺、技术设备、生产组织,又善于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卓越组织者和教育者来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业队、分场和农场;为了有计划地培训农业企业领导人,应把他们集中在一些重点高等农业院校的专业系里学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管理生产的中层领导干部的培训与进修的全部组织工作应大大加强,并要高质量和加以改进,应在具备良好教学和生产条件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共和国的、跨州的和州的农业管理学校来培训作业队、分场、农场、车间以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跨单位企业和联合公司的其他生产分支部门的管理人员;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委和州委应对担负干部培训、进修和深造的各专业系、班、学校和进修班的工作加强监督,并不断给他们以帮助。在干部学习期间,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苏共中央认为,在农业发展的现阶段,在实行农业生产集约化、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实行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化这样一些任务提到首要地位的时候,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联合企业和联合公司领导干部和专家的职业和思想政治训练水平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因此,建议苏联农业部修改干部进修系统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使其内容更为广泛,包括共产主义建设和当前经济问题和党的农业政策问题,要使干部掌握领导群众的列宁主义艺术,掌握在科学技术革

命的条件下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有效方式和方法。

8月2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等专业学校的领导措施和关于提高具有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的教育质量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完成苏共二十四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任务还必须进一步改善对中等专业学校的领导，提高专业人员的教育质量，改进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有关措施。例如，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以及苏联其他各部和主管部门根据建设任务、科技进步的要求，保证进一步发展中等专业教育，特别注意提高专业人员的教育质量，改进教学工作，“把教学、教育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要配合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在1975—1977年内实现中等专业学校进一步专业化。

决议同意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建立隶属于该部的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其成员是：下设有中等专业学校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以及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共青团中央、各加盟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的领导干部；为了加强对具有中等专业教育水平的专家的教育质量监督，责成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对全苏各所中等专业学校实行国家检查；采取措施提高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对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和领导干部实行定期（至少每5年1次）考核，等等。

8月2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白俄罗斯党组织挑选和培养思想工作干部的工作》的决议。决议对白俄罗斯党组织提出批评，指责它们忽视思想工作，忽视思想工作干部的挑选。决议要求党组织对上述问题尽快改正，教育广大人民站在进攻性的立场上去同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应制定和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对意识形态工作干

部的选拔、配备和教育工作,消除这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必须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训练,教他们如何制定当前的和未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划。

《真理报》于9月3日和9月19日就这一决议两次发表社论,要求加强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监督,同时强调思想工作以及挑选思想工作干部的重要性,强调党组织主管思想工作的部门应充分发挥作用。

9月25日——30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卡达尔进行了会谈,联合公报说,这次访问对苏匈合作,对大力发展苏匈两党、两国政府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工作联系,是一种新的推动因素。公报还称,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缓和。双方主张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在近期内召开“欧安会”。

9月 理论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9期刊登署名文章《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问题》。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分如下三个时期:1.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首先意味着在社会中推广社会主义经营方式和在政治上受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的相应的社会制度,2.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任何国家都必须巩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提高生产力水平和解决确保普遍实现公有化的其他任务。3.发达的社会主义,它在继续使实际上的公有化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使其徒具形式的因素普遍消失,并要求在其最终阶段建立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作为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按最明显的特征被划为两个阶段:(1)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互相接近和它们受正在建立的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影响而相互结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加紧消除阶级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仍然存在。(2)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实际上已经普及,而社会已成为无阶级的社会(即社会各个成员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阶段,然而,还不意味着已彻底变为单一化的社会。

文章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的共产主义。然而。它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低级阶段现在也还远没有在所有兄弟国家具有成熟的形式，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最终的和完善的地步”。

10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庆祝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和党成立50周年集会，并发表讲话。关于比萨拉比亚的历史，他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对摩尔达维亚人民的遭遇来说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到1918年初，摩尔达维亚人民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下，已在比萨拉比亚全境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是，仇视这个年轻工农国家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通过罗马尼亚王国统治阶级之手，使普鲁特河同德涅斯特河之间这块地方脱离苏维埃祖国达22年之久。这一来，摩尔达维亚土地和摩尔达维亚人民被强迫分开了。对于比萨拉比亚人民来说，这是一段艰苦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认为，“1940年比萨拉比亚苏维埃政权的恢复和该地区同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新合并，在历史上是一次公正的行动”。

10月16日——18日 苏共代表出席在华沙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会晤公报说：与会者认为筹备和召开欧洲党代表会议是必要和适应的，希望代表会议能在1975年年中以前举行。决定今年12月至1975年1月将再次举行筹备会议。

10月18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科学干部和科学教育干部评定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科学干部和科学教育干部的评定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和漏洞，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太多、太分散，以致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不能对其活动给予积极有效的影响，不能顾及科学发展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新的远景方向”。为改变上述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规定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各主要科学部门的著名科学家和专家组成，人数不超过

200人。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应定期更换,并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决议规定,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领导科学干部和科学教育干部的评定工作,对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实行监督。决议委托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团,协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在两个月内拟定出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条例并报送苏共中央审批,同时还应提出关于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学位和学衔授予办法的建议,并报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11月25日——2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同蒙古党政领导人泽登巴尔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公报称:要采取实际步骤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两党将继续反对反共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同任何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出席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群众集会,并在发表讲话时说,1966年“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可靠地“保卫着社会主义蒙古边界不受侵犯”。他表示准备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和合作,同时认为绝对不能接受要求苏联边防军撤出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他说:“对我们不存在任何‘争议地区’”。

11月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概论》(第三版)出版。该书强调当前国际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不应把革命斗争的主要敌人与共运的主要危险混同起来。该书认为,战略领导的艺术在于,把革命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主要方向,在决定性时刻对主要敌人进行决定性打击。在30年代,共运和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据此,共产党人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国际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不应把革命斗争中的主要敌人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本身的主要危险混同起来。“尽管同机

会主义斗争十分重要,但不能引开对革命主要阶级敌人的注意力”。

12月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5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就这些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表示基本赞同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苏联国家预算草案。

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各部和主管机关、一切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应遵循苏共中央决议和勃列日涅夫关于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的讲话,制订和实现完成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和整个第九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具体措施。各企业、组织、建设单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集中力量全力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迅速地使新生产设备投产,更好地使用现有生产设备,挖掘一切潜力以便在降低物质耗费和劳动耗费的同时增加产量和改进产品质量。

由于杰米契夫调任其他工作,全会解除了他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12月19日——21日 波诺马廖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筹备会议,讨论“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问题。有28个党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公报称,会议就建立欧洲党会议编辑委员会达成协议。与会者主张尽快召开最高一级的欧洲安全会议最后阶段会议。

12月24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苏联公民证制度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实行公民证制度的目的在于帮助苏联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履行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义务,保证进行居民流动登记,为进一步加强法制和法律秩序服务。该决议规定,1976——1981年给年满16岁以上的全国公民颁

发新公民证。

12月 苏共莫斯科市委、苏联哲学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当代思想斗争》学术会议。市委书记雅戈德金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这是具有自己发展的辩证法,自己的矛盾和新旧冲突的急剧变动和多方面的过程。这些矛盾不具有对抗性。它们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总过程中,在各种利益原则上一致的基础上,作为完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动力而发挥作用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建立新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摆脱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我国的全体公民、各个阶级、各社会集团和大小民族在社会政治上的真正平等;社会乐观主义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气氛;与人为善的气氛;集体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个人主义。

1975 年

1 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诺马廖夫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文章说,帝国主义首领考虑到火箭—核战争的后果,没有下决心象 30 年代那样露骨地把赌注押在新的世界性军事冲突上,但帝国主义未放弃战争计划,由此产生了军备竞赛和其他在物质上准备战争的措施。

2 月 2 日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哲学博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家罗森塔尔逝世。罗森塔尔从 1946 年起,一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他的代表作有《辩证逻辑原理》(1960)、《马克思的辩证法》(1967)、《列宁与辩证法》(1963)、《今天的列宁辩证法》(1970)。

2 月 9 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关于苏联人民取得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30 周年》的决议。决议号召:用保持高度警惕和对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常备不懈的精神来教育全体苏联人,首先是教育青年”。决议要求文化部、国家电影委员会、陆海军总政治部、各创作协会摄制故事片、纪录片和描写武装力量的大型彩色影片,举办全苏艺术节、卫国战争时期歌曲会演、全苏美术展览等活动庆祝。

3 月 4 日——5 日 苏共中央书记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和蒙古 9 党的中央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交流党的活动经验,讨论意识形态合作的方针。会议还注意到必须研究波及资本主义世界

一切领域的深刻危机的原因、性质和结果。会议还特别讨论了关于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 30 周年庆祝活动的问题。

3 月 16 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3 月 18 日,勃列日涅夫同参加大会的东欧国家党的领导人胡萨克、盖莱克、日夫科夫、卡达尔、昂纳克会晤。

3 月 19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致词。基里连科说:苏联十分理解你们摸索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方式,探索建立能够一道共同努力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各种力量的联盟的最好途径。他还认为,意大利在这方面正在做“创造性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和理论。”

3 月 《共产党人》第 5 期发表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于今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副院长会议上的发言摘要,题目是《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文章指出:“苏联社会科学家的主要努力集中于综合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我们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起联结二者作用的某种中间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已经达到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特点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面发挥,科学技术革命成就与新的社会关系彻底结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断发展,这些规律的作用范围和实施条件不断扩大,利用规律的社会效率大大提高。这就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着物质和精神的有利的先决条件”。

同月,《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第 3 期报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农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网和改进这些学校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农业发展现阶段,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在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土壤改良和为其他的企业和组织培养熟练工人方面的

作用正在增长。这些学校每年为农村培养 50 多万名各种专业的熟练工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采取重大措施进一步改进和扩大农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熟练工人的工作。1976 年——1980 年,将修建 250 所农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综合校舍并交付使用;扩大现有职业技术学校并把它们改建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其办法是修建能容纳 32.95 万名学生的教学楼和能容纳 12.71 万名学生的实验和实习楼,修建 505 座带有食堂的社会生活服务楼,修建能容纳 33.28 万人的学生宿舍和总面积为 88.2 万平方米的技术教学人员宿舍。

决议还提出,在 1976——1980 年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输送 4.12 万名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担任教师和生产教学技师,并在考虑到国内自然经济区的情况下,固定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一些系科,专门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干部。

4 月 10 日——11 日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学术会议,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新现象”。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创新,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表现得特别显著,它体现着历史上形成的个性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表现于艺术思维的性质本身,表现于我们当代艺术的史诗倾向。这种艺术就其激情、理想、个性的概念而言是英雄主义的,就其艺术思维的本质而言是史诗性的。

会议还提出,要“坚决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毛派的创作上的思想艺术原则作斗争”。

4 月 16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决定了召开苏共第二十五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问题。

全会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

在讨论中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有: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利

亚什科、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里什克亚维丘斯、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阿希莫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列宁格勒市奥尔忠尼启泽波罗的海造船厂船舶装配工作队队长斯米尔诺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

苏共中央全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定于 1976 年 2 月 24 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根据谢列平请求，全会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4 月 16 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决议》。决议就国际形势的和缓说：“我们党和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民主、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进行的斗争促进了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正在遭到失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是与侵略和强制的政策相对立的，它是使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的重要动力，促使资产阶级国家中正视现实的人士参加缓和的工作。在最近期间顺利结束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对于使和缓不可逆转将具有特殊意义”。

决议强调，“政治和缓应该补充以军事方面的和缓，应该利用政治和缓来缩减军备和为裁军而斗争，并且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在没有任何歧视和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发展一切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联系”。

决议认为，“苏联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是忠实地为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为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服务的。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崇高的目的，有助于在最广大群众的思想中广泛了解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和其他动荡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4 月 22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纪念列宁诞辰 105 周年大会作题为《遵循伟大列宁的遗训》的报告，报告说，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提上日程了。党正在既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来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而且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而是从这一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和关系上统一地全盘解决。

5月1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战胜法西斯30周年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说：“由于我们党一贯坚持爱好和平的政策，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实力和影响的增强，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被推迟了。”他还说，印度支那战争策源地的消除，为国际气氛的进一步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国际缓和事业，包括我们同美国关系的缓和事业，将因此而得到好处。

5月2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肖洛霍夫70岁祝寿大会。会议认为，“肖洛霍夫70寿辰超出了一般文学纪念日的范围，它已成为全民的节日”。5月22日，苏共中央致电祝贺肖洛霍夫寿辰，授予他列宁勋章。贺电称他的作品“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含义和历史意义”，受到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喜爱。

为庆祝肖洛霍夫70寿辰，苏联政府在1974年7月成立了以吉洪诺夫为主席的庆祝委员会，准备召开学术会议，举办戏剧艺术节，放映根据肖洛霍夫作品拍摄的影片，大量出版他的作品，发行录制他的作品的唱片，举办书展等隆重庆祝。

5月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约夫楚克在《哲学问题》第5期发表文章《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发展的辩证法》。文章认为，社会意识发展的规律首先指的是：“物质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及其‘第一性’，第一性本身包括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变革的实践活动；包括社会意识在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提高；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和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整个精神文化史中发展的继承性，等等”。

文章强调,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共同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全部生活活动的智力化。

文章还论述了苏联新出现的“工人—知识分子”这个“边缘”阶层。约夫楚克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文化活动方面的生活方式,就其实质来说,实际上同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已没有区别。

6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选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新莫斯科斯克选区会见选民时,发表题为《党和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这是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况且是在象我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进行建设”。“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一下子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缺点和困难。但是,它立即把主要的东西给了劳动人民。它使最广泛的群众能够积极和直接参加所有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管理。劳动人民、苏联全体统一的多民族人民恰恰是通过自己的组织,首先是通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来管理国家的”。

安德罗波夫指出:“社会主义的敌人懂得,现在要使苏联人接受恢复资本主义的主张,那是枉费心机。因此,他们力图披上关心社会主义‘民主化’及其‘改良’的外衣。然而,不难看出这种‘关心’的真正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颠覆苏维埃政权,消灭社会主义的成果”。

安德罗波夫最后强调:“由于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所有这些年来,它一直领导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本身在本世纪的政治历史上就有卓越的意义”。“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苏共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的作用日益增长。我们建设工作的规模更加广泛,社会进程的速度正在加快”。

8月26日 《党的生活》杂志第17期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拉脱维亚人民监督机关领导问题》的决议。决议批评拉脱维亚党组织没有充分利用人民监督机关来加强对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环节的检查

工作,容忍官僚主义。监督机关对于某些部门没有完成任务、生产严重落后、浪费、盗窃等问题,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决议要求拉脱维亚党组织改正上述错误,切实“反对一切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反对形形色色不按法律办事的现象”,要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在同经营不善和浪费现象以及同各种破坏活动做斗争中,“要更充分地利用苏联人民监督机关条例给予委员会和小组的权力”。

8月 契尔年科在《苏共历史问题》第8期发表文章《关于完善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问题》。文章认为,苏共中央十二月(1973年)全会是苏共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对进一步发展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领导原则的重大贡献。全会提出了党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在管理体系中的工作的迫切问题,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进一步确立和发扬党的真正的列宁作风的迫切问题。就此批评了一些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工作作风,强调指出了同导致官僚主义和拖延推脱的现象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文章认为,“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不断提高,使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大大地扩大了国家管理机关在物质生产、文化教育工作、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方面,在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等方面的职能”。

文章还强调:在国家管理机关的工作中进一步发扬民主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就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考虑到舆论,认真地、经常不断地研究地方苏维埃机构的决议,以及中央管理机构收到的劳动人民的信件、建议和反应。一个倾听群众呼声,支持群众积极性、独创性和创造主动性的管理机关的极其重要的品质就鲜明地表现于此。

文章指出:“目前,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党的二十四大关于1971至1975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九个五年计划指示。在千方百计地动员劳动人民努力去顺利地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情况下,尤

其必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协调管理和经济机关。党中央要求所有的组织,所有的部和主管部门,所有的领导人员要认真地按照党性来处理事务,要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高全体干部,党和苏维埃机关、管理体系各个环节的每个工作人员对有效地、积极地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责任感”。

10月6日——13日 勃列日涅夫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德签订苏德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有效期25年。条约规定:欧洲国界不可侵犯性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首要前提,双方决心同其他华沙条约国一起联合保障华沙条约国的国界,其中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界的不可侵犯性。西柏林不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并在今后也将不由它来管辖。苏联同民主德国还宣布:“缔约之一方,一旦遭到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武装进犯,缔约之另一方将认为这也是对本国的进犯,并立即向它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并以本国拥有的一切手段提供支援。”

10月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5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经济和国际实力的增强,使苏联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动积极的攻势,以加强普遍的和平”。

10月10日 《真理报》于9月19日发表编辑部文章《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对苏联哲学界的现状提出批评,同时点名批评了《哲学问题》杂志。10月10日付印的《哲学问题》杂志第10期全文转载了《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并加了按语。按语说:“编辑部在本期转载《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是想要强调提出这篇含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指示的文章对改进我国整个哲学战线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哲学问题》杂志的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编辑部为迎接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打算刊登一批文章,其中将本着苏共中央的指示剖析苏联哲学工作者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后的工作结果和他们现在面临的任

务。编辑部号召作者和读者们积极参加对我们这门科学的迫切问题的讨论”。

12月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听取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关于1976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加尔布佐夫《关于1976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基本赞同1976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草案和1976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并将它们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

关于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 确定苏共第二十五次例行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

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党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报告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2. 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

3. 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4. 选举党的中央机关。

二. 规定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每3000名党员选出代表1人。

三. 根据党章,出席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共产党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州的党代表会议上选举。

苏联陆海军、公安和边防部队党组织的党员,同有关地区党组织

一起,在州、边疆区的党代表会议或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选举出席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苏联驻在国外的陆海军部队党组织的党员,在该部队的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席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9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关于欧安会问题,他说:“许多西方国家不重视欧洲安全会议最后文件,在西方国家,这个文件最多只印几千份,知道的人很少。赫尔辛基会晤刚一结束,西方国家某些有影响的人士就反其道而行之,对社会主义国家大肆造谣污蔑,搞种种旨在挑动对方作出反应和毒化气氛的小动作。他强调“对国际合作的反对者及其直接和间接的帮凶要给以坚决的回击”。

同日,勃列日涅夫还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党的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会晤。会晤时,苏共和各国党的领导,就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并就履行赫尔辛基全欧安全会议最后文件的原则和条款的途径进行了研究。

12月1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诺马廖夫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和平共处乃是国际舞台上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在继续,在当今世界上,缓和没有消除而且也不可能消除阶级矛盾。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正在各个领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而且围绕着缓和本身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在加强”。

1976 年

2月2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审查了苏工会中央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全会一致批准苏共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全会还审查了向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作的《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报告草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全会一致批准《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报告。

2月24日——3月5日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当选出席苏共二十五大的有4998名代表，有15人缺席。大会代表一致选举了代表大会的主席团、秘书处、编纂委员会和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 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报告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3. 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4. 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苏斯洛夫说：“来自96个国家的103个共产党、工人党、民族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代表团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来参加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我党举行的历

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友好代表团出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的决议》、《苏共中央〈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草案的决议》，还通过了《给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囚禁者以自由》的声明。

勃列日涅夫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代表大会讨论了过去5年的总结，认真而客观地分析了积累的经验，审议了我们未来的计划。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今后年代里的基本政治方针。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是不轻松的、紧张的计划。它提出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任务。

2月2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世界局势和苏共的国际活动，其中包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性成就，它的威力和影响的增长。2. 五年计划的结果和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其中包括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党的经济战略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特点；现阶段发展经济的关键问题。3. 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党，其中包括党的进一步发展，干部政策问题；党的思想工作等。

勃列日涅夫说，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成就；发展农业，实行农业技术改装以及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问题，也进一步得到解决。进一步发展农业仍是全民的任务。“第一，争取可靠地向国家供应粮食和农业原料，为此，要经常备有足够的储备。第二，使城乡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条件进一步接近，这是我们的纲领性要求”。

关于党的发展和提高党组织的质量方面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

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深为满意的是,如今,在新加入党的人中,工人占了58%。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

关于干部问题,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的干部政策是党用来影响社会发展过程的强有力杠杆。过去几年,许多年轻有为的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自己是优秀的有能力的组织者,他们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一个现代领导者应当把党性同熟悉本行工作,把纪律性同主动性以及对事情的创造性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99.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70%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和农业教育。勃列日涅夫强调,不能以干部要稳定为借口,把不称职的、所谓不拉车的人留在领导岗位上。当然,更不能把不负责任的、吃老本的、认为职务本身就能保证他们享有威望和受人尊敬的人留在领导岗位上。

2月25日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代表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报告说:“中央检查委员会在其全部工作中始终遵循着苏共二十四大和历次中央全会的各项决议,把它们注意力集中于监督党的预算的执行情况,监督党的经费开支和物资消费是否节约、适当,以及帮助地方党组织的检查委员会进行实际工作。我们这个拥有上千万党员的党的财物管理工作是繁重的,它要求我们给予经常的注意和正确的管理”。西佐夫谈到交纳党费问题时说,“我们还有些基层党组织,其中一些党员不按时交纳党费,但是党的支委会或者党的会议,很少根据党章的要求对这些破坏党的纪律的事实进行讨论。还有这样的事实:个别党员不是根据全部工资、各种奖金和报酬来交纳党费”。

2月27日 苏共二十五大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伊·瓦·卡皮托诺夫在报告中谈出席会议的代表情况时说,代表中有1703人是社

会主义工业各部门的工作者,877人是农业工作者,103人是苏联科学院、专业科学院和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442人是博士和副博士。妇女代表有1255人,苏联陆海军、边防部队和内务部队的军人代表有314人。苏联50个民族都有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

从年龄上看,35岁以下的代表占12.5%,35岁至50岁的占58%,51岁至60岁的占19.7%,60岁以上的占9.8%。

从党龄上看,革命前入党的有7人,1917年11月至1941年入党的有381人,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入党的有713人,战后入党的有3897人,其中最近10年入党的有1132名代表。

2月28日 苏联武装力量代表团打着军旗进入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会场,受到与会代表和来宾的热烈欢迎。战略火箭部队师长斯·格·科切马索夫少将发言。科切马索夫少将代表苏联武装力量全体军人向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来宾致敬,并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保证:忠于列宁遗训,在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下的苏联武装力量今后仍将无限忠诚地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可靠地保卫可爱祖国的神圣边疆。苏联武装力量同华沙条约国家的兄弟军队一起随时准备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成果,并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反击。

3月1日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囚禁者以自由》的声明。声明说:“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表达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庄严宣告它兄弟般地、坚决地声援一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的共产党人和所有战士,首先是法西斯镇压的受害者,那些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中的人和受到残酷折磨的人。他们受到的非人的拷打是对他们英勇参加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和平与民主、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而进行的崇高斗争的阶级报复”。

声明要求释放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释放智利

共产党领导成员何·卡德马托里和豪·蒙特斯,社会党领导人爱·庞塞和洛尔卡;释放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海·佩雷斯、何·路·马塞拉、乌拉圭广泛阵线执委会主席塞雷尼和其他民主人士及所有乌拉圭共产党人;释放巴拉圭共产党主席安东尼奥·迈大纳和中央书记索莱尔;释放危地马拉劳动党总书记贝·阿尔瓦拉多·蒙松和阿尔瓦拉多·阿雷利亚诺。

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所有对共产党及进步组织的镇压活动,并要求立即停止这样的活动。

代表大会表示支持和拥护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在莫斯科建筑一座纪念惨遭阶级敌人杀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以及为人民幸福而忘我奋斗的战士的纪念碑,作为苏联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事业的象征。

同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五大作报告《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2. 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社会任务和经济任务。3. 在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基础上发展物质生产。他在报告中阐述了苏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草案中所规定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迅速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改进国民经济一切环节的工作质量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实现苏联共产党关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针”。

柯西金强调:“按照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我们的计划、党和人民的努力,将用于保证经济的全面进步及其综合和谐的发展,提高苏联人的福利。国民经济计划的重点将是,在科学进步和厉行节约的基础上加深生产的集约化。在过去的几年里,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

非常关心加强经济发展的集约化因素的作用；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这种作用的加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报告强调苏共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国民经济沿着集约化道路发展，必须作到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对这一任务的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计划的各章节和物质生产各部门同先进科学的有机联系应当象条红线一样贯串整个计划”。

3月5日 新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安·安·格列奇科、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尼·柯西金、弗·达·库拉科夫、丁·阿·库纳耶夫、基·特·马祖罗夫、阿·雅·佩尔谢、尼·维·波德戈尔内、格·瓦·罗曼诺夫、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和弗·瓦·谢尔比茨基。

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盖·阿·阿利耶夫、彼·尼·杰米契夫、彼·米·马谢罗夫、鲍·尼·波诺马廖夫、夏·拉·拉希多夫和米·谢·索洛缅采夫。

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是：列·伊·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安·帕·基里连科、费·达·库拉科夫、德·费·乌斯季诺夫、鲍·尼·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基赫、康·费·卡图谢夫、米·瓦·齐米亚宁和康·乌·契尔年科。

阿·雅·佩尔谢被批准为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选举根·费·西佐夫为主席。

3月10日 《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热诚战士》，纪念斯大林时期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联共(布)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诞生 80 周年。

文章一改赫鲁晓夫时期对日丹诺夫的批判和谴责,认为他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热诚宣传者,党的著名理论家,强调他关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讲话,从思想上教育苏联人民,在发展精神文化事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文章还称赞他“反对中立地,客观主义地对待敌对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作出了战斗的、党性的榜样”。

3月17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出席苏联科学院年会,并作报告《我们的时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时代》。报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越来越经常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个别结论,加以歪曲,从而诋毁现实社会主义,竭力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革命实质,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谨慎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各项原则的态度,同以创造性的革新态度认识新现象和新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苏斯洛夫强调,苏共二十五大是“勇于创造性地解决当前社会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各项根本问题的典范”。

苏联科学院“为了表彰苏斯洛夫对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作出的杰出贡献”,决定授予他卡尔·马克思奖章。这是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最高奖赏。

3月24日 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用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检验行动和计划》。

报告中说:“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一次会议,它反映了辉煌的成就,批准的发达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的计划,而发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高度成熟的社会,新制度的所有优越性都已变得特别显而易见。我们引为自豪的是,在上一个五年计划里实现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广泛的社会纲领。在即将到来的五年里,党在社

会领域里提出了更加宏大和有分量的任务”。

关于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报告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和单独的问题。中国现今领导人的政策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极端反动派的立场直接呼应”。“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党坚决遵循早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的方针。它今后仍将同毛主义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苏联愿意在和平共处原则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安德罗波夫强调：“遵照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应当警惕地注视着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及时揭露和制止颠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的作法，积极帮助党和苏维埃国家奉行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实施进一步争取和平与国际合作、争取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斗争纲领”。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大国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很严重，如“间谍机关资助各个反苏电台和各种流亡中心的活动，策划向苏联发送反苏书籍。它们竭力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政治团结和思想团结，妄图在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煽起民族不和，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武器，拿宗教自由原则进行投机，吹捧各种背叛者”。

3月26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强调贯彻苏共二十五大完善法制和巩固法律程序等问题，要求教育公民坚决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法院机关要更有效地反对欺骗国家、盗窃社会财产的企图和地方主义地表现。更积极地促进人民形成高度的责任感和诚实地对待公民职责。

据社论透露，全苏将于4月11日选举“人民法官”。

4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纪念列宁诞辰106周年大会并作题为《列宁主义是革命创造活动的科学和艺术》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二十五大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历史里程碑；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共处与思想斗争。

报告说：“我们的国家是全民国家，它之所以是这样的国家，不仅由于它履行着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且由于为劳动人民群众谋利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全部活动是在他们的日常支持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党指引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加强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探讨、提出和不懈地解决发扬我国民主问题的正是共产党，这个事实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这不仅是因为党在各项政治决议中集中并体现了所有阶级和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苏联社会各代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本身就是由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 1500 多万先进分子组成的一个极其民主的机体”。

报告认为，“从‘冷战’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大转变是最近这些年的标志”。但是，“我们的政策，无论就其原则还是就其目标来说，都是阶级的政策”。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样，“谁也不能‘取消’它”。因为“各个阶级的利益、关于各个阶级的目的和理想以及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观念都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既然这些利益和观念是互相冲突的，那么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4月28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根据苏共二十五大决议做好劳动群众来信的处理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加强的情况下，搞好信访工作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苏共二十五大决议的精神，应进一步完善这一工作。

改进和完善信访工作，主要是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以有效的方式向居民介绍党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阐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宣传苏联法律，改进对各族人民的法制教育工作。

决议强调，苏共中央各部、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应当根据规定的要求在 1976 年 7 月 1 日之前完成劳动群众给苏共二十五大的来信的处理工作，保证认真地、全面地研究处理来信提出的问题，更积极地采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工程师和技术员、科学

和文化工作者提出的旨在改进工作和克服现有缺点的建议和要求。

4月 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在《国际生活》第4期发表文章《列宁主义的和平战略在执行中》。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下，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气候大有好转，出现了从‘冷战’和紧张局势向缓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转折。始终不渝地实施和平纲领，促进了极其重要的世界性问题的解决以及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基础的巩固，使缓和紧张局势的趋势成为整个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并排除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

“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助于加强它们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的实施，将这种合作提到新的、更高水平，有助于加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协作，使它们的经济能进一步得到互相补充，以利于每一个国家。苏联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在迅速发展。五年内贸易额增长了一倍多。制订并实施长期专项纲要将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如保障对动力、燃料、各种主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提高机器制造业的水平，更充分地满足对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需求等等”。

“在争取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中，苏联非常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重视加强和扩大同它们的全面联系。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体现了我们党的原则性方针，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支持捍卫自由的各国人民，加强同发展中国家进步、民主和民族独立力量的团结”。

5月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元帅军衔。同时在其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为其树立了半身铜像。

5月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在《哲学问题》第5期发表文章《苏共二十五大和社会科学的任务》。文章说，苏共二十五大对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要求，就是加强它同生活、实践的联系，克服繁琐的推理。只有联系实际，使研究工作取

得实际效果,得出具体建议,才有可能提高科学的效率。苏联社会科学当前研究的任务是:科学地总结苏共以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继续研究发达社会主义及其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规律性问题,解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任务,实现社会主义一体化的问题,解决世界革命进程问题。

文章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解决以下3个问题:1.人口学和劳动资源问题;2.保护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3.农业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这些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综合性的,要求社会科学各个部门的代表们一致努力,尤其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密切配合。

7月12日——13日 苏共中央召开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党委党务工作部部长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组织党务工作部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党的发展与巩固问题,遵循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问题,实施干部政策,改进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以及进一步活跃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问题。

8月17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培训系统》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共二十三大以来,已有43万名干部接受了培训。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苏共中央决定将苏共中央高级党校中的常设进修班改为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进修学院。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及其他地区党校的常设进修班也将进行调整。

决议规定了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迫切问题,在发展苏联经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中以及在苏共外交活动、当前世界发展和革命进程中的主要问题,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的领导原则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活动

等问题。鉴于党和苏维埃各类干部所需专业知识不同,对他们采取分类教学,同一类学员组成学习班,学习时间1个月到1个半月。

9月2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筹备出版苏联法规汇编》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执行苏共二十五大关于出版苏维埃国家法规汇编的决议,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必须进行筹备正式出版苏联法规汇编工作。该法规汇编,将汇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法令以及最重要的联合决议;为了对苏联法规汇编的筹备出版工作实行总的领导,成立以苏联司法部长为首的,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苏联总检察长、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苏联财政部长等人参加的苏联法规汇编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77年7月1日之前将筹备出版苏联法规汇编计划及有关财务问题的建议呈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此外,决议提出,每个加盟共和国也要筹备出版本共和国法规汇编。

9月21日 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出席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并作报告《苏共二十五大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作《从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看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任务》的报告。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作《苏共二十五大和提高培养具有高等水平专家的质量的任务》的报告。

10月4日——6日 苏共中央马列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在莫斯科举行《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全苏科学理论会议。社会科学家、党务工作者和高校文科教师、宣传工作者出席了会议。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要讨论苏共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的主要方面的内容。他要求苏联学者帮助党在国内外深入阐明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宣传苏共的历史和经验,深

入研究发达的社会主义,争取把社会科学的成果尽快地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组织综合性的研究。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他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今天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紧迫要求所决定的,也是因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也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情况所决定的”。

费多谢耶夫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力达到跟前一个时期根本不同的更高的水平,生产关系达到更加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里,经济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展,因此也就为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确立创造着极其重要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他强调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要防止两个极端。其一,不可跳越必要的阶段向前跑,其二,使发达社会主义完善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正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创造着主要的主客观前提以保证新的社会结构从第一阶段直接转入第二阶段,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要犯同样大的错误。

10月21日《真理报》公布苏共中央《关于培养青年创作者的工作》的决议。这是苏共中央第一次就培养青年作者问题作出的决议。决议对文化艺术领域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提出批评,认为许多艺术院校没有积极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工作,而各文化机构和创作协会对毕业生的就业与专业水平的提高也缺乏必要关心,决议要求党、团、作协组织根据苏共二十五大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的任务及原则,改进对青年创造者的培养工作,及时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入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真理报》于10月22日发表社论《关心青年创造者》。社论要求广泛吸收青年创造者参加各种期刊的编辑工作,有关出版社要及时出版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

10月25日——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76年至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国家五年计划和1977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5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决议。2.选举雅·彼·里亚鲍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10月 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在《党的生活》杂志第19期发表文章《监督和检查执行情况是贯彻党的决议的极其重要的条件》。文章指出:在以贯彻执行苏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决议为标志的历史时期,我党在确立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方面,以及在各级党组织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广泛采用创造性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党的文件,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党、关于党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长的学说,揭示了改进党组织的工作的具体途径,并对党内和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新过程和新现象作了重要的理论总结。

党十分重视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在这方面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状况,而是因为正确地组织这项工作,今天已成为一切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顺利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不断扩大党、国家和社会监督的作用范围,就能为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进一步吸引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与国家事业管理创造前提。

最近几年,在解决生活所提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方面,

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我党在二十三大、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以后的活动表明,党中央机关工作的特点是科学性和务实性,现实性和远见性,集体制定决议并贯彻到底,对干部既高度信任又严格要求,同地方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地予以帮助。最近几年的特点是,党不仅在决议通过后立即组织贯彻决议的工作,而且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考虑到贯彻文件的可能性,并确定贯彻文件的条件、时间和组织措施。

11月2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罗斯托夫州委中层干部、机务人员和其他一般业务干部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罗斯托夫州党组织为改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部门领导人和专家人员的素质,为培训机务人员和其他一般业务人员,并使他们在农村稳定下来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该州的每个区里,各农业单位都制订了选拔、配备中层干部和提高他们业务水平的长远计划,现有的高等和中等农业学校、科研机构、州和区的农业管理的先进经验推广学校、科技进步之家,以及在跨单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学校和训练班都被有效地用来为这些干部组织培训和进修。但是。罗斯托夫州党委的上述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某些区里,农业单位的分场、作业队、农场的领导人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具有必备的水平,为畜牧业、跨单位企业、农工联合企业和联合公司培养中层干部和一般业务干部的工作进度缓慢。有些区委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党组织没有进一步做好机务人员的工作,特别是没有做好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工作以及把他们稳定在农村的工作。

鉴于上述情况,苏共中央决定在罗斯托夫市召开全苏讨论会,专门研究党组织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干部工作的问题,应当把这一工作看作是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苏共中央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根据苏共二十五大的指示改进选拔、配备和教育农业生产部门干部的工作,使

有经验的、政治上成熟的专家,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领导生产的、有才干的劳动集体的组织者和教育者去领导所有农业单位、作业队和农场。

11月 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主人公的大型传记纪录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公映。影片从勃列日涅夫战前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活动时期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报告。除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外,还包括有他的日常生活,如打猎、看体育比赛、与孙子散步等。

12月 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在《苏共历史问题》第12期发表文章《苏共二十五大论进一步发扬列宁式的党的工作作风》。文章指出,众所周知,过去提出过不少关于发展农业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实际上远非一贯都付诸实施。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疏漏造成的。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现象开始阻碍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奉行有理论根据的并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农业政策,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减少农业对变幻无常的大自然的依赖性,为在工业基础上改变农业劳动性质本身创造条件,改善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生活条件。在制定这种政策方面,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是苏共中央三月(1965年)全会的决议。这一政策在以后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苏共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大的文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党执行下述方针:提高经济杠杆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科研机关、科学家和专家在尽快把科学技术成就运用于农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我们党对已取得的成就作出应有的评价,同时也看到,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速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指标还不能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苏共中央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通过了一系列极

其重要的文件：《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农业的措施》、《在跨单位协作和农工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进一步提高农业科学的效率和巩固它同生产联系的措施》、《进一步改进谷类作物、油料作物和牧草选种和育种的措施》等等。这些文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所拟定的措施为加速增加产品产量，提高农庄农场效率，提高集体农庄生产社会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使两种所有制形式相接近，逐步消灭城乡重大差别开辟了新途径。

1977 年

1 月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第 1 期发表意共中央委员鲁比的文章《新国际主义》。该刊在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说明“刊登此文供讨论用”。苏共对意共提出的“新国际主义”提出批评。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扎格拉金等撰文说,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家们一口咬定,国际主义似乎就是掩饰一些党屈服于另一些党,掩饰一些大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统治,首先是苏共的统治。有人臆造苏共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企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建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目的是当这个中心的头。文章认为,“苏共的全部实践说明,对其他革命力量和政治进行统治,指挥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们的任何趋向,都是与苏共格格不入的”。

3 月 10 日——11 日 苏共中央召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的行政机关部部长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以及改进群众护卫工作的问题。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尼·伊·萨文金作了报告,与会者就上述问题交流了经验并制定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3 月 21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当谈到吸收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他说:苏联工会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千百万人从中学习管理生产、国家和社会这门科学的学校。工会日益广泛地吸收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表现。工会作为一支权威性的社会力量,在苏联整个政治制度中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起着巨

大作用。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人民政权,即群众参加决定国家社会事务,也就是列宁曾经说过的真正的人民自治。

4月4日——8日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访问非洲后,到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同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举行多次会谈。双方表示,对所讨论的问题观点完全一致,苏古将致力于促进国际局势健康化,支持亚非拉反帝斗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配合。双方还确定了进一步合作的某些重要步骤。

5月12日 苏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关于法律教育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州党委书记、中央意识形态机关、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创作协会机关的领导人,司法部、内务部、文化部、工会和共青团的有关人员,莫斯科市一些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及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苏联司法部副部长苏哈列夫作《关于改善居民法律教育措施》的报告,与会者就加强法律和法制、教育苏联公民树立高度法制观念和公民责任感方面的组织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和预防工作广泛地交流了经验。

5月2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联合成为一体,逐步消灭了差别,渐渐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各阶层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向工人阶级方面转变,已发展成为“全民国家”。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已不复存在。苏联宪法是一部发达社会主义的宪法,是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宪法。

关于1977年新宪法,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是全民国家,新宪法的新内容主要是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要加强苏维埃在解决社会生活重大问题上的作用。新宪法还强调对执行机关和管理

机构,对各单位和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法制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过去出现过一段阴暗时期,实行非法迫害,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践踏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坚决谴责了这种做法,永远不能让它重演。今后“要建立各种可靠的保障以防止任何侵犯公民权利、滥用权力和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我们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全会解除了波德戈尔内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还解除了卡图谢夫中央书记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助理鲁萨科夫接替他的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除波德戈尔内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宣布他将退休,并选举勃列日涅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6月17日,勃列日涅夫就此事发表讲话说,党中央五月全会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决议,绝不是一项徒具形式的决定。全会的决议是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的。他强调,各级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组成统一的国家权力机构系统,这就是全民国家的政治基础。

6月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答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提问时,就缔结苏日和约问题说,如果日方不提出明知不能接受的条件,那么苏联准备把这件对我们两国来说都很重要的事情进行到底。勃列日涅夫强调,那种认为苏日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所谓“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建议在争取签订和平条约的同时,先“签订一项睦邻合作条约”。

6月15日,勃列日涅夫接见日本劳动相石田博英时,再次提出签订苏日睦邻合作条约的建议。

6月12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就日本共产党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写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立场,提出批驳。文章认为,日共对苏联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千岛群岛提出非法要求,是要“修改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要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夺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苏共认为，这是日本共产党对国际主义的背叛，是在煽动领土纠纷。6月21日，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对《读卖新闻周刊》记者说，1959年他率领日共代表团访苏时，曾与苏共达成协议：“将包括国后、择捉在内的南千岛群岛归还给日本”，并互换了会谈纪要。

6月24日 苏联《新时代》周刊发表编辑部文章《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指责卡里略提出“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企图使欧洲自成一统而作为一种对抗苏联的力量，是在反苏的基础上联合西欧，完全符合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势力的利益，说出了共产主义敌人想要说的话，其后果将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几十年所梦寐以求的。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对此发表声明，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整个西班牙共产党和赞成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所有共产党的。西班牙共产党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唯一有效的选择，它“不受任何中心任何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世界性或区域性指导党”。

6月29日——7月2日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率领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进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1976年欧洲党柏林会议后，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巴叶塔还向苏共提出他们对卡里略的攻击问题，表示不同意苏共对卡里略的攻击。苏共强调：他们同卡里略的争论决不是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攻击，更不是对其他党攻击的开始。

7月19日——8月1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疗养地同在此休假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导人分别会晤，他们是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盖莱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以

及蒙古的泽登巴尔。

8月16日——19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铁托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进行了会谈。双方确认，苏南关系和合作的基础是1955年《贝尔格莱德宣言》、1956年《莫斯科声明》、1976年苏南《联合公报》所包含的原则。双方认为恪守独立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苏南两国友好关系牢固可靠的基础。勃列日涅夫称赞铁托对革命运动立下了历史功勋，并授予他十月革命勋章。

8月 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文章《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列宁主义思想的60年》。文章指出：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的决议对完善党的机关及其活动具有很大的原则意义。这次全会谴责了在领导经济发展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不适当地改组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机构的做法，通过了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加强党同广大劳动群众联系的有力措施。全会对党和国家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有益影响，清楚地表明了苏共的团结，它在政治上的成熟性以及勇敢而又坚决地排除阻挠它前进的一切阻碍的能力。

最近几年为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对管理机关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机关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进和精简；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接近生产的问题并果断地加以解决；经济核算的范围不断扩大；对要通过的决议进行经济论证的要求日益提高；为进一步推广现代化的组织技术、通讯手段和自动化管理系统创造了现实的前提；管理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在全民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日子里，进一步改善管理机关的问题受到特别的注意。这项根本大法草案如此深刻和多方面地涉及到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效率问题，这在制宪实践中还是头一次。这里的含义是深刻的，因为扩大苏联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同管理机关工作

人员的准确严谨、办事能力、精明强干和专业水平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工作人员应该成为政权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

在目前条件下,当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主要由于管理工作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的时候,监督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新的性质:给予具体的帮助,就地组织实施工作,总结并推广先进经验和富有成效的劳动方法,也就是说,它同为执行某项指示而进行的直接组织工作有关。同时,监督还规定要纪律严明,要工作人员对所委托的部门承担个人责任。

9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捷尔任斯基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社会主义法制如同整个苏维埃政权一样,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残酷搏斗中确立起来的。必须为它斗争”。“我们的法律随着苏联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而不断完善”。他强调苏联新宪法的产生便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它合乎逻辑地表达了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发展,同时又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人认为新的根本大法是他们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和反映。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新宪法的民主性同苏共中央始终不渝的列宁主义方针,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安德罗波夫强调加强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和对社会主义敌人阴谋的回击。他说:“社会主义的敌人今天仍然不想放弃颠覆新制度或者为它的前进设置障碍的企图,尽管他们已经不能用武力消灭这个制度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在特工机关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这一特殊领域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特工机关“极力要破坏、动摇苏联人的共产主义信念,把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道德强加给我们,最终妄图在苏联社会实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变

化”。

安德罗波夫指出：“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生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存在的本身和它们的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存在等因素决定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变化，但它们的共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斗争”。

10月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宪法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还选举契尔年科和库兹涅佐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4日——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了苏联新宪法。

10月3日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库兹涅佐夫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世界上第一个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已获通过，“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已由宪法固定下来”。

苏联新宪法写道，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加强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

新宪法还强调，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它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

10月5日 《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的

发言。勃列日涅夫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体制逐渐变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体制。苏联现在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是社会改造的一个必要环节”。勃列日涅夫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彻底胜利的成果之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步转变成全民国家。

10月6日 苏共中央致电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柬埔寨共产党公开，电报中说，柬埔寨人民在柬共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朗诺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的胜利，愿苏柬两党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日益巩固。

10月10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民经济学院》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进一步完善各部和主管部门及其他国民经济管理机关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使领导干部掌握经济发展的科学原理以及国民经济管理、组织和计划工作的现代科学方法。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在莫斯科设立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的苏联国民经济学院，规定在苏联国民经济学院的学习期限为2年。学院每年招收学员100人，招收的学员应有高等教育程度，年龄不超过45岁。该学院学员在脱产学习期间的助学金数额相当于原主要工作地点的月平均工资，但不得低于职务工资。

决议还规定，该学院可聘请著名学者、学识渊博的教员和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来充实教学人员队伍，还可聘请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及各部部长和主管部门领导人来授课，并担任某些重要的课程的教学。

10月13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领导人员和专家的进修系统》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科学进步和提高一切工作质量，必须系统地提高和加深国民经济领导人员和专家的政治与业务知识。苏共中央要求：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应保证科技进步的要

求不断提高国民经济领导人员和专家的业务水平,选拔具有博学知识的人作为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并为新办企业和生产单位培训干部。

决议要求加强教学工作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实践的联系,研究科学组织劳动、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械化以及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先进经验。

决议规定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设立部门的国民经济领导人员和专家进修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各专业部和主管部门、全苏知识协会、全苏科技协会理事会和全苏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协会等部门的代表。委员会的任务是重点研究国民经济领导人员和专家进修系统的主要问题,组织教学过程的基本原则,关于学习期限,示范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材料,以及组织工作和经验交流。

决议要求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应重视对领导干部后备力量的培养,改进选拔学员的工作。教育部在征求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的同意后,3个月内制定出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组织者进修系和工业生产计划工作系的新的教学计划。

11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十月革命6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不是要取得压倒对方的军事优势,不想破坏现在东西方之间在中欧或者苏美之间所形成的军事力量大致的均衡状态,他建议就各国同时停止生产核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问题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愿意同其他国家就在一定期限内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暂缓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达成的协议,他同时还建议各国就同时停止生产核武器达成协议。

12月3日——1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率领苏共

代表团参加安哥拉人运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讲话时说,把人运变成“先锋党”的问题,是种种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认为非洲的反殖斗争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12月1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就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建立60周年,向全苏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发去贺词。贺词中说:“捷尔任斯基奠定的光荣传统,如今仍存在于你们保卫伟大十月革命成果、保障苏维埃国家安全的艰巨然而又是光荣的、十分需要的、负责的工作之中,并且日益发扬光大”。“今天,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已经列入苏联新宪法——发达社会主义的宪法。同志们,这就赋予我们更大的责任,要求不断完善你们的全部活动。苏联肃反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在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下,进行这项活动,这便是成功的保证”。

12月1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庆祝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建立60周年大会,并致开幕词。安德罗波夫说:“今天,国家安全机关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活动了”。“我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新的历史性共同体——由利益的一致、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而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成长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现实力量,承认缓和的语言。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不再试图使世界发展的进程有利于自己的变化”。

安德罗波夫强调,从这样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中为肃反机关作出了重要的结论。“这首先是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牢固一致和有力团结的结论。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国国内不存在会产生旨在反对苏联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颠覆活动的阶级基础”。“现在,威胁苏联安全的根源在外部。阶级敌人试图从那里,从外部将颠覆活动移

到我国境内来，试图大搞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不坚定的人身上”。

安德罗波夫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必须服从苏共的领导，他说：“作为指引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党——苏联共产党的日常领导和监督，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机关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12月2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国际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关于中子弹问题，他说：有人要把这种惨无人道的武器硬加给世界，有人想抹煞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间的界限，把它说成是战术武器，使各国人民不易发觉向核战争升级的行径。他强调，苏联坚决反对制造中子弹，反对主张在西欧布置中子弹的企图。如果西方制造这种炸弹，苏联将回答这种挑战。苏联建议就不生产中子弹问题达成协议。

关于中东问题。勃列日涅夫指责埃及同以色列单独谈判，他认为这将会在阿拉伯世界制造分裂，破坏中东问题的“真正调解”，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他强调，苏联主张召开日内瓦会议，但召开的条件是不使会议成为掩饰单独交易的帷幕。

1978 年

1月18日——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

1月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给北约国家首脑分别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在本国部署中子武器。3月11日，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生产子弹，那就意味着开辟另一领域的军备竞赛，增加发生核战争的危险，苏联将对这一挑战给予应有的回答。声明要求美国放弃中子武器的生产，并表示愿意就此问题同美国谈判，并签订相应的国际协议。

2月2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诺马廖夫最近访美结果发表讲话时说，苏美合作的道路上，依然布满着各种障碍，美国那些不关心苏美睦邻关系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势力正在制造障碍，他们阻挠战略武器会谈圆满结束，企图生产并布署子弹，在两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人为制造困难”。勃列日涅夫认为，必须作出新的努力推进苏美关系，而苏美关系是苏联整个国际方针的重要因素。

2月27日 苏共中央书记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书记会议。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波兰、蒙古、民主德国、罗马尼亚、越南党的书记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商讨对美国子弹、欧洲安全会议贝尔格莱德续会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问题采取一致方针的问题。

3月23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

通过决议,对《苏联法规汇编》的出版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决议指出:《苏联法规汇编》的准备工作应以苏联宪法为基础,应促进苏联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加强保护社会利益,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促进加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础。该法典将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式版本在1981——1985年间出版。决议规定法规汇编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关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法规、关于社会发展和文化的法规、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关于国民经济的法规、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法规、关于国防和保卫国界的法规和关于审判、检查监督与维护法律秩序的法规7部分。

3月28日——4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乌斯季诺夫和扎米亚京的陪同下,视察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联武装部队。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为的是保卫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社会主义友邦免于受到无论可能来自何方的侵略”。他认为“我们边界的东西方都有热衷于军备竞赛、加剧恐怖和敌视气氛的势力”。

3月 为了贯彻苏共二十五大关于完善高级党校培养干部的措施的决议,苏共中央决定在苏共中央所属的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高级函授党校的基础上,成立统一的、崭新的学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该学院将成为培养党、政和意识形态干部的整个系统的教学、科研和科学教学的主要中心。

决议规定,学院将设立基础部、函授部、研究生班及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进修学院,学制2——3年。决议要求“吸收表现良好、有培养前途、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员到学院学习,年龄应在40岁以下,在个别情况下可放宽到45岁以下”。首先应入学的是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的书记和各部部长,大城市的市委第一书记,各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边疆区和州执行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各部

和主管部门领导人,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应该提拔到更重要部门工作和其他部门的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

5月30日——6月2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等捷党政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发展两党和两国兄弟友谊和全面的合作。关于1968年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成果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胡萨克强调,苏联出兵是应捷党内外人士的无数次要要求而作出的“历史性决定”。

7月2日 苏联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致电越南政府领导人,支持越南政府的对外政策。电报说:当越南经受外来的粗暴而又毫不掩饰的压力,遭到攻击和恫吓时,苏联对越南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9月1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再次表示支持越南,他们在写给越南党政领导人的信中说:越南受到中国粗暴的大国主义压力以及柬埔寨的由北京唆使的军事挑衅,越南理所当然地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7月3日——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认为,发展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培养干部、尤其是作为专业干部的农机手密切相关。目前虽然集体农庄主席中具有高等和中等文化水平的专家占93.5%,国营农场场长中占98.3%。从事农业的专业人员有160多万人,农机手有422.5万人。但农庄农场的中层管理干部,即生产队长、分场和畜牧场场长的专业文化水平还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后农业迅速发展的要求,因此他强调“在农村建设中关心干部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要为农村培养更多的专业化领导干部、更多的建筑工程师和建筑专家。中央和地方机关应更加重视在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中培养技术熟练的

农村建筑工人,并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7月7日 苏共中央书记凡·卡皮托诺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草案作了说明,指出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最鲜明的表现之一,选举是人民的主权意志的表现,人民首先是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来实现属于他的权利的。因为苏联的选举制度是建立在不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原则基础之上的,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现阶段的要求。卡皮托诺夫强调指出,阻挠苏联公民自由行使其最高苏维埃选举和被选举权的人要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卡皮托诺夫还强调,苏联选举制度的真正民主还在于,不论是代表候选人,还是选民都不承担同选举有关的任何物质费用。

7月11日 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出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西伯利亚和远东党务工作者会议,并发表了《完善党的机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讲话。讲话指出:最近,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关于落实苏共中央七月(1978年)全会决议的措施》问题。各级党组织面临的

任务是:

第一,要把全会决议的精神和意图传达到全党,传达到每个党员。为此,要在党委全体会议或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以及在基层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大会上普遍讨论中央全会的结果。

重要的是保证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深刻阐明全会的文件。担任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应直接参与这项工作。同时还应吸收专家、科学家、生产革新能手和优秀宣传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

第二,全会的决议必须靠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大量组织工作来保证。在制定措施时,重要的是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对农业的领导和克服缺点这些问题上。安排工作要做到每个党员、苏联的每个劳动者都能各得其所。

当前,党政机关的整个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都应服从于主要问

题,如做好庄稼的收割工作,完成计划和履行向国家交售谷物和其它农牧产品的社会主义义务,有组织地完成 1978 年的全部农活。

第三,除了要完成当前各项任务外,应要保证制定出能落实全会决议的一整套长远措施。

7 月 20 日——8 月 23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假的东欧和蒙古党的最高领导人分别会晤。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民主德国的昂纳克、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盖莱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以及蒙古的泽登巴尔。会晤后发表了公报,表示坚决支持“遭受中国粗暴压力的越南”,谴责“中国的霸权主义方针”。

8 月 5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彼得罗扎沃兹克市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庆祝大会,并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发表讲话。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以《给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以崇高奖赏》为题,他说:“在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进一步繁荣和接近起来,苏联各大小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党在民族关系上始终不渝地实现族际主义原则,加强各民族的友谊,把这看作是社会主义重要成果之一。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和残余、对民族局限性和特殊性以及把各民族历史往事理想化和掩饰社会矛盾的倾向、对妨碍共产主义建设的风俗习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不变原则”。

关于苏联国内形势,安德罗波夫强调“把社会生产集约化、提高全部工作的效率与质量的任务置于首位。这是出自当今的实际情况的客观必要和规律。今天,并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计划,而是要通过消耗最少的人力和物力去完成计划。提高效率方针的实质就是:善于实实在在地以主人翁的态度利用我国经济不可估量地增强了的潜力和优越性、苏维埃政权 60 年来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优秀干部的知识和才干、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

关于国际形势,安德罗波夫强调缓和问题。他认为“被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积极进程有了发展。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和平共处占有的阵地越来越牢固”。“今后的道路是明确的,这就是耐心地建设性地调解冲突和分歧,在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和加深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方面采取新步骤的道路。使缓和不致逆转,这就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一项任务”。

8月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在维堡举行的授予维堡基洛夫边防总队红旗勋章的大会,并受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委托,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题为《祖国神圣疆界的可靠哨兵》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党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任务正在胜利实现”。“党要求提高我们一切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方针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效益。从今年上半年工业产值增长5.2%(年度计划为4.5%)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从农业劳动者如今的工作情况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从我国南部地区不断传来丰收的消息。加速科技进步、使科技进步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这对计划任务的完成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我国每个劳动者密切关心增加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关心这些财富和资源能得到主人翁般的,合理的和最有效的利用”。

关于国际形势,安德罗波夫认为“70年代上半期开始的积极进程,决定了世界事态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缓和的具体表现有: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和平共处原则开始越来越顽强地给自己打开一打道路;导弹核战争的威胁得以推迟和削弱;人们开始对未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他强调“缓和不是一种良好和愿望,也不是某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这是从当今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它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理应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党、苏维埃国家走在争取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前列”。

安德罗波夫还强调苏共对边防部队的领导。他说：“共产党的领导过去一向是，现今仍然是边防军顺利开展活动的基础之基础。近几年来，由于苏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经常关心，由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关注，苏维埃国家边界的警卫工作已提高到崭新的水平”。

8月 《真理报》等报刊就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表评论，认为这次访问具有公开的反苏性质，破坏共产党国家的团结和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推行霸权主义。《真理报》等还指责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没有同中国的“反苏言论”划清界限。

9月2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授予巴库列宁勋章的大会，并发表讲话。关于国际形势，他就美、埃、以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达成关于中东问题的协议说：这个会议排除或避开合法参加调解的各方，牺牲它们的利益，并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谈到苏美关系时说，美国利用人权问题直接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是对欧安会文件最粗暴的破坏。他指责美国某些人有意识地向苏联挑衅，力图使局势更加尖锐化。

10月13日 葛罗米柯率领苏共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等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说，双方愿意本着1970年苏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1970年苏罗声明的精神，在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团结、平等、独立、相互信任、尊重和同志式的互助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两国关系。

11月1日——9日 黎笋、范文同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等进行了会谈。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强调，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或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双方表示，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

一个新阶段。

11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在十月革命61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说：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全民国家，这是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忘我劳动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的结果。苏共一贯举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首先是始终如一地保证劳动人民日益广泛地参加社会一切事务的管理，进一步发扬我们国家组织的民主的原则，同时，发扬民主同提高苏维埃国家的组织作用是分不开的。苏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协调这个制度的一切环节的活动，即协调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活动，但党不是代替这些组织，而是加强这些组织，从而把一切组织，把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为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加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而奋斗。

11月1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西方国家可能武装干涉伊朗内政”答《真理报》记者问。他说，苏联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借口下从外部干涉伊朗内政。他强调伊朗是同苏联直接接壤的国家，苏联把对伊朗内政的任何干涉，尤其是军事干涉，都看作是触及它的安全利益。

11月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并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还选举了康·乌·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尼·亚·吉洪诺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会解除了基·特·马祖罗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2月4日——7日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总理塔拉

基，中央书记、副总理兼外长阿明等访问苏联，同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进行会谈。两国签订了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条约强调：为了加强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他们缔结的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双方保证不参加旨在反对缔约另一方的军事联盟和其他联盟、国家集团以及行动或措施。双方还强调将努力促使亚洲安全体系的建立。

12月1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索非亚举行的理论讨论会上，重申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11月写给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信中的内容，反对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武器。他说，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装备和工艺，是“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无所作为的，它们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以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

1979 年

1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某些国际问题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内容涉及到苏美关系、苏中关系和西方同中国的关系等。他说:苏美是在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并肩跨进1979年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的工作正接近尾声,尽管为了最后协调立场还需要一点时间。由于美国顽固地追求损人利己的目的,所以苏美关系中令人欣慰的因素是不多的。关于苏中关系,他认为苏联对中国既无领土要求也无其他要求,苏联看不到恢复苏中友好关系的任何客观障碍。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挑动我们撕毁”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不会上这种挑动的当,并声称“如果北京领导人硬要走这一步,那他们将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面前承担全部严重责任”。勃列日涅夫还重申,反对西方国家向中国提供现代化武器。

1月13日——1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等访问保加利亚,同保共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等进行了会谈。双方表示,决心进一步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方面相互接近的过程,并加深两国的全面合作。两国还讨论了进一步鼓励保加利亚对苏出口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以及鼓励苏联公民去保加利亚旅游的具体措施。

2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斯图皮诺选区会见选民时,发展题为《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党的指引下》的讲话。他说:“苏联新宪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法

律文件,它既反映了我们的成果,也展示了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前景。虽然新宪法才通过不久,但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正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多么良好的影响,它又是怎样有机地进入共产主义建设的活生生的实践的”。他认为“进一步发扬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方针之一”。“宪法赋予苏联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变得更加广泛和充分。同时,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保证在不断加强。个人和国家相互关系的民主原则在日益深化”。

关于国内形势,他认为“和平和国际安全是不能通过军事竞争得到加强的。军备竞赛破坏国与国之间的信任,毒化国际气氛,增加使危机局势上升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才十分重视限制并进而裁减军备,和平解决争端和冲突,加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发展互利国际合作”。“可以满意地指出,70年代出现的紧张局势缓和的趋势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国际生活的主要趋势。例如,欧洲的形势以及在筹备和召开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期间破土而出的欧洲新关系幼苗的壮大,都说明了这一情况”。他强调,“尽管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事态很复杂,有时也很矛盾,这并不能改变我们对外政策的态度。相反,苏联人民一年比一年更加相信我党选定的方针是多么正确,相信继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限制军备和裁军以及为发展国际合作而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是多么重要”。

2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是帝国主义的有毒武器”。在目前条件下,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下,“两种对立制度的思想搏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激烈”。

安德罗波夫说:“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领域涉及政治、哲学、法学、道德、美学、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观点和思想,也就是说,涉及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具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许多特点。但它不是由于两种对立制度的现实存在而客观产生的

那种通常的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这首先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一种破坏活动形式。它的目的是削弱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破坏活动是通过专门手段进行的，常常是直接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因而是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违背社会主义法律的。这种破坏活动虽然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但这一事实改变不了它有破坏和违法的性质”。

安德罗波夫认为时代变了，“帝国主义干得更加狡猾了。它竭力密切结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行事。因此，它声嘶力竭地叫嚷，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啦，我国‘缺少’人权和自由啦，必须‘改进社会主义’啦，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都是拾资产阶级的牙慧”。“帝国主义特务机关力图渗透到一切意识领域中去，既利用尖锐的政治问题，又利用初看起来与政治毫无直接关系而属于人的性情、兴味和生活习惯这样一类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安德罗波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要方针之一，是以高度的思想性和忠于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必须使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苏联人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自觉对待社会义务，具有高度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感情”。

3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最高苏维埃选举会见选民，并就苏联内外政策发表了讲话。关于国际问题，他谈到了苏美关系、欧洲局势、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和中越战争等问题。他说：苏联希望不久能同美国总统卡特签署苏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能同其进一步讨论发展苏美两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欧洲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缓和扩大到军事方面，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北约集团正在狂热的扩充军备，使局势复杂化，为此，苏联准备带个头，在一年内从中欧撤出3万军事人员和大量军事技术装备，包括1000辆坦克，但前提条件是美国也应这样做（规模可小些）。勃列日涅夫还建议

全欧会议参加国能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装达成协议。

关于亚非拉国家的状况,勃列日涅夫表示欢迎伊朗革命的胜利,同情和声援阿富汗的进步改革,无私援助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他强调苏联同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不是矛头指向他人的军事同盟。关于中越战争,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在越南这个艰难时刻,完完全全地声援越南,谁也不应怀疑苏联是忠于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他认为这是中国向越南“发动了空前蛮横无理的强大式进攻”,奉行“大国霸权主义政策”,“给全世界的和平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从越南土地上一个士兵不留地撤出全部干涉军队”。

3月5日——7日 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访问苏联,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双方表示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双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前景和加深生产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同月12——14日,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访问苏联,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提高经济一体化措施的效果问题。盖莱克认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发展波苏全面合作的新的重要动力。

4月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审议第十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问题;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活动和进一步完善各级人民代表的苏维埃工作》的报告通过决议;解除雅·彼·里亚鲍夫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4月2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思想教育工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苏联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污蔑性宣传的全部骗局,通过具体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揭露这些宣传的实质,并向人们宣传社会主义胜利的真理。

因此,苏共中央决定:

1. 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边疆区党委、州党委、自治区党委、市党委、区党委、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措施,提高思想工作效率和质量,清除存在的缺点。思想工作应当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使之符合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新任务的要求。

2. 各级党组织、意识形态机关、宣传部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集中解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问题。决议强调应保证宣传鼓动工作的科学水平,重点宣传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威力、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和人道主义,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

3. 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是培养苏联人的科学世界观,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

4. 进一步加强农村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农民对迅速发展农业应有责任感,经常关心提高农民的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

5. 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要加强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研究思想工作问题,科学家要集中精力研究下列问题: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效率的途径;培养各阶层劳动人民的马列主义世界观;现阶段国际舞台上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方法。

5月5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决议强调要用高度的思想性和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用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全体劳动者,彻底克服资产阶级观点和道德残余,使个性得到全面

和谐发展,创造真正的精神文化财富。

决议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仍然是树立苏联人的科学世界观,忠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以及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现在仍然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

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舆论和宣传机构的领导人提高马列主义和苏共历史经验的宣传水平,提高报刊、电视和广播的思想水平和效率,必须扩大有关国内和国际生活报道的题目、数量和领域,使报纸和杂志发表的材料以及电视和广播节目中有更丰富的新闻内容。

苏共中央在决议中,还对意识形态及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认为这项工作对国际舞台上急剧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同时认为这项工作的质量也不符合苏联人日益提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要求。

5月30日——6月1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同匈牙利党中央领导人卡达尔等进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时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如果不考虑这种特点,就不可能发展健康的合作,不可能使双方满意地解决各种问题。关怀备至地、真正善意地对待相互的特点,是苏匈关系的准则。苏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苏联对匈牙利“创造性地建议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有浓厚兴趣。双方表示,尊重兄弟党的创造性探讨精神,但只有“既考虑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规律,又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形势和本国特殊条件的时候”,这种探讨是卓有成效的。

6月15日——18日 勃列日涅夫同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会谈。双方签署了以下文件: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至1985年);上述条约议定书(有效期至1981年底);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原则和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关于确定进攻性战略武器数

目的基准数据的谅解备忘录；苏联关于逆火式轰炸机的声明和苏美联合公报。

在会谈中，苏美还就中东、东南亚和南部非洲的局势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在会谈中还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要求美国不应利用自己同中国的关系来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

7月11日 《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谈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文章认为，中国提出谈判的前景取决于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是对改善苏中关系提出某种“先决条件”，而提出先决条件的策略往往从一开始就会把谈判搞垮。文章强调，苏中关系健康化只有双方努力才能有结果，“如果中国方面表现出真正的诚意和现实态度的话，苏方是不成问题的”。

7月12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苏共二十五大及以后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联宪法的条款，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对经济的计划领导，发展生产管理工作中的民主原则和提高劳动集体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当前的任务是“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和经营水平，使之符合现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要求，大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经济和苏联人民的福利不断高涨。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1. 关于提高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水平的措施。2. 关于加速生产能力和项目投产及提高基建投资效率的措施。3. 关于发展经济核算制和加强经济杠杆与经济刺激因素的作用。决议强调：“改进整个计划工作最重要的方针是，选择能取得很高国民经济最终成果的最有效途径，使部门发展和地区发展，远景计划和当前计划合理地结合起来，完善部门间的比例和部门内部的比例，保证经济平衡增长”。决议还要求苏联国家计委、各部和主管部门及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必须制定措施提高基建投资效率，使已开工工程的生

产能力和项目尽快投产,并大大减少新开工工程的数量,以便在最近几年内把未完工的建筑工程量降到规定的标准。

这一决议公布后,苏联有关部门又先后公布了贯彻该决议的重要条例、指示、说明、细则等。这些文件先后在苏联《经济报》上发表,到1981年1月止,共发表了80余篇。

7月17日——8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分别同在此休假的东欧国家和蒙古党的领导人会晤,着重讨论了发展长期专业合作纲要和发展专业化与协作问题,还讨论了经互会各国1981至1985年经济计划协调问题。同勃列日涅夫先后会晤的有胡萨克、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盖莱克、日夫科夫和泽登巴尔。

8月2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改进维护法制的工作和加强同违法行为的斗争》的决议。决议认为,许多党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对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尖锐性估计不足,对忽视教育工作的情况往往放任不管,对护法机关不进行日常的领导,对于法制状况也没有提出严格的要求。

根据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联宪法条例,苏共中央决定:1.各检察机关、内务部机关、司法机关和法院要坚决地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完善自己的工作形式与方法,扩大并加强与各劳动集体和社会团体的联系;2.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民族区委、市委和区委应该对护法机关的工作加强监督,采取措施以受过培训的干部来加强这些机关、并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劳动条件与生活条件;3.各级党委应该经常关心扩大护法机关同社会团体的联系,并建立起尊重与支持护法机关的气氛;4.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要经常研究加强法制工作的情况,把党和国家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意识形态工作机关、家庭和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协同一致地同违法行为进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防止违法行为的综合性措施,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执

委会应该提高苏维埃在加强法纪与法制方面的作用 and 责任感,并发挥苏维埃执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各个代表组织和每位代表在这方面的积极性。

苏共中央强调指出:防止违法行为的主要方向是在各劳动集体和居民点中加强预防工作。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必须加强对破坏国家纪律和社会主义财产保护法的行为进行斗争,坚决制止欺骗国家的行为。

苏共中央委托苏联检察院、苏联内务部、苏联司法部、苏联最高法院、苏联卫生部、苏联医学科学院、苏联教育部采取措施改进对犯罪活动、酗酒和嗜酒过度的原因进行科研组织工作,并就防止和根除这些现象提出具有科学根据的建议。

8月16日 苏共中面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出席授予红旗东部边防军区边防总队以红旗勋章的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不久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过的《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定时说,“这个文件不仅是向计划组织、各部和各主管部门提出的,而且是向每个苏联人提出的”。“党在这个文件中坚决地提醒注意,我国的计划工作同生产、管理任务与道德风气是不可分割的。我国的经济无与伦比地增长,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而且在质量上也复杂起来了。经济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革命向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的水平,使其符合现阶段——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要求,力争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并在此基础上保证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和增进苏联人民的福利”。

契尔年科指出:“对这个文件所包括的任务的各方面进行思考和斟酌,就会明白,我们大概还必须克服心理障碍,陈规旧习、因循守

旧、优柔寡断以及不能按照这个决定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我党和我国现在要广泛讨论这个决定,拟定在每个企业实施该决定的具体措施。我们相信,每个苏联人都将对全民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进一步提高我国福利的水平,再接再厉地增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实力,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将再向前迈进一步。”

关于苏共中央不久前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定,他强调“这个决定向边防部队政治机关、党团组织提出了一系列补充的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当前整个形势、意识形态战线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如今向军队中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月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卡斯特罗发出贺电。电报称,不结盟运动已成为世界政治的有影响的因素,历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对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都作出了有分量的贡献。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主张争取加深缓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同争取加深缓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

9月12日 安哥拉人运—劳动党主席、共和国总统内图在莫斯科因肝病去世。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赴安哥拉驻苏大使馆吊唁。次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会见来苏接运遗体的安哥拉代表团时说,苏联同安哥拉发展全面合作的方针不变。9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索洛缅采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安哥拉参加内图葬礼。

10月1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给联邦德国、荷兰、英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领导人,通知他们他于10月6日在民主德国访问时,提出的新建议的内容:苏联准备减少部署在苏联西部地区的中程核武器数量,但要以西欧不再进一步部署中程核

武器为条件。苏联决定单方面减少在东欧的驻军人数,在今后12个月内从民主德国撤出达2万名苏联军事人员、1000辆坦克以及一定数量的其他军事技术设备。17日,华约成员国议会领导人致北约成员国议会领导人呼吁书,呼吁不要把美国新型中程导弹部署在西欧。

11月5日,勃列日涅夫就他在民主德国访问时提出的新建议答《真理报》记者问。他建议立即同西方就减少中程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他要求北约在结束谈判之前,不要通过在西欧制造和部署上述武器的任何决定。

11月1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共乌德穆尔特州委选拔、配备和教育干部的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这个州委在干部工作中存有许多严重问题,如许多劳动集体不是由有才能和有威信的领导人来领导;没有及时调派优秀干部加强落后部门的工作;农业、地方工业、服务行业干部的培训工作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对苏共二十五大提出的关于积极提拔国民经济专家担任党的工作的任务执行得很差;许多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人员的文化生活水平和专业素质不高;党、苏维埃、经济机关没有有计划地建立真正的干部后备力量;对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只是调换一下领导岗位,而对有发展前途的、表现好的年轻工作人员不大胆提拔;很少提拔妇女担任市、区苏维埃及其他部门的领导工作;选拔干部时缺乏全面认真的考察,委派一些政治上不够成熟和专业水平不高的人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干部欺骗国家、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等。

苏共中央要求苏共乌德穆尔特州委尽快改正上述问题,严格遵守列宁的干部工作原则,增强干部的选拔和教育、培训以及进修工作,加强培养后备干部的责任心;加强党纪国法,加强对党的指示执行情况检查,充分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同一切破坏国家纪律和违法乱纪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11月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 听

取并讨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1980年苏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80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8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2. 选举尼·亚·吉洪诺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4日——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应保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托·日夫科夫的邀请访问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向契尔年科授勋并称赞他是勃列日涅夫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一代英豪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12月14日——22日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佳热利尼科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问西班牙，同西共总书记卡里略举行了会谈，并受到西共主席伊巴露丽的接见。这是1977年苏共和西共关系紧张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双方表示愿在国际主义团结、完全平等、彼此尊重和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加强友好与合作关系。

12月27日 根据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决定，苏联武装部队入侵阿富汗，推翻阿明政府，对阿富汗实行武装占领。苏伞兵部队1万余人当晚袭击了喀布尔郊区的首相所在地达尔拉曼宫，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委会主席阿明的警卫部队发生激战，阿明被击毙，由卡尔迈勒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委会主席和国家元首。卡尔迈勒在呼吁书中称阿明是刽子手、篡位者和世界帝国主义的爪牙，在阿富汗实行血腥的统治。

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电卡尔迈勒，祝贺他出任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委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同日，卡尔迈勒发表声明，他说：本政府根据阿苏1978年12月5日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吁请苏联给予紧急的政治、道义、经济援助，包括军事援助，苏联政府满足了阿富汗方面的请求。

1980 年

1月7日——10日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率领法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两党着重讨论了发展两党关系和合作的问题。双方认为，“每个国家的传统、民族特点和状况各不相同，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不能硬套或抄袭别人的经验”。双方还表示，立场的不同和现有的分歧不应成为进行合作的障碍。马歇在苏联电视台发表了讲话。他认为两党在某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同时又为苏联出兵阿富汗进行辩解，他说，“苏联如果不对阿富汗的请求作出回答，就意味着它没有履行苏联阿富汗条约”。

1月12日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共体、丹麦、意大利、澳大利亚、冰岛、日本、联邦德国、冈比亚、挪威、新西兰、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国宣布对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联大举行紧急特别会议，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国际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他说：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早在塔拉基任总统时，以及后来，不止一次地请求苏联给予援助。苏联不得不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他认为，“只要迫使阿富汗领导请求苏联出兵干预的原因不复存在，苏联部队就将从阿富汗全部撤出”。

勃列日涅夫强调，阿富汗事件不是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化的原因。假如不发生阿富汗事件，美国和北约的某些集团大概也会找到其他借口来使世界局势尖锐化。他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明显地复杂化的原

因,是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的某些集团造成的。因为早在1978年,北约理事会就已经为其敌视缓和和加剧军备竞赛的方针,定下了基调。“那次会上确定北约成员国的军事预算在20世纪末之前自动增长”。他还指责美国破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把一些新式中程核导弹部署在西欧国家,从而导致了新一轮军备竞赛。

1月17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根据苏联人民监督法进一步改进人民监督机关工作和加强党对人民监督机关领导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人民监督法是实现宪法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完善国家管理与监督等要求的重要步骤。人民监督机关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加强纪律与法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力量,成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苏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认真执行苏联人民监督法的各项条例。决议认为人民监督机关的使命是更加深入地研究各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组织的情况,仔细分析产生各种违法行为的原因,客观地有原则地分析研究所取得的检查材料,努力纠正缺点。应该更加充分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力,对犯有经营不善、欺骗国家的错误及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人员给予处分。

决议强调要加强人民监督的最基层环节,即监督小组和监督岗的作用,大力改进监督小组和监督岗的工作,保证每个检查员都积极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还要选派优秀干部加强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苏共中央要求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积极贯彻苏联人民监督法,切实保证工会和共青团积极参加人民监督机关的工作,选拔工会和共青团中的优秀代表参加人民监督委员会、监督小组和监督岗。

2月4日——11日 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访问苏联,同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会谈。双方就加强

各方面的联系、加强在国际活动方面的互相支持以及苏联进一步援助韩桑林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及文化设施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1980年供货协定、文化和科学协定,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月1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在高尔基市普里奥克斯基选区会见选民时发表题为《人民的团结是伟大的力量》的讲话。他说:“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十一月(1979年)全会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远景规划问题,详细分析了业务领导问题以及某些经济部门刻不容缓的任务。现在,全体共产党员、所有劳动集体、所有党的领导人和经济领导人正在把注意力放在尚未利用的潜力以及挖掘内部潜力的必要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上面。在评价过去所做的工作时采取全面和批评的态度,对在工作的组织安排方面有疏忽的领导干部采取严格要求的态度,乃是列宁领导作风的榜样。”

安德罗波夫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他认为“在加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加强党的纪律、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的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本身、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加强劳动纪律问题远不是新问题。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老问题具有新的意义。要知道,生产机构越发达,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越错综复杂,对劳动活动的协调性和组织性的要求就越高。在这种条件下,任何违反劳动纪律、不完成计划、工作中出废品等现象,都会影响到生产的总节律及其最终结果”。

关于近年国际局势明显复杂化的问题,安德罗波夫认为,其原因“就是华盛顿奉行不负责任的和危险的政策。种种迹象表明,在华盛顿,现在身居领导地位的是那些同军界、工业界集团有联系的最反动势力,是那些妄图恢复旧时代,即帝国主义列强把合乎自己心意的秩序加给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时代的势力”。

2月2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鲍曼区向选民发表讲话。关于阿富汗问题,他坚持说这是苏联根据苏阿友好条约而采取的行动,不是武装干涉。他说阿富汗三届政府都曾请求苏联帮助保卫它免遭外部入侵。勃列日涅夫强调,一旦外来干涉完全停止,苏联愿意从阿富汗撤军。

4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苏共历史问题》1980年第4期发表文章《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苏共领导作用的加强和列宁式的工作作风》,纪念列宁诞辰110周年。

文章认为:“在建议发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政党同时也成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 and 政党。同时就其阶级本质而言,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正在加强自己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指导性影响,同时敏锐地注视着未来,向人民展示有科学根据的新的前景,在群众中唤起巨大的毅力和创造性主动精神,领导人民去解决更宏伟的任务”。“在目前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共产主义建设已成为苏联人民直接的实际任务的时候,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和指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的作用正在进一步提高”。

关于苏联国内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文章认为,“苏共中央十一月(1979年)全会尖锐地、以批评的态度讨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所有的部门和企业都完成了计划。在供应居民某些食品和工业品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中央全会认为,为了消除这些缺点,必须更坚决地实行党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完善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加强纪律和提高各个工作岗位上的责任感”。

契尔年科举例说明苏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事实后说:“伪善地扮演‘人权捍卫者’角色,实际上却在扼杀起码自由的帝国主义集团,能拿什么来同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事实相比较呢?……帝国主义剥夺了千百万男人和妇女和基本权利——人的劳动权利和正常生活的权利。”

5月7日 勃列日涅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参加南共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葬礼。有200多个外国代表团出席了葬礼。勃列日涅夫对南共领导人说：苏联领导希望在苏南关系中永远洋溢着相互谅解、信任、融洽和绝对平等的气氛，苏联人过去、现在都一直希望看到兄弟的南斯拉夫是个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团结、繁荣的国家。在铁托患病期间，勃列日涅夫在1月19日致电，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南斯拉夫和苏南友好的利益而长久和有效的工作。

5月19日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华沙会谈。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参加了会谈。这是阿富汗事件以来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会晤。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倡议，也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举行世界最高级会议讨论造成目前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法国则更倾向在1981年举行由一些主要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分歧很大。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密特朗抨击这次会谈，他认为这次会谈“强化了侵略者的地位”。

6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 就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关于召开例行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决定苏共二十六次在1981年1月25日召开。2. 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报告通过决议。

勃列日涅夫发言说，苏联是应阿富汗的请求，帮助阿富汗“反击侵略”，“回击从巴基斯坦领土上进行活动的匪徒部队的武装进攻，苏联对阿富汗毫无私念，除了出兵没有别的选择。他说，现在阿富汗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大批穆斯林游击队已被击溃，因此，苏联决定撤出一部分驻阿富汗军事人员。

6月28日——7月25日 越共领导人黎笋、范文同到苏联休

假，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勘探和开发越南南方大陆架石油与天然气合作协定，以及苏联向越南提供贷款的协定。

黎笋代表越共和越南政府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授金星勋章。勃列日涅夫在授勋仪式上说，苏越会谈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两国的合作（包括国际合作）将有一个新的规模和深度。

7月1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有37个国家和地区为抗议苏联侵略阿富汗，抵制这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有16个队没持本国国旗，10个队只有持旗者而没有运动员参加。

7月3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在克里米亚会晤。双方互相通报了本国情况和两党现在努力解决的问题。7月1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部分肉类销售价格，引起国内工人反对，并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组织，这是这次会晤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8月下旬，塔斯社就波兰局势发表评论，认为波兰事件的实质除许多客观因素之外，经济政策中的错误也起了重要作用，评论还认为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国内的颠覆活动不断加强”，指责西方借波兰事件掀起颠覆性的宣传叫嚣。9月1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波兰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已经渗透到波兰沿海一系列企业之中，他们企图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他们摆在第一位的是政治要求。9月27日，《真理报》再次发表文章，指责西方国家继续在波兰挑唆反社会主义行动。

8月2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公报，宣布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7—8月间，在克里米亚会晤了一些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党的领导人，他们是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波兰的盖莱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民主德国的昂纳克、老挝的凯山·丰威汉和蒙古的泽登巴尔。

8月2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哈萨克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说苏联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帮助阿富汗反击侵略,苏联是根据苏阿友好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履行自己的义务。他认为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并没给发起者带来什么好处。关于对中国的政策,他说,现在中国内部变化的过程,即使用肉眼也能看得见,要评论这一过程的真正意义,大概还为时过早。遗憾的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目前还没有反映出来。

9月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电贺卡尼亚接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是盖莱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后,被选举为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在电报中称他是为人民的真正利益和福利、为共产主义理想、为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巩固波兰社会主义阵地而斗争的坚强战士,是一位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波兰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友谊的活动家。

9月8日,卡尼亚对格但斯克党的领导干部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他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后的第二天,曾赴苏联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的谈话,勃列日涅夫保证苏联“将充分支持波兰党和波兰”。

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苏联198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苏联1981年国家预算和苏联1979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决议。2.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吉·雅·基谢廖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柯西金由于身体状况辞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任命尼古拉·吉洪诺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西方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柯西金执行苏共经济政策不力而被解除职务的。柯西金自1964年10月以来一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30日 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和部长会议主席平科夫斯基对苏联进行访问，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进行了会谈。卡尼亚向苏共介绍了波兰的局势和波兰为稳定国内局势所进行的努力。勃列日涅夫表示相信波兰党和人民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尖锐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进一步发展波苏关系问题。

12月5日 苏共领导出席华沙条约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会晤。会晤时主要讨论了波兰问题。会晤公报说，华沙各国相信，波兰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发展。公报强调波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牢固一环，与会者重申波兰“可以期望得到华沙条约国兄弟般的声援和支持”。

12月1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率领苏共中央代表团，出席古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广泛、如此迅速的变化。社会变革就在我们的眼前猛敲顽固不化的残暴政权的大门。在这里，在拉丁美洲，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独裁统治的垮台、萨尔瓦多的人民运动、这个大陆各国人民日益强烈地向往独立与自由的意志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契尔年科强调指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不安宁的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心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国际生活中出现的麻烦好象同苏联、古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干涉别国内政，搞什么‘革命输出’这一点有关，这当然是弥天大谎”。“不论是你们，是我

们,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搞革命输出。革命是在每一个国家中由于其内部条件变化而产生并取得胜利的,而不是从外部夹带进去的。然而,反革命的输出,从外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也是不允许的。帝国主义者应当明白这一点!”

契尔年科还介绍了苏联的国内情况:“我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正在积极地准备迎接苏共二十六大。我们正在制订规模宏大的新计划。现在,苏联人民正在讨论苏共中央提出的《苏联 1981 年至 1985 年和 1990 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草案。简言之,以自己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为首的苏联人民正在坚定地沿着列宁的道路,不懈地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1981 年

1月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英国出版其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权》写信给英美读者说,苏维埃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是:这种民主使千百万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从苏维埃政权初期起千百万人不仅直接参加选举,而且直接参加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日常管理工作,这在建设新社会方面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进入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人民日益广泛积极地参与国家生活的管理,已经作为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中心方针牢固地确定下来了。

勃列日涅夫认为,“在苏维埃国家的60多年里,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得到发展、加深和充实,然而其实质仍然未变:群众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民主原则和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就是不断发展对选民的报告制度,工作公开的原则,批评缺点,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近来苏联出现了劳动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新形式——劳动集体即我国社会机体基层组织,在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2月2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就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和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通过决议。2.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关于苏联1981年至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通过决议。就《关于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六十周

年》的提纲通过决议。

2月23日——3月3日 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当选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有5002人，实际出席4994名，有8名代表缺席，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 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报告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根·费·西佐夫。3. 苏联1981至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4. 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大会通过了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国内国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决议。“代表大会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建议各级党组织在工作中遵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原则和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

大会听取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关于起草苏共纲领新修订本的讲话，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决定。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苏联1981至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通过了《关于苏共二十六次收到的劳动人民来信和检举书、共产党员上诉书》的决定。

3月3日，大会选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319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51人。

2月2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关于苏共的国际政策，其中包括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发展同已解放国家的关系；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制止侵略势力，和平与

合作的政策；加强和平，加深缓和，制止军备竞赛。2. 苏共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苏联在70年代和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果；80年代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迫切的国民经济问题。3. 苏联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与党的任务，其中包括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造就新人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苏联宪法和进一步发展苏联政治制度。4. 党是苏联人民的先锋队，其中包括完善党的领导方法；党内生活问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说：“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与方针是正确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是，我国的国民财富已经大大增加。国家的生产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增长了。苏维埃国家的防御能力得到了加强。我国人民的福利和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苏联各族人民大家庭更加团结、更加和睦了”。“苏联新宪法的通过成了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新宪法开创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更高阶段。苏联人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

关于国际形势，他说：“报告所总结的时期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世界政治中的两种方针在激烈斗争。一方面是制止军备竞赛、巩固和平与缓和、维护各国人民的主权和自由的方针；另一方面是破坏缓和、加紧军备竞赛的方针，是威胁和干涉别国事务，镇压解放斗争的政策”。“到了80年代开始时，国际地平线上已是阴云密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坚决为消除战争威胁，为维护和加深缓和而继续进行了斗争，在实践中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了互利合作。”

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还谈到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他说，70年代，苏联社会各阶级和社会集团互相接近的过程继续向前发展。苏联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将要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结构’，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2月26日 苏共二十六大作出《关于起草苏共纲领新修订本》的决定。决定说：“鉴于苏共纲领通过已经20年了，在此期间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在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和过程”。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因此决定，“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现行的党纲（总的说来，它正确地确定了世界社会发展的规律，党和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的和基本任务）作必要的修改，并且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前草拟出苏共纲领新修订本”。

决定强调，“修订时，苏联社会生活中和世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变化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的最主要任务应当在纲领中得到深刻的、科学的反映”。

2月26日——3月1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见前来参加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党的领导人，他们是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萨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尼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此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还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总理李钟玉。

2月27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作《苏联1981至18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第十个五年计划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2. 国家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3. 发展对外经济联系。4. 坚持不懈地提高管理和经营水平。

吉洪诺夫说，“党提出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稳定而一往直前地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科技进步和使经济转上集约化

的发展道路、更加合理地利用国家的生产潜力、大力节约各种资源和改进工作质量的基础上,确保苏联人福利的进一步增加”。吉洪诺夫还强调:“党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决定实行一整套广泛的措施,目的在于始终不渝地提高人民的福利,为个人的全面发展、高效率的劳动、增强苏联人的健康和改善他们的休息以及为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也就是为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一切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规定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比例。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收入将增加16%——18%。”

3月2日,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1981至1985年和199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的决定,批准了这一基本方针,并委托苏联部长会议根据基本方针草拟1981至198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分别草拟五年计划的年度计划、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以及加盟共和国的计划,并在1981年10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

被通过的基本方针强调:“在80年代,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继续实现自己的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最高目的就是:在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基本方针规定:在5年内使工业产值增长26%——28%,其中生产资料增长26%——28%,消费品增长27%——29%。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23%——25%,靠此得到产值增长额的90%以上。在农业方面,5年中,农业年平均产值增长12%——14%,使公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4%。把谷物的年平均产量提高到2.38亿至2.43亿吨,其中包括豆类作物1200万——1300万吨。

3月3日 苏共二十六大作出《关于苏共二十六大收到的劳动人民来信和检举书、共产党员申诉书的决定》。1.获悉,大会秘书处审查了苏共二十六大收到的很大一部分劳动人民来信和检举书、共产

党员上诉状,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2. 责成苏共中央委员会完成对大会收到的劳动人民来信和检举书、共产党员上诉状的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同日,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下列 14 个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列·伊·勃列日涅夫、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丁·阿·库纳耶夫、阿·亚·佩尔谢、格·瓦·罗曼诺夫、米·安·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弗·瓦·谢尔比茨基。

下列 8 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盖·阿·阿利耶夫、彼·尼·杰米契夫、吉·雅·基谢廖夫、瓦·瓦·库兹涅佐夫、鲍·尼·波诺马廖夫、沙·拉·拉希多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下列 10 人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中央总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安·帕·基里连科、康·乌·契尔年科、米·谢·戈尔巴乔夫、鲍·尼·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基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

全会批准阿·亚·佩尔谢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3月30日——4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代表苏共致词时说,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提醒党员注意学习和利用兄弟国家积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经验,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农工综合体的有益形式。

4月6日——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率领苏共代表

团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他代表苏共致词时强调,1968年战胜反革命势力是捷克斯洛伐克对发展世界革命进程的贡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68年事件中的经验,对其他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4月7日 苏共中央公布《关于根据苏共二十六大决议进一步改进对劳动人民来信和建议的处理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两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收到来信300多万封,在此期间,党的各级地方机关共审理了公民提出的1500万份书面与口头申请。

决议强调,每个党的工作者,每个领导人都应该以同情和关切的态度对待公民的来信、请求和申诉,把这看作是自己对人民对党应尽的职责,党、苏维埃、工会和经济机关应保证完全公开地处理劳动人民的建议、申请和申诉,党委成员、苏维埃代表、先进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代表要更加积极地参加这项工作。在解决这些建议、批评意见和请求时,必须考虑集体的意见,并应提交工人大会和公民大会讨论。

4月11日——1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代表苏共致辞时说,苏联有责任关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有责任关心它的坚定的团结一致及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有责任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4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出席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111周年大会,并作题为《以列宁为榜样,象列宁那样行动》的报告。报告说: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赞同了苏联1981至1985年和到1990年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这项文件的名称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经济问题是同社会方面的任务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讨论的。党认为我国的明天不仅在于增强经济潜力和科技潜力,使苏联人更加富足,进一步发展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和

民族结构,这项任务同样重要”。“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正在发生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进程。苏联社会的社会同一性在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所有的民族,都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苏维埃全民国家制度不断发展和巩固。所有这些变化都已载入新的苏联宪法中”。

契尔年科说:“列·伊·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无阶级的社会结构主要地和基本上将在成熟社会主义的历史范畴内建立起来”。“这个结论要求我们去做许多事情。它清楚地表明党在今后年代的社会政策应当努力的方向”。契尔年科认为这个政策主要是“加速住宅、文化生活设施建设,特别是在不很适于居住的地区;减少不熟练劳动和重体力劳动;提高工资和优抚金;完善整个分配领域。党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直接牵涉到千家万户”。

关于国际形势,契尔年科认为“80年代初的特点是国际局势严重复杂化。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有使70年代在缓和紧张局势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一笔勾销的危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好战集团在加紧军备竞赛,力图破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已形成的军事战略平衡,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自己。因此,在缓和的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在70年代中期有所减轻的战争危险再次增长了”。契尔年科强调,“保持缓和、遏止军备竞赛、加强和平是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任何核冲突都全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许核冲突爆发!这就是苏共对待当代最紧迫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的实质。”

4月23日——2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问波兰。这是去年夏天波兰出现罢工浪潮之后,第一个访问波兰的苏共高级代表团。苏波两党就两党生活中的紧迫问题进行了会谈。苏共表示支持波兰党在维护社会主义和稳定形势以及加强党领导作用方面所做的努力。双方谴责帝国主义干涉波兰内政,制造紧

张局势，加剧冲突和支持波兰国内的社会主义的敌人。

5月2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第比利斯举行的庆祝格鲁吉亚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再次提出关于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关于波斯湾局势和阿富汗问题，他认为这些地区局势尖锐化的原因，是华盛顿企图对伊朗施加粗暴压力以及组织了对阿富汗革命的干涉。他提出缓和局势的建议是：“单独达成保证波斯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协议，以及单独达成调整阿富汗局势的协议；或者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讨论它们的国际方面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表示，苏联主张阿富汗完全独立，尊重它的不结盟地位，“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认为欧洲局势恶化了，苏联对此不能置之不理。如果需要，苏联会提出补充的防御措施。

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见格鲁吉亚党政领导人时说，格鲁吉亚共和国培养出一批优秀干部，克服了过去那种背离党的干部政策、背离党内生活准则和党的领导原则的现象。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采取措施加强党纪国法，同形形色色的不良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还称赞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执行干部政策时，能够比较认真地考虑居民的多民族性这个因素，关心居住在本共和国的各民族的大小民族的干部培养，提拔他们担任领导工作。

6月5日 苏共中央致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指责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要求“进行无休止的退让”。苏共中央还对波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提出批评。苏共认为，一些信奉机会主义的人混进了地方党组织和九大代表之中，因此，不能排除这些人在代表大会上可能企图打击党的马列主义力量，以便最终消灭党。信件呼吁波兰党“动员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反击阶级敌人”，在波党九大前把局势引上正轨。

在此信之前,《真理报》于6月2日曾刊登波兰《卡托维兹论坛》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批评文章。文章认为,波兰党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者所控制,处于对国家事务失去控制的危险境地。

6月2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答芬兰《社会民主报》记者问,阐述关于建立北欧无核区问题。他说,苏联对北欧建立无核区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苏联准备承担责任,对参加无核区的北欧国家不使用核武器,而他们则不生产、不购置或不在自己领土上设置核武器。苏联的这种保证可以通过签订有苏联参加的多边协定或者双边协定加以确认。勃列日涅夫还说,苏联准备承担不对无核区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但是这并不排除考虑在邻近北欧无核区的苏联领土上采取“某些其他措施”的可能性。苏联准备同对此感兴趣的国家进行讨论。

6月29日——7月2日 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诺马廖夫同来苏访问的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进行会谈。勃列日涅夫强调,现在最迫切、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停止军备竞赛。在目前形势下,最好是从限制欧洲的核竞赛开始。我们恨不得明天就坐下来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但是,由于美国的立场,谈判至今还没能开始。

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准备从谈判一开始,“就停止在本国的欧洲部分部署自己的中程导弹”,但是美国也必须“不在欧洲增加中程核武器”。他说:“每个国家都力求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在核时代,指望靠赢得军备竞赛的办法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在当代,只有当安全建立在各种对抗力量业已形成的大致军事均势和随后减少对抗力量水平的基础上的时候,这种安全才会是现实的和巩固的。”

双方会谈还涉及到波兰局势和阿富汗问题。勃兰特认为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在维护和平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7月13日——18日 苏共中央政治委员格里申率苏共代表团

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格里申在会上讲话时强调，苏联一直认为，使国家摆脱危机是波兰党和人民自己的事。但是，当问题涉及社会主义在一个兄弟国家的命运时，苏联就不能漠然置之。置自己的朋友和盟友于困难而不顾，不是苏联的行为准则。

特别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卡尼亚连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前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和前政府总理巴比乌赫等7人被开除出党。大会重申，波兰统一工人党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新和协商路线。

7月30日 苏共中央致函给日共中央。指责日共在阿富汗问题和波兰问题上对苏共的批评，“只能认为是反苏表现”。信中说，苏联从来也没有答应要归还你们所要求的领土，苏共不谋求扮演国际共运的先锋队和中心的角色，也不想强迫其他党接受自己的观点。苏共针对日共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说，“这是侮辱性的、有害的、完全荒谬的指责”。

8月13日——15日 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赴苏进行工作访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在克里米亚会见了他们并进行了会谈。会谈公报说，苏联十分关心地注视着波兰事件，决定向波兰提供援助，将波兰归还苏联贷款的期限推迟5年，并增加供应轻工原料和消费品。双方强调，苏波友谊是当前欧洲力量平衡的主要基础之一。《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发表消息说，团结工会借助于蛊惑宣传、挑衅、讹诈和威胁，竭力激化局势，实际上是直接进行夺权斗争。波兰党应该采取更加坚决和果断的行动，党员应该积极同那些想使波兰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作斗争。

8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公报，宣布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7月至8月在克里米亚分别会晤了一些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党的领导人。他们是：胡萨克、卡达尔、齐奥塞斯库、昂纳克、日夫科夫、泽登巴尔、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公报说，社会主义的实践再次

令人相信,严格遵守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关心加强党群联系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奉行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不欠资本主义国家过多的债务,用国际主义教育劳动人民,表现出革命警惕性,给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及时的坚决回击,对共产党来说是多么重要”。

8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3期发表文章《列宁主义的领导战略——论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活动的若干问题》。文章说:“成熟社会主义的完善及其逐步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过程在今天显然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自动地实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同全体劳动人民结成联盟进行积极的自觉的创造,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工人阶级创造活动的规模和效果同思想信念、组织性和自觉纪律的水平是成正比的。当然,在培养这些品质方面不能听其自然和放任自流。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认为,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是一项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和教育任务。其目的是锻炼工人的意志,使他们有准备和有能力自觉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清楚了解社会所面临的任务的性质,完成任务的途径以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文章写道:“首先需要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增长,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其成熟阶段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反映。只有在牢固的掌握科学、其中包括牢固地掌握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劳动群众最积极地参加的情况下,才能使发达社会主义的巨大可能性变成现实,才能向国民经济集约化的道路过渡。只有党才能制订有科学论据的战略,才能发挥群众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引上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轨道”。

契尔年科在文章中强调:“党在动员群众实现自己的政策方针时,并不运用政权的力量和行政命令来达到这个目的。党为达到这个

目的而运用的是信念的力量，每个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的力量，经常关心对人们的政治教育，关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对官僚主义、对违反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对经营不善和浪费的种种表现进行积极的斗争”。

9月17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就波兰局势致波兰党政领导人一项声明。声明说，反苏主义在波兰已达到危险的边缘。但波兰当局迄今对敌人的反苏运动没有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声明还指责波兰当局为团结工会提供会议场所，允许他们享有舆论工具，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手段。声明敦促波兰当局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制止反苏行径。

在此之前，塔斯社多次就波兰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评论，认为大会越来越明显地露出它的反革命倾向，这是一次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是一场公开反党反政府的斗争。塔斯社的评论还指出，这次大会致苏联、东欧各国劳动者的公开信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赤裸裸的挑衅和厚颜无耻的文件”。

11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谈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主要内容是：1. 任何有限的核战争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区挑起核战争，它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全球的性质。2. 苏联的军事理论也是防御性质的。这种理论排除了先发制人的战争和“第一次打击”的概念。3. 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上提出了防止核浩劫的倡议，其主要之点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4. 现在北约和苏联的欧洲中程核武器大致均等。如果西欧再部署572枚美国新式导弹，则在运载工具方面，北约将取得一半的优势，而在核弹头方面大约将取得一倍的优势。现有的大致均势将遭到严重破坏。5. 苏美即将举行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6. 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在各级进行了长期的和困难重重的谈判。7. 关于监督

问题,苏联认为国家手段能保障应有的监督。8. 苏联同意把信任措施扩大到苏联的整个欧洲部分,但同时也期望西方采取相应的步骤,把靠近欧洲的岛屿,有关的海域和大洋水域以及它们的领空包括进来。9. 苏联赞成北欧、巴尔干、地中海无核区的主张。

11月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康·巴伊巴科夫《关于苏联1981年至198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和苏联198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苏联财政部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82年苏联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决议。

12月7日 塔斯社就波兰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和各地区分会主席在华沙南部拉多姆举行联席会议发表评论。评论说,拉多姆会议使团结工会走上了公开夺权和破坏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轨道。12月10日和12日,塔斯社继续发表评论。评论说,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发出要消灭共产党的叫嚣,个别人还对苏波边界提出疑问,篡改苏军解放波兰的历史,团结工会领导人在拉多姆会议上彻底暴露了自己反社会主义意图,瓦文萨搞两面派,完全暴露了反革命阴谋,说波兰政府应给他们以罪有应得的反击。

12月14日 波兰13日零时开始实行军管后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声明说,波兰国内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行动对波兰履行华沙条约同盟职责构成直接威胁,它直接涉及华沙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和利益。波兰军管是为了捍卫法制和恢复社会秩序,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苏联领导和全体苏联人民正关切地注视着波兰及其周围的事态。

12月2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答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问,主要内容是:1. 苏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成功的关键,就是双方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协议应考虑双方不同武器系统的特点,考虑苏美地理位置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不同。2. 赞成举行苏

美最高级会晤,但要作相应的准备。3. 为了避免爆发战争,应当减少刺激军备竞赛的危险情绪,应当缓和过分紧张的局势,消除危险局势的危险策源地,应当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限制和减少军备问题。4. 希望美国排除在贸易、文化、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人为障碍。

1982 年

1月24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反驳意大利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国际政策问题上对苏共的批评。《真理报》说，意共完全忽视苏共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加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对外政策，在一切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相对抗的行动纲领。文章谴责意共同情波兰团结工全中的极右派分子，为北约集团涂脂抹粉。同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2期也发表文章，指责意共领导早就有意背离马列主义转向同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格格不入的立场上去，中伤苏波关系，同帝国主义政客同流合污。

《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反驳文章前，意共中央总书记贝林格曾指出，东欧各国照搬苏联的模式给他们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和损失。苏联在国际活动中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的立场和行动，背弃了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意共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苏联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是违背和平的，意共坚决反对。

1月2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病逝。他是苏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长期主管意识工作和国际共运工作。苏斯洛夫1902年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2月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1947年当选为中央书记，1952年10月当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改称苏共中央政治局后，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63年7月曾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2月22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文章说,苏共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是党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一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发展具有综合性质,经济任务与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任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宪法上肯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历史经验证明,哪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和权力削弱,哪里就会出现混乱,社会主义成果就要受到威胁。

2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苏共历史问题》第2期发表文章《全党的重要问题》,就完成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党的计划时,如何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工作作风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党的领导的实质及其决定性环节,众所周知,这就是选拔、配备和教育干部,以及监督和检查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最近几年来,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改进党组织、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干部的质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契尔年科指出:“党的工作人员更加充分地掌握政治方法,用以管理社会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和精神发展过程,这是同完善干部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少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特别是不少具有高度技能的青年专家已被提拔到极为重要的岗位上”。他强调“在这方面认为重要的是,提拔的同志除了要经过相应的政治训练和专业训练、善于做人的工作外,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也就是常说的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们的需要和利益”。

契尔年科还强调了加强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所要求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坚决使生产转向集约化的方针所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大大提高,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人”。“党认为,监督和检查的职能,不仅是党

的机关的权利,而且也是它们必须履行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说得对,对执行情况的检查仍然是相当多党组织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党正在坚定不移地改进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的制度”。

契尔年科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在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活动中,如果不恪守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如果不寻找最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办法,把民主原则与集中制原则结合起来,那么,完善党的领导作风和方法、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

3月1日——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赴苏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会谈。勃列日涅夫认为波兰实行军管是及时的措施。苏联将继续给予波兰援助:1. 帮助波兰克服由于西方经济制裁而加重的经济困难;2. 在最近两三年之内向波兰提供原材料,以使波兰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利用,避免工人大量失业;3. 今后苏联同波兰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长期合作。勃列日涅夫还谴责了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加紧向波兰施加压力。

3月1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宣布:苏联决定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 SS——20 中程导弹,并停止用 SS——20 导弹来更换 SS——4 和 SS——5 导弹。勃列日涅夫还重申,只要双方谈妥暂缓部署,苏联为了表示诚意还准备单方面减少自己在欧洲的核武器。但是,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仍要实施在欧洲部署新导弹计划,那么世界上会出现另一种战略局势,就会对苏联及其盟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这将迫使苏联采用相应对策,使另一方,其中也直接包括美国,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3月24日 《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发表该刊主编里·科索拉波夫的文章《苏共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次对研究发达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贡献》。文章说,发达社会主义是基本上打破阶级界限的社会制度,公民很容易从一个劳动者社会阶层转入另一个社会阶层。现在苏联社会的特征是,一方面社会的宏观结构简单化;社会阶级差别迅速消灭;另一方面社会的微观结构复杂化;非阶级差别的日常作用相对增长了。无阶级社会结构的形成将主要和基本上发生在成熟社会主义的历史范畴内。在这一社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变革中心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更加巩固,党作为新条件下的领导者的作用将继续增长。

同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对华政策的重要讲话。他说,尽管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观点,但苏联从来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生活,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威胁,也没有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准备讨论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相互信任的可能措施;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

3月24日——4月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出席越南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戈尔巴乔夫向越共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授“列宁勋章”。

4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大会,并作题为《列宁主义是群众革命精力和创造精神取之不尽的源泉》的报告。他说:“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同抽象的刻板公式和模式格格不入的。每一个执政党,根据具体情况以及民族特点和传统,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谈到社会主义模式时,他指出:“有人说,某些社会主义国

家遇到的困难,似乎是由于苏联‘模式’被强加给这些国家引起的。这真是奇谈怪论。只要不抱成见地看一看现实,就可理解这种说法荒谬已极。不论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例,到处都可明显地看出独有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特点”。

安德罗波夫还指出:“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符合这一国家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如果在形形色色的关于‘模式’的谈论的遮掩下,社会主义的实质本身及其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的概念被弄得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那就应该来辩论一番了。而且,当有人竭力诬蔑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经验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实际上遭到否定的时候,那当然就要进行坚决驳斥。”

关于国际形势,安德罗波夫强调:“我国人民确信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为此,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各国政府,各政党和珍视各国人民未来和人类未来的政治活动家都要积极地行动起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苏联的政策有效地为和平事业服务,启发群众,揭露军备竞赛和侵略的辩护士的阴谋。苏联的政策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为这些目标服务,而且也以自己的一切行动、各项和平倡议为这些目标服务。”

4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发表文章《苏联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和加强这种作用的重要条件——论意识形态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统一》。文章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切实保证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和统一,即使在社会主义胜利后也仍然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提高共产党员在实现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创造性的、复杂的任务方面的先锋作用,一个极其重要的潜力在于各级都把意识形态工作和组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发达社会主义问题,契尔年科认为这个概念“具有杰出的意义,它已经成为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用以确定我们党在一

个长的历史时期的战略和策略,确定党在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方针”。“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使党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现实辩证法,使我们对新社会的社会主义阶段本身持续的时间以及在这个阶段内取得进步的远未用尽的潜力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起来”。

契尔年科强调,“在发挥发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方面出现新的、更广泛的可能性,要求采取新形式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要求把它们更加牢固地统一起来”。“可是还有一部分(尽管是不大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干部想脱离组织工作,他们把事情说成这样:意识形态的全部任务就是进行鼓动和解释,而组织工作则是别人的事。无须证明,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当然,意识形态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本身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既不应该把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归功于它,也不应该把现有的缺点都归罪于它。只有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相结合,才能保证有所前进,因为这种结合使组织工作追求的不是所进行的活动的数量和人们常说的‘涉及面’,而是具体的最终结果”。

契尔年科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强调,现在要求有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强党和经济工作的各个岗位。苏联目前有近三分之一的市委和区委书记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人。在现代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培养干部的主动性,独立自主能力,勇于承担责任,在需要时敢于担风险,而消极情绪带来的损失有时比工作中的缺点更大。

5月18日 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共青团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会谈的苏方三原则:1. 谈判确实要以限制和减少战略武器为目标,而不要为继续军备竞赛和打破业已形成的对等打掩护;2. 要考虑到彼此安全的合法利益并应严格符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3. 必须保留早先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还

说：“苏联主张开始苏美限制和减少战略武器的谈判，并愿意商定：就在现在，在谈判即将开始的时候，就把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武器冻结起来，在数量上加以冻结。要最大限度地限制战略武器的现代化。”勃列日涅夫拒绝了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削减美苏战略武器的建议，他认为这一建议是片面的，不切合实际的，是不真诚的，直接损害了苏联的安全。

5月2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 就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关于1990年前苏联食品纲要及其实施》的报告通过决议。2. 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选举苏共中央书记弗·伊·多尔基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全会还通过了改进农业管理等决议，作出在农村推行集体承包制的决定。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说，食品纲要的出发点是减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苏联决不允许别国利用出售粮食作为它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同日，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提议，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1990年前苏联食品纲要及其实施》的决议，并批准了有关的6个决议。

食品纲要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国家已经增长的经济潜力，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稳定地供应居民各种食品；大力改进饮食结构。食品纲要的具体内容是：1. 发展农工综合体的基本任务，规定1981——1985年要满足与改善面包、食糖、谷类、蛋类、鱼类、人造奶油与果品的供应，1985——1990年要明显提高肉类、消费品。199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肉与肉制品70公斤，鱼与鱼制品19公斤，奶与奶制品330——340公斤，蛋260——266个，食糖45.5公斤，蔬菜与瓜类126——135公斤，水果与果酱66——70公斤，粮食制品135公

斤。2. 关于食品商业的组织工作和食品主要品种生产,规定了农产品的生产计划。1981——1985 年平均谷物产量增至 2.38——2.43 亿吨,1986——1990 年增至 2.5——2.55 亿吨。3. 发展农工综合体的物质技术基础。4. 为农工综合体各部门保证提供运输、包装和包装材料。5. 加强科学在现实食品纲要中的作用。6. 改善农村的社会生活条件。7. 提高农庄、农场、农工综合体的其他企业与组织的效率。8. 各加盟共和国在实现苏联食品纲要中的基本任务。9. 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

同日,苏共中央《关于派领导干部和专家进一步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高他们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和责任心》的决议在《共产党人》杂志第 9 期公布。决议指出,现在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要是经验丰富、有专门知识、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是有才能的生产组织者,劳动集体的教育者。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州党委、市党委、区党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边疆区、州、区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各农业机关,要选派业务能力强、思想成熟、并能保证完成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实现农业集约化和提高农业效率、真正实现食品纲要这一新的庞大任务的领导干部和专家来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特别重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干部和专家的威信、以及他们在管理生产中的作用。停止毫无理由地调动人员的做法。把对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同对其工作的高度要求结合起来、把集中领导同发展经营的独立自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

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的职责是:坚决发扬和鼓励领导人员和专家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他们忠诚老实、谦虚谨慎、坚持原则和对缺点毫不妥协的品德;提高他们对贯彻党和政府的决定、遵守计划纪律、财经纪律和生产纪律的个人责任心;严格遵守对领导干部和

专家作鉴定的制度,提高这种制度的作用,把它作为全面评价领导干部和专家的职业素养、以及在组织集体劳动方面的才能的一种手段。

6月1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出席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国内继续对苏共中央五月全会(1982)的材料进行广泛的讨论。党提出的食品纲要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全体苏联人民对全会决议一致表示热烈赞同是理所当然的。他强调说:“五月全会上讨论的问题是有巨大重要意义的问题。全会上通过的决定是能管许多年的纲领,因此,如果我说这次全会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想必不会有错。它的决议是一些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决议,将对我们社会的生活产生特殊的影响”。“我们党不止一次地研究过有关人民生活、党的活动、巩固国家实力和发展国家国民经济方面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并提交全体劳动人民讨论。因此,苏联人对党的计划一直感到称心,并尽一切力量予以实现。由于全民的支持,已实现了许多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计划”。

契尔年科认为苏共中央五月全会的决议有如下特点:“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考虑到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且还有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所有兄弟国家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对国民经济进行深刻的、触及一切基础的改造”。“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象我们这样强大的党、象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制定的一项就其规模和目标来说都是空前的行动计划”。“从理论角度来看,这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我们的一般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政策和实践的全部学说方面的知识”。

契尔年科在报告中还明确了1990年前苏联食品纲要规定完成的三项相互联系的任务:其一,大大增加农产品生产并更加充分地满足居民对食品的需求,为此建立足够的储备。其二,保证充分供应本

国的食品和饲料资源,减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农产品,逐步扩大小麦和某些其他种类的农产品出口。其三,将农业和为其服务的工业运输、商业部门联合成统一的综合体,使它们的活动服从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更多地供应居民各种高质量的食品。

7月8日 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里根,反对美国派军队去黎巴嫩。信中表示,如果美军进入黎巴嫩,苏联将根据这一事实来确定自己的政策。21日,勃列日涅夫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讲话,再次重申坚决反对美军进入黎巴嫩。他还说,黎巴嫩事件一直处在苏联领导注意的中心。当前最刻不容缓的是解除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的包围。苏联不反对使用联合国部队,使保卫贝鲁特西区的力量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

8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苏联》杂志第8期发表文章《自由的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纪念苏联成立60周年。文章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是由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准备好的。它成了居住在俄国的各族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那些年代的历史文件把关于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的情况,以及各县、乡、省和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情况留传给我们。这些会议是一种独特的全民投票,人民在会上斩钉截铁地对各民族自愿的联合表示赞成”。“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建立,既有其内部原因,又有其外部原因。其内部原因是:如果没有紧密的联盟,要治好战争年代的创伤是不可思议的;其外部原因则是:如果没有紧密的联盟,面对着众多的外部威胁,要维护、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想象的”。

契尔年科指出:“共产党并没有说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是的,共产党人已把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形式的民族问题解决了,民族的不和睦消失了”。“今天,党把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友谊,增强每个共和国的物质潜力和精神潜力看成是自己在

民族政策领域中的任务。而这要求把共和国的发展同整个国家的发展协调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共产主义建设的整体利益”。“我们党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时刻关心苏联人的福利。在这方面,它从来也没有在任何程度上突出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民族,它注意的中心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

契尔年科强调指出:“党经常注意民族政策问题。党的代表大会必然讨论这些问题。在苏共中央全会工作中,在国家机关的法律和其他决议中也都考虑这些问题,党在执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中的这种始终如一的做法会产生百倍的效果。”

9月2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在巴库举行的为阿塞拜疆荣获列宁勋章举行的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关于苏中关系,再次提出了正常化的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在合乎常理、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逐步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将对加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作出的良好贡献。

10月2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苏联陆海军领导成员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世界局势在继续复杂化。美国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攻势,并使战备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他认为现在世界政治中有两条路线在发生冲突。美国及其追随者的路线是加剧紧张局势,尽力使局势尖锐化。苏联的路线是缓和与加强国际安全。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为了使军队永远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人民是一切都在所不惜的。我们正在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和兵器装备武装力量,党中央采取的措施是使你们什么都不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武装部队的物质基础。

关于苏中关系,勃列日涅夫认为,同中国的关系有不小的意义。“我们真诚地希望同这个国家关系正常化,并正在这方面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北京现在也说愿意正常化,至今还未看到中国对外政策中

有原则性的变化。但是,对正在暴露的新因素我们不应忽视。”

10月2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第比利斯授勋大会上就苏联内外政策发表讲话。关于苏中关系,他说,苏联真诚希望与伟大的中国邻居关系正常化,坚信这将有益于苏联,有益于全世界的事业,谈到苏美关系时,他表示苏联不会被美国的制裁和好战姿态所吓倒。苏联反对苏美关系进一步紧张,主张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得到改善,愿意举行能考虑到双方利益的求实而认真的谈判。

11月7日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十月革命65周年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他说,帝国主义在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规模的进攻已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然而苏共和苏联人民决不会在困难面前后退。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战争冒险的爱好者任何时候都不会使苏维埃国家措手不及,使潜在的侵略者知道:他必然遭到毁灭性的回击。他强调指出:苏联的实力和警惕性,是会使某些帝国主义政治家过分狂热的头脑冷静下来的。

11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因病去世。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的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书说,勃列日涅夫的全部的活动和个人的命运是同苏维埃国家历史的各个重要阶段分不开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伟大卫国战争后复兴,开垦生荒地和组织宇宙研究工作——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光荣儿子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生平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他在制定和实现提高人民福利的方针,在进一步加强苏联经济实力和国防威力方面引起了卓越的作用。

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体会议。非常全会的主要内容是选举尤·弗·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受政治局的委托,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中央非常全会确实具有紧急性。国家和党都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与世长辞了”。

“我想以政治局的名义表示深信：我们这次全会将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党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举行现阶段在苏共二十三大至二十六大的各项决议中作了充分明确的表述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将深信不疑地、始终如一地、目标明确地贯彻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制定和实施这种政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契尔年科还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委托我向全会建议选举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全体政治局委员认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出色地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勃列日涅夫对人民利益的关心、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态度及其全力打击侵略者阴谋、维护和加强和平的决心”。“党所要求的谦虚精神，对他人意见的尊重，对集体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些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固有的品质。政治局一致认为，安德罗波夫同志不会辜负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党的信任”。

在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前，安德罗波夫也讲了话。他说，当勃列日涅夫“把他的思想和努力倾注在解决苏共二十六大及随后几次中央全会所拟定的重大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任务上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实现这些任务，始终不渝地执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制定的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针，乃是我们头等重要的职责。这也将是我们对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位领导人的最好的悼念。

11月15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列·伊·勃列日涅夫追悼大会。新选出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追悼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在苏联人民为巩固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实现列宁的遗训，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我国的自由和独立而忘我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成长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之一”。他代表苏共全党及它的中央委员会表示，“决心

坚定不移地执行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良好影响下制定的国内外政策中的战略路线”。

安德罗波夫还说：“苏联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党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及其集体领导机构周围，表示支持党的政策，无限地信任党。党今后仍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扬苏维埃社会的民主原则，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巩固苏维埃社会的民主原则，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兄弟民族的友谊。苏共中央委员会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体现苏联人民的意志”。

除苏联党政领导人外，出席追悼会的还有保共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卡斯特罗、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罗共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老挝国家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韩桑林、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卡尔迈勒、中国外长黄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

出席追悼会的还有美国、法国、意大利、智利、乌拉圭、葡萄牙共产党的领袖；印度、叙利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的总统、总理、执委员主席或副总统。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出席了追悼会。

11月2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听取、讨论并批准1983年苏联的计划草案和预算草案。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会上讲了话。他认为计划草案的特点是“规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国民收入的绝对增长额、工农业产值的绝对增长额和零售贸易额。规定在提高国民经济效率方面继续进行工作——要在较少地增加物质消耗和资力资源的情况下完成紧张的任务”。“预算

草案保证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拨款”。

安德罗波夫同时指出，“我想请你们充分地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上，五年计划头两年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这自然也将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草案有所影响”。

他还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他说：“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能使我们满意。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尚未解决。产品的材料消耗量实际上并未降低”。“计划依然是用消耗大和生产费用高的代价来完成的”。“惰性、旧习惯还在起作用。看来，有人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干工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当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把科学技术成就和先进经验广泛而又迅速地运用到生产中去，在这些方面去挖掘这种潜力”。同时“合理利用物力和劳力”，“节约和勤俭地对待人民的财产”。关于实现1982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提出的实现食品纲要有关问题时，他说：“实现食品纲要并非一年的事，这是对的。但我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明另一点，完成食品纲要要是不能拖拉的。农工综合体的工作人员应该日复一日地加紧努力和劳动，使用于完成这项任务的巨额资金今天就能产生效益，而明天能够获得更大的效益”。

关于苏联对外政策，他说：“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党二十四大、二十五大、二十六大的决议所确定的那样。保证持久和平、保护各国人民的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权利，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不变目标。在争取达到这些目标的斗争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将是有原则的、一贯的、审慎的”。

12月2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出席莫斯科举行的苏联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并作报告。他说：“各个共和国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帮助和相互联系结出累累硕果，把苏联大小民族的创造力量引上统一的轨道。我国每个社会主义民族的全面发展，理所当然地促使他们日益接近”。“我国各族人民对俄罗斯人民

表示特别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俄罗斯人民的无私兄弟援助,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已经自然地进入了各民族千百万人的生活中的俄罗斯语,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在我国各大小民族的接近方面,在他们共享世界文明的财富方面,都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因素”。

关于国际形势,安德罗波夫强调:“不能允许爆发核战争,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是有限的还是全面的,制止新的战争贩子,这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我们主张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大家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幸福进行广泛、卓有成效、不对别人发号施令、不干涉别人事务的合作”。

12月3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答美国政治评论员金斯伯里·史密斯问,内容涉及苏美关系和两国在核武器问题立场上的分歧等。安德罗波夫说:“苏联人和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战争威胁和加剧战争威胁的一切东西”。

关于核武器问题,安德罗波夫说:“在战略武器方面,我们建议双方从现在起就停止进一步增加这种武器,也就是说冻结在现在的水平上,然后每一方都将现有的数量大约削减25%,使其达到同等水平,然后再进一步削减”。

“我们建议对欧洲地区的核武器采取各种处理方案。要么在欧洲地区根本不要核武器,不管是苏联还是北约国家,都不在那里部署中程核武器,也不部署战术核武器,就是说双方都是‘绝对零点’。要么是双方把自己的中程核武器(导弹和携带武器的飞机)削减2/3以上。这样,在这里就将根本不存在苏美相互对峙的中程导弹,而苏联将只保留同英国和法国数目相等的这种导弹。在飞机方面,我们主张在比现今低得多的水平上保持双方完全相等的数量。总之,我们不想在欧洲地区比北约国家多一枚导弹,多一架飞机”。

12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

题》杂志第12期发表文章《各族人民兄弟友谊60年》，纪念苏联成立60周年。他说：“正当苏联各族人民和他们的朋友们庆祝苏联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工农统一联盟的多民族国家成立60周年的时候，尤为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各项重大改革以及我国深刻的社会进步的世界性历史意义，是同下述事实的伟大意义分不开的：正是苏维埃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完成了大胆的创举。十月革命解决了根本的社会问题，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同时也解决了民族问题，消灭了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民族压迫，保障了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平等，正因为如此，我国在过去的年代里才能够变成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时期里，我国各民族在列宁的共产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为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

契尔年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的发展具有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它们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它们不断接近，这两种倾向的关系问题常常引起争论”。“只有持极端机械论的态度的人才会硬说各民族的进步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苏联社会的统一，将来势必引起苏维埃联盟的崩溃，那些专门歪曲苏联民族关系的西方苏联通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

关于苏联和国际主义原则问题，契尔年科说，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各族人民交往的新形式首次在苏联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来，这种形式就是加入了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各民族友好与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大家庭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的经验丰富了社会实践。不能不看到这些体现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现象有着相似之处和联系，虽然它们之间当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1983 年

1月7日 苏共中央召集党政各部、工会、共青团和人民监督委员会负责人开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问题。会议强调,对生产劳动好的应给予应有的奖励,对工作差、不遵守纪律者要使其物质报酬受到直接影响。

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关于加强纪律的指示而召开的。苏共认为,整顿经济领域里严重违犯纪律的现象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任务。苏共领导和《真理报》等中央报刊反复强调的口号是“一切从纪律开始”。

1月1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基谢寥夫病逝。基谢寥夫 1917 年生于白俄罗斯,自 1980 年起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

1月3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会见莫斯科奥尔忠尼启泽机床厂职工时,强调加强劳动纪律,生产更多的商品的问题。他说,加强劳动纪律不仅是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这还涉及到从部长开始的所有人。“没有必要的劳动纪律、计划纪律和国家纪律,我们就无法迅速前进,整顿纪律确实不需要任何投资而效果将是巨大的”。他认为,苏联在生产中,物力、财力和劳动力的消耗过大,结果造成生产发展同居民现金收入的增长之间比例失调。他批评在执行计划过程中修订指标,降低产量而工资不变的现象,甚至有时还要为完成降低了的计划支付奖金。

他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虽不能把

一切都归于纪律，“但应该从纪律开始来抓”，“做到人人完成定额，生产更多的商品”。

2月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他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我们已建立了强大的、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它能够提出并解决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国民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当然，我们的这些可能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在这方面既有一些问题，也有严重的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来源是不同的，然而，它从来都同已确立起来的并证实了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本质无关。相反，有时破坏我国国民经济这些或那些部门正常工作的相当大一部分缺点，都有着自己的、偏离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的准则和要求的原因”。

安德罗波夫认为，“尽管苏联经济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它们总的汇合成一项任务：保证增加劳动人民的福利，为其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进一步丰富多彩及社会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创造物质条件。这种情况也决定着苏共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它反映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文件中，反映在目前正在执行的食物纲要中，反映在党就具体国民经济问题作出的决议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他认为这“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本身也在发生质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它已反映在1977年会民通过的苏联宪法中。苏联宪法为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打下了立法基础”。

谈到提高生产和整个经济的效益问题。他认为，苏联已深刻意识到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这是苏联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这个问

题的解决并不如期望的那样顺利。

他谈到苏联的巨额基本建设投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益和科学技术成就,未能以满意的速度应用于生产的原因时说,这首先是在完善和改革经济机制、管理方式方法方面的工作,落后于物质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水平提出的要求,其次是农作物连续4年收成不好,同时还必须把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开发苏联北部和东部的燃料动力资源和原料资源。他认为应有相应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在苏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安德罗波夫明确提出与勃列日涅夫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党和人民面临着大规模的任务。总的说,把这些任务归纳起来,可以称之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并随之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国处于这一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当然这个阶段也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步骤。只有经验和活生生的实践才将表明,这些时期和步骤将持续多久和采取哪些具体形式”。

3月15日 苏联等11国的党中央书记会议在莫斯科闭幕。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会见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蒙古、老挝和古巴党的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会员、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致开幕词,各党的中央书记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了国际形势、意识形态问题和加强各党在对外政策宣传报道中的合作问题。

3月19日 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农业会议上说,应该把今年作为普遍推行农业集体承包制的开始阶段,以期在本五年计划期间,把这一先进组织形式在苏联所有农村牢固地建立起来,他认为苏联农业和畜牧业目前面临着提高产量、产品率 and 基本投资效率等尖锐问题,需要实行直接同最终成果相联系的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实行集体承

包制。

去年5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在农村推行集体承包制的决定后,进展缓慢。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目的是加速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

3月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莫斯科市委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办各种展览。中央列宁博物馆举办了《马克思与革命的俄国展览》,展出了马克思读过、并作了批注的俄国人写的历史、经济、农业、统计各方面的书籍,以及马克思学习俄语时用的赫尔岑著的《监狱与流放》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则展出了反映马克思生平和革命活动的照片,马克思的部分手稿及用各种文字出版的马克思著作。

4月1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举行的讨论农业问题的各加盟共和国和州党组织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保证完成农业计划。他说:苏联今年农业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完成计划规定的农作物产量和巩固畜牧业中已出现的积极变化。他认为,农业情况现在还是复杂的,近几年来天气一直不好,同时工作中也有严重的疏忽。他认为应提到科技成果在农业中推广迟缓和农业机器使用不善的问题。此外,还应首先保证种植业的稳定和大大提高其单位面积产量。

安德罗波夫还提出改善居民的食品供应问题和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纪律,改进计划工作和完善经济机制等问题。

5月9日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38周年的文章中透露,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同时兼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他在文章中写道,安德罗波夫时刻关注加强苏联“国防能力和陆海军实力问题”。

5月2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佩尔谢逝世。佩尔谢1899年生于拉脱维亚,1915年入党。他自1959起任拉脱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以来任苏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6月14日——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详尽地和深入地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迫切问题。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决定了一些人事变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索洛缅采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维·伊·沃罗特尼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谢·阿·赫罗梅耶夫等5名中央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

中央全会还决定把前苏联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从中央委员会开除，由于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苏共中央政治局原有15名成员，目前剩11名。这次全会没有选出新人补上空缺。

6月1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题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迫切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中央1979年4月26日的决定、苏共二十六大的材料以及党的其他文件，确定了在目前条件下的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这次全会的目的，是讨论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研究一下今后该怎样做。

契尔年科对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提出批评，认为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及其他学术机构“只埋头于自己的‘论文’，热衷于小集团的利益，选题琐碎，党的影响薄弱。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社会科学部、各级党组织应该更加

重视科研的计划和组织工作问题、学术集体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他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以下要求：1. 研究工作应当从存在的现实出发，考虑到它的各种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更充分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 学术机关应当更富有成效地和灵活地进行工作。生活是不会按照一次定出的蓝图发展的。事态往往会发生出乎意外的转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应当善于及时地集中科研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3. 关于科学规律和范畴的辩论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应带有孤芳自赏的、繁琐哲学的性质。党希望，通过科学研究工作，将更加经常地出现一些好的切实的建议。4. 科学工作者应当更好地着眼于未来，及时地“捕捉”正在成熟的趋势。我指的是作出可靠预测，有了这种预测就能够更好地看到明天，作出有根据的决定。

契尔年科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应当遵循革命的理论，善于运用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探索方法。不言而喻，新的事实可能导致对业已形成的观点加以补充和说明的必要。但是，也有一些不容更改的真理和早就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科学的基础上而‘忘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6月1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讲话，阐述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要任务，这就是：1. 必须坚持把我们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工作、宣传工作提高到适应党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过程中正在解决的那些重大而复杂的任务的水平。尽管它们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十分重要，但是意识形态工作仍然越来越被提到首位。2. 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教育和培养手段。要更正确地利用所有这些手段、更加积极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手段，特别要考虑到苏联人大大提高了的教育和需求水平。3. 干部问题。各级党委都应当拥有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干部，他们有能力妥善地组织对各种居民集团的意识形态工作，并对这项工作负责。4. 应当保证使社会科学，首先是经济科学领域中的思

想理论工作以及我们的科学机构和每个科学家的工作达到新的、高得多的水平。必须坚决地转到解决生活向我们社会提出的现实而实际的任务方面来。5. 我们的政治教育和群众性政治学习网的工作作风的改变应该发挥巨大作用,必须首先肃清形式主义,消除机械地、脱离生活实际地背诵(或照本宣读)某些普遍原理的作法。6. 在整个教育和宣传工作中,应当始终考虑人类正在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而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政治方针对抗的激烈尖锐程度在整个战后时期是空前的。

安德罗波夫指出,党的现行纲领中的某些论点,“应当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完全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因为里面有些内容脱离现实,超越了时间的发展,写得琐碎而缺乏根据。况且,20年来,无论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中,还是在整个世界发展中,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安德罗波夫强调指出:“政策上犯错误,就要付出代价。当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削弱时,就会出现滑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党同人民丧失联系时,在所出现的真空中就会出现一些冒充劳动人民利益体现者的人。不回击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出现国家间的冲突”。

6月1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向第十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八次会议提议,选举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契尔年科说:“这个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讨论过了。全会完全一致地认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同志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是适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认为,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在我国对内

对外政策中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不断增长,苏联人和外国人完全有理由把这一点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威望不可分割的证明,看作是党和人民的理智和意志统一的表现”。

契尔年科强调,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符合我们社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有助于顺利实现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历史性规划,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7月 苏共中央决定,从1984年初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试验。这一试验首先从5个工业部门所属的工业公司(企业)开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权利和加强企业责任制,目的是调整国家与企业、集中与民主的关系,同时将扩大企业权利与加强企业责任密切结合起来,实行以经济定额为中心环节的生产责任制,充分发挥企业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这一改革试验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生产计划,扩大企业计划和安排生产的权利;2.严格限制中央各部门对企业的监督范围,使企业指挥生产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3.扩大企业的人权与财权,企业职工人数不再由国家计划规定,改由企业自行决定;4.在利润分配和信贷制度上实行灵活政策,经营得好的企业可以分得更多的利润,并可得到优惠信贷;5.扩大企业对职工工资与奖金的分配权。

8月1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苏共老党员。他在讲话时强调反对不良现象,改进计划管理和经济机制。他指示,苏共最近几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远没完成,经济转上集约化发展轨道的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是未能有力地寻找完成新任务的途径,采取措施往往不彻底,没有很快地克服惰性。

他说,在一部分苏联青年中存在着对他人的依赖性,对劳动和社会生活持消极态度,缺乏纪律性,同这些现象必须进行斗争。他还说,现在必须补救已经失去的东西,改进计划、管理和经济机制。他认为

应建立高度的劳动文明来保证生产秩序和纪律。同时他还认为,由于苏联经济规模大而复杂,所以在作变更时必须特别谨慎。

8月2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谈苏中关系。他说,近20年来苏中关系一直不正常,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但是,双边关系的现有水平还远不是我们认为苏中两个大国和邻国之间应有的水平。在进一步扩大贸易,安排经济和科技合作方面在文化、体育和其他交往方面还可以做许多工作。在共同制订和实施苏中边境地区的信任措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我们还准备同中国就世界发展的根本问题,首先就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政治对话。

安德罗波夫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尖锐化的情况下,苏中关系健康化特别重要,特别迫切。

8月28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公布《关于加速国民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说,在未来几年内,工业应该采用先进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保证产品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

决议要求政府各部为各种机械产品制订不同的更新期限标准,并从1986年起,根据这些标准规定5年和各年度的新产品试制投产任务,以及停止制造旧产品的任务。决议还规定对完成或没有完成任务的企业领导人分别给予奖励或处分。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要求各经济部门采取措施,发展科技事业,认为它是经济集约化的决定性条件。

9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发表文章《全党的事业与每个共产党员的职责》,论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3年)的内容及重大意义。文章说:“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发展了苏共二十六大和中央十一月(1982年)全会的论点,在六月全会上提出了有长远意义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广泛概念。

一些深刻的新思想丰富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宝库,这些思想既来源于今天的现实,又照亮了继续前进的道路”。“六月全会是在党与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和我国社会的团结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召开的,它激起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愿望,要更加意气风发和坚持不懈地为实现既定计划而斗争,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契尔年科在文章中还提出了贯彻六月全会所应注意的问题:1. 应当使全体党员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决议要求进行长期而系统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全面地、有计划地完善发达社会主义。2. 必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共产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发展的迫切问题,与加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辩证地互相联系在一起的”。3. 意识形态工作是统一的整体。整个思想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意识形态机构、舆论工具和宣传三者密切配合,吸引最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这项工作,并始终依靠他们。4. 应当发扬和丰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传统,提高宣传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始终应当看到人和他的独特的个性、内心世界、切身生活经验、欢乐和悲愁、心事和意愿”。5. 坚决根除大吹大擂、装潢门面和文牍主义的风气,因为这种风气到头来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我们不应根据活动、会议和通过的决议数量,而应当根据群众的劳动和政治积极性这个主要标准来评价各级单位和每个环节的意识形态工作。

10月2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关于正在日内瓦进行的苏美限制欧洲核武器谈判的状况及进展,安德罗波夫说,谈判没有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仍然陷入僵局。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声明和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发表的言论言行不一,其灵活性仅限于言词。“美国路线的实质并没有变化,仍然是通过在欧洲部署美国新导弹来保证美国取得对苏联的显著的军事优势”。

安德罗波夫强调：“我们在寻找具体的解决办法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灵活性，但要遵守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不应破坏在欧洲中程核武器上存在的均势。双方这种武器的水平可以而且应当大大降低，但必须使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保持不变”。他同时还表示，在这种原则性态度的范围内，我们表现出了灵活性和建设性。为苏联和北约规定出在相互可以接受的数量范围内的中程运载飞机的同等数量水平。即使这个数量范围很不同于我们早先提出的建议也好。这个水平的具体数值是可以商定的，也可以进一步明确受限制的运载飞机的成份”。

他认为“摆脱日内瓦谈判陷入僵局的出路是存在的。只要美国表现出真正愿意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则制定出一项协议本可不需很长时间”。他还表示，“在西欧出现美国的新导弹，现在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就不能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开始实际部署导弹，日内瓦谈判就可能继续进行”。

11月17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请美国实业家约翰·克里斯特尔把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表示愿意改善苏美关系，但美要有善意的口信转告美国《得梅因纪事报》。同日，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扎格拉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在不部署美国导弹的情况下，苏美日内瓦限制欧洲核武器谈判才可能继续进行。如果部署美国导弹，苏联一定将针对西欧和美国本土采取反措施。

11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11期发表文章《革命创造与和平的意识形态》。文章指出：“苏联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我们的社会需求极大地提高了，潜力也增长了，各项任务的性质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规模更大，形式更多，也更加复杂了。况且，这些任务需要在严重加剧了的国际形势下完成。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战争危险急剧增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双方的政治方针和针

锋相对的世界观的对抗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业已成熟了的经济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十分重要,但是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提到首位。它是全党的事业”。

契尔年科强调苏共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要求之一,是“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发展创造性原则”。他说:“全会为苏联社会科学规定的目标是:根据发达社会主义的各个基本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全面地研究发达社会主义。全会提示说,社会科学的职责就是对生活中的最新过程和现象敏锐地、有效地作出反应,对实践作出有根据的阐述,坚决克服形形色色的墨守成规、公式化、书呆子式的推理作风”。

契尔年科认为应避免两种错误。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要求防止夸大已经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采取这种现实主义就不应对我们的成就、成果、日益增强的潜力有任何估计不足之处。“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会使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力量,变意识形态为动员群众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项重大复杂任务的有效手段”。

12月26日——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苏联1984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没有出席会议,他向全会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改善经济管理是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强调改善对居民的食品供应,仍是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首要任务。

全会作出决议,支持苏共中央政治局去年11月以来的内外政策,支持安德罗波夫书面发言中关于发展经济的论点,赞同1984年的经济计划和预算草案。决议强调不能忽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这个战略问题,进一步搞好在一些工业部门进行扩大企业权力及加强企业责任心的试验。决议还要求各部门坚决完成或超额完成明年的生产计划。

全会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

特尼科夫和苏共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共中央组织党务部部长利加乔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1984 年

2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病逝。安德罗波夫1914年6月15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铁路员工家庭。1962年——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年——198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7年6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升任正式委员。1982年5月重新当选为中央书记。1982年11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0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就安德罗波夫逝世发表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书，并宣布组成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安德罗波夫的遗体安葬在红场。2月11日——14日为苏联全国哀悼日。14日，在莫斯科红场为安德罗波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联党政领导人契尔年科、吉洪诺夫等参加了葬礼。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美国副总统布什、法国总理莫鲁瓦、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和东欧各国的党政领导人出席了葬礼。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主持葬礼并讲了话。他说：苏联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苏共二十六大和其后历次中央全会的决议来巩固和扩大苏联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积极进展，注重实干，取得实际成果。

2月13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委

员们给予我的崇高荣誉,选举我为中央总书记。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我明白,面临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同寻常的复杂。我向中央委员会和党保证,我将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知识和全部经验,决不辜负对我的信任,并同你们一道继续举行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地执行的我们党的原则性路线”。

关于国内工作,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善于及时地发现并支持人民的倡议、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加强秩序和纪律等。他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强调了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他说:“我国的整个经济机制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改造。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始。它包括进行扩大企业权利和加强企业责任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服务行业正在探索新的经营形式和经营方法。毫无疑问,这种探索将提供许多有益的东西,有助于我们解决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关于世界形势,契尔年科指出“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轻率的冒险行动今天给人类造成的威胁,并且大声疾呼地指出这一点,使世界各国人民注意到这一危险。我们不需要军事优势,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打破业已达到的军事均势。但愿任何人丝毫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今后仍将关心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使我们有足够的手段,能够使好战的冒险分子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3月2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会见莫斯科古比雪夫选区选民时,发表题为《人民和党团结一致》的讲话。他说:“在谈到今后计划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真理: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更好地工作。为了在实现我们的社会纲要方面顺利前进,必须使经济,首先是使经济效益得到稳定而迅速的提高”。他批评了国民经济的某些落后部门时说,“现在生产潜力远未得到充分

利用。机器制造业的试验基地十分薄弱，令人不能容忍。工业生产和建筑业中的重体力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比重下降得缓慢”。“我们非常需要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不断得到迅速的更新。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之一。不解决这一任务，社会就不可能前进”。

契尔年科还谈到了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他说：“党十分注意了解当前时期的特点，注意清醒地、毫不空想地确定我们的新社会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开端。正是解决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过程中，我们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他还说：“党所得出的这些结论的原则性政治意义，怎样评价也不为过。这些结论使人能更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十分复杂、充满矛盾和多种多样的发展情况。它们有助于切实消除在言论与行动之间、在社会实际条件与没有根据的预言之间时常出现的脱节现象。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着手进行起草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的”。

4月1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表讲话，谈完善和更好地发挥各级苏维埃的作用等问题。他说：“我们不断——特别是在通过苏联新宪法之后——扩大各级苏维埃的主权。这有助于在它们的活动中更充分地实施立法、管理和监督三者相一致的列宁主义原则”。可是，“必须承认，苏维埃的巨大潜力还发挥得不够”。“许多部门企图避开地方苏维埃来采取行动。它们集中力量搞工业项目的建设和改建，往往对住宅建设以及社会生活与文化设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苏维埃本身也并不总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方面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

契尔年科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应该利用党对苏维埃工作施加影响的所有方法，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消除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是当前现实提出的要求。这是对所有党委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对

共产党员代表的要求,党正是通过他们实施自己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的。在这里,他们作出榜样和对代表义务采取负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苏联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契尔年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为了苏联社会能满怀信心地朝着我们伟大的目标前进,每一代新人都应当具有更高的教育和普通文化水平,专业更加熟练,发挥更大的公民积极性。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规律”。他还宣布,“自9月1日起,将开始分阶段使教师和国民教育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提高30%——35%。这项措施将涉及600万人,一年约需35亿卢布”。

4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吉洪诺夫再次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月2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苏共中央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我们新社会在社会经济方面已经达到的成熟程度。在最近几年党的文件中得出了一个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的结论:我们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这就决定了党和苏联人民当前任务和长远任务的实质。在当前条件下,我们的纲领应该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纲领。正是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党的整个工作,其中也包括提高群众觉悟的工作,都应当从这一点出发”。

契尔年科认为“党纲应当尽量避免没有根据的许诺,避免作出很快就可以轻松地取得成就的预言。党纲应当引导人们为完善社会主义而进行高度紧张的大量工作,也就是说,去寻找具体途径来解决我们生活本身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复杂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就其性质和根源来说,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阶段的某些时期的”。

契尔年科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共始终如一的纲领性要求。因此，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高效益的经济，为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我国威力的不断增长奠定基础。党纲中应明确规定党的方针：在生产中大力采用最新科技成就，完善管理形式，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劳动积极性，我们的一切成就在决定性程度上都取决于此。两种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融合的思想，应在苏共纲领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5月4日——5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进行会谈。契尔年科强调：华约成员国的团结和一致，可以帮助我们击退阶级敌人。他还指责了国际反动派和波兰国内的反动势力企图阻挠波兰经济、政治形势稳定的进程。契尔年科和雅鲁泽尔斯基还在会谈中强调了东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6月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同来访问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就苏罗关系及国际问题举行会谈。契尔年科认为，进一步发展苏罗两国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潜力还很大。他指责美国追求军事优势，表示在西欧继续部署美国导弹的情况下，苏联不能接受恢复裁军谈判的主张。齐奥塞斯库对西欧部署美国导弹和苏联宣布反措施后形成的欧洲局势表示忧虑。他主张立即恢复苏美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在欧洲和全世界消除中程导弹及其它核武器。

6月1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和范文同。他说：“苏联方面坚决谴责中国当局对越南的敌对行为”，同时指责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这是契尔年科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在中越关系问题上第一次发表谴责中国的言论。

同日，契尔年科回答记者提问时向美国建议，苏美立即开始正式谈判，就禁止反卫星武器达成协议。契尔年科认为，应该在空间武器

尚未部署时就禁止这种武器达成协议。

6月12日——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主持经互会成员国最高级会议。除苏联外，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越南、蒙古的党中央总书记和政府总理出席了会议。契尔年科、日夫科夫、卡达尔、黎笋、昂纳克、泽登巴尔、雅鲁泽尔斯基、齐奥塞斯库、吉洪诺夫、胡萨克在会上发了言。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罗德里格斯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经互会成员国经济与科技合作基本方针的声明》和《维护和平与国际经济合作宣言》。

6月14日 苏共中央经济部第一副部长戈斯捷夫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从70年代以来，苏联向经互会东欧成员国提供石油是按国际市场前5年的平均价格来计算的，今后要更多地根据国际市场的浮动价格来计算。戈斯捷夫介绍了刚刚在经互会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经互会成员国经济与科技合作基本方针的声明》。他说：今后经互会最高级会议可能每5年举行一次，以便更好地协调各成员国的五年计划。

6月21日 《真理报》发表文章，否认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以及在远东扩充军备和部署大批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造成的军事威胁。文章说，这只是为了对付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升级。

7月5日 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证实，被赫鲁晓夫撤职并开除出党的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恢复党籍。

7月1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会见来苏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双方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契尔年科表示，苏联支持联合国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调解，同时还表示，苏联有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

8月2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根据1983年7月苏共中央决定开始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试验的初步结果。决定从1985年1月起，把改革试验推广到机器制造业、黑色冶金业、食品工业、轻工业、地方工业、服务行业等26个部门。这样，苏联国民经济各主要生产部门都将参加改革实验。苏共开始制定综合完善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纲领，主要内容是完善国民经济各级和各个环节的组织管理机构，包括明确管理机关和企业的职能、权利和责任，把国家利益和劳动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提高社会生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要求，改进国民经济的计划制度；提高所有经济杠杆和经济刺激办法的效能，包括价格形成、贷款和财政制度、对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法等等的效能。

10月2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同来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巴特蒙赫举行会谈。这是他在8月取代泽登巴尔以来第一次出访和第一次访问苏联。契尔年科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有助于亚洲大陆局势健康化。“苏联致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总是把同中国进行建设性谈判的大门敞开着”。他还指责美国在靠近苏联远东边界的地区继续增加军事战略手段。契尔年科还表示，苏联支持越南、老挝和金边当局把东南亚“变成和平与稳定地区”的纲领。

11月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67周年大会。葛罗米柯在讲话时说，苏联主张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使这一关系得到改善。两国代表继续保持接触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关于苏美关系，他说，苏联对美国不抱有任何敌意，并愿在加强国际安全方面同美国协同行动。但华盛顿必须抛弃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野心。他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执行好战方针，并说正是这种方针造成了紧张局势。

12月1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意识形态

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作题为《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的报告。他说：“中央委员会把举行这次会议看作是执行六月全会决议工作中的一个标界，看作是筹备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重要环节。我们希望深刻领会所积累的经验，认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由于国家面临着广泛的社会经济任务，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康·乌·契尔年科针对苏联社会已达到的社会成熟程度而提出的理论方针和原则，是党的战略方针和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基础。关于我们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个长期历史阶段的起点的结论，获得了深刻的论证。在这个基础上，党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正在具体化，提供了更好地认识用以指导行动的社会经济方针的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性目标越艰难，越伟大，越重要，群众积极参与达到这些目标就越重要。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产生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因素”。因此，“为了实现党所规定的历史性改造，应当把蕴藏在群众劳动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中的全部创造力量调动起来”。他认为要作到这一点的主要途径“首先是加强对人的关注。要在各个方面——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加强关注。这不仅指的是旨在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的社会经济计划的总方针，而且指的是我国社会各个环节及全部社会结构的工作实践的完善”。“对实际工作中的任何一个决定和任何一个步骤，首先都应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给予评价：它们将使人们得到什么，它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果如何。对客观情况的任何推诿都不能成为不关注人们的需要的辩护理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劳动者的利益格格不入的利益。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在强调指出党把关心人置于自己全部政策中心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不能放过问题的另一方面——关心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关心人对增加社会财富所作的劳动贡献”。

12月 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发表文章《提高到发达社会主义要求的水平——苏共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几个迫切问题》。他说：“今天我们国家正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进入这个阶段，是党和人民进行紧张的建设活动的必然结果，是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数十年的劳动结果。同时，这也是向解决完善我们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这项任务发生重大而复杂的转变的开始”。“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然而，它并不意味着，目前在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在社会机体的每个细胞中，社会主义的所有原则和准则均得到完全、彻底和绝对的遵守。众所周知，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并非所有的任务和问题我们都是按照发达社会主义的要求来加以解决的”。

契尔年科还谈到在经济发展中应避免的两个极端。他说：“与经济相联系的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整个形象应该由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来确定，应该符合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现实主义要求”。这就是说，“现实主义地对待有关在共产主义形态第一阶段的范围内，经济能够提供什么和不能提供什么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不容许使经济面向达不到的、尽管是美好的目的。但是，也不容许陷入另一极端，也就是说，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有任何的估计不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任务时不能贬低了它的建设性力量”。他强调，“我们的计划、经济实践不单在经济上应当是有的根据的，而且首先在政治经济学上也应是有根据的”。

1985 年

1月1日 苏共中央电贺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贺电指出,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共产党人的进一步团结和积极活动,以及他们反对核战争,使世界由对峙转向缓和的斗争,对各族人民的和平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贺电说,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对维护各族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事业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3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因病于莫斯科逝世,终年74岁。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在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书中,称契尔年科是杰出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和平的胜利而奋斗的战士。表示苏共今后“仍将奉行全面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方针”,“尽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努力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巩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防止核灾难和保障持久和平”。说苏“不威胁任何人,也不谋求军事优势。但是,它绝不允许任何别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取得这种优势”。

3月11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讨论苏共领导的继承问题。全会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提议,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开始参加劳动,在农机站当联合收割机手。1950年考入国立莫斯

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攻读法律。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从1955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从事党团工作，先后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第一书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到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函授班学习，1967年毕业。1962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推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庄农场管理局党的负责人，同年12月被任命为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机关部部长。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8月起，出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1970年4月当选为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从1971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苏共22大、24大、25大和26大的代表。1978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7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10月22日，也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中央非常全会上发表了就职讲话。在论及国内政策时，他强调：1. 苏共26大及后来的苏共中央全会制定的战略路线将不会改变。这条路线就是：加快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要改变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体系，也包括人自身的发展，根本改变人们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2. 苏联面临的经济任务是，实现国民经济向集约化发展轨道的转变。苏联必须在短期内达到最先进的科技水平，达到世界最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为顺利地、迅速地、迅速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更坚决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制。3. 苏联面临的政治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人民的整个社会主义自治体系。为此，要进一步提高苏维埃的作用，使工会、共青团、人民监督和劳动集体积极开展活动，在党、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中必须贯彻公开性原则。

戈尔巴乔夫在说到苏对外政策时说，党和国家的“第一条戒律”

就是爱护和大力加强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兄弟友谊,并“将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要“外国的志同道合者”相信:苏共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的党,在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将一如既往地同兄弟的共产党、工人党和革命民主党密切合作,并主张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和积极合作”。戈尔巴乔夫谈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指出,苏联将继续遵循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方针,“珍视”在70年代取得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成就,愿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平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4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通过了这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苏共例行第27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列宁教导共产党人从阶级立场出发,现实主义地评价社会现象,不断地创造性地寻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好途径。戈尔巴乔夫说,“生活及其发展促使我们继续变化和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整个体系的活跃,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和人民自治。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苏联经济形势做了基本分析,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必要性及其途径。他认为,国家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后如何引导我们的事业。应广泛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当代的条件和要求,大大加快社会经济进步,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他指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是:把经济发展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改革计划与管理,改革结构政策与投资

政策,全面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彻底改进工作作风。

全会讨论了组织问题,作出了人事变动的决定:政治局候补委员B·切布里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E·利加乔夫和H·雷日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委员、国防部长C·索科洛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B·尼科诺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5月17日 戈尔巴乔夫视察列宁格勒,参观了基洛夫工厂,并在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争取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靠整顿秩序、加强劳动纪律、工作纪律和国家纪律是可以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生产领域、市政和公共事业领域、商业、卫生保健、服务领域、特别是有许多严重官僚主义现象的管理领域,都要有秩序。各级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使每一个劳动集体和整个国家向好的方面转化。党中央和政府已决定,领导人如果在他们领导的单位中不能保证秩序和纪律,就不能再呆在领导岗位上。戈尔巴乔夫还谈到了改革干部工作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从工人到部长,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到政府领导人都应该改变看法,人人都应该掌握新的看法,并且懂得我们别无他路可走。干部尤其应该认清时势的要求,改变工作方式,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特别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都应干脆走开,别再碍事。任用干部要为青年人开路,但主要的是要善于使有经验的干部与青年干部相结合,这样可有效地防止僵化、保守和停滞、冒险主义和唯意志论。

5月20日——21日 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交流各国党有关实施经互会成员国最高级经济会议的决议以及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的工作经验。会议公报指出,始终如一地实行经济会议决议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继续向前发展和加强它们的团结一致的重要因素。强调兄弟国家目前经济战略的主要环节就是加速科技进步,为此与会者特别注

意到集体制订 2000 年以前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的重要性。会议认为继续定期地举行各国兄弟党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书记会议是适宜的。戈尔巴乔夫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

6 月 11 日——12 日 苏共中央召开有主管部门领导人、地方干部、企业及高校领导人、专家,以及群众代表参加的加速科学技术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集约化经营联系起来,号召加快科技进步。他说,党把加速科技进步看作是经济战略的主要方针,是国民经济集约化发展的主要杠杆。加速科技进步刻不容缓,行动上决不能延误。这一任务涉及到目前和未来的许多问题,包括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发展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上层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国民经济每个环节的活动问题,也涉及到每个集体、每个党员和每一个苏联人。在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中,都要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中心工作,使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全体人民都密切注意这一问题。在谈到国民经济向集约化转轨时,戈尔巴乔夫指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也是指经济发展在质量上的提高,使整个经济的发展走上集约化轨道,在一些具有战略上最重要意义的方面迅速向前发展,改革经济结构,利用有效的管理形式、劳动组织形式和刺激形式,更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

6 月 21 日 《真理报》发表弗拉基米罗夫(罗满宁)文章《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论述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文章提出要把“团结和协调对阶级敌人的行动的严格标准问题放在首位”。文章说,社会主义各国在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时,“既要求最大限度地考虑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也要求最大限度地考虑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特点”。文章说,无论追求民族的特性,还是机械地模仿或无视其他国家的经验,都同样是危险的。文章批评有些人对普遍规律产生怀疑,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各兄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文章谴责“民族主义”,认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总是同民族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国内孕育着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缩小,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将削弱国际主义联系。文章提出同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坚定的和有原则的斗争是各党的任务。

6月27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席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共和国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及乌克兰的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劳动者致意,并发表了题为《坚决执行拟定的方针》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会议意义不凡,因为它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即将举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即将结束的时候进行的。苏共正在迎接自己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现在的形势是我们既要解决当前任务,又要解决长远任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段时间总是要进行总结,对已做的工作作出评价,分析社会发展中的现象和趋势,吸取教训以利于未来。”“对于我们来说,既不能容许犯唯意志论性质的错误,即搞跃进、搞突击和缺乏耐心,也不能容许由于采用已经过时的老的保守方法而造成的错误,俗话说得好,行者不怕路途遥。既然方向已经选定,就应当大踏步地、信心十足地前进,就应当坚决贯彻执行拟定的方针。”

戈尔巴乔夫要求乌克兰共和国将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得“更高一些”。他说:“现在它低于国内的平均水平。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是,你们的自然条件、生产潜力、科学潜力和干部(不仅指领导干部)实力,以及工人、集体农民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技术水平并不亚于其他共和国,所以有理由期待你们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戈尔巴乔夫还就乌克兰共和国的冶金、煤碳、机器制造、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希望这些部门能迅速发展,为全苏作出榜样。

戈尔巴乔夫还就乌克兰的农业问题专门进行了分析。他说：“乌克兰是最大的农业区。食品纲要的完成和经济发展的总指标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那儿工作得如何”。“苏共中央希望，共和国党组织及全体知识分子，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找出必要的办法，采取措施增加粮食产量和卖给国家的数量，使粮食作物稳产高产。”

6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说苏共中央加快科技进步会议拟定的经济改革，将在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内进行，丝毫不会向“市场经济”和私人经营方向发展。苏联的改革道路是，竭尽全力加强集中计划并同时加强企业的独立性和责任，发展经济核算制，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加乔夫还指出，在苏联，科技进步的加速是在不削减社会计划，保证居民完全就业，以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提高其物质水平及丰富其精神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的，苏联在这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原则的区别。在那里，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大多是靠削减社会措施的开支。西方的科技进步是把成千上万的人抛向街头，使他们去补充百万失业大军。

7月1日 苏共中央举行例行全会，讨论了苏联第11届最高苏维埃第3次会议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最高苏维埃会议问题发表了讲话。全会公报强调，必须坚决完善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并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的作用，使社会政治体系中每一环节都明确履行自己的职能。全会同意Г.罗曼诺夫的退休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全会决定政治局候补委员В.谢瓦尔德纳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共中央建筑部长Б.叶利钦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Л.扎伊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7月2日——3日 第11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3次会议在莫斯科

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加强苏维埃的作用的问题，强调苏维埃应该把它们通过国家决议的职能同组织贯彻决议、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结合起来。各级苏维埃应干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最高苏维埃应更好地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审查生活中的最重要问题。监督管理工作的工作，在加强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议选举A·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在提名时说，新的任务要求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对各级干部的配备提出修正，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要求提高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强度，总书记要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会议选举葛罗米柯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奥尔洛夫和瓦格里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选举利加乔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雷日科夫为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任命谢瓦尔德纳泽为苏联外交部长。

7月1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广泛推广新的经营方法并加强其对加速科技进步作用的决议》。会议认为，1984年开始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企业责任的经济试验已使企业的工作有了改善。参加经济试验的各部、各企业都超额完成了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利润、降低成本和生产高质量产品等方面规定的任务，产量的增加是在不增加工作人员人数（甚至是减少人数）的情况下达到的。这使建立国民经济整个管理体系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会议根据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5年）的决议及苏共中央科技进步会议规定的方针确定了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的方向。规定要进一步使劳动集体和国民经济各环节从切身利益上更加关心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利用发展生产基金、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的可能性。

7月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争取禁止核试验

国际学术会议代表时，就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迫切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不想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指望你们不经思考就采纳我的意见。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实质归结为两句话：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生活在复杂的、相互制约的和矛盾的世界里。不管我们多么不同，必须学会共同相处。其他国家有它们自己的那种民主，就让他们好好享受那种民主吧。但是请不要侵犯我们享受自己的民主价值的权利。不过，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主要是：我们或者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是给文明造成灾难性后果。必须摆脱这样一些已过时的概念，即把世界看成是某某的世袭领地。现代世界是各个国家和人民共同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有着自己历史的和处在自己发展阶段的许许多多的国家。但是大家都应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体和独立处理本国的事务。”

8月23日 《新时代》第35期刊登希什林的文章《第一条戒律》，主要阐述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文章强调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是苏联对外政策和极为重要的任务。文章承认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它自己的特点”，在通往根本改造社会的道路上要“既考虑社会主义发展共同规律本身，也要求考虑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认为社会主义世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图画，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明显的民族特征，自己解决社会主义任务的形式和方法上的特点，这绝不妨碍社会主义各国全面和积极的合作”。文章要求各执政党“掌握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的艺术”。

8月2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美国《时代》周刊的请求，同时代出版公司总经理格伦沃尔德、《时代》周刊主编凯夫、副主编邓肯和该杂志莫斯科分社社长杰克逊进行了谈话。关于苏美关系，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正视现实。尽管日内瓦谈判已经开始并达成

了有关最高级会晤的协议,但是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在继续恶化,军备竞赛在加剧,战争威胁并没有缩小。”当回答记者提出“什么是苏美关系中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时,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那就是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管我们彼此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起死亡。我们应当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最终愿意承认,除了彼此和平共处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是不是准备把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战争轨道转到和平轨道上去?我们有句俗话: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我们把这称为和平共处。至于谈到苏联,我们对这个问题和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戈尔巴乔夫首先回顾了历史情况,“苏维埃政权从旧制度那里接受了沉重的遗产:落后的经济、深重的封建主义残余和千百万文盲”。“此外还有两次毁灭性的战争,这两次战争席卷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使人民劳动创造的许多财富化为乌有”。“西方有人不止一次写道:要恢复法西斯侵略造成的破坏,苏联需要 50 年至 100 年的时间。苏联人做到了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最短的时期内恢复了国民经济。……我们在复杂的条件下,利用我们制度的潜力,把苏联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这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巨大可能性”,但“同时也有与我们的缺点和疏忽有关的困难,这一点我们是公开谈论的。并非始终都工作得很好,还没有学会象现代经济要求的那样和我们的巨大可能性所允许的那样搞经济”。戈尔巴乔夫还明确提出了改进国民经济工作的具体途径:“加强管理的民主原则,扩大联合公司、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发展地方的自治,鼓励主动性和进取心,当然,是要有利于社会,而不是危害社会。”

9月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秋明州和托木斯克州党的积极分子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西伯利亚的经济工作“加快步伐”。他说:“党中央的四月全会和六月全会提出

并论证了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 展的路线。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在经营管理的态度和方法上,在解决实际任务方面来个大转变”,为此,“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久前通过了关于综合发展西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决定。这是一个可为该地区的发展开辟崭新阶段的原则性文件。其实质是,在集约化和利用科技进步成果的基础上,迅速提高国家主要燃料基地的效率和可靠性。”戈尔巴乔夫还谈到使“苏共中央委员会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如“秋明已经三年没有完成石油开采计划。没有完成任务就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困难。同时,落后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他认为,完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中提出的任务将使“秋明获得新生”,“因此,竭尽全力使决定中所拟定的措施得到充分实施,是十分重要的。”

9月1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讨论并通过《1986——2000年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综合纲要》。会议指出,该纲要对实现党的社会经济政策、进一步提高苏联人的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纲要的目的在于把满足人民对商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计划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使消费品产量至少增加30%。

9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老战士和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先进生产者。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时发表讲话,称斯达汉诺夫的意义是伟大和永恒的,它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创造性的开端。斯达汉诺夫运动反映了新的劳动态度。“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作”,这是主动精神的象征,这是争取一切先进事物、反对陈旧和腐朽的事物的象征。这个运动的传统并没有过时。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揭示新社会的人的心灵美的道德现象。这个运动最初的开拓者已成为苏联真正的英雄。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应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如何生活,跟着他们前进。

9月30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前夕在莫斯科接受法国电视

公司记者采访。在谈到苏联国内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我们将竭尽全力增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活力;首先将注意、并且最密切地注意全面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在对待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困难。我们愿意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讲坛上、同任何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指出:国际紧张势在发展。核导弹浩劫的威胁并没有减弱。必须正视令人痛苦的现实。今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做一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旁观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现在正在决定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命运。对我们苏联人来说,主要的是发展经济、社会关系和民主,那么这也就决定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利益。首先是关心和平,关心稳定的国际局势。只有稳定的国际局势才能使我们把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和平建设事业。

10月1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例行全会,讨论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草案和苏联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审议1986年——1990年以及在2000年前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的草案。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党的政策——关心人民福利、关心和平与进步》的报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党纲新修订本注意了理论和政治上的继承性,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也批判性地重新考虑了纲领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提法。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原党纲中不考虑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熟程度,一味冒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种种错误作法。戈尔巴乔夫指出,党纲新修订本草案中关于发展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日益充分地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的论点具有原则性意义。他强调说:“不大力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即不创造条件让全体劳动人民及其集体和组织经常地、积极而有效地参与解决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顺利前进。”他还指出:“在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中进一步实行公开原则、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深民主原则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是

可贵的。”

全会讨论了人事问题。选举塔雷津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鉴于雷日科夫已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全会决定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全会还通过了由于健康原因而解除吉洪诺夫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决议。

10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期间同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举行会谈。双方相互介绍了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苏共二十七党和保共十三大筹备情况，研究了、两国合作的问题和前景，讨论了国际生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关键问题。双方对讨论的问题“观点完全一致，立场完全相同”。两党共同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国际资本向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进攻，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广泛而积极的协作以及在争取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防止核浩劫、保障欧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国际主义团结变得特别必要。”在日夫科夫举行的晚宴上，戈尔巴乔夫说，刚刚结束的华约成员国会议令人信服地证明各社会主义盟国今后仍将在国际事务中共同行动，始终不渝地奉行阶级路线，不让帝国主义的“压力政策”得逞，不允许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破坏军事战略均势以利于它们自己。在谈到苏保关系时，他说，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同盟，两党和两国间需要经常接触，同志式地协商和交换经验，需要做出共同的决定和具体和协议。

10月25日 塔斯社播发《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草案)》。草案分为对时代的分析、苏联共产党的总任务、对外政策和关于党的论述四个部分。草案批判了以往在指导思想上的“冒进倾向”，否定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论点，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确定为党的基本战略方针。草案中经济问题是核心部分。在这个问题中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理体制和经营方法，指出现阶段经济战略的核心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为今后的经

济体制改革规定了总的方向和框架。草案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同一切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分清党、国家和社会团体的职责,加强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以“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恶习;加强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拔适应新时期要求的“对新事物敏感、敢于承担责任的干部”。草案将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规定为“为完善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迈进而保证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外交战略方针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两个世界社会政治体系的“历史性竞赛”的内容,表示苏联“不愿同任何一个国家对立”,而希望“进行对话,通过谈判建设性地解决国际问题”。

11月5日 列宁纪念像在莫斯科十月广场揭幕。出席纪念像揭幕仪式的有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雷日科夫,以及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纪念像剪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格里申讲话。他说,列宁的纪念像在十月革命68周年前夕揭幕是很有意义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要无限珍惜列宁的名字和事业。列宁的光辉形象和战无不胜的精神遗产是不受时间支配的。今天,列宁纪念像的揭幕是他的思想获得胜利和他为之献出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获得胜利的证明。格里申最后说,一批又一批新的一代将接替目前的一代,但他们也将在列宁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中寻找解决生活提出来的最尖锐的问题的答案。受到列宁思想鼓舞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可靠领导下,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

11月6日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十月革命68周年庆祝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作了题为《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朝着完善社会主义的新目标前进》的长篇报告。报告指出,苏共1985年四月中央全会的转折性意义在于,它确定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质的改造的方针;采取了修改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和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东西的

坚定方针；采取了开展革新活动、发扬创造主动精神、进行大胆探索的方针，为直率地和有原则性地批评缺点开辟了广阔天地。切布里科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总的生产发展速度减慢，一部分干部对改革丧失兴趣，各级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他说当前国内需集中注意的问题是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尽快推广科技成果，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领导干部和专家要改变工作方法。

11月21日 在布拉格举行华沙条约国首脑会晤，出席会晤的除各党总书记外，还有各国外交部长等。戈尔巴乔夫用三个小时时间向与会者通报了苏美首脑会谈的进程与结果。会晤公报指出，各国领导人“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在同里根会谈中“本着华约国1985年10月23日声明中所表现的联合方针的精神所阐述的建设性立场”。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在会晤过程中“为推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同制定的爱好和平的立场方面所作的特别重要的贡献”。与会者一致认为会谈结果是“有益的”，它为国际局势健康化和回到缓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会者重申，华约国不谋求军事优势，但是也不允许别人谋求对华约国军事优势。他们一致认为，在复杂的国际条件下，“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阶级声援、在一切合作领域中日益增强的协作具有头等意义”。

12月1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行会议，讨论关于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总结选举活动的问题。会议严格地评价了各级党委的活动，尖锐地批评了所存在的缺点和疏漏。尤其是对下述情况感到不安：有些领导人口头上拥护完善工作的方式方法，却继续按老框框办事，对干部并非总是表现出应有的严格要求，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斗争不力。并且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同违反纪律和舞弊行为进行斗争，坚决采取克服酗酒现象的措施，对待那些获得非劳动收入的人要更积极地利用社会舆论和法律的力量。

政治局建议各级党委全面分析党组织的总结和选举的结果,采取措施在克服已揭露出来的缺点,在筹备和举行州、边疆区党代表会议和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大会时广泛地利用已积累的工作经验。

12月19日 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该书收录了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至10月的讲话、文章和报告。所有材料都贯穿着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肯定了更迅速地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同时还谈到了这种发展的新性质、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过渡和在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方面迅速前进的问题。

党的社会政策问题、更充分地实现社会公正原则问题和建立可靠的食物基地问题在书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选集》的材料非常注意完善党的工作作风和严格遵守列宁关于根据政治、业务和道德素质挑选与配备干部的原则。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进步与民族解放问题、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书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分析。

筹备苏共27大和讨论代表大会前的文件的问题在书占有特殊的位置。所发表的材料证明了列宁关于有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真正的政策这一结论的深度。

12月19日——20日 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保、匈、民德、越、古、老、蒙、波、罗、苏、捷)共产党和工人党负责国际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会议,并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指出,与会者就同争取和平与核裁军、加强国际安全与合作有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交换了意见。强调各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会各党表示要决心同世界各国、同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各种反战运动紧密配合,以便制止军备竞赛,消除核武器,防止宇宙军事化,确立安全、相互信任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会议交流了各党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经验。

12月24日 塔斯社宣布,格里申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格里申现年71岁,自1967年以来一直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那以前当过11年国家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格里申1971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政治局里资格最老的委员之一。

新任命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是鲍·叶利钦。叶利钦现年54岁,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乌拉尔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度过的,今年4月成为11位中央书记中的一名。

12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向苏联人民致新年祝词。戈尔巴乔夫说,在核时代,地球上的人们坐在同一条船上,用军事冒险来摇晃这条船是极不负责的做法。当代生活本身否定了政治上的轻率。正因为如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顽强地致力于和平,致力于使国际关系健康化,使它具有文明性质,这是20世纪有教养的人们应具有的品质。苏联希望被联合国宣布为和平年的新的一年进而发展成和平的十年,使人类在和平与合作中跨入21世纪。戈尔巴乔夫指出,1985年初苏联经济中碰到了很大困难,并为扭转局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进行复杂的工作和巨大的变革,要求要有更大的坚定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抛弃过时的一切东西,特别需要高度的社会积极性、对缺点的不调和态度、对新的先进东西的坚决支持。

1986 年

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分三个阶段完全销毁全世界核武器的计划。按照该计划,在第一阶段,苏美在5—8年内把能够打到对方领土上的核武器减少一半,双方保留下来的核弹头各不超过6000枚;第二阶段,在不迟于1990年开始的5—7年内,其他核大国开始核裁军;第三阶段,在1995—1999年期间彻底销毁世界上所有剩余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决定把于1985年12月31日期满的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再延长3个月。如果美国作出积极响应,暂停将继续生效。此外,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完全销毁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大幅度削减常规军备的倡议。戈尔巴乔夫说,积极采取措施制止军备竞赛和削减军备是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他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纪元的重要阶段,应当摒弃“石器时代思维”,“要采取新的大胆的态度,进行新的政治思维,敏锐地认识到对各国人民命运所负的责任”。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的政治思维”的概念。

2月18日 苏共中央举行二月全会(1986年)。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27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的问题。2.关于全党和全民对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草案讨论的主要结果和将草案提交苏共27大审议的问题。3.关于对苏共党章修改意见的讨论结果和将修改后的党章草案提交苏共27大审议的问题。4.关于要向苏共27大作的苏联1986至1990年以及到2000年

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的问题。5. 关于对《苏联 1986 至 199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的全民讨论结果和将这一草案提交苏共 27 大审议的问题。全会听取了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就上述问题所作的报告。全会赞同所提出的报告,苏共纲领新修订草案、修改后的党章草案和基本方针草案,通过了把这些文件提交即将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 27 次代表大会审议的决议。全会讨论了组织问题,选举鲍·叶利钦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因他调往莫斯科市党委会工作而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由于维·格里申已退休,全会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于康·鲁萨科夫因健康原因退休,全会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

2 月 25 日——3 月 6 日 苏联共产党第 27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52 个外国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政治报告;西佐夫作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3 月 3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作《苏联 1986 至 1990 年以及到 2000 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分为 6 个部分:一、当代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矛盾;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方针;三、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加深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四、党的对外政策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针;五、党;六、关于讨论党纲新修订本和修改党章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到当代世界的主要趋势和矛盾时说,当今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充满着各种矛盾。两种制度的竞赛和对抗与世界大家庭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长的趋势相结合,这就是当代发展的现实辩证法。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今天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坚决扭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倾向,使经济获得应有的活力。出路在于:加速科技进步和改造经济体制,对经济管理机制不能局限于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深刻改革经济机制,不建立能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完整、有效和灵活的管理体制,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方面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他认为,不进一步发扬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加速社会的发展便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他接着提到了加强民主的各项措施:活跃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劳动集体和人民监督工作,加强公开原则。而这些任务要求始终不渝地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

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方向时指出,苏联国际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苏联人民在巩固的和平与自由环境中劳动的机会,当前首先要制止从物质上准备核战争。苏共仍然把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方针。”他说,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各国之间除了合作与协作外,别无任何选择。

代表大会批判性地总结了苏联 70——80 年代初的状况,制定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使经济实力翻一番的目标,确定了对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质的改造的方针。

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和雷日科夫的经济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共选出中央委员 307 名,候补中央委员 170 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83 名,共计 560 人。在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 94 人,占中央委员总数的 31%;在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为 103 人,占候补中央委员的 61%;在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中,新当选 62 人,占中央检委总数的 75%。新当选委员总计 258 人,占总数的 46%。

戈尔巴乔夫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他评价说,苏共 27 大是公开揭露缺点和疏漏、深刻分析社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气氛中进行的,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处于批评性分析之外。他再次强调,争取加速发展,就要求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和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

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

戈尔巴乔夫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致词时说,苏共 27 大确定了苏共在国家发展转折阶段的总路线。

3月6日 苏共 27 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会,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选出下列人员组成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还选出了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会批准任命索洛缅采夫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检查委员会选举卡皮托洛夫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3月1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确定了关于执行苏共 27 大各项决定的组织工作以及学习和解释大会文件的紧要措施,并就此通过决议。决议要求在各级党组织和各劳动集体都要形成代表大会所创造的气氛,即保持党的原则性,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对干部的要求,及时发现和消除缺点与失误。规定各级党和苏维埃组织、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要讨论 27 大提出的任务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实际完成这些任务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解释代表大会的各个文件,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传达给每一个苏联人。例会还讨论了进一步完善燃料动力综合体各部门管理的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就此通过专门决议,决定建立“燃料动力综合体局”,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常设机构,对各能源生产部门实行统一领导。

3月2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制定了执行苏共 27 大方针的一些具体措施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要求苏联政治系统的所有环节立即展开有力的工作,规定各部门和各企业要制定生产

革新的远景计划,把部门管理原则同地区管理原则正确结合起来,通过产品质量法,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福利等。

4月7日——9日 戈尔巴乔夫视察古比雪夫州。4月8日他在会见该州陶里亚蒂市劳动者时发表讲话。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苏共27大回答了当代最根本的问题,目前的任务是实现大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迅速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应当在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劳动集体进行,应当在管理机关、在党和国家机关——包括政府和政治局——中进行。摆在首位的是,首先应当从改造思维和心理、改造组织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开始。不管遇到什么干挠和困难,一定要把已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苏共27大确定了反对核战争的方针。苏联外交政策是“表达苏联人民利益并考虑到所有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政策。

4月1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下列问题:1. 必须加强有关实施苏共27大决议的实际工作,在这方面不允许装门面,大哄大嗡和议而不决。要加强全体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忘我工作和责任感。2. 讨论制定完善国家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基本方针问题。强调要提高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作用,因为它们长期影响经济和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将大大扩大高等学校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规模,扩大学校的权力和责任,彻底改进培养、教育和使用专家的工作,使之达到教育、生产和科研一体化。3. 讨论了苏中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成果,并指出,苏中经济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助于两国其他领域关系的改善,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4月22日 莫斯科举行纪念列宁诞辰116周年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谈到不久前结束的苏共27大时指出,苏共27大出色地继承了列宁的传统,忠于列宁的

全部遗产,其中主要的是提出大胆的革命性任务和完成任务的革新战略。没有中央三月全会,没有党在四月全会上制定的新的路线,没有关键岗位上干部的更新,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代表大会。谢瓦尔德纳泽指出,在新条件下用老办法不可能实行领导,人在改革中处于中心地位,应改造人的意识、心理和思维。党把民主化过程同公开性原则直接联系起来,取消了过去某个时候不准批评的禁区,取消了免受批评的特殊待遇。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谢瓦尔德纳泽说,苏共奉行列宁的和平与安全哲学,执行同各国人民和政府进行直接和坦率对话的方针。

5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表电视讲话。说事故中已有9人死亡,292人患放射病。称这一事故是悲剧,又是一次严厉的警告:核时代要求有新政治思维和新政策。戈尔巴乔夫提出4点建议:一、建立安全发展核动力工业的国际制度;二、召开专门的国际会议讨论上述问题;三、提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和潜力;四、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更积极参与制订保障和平使用核能活动安全发展的措施。

5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鞑靼自治共和国视察工作时,谈到干部的选拔和配备问题。利加乔夫强调指出,要对领导人作出客观评价,只有在领导人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对劳动者都公开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没有广泛的公开性,没有原则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干部组织、以至我们的整个工作中不大力发扬民主,要改革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

5月27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全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作出决定和发布命令,要求同与社会主义性质不相容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任务。决定指出,所谓非劳动收入,就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或未经增加劳动量而获得的超过其劳动价值的收入。这

种非法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为达到个人目的滥用职权、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决定对这些违法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强调加强统计和财政机关监督以防范这些违法行为。

6月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两个问题:(1)关于“十二·五”计划和各级党组织的任务;(2)关于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成果。戈尔巴乔夫就上述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总结了27大以来的改革进程,猛烈地批评了那些继续因循守旧、死死抱住无效工作方式的人们。说改革在断断续续进行,旧的观念还在拖后腿,惰性还很有力量。他表示要同一切妨碍改革的东西作坚决斗争。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改革涉及到所有的人,要使改革成为全民的事业;不能用指令代替群众的创造性;要讲真话。他阐明了“十二·五”计划中的主要任务。报告强调要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戈尔巴乔夫还说,苏美举行新的会晤是可能的,但必须创造一种能为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开创前景的气氛。

6月29日——7月3日 戈尔巴乔夫率苏共代表团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10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讲话,重申苏联不允许美国恣意主宰世界命运。戈尔巴乔夫与雅鲁泽尔斯基单独会晤,双方表示将定期交流有关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经验,扩大党际联系和国家之间的联系。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党10大提出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建议。

7月2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问题,并就此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对顺利实现加速战略、解决苏共27大提出的有关把社会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状况的规模宏大的复杂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会议指出,《共产党人》在发展和实现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进一步开展和深入研究社会科学新问题,保证科学研究坚决转向实际需要,教育干部善于按新方式思考和行动等方面,应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要求该杂志积极支持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大胆探索,支持改革中的新的进步的东西,反对保守思想和墨守成规。

政治局指出,必须改革《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形式和方法,力争把全国最好的理论力量集中到杂志周围。杂志在加强同各级党组织和科学界的联系的同时,应该促进政治、经济和思想教育方面新观点的发展,揭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对机会主义观点,大力促进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的观点付诸实现。

7月25日——31日 戈尔巴乔夫到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视察工作。28日,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主张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共同建立新的、公正的关系,积极同亚太各国发展双边关系。关于苏中关系,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建议两国联合开发黑龙江上游的资源;确认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提出同中国在宇宙方面进行合作。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再次发表讲话,指出,改革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和其他一切生活领域,“改革”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词,“改革”与“革命”这两个词之间可以划等号。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不应当在社会主义之外,而应当在这个制度的范围之内寻找对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但不能容忍让过时的原理妨碍前进,不能把改革看成是对苏联制度的动摇。

8月1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关于他视察远东工作的汇报。政治局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这次视察的结论,强调指出,对改革问题丝毫不能放松注意力,必须坚定地前进,抛弃旧教条,充分利用群众的创造热情,以加速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8月24日 《莫斯科新闻》周报(第34期)以“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为题报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会见新闻记者的谈话。

叶利钦说,多年来莫斯科有许多禁区不能批评,今天市委的工作作风就是开诚布公地讨论任何问题;大型会议要大大减少,领导要更多地事先不打招呼到基层了解实情。叶利钦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后,有关首都生活问题的报道充满了批评。我们支持这种做法。市委要更严格地要求各组织和机关必须对批评作出反应,制止不尊重报刊态度和敷衍了事的答复,更不得企图报复。商业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领导人由于欺骗顾客和国家,勒索和接受下属人员贿赂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叶利钦强调指出,所有犯罪的人及其庇护者,不管他身居何种职务,都要受到应得的惩处。

据报道,这次会见持续了5个小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约200个问题。会见反映了莫斯科市委开诚布公地、认真地、批判地讨论任何问题的工作作风。

9月8日——1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塔雷津访问中国,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两国的贸易、经济问题及改善政治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签署了重新修订的领事条约和两国计委合作协议、文化协议等。1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塔雷津访华的结果。会议认为,这种接触有利于活跃两国间的互利合作,强调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使苏中关系具有持久睦邻的性质。

9月17日——20日 戈尔巴乔夫视察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18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边疆区劳动者时说:我们要改革经济,要坚决改变社会领域的一切,也就是一个每天生活在其中并决定他的情绪和对一切事物的态度的环境。在经济改革中,应该扭转人们的意识。意识不能靠号召、书本和口号来扭转,虽然这些都是需要的。人要在斗争中改变自己的意识和态度,所以我们正在所有的战线——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战线展开斗争。我们在展开这些进程时希望思维方法将有所改变,态度将有所改变,人们的原则性将得

到加强。19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改革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改革不是一次性的一时的行动，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贯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中。我们的意图是实现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我们把这些变化叫革命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还指出：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民主化使人民参加改革进程。如果说到改革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实质简单地归结如下：我们应当在每个劳动集体、每个党组织、每个州、共和国、部门、每个中央主管机关，在全党创造一种前提，使我们的人民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民主不仅仅是权利，也是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纪律问题，民主不是为所欲为，不是无政府状态。它是在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权利与义务又能使每个人表现出自己的公民立场。同时，民主要求每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参与实现我们社会的目标。这就是说，民主是大家的事。因此，我讲扩大民主，这不仅涉及到负责人，不是的，这也涉及到所有的人。

10月1日 戈尔巴乔夫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使用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说，倘若思想理论工作不活跃，倘若为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种种实际措施得不到可靠的科学保证，要实现加速、改革并使苏联社会达到崭新状态的方针，是不可思议的。戈尔巴乔夫指出：在使我们的社会达到崭新状态之前，我们就应当取得巨大的精神胜利，在理论领域，在创造性地认识生活的新现象和新过程方面应当大步向前迈进。不仅是为了确定长远的社会和政治方针需要理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理论。倘若不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和论证，任何一个较为重大的实际问题都无法解决。理论活动本身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成为改革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在开展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科学系统提出了十分重要的社会要求。

我们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制、人民自治和民主、关于社会意识的发展、克服产生消极现象的根源与途径的概念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的概念,都需要我们用现代生活的材料加以丰富。旧的东西不经过斗争是不会投降的,况且有人早已力图把“加速”和“改革”这两个概念纳入陈规旧套和老框框,阉割它们的新内容和革命实质。不能用旧的公式来套今天的进程,需要作出能反映现代生活辩证法的新结论。而这只有在创造的气氛中才能做到。应当通过各种观点对比、辩论和讨论、打破老框框来寻求真理。

10月14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视台就苏美首脑冰岛会晤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力图把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作为雷克雅米克会晤的重点。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坚信:国际关系旷日持久的狂热状况包藏着突发的和毁灭性的危机威胁。需要采取脱离核深渊的实际步骤。需要苏美的共同努力,整个世界大家庭的努力,以便使国际关系根本健康化。”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对苏联提出的具体建议的反应是冷淡的,“我们的伙伴视野不够开阔,不懂得机会难得,归根结底是在解决世界上极其重要的迫切问题时缺乏十分必要的勇气、责任感和政治决心。他们仍然站在那种已被时间冲刷掉并且不符合当今现实的原有立场上。”戈尔巴乔夫说,“美国人自己在对局势的评价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策略性错误,认为苏联迟早会赞成美国在战略上发号施令,同意只限制和削减苏联的武器;另一是战略性错误,美国想通过最新式的和最昂贵的太空武器的竞赛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10月22日 戈尔巴乔夫会见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会议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州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晤时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大胆解决生活提出的问题,更坚决地根除一切阻碍社会民主化的东西。戈尔巴乔夫指出,在改革中,党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根本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方式和方法。党的

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人,改革的主要因素是人的因素。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是为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满足他们的需求。要把注意力转向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整个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干部问题。

11月6日 苏联莫斯科集会庆祝十月革命69周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遵循十月革命的方针,本着革命创造的精神》的报告。利加乔夫在谈到改革时说:现在展开的改革过程具有革命的性质,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如此。当然,这指的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相反,这一过程的宗旨是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原则,消除一切不符合这些原则的现象,为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创造条件。党用一个明确的词表示改革的深刻本质,这一个词就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有些人倾向于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大厦装修门面,这就错了。改革就是要改造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深刻的根本结构。这就是改革的目的所在,这就是改革的实质,这就应该使改革具有并正在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利加乔夫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只能靠“和平竞赛和竞争”来解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事情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现状。必须刻不容缓地在平等、尊重和睦邻原则基础上进一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健康发展。

同日,《真理报》就十月革命69周年发表社论。社论强调理论对改革具有重要性,指出:“马列主义作为统一的革命学说,是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的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社论中引人注目地提到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说“现在必须对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实际措施赋予可靠的科学保证。”舆论认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概念,是苏联学术界对苏联社会所处阶段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11月29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加强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决定》。决定指出,贯彻苏共

27 大批准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生活民主化和提高群众创造积极性的方针,是同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可靠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合法利益、恪守社会公正原则密不可分的。承认苏联在上述方面的工作还不够有效,不完全符合时代和现阶段的要求。

12月16日——18日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现年74岁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丁·库纳耶夫的职务,其原因是他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不力。库纳耶夫从1942年起,一直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党政要职。前些年,哈萨克共和国的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但是近年来则不断受到批评。今年2月,在哈萨克党代会上,库纳耶夫和整个党中央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点名批评。8月28日,苏共中央公布了一项专门决议,批评哈萨克共和国党政领导对畜牧业的领导工作中有“严重失误”,认为对那里的畜牧业现状“不能继续容忍下去”。哈共中央全会选举59岁的根纳季·科尔宾接替库纳耶夫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科尔宾是俄罗斯族人,1954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197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年起,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是第七届至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库拉耶夫被解职引发了17—18日哈萨克青年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据塔斯社报道,在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几百名“受民族主义分子唆使的青年学生”以及“流氓分子、寄生分子和其他反社会分子”,手持木棒、铁棍、砖头和瓶子,喊着民族主义口号,举着写有“俄罗斯人滚出去”和“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等字样的标语牌,在市中心广场和街道上“闹事”。他们殴打民警和纠察队员,纵火焚烧了一家食品店和一些私人小汽车。结果有两人(一名警察和一名学生)被打死,近200人受伤。

12月2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听取索洛缅采夫关于视察阿拉木图市以及同该市党的积极分子和苏维埃代表、企业、机关和高等学校的集体会晤和交谈情况的汇报。汇报说哈萨克共和国的党组织、

党员、劳动人民积极支持不久前举行的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争取顺利完成1986年的计划任务和加速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党员、团员、劳动者举行的集会上强烈谴责了在阿拉木图发生的有民族主义表现的事件,要求惩处其煽动者。政治局责成哈萨克共产党中央仔细查清所发生的事件,并采取必要措施来坚决改进对劳动者的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教育,改进对于部的培养和分配,加深哈萨克同其他共和国的兄弟关系。

12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新年祝词。他说1986年是目标明确地进行探索的一年,是紧张工作的一年,是世界人民认识到战争浩劫危险的一年,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方兴未艾的一年。戈尔巴乔夫承认:停滞不前和心安理得的现象还时有表现,还有人希望一切都回到老路上去。但是,这阻挡不住苏联社会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我们应当坚定和始终不渝地前进。我们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松懈。新的一年,苏联要广泛实行企业向新的经营方法过渡,继续进行改革,加强主动性和责任心、批评和公开性、民主和纪律。戈尔巴乔夫说世界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危险,核对抗的形势要求在国际政治中采取新的做法。

1987 年

1月22日——24日 在华沙举行社会主义国家(保、匈、越、民德、古、老、蒙、波、罗、苏、捷)共产党和工人党主管国际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会议。与会者就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国际形势问题,以及根据各党代表大会决议和经互会成员国各党领导人莫斯科工作会晤的精神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等一系列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指出,各兄弟党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新社会的建设实践提供了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经验,并用自己的成绩继续充实这些经验。代表们进一步探讨了兄弟国家之间合作的手段、方法和形式。与会者还就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活动计划与准备情况交换了意见。会议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强调苏联在雷克雅米克苏美首脑会晤上提出的建议是新政治思维力量的证明。代表们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别、政治和世界观的差别,不应成为各进步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扩军备战和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空间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障碍。他们还重申了通过谈判解决各种地区冲突的必要性。

1月27日——2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改革和干部政策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重新分析了过去所犯错误的严重后果及其根源,阐述了根本改革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历数了苏联社会中的“危机现象”、“障碍机制”在经济、社会、精神面貌、政治思想教育、党的工作方面的表现,指出造成危机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苏共中央

和国家领导由于主观原因未能及时充分评价改革的必要性和危机现象滋生的危机性；二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 30 到 40 年代的水平上。2. 阐述了对改革的新理解。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①改革——这就是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速机制，苏联战略的主要意图在于使科技革命的成果同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并调动社会主义的全部潜力；②改革——这就是依靠群众活生生的创造力，全面发扬民主和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公开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力提倡尊重人的价值与人格；③改革——这就是不断提高经济中的集约化因素，在经济中恢复并发扬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运用经济方法，确保经济的各个环节向完全经济核算制原则和劳动生产组织的新形式过渡；④改革——这就是坚决转向科学，使科学和实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任何一项创举具有浓厚的科学基础，关心科学的发展，关心科技干部的成长；⑤改革——这就是优先发展社会领域，更充分地满足人民对良好的劳动、生活、休息、教育和医疗条件的需求，关心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把解决重大的根本性社会生活问题同解决人民的日常问题结合起来；⑥改革——这就是努力避免对社会主义道德的歪曲，不断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提倡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提倡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和消费主义倾向。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3. 总结了 27 大以来的改革进展。戈尔巴乔夫说，改革已把社会的健康力量发动起来。国内正在形成新的道德精神气氛。整顿秩序和改革的措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改革尚处于开始阶段，主要的、最复杂的工作还在前面。今后的口号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和“从我开始改革”。4. 阐述了社会民主化的意义和途径。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

民主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加强社会民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包括贯彻自治原则,完善选举制度,加强劳动者对干部工作的监督,加强法制建设等。5. 制定了适应改革需要的新的干部政策。戈尔巴乔夫说,决定改革成败主要取决于干部如何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根据“按新尺度、新任务挑选干部”的原则,现阶段衡量干部的新标准是对改革的态度。这是当前干部政策中的决定性标准、定音器。

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以来时期的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政治和实际结论,完全赞同对改革进程以及履行苏共27大决议的初步结果和原则性评价以及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各党组织、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当解决的苏共现行干部政策的任务。

全会解除了库纳耶夫政治局委员和齐米亚宁中央书记的职务;选举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现年63岁的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年58岁的斯柳尼科夫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现年56岁的卢基杨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2月10日——11日 经互会各成员国(保、匈、越、民德、古、老、波、罗、苏、捷)主管农业的党中央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实施各兄弟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及在农工领域实现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的具体活动问题。代表们强调指出,农工综合体在经互会的近期和长远任务中占有特殊地位。农工综合体各部门的进一步发展、食品问题的成功解决和相互供货量的扩大,同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全面合作有密切联系。与会者交流了在这方面的领导经验。

11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各党中央书记,介绍了苏共27大关于改革和更新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针,介绍了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意义。戈尔巴乔夫强调,广大劳动群众、各劳动集体积极投入改革是实现业已开始的革命变革的主要条件,

是不重复过去错误的保障。稳步而积极地发展农工综合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

2月13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宣传部门领导人,就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交换了意见。戈尔巴乔夫说,新事物是在斗争中诞生和确立起来的,要经过生活和实践的考验。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具有具体政策的形式。它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有这样一些人,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他们明白,舍此别无他途。大家都应当自我改造,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而改造自己。除了改革是没有其他抉择的。我们整个社会为了改革已经历尽艰辛。应该支持改革,应该捍卫改革,应该发展改革,应该把改革推向前进。戈尔巴乔夫指出,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历史。一切都发生过,有过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国家还是前进了。这是生活,是现实。这是充满各种矛盾——既有成就也有错误——的人民的命运。

2月16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会议与会者,并发表讲话,他说:“超出理智范围去制造,然后积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使人在技术上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存。同时,世界上有爆炸性危险的社会物质日积月累,有人试图继续用武力和用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办法解决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问题,这也从政治上使这场灾难变得极有可能发生。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军国主义化正在削弱通往核自杀道路上的道德障碍,甚至根本把它们清除。我们无权忘记,通向核自杀的第一步,而且往往是最冒险的一步已经迈出。”他强调“核战争之后,什么问题都将不存在了,也没有人坐下来谈判了,不用说坐在谈判桌前,就是坐在树桩旁,或石头旁都是不可能的了。第二艘诺亚方舟也不会从核洪水中获生”。因此,“要么使政治思想适应时代要求,要么人类文明和地球上的生命本身可能遭到毁灭”。“在人类所有事物中,尤其是在国际政治

中,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目前压倒一切的矛盾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即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之间的矛盾。”

2月17日——21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视察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19日,戈尔巴乔夫对拉脱维亚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发表讲话,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把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溶合在一起了,并且获得了依靠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巨大潜力的难得机会。这不是力量的简单溶合,而是成倍增加。21日戈尔巴乔夫对爱沙尼亚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发表讲话,说由于苏联各大小民族的共同努力才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解决各项任务——政治任务、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和文化任务的能力。这也就是在切实实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基础是不仅承认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且承认在实际上平等,承认它们自由的全面发展。

2月21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会,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在全会上说:“许多领导人跟不上正在变化的经济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日益民主化。一些人犯了等待综合症,一些很好的决议常被束之高阁,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沼中。”会上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叶利钦在干部工作中“缺乏章法”,“未能解决首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关键问题”;批评市委第二书记别利亚科夫在市委各部工作中没有“架起桥梁”;批评市委书记卡拉巴索夫对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评价干部和贯彻新做法优柔寡断;批评市委书记科罗廖夫积累党的工作经验很慢,同区委接触不够;批评市委书记尼佐夫采娃忽略商业和服务行业的远景;批评市委书记皮萨列夫在组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想解决一大堆建筑方面的问题,精力分散,顾此失彼。

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出席苏联工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并代表苏共中央向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发表了题为《改革是人民的切身事

业》的长篇讲话。关于改革问题，戈尔巴乔夫说：“主要的任务，也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任务还在前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主要是为改革作了一些准备：制订了改革的战略，拟定了主要途径，弄清楚了起妨碍作用因而需要加以纠正的东西，确定了出发阵地。”“现在应当实际展开改革了。已经开始的1987年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决定性的一年，因为今天实质上在决定着改革的命运，在为加速奠定基础。”“正如中央一月全会强调指出，改革已不单是一种主张，而是现实了。它已经被群众所掌握，这就是说，改革已经在起作用，在为社会主义、为我们社会的革新而工作。”戈尔巴乔夫认为“现在改革过程已从思想走向深入，走向实践，看来，这就触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其一是国家验收制度，其二是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其三是选举制，其四是监督、公开性和批评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开性问题，戈尔巴乔夫说：“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不是背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而是通过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我们不是背着民主的方向走，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朝着发扬民主的方向走去”。“我们需要不断地和坚决地深化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主张实行公开性，这应当成为一种准则，而不是一场运动。我们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应成为我们实际生活的一种准则。为了实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改造，我们需要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民主形式。”“加深民主，当然并非易事。因此，这方面并非事事都会一帆风顺，可能会不时地出现坎坷，对此不必害怕。我们有成熟的社会，强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依靠人民支持的极其牢固的基础，恰恰是从我国生活的民主化中吸取力量。我们的民主越多，我们就能越快地沿着改革、社会主义革新的道路前进，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中就将有更严明的秩序和纪律。”

2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最近讨论了与实现无核世界计划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决定在这方面再采取一项重大步骤。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声明说:“苏联建议把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问题中单独列出来,就中程导弹问题缔结单独协议,而且立即着手这样做,采取这一步骤不仅有基础,而且实际上也有现成协议。在雷克雅米克曾经商定,苏联和美国在今后5年内消除各自在欧洲的一切中程导弹。在同一时期内,苏联把在自己领土的亚洲部分的这一级导弹缩减到100枚弹头,这就是说美国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同样数量的中程导弹弹头。”

“一俟签订关于消除苏美在欧洲中程导弹的协议,在同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协商后,苏联就将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加大射程的战役战术导弹。这些导弹是作为对西欧部署潘兴——II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对策而部署在这两个国家的。至于其他种类的战役战术导弹,我们愿意立即就削减和彻底消除这些导弹开始谈判。”

“可见,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欧洲大家庭摆脱大量核重负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将是朝着使欧洲彻底摆脱核武器迈出实际的一大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建议放到了在日内瓦同美国举行的谈判桌上。”

“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我们相信,只要苏联把中程导弹问题从雷克雅米克的一揽子计划中取消,那么就消除欧洲中程导弹达成协议就不难了。现在正是用事实证明这一点的大好时机。欧洲人和其他各大洲的人民都希望这样做,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也要求这样做。”

“苏联政府现在虽把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单独提出来,但仍然认为,就大大削减并随后消除战略武器达成协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当然,正如过去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的,签订这样的协定应以解决不准在太空部署武装为前提,因为这些问题有着有机的相互联系。”

“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和人为的障碍,苏联再次表现出解决核裁军问题的诚意。新的思维意味着能够倾听公众的呼声,包括欧洲和世界公众的呼声,能够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忧虑和利益,在我们这个互相牵制的世界上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同邻国的安全割裂开来。”

“历史的机会不应错过!我们期待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回答。”

3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萨拉托夫市会见党的积极分子时说,苏联的改革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但改革的速度和深度还不符合拟定的计划,向好的方面转变的速度还很缓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还未具应有的稳定性。在实现苏共27大改革战略方面,一月全会占特殊地位。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有思想内容的、进行了严肃和大胆评价的、在结论上有建设性的和采取了实际步骤的全会。会上第一次涉及到这么多的改革理论和政策问题。西方企图破坏苏联改革和民主化的威望,希望从内部削弱苏联的制度。这个希望是实现不了的。深刻的改革绝不意味着废除苏联的政治制度,相反正是为了加强苏联的制度。

3月13日 苏共中央就十月革命70周年发布《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十月革命今天仍在改革的事业中继续着。国内展开了实质是改革的改革,其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革命奠定了在国内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各族人民的平等和他们的兄弟合作已在实际上得到了确立。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提高了。但是,民族关系的完善正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不断提出新问题。这些问题正在解决中或将得到解决。国家的进步现在和将来都是有利于各大小民族的,也是有利于全联盟的。伟大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为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一点。在苏维埃国家艰难的发展道路上,苏联为背离列宁主义原则,为破坏法制、民主准则、唯意志论和教条主义,为实际行动的惰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今改革已成为事实,但不能沾沾自喜于已取得的成绩。改

革只是迈出了最初几步,主要工作还在前头。在对外方针方面,苏联遵循着新的政治思维,国际问题的立场是现实主义的和灵活的。

4月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干部的培养和进修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扎伊科夫致开幕词,苏共中央书记格·拉祖莫夫斯基作报告。会议指出:(1)要把高级党校变成各级党的机关培养后备力量的主要渠道之一。规定在10——15年内,使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有机会接受党的高级政治教育,高级党校的学员应当主要是党的青年干部。(2)要把公开性、选举制、来自下面的监督、推荐和其他民主形式推广到教学和整个干部培养中去,要促进工作人员的横向调动,按照从其他地区提拔的办法委派领导人员。(3)必须在5年内进行两次为期2——3周的对工作人员的群众性培训工作。(4)要改进学习的方法和内容,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苏共历史经验时要遵循统一性原则,在学习经济课程时要注意研究经济机制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学习国际知识时要注意研究一切新的设想。

4月9日——11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与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等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广泛地接触了群众。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了以下几点:(1)苏联改革势在必行,除此以外,别无他路;(2)苏联不号召别国效仿自己,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各兄弟党根据本国条件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3)各兄弟党、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平等,任何党都无权垄断真理。

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向西方提出了两项裁军新建议:(1)就削减和随后消除部署在欧洲的射程为500——1000公里的战术核武器问题举行会谈;(2)举行35国外长会议,讨论削减欧洲常规部队和常规武器问题。

苏捷会谈以后,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社会主义面临的新

任务要求所有兄弟国家把政治合作提高到更新的水平,并认为对在经互会范围内协作的形式和方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成熟。公报强调要进一步挖掘政治潜力,扩大并提高两党在各种级别上的联系,必须用新思维和建设性态度对待当前世界上复杂而相互联系的现实。两党主张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在争取社会进步、裁军与和平的斗争中协调行动。

4月22日 莫斯科举行大会,纪念列宁诞辰117周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列宁主义是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基础》的报告。雷日科夫说,苏联现在进行的改革,可与列宁领导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改造相比拟。改革的首要成果是全国动员起来了,政治、精神和道德变化已经发生,其次是经济形势正在普遍好转。问题是不少事情改得慢、不彻底和不连贯。1987年是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的一年,是可以看到未来的改革大方向的一年。党正在更深刻地思考、发展和实际运用列宁关于合作制的思想。合作制在保证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必须把这条路上一切毫无根据的限制都清除掉。苏共认为,发展民主是全面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杠杆。党号召改革社会,党首先从自身开始改革,党从党的基层组织到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全面发扬民主。党的生活中的改革将成为苏联政治体制各个环节中坚决转向民主化的必要楷模。

5月10日——11日 保共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之后,在莫斯科停留。11日,戈尔巴乔夫会见日夫科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两国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戈尔巴乔夫强调,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质的革新的进程,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他指出,当前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建立起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和自主性的、完整的经济机制。日夫科夫高度评价了苏共27大和苏

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的重要意义。

5月12日——13日 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保、古、捷、民德、老、蒙、波、罗、匈、苏、越)共产党和工人党主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会议。苏共中央书记格·彼·拉祖莫夫斯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实施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情况互通了情报,并就加强政治组织工作,改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交流了经验。会议认为,各党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分析自己的工作,不断更新组织领导工作的民主形式和方法,对各党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5月1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与起草了向下一次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报告有关的问题。会议指出,企业法草案已引起苏联人的深切关心和赞同,已对草案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将为未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奠定牢固的基础。会议决定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一法律草案,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改革劳动和社会发展管理体系基本方针的建议。

5月18日 戈尔巴乔夫就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广泛问题回答了意共《团结报》编辑部的提问。在对内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中心是人;改革的阻力是指旧方法、旧习惯势力、怕新生事物、怕负责以及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改革的条件和强大手段。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说,不能让人类采取任何新的步骤迈过那无法生存的界限,现实生活的要求是要商定向相反的方向起步,这是对现在政治和外交至高无上的命令,苏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建立国际政策的。如果死抱住旧的实力政策不放,顽固坚持东西方关系中过时的模式,那就很难指望国际关系根本健康化。他在谈到苏中关系时强调指出,苏联正朝着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积极行

动,最近的苏中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联系在迅速发展,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立场接近,但苏中关系现在还没有完全正常化。他说,苏联关心中国为调整经济所做的一切,衷心祝愿中国党和人民取得成就。在谈到国际共运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苏共同许多党一样,渴望团结,渴望把力量联合起来。这里指的是,发展各党之间的政治关系,指的是政治团结,指的是共产党人对时代向各国人民提出的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将邀请许多党和各种运动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有其他党派参加的非正式会晤,就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会晤将不签署文件,不做结论等。

5月22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了以下问题:(1)关于完善苏联部长会议在争取加速发展条件下的工作的措施问题。会议批准了改进苏联部长会议机关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建议。(2)关于完善共和国管理机关活动的问题。强调要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利,提高其对本地区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的责任,明确各级管理机关的职能。(3)关于改革物质生产领域各部和主管部门活动的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各部和主管部门工作中的不良现象和缺点的措施,关于改变部和主管部门在国营企业法草案规定的新的经营管理条件下的作用和职能的措施。(4)关于执行苏共中央有关同酗酒作斗争的决定的情况。会议对一些地方放松这一工作表示不安。

5月25日——27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罗马尼亚,与罗共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双边关系及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表示将继续在马列主义、完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和国际主义团结,以及对本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共同事业负责的牢固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苏罗合作的效率,广泛发展与提高经互会成员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

协作。在谈到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两党重申要始终如一地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合作和团结一致,并本着同志友爱、尊重各党的独立、充分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发展广泛的协作和积极的对话。戈尔巴乔夫还介绍了国内的改革情况。同时,他表示苏联也抱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朋友们的经验,研究朋友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的探索,并力图广泛利用一切适合于苏联的经验。他说,如果其他国家从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中找到某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苏联也会感到高兴。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在确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时完全自主和对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集体负责精神,广泛地、互利地交流经验和同志式的平等合作。

6月8日——9日 苏共中央就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举行了会议。苏共中央邀请企业、联合公司及各部的领导、学者和党的工作者参加会议,讨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问题。为本月底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作准备。苏共中央书记尼·斯柳尼科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经济管理工作改革的基本方针的报告,说新经济机制的主要任务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致开幕词并做总结发言。在这些讲话中,就下列三个重大经济问题谈了看法。

(1)如何看待苏联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改革,改革进展如何?戈尔巴乔夫认为,与会者在不改革苏联就不能前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改革不仅仅是对时代的挑战,对苏联业已成熟的问题找出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答案,改革也是改变苏联社会目前状况,特别是改变苏联社会经济领域目前状况唯一现实的抉择。改革初期阶段的进程是艰难、复杂和矛盾的,而它的前进需要有新的动力。

(2)如何看待企业法草案?戈尔巴乔夫指出,指望一挥而就,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个理想的国营企业法,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态度是现实的,这是改革管理体制现阶段的一个重大成就。好就好在正是从这一基本环节开始。戈尔巴乔夫认为,企业法应当接受,应当开始按这

一法律工作,并找出它的优缺点,必要时加以完善。企业法今天就已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便在推行新的经营机制方面展开工作。

(3)中央管理机关应起什么作用?戈尔巴乔夫指出,中央在经济管理方面所要解决的一切不能违背企业法。有关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12个文件尚未通过,但原则是清楚的,那就是应当给经济自主提供更大的空间。留给中央管的是主要的比例、主要的平衡、国防问题、各共和国发展问题等等。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中央集权制同发挥主动性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同样需要建立一种机制,需要一套指标。

6月1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过渡到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的问题。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定中说,在1988——1989年期间,分阶段地完成向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的过渡,同时也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应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决定指出,向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过渡是为贯彻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条例创造必要的条件。实行规定的措施,将成为贯彻27大关于根本改革国民经济管理,增强劳动集体活动中的民主基础,扩大企业在生产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刺激社会主义进取心,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决议的重要措施。

6月25日——2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六月全会(1987年),讨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目的是使经济增长从中间结果转向最终结果,转向满足社会需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使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立可靠有效的反消耗机制。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实现从主要是行政的领导方法向主要是经济的领导方法的转变,向管理的民主化、大力活跃人的因

素过渡。改革措施包括 5 个方面：(1) 大大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自主权界限，联合公司和企业改为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制，提高对最高最终结果的责任，完成对消费者承担的义务，确立集体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它的工作效率，在劳动关系中广泛发展集体承包制；(2) 根本改革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提高其质量水平，使其集中处理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质量、速度、比例及其平衡的主要进程，同时中央决不干预下级经济环节的业务工作；(3) 根本改革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机制，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过渡和改革科技进步、对外经济联系、劳动与社会性事务的管理；(4) 建立新的组织结构，以加深专业化和提高合作联系的可靠性，以及使科学直接参与生产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世界质量水平；(5) 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管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过渡，发展自治，建立发挥个人潜力的机制，明确划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职能并根本改变它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的决议。这是根本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文件，它规定了苏联今后进行根本性改革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方向。文件由前言和 6 个部分组成。文件前言指出，现阶段苏共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实现根本改革，建立完整的、有效的和灵活的管理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和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余 6 个部分是：(1) 使企业（联合公司）的活动向新的经济机制过渡；(2) 在管理的经济方法基础上提高国民经济集中领导的效益；(3) 改革管理的组织结构；(4) 保证部门和地区经济管理的最佳结合；(5) 增强管理的社会性；(6) 有条不紊地组织经济管理改革。

全会赞同根据全民讨论加以修改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并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将它提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

全会决定于 1988 年 6 月 28 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苏共第

19 次全联盟代表会议。

全会讨论了组织问题，作出了人事变动的决定：尼·斯柳尼科夫、亚·雅科夫列夫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维·尼科诺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德·亚佐夫由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谢·索科洛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丁·库纳耶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7 月 16 日 《莫斯科新闻》周刊介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历史教研室主任 H. 马斯洛夫在关于编写苏共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批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教条主义、死啃书本和概念化的根源。(2)还没有一本能回答生活提出来的一系列尖锐问题的党史教科书。(3)只有克服那些禁锢党史工作者科学思维的教条，才能编写出新的党史教科书。这些教条认为：党的发展没有冲突，只有胜利、成功和成就；任何历史人物只要犯了政治错误，那他一开始就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直不断地”自动地增长；所有党的文件都是绝对真理。

7 月 17 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讨论与贯彻六月全会决议有关的组织、政治和经济措施。会议强调完成所提出任务的关键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经济管理，每个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在集体和社会中成为真正主人，强调在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国营企业法条款。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推广国家验收制问题，认为有必要从 1988 年 1 月 1 日起，在生产重要的国民经济产品和消费品的一系列企业，在农工综合体加工部门和建筑业部门的工厂，以及为国家产品验收站接收的产品供应材料和配套零部件的企业，也实行国家验收制。

会议通过了关于计划工作、物资技术供应、价格体制、财政信贷和其他活动领域实行改革的一系列文件。

8 月 8 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会，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在

会上讲话。他说,部分莫斯科人对改革的命运感到担心甚至感到失望。现在出现了说了不少而成果不多的言行脱节的实际危险。一些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对任何决定都可以不执行,拖拖拉拉,将其改头换面,淹没在无休止的讨论、协商和修正中。叶利钦在讲话中还谴责一些组织打着“改造苏联社会”的旗号,组织具有“挑衅性”的游行示威活动。

8月2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完善部长会议的工作和改变部长会议机关结构的问题。会议赞同政府提出的作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综合纲要组织部分的具体设想。会议要求大大提高苏联部长会议各级机构的工作水平,引导各级机构实现加速发展国家经济和更充分满足人民需要的各项有效措施,改革政府机关的工作;确定了政府机关的新机构,要求精简机关工作人员。

8月2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视察莫斯科州冶金和机器制造城市——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利加乔夫在这里举行的教育和职业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在深刻变革的道路上有不少阻力,其中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死对头。利加乔夫指出目前有些人企图把改革简单化,他批评这种态度不符合党的战略和人民的利益。利加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说:“有些人企图利用‘公开性’解决个人恩怨,而且只讲些废话。”利加乔夫认为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在发展中社会主义的范围内采取坚决而彻底的行动,才能使苏联达到世界经济的先进水平。利加乔夫指出,实现根本改革的保证是:(1)党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改进;(2)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改革;(3)必须进行涉及经济、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科学和文化的全面改革。利加乔夫在结束讲话时称,在苏联正在发展的过程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加强着现实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吸引力;同时指出阶级敌人寄希望于苏联离开社会

主义,走向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西方民主。

9月10日 莫斯科举行纪念捷尔任斯基诞辰110周年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切布里科夫在会上作了题为《为革命理想服务的伟大楷模》的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了捷尔任斯基一生的革命功绩,同时也谈及了目前苏联的一些现实问题。切布里科夫说,肃反机关的活动要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进程的顺利发展。要善于在扩大民主和公开性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在民主、公开化条件下,可以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端和冲突,但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民主与纪律、自主与责任、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结合。切布里科夫还谈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他指出,在同贪污、盗窃、弄虚作假、侵犯人的生命安全以及损害公民健康、荣誉、声望等罪行的斗争中尚未出现转折;酗酒、吸毒、过寄生生活等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为此,必须同各种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报告说,西方没有放弃颠覆苏联的活动,同时承认苏联也有一些人具有公然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个别人走上了反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有人准备同敌特机关直接合作。

9月17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审议并通过了《国营生产联合公司条例草案》。条例规定,国营生产联合公司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是国民经济基本环节最大的生产组织,它可以是全联盟的或地区性的。企业、联合公司以及一个或几个部门的组织均可加入。组成联合公司的企业仍保留自主权,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守《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并可成立“劳动集体代表大会”。国营生产联合公司由经理委员会和选出的总经理根据民主原则进行管理。

同日,例会还讨论和通过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科研单位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科研、设计单位和工艺组织在自己的活动中应当遵守《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的各项条例,改变由各部和主管部门向科研单位提供经费的办

法,实行通过签订经济合同和完成经济合同后支付工资,以及直接由订户向科研单位拨款的新办法。建议科研机构的自筹资金改革与企业的自筹资金改革最好同步进行,但同时也强调要考虑到科学院科研机构 and 高校科研机构的特点。此外,会议还确定了在新经营条件下完善对外经济活动的补充措施,赞成扩大各组织在独立作出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决定权。

10月12日——13日 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节日之前赴列宁格勒视察,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列·扎伊科夫同行。戈尔巴乔夫参观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同列宁格勒人会见、交谈,并于13日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阐述了党在改革中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一共讲了9个问题:1. 党应调动一切力量促进改革;2. 加强党组织的作用;3. 加速解决住房问题;4. 加速解决食品问题;5. 改变党在经济领域的工作方法;6.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7. 区市党委如何帮助基层党组织;8. 党的干部政策;9. 批评和自我批评。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正处在改革应当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转折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加快改革过程,吸引千百万人和整个国家参与这一进程。只有党才能将各种力量联合在一起,解决改革的各种问题与任务,完成苏联社会达到崭新水平水平的任务。现在和今后评价党组织和党员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对改革的态度和对改革所做的实际贡献。

10月21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和审议有关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活动问题、改革问题以及叶利钦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在会上发言的还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叶利钦、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谢·马尼亚金等27人。全会就叶利钦要求辞职一事作出决定:第一,认为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十月(1987年)全会上的讲话从政治上来说是错误的;第二,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市党委根据苏共中央全会上交换

的意见讨论叶利钦同志提出的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明问题,根据全会的委托,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全会衡量了已形成的形势,得出了关于必须加强苏共莫斯科市委领导的结论。

11月1日 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一出版商的请求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7章。第一篇题为《改革》,第二篇题为《新思维与世界》。正文之前有个《致读者》作序言,最后有简短的《结束语》。第一篇论述苏联社会经济改革的根源、实质和革命性;第二篇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新思维,苏联对当代世界的看法,苏联同美国、中国、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书中第七章专门论述裁军问题与苏美关系。本书俄文版共271页,译成汉语约18.5万字。作者认为,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而是对改革、对苏联面临的问题、变革的规模、现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进行评述和思索。这是一部谈苏联的打算和准备如何实现这些打算的书。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此书能有助于增进国际信任的话,那么,它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11月2日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联合举行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葛罗米柯致开幕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1. 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先驱者的道路;2.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改革;3. 伟大的十月革命与当代世界。报告的第二部分集中谈到当前苏联的改革问题,提出的主要看法有:建设新社会的道路是一个长时期的一连串的过渡,有理由把改革看作是我们社会前进过程中的一定的历史阶段;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根本的经济改革。

是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它们决定着改革的命运;改革要着重反对保守势力,同时要防止过急。戈尔巴乔夫在讲到国际问题时说,世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整体,帝国主义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类应该为生存而同舟共济。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重申了最近两年多来苏联提出的一系列裁军建议。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一运动目前正处在转折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存在,但要革新,共产国际、情报局时代以及召开有约束力的国际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党都是完全而且永远独立的。各国共产党正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发生的深刻变革中寻找自己的新位置,它们的国际运动也在日益更新。戈尔巴乔夫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守和平共处原则。

11月4日——5日 由苏共发起,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他进步运动和组织的代表会晤,出席会晤的有前来参加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活动的178个党和运动的代表团。会晤参加者推举苏共代表团团长戈尔巴乔夫担任会晤主席。许多代表在会上发言,既谈到制止核战争、裁军、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也谈到了国际共运、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改革等当代迫切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发展的特点已清楚地显示出来。这首先是把人类本身的生存问题提到首位的核时代的特点,其次是受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世界经济联系复杂化的进程,并且在多样化和充满矛盾的情况下形成了世界的整体。所有这一切从新的方面阐明了和平共处思想的内容,这要求各种政治活动要对自己的任务重新分析和认识,克服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刻板模式和旧框框。戈尔巴乔夫还指出,象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也需要革新和质的变化。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而且就其本身的实质来说是一种国际力量。那

种“高傲的无所不知”的人有一种立即否定别的观点的老习惯，这样就不会有对话，也就没有富有成效的讨论。

11月11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和中央书记格·拉祖莫夫斯基到会。市委全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1987年十月全会关于鲍·叶利钦在全会上发言有政治错误的决定。市委全会因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党组织领导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而解除了他的市委第一书记和市委常委的职务；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扎伊科夫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向与会者介绍了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他指出，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总的来讲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极其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发言所依据的不是分析，不是事实，而是断章取义，按其内容和性质都是蛊惑人心的。叶利钦实际上是企图怀疑党在改革方面的工作和目前变化的性质，甚至说改革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叶利钦认为党的领导在进行改革方面缺乏“革命坚定性”，企图歪曲政治局的工作和状况，首先是在有关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上，想把中央全会的工作引入歧途。戈尔巴乔夫指出，叶利钦把个人的自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突出自己，领导莫斯科市委期间工作不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叶利钦以工作得不到支持为借口而提出辞职的理由是荒谬的，不符合事实的。

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叶利钦的行为是政治冒险，从背后打击党，其目的是把莫斯科党组织与党中央对立起来并分裂政治局。叶利钦往往单独作决定，脱离党的积极分子，并总以为自己绝对正确，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缺乏政治成熟性。

12月7日——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罗·里根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爱·谢瓦尔德纳泽等随同前往。8日，举行了苏美首脑正式会晤仪式，戈尔巴乔夫同里根开始就武器控制、双边关系、地区性冲突和人权问

题进行了讨论,并签署了关于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苏美两国将在1991年之前共销毁2400枚以上的核弹头,相当于苏美两家核武库的4%左右。经过6年多艰苦谈判而签署的这个条约,是苏美裁军谈判史上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10日,会晤结束,举行了告别仪式。戈尔巴乔夫在告别仪式上说,这次会晤是认真、坦率的,接触使双方增进和加深了了解。

12月11日 华沙条约缔约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在柏林举行会晤。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详细通报了苏美首脑会晤的过程和结果。与会各领导人“完全支持并高度评价”华盛顿会谈结果,称它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们称赞这一步正在对全球的政治气候产生良好影响,并增进了各国的相互信任,增强了对现实与理智在当前复杂、矛盾然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取得胜利的希望。他们认为,苏美签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符合一切国家的利益,它将是裁军与建立无核、无暴力世界的一个根本性进展。

1988 年

1月7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基辅市党组织关于贯彻苏共 27 大决议情况的工作报告。会议批评基辅市党组织改革不力,指出,基辅党组织在改革开始阶段失去了时间,没有真正地开展工作,改革尚未深入到基层的组织和劳动集体的生活中,市党委、区党委和许多党组织的动作仍然迟缓,没有最终摆脱形式主义和过时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没有为改革提供充分的意识形态保障和组织保证,许多党的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没有保证各企业认真地预先准备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工作。经济干部的注意力没有完全集中在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以及发挥潜力提高生产效益等问题上。会议责成基辅市党组织从根本上改进工作。

1月8日 戈尔巴乔夫参加了苏共中央举行的同舆论界、意识形态部门、创作协会领导人的会晤并发表讲话。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想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来使人民参与管理的全部过程。如果有人拉我们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人想抛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价值”,那就是倒退,就是退步。我们已作出了选择,将沿着 1917 年开展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正在真正地着手揭示我们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知道,这是列宁的思想:无产阶级要通过民主来达到社会主义,在革命以后只有通过扩大民主才能管理社会。戈尔巴乔夫说,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应当忘掉历史或只利用历史的某一部分。今天大家理解了使人感到不安的现象的根源,这种根源已成为决定必须改革社会的直接原因。

1月11日 《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答中国《辽望》周刊记者问。戈尔巴乔夫就苏联的改革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苏联目前所经历的时期，可称为新的时期。苏联为变革的新风敞开大门。已经制定了改革的理论和政治纲领，它的主要方向就是民主化和根本的经济改革。改革遇到过并将继续遇到困难，其中许多困难是改革初期和过渡时期的矛盾造成的。保守和跨越阶段从两个方面拉改革倒退或使命令式的行政管理方法复活。

目前，改革已进入了新阶段。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主，经济体制所有环节的相互关系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些变革涉及大部分人的利益，实际上是涉及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实行这些变革，就是要破除那种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某种普遍平均主义的社会概念。因此，完成既定任务只有一条路，就是使广大群众直接参加管理、作出决定和进行监督。

2月17日——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在17日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等和高等学校改革的进程与党实现这种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8日会议上作了题为《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的长篇发言，发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有关改革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要求以新的态度看待某些习以为常的评定，不仅要以马列主义关于建设新社会的目标对照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也要对照未来的道路，要校正我们实际行动的方向，不要重复僵硬的教条，要寻找对已出现的局势产生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天已确立了一个认识：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必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质是使苏联过渡到崭新状态，保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性更新，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品质。

戈尔巴乔夫还说，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确立劳动人民的权力，确

立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享有福利和优先权。社会主义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结束剥削社会所特有的人与社会疏远的现象，结束人与权力、与生产资料、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与精神财富疏远的现象。十月革命为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开辟了道路。具有转折意义的原则性步骤是，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成果。

全会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决议，讨论了组织问题，解除了叶利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3月9日 苏共中央举行会议听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发生民族冲突事件的汇报。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主要一点是彻底贯彻列宁民族政策的原则，加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苏联高加索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民族的友谊。政治局决定委托中央书记处全面深入地研究纳卡自治州发生民族纠纷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讨论。会议即将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指出，在今天，不考虑各种问题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就不可能解决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葛罗米柯、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以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2月4日 苏联最高法院宣布，撤销50年前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尼·布哈林等20人的判决。称布哈林等人的行动没有构成犯罪的成分，而当时的审判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明，用不允许的方法向被告人取得口供。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不能成立，决定为他们平反。布哈林沉冤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错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3月13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对苏联开展的对斯大林时期的某些批判，对苏联目前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发表了不同的

看法。

来信指出,苏联已出现许多扭曲和片面的东西,以斯大林问题为例,甚至把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的工业化、集体化、文化革命也硬算作“个人迷信”,问题已发展到非要“斯大林分子”“悔过”。为什么对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每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其离开岗位后就败坏他们的声誉呢?

来信说,有的学生认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都是过时的概念。甚至有的科学院士也说,两个不同社会经济体系的国家间的现今关系已失去阶级内容。难道代表自己国家和政治机关的国际工人阶级当今就不反对世界资本了吗?

来信指出,近来以“新自由主义者”和“新斯拉夫派分子”思想为基础,成立了一些非官方的组织和联合体,这些独立的组织已“政治化”,其头头们经常谈论在“议会制度”、“自由工会”、“出版社自治”的基础上“分配权力”。现今发生的争论,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就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

该信的发表很快引起了苏联国内外舆论界的强烈反响。

3月23日 苏共中央总书戈尔巴乔夫出席第四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并作题为《挖掘合作制的潜力,促进改革》的报告。

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三年是顽强苦干的三年。这期间伴随着对新事物的探索,对许多定型观念的破除,大规模的实验和社会领域的发现。现在我们更加认识到,改革是一个迅猛发展的矛盾过程,其间客观的与主观的因素和现象相互作用。而且,随着变革日益深入到我国劳动群众各阶层,它们的作用也不断增大,这就是改革的辩证法所在。”

关于合作制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期,列宁的合作社学说遭到粗暴歪曲。在以后的年代

里,毫无根据地废除了手工业合作社,用行政方法把集体农庄变为国营农场,禁止或者取消了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运动。”“列宁的有关合作社的创新思想被严重丑化了。”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天,我们需要各种类型的合作社。这是在生产服务各领域建立新的合作社。这是恢复和加强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组织的民主、合作制原则,这是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企业的基层劳动集体的合作社。这是国营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有了这种广泛的合作社网,社会公有制的丰富内容就可以成为现实。”

关于合作社运动同改革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首先,改革已形成并继续形成有利的社会气候,解放了成百万人民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这是原则性问题,因为办合作社不能由‘上面’强加。只有靠‘下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办起充满生机的真正具有群众性的合作社,而不是营养不良的徒具形式的合作社。”“发展合作社运动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化的实际结果,是民主的众多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它是加深整个民主化过程、同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杠杆。”“公开性、选举、公开汇报工作、劳动者参加生产管理,这些是合作社所必不可缺的。合作社只有成为自治的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富有成效的经营形式。”

戈尔巴乔夫谈到今后应注意的问题时说,“首先是集体农庄的民主”。他认为“在深化这种民主时,也就是在总的方面来巩固改革”。戈尔巴乔夫说所以要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由于发号施令和外部干预,集体农庄民主本质的基础本身受到了损害”。“最重要的东西——农民的主人翁感和对集体农庄事业的关怀被削弱了。对研究集体农庄事务和选举农庄主席的大会漠不关心,岂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戈尔巴乔夫最后强调:“我们今天的确应当重新评价许多东西,重新思考许多东西,抛弃那些妨碍我们的生活并使生活失去特色的东西。然而,这绝非意味着抛弃社会主义,抛弃它的理想和原则,而是

要使它们摆脱腐蚀侵袭”。“我们能够而且应当恢复列宁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最人道、最公正的社会的面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循改革的革命原则：更多一点公开性，更多一点民主，更多一点社会主义。”

4月5日 《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女教师来信提出尖锐批评。

文章说，除了改革之外，苏联别无他路可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对改革本身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放弃原则》一信表明有人对目前改革的怀疑，其观点与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完全不相容的和对立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保守的和教条主义的。从这封来信可以推测出，就已提出的问题必然要进行一场实质性的辩论。

文章说，在今天进行的大辩论中，有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真理报》认为，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为斯大林辩护，从而在实践中保留斯大林所依靠的“解决”争论问题的方法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党的生活与社会生活准则；而最主要的是为专横武断的权力辩护。

《真理报》的文章称女教师的信是“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书”，指出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具备阶级对抗形式，但都是很尖锐的。

《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

4月22日 莫斯科举行纪念列宁诞辰118周年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在会上作了题为《为社会主义的革新，为列宁主义》的报告。报告分3个部分：1、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在改革事业中的体现；2、掌握列宁的政治领导艺术；3、从革新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

拉祖莫夫斯基说，党现在应该勇敢地摆脱那些在某种条件下，特别是在个人崇拜时期打上烙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观点。目前，在改革

联盟日益壮大的同时，一些人没有从心理上适应新形势，他们不愿参加这项共同的工作。这是改革的严重障碍。改革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党和人民的思维改造，为社会主义意识而斗争就是要克服反改革的观点和情绪，克服旧思维的刻板公式，同朝后看的观点划清界限。

苏共认为，今天的许多不幸都是由于昨天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的行为造成的，揭露真相要涉及许多人的痛处。某些人根本不想诚实地谈论过去。但为了扫清通往未来的道路，苏共将继续这项工作而且不隐瞒任何真相，不管这种真相多么令人痛苦。

5月7日 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见新闻媒介和创作协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结束时发表讲话。他说，党和整个社会都对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抱有期望，改革的反对者也对这次会议表现出巨大兴趣，正在筹划某种计划打算。使许多人担心的是，选出什么样的人参加这次会议。苏共中央就此确定的政治方针是，选举积极支持改革的人出席代表会议。

戈尔巴乔夫说，可以预见到，改革的第二阶段（2——3年）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战略正在变成实际政策，变成社会的实际过程，并会出现新的形势，但现在还远未为此做好一切准备。

戈尔巴乔夫说，他无意下台，并保证仍旧推行其政策。他和利加乔夫还有许多事情要一起去做。今年3月刊登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那篇为已故独裁者斯大林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文章，是一篇反对经济改革的声明。

5月23日 苏共中央召开五月全会（1988年）。全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发表了讲话。全会赞同政治局提出的提纲，并决定将其在报刊上发表，供党组织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广泛讨论。提纲草案共分10个部分：1、关于当前的改革形势；2、关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问题；3、关于完善科技进步管理问题；4、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的目的；5、关于党的自身改革问题；6、关于恢复各级苏维埃的作用和权力问题；7、关于民族问题；8、关于法律改革问题；9、关于完善社会团体的途径；10、关于对外政策的调整。

关于当前的改革形势，提纲写道，改革已成为现实，并产生了积极成果，但尚不能让人有根据地说苏联社会经济发展中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思想的残余还特别富有生命力，不消除这些现象，就不能解决宏伟的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及苏维埃的作用问题，提纲认为，必须改革苏联社会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必须摆脱一切个人崇拜的后果、管理的行政命令方法、官僚主义、劳动人民远离政权、违背列宁的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有关的现象。

提纲说，在改革立法工作时，应严格遵守一条原则，即允许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一切事情。

全会委托戈尔巴乔夫在第19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6月3日 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会，选举出席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市委常委经研究决定，把一些在区一级选举中落选的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经济学家阿巴尔金和什梅廖夫、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莫斯科新闻》总编辑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等，列入无记名投票名单。在市委全会上，被讨论的319名候选人全部当选。戈尔巴乔夫出席了市委全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苏联在各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经济改革还未取得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成果。惰性还在产生影响，还存在再次采用行政的高压管理方法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心神不定。在这件严肃事情上过于激动是不必要的。应禁止使用左的言辞，不能靠它来赢得廉价威信。

6月28日——7月1日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总结三年改革的

经验教训,制订深化改革的纲领和措施,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目标模式。来自苏联各地的代表共 4991 人出席了为期 4 天的会议。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议的第一天作题为《关于苏共 27 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 3 个部分:1、发展和深化改革;2、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3、苏联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的序言和第一部分着重总结了三年的改革成就和分析失误的原因。他说,完全有权把我们生活中的最近三年称为转折性的年代。通过党和劳动人民的努力,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如今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和懂得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体现为各项具体的社会经济计划的改革政策,正在成为千百万人的实际行动。人们感到了自身的责任,正在抛弃漠不关心和互相疏远的态度。革新之风使人民在道德上经受了锻炼。民主化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大解放,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富于首创精神。讲真话和公开性的确立净化了社会环境,使人民受到鼓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积极开展活动。革命性的更新过程日益深入到生活的决定性领域——经济。企业改行经济核算、自筹资金和自我管理,使集体有可能既感觉到自己新的权利,也感觉到责任重担。虽然改革仅仅迈出头几步,而新的经营方法刚刚掌握,但是它们对解决许多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对集体的整个情况已经开始产生积极影响。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从 7 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如何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30 年代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严格集中、靠行政命令领导国家的体制,它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这种体制是苏联历史上改革屡遭失败、个人迷信和“独裁”得不到克服、经济“停滞”以及目前改革进展迟缓的根源。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假如这种政治体制仍然不动,苏联就实现不了改革

的任务。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必须解决下列任务：1. 使劳动人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参加国家管理；2. 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创造条件；3. 调整决策机制，使之协调和体现自由形成的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4. 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和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证条件。5. 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以排除篡夺政权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6. 严格区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7. 建立一种能保证政治体制及时自我更新的有效机制。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戈尔巴乔夫论述了恢复党内民主、划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以及通过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说，应该抛弃一切在 30 年代使社会主义变形、在 70 年代又使社会主义停滞不前的东西。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是一种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公正的制度，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各民族真正平等、各民族社会与精神繁荣并互相充实的制度，是一种渴望和平，能够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制度。这就是“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

戈尔巴乔夫在会议闭幕词中宣称，这次会议气氛之民主是苏共历史上 60 年来所仅有的。会议代表围绕“深化改革和使改革不可逆转”的主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和意见交锋，最后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等 7 项决议。

7 月 1 日 鲍·叶利钦在苏共第 19 次代表会议上发言，就苏联体制改革问题谈了五点意见：

第一，关于和利加乔夫的分歧问题。叶利钦说，在战略方面，在代表大会决议方面以及在改革的任务等方面，他同利加乔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改革的策略方面，在社会公正方面和利加乔夫在工作作风问题上存在分歧。

第二,改革应当先从党内开始。然后,象以往一样,它才能率领其他的人。

第三,改革三年来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没有达到革命改造。

第四,关于党内的开放性和社会公正问题。党是为人民的,而人民应该知道党所做的一切。遗憾的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在社会公正方面有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愤慨,降低了党的威信,对改革速度起了有害的影响。

第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上层的腐败遍及许多地区,党内的许多领导人贪脏受贿,弄虚作假,品行不端,丧失了道德纯洁性、谦虚精神和党内同志关系。对这些问题不能估计不足和加以简单化。

7月29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七月全会(1988年),讨论“关于具体实施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报告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指出,第19次代表会议是党内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事件,它鼓动了整个社会,它的气氛本身就是对改革的重大贡献。它使苏联共产党获得了经受全民政治锻炼和公开性与民主锻炼的新经验,它显示了党的巨大潜力以及人民使改革不可逆转的迫切愿望,同时也表明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保守情绪、怀旧思想、散布怀疑等现象尚未彻底根除。

第二部分着重谈了如何深化农业改革以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和进一步加速经济改革的若干建议。戈尔巴乔夫说,在解决食品问题方面需要采取既有当前性质,又有长远性质的紧急和根本性措施。目前的任务是用使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方式来改变经济关系,这指的是在实行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租赁和承包的基础上解决这项任务,这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党内进行总结和选举的决议》和《关于改革

党的机关的基本方针的决议》。全会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一个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起草有关苏联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建议的委员会的提议。

8月4日 塔斯社全文播发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 30——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发表的公报，为历史上 4 大案件（即所谓“马列主义者联盟”、“莫斯科中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平行反苏总部”）的受害者平反，指出当年对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是在违法和捏造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决定为受害者恢复名誉。

8月4日 《苏联拉脱维亚青年报》刊登该报记者采访叶利钦的谈话。叶利钦表示不同意利加乔夫对他的指责，说利加乔夫歪曲了他对改革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所持态度的实质。叶利钦说，改革是一场斗争，没有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真正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的威望就不能提高；目前除了新闻界和知识分子积极行动外，还看不到其他引人注目的进展，或者进展很小。因此，如果不做令人感觉得到的往前猛冲，改革就会受挫。

8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鲍·利加乔夫会晤高尔基市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利加乔夫说，克服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是苏联的当务之急。坚决反对试图取消苏联人民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坚决反对贬低改革的实际成绩以及散布多党制和在社会中建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等做法。利加乔夫强调指出：苏共是执政党，在加强苏维埃的权力的同时，党并不放弃其领导作用。有时有人表示担忧：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职能上，会不会导致党放弃对经济部门和其他实际工作的领导呢？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有人认为，似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不确立政治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方针，而只是按照市场规律，经济就能够得到发展，这种观点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利加乔夫认为，商品

货币关系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苏联正在克服对此重视不够的做法。但模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模式的做法，对社会主义经营体制根本不适用，因为社会主义经营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利加乔夫指出，苏联对外政策应是国际关系的阶级性质，别的提法只能给苏联人民和外国朋友们的思想造成混乱。

8月1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该委员会已为30——40年代和50年代初受迫害的636人恢复了名誉，一些参与迫害的罪魁分别受到了刑事、行政和党纪处罚。该委员会将彻底调查基洛夫被谋杀一案和其他一系列案件。还附带研究个人崇拜时期驻苏联的某些外国共产党人被迫害的案件。

9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作协会领导人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会上就苏联当前的改革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苏联改革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这是一个带有巨大困难的进程，时间要求采取有力的实际行动。改革正在受到影响，提出的目标和实际工作之间出现了脱节，新与旧的对抗也给改革计划增加了复杂因素，有人甚至想利用挫折和困难来败坏和贬低改革工作。在报刊中，乃至在全社会都可见到混乱不堪的分析和评价。某些讲话和发表的文章的结论是，改革似乎加重了经济状况的恶化，造成了财政不平衡，使食品和商品的供应变得更糟，使住房及其他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对此状况想说明两点：第一，决不能把过去积累的问题统统都归咎于改革，恰恰是过去问题的压力才迫使进行改革的。第二，苏联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苏联只是开始改革。为此，把对过去危机状况的批评武断地、机械地转嫁到今天是十分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各项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力量为基础的。这并不排除同那些鼓吹其他原则的人交流技术与科学、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经济和成就。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

观。我们应当让社会主义的一切潜力为更新社会服务。

9月30日 苏共中央召开九月全会(1988年),研究政治局关于改组党的机构的建议和一些干部问题。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由于党的职能的变化和党作为社会政治先锋队作用的提高,有必要完善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活动。这就需要在党的干部配备方面进行某些变动。

全会决定,解除葛罗米柯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解除米·索洛缅采夫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职务,解除弗·多尔基赫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解除彼·杰米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解除阿·多勃雷宁中央书记职务;全会选举瓦·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政治局委员维·切布里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选举亚·弗拉索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亚·比留科娃和阿·卢基扬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解除他们的中央书记职务;全会确定鲍·普戈为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中央各委员会和改组中央机构的决议:

一、全会决定苏共中央设立下列委员会,并批准下列人员担任各委员会主席:

1. 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
2.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梅德韦杰夫);
3. 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斯柳尼科夫);
4. 农业改革委员会(主席利加乔夫);
5. 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
6. 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

二、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在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下党的机关的职能变化,实施有关建立苏共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员会新的结构的实际措施。

三、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在正在进行的总结和选举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党的机关的干部选拔问题，把政治素质好和业务能力高、坚决拥护改革、在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中受到信任和有威望的同志提拔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来。

10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举行非常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替退休的葛罗米柯。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采取改革方针的出发点是，依靠国内创立的经济和精神潜力，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坚决摒弃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曲解和歪曲，充分发挥我们制度的潜力，在最短时期内使国家达到现代水平，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戈尔巴乔夫说，现在，改革和社会更新已进入新时期。现在，只是热烈的讨论、召开大会、对过去错误进行分析，已经不行了。需要实际地向前迈进，改进我们各个方面工作的状况，特别是涉及到人民生活条件的那些地方。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并理解到我们的问题和困难。但是，他们要求采取更坚决和果断的行动。劳动人民对于我们苏维埃机构、经济机构、社会团体和党的许多委员会目前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10月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与实现中央九月全会（1988年）决议有关的问题。会议决定，为加强苏共政策和开放性、加强苏共与群众的联系，将出版《苏共中央通报》。通报将正式发表党的最高机关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定期通报中央及其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情况；发表苏共中央最重要会议和会见的速记记录、关于选举和任命党的工作人员及其简历材料以及地方党组织生活简讯等。政治局会议还赞同关于出版《政府通报》作为苏联部长会议正式机关报的建议。它将“定期通报政府在贯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方面的活动情况以及同全国进行的改革有关的迫切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出版这两个刊

物,符合党的加深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方针,将有助于扩大党和国家生活领域的公开性。

11月5日 苏联举行十月革命71周年庆祝大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尼·斯柳尼科夫在会上作报告,谈近几年改革的成效、性质和当前的主要任务。斯柳尼科夫说,改革虽然刚刚开始,但已为社会主义输入了新的能量,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公民积极性正在提高。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法制国家的做法正在为社会的创造性开辟广阔前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的方针有助于更积极地确保苏共的先锋作用、增强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和发挥社会团体的自主权。改革是向社会的崭新状态过渡。西方希望我们的改革超出社会主义范围是徒劳的,我国人民不会改变十月革命的选择。改革是为了解放社会的动力,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消除一切干扰表现人民意志和个人利益的因素。斯柳尼科夫还强调说,改革的关键是根本的经济改革,为了尽快调整好经营机制,需要把计划与奖励,整个商品货币关系,劳动报酬形式和制度,组织结构提高到一个崭新状态。特别重要的是把新的经营原则推行到所有的劳动集体、班组、工段和工位。报告人还指出,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和不同制度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原则,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列宁关于优先考虑全人类利益的思想正在得到实现。

11月28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十一月全会(1988年),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的决定》。决定指出,即将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具有重大政治意义。需要按新方式组织选举运动,要充分考虑到,候选人的实际竞争将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党组织的任务是千方百计促进选举过程的民主化,应坚决摒弃按照名单选举和事先安排的做法,认真听取人们的意见和关心人们的情绪。要根本改革宣传鼓动工作,应当讲真话,不要回避尖锐问题,要善于运用解释工作的积极形式,其中包括辩论。

全会批准了苏共中央(1988年)九月全会决定建立的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12月1日——3日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苏。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同钱外长共举行了三轮会谈,就各自国家进行的改革、两国关系和一些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外长,戈尔巴乔夫表示,现已具备使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入最后阶段的基础。苏联希望早一些解决这个问题。两国伟大的人民正在改造与改革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有利于发展苏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我们的根本利益并不相互矛盾。从两国正在解决现代化的国内需要来看,从国际角度来看,现在是合作的良机。至于对外政策,各国可根据各自利益行事,同时可以进行广泛磋商、互通信息、交换意见。

12月6日——8日 戈尔巴乔夫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长篇演讲,阐述了对当今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就裁军问题提出了重大建议。戈尔巴乔夫指出,世界事态的发展进入了转折时期。世界在进入21世纪时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的挑战,靠旧的方法已无法解决未来的问题,应该建立一种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现实改变着整个世界形势,过去遗留下来的分歧和对立正在消失或改变。现今已进入“全人类的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的时代,这要求优先考虑全人类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建议应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减轻债务负担。苏联将同意某些国家延期偿还或勾销它们欠苏联的债务。关于裁军问题,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已决定在今后两年内将单方面裁军50万,常规武器的数量也将大大减少。苏联还决定在1991年之前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予以解散;大幅度减少在欧洲和亚洲地区以及在蒙古,特别是中苏边境的驻军;通过试点逐步实行军工生产转民用生产。

1989 年

1月6日 苏共中央举行同科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会晤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讲话。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联目前就改革所展开的辩论的性质时指出,改革需要辩论,但目前的辩论中有些东西令人不安。一些人认为改革导致了混乱,威胁到国家的正常发展,甚至产生了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情感方面,而且具有某种哲学和政治内涵。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框框对于改革来说似乎是太狭窄了,他们逐渐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是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和反对改革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指出,新的一年可望成为深化政治改革硕果累累的一年。但如果没有社会意识、人们的心理和思维等方面的变革,改革的目标将无法实现。摒弃僵硬的教条和模式,改革陈腐的社会关系形式的进程,已使一些人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认为改革是在出卖社会主义并在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造成了困难。这种观点的背后如果隐藏着政治立场,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无论是从“左”的立场,还是从右的立场评价改革的企图都是不能接受的。

1月10日 苏共中央举行例行全会,讨论有关从苏联共产党中提名和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问题作重要报告。戈尔巴乔夫指出,在面临选举运动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时,党作为社会的组织力量和一体化力量所起的作用尤其巨大,需要苏共政治纲领的必要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为了加

强人民对党的信任,就必须继续和深化改革进程,始终关心和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经验证明,选举必然会遇到妨碍更新进程的保守主义的表现,遇到人为阻止在生产和生活其他领域采用先进组织管理形式的作法。一些人很难摆脱“左”倾冒进、超越发展阶段的企图,一些人在改革问题上进行投机。对此要作出认真的分析和评价,以保证按既定的方针前进。

全会通过了《致党、苏联人民呼吁书》和《关于举行从苏共中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决议。

1月21日 戈尔巴乔夫出席苏共莫斯科市第27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戈尔巴乔夫谈到多党制问题时说,大家生活在一党制国家,这是历史形成的。有些人认为,为使社会充满活力地发展需要多党制。但这种观点只能在寻求一种保证积极的社会生活、保证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而这正是党通过政治改革、民主机制、公开性和批评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此,应尽一切力量使党真正作为政治先锋队而展现在人们面前。谁也不能在政治上代替党。今天,在发扬公开性、民主化的情况下,党是一支强大的思想政治凝聚力量。党不应该以施加压力的方式做工作,不是以官僚主义的形式,而是通过政策、意识形态工作和干部工作来起作用,这就是党的职能。

2月12日 苏联著名政治理论家C.贾拉索夫以《多党制不是多元论的唯一机制》为题,在《东方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谈苏联开始讨论多党制的一些观点。文章认为多党制对苏来说不是确保意见多元化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法。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比如苏联)存在几个共产党的活动是允许的。以苏联为例,苏共分成两个部分——“迅速改革党”和“逐步变革党”。它们之间会发生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但立,即在苏联实行多党制,那完全可以预测国内局势将达到严重尖锐的程度。列宁曾提出一种不同于多党制、保障民主的方案,即应当保证执政党内有广泛的政治自由,在讨论问题时,每个党员或整个党组织

有权公布行动纲领,谁的纲领赢得拥护者多,谁就获胜。党可以只有一个,但应允许其他形成竞争的政治团体。执政党如不制定最佳政策,其他团体就会提出来。现在苏联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这就是苏联今天发扬民主的道路。

2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从全国各地前来莫斯科的国民经济一些部门的工人时,谈了对多党制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说,关于多党制的辩论是什么呢?这种辩论是没有根据的。要知道,即使有三、四个政党存在,也可能保持这种强迫命令的做法,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不能自由呼吸!重要的是,社会气氛应当是民主的,应当有民主制度,人民真正能够作出决定,监督各项事务,提出批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以及公开性,这才是主要的。党将坚决走这条道路,并将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来支持这些进程。这就是说,在民主的范围内,我们应当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反对那些干挠我们的人,反对那些提出种种杜撰的怀疑思想的人。这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的人干的。

3月3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在接见鄂木斯克州党组织和社会团体代表时的讲话。利加乔夫说,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要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和法制的政权,就极其需要自由的对话,公开地对比各种观点。但要十分明确地、坚决地否定政治钻营和冒险主义。不能允许个别人或一批人利用民主和公开性来达到谋私利和反苏的目的。利加乔夫指出,改革思想本身是由关心人而产生的,是由关心人而决定的。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解决食品问题。为什么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呢?原因之一是苏联的农业政策不总是具有通盘考虑的特点。农工综合体远不是和谐的,它的主要环节不平衡,没有合成一个统一的生产线。同时国家的农业政策对必须及时地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考虑不够。当然,食品增长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农村社会发展严重地落

后于农业工作者的需要。

3月15日——16日 苏共召开三月全会(1989年)审议下列问题:1.关于进行选举代表苏联共产党的苏联人民代表;2.关于在现代条件下党的农业政策。代表苏共的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出席了全会。苏共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主席科普秋格就第一个问题作了报告。然后举行了投票,参加投票的有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没有进入苏共中央机关但却是其他党的选举机关成员的部长和军区司令员。无记名投票结果,所有的候选人都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的苏联人民代表。全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选出的苏联人民代表委托书的决议》。委托书提出有关政治、经济、外交建议,将提供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些建议包括:不断提高苏共先锋队的威信;制定全民投票法,国家重大决策通过全民投票作出;加强苏维埃联盟的团结,采取措施使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地的族际关系正常化,制止敌对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坚决实行使经济面向社会的方针,更加重视解决人民切身的重要问题;加快制定租赁法;制订国防法;最高苏维埃成立国防问题专门委员会,监督军费使用情况,等等。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就“关于在现代条件下党的农业政策”的问题作了报告。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邀请了一批农业边疆区委员会书记、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承租人、学者和农工综合体的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全会。

全会的参加者都预先熟悉了党的农业政策问题文件的方案,这些方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方针和第19次全苏党代表会议和方针起草的。

4月21日 苏共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城市劳动人民代表集会,纪

念列宁诞辰 119 周年。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在集会上作了题为《列宁主义和改革：为了现实主义和创造》的报告。报告要点是：

1. 苏联在改革方面已迈出不可逆转的步子，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超出当初的预料，触及各个阶层。在满足人们日常需要方面未取得明显效果，使人产生急躁情绪，有些人失望、消沉。党要考虑他们的情绪，对政策作必要的修改。

2. 经济仍然是改革中最困难、最激烈的领域。根本改革经济机制，不可能不触及到所有制关系。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新的经营方法就是无本之木。党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来解决这个任务。

3. 民主改革已在政治范围内展开。在一些地区的民主浪潮中，有人试图采取暴力，提出最后通牒性的要求。采取对抗和极端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能放纵利用民主和公开性，以达到反对改革、反对社会主义和宪法的破坏目的的行径。

4. 党在团结各种力量方面起最重要的作用，它依靠对话和同各种健康力量合作来对付任何分裂苏联社会的做法。从当今国际关系看，团结尤其迫切。

4 月 25 日——26 日 苏共中央召开四月全会（1989 年），讨论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些组织问题。全会接受 110 名已退休的苏共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提出辞职的请求，并进行了补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讲了话，他说，人民代表的选举表明，改革确实在变成全民运动，也表明人民对各方面不满。改革未取得预期的结果，根源在于中央机关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指出，从竞选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深入群众，用政治方法进行工作，不要把党变成辩论俱乐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全会可以并且应当成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这是改革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

党决心继续发展改革,沿着这条道路更加积极和更加有效地、富于成果地解决这条道路上提出的各项复杂任务。

5月15日——18日 戈尔巴乔夫访华。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国学术界发表讲演。在谈到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把改革进程看做是自己国家的,苏联的,一丝一毫地不愿意把它强加于任何他国。正是把一个模式,何况还不是完美无缺的模式强加于他人,或者照搬模式,成为过去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许多摩擦的原因。

我们牢牢地掌握了这个教训。我们是在完全尊重独立和选择社会发展的方式与方法的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同一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我党发展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时,也是从上述原则出发的。我们和中国同志商定,在这样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目前,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从内容上,而且有时从形式上同我们改革有近似的进程。这再次证明,应更加积极地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一方面,创造性地吸取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好的东西,而另一方面,避免重犯错误。

苏联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破除了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制度的错误概念,同时还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向前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

5月25日——6月9日 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5日代表大会开幕当天,戈尔巴乔夫被提名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在施政方针中谈到要忠实于在民主、公开性的基础上革新社会以及对人的尊重,不允许官僚主义作风、脱离人民、固步自封。主张同党内外各阶层对话,并要同难于对付的社会运动对话。强调总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是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

通过的正确建议。26日,代表大会进入第二天,主要议程是选举最高苏维埃。会议围绕如何区分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权限,最高苏维埃代表是否一定要完全脱产,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代表是分别由各加盟共和国选举还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问题进行了争论。27日,苏人代会联盟院举行选举,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弗·吉洪诺夫教授等人落选。叶利钦在民族院选举中落选。28日,莫斯科15万人在卢日尼基广场举行集会,对人代会迄今一些结果表示不满和抗议。对叶利钦未能被选入最高苏维埃不满,要求提名叶利钦为副主席。29日,苏人代会选举阿·卢基扬诺夫为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大会上,27日已当选为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的鄂木斯克大学副教授卡赞尼克主动表示可以让出自己的席位,条件是席位要由落选的叶利钦递补。经大会表决通过,叶利钦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30日,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作《关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报告。31日,叶利钦在人代会上讨论戈尔巴乔夫施政报告时发言,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当前状况不能推卸所应负的责任。6月9日,苏联第一次人代会闭幕。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这次代表大会将引导苏联走向民主和公开性以及改革本身的一个新阶段,它是国家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

6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决定全文。其要点如下:

1. 关于国内形势。决定认为苏联正处于关系到改革命运和国家未来的紧要关头。改革进程艰难,国内状况复杂而又紧张。国家尚未摆脱危机,社会革新遇到旧的结构和思维的顽强抵抗。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道路上也出现严重问题。

2. 关于社会问题。要求更加关心人,关心进一步民主化和人道化,关心精神革新和彻底实现社会公正原则。

3. 关于经济问题。基本赞同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报告中关于振兴经济, 削减预算赤字, 调整货币流通, 以商品和服务充实市场的建议。

4. 关于政治改革。赞同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机构间的职能, 主张着手起草新宪法, 决心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加强法院独立性。

5. 关于民族问题。确保大小民族在联盟国家范围内得到自由全面发展, 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永远排除暴力。

6. 关于对外政策。目前在裁军和加强信任方面的积极变化尚无不可逆转的保证的情况下, 确保国家有可靠的防御能力。欢迎中苏关系正常化, 认为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6月30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会议发言, 在谈到干部政策时, 戈尔巴乔夫说: 我完全相信我们能够改变形势。在那些事情进展不顺利、干部对改革的要求充耳不闻、对人民的困难装聋作哑的地方, 应该在党的工作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执行有关的、能够保证解决实际任务的干部政策。

这一点适合任何一级的干部。如果共产党员领导人把事情搞糟了, 那么党的机关在这方面绝不留情。这有关事业本身, 也有关党的威信。

7月1日 戈尔巴乔夫就日趋严重的苏联民族问题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 说民族问题已使每个苏联人深感担忧, 民族关系尖锐化的危险性正在日益加深, 最近以来, 发生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事件和磨擦, 甚至出现民族冲突, 使人们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在许多情况下还造成了人生悲剧。如果不认识到这种局势的巨大危险性, 如果让这种现象蔓延开来,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最坏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呼吁全苏各族人民表现出最大的责任感, 本着友好与团结精神解决民族关系中存在的紧迫问题。必须查清各方面的情况, 采取一整套措施来改善民族间关系, 消除造成复杂局势的一些根本原因, 使民族关系

纳入正常、健康的轨道。针对民族关系中积累的种种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4项解决措施。1. 要让每个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在祖国的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一切权利;2. 每个民族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满怀信心地生活,要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由地发展语言和文化创造一切前提;3. 必须对苏维埃联邦制实行深刻的改革,但同时要考虑到数百年来,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年代所形成的现实;4. 党、团员和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要负起责任来,因为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具有重大影响。

7月4日——6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同法领导人会谈两国关系、欧洲问题、裁军、地区性冲突等问题。5日,戈尔巴乔夫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说:我不同意那种只有波兰和匈牙利有民主化的说法,其实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变革。变革在迅速发展,这是一种将可以达到新的生活和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整个潜力的自然现象。不应该谈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危机,而相反应当谈论更新。5日晚,爱丽舍宫发表文件说,在戈尔巴乔夫访法期间,法苏签署了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等方面一共22项协定与文件。

6日,戈尔巴乔夫在巴黎大学发表演说,说苏联解决改革任务的关键是克服人与所有制相脱离的现象。苏联采取的各项有关打破行政命令体制、改造生产关系的措施的共同点就在于此。苏联为发展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开辟了广阔天地,使市场、商品货币关系、主动性、进取心、经营的本领等为消费者服务。总之,是使经济面向人及其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克服人与政权相脱离的现象。政治改革的实质是:恢复苏维埃的全权,真正自由地竞选,使整个社会生活摆脱教条和禁忌,公开性,执行机构实际汇报工作,法院的独立性。改革将使苏联重新获得社会主义不加歪曲的价值观念——民主、人民政权、社会公正、人权。

7月18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说苏联目前在社会经济领域和社会风气中已出现紧张局势。对此,今天和将来都不会有简单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可能用老方法和老观点驾驭尖锐的形势和进程。在日益更新的社会中,党也应当不断更新。一切都应从党开始。此外,更新党和完善党的工作方法总是应该超前进行,以使日益更新的党能够制定出当前改革的进步政策,并通过相应的组织和思想工作,通过最有效的、集约化的和符合时代精神的干部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只有这样,党才能发挥社会政治先锋队的作用。谁都不能取代日益更新的党。因为它掌握着切实重要的、决定改革成败的职能,而且它只有作为一个革命力量,才能实现这种职能。这一切都应该看到并搞清,只有这样,在分析我们的工作时才不致于犯错误。而主要的是使党能够不断加强,使党的精力、影响和革命力量不断增长。不能败坏党的威信。在这方面,现在不能作出任何最有力量的指示或决定。我们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赢得威信,向社会提出了改革政策。社会相信党,支持党,跟着党走。今天,要赢得威信,只能把改革政策果断地、彻底地付诸实现。党要赢得威信,现在和将来都别无其他道路!如果有谁指望有另一条道路,那是不现实的。

7月23日 戈尔巴乔夫就7月中旬开始的矿工罢工问题向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说如果紧张局势继续下去,就会对国家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他还谈到要从罢工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首先就是需要改革。总的说来,在矿区发展中积压了许多问题,我们确实应当在改革中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今天这个问题由矿工尖锐地提出来,不是没有理由的。人们期待着更好一点,而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改革的途径。其次,应该更加坚定地进行改革。如果国家坚定地走改变经营方法的道路,这种可能性就可以得到增强。戈尔巴乔夫还说:改革必须面对实际情况,坚决为人民利益办事,同人民一道讨论,找到解决最困难问题的办法。

8月11日 苏联为“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在一次例会上听取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给未经审判就因所谓“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恢复名誉的有关材料的审理结果的通报。此案是1934年12月在所谓“列宁格勒中心”案侦察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的过程中被列为特别诉讼程序的案件,未经检察长批准,就被内务部逮捕77人,其中65名联共(布)党员。他们被指控参与谋杀基洛夫,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控告。内务部于1935年1月16日通过一项决定,凡此案人员都受到剥夺自由或不同刑期流放的惩罚。后来许多人再次遭到更严厉的迫害,直至枪决。

考虑到对所谓“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案的全部参加者提出的政治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要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给他们彻底恢复名誉。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已为此案绝大多数的受审人员恢复党籍。

8月17日 苏共公布纲领性文件《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草案),供全民讨论。文件阐明了苏共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文件指出,苏联的民族问题最近极其尖锐,因此解决所出现的问题对于改革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具有重大意义。民族问题尖锐化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大规模的镇压,特别是把整个民族从他们的习惯居住地迁往其他共和国和地区。尽管在苏共20大以后谴责并取消了有关决定,但是还没有在各种情况下取消由于不公正而造成的后果。现在,当苏联社会走上重大的、根本改造道路的时候,就要为自由的民族发展开辟天地,增强社会的在族际主义原则下的统一,巩固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文件接着强调指出,苏联最近的发展过程使人得出下述结论:“苏维埃联邦制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在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中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明确规定联盟和各共

和国的权限以及相互承担的义务。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公认的提法：“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各共和国，就没有在强大的联盟”。文件中提出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涉及到共和国实行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要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自主权。文件中提到的其他问题还有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自由发展，维护各民族公民的权利，解决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地位及其民族国家结构问题。

8月26日 苏共中央就波罗的海共和国出现脱离苏联的局势发表声明，批评当地领导未捍卫原则立场，呼吁各界坚决制止有害趋势。声明说，那里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集团利用了民主和公开性，把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引到事件的发展中来。他们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苏性质很快暴露出来。在有些地方已开始建立平行的政权机构。他们还把国外的组织拉进来，成为自己的顾问。这些破坏势力的活动导致在共和国一级通过违反苏联宪法的文件。民族主义势力的活动也导致了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的非常严重的损失，导致了族际间和社会的紧张关系。有些地方确实存在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危险。声明主要是针对8月22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苏德条约是非法的和无效的；立陶宛议会关于立陶宛加入苏联的宣言（1940年7月21日）和苏联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苏联的法律（1940年8月3日）也是非法的，不具法律效力。苏共中央在声明中指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上述声明并非个别事件，它与波罗的海沿岸3个共和国的某些势力顽固地推行分立主义路线有关，声明认为，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未能制止消极倾向的发展，未能坚持原则立场。部分党委则在困难面前畏缩，有些人甚至讨好民族主义情绪。苏共中央呼吁这些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要认清形势，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声明表示，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统一的大家庭和苏共各支队伍的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8月28日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举行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声明,通过告共产党员书。建议对声明进行讨论。就各方面问题进行坦率的对话,耐心地寻找摆脱困境的途径。坚决回击旨在挑起民族纠纷、颠覆现有制度的活动。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瓦伊诺·维亚利亚斯在共和国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爱沙尼亚共产党的出发点是,爱沙尼亚是作为一个主权共和国加入苏联的。关于发展的可能性问题,首先即是苏联进一步民主化,根本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在民主法律保障基础上恢复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指出,在拉脱维亚的确存在着分立主义表现以及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拉脱维亚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它的立场是始终不渝的:争取组成崭新的苏维埃联邦中的拥有主权的拉脱维亚,争取拉脱维亚共产党作为苏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新的地位。拉脱维亚党中央强调指出,拉脱维亚的共产党员、全体劳动者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族际主义事业就是为克服经济中的危险状况、创造人们崭新的生活而进行忘我的劳动。这应该成为团结拉脱维亚一切社会集团和民族集团的基础。拉脱维亚党中央呼吁保持安定,要谨慎从事,要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发表声明,呼吁居民要清醒地认识到,立陶宛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苏联是一体化的。立陶宛可以成为平等的共和国联盟中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

9月19日——20日 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全会,听取、讨论并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题为《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报告。报告承认,苏联民族问题极其尖锐。几十年来犯下的错误和造成的扭曲现象表现出来了,多年来潜在的族际冲突爆发了。目前,急需从原则立场出发讨论民族关系的现状,并制定党在民族问题上战略。党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列宁主义的民族

自治原则。他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一些相对有成就的共和国和州追求自给自足的趋势以及自我孤立和与其他共和国和州断绝往来的企图是极其危险的。这可能对那些想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带来极其消极的后果。新的民族政策的使命在于,保证有广泛的可能满足每个民族的特殊利益,同时加强各民族公民权利的保证。苏共不会放弃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的道路,但凡是形势尖锐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地方,苏共将利用苏联法律的全部力量。20日,苏共中央全会审议了苏共民族政策纲领草案并通过了这一纲领。全会认为,这一纲领的各项思想和提法符合改革的迫切要求,可以成为革新联邦制、发展所有民族国家实体,解决其他民族问题的政治基础。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共和国中央、边区和州党委制定具体计划,努力实施纲领中所阐述的思想。

在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还作了关于召开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他说:提前召开28大在不小程度上是因为必须在考虑到党在改革阶段作为政治先锋队的新作用的情况下实现其自身改革。现在党的机关和党组织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被陈旧的组织机构、过时的规章制度所束缚。部分干部热衷于陈规陋习对此也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使党的事业裹足不前。苏共提出了革命改革、社会民主化的倡议,它打算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说,改革伊始,许多人就注意到尊重苏联历史和整整几代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必要性。目前正进行着一场政治斗争,一些人主张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另一些人则主张转向资本主义,将私有制和多党制引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危险恰恰来自后者,而不是来自那些因忠于社会主义而被贴上“保守主义者”标签的人。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才能革新社会主义并发挥其潜力。

20日,苏共中央全会闭幕。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改组。尼科诺夫、

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索洛维约夫和塔雷金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克留奇科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马斯柳科夫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普里马科夫和普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还选举4名州委书记为中央书记。

9月22日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双方就广泛问题交换了意见。戈尔巴乔夫说，改革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是要摧毁十月革命所创立的基础，而是要摆脱一切扭曲社会主义的东西和一切束缚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接受者自由活动的东西。苏联的各阶级和各阶层、苏联各族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理想，是改革的主要特点。苏联公开吸收其他社会制度的成就，也是为了更充分地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并证明社会主义在人类共同进步中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不能把国际共运中的一切探索工作都视为修正主义和背叛。在这方面，苏共应承担过去从统一模式立场出发谴责一切所应负的责任。对友好国家所形成的局势可以感到不安，但应相互理解，应考虑到兄弟党决定自己政策时所处的形势。

9月28日 戈尔巴乔夫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新，而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这是革命的改造，是消除社会主义的扭曲现象，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党过去和现在一向起主要的组织、协调和团结的作用，不允许出现不良的和悲剧性的事态。某些“理论家”、集团和运动为了谋取政权，正在寻求工人阶级支持，企图同党对立并提出党自我取消问题。有些人对党的革新和放弃某些过去的职能的事实本身，特别是对党使自己接受人民的公开监督、实行民主化、好象正在失去先锋队作用的事实越来越公开地表示不满。有人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好象改革背离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从而使国家陷入混乱。这一切都是对党的诬陷，苏共提出并奉行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它将坚持这一政策，并且深化和在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下调整这一政策。有一股势力今

天力图开始向党发动正面进攻,想使党在人民眼中看来在理论方面已经破产,但是党坚决摒弃了许多过时的教条理论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看法。我国人民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作出了选择,尽管过去发生过对社会主义、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歪曲,但是,我们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10月23日 戈尔巴乔夫接见《真理报》编委、各部主编和该报党委成员,并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为改革所做的一切就其涵义来说是真正革命的事业。我们说这是革命中的革命,是想以此强调,第一,今天的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证明,1917年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作的选择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今天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的革新带有革命的性质。例如,这种变化触及到了所有制关系,它的目标是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疏远,与自己劳动成果的疏远,使人成为经济中的真正主人,这是最主要的。实质上,这里指的是,通过根本的经济改革,把经济权利交给劳动者。第二,我们是想把解决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这样一个任务进行到底:克服人、劳动者与政权的疏远。为此才开展了政治改革。这个过程发展如何呢?这里还有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东西。但是,无疑,我们在这方面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以此来实现人民政权的思想。我们是想通过民主化,通过复兴苏维埃和它在当前情况下的作用的新认识来使人成为改革和社会的主人公。也就是说,正在发生真正深刻的革命变革,我们应该说,我们面前出现的,可能是最复杂的任务:道德和精神复兴的任务和社会健康化的任务。

10月24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在雅科夫列夫主持下,重新研究了30年代一宗涉及多人的反革命案件,认为所谓“斯列普科夫和其他(‘布哈林学派’)右派反党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不真实的。苏共中央监委恢复了有关人员的名誉,并恢复了被列入季诺维也夫反革

命集团的 H. 巴尔金的党籍。

10月30日 苏共中央召集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企业负责人开会,讨论苏联当前社会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要求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动员起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在如何摆脱经济形势的途径问题上,意见分歧是很大的。我们的构想和基本意图在于,希望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重新振作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现象。我认为,这才是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问题——人是问题的中心。我们打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就在我们的构想中: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通过改革所有制关系和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通过使道德领域和整个精神生活健康化。总之,要把人作为目标,而不是作为手段。与会者就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投资、税收、企业自主权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和建议。

11月7日 莫斯科群众举行庆祝十月革命72周年游行,戈尔巴乔夫在红场列宁墓检阅台上对苏联电视台记者发表讲话说:经过这些年以后,我们确信,十月革命的选择及其理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我们的口号是更坚决地走改革的道路,更快地实行新的生活方式。他接着说: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展现出来。当我们谈到革新社会主义时,这首先是同提高人的福利联系在一起的。劳动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向新生活,走向普通人感到自我良好和自信的生活,感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国家命运的主人。改革就是要民主,要公开性,要经济生活民主化,要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要使人们掌握精神文明,掌握政治进程。改革使人们高尚起来,这是最主要的。

11月15日 莫斯科举行全苏大学生会议,戈尔巴乔夫出席,并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说,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1917年十月革命不是错误或偶然的事件,而是走向未来的伟大的全世界历史性

突破。他接着说,在个人崇拜年代所发生的社会主义扭曲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不可能不反映在群众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上,因为这种扭曲歪曲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并使它的内容贫乏,对整个社会面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产生了不良影响。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最初认为,改进和完善某些东西就足够了。我们今天却坚定地得出一条结论:需要彻底改革一切,需要确保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政治进程、精神生活领域和我们社会的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因此我才说,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的我,已经准备好进行深刻变化了。这就是发展的逻辑。在谈到苏联宪法第6条和多党制时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已走上深刻改革的道路,需要对宪法作出修改,可能涉及宪法的第6条(党的领导作用)。但是有人以讨论这一条为借口,企图贬低党的威信,散布对党的怀疑,这是在打击改革。有人认为实行多党制才能表达各方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苏联应当证明,苏联能本着自己的价值观来改造社会,不诉诸武力、国内战争和流血,而是通过民主、改革政治进程和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的途径。

11月1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召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体成员参加,要求立陶宛党中央说明召开20大的原因,以及独立后的立共与苏共的关系。会议听取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关于共和国党组织在实现改革任务方面的工作汇报,并同立共中央全体成员一起讨论了立陶宛的形势发展。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出,立陶宛在改革过程中矛盾重重,这同持有反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势力加紧活动有关,妨碍了改革的进程。该共和国的党组织往往落后于形势,未能一贯及时地用明确的政治方向武装党员干部和劳动人民。会上一再说服立共不要脱离苏共。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一个共和国的问题,而且把当地主要领导召来首都,这是不同寻常的。

11月22日 列宁格勒两万多名共产党员举行集会,表示要捍卫共产主义理想,不赞成反列宁主义,不赞成私有制,不允许利用改革打击共产主义。提出如果苏共中央全会不对各种现象作出评价,就必须进行全党辩论。集会通过的决议说,国内事态的发展达到危机点。考虑不周的决定和不正确的行动造成的后果的主要负担落在工农和不富裕的居民身上。假民主主义者正在向党发动进攻,某些新闻工具站在他们一边。列宁格勒党员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袖手旁观,坚决反对实际上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方案。25日《消息报》发表文章《列宁格勒的集会》,对列宁格勒党员集会所见所闻表示担心,文章说会上个个发言固执地在普通党员和中央之间树立一道墙。26日,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菲耶夫的谈话,责问列宁格勒党员大会是支持哪个党。

11月26日 《真理报》今天发表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阐述他对社会主义前途和他自己提出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计划的想法。该文原编者按说,这篇文章综述戈尔巴乔夫最近时期一系列讲话所阐述的思想,文章共分4个部分:一、我们向何处去?改革的意义和使命;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三、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四、社会主义的新面貌。

戈尔巴乔夫在文章中叙述了他对苏联各领域改革的构想,驳斥了关于改革缺乏明确计划的说法。他说:苏联现今有一项复杂任务,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我们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历史道路的一个长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放弃专制的官僚体制,形成真正民主的、自治的社会机体。在这个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的过渡时期,各种成分和因素结合并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在各种经济、社会形式和体制、各种意识形态倾向的竞赛中,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的新面貌,革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要延续几十年,直到21世纪的过程。如果说在初期我

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是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改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方面实际采取措施。

12月1日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将于12月举行的立陶宛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问题。专程赶到参加会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宣读了戈尔巴乔夫致立陶宛全体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并作了长篇发言。全会上展开的讨论反映出该共和国及其共产党内的革新进程的矛盾性和非一致性,对立陶宛共产党的未来、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在使共和国主权充实实际内容方面的作用和地位,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在全会上梅德韦杰夫对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在立陶宛建立独立于苏共之外的共产党这一情况表示不安。他说,这种倾向在作出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尤其在公布该共和国共产党地位的草案(实际上是另一个党的章程)之后变得强烈起来。他把脱离苏共的意图看作是在改革发展的最紧急时刻对改革的打击。布拉藻斯卡斯接着发言,对戈尔巴乔夫呼吁书提出看法并逐条加以反驳,重申召开立陶宛20大的理由,说这事已酝酿很久。立陶宛的独立是客观需要,是历史及内部条件决定的。说立共之所以要脱离苏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近两年立共威信急剧下降。在非正式组织的强大攻势下,如果立共不争取主动,就可能完全失去群众。

12月9日 苏共中央就即将召开第二次苏联人代会等问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增选伊瓦什科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罗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批准他为《真理报》总编辑。通过《致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员呼吁书》,强调坚决反击右倾极端主义和“左”倾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表现,维护国家完整。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苏共坚定地遵循列宁关于党是先锋队的概念。党的威信、对党的信任取决于党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履行自己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作用。把事情说成似乎苏共的地位只是宪法第6条决定的，就会使人产生误解，使人糊涂。中央委员会将同企图贬低党的作用，破坏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威信的做法进行坚决的斗争。

由此而产生了我们对宪法第6条的态度问题。我们已经走上并且正在走社会改革的道路，今后将出现经济、政治、法律改革和改造苏维埃联邦制的新阶段。所在这一切都要求修改苏联宪法，而最终还需要制订新的基本法。在这个进程范围内，任何一条都可能成为重新思考的问题或者予以取消。这也完全适用于第6条，何况列宁在世时通过的第一部苏联宪法里也没有这样专门写下党的领导作用。即使在1936年的宪法里，也只是在针对公民结社的权利时才谈到这个问题。

必须补充说，在国内正在发展民主进程和苏共革新的条件下，这一条本身并没有为自由选举制造任何障碍。已经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地方权力机关和共和国权力机关的选举也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要“十万火急”地讨论宪法第6条的问题，赋予这个问题以紧急意义的做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有人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涣散共产党员的士气，降低党员在改革的转折阶段的威望，使党同劳动人民对立起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12月12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改变经济方针满足人和整个社会的需要是改革中优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完成重大的和复杂的任务需要有组织性、实干精神、纪律性和责任心；需要向混乱现象和不善经营发起坚决的攻势，为此，我们最需要的是使社会团结起来。在谈及苏联宪法第6条时，戈尔巴乔夫说，在已开始的新宪法制订工作范围内，任何

一条都可修改或取消,但改革表明,宪法第6条并不妨碍实行自由选举,因此赋予这一问题某种特殊意义的做法完全是追求另一目的。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几位代表提出的讨论苏联宪法第6条的建议。

12月25日 25至26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研究立陶宛问题。戈尔巴乔夫在25日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立陶宛共产党20大通过的《立陶宛共产党独立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及立陶宛共产党纲领和章程,表明立共朝着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脱离苏共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一问题远远超出党内关系范围,实际上是对政治改革和本着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革新社会主义计划的打击。戈尔巴乔夫说,立陶宛党组织的某些领导不能控制和影响该共和国的政治局势,不能实现苏共的改革方针。一方面要明确表明党和国家现领导不允许联盟国家的解体,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听取对方的意见,作出相互的让步和妥协。良好的关系靠命令和武力是建立不起来的,要做长期细致的工作。用列宁的话说,中央在民族问题上宁可让步多些,也不要让步不够。

12月26日 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通过关于立陶宛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决定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是:1. 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报告中所做的评价和结论。苏共中央全会表示相信,立陶宛共产党员、劳动人民将会以理解的心情领会苏共中央对在立陶宛共产党中形成局势的关切;2. 全会认为有必要让苏共全体党员、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知道戈尔巴乔夫报告中的评价和结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第一书记、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应当参加研究全会材料的政治工作;3. 全会认为必须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会参加者小组赴立陶宛,同该共和国共产党员、各级党组织、共和国劳动集体举行会见。全会还认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前往立陶宛视

察是适宜的；4. 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复会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2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讲话。他说：1989年是从1985年4月开始的改革中最困难的一年。不仅经济改革非常紧张，消费市场的形势也非常尖锐。秩序混乱，纪律松弛。整整一年，民族关系的尖锐化一直使我们感到不安。经过1989年所特有的种种复杂情况，社会上越来越意识到对话、相互谅解、尊重各种立场和寻求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的必要性。1989年是国际舞台有巨大进步的一年，是“冷战”结束的一年。新的政治思维开始取得成果。革命革新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在柏林和索非亚、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社会主义同民主相结合的必要性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实。戈尔巴乔夫最后祝愿所有人在相互理解和团结之中度过新的一年。

1990 年

1月11日 戈尔巴乔夫抵达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同劳动集体和知识界代表会见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党的自身改革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不能用命令确定党在先锋队里,在社会革新中心里的地位。党的地位应该是党本身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的结果,是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恢复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的结果。我们已经踏上了对党本身进行内部的坚决的民主改革之路。苏联共产党应该成为一个经过革新的、民主团结的、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只有生气勃勃、勇敢和能够清醒地评价自己及周围世界的党,才可能成为社会的凝聚力量和改革的灵魂,党认为自身活动的意义不是为自己本身服务,而是为本国人民服务,党必须维护和加强自己队伍的统一以便达到党员和我们整个伟大民族国家的劳动人民盼望党要达到的那些切实成果。

在谈到改善民族关系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应当使苏联走上能使每个民族发挥潜力和传统的道路。过去在这方面进行“民族融合”、“语言融合”等统一一切的作法,损害了各民族的尊严。所有的人,不论属哪个民族,都应享有全权。不允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歧视。

1月13日 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党的革新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指出:苏共中央的革新战略是,在同所有社会政治团体划分职能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根本改变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意味着要使党从总体上

一贯正确、从追求对一切进行领导、从政治垄断地位中摆脱出来。苏共应当成为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政策中体现人民的利益并处于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的党。换言之，党将为人民效劳。这应该是一支自治、自行发展的和不断革新的政治力量和组织。无论是对理论探索、政治讨论，还是观点对比，它都应坦诚相待。这就意味着应对党自身内部的民主进程重新进行认识。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应重新进行认识。

关于实行多党制问题，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这应取决于政治进程的发展。如果出现多党制并且符合社会的实际利益，我不认为它会有任何不幸。因此不应当象魔鬼怕神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但也不应人为地强加于人。他还指出，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最主要的是民主、公开性，是人民实际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进程与机构。

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期间阐述的其他问题还有：立共宣布独立是涉及到苏共、苏维埃联盟和苏联改革命运的大事，要三思而后行。在苏联改革正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立共独立会引起保守力量的反对，有可能葬送改革，因此要顾全大局。苏联的联邦制和苏共都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将会赋予共和国及其党组织以主权。立陶宛同苏联其他共和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独立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波罗的海舰队和波罗的海军区在立陶宛的基金达几百亿卢布，全苏企业在立陶宛占很大比重，如立陶宛独立如何向苏联赔偿？

2月5日——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就召开28大的行动纲领草案作报告。主要内容有：1. 建议今年6月底7月初提前举行苏共28大；2. 党的地位不应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3. 党的革新要求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4. 党的政策的中心永远是人和人的利益，应首先以此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5. 创

造法律条件,为各种联邦联系形式开创可能性;6.要在最高决策层重新配置力量,以保障改革具有活力及其不可逆转性;7.设立总统制保证实现改革政策。

6日,《真理报》刊登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叶利钦阐述了他对苏共纲领草案的意见,他说:新纲领草案有新的内容,某些立场是进步的。但给人的印象是,它是用左右两手写出来的,是调和、妥协的产物。而且许多提法不清楚,不明确,立场模糊。叶利钦还说,苏共已处于危机边缘,本届中央委员会应对此承担责任。

7日,《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利加乔夫阐述了对改革进程、党纲草案的看法。他说,政治局和政府实施改革意图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和失误。改革的头两年有某些起色,随后经济便走下坡路,族际纠纷达到流血程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民族主义、分立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派别是对改革的严重威胁。他指也,党内有政治蛊惑分子和阴谋家,他们在拼命攻击戈尔巴乔夫,企图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名誉扫地。对此应坚决反击。他主张把党的团结问题写进纲领草案。他认为,中央提出的纲领草案在某种程度上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私有制打开了缝隙。这涉及到基本问题,需要全民投票表决。

7日,《真理报》还刊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雷日科夫首先表示完全赞成苏共新纲领的主要论点。在谈到革新苏共时,他说,苏共党内的危机现象在增长,出现了“左”倾激进立场和新保守主义立场,许多党组织和党委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惊慌失措和胆小怕事。不应在党外而应在党内寻找苏共面临困难的原因。苏共在垄断国家权力的条件下发展,丧失了任何社会政治领导者本能上所固有的战斗员的素质。党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由宪法赐予的。他认为,解决苏共内部危机的办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走根本革新苏共党内生活和活

动的道路。在谈到多党制问题时,他指出,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在苏联已经存在。党应当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他强调指出,现在,正处于权力由党转向国家的复杂的过渡时期,决不能允许出现危险的权力真空。

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中央提交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决议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

2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以347票赞成、24票反对、43票弃权通过实行总统制法律草案。草案确定了苏联总统的广泛权力;全面监督苏联公民权利与自由、苏联宪法和各项法律的实施情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确保苏联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协作,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代表苏联。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说,在苏联建立总统权力的问题是改革进程根本性问题之一。为了使改革进程继续下去,为了推动和加速改革,为了捍卫民主,为了有效地促进我们联邦制的革命改造,总统设制是必要的,不如此,改革将进行不下去。

雷日科夫同记者谈话时说,必须实行总统制,这不仅是出于整顿国内秩序的当前任务的要求,就其实质来说,这是国内政权的重新改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在议会讨论总统制问题时发言说,设立总统职位会使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具有在各种情况下把不同管理形式和管理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的能力,革新权力的能力,而主要的是这将意味着加快民主进程。

3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苏联所有制法》。该法分为6章,34条。第一章“总则”,从总体上规定了苏联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和形式。第二章集中对有关“公民所有制”关系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第三章是谈集体所有制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第四章具体规定了国

家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形式以及活动方式。第五章涉及与外国所有权有关的问题,包括合营企业所有制以及外国公民、组织和国家所有制诸方面的事项。第六章规定国家保障各种所有制关系的稳定性。塔斯社说,这是一系列为苏联经济改革奠定法律基础的法令中的一项中心法律。它承认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为它们的平等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取消了国有制的垄断。该法从1990年7月1日起生效。

3月11日——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关于把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和第7条的建议提交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2、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和进行党内总结选举运动的日期以及代表名额和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程序问题;3、关于苏共党章草案的问题;4、关于苏共中央监察一检查委员会章程草案的问题;5、关于从苏共中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问题。在3月1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作报告,他说:今后在民主程序和选举运动范围内争取领导地位的斗争将是苏共基本职能之一。他表示不能接受把苏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主张,说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取消苏共最终理想即共产主义,将会打击苏共的思想基础,在国际上也会对捍卫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的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修改党章的主要因素是使党员成为党的生活的中心,保障党员有参加制订和实现党的政策、建立党的领导机关以及监督其活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东欧经验表明,党的力量削弱正是在区和市党组织受到破坏后出现的。

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续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

16日,苏共中央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今年7月2日召开苏共28大,全会基本赞同新党章草案。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全会上没有人对党章草案提出怀疑,但还需要作重要补充。全会有愿望在草案中保留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他在这次

全会和二月全会上感觉到人们对领导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有很大不满,对此他深感不安,他要认真对待并自己承受下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会上发言时说,社会上有一些势力和人物利用改革口号作掩护企图瓦解社会 and 党,阉割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列宁主义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在我国实行私有制和复辟资本主义。他认为东欧已大大背离了社会主义。还说,造成国家危机状况的突出因素是党本身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削弱了。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队伍的组织统一和思想统一。提出要把所有破坏党、从事派别活动、反对派活动和参加各种反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全会通过了把关于就政治体制问题(苏联宪法第6条和第7条)对苏联宪法(基本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苏联法律草案按照立法动议的程序提交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决议。

选举委员会主席科普秋格就从苏共中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3月14日 苏联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对苏联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和所有制问题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例如,从序文中删去了“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一句,将第6条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将第7条改为: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建立以使用暴力改变苏联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性、破坏国家安全和挑起社会、民族和宗教纠纷为宗旨的政党、团体和运动及其开展活动。

3月15日 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宣布,戈尔巴乔夫以1329

票赞成(占投票总数 1878 张的 70.76%)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随后在人代会上举行了就职仪式,戈尔巴乔夫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说,表示要加快经济改革,巩固联盟的完整和扩大共和国的主权,深化民主进程并加强法制建设。戈尔巴乔夫强调总统不是某阶层或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的代理人,他将不带感情色彩地考虑社会上的各种观点,按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戈尔巴乔夫指出,党所宣布的纲领性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人民的夙愿,符合人民在开放的、民主的、公正的和繁荣的社会中生活的愿望。戈尔巴乔夫还说,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第 6 条和第 7 条,从而开创了我国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今后苏联共产党将和其他政治组织平等地开展活动,将参加选举,以民主方式争得建立联盟和共和国政府、建立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利。

在此次人代会上,卢基扬诺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利加乔夫在答记者问时说,政治局非常欢迎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认为这是一次重大胜利。

4 月 11 日 《真理报》刊登苏共中央致全国共产党员公开信《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呼吁同挑起党的分裂的人划清界限。信中说中央认为不能对某些人使党背离其战略方针和挑拨党分裂的企图不闻不问。这种企图不仅来自右也来自“左”的方面。那些联合在“民主纲领”周围的人的活动值得注意,他们要把党搞垮,提出从内部分裂苏共,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与走上同党作斗争的道路的人划清界限并不是清洗,并不是对异己思想施加压力。划清界限应当针对派别集团的组织者。

4 月 21 日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 120 周年大会上作题为《论列宁》的长篇报告。他说:改革使我们发现了真正的列宁。同时,列宁的政治和理论遗产、他的个性,今天再次成为思想和政治斗争的中心。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教条。列宁在自

己活动的最初时就曾写道：问题不在于“背诵”经典作家做出的“过去的结论”，而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这是理解列宁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刻所完成的那些重大转折的钥匙。每一次转折都不是轻松的。不仅仅需要同自己做斗争，同政治敌人做斗争，而且还不得不忍受来自党内那些指责列宁忽而“忽视原则”，甚至忽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的最强大的压力。列宁在答复他们的时候写道：如果历史进程的形成与我们所想象的迥然不同，更有独创性、更别致、更五彩缤纷，那么就不应该“同那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戈尔巴乔夫说，列宁酷爱理论，但在生活要求改变观点的时候，他不承认任何公理和似乎是神圣的教条，用他的话来说，只遵循组成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东西——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社会主义改革之外，没有其他更明智的选择。社会主义改革是复杂的，但却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是实际进步之路。不利用被我国和世界现代史经验和教训丰富起来的列宁遗产，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就寸步难行。

5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题为《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报告除序言外，共分13部分：1. 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2. 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总原则和可能的后果；3. 财政信贷政策；4. 对价格形成的改革；5. 居民社会援助制度；6. 加强对高效高质量劳动的刺激，劳动报酬和就业；7. 苏联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8. 关于在过渡时期发展市场关系和保持国民经济的物质平衡；9. 市场关系条件下的投资体系；10. 市场关系条件下的农工综合体；11. 消费市场的组织；12. 对外经济联系；13. 调整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制定1991年国家计划的特点和对形成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态度。

5月29日 鲍利斯·叶利钦在俄罗斯人代会的第三轮选举中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赞成票 535 张,反对票 502 张)。叶利钦在当选后发表讲话,说他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联邦的主权,这种主权意味着从下到上的独立。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宪法具有对全苏法律的优先权,俄罗斯联邦具有独立的内部和外部政策。叶利钦说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将建立在务实、对话和谈判,而不是对抗的基础上。叶利钦提出,俄罗斯联邦应当第一个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签订条约,随后也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5月30日,叶利钦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主张俄联邦一年后也设总统,总统不分大小,应是平等的。他承认他同戈尔巴乔夫有分歧,但表示将完全抛弃进去和现在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的一切个人的东西。

6月16日——17日 苏共“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分别举行代表会议,讨论各自对苏共 28 大的政治主张。

民主纲领派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政治决议,准备在苏共 28 大上提出 4 项原则要求:1. 苏共应放弃一种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垄断地位,马、思、列以及普列汉诺夫和格拉姆希等人的著作均应看作党的理论基础的来源;2. 苏共应放弃共产主义目标,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目标;3. 放弃对政权和舆论工具的垄断,同新的民主运动与政党结盟和对话;4. 放弃民主集中制和按地区生产建党的原则,建立议会式的党的机构。决议明确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被接受,他们便立即开始组建新党。

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两个文件:《关于苏共中央拟定的苏共章程草案的决议》、《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策略任务》。第一个文件提出,所有党组织应当独立解决地方问题。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必须考虑下级党组织的意见,下级党组织独立确定实施决定的必要性和程序。第二个文件提出,该派的战略目标是:在劳动者的群众性民主组织中积极扩大本派的影响,争取“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的民主联盟在国内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苏共的信任”。文件反对将国营企业拍卖给个人,主张生产自治和市场的社会民主调节;主张一切人民的社会保障手段归人民民主组织所有,不要职业政治家,要劳动集体中的人民自治全权机构;主张将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交给群众性民主运动。

6月19日 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说:成立俄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俄共的成立将会加强苏共。应当排除俄罗斯与苏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任何形式的对立。我们在使用“俄罗斯”这个词时,应当永远记住同样令人憧憬的一个词——“联盟”。党不再掌握国家的职能。国家本身实际上也正在实行权力分配。我们需要赋予中央这样一种权力,即当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所做出的决定与苏共章程相抵触时,中央有权废除该决定。还应当保证中央有权直接下到普通党员中去,下到基层党组织中去,以及举行全党投票和展开党内辩论,而不问某一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这方面所持的立场如何。这将保证和促进共产党的统一和平等。

6月2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即将举行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全会表示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28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基本论点,并委托中央政治局参考讨论情况把这一报告加工好。全会委托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全会基本赞同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苏共章程草案,并通过了把这些文件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决议。全会决定苏共28大如期举行。

7月2日——13日 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2日,在开幕式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题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28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为3部

分：1. 关于当前形势；2. 改革政策：经验和前景；3. 党与改革。戈尔巴乔夫指出，自由人的公民社会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根本改造，包括自由选举、多党制、人权在内的真正民主正在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正在复兴。造成劳动者同所有制、同其劳动成果分离的生产关系正在解体，社会主义生产者自由竞赛的条件正在形成。把超集中制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的以各族人民自决和自愿统一为基础的真正的联盟国家的工作已经开始。自由思考和公开性以及开放社会信息取代了意识形态专制的气氛。新政治思维帮助我们以另一种态度观察和现实地评价周围世界，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了对抗态度。苏联成了对世界与合作开放的国家，这个国家引起的不是恐惧，而是尊敬和支持。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党主张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和第7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党以社会主义为选择，以共产主义为前景。

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作个人工作报告。3日，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8名政治局成员作个人工作报告。4日，立陶宛共产党（苏共纲领派）第一、第二书记布罗基亚维丘斯和什韦德在会上发言，总结了立共的教训。同日，大会分“党的革新”、“意识形态工作”、“苏共经济政策”、“苏共农业政策”、“党、苏维埃和社会政治组织”、“民族问题”、“国际问题”7个小组进行专题讨论。6日，苏共三个纲领派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民主纲领派”主张放弃共产主义这一纲领性目标；“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主张党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广泛民主化；“俄罗斯共产党人倡议代表大会纲领派”宣布以苏共的传统观点看待党和党在社会上的作用。叶利钦在大会上发言，说28大不应解决改革的命运，它首先应解决苏共自身的命运问题。苏共的出路是进行根本改革，做到：第一，组织上允许各种纲领派别并存；第二，应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第三，28大通过一个革新苏共的宣言；第四，党应摆脱

国家的职能,军队、安全部门和国家机构中党的基层组织应解散。苏共应成为新的党或党的联盟,产生一个议会党。

7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回答代表质询。雷日科夫说,向市场过渡计划应有综合性质,而不能只归结为提价,但向市场过渡只有从提价着手。雅科夫列夫说,东欧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所作所为,如果人民不理睬共产党,那就意味着党的政策没有被人民视为自己的政策。利加乔夫说,反社会主义和分立主义势力正在分裂党组织,破坏苏维埃联邦,并在一些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谢瓦尔德纳泽说,在东欧垮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被扭曲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应怀疑社会主义今后还要发展。9日,大会通过新党章,其中第4条规定使新政治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政治局由总书记、副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负责制订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的中央书记和若干中央委员组成。10日,戈尔巴乔夫再次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投票结果3411人赞成,1116人反对。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就政治报告的讨论结果作长篇总结发言,他说:在对意识形态状况的批评中,我也感到有强烈的老观念的气息。在报告中我曾试图说明一下新的理解的意识形态问题,要知道,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认为,如果我们如今在纲领性声明中和其他文件中写明:我们仍然恪守老的办法,那么一切都会各就各位。就什么位?我们是不是要回到60多年以前去,那种状况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在国家参与文明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新思维能为其形成开辟广阔天地。全世界现在已把新思维作为我们新的国际主义,它能团结世界,而不是把世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大会通过关于反对迫害共产党员的决议、关于现阶段党的军队政策的基本方针的决议。

11日,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声明指出:“我们所理解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与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疏远，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使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有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受社会监督的国家保证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社会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这是坚定不移地主张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主张尊重每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权利的社会。”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苏共预算和财产的决议、关于苏共社会经济政策的决议和关于苏共农业政策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当选为苏共中央副书记。利加乔夫副书记候选人的资格被取消，投票结果是 2293 人同意取消，1916 人反对，47 人弃权。12 日，戈尔巴乔夫在大会审议苏共章程草案时作说明。叶利钦在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

13 日，苏共 28 大闭幕。戈尔巴乔夫在闭幕词中称 28 大是在革新党方面迈出的重要步骤。大会通过新党章、关于经济改革的决议、关于苏共舆论工具的决议、关于苏共青年政策的决议、关于苏共民族政策的决议、关于苏共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政策的决议等文件。决定成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党纲起草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28 大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取消叶利钦 28 大代表资格。

7 月 13 日——14 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选举 24 名政治局委员，11 名中央书记，5 名中央书记处成员。选举依·弗罗洛夫为《真理报》总编辑。新政治局委员尤·普罗科菲耶夫 7 月 16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共中央书记分工情况：扎索霍夫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伊瓦什科分管社会经济问题，吉连科分管民族关系问题，斯特

罗耶夫分管农业,亚纳耶夫和法林分管国际事务等。

8月7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举行题为《优先处理刻不容缓的事情》的例行会议,讨论党中央报刊工作、新联盟条约和庄稼收割等问题。中央书记吉连科发言指出,社会上对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既直接关系到各民族的命运,又直接关系到国家形势的稳定。

8月13日 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恢复20至50年代所有受政治迫害者权利的命令》,承认在集体化时期对农民进行的镇压,在20至50年代因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和其他理由对所有其他公民进行的镇压是非法的,是违反人的公民和社会经济基本权利的,应完全恢复这些公民的权利(不包括在卫国战争时期及战争前后年代犯下反祖国和反苏联人民罪而被合理判决的人)。命令说,必须尽快克服没有法制和滥用权力在苏联造成的政治后果。

9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向市场过渡问题时发表讲话,说在实现经济的重大转折时,必须注意到改革的环境和现实,否则就会犯重大的政策和实践的错误。苏联在放弃旧模式的同时,不能又踏上主观主义、机械采用脱离实际的方式和机械照搬别人经验的道路。目前向市场过渡有几点起因:1. 现实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2. 改革所有制关系将为真正的集体主义奠定现实而健康的基础;3. 只有平衡的市场能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4. 向市场过渡有助于真正确保社会保护。目前许多人提出应立即对各级,首先是对最高层进行改组,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样做只能把苏联拖入政治纠纷并加剧社会矛盾。目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以实施走向市场的纲领,制订和推行新的联盟条约。

9月20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国内形势和为实现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的党的任务问题。会议指出,国内正处于作出重要决定的前夕,这些重大改造的实现要求国家局势稳定,要求具有社

会和谐的环境。首要任务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必须同心协力来扭转局势,克服危机,积极参与稳定局势,加强纪律和秩序,调整好生产节奏和互利经济关系,是今天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10月8—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审议了下列问题:1. 关于国内形势和苏共在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中的任务;2. 组织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全会开幕并致开幕词。戈尔巴乔夫说:现今多党制正在形成,善于同其他党派协作有特殊意义。苏联目前时期可以比作20年代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期。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列宁的意图,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苏共现阶段也遇到这种考验。苏共能否保持执政党地位及其命运本身,取决于它在国家向市场过渡情况下如何行动。旧思维的惯性正在对党构成威胁,党必须帮助社会摆脱对市场的偏见和恐惧。苏联已进入改变多民族国家的阶段,既要看到有益的变化,也应看到存在的危险。苏共赞成民族主权、独立和自治,坚决反对分立主义,反对任何破坏性行动。共产党员没有比抵制分立主义势力的进攻更为重要的任务了。如果不战胜这些趋势,国家就可能面临“黎巴嫩化”的危险。

苏共中央副书记伊瓦什科就国内局势和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问题作报告,他强调首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全会听取了苏共中央书记扎索霍夫关于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党的28大之后时期工作的汇报和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关于苏共中央各委员会和机关情况的专题报告。参加全会的有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没有进入苏共中央机构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民族区党委的第一书记,还有苏共苏联人民代表、科学家、党报党刊的总编辑、某些主管机关和机构的代表。全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中央各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规定:根据苏共章程第29条,在苏共中央活动的主要方面成立以下常设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社会政治委员会、社会经济委员会、苏共民族政策委员会、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革新基层党组织活动委员

会。根据苏共 28 大新通过的决议,成立以下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科学、教育和文化委员会、苏共青年政策委员会、军事政策委员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总结发言。

10 月 19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戈尔巴乔夫提交的文件:《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文件指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具有活力和效率,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由人民的利益决定的,目的在于建立起面向社会的经济,使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需求,克服商品短缺和排长队的耻辱,切实保证公民的经营自由,为鼓励热爱劳动、创造性、主动性和高生产效率创造条件。向市场过渡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相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市场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能保证在全体生产者活动十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使经济保持平衡,保证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要求生产具有灵活性,并能迅速接受科技进步的成果。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同世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我国公民得以利用世界文明的一切成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当同日发表讲话,他表示反对这一方案,并提出俄罗斯独自执行“500 天计划”。

11 月 7 日 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 73 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强调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应清楚地懂得,历史上所做的一切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承认谬误和错误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那么这些谬误是可以改正的,希望人们能坚定沿着社会主义革新道路前进的信心。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正摆脱在许多方面并没有证明是正确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则这不意味着我们要背离十月革命。相反,在寻找更公正、更人道的生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理想终将变成现实,我们改革的意义正在于此。

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们国家的界限,将对世界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游行时发生一起企图杀害戈尔巴乔夫的开枪事件,同日,莫斯科选民联合会和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集会和游行,攻击十月革命,抨击苏共及其政策。

11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紧急改组和加强国家政权结构的8点建议:赋予苏联联邦委员会崭新的权限,使它从议事机构变成协调中央和各共和国行动的有效机构,成立跨共和国委员会作为联邦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撤销总统委员会,成立属于总统管辖的安全委员会,同时立即根本改组执行机构,进行人员调整,设立副总统职务,保证地方执行机构的有效工作;加强法制,保障苏联每个公民的安全;整顿居民食品供应系统;保障铁路运输和动力供应措施;更新和维护联盟,从本质上改革上下左右的全部联系体系,反对分裂,反对改划领土;加强关心军队,保证军人及其家属的社会福利等。绝大多数代表表示基本赞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

11月24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草案)。条约分三个部分:1.基本原则;2.联盟体制;3.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条约参加国都是主权国家,苏联是由各共和国自愿联合而组成并在条约参加国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的主权联邦国家。每个共和国自由选择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自主确定自己的国家制度等。联盟体制包括成员资格、国籍、领土、联盟的权力、所有制、税收、法律等。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组成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总统、苏联副总统、联邦委员会、苏联内阁、联盟法院、联盟检察院,还规定了联盟的国家语言等。

12月10—1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通过关于联盟条约构想和党组织任务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题为《为革新我们的联盟国家而斗争》的讲话,他表示要按联邦制原则把国家改

造成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他说：这次全会的任务要表明党对国家各族人民具有迫切重要意义的问题的立场，即要不要和要什么样的联盟？苏共主张保留联盟并对其进行根本改革。国内没有什么比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煽动民族纠纷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了。国内围绕共和国权力和联盟权力关系问题展开了辩论和政治斗争。划分权力的过程已失去控制，具有公开争权的性质，受害最大的是一系列经济部门。权力划分的争议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联盟将是一个强大的全权国家，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松散实体。戈尔巴乔夫在说到许多人提出联盟条约草案为何更改国名问题时强调，这丝毫不意味着改变社会主义的原则方针，草案中仍保留“苏联”称谓，但这是国家文件，是考虑到一些共和国决定改变自己名称的结果，所以就提出改变联盟名称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全会解除了索科洛夫和莫夫西扬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洛费耶夫和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戈扬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2月17日——27日 苏联第四次人代会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国家形势报告，他说，现在我们的确很困难。这种形势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还在1985年之前很久，我们社会就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还由于我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要进行改革，工作量巨大而艰巨。但是，问题还不仅在于此。在改革过程中，国家领导又犯了严重错误和失误。我们对社会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在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时有过一些考虑不周的和匆忙的决定。并非总能正确、及时地估计面临的危险，旨在防止这种危险变为消极现象的行动不够坚决。19日，人代会转入讨论有关联盟条约的议程。叶利钦在会上发言，他说：俄罗斯不同意恢复克里姆林宫的专制，发号施令的时代已过去，各共和国已经不怕任何严厉的命令，强化中央只会刺激作出否定的反应。雷日科夫在会上发言，

说有一些政治势力正在向政府发动进攻,其目的是要偷换改革的实质,打击国家,打击社会政治制度并彻底摧毁它。他们表面上是拒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意识形态来取而代之。目前的经济危机不是由生产领域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管理领域中明显的危机而引起的。苏联国家的规模和几十年形成的各种规律性不允许使用“休克疗法”。

20日,谢瓦尔德纳泽在人代会上提出辞职,说是对独裁的抗议。谢瓦尔德纳泽表示他一贯支持并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将支持改革的思想、民主化的思想。他说,民主派的同志们,你们快逃走吧,改革派已经溜掉了,独裁正在来临。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未同总统商量就提出辞职,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愿意让他辞职。说本来要推荐他担任副总统,他提出辞职对自己是最大的刺激,在国家最困难的关头离去是不可饶恕的。

21日,人代会转入讨论修宪案。22日,人代会通过全民投票程序法草案。24日,人代会就保留联盟和原国名问题进行表决,1657人赞成保留联盟,反对和弃权的为20人和61人;1365人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原国名,反对和弃权的为189人和170人。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关于国内局势和克服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危机形势的首要措施的决定。大会决定为解决关于保留下来的作为平等的主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土地私有制问题,将举行两次全民投票。26日,人代会通过修宪案,其主要内容是:根据苏联总统的建议,成立和撤销各部及苏联其他中央国家管理机关;根据苏联总统的提名,批准任命总理,在会议中同意或者不接受苏联内阁成员候选人和苏联安全会议成员;有权解除上述人员,用“苏联内阁”字样代替“苏联部长会议”字样;苏联副总统根据苏联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与总统同时选出。苏联副总统受苏联总统委托履行总统的部分权限并在总统不在和总统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代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名53岁

的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在解释他所做出的选择为什么恰恰是亚纳耶夫时说,这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能参与讨论和通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的、重大的决定”。他接着说,这是一位“熟知国内政策方针又谙熟对外政策方针的人”。这是一位“忠诚于改革和革新我国社会的政策的人”。

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人民代表议员团主席亚纳耶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正在进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人代会就联盟条约构想通过的决定,为在新的基础上建设联邦创造了可能性,有助于找到区分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之间职权范围的界限。他说,中央将与每个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这样就能够找到非常合理的形式来保留我们的联邦——一个革新的联邦。亚纳耶夫深感遗憾的是,“现在出现了政治敌人,他们把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放在首位”。他指出,许多社会运动已经在集会上明确了自己的行动,并可能会迫害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希望内战。我们有着明确的纲领,就是拯救国家,使国家摆脱危机局势。27日苏第四次人代会闭幕。经过两轮投标,亚纳耶夫当选为苏联副总统。

1991 年

1月14日——1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根据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苏联成立总统领导下的苏联内阁取代以前的部长会议的宪法修正案,批准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推荐的瓦·帕夫洛夫为苏联政府总理,维·多古日耶夫和弗·韦利奇科为第一副总理,尤·马斯柳科夫和尼·拉维奥罗夫为副总理。议会还批准了别斯梅尔特内赫为新的外交部长。戈尔巴乔夫在提议帕夫洛夫为总理候选人时说,他作出这一选择是由于“今天需要一位有丰富经验、有个性、愿意承担责任的大财政家、经济学家担任内阁首脑”。

议会通过了3月17日就是否保留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决定,听取了联邦委员会代表团关于立陶宛形势的报告,讨论了海湾危机并通过了相应决定。

1月16日 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新党纲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成立了苏共新纲领草案议案审议工作小组。该小组由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弗罗洛夫任正副组长,包括8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7名中央部长、苏联副总统、苏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副院长、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等35人。此次会议还确定了纲领草案各个部分的写作班子,同时委托工作小组系统地归纳党员和党外人士、其他社会政治运动和组织的代表所提交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规定了新党纲的主旨和基调。其要点是:1. 强调苏共的任务是要制定一个内容深邃和形式清晰的文

件,而不是对旧纲领进行翻新。说新纲领要成为今后根据民主社会主义原则革新党和加强党在改革苏联社会中的先锋作用的全部活动的可靠方针。2. 要制定的是一个新的党所具有的纲领,这是问题的实质。认为新的党要同专横制度的遗产、同社会主义的变形和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曲解彻底决裂。因而,起草纲领时要根据 20 世纪末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重新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苏共 28 大纲领性声明是坚实基础。3. 新纲领所要阐述的问题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涉及世界共同体的发展经验和人类思想的全部成果、对社会进步及其标准的新看法。第二方面涉及对苏联社会和党的历史道路的评价以及对目前状况的分析。第三方面涉及苏共的世界观原则、苏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第四方面涉及苏共的作用和地位、党的基本职能、党同国家、各社会政治组织和运动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内关系。

1 月 31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主持会议。伊瓦什科副总书记作报告,他说,苏共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完全支持革新苏联社会的方针、忠于苏联宪法、忠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谈到经济情况时,他指出,1990 年在战后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生产绝对衰退的状况。随着新年的到来,情况未见好转。今年 1 月份多数重要产品的产量比去年下降 5% 至 10%。他说,领导在民族主义的压力面前后退、讨好,就会丧失阵地、威信,或者垮台。他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反对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内的一切破坏性主张和行动。

这次全会要求“公民和睦和全国和谐”,谴责右翼势力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的阴谋和行径,号召采取“责任重大的行动”以革新联盟和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 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表明了苏共的立场,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全会指出,苏联形势的特点是:社会危机已达到危险的界限,

超过这一界限就有可能爆发破坏性的社会震荡；以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为目标的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完全形成和正在联合起来，并使改革具有倒退和反人民的性质；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公然采取了消灭社会成果的方针，民族歧视重新复活，民族主义极权制度已在形成。因此，全会呼吁在全国刻不容缓地恢复宪法秩序，重申苏共的立场：主张废除所有反宪法法令和决定；反对成立非法武装；反对反军活动；反对把社会和国家分裂成敌对阵营的一切企图；反对民族争吵和破坏性对抗、暴力和专横。全会特别指出苏共和历史责任，强调除了苏共不存在另外一种能够解决改革任务的政治力量。今后苏共的任务是：在政治方面，达到公民和睦和全国和谐；在经济方面，为维护全国的经济统一而斗争；在思想宣传领域，揭发敌人的阴谋和行径；在民族关系方面，为保留联盟而斗争。

2. 全会抨击了右翼势力，矛头首先指向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议会。全会的发言指责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变成破坏苏联的攻城槌”，在右翼势力中“起凝聚作用”，揭露俄罗斯议会领导人企图将中央权力据为己有。许多发言谴责整个右翼势力对苏联社会的威胁，揭露他们的矛头针对共产党，针对苏联社会基本的生活结构。并指出，平行的国家结构、与苏共对立的政治组织的联合已成为现实，“影子政治”已经出现，反对派的作法与东欧国家推翻共产党政府的作法非常相似。

3. 全会上的一些发言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十分严厉、激烈，或指名，或影射，涉及内政、外交、理论、实践等方面。其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批评言辞最尖锐。他说：我们国家目前根本谈不上什么多党制，实行多党制为反动势力和猖狂活动提供了机会。我们有一个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共，但也有一些领导人只有一个政治面孔——反共。现在已经很清楚，改革已进行不下去了。

4. 全会为加强党组织工作通过了若干文件,并解决了一些例行的人事问题。全会除《政治声明》外,还有3个决定、6个指示和条例。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关于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加强党组织的决定》和《关于苏共在苏军中各级组织的工作的指示》。全会决定(因当选副总统)免去亚纳耶夫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

2月6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会,讨论“在关各级党组织对于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的筹备与实行工作”问题。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即将举行的全民投票作为人民直接参与苏联范围内的国家权力的形式,这还是第一次,它无疑将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全民投票的结果对于国家、每个苏联人和国际社会来说,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定强调指出,全民投票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和族际关系中的危机进程大大加剧的时刻进行的。形形色色的分立主义势力、民族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这一形势积极活动将瓦解苏联的思想强加于公民。它们发出了别参加全民投票的呼吁,加紧批判和诬蔑苏维埃国家和苏共。政治局认为,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应当坚决回击此类行动。破坏全民投票会更进一步加剧族际冲突,导致长期的自相残杀、经济浩劫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决定指出,准备和举行全民投票的工作正在由相应的各个委员会依法进行。然而,苏共不能袖手旁观,不参加这项政治活动。各级党组织应该找到在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在组织和举行全民投票方面进行有效工作的方法、方式和途径。

政治局呼吁各地党委会利用组织条件、宣传条件、干部条件和财务条件吸引党的全部聪明才智,形成有利于保留苏联这个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的舆论。同时,必须揭露恶意中伤苏联、败坏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思想以及煽动族际不和和分立主义情绪的行动,证明只有在革新的联盟里,各共和国各族人民的主权才能日益强化,才

会具有真正的内容,而加盟共和国的团结则是苏联国际威望全面发展和加强的保障。

2月19日 叶利钦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辞职。叶利钦说,自1990年5月他担任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以来,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戈尔巴乔夫过于信任。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有一种个人专权的倾向。叶利钦批评戈尔巴乔夫独揽大权、背离激进的经济改革和使用军队镇压平民。他说:我自己同这位总统的立场和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主张他立即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共和国联邦委员会。由苏联总统、副总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主席组成的联邦委员会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于去年底成立的。

叶利钦的讲话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苏联议会指出叶利钦的论点与苏联宪法相抵触,苏联总理、哈萨克和乌克兰等共和国议会领导人及俄罗斯联邦议会部分负责人、许多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等纷纷谴责叶利钦的举动。

3月4日 《消息报》报道,制订联盟条约草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在草案上签字的有27个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其中有8个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这一工作。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没有参与制订条约草案。该报写道,尽管制订条约草案的工作进行得并不轻松,但在多数情况下找到了反映条约进程所有参加者利益的共同态度。报纸援引道,现在,“组成联盟的共和国拥有充分的国家权力,独立确定自己的国家结构、行政区域的划分和权力机关系统。”同时,组织国防以及领导武装力量、边防部队和国防企业的问题仍属于联盟特有的管辖范围。该报写道,各共和国代表对所有制、法律、联盟机关的形成和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其中多数代表现在所提出的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原则性分歧并不太多,而从已经得到同意的草案和全权代

表工作气氛本身来看,事先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些分歧。

3月17日 苏联举行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投票,就“是否有必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作出明确选择。围绕这次全民公决,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早就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联盟,要不要社会主义。

苏联当局对投票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3月5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任何阻止苏联公民参加全民投票的行为都是违宪的。3月7日,苏联总检察长称,企图阻止全民投票的人将被依法追究责任。3月11日,苏联议会授权苏联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小组,让他们以议会正式观察员的身份分赴各地,监督苏联全境内的全民投票情况,委托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全民投票的顺利进行”。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动员讲话。截止3月15日,苏联总统、副总统、议会两院主席、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主要领导人、“联盟”议员团的主要人物阿尔克斯尼斯上校等都已先后发表讲话或文章,“吉尔”汽车厂,“镰刀和锤子”工厂等有影响的大企业举行集会,力主联盟,反对分裂。苏共中央及地方党的报纸临近投票日的几天都把全民公决票印在报上,要人民在答案中留下“要联盟”,在“不要”上打×。口号是“要联盟,不要分裂!”,“我们多民族祖国的同胞们,不要听信奸诈的政客!不要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丧失前途!愿他们友好和睦!在公决时对联盟投赞成票,以此巩固我们的愿望!”

与此同时,“反对派”进行了一系列抵制全民投票的活动,企图把全民公决变成一场不信任苏联总统和议会的运动。3月3日闭幕的苏联民主大会把中止全民投票和抵制签订联盟条约确定为近期主要计划。3月10日,“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组织大型集会,呼吁对联盟投反对票,号召人们支持俄罗斯设总统。3月15日叶利钦批评全民

投票提法含混不清,反对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把各共和国硬捆在联盟内,说联盟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让人民拥护旧体制,说搞公决是为了让人支持现领导的现政策。

3月17日,全民投票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立陶宛等6个加盟共和国官方未组织投票,但这6个加盟共和国人口只占全苏总人口的7.3%,对总体结果无法产生重大影响,况且这些共和国的苏联驻军和某些地方政府及企业机关不顾当局的反对和阻挠,设了投票站。

3月21日,苏联议会宣布,全民投票结果是最终决定,在所有苏联领土上均具法律效力。3月26日,苏联宣布全民公决投票的最终结果:在全国登记的1.856亿选民中,8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76.4%的投票人投票赞成保留联盟。

4月24日——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全会前夕,“民主派”和“传统派”从不同立场和目的出发,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民主俄罗斯”提出解散苏联人代会和议会,要求总统和内阁辞职。以军队和苏共为主的“传统派”从去年底开始,一直试图恢复权力。本月21日“联盟”议员团甚至要求召开苏联非常人代会,建议在苏联全境实行紧急状态以及对戈尔巴乔夫在总统职位上的活动作出评价。在25日下午头两个小时的会议中,18人个人发了言。所有发言的主旨都是对国家和党内的局势严重担忧。将近一半的发言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直接或间接地呼吁他辞职。鉴于此,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要求。在会议休息时,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一致作出决定,建议全会不讨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问题。复会后,349名代表中有322名赞成政治局的建议,13票反对,14票弃权,戈尔巴乔夫的请求被全会拒绝。

全会重点讨论了国内局势和经济危机问题。俄罗斯共产党中央

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发言中指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苏共内部都有人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剧对抗和不容忍的气氛。我们已不是头一次听到经济危机的说法,现在又听到经济崩溃和联盟垮台的说法,而且我们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些话。但要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曾想过要坦率、认真和全面地分析这种说法的原因呢?在政治局和历次全会上实际上都没有这样做过。在国家和政府机关里也没有这样做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说成是由于搞了合作化、出现了停滞现象、搞了70年一党制、文艺只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已经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太不体面了。不进行深入分析是不行的,没有别的出路。

全会通过了《关于国内局势和摆脱经济危机途径的决定》。全会支持苏联总统和9个加盟共和国的联合声明以及苏联内阁在克服危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全会认为党的最迫切任务是用政治方法坚决反对反社会主义力量企图改变社会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消灭苏维埃代表制等的行为。全会号召各级党组织要大力支持国家机关加强国内宪法秩序的努力。此外,全会还作出了人事变动:选举阿曼巴耶夫、叶列梅和苏尔科夫为政治局委员,批准中央书记法林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停止沙塔林的苏共中央委员资格,等等。

26日,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致闭幕词,他说:现在主要的是利用党的全部影响和威信尽快推进国家摆脱危机的进程,加强党的同志情谊、团结一致,而不是挑起类似瘟疫流行时的天下大乱。如果有人想恢复宪法第6条关于党的作用的条款,社会是不会接受这种立场的,这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构想,是恢复旧制度。戈尔巴乔夫还批评有些人在发言中把政府的反危机纲领称作是反人民的纲领,认为这不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立场,对苏共来说,没有其他能摆脱危机的办法,只能是把一切爱国力量、所有民主政治运动联合起来,力求把它们团结在反危机行动纲领周围,恢复和加强社会的宪法秩序。

5月8日 新华社发表新闻综述：《苏共的反对派都是哪些人？》综述援引苏《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报道：1990年9月，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研究与苏联共产党对立的反对派的情况。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9个州与市苏维埃活动的反对派代表，同时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进入权力机构，但在本共和国或本地区政治生活中起重要影响的反对派头面人物。调查组对1363名反对派代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他们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和群众大会的发言以及在权力机构就某些问题参加投票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苏共的政治反对派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1种：反共积极分子。第2种：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满的知识分子。第3种：某些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第4种：苏共过去的积极分子，其中包括一批党内过去的高级人士。第5种：基层的反对派代表。第6种：反对派的大多数（约占75—80%）

5月21日——25日 俄罗斯联邦第四次人代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人代会以894票赞成、6票反对、16票弃权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法》。在讨论总统法过程中出现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有关确定共和国元首权限和对担任总统职务的限制条件上。例如，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法律草案规定了总统职务的非党化，但会上以多数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新条款，规定总统不必暂时停止在自己在政党中的党员资格。会议确认鲍·叶利钦、尼·雷日科夫、瓦·巴卡京、阿·图列耶夫、阿·马卡绍夫和弗·日里诺夫斯基6人为俄总统候选人。会议议程中没有实现的唯一一项就是选举宪法法院。由于围绕着最高苏维埃业已赞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发生了争论，决定把这一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

苏联一些报刊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俄罗斯联邦历次人代会中“气氛最平静、时间最短、成果最显著”的一次会议。叶利钦在会议结束后

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承认,“这次代表会议体现了建设性的精神”。《工人论坛报》甚至认为俄罗斯共产党议员在会上变得“十分沉默”,以至有些“消极”。

6月12日 俄罗斯联邦举行总统大选,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成立的88个选区的选民名单中,有74.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鲍里斯·叶利钦以57.3%选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当选为副总统。7月10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宣誓就任总统。他在誓词中表示,他将遵守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他在施政纲领性讲话中说,俄罗斯仍将同其他共和国一道积极参加改造联盟的工作。帝国的野心是同人民选择的政治方针格格不入的,俄罗斯正怀着纯结的愿望返回国际社会,同各国建立真诚和文明的关系。

6月15日 克里姆林宫举行讨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他建议与会者不要从政治上怀疑和扣帽子,要进行自由的、公开的辩论,持各种观点和立场的人都要参加辩论。他尤其强调指出,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必须就这个问题建设性地交换意见。

苏联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报告中呼吁放弃意识形态教条。因为它妨碍人们利用各种社会形态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制定的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办法,他还强调必须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看作是吸收外国投资的一种切实手段。谢尔巴科夫表示反对无偿分配财产,并说这是联盟内阁的意见。他指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大型国营企业不一定要出卖,但它们无疑应过渡到商业工作体制。

6月21日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同记者交谈时指出,不能把内阁反危机纲领同“哈佛计划”对立起来。

反危机纲领是今年4月份由苏联内阁提出的,6月17日将其修

改后的最后方案及其实施计划提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签署这一文件的有 8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

“哈佛计划”是由以亚夫林斯基为首的苏联经济学家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里森等同行共同研究制订的。该计划被认为是将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与“哈佛计划”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没有克服不了的矛盾”,“如果有人想把其中的一个说成是偶然的错误,把另一个说成是天才的发现,那就错了,并会起挑拨作用,使人们不能理解,从而造成冲突。”戈尔巴乔夫主张在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吸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建议,形成“总统纲领”,以提交欧洲七国首脑会议。

7月1日 苏共中央副书记伊瓦什科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苏共新党纲起草情况。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党纲起草小组负责人、《真理报》主编弗罗洛夫,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卢钦斯基,中央委员、意识形态部长杰格佳廖夫和中央委员、社会科学部长里亚博夫参加了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的部分问题。据介绍,他们都是新党纲起草小组的成员。

伊瓦什科在讲话中指出,去年7月13日,在苏共28大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制定出新的党纲草案,使各级党组织能不迟于1991年上半年对其展开讨论。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草案的发表将要推迟。他透露,为了起草新的党纲组成了专门的起草委员会。在人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各个地区,党内的各种派别、专家、学者都要照顾,使总人数达到134人。其次,新党纲的起草要以28大通过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为基础,结果又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中央认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它贯穿着改革的精神。至今还没有一个政治家在其中能找到原则性的缺陷。

伊瓦什科在回答问题时说,苏共将不会改变自己的名称。当然,这要由代表大会决定,但我个人属于坚决反对改名的人员之列。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如个人的自由和民主,这很难说是党的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或者说既是最低,也是最高纲领。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7月20日 叶利钦发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命令规定,不允许各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及其组成的各共和国国家管理机关中,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中,在国家机关、组织和康采恩中,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无论属于谁的企业中活动以及建立新的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机构;在向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下达的正式文件中,禁止指明以及要求指明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成员资格;建议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讨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09条按照立法动议程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苏联关于禁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结构在苏联最高法院、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苏联检察院以及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务部的机关与部队中发挥作用的法律草案的问题。命令从公布之日起14天后开始生效。

命令发布之后,在苏联各界引起强烈反应。俄罗斯共产党发言人弗·马尔科夫说,叶利钦颁布的关于在政府机关和共和国经营的企业禁止政党活动的法令违反苏联宪法和公众团体法,因而是无效的。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称叶利钦的命令在为发展苏联社会和谐和建设性合作的进程制造障碍,命令旨在反对苏共,其目的在于破坏业已形成的党的结构。23日,俄罗斯共产党发表声明,认为这项命令强烈地激化了国内政局,使国家业已稳定的进程受到破坏。命令粗暴地践踏了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宣言与协定的公认准则。23日,《莫斯科真理报》发表苏共莫斯科市委党务委员会区党委书记会

议声明,指出颁布此项命令无非是想把公民彻底排除在政权和管理之外,建立独裁制度。它粗暴地破坏了苏联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大多数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意愿。26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中央声明严厉谴责了俄罗斯总统令,建议苏联总统、议会和宪法监督委员会立即对该命令作出法律评价,捍卫民主成果。同时,支持叶利钦的命令的力量也很强大。22日,波波夫率先表示坚决执行叶利钦的命令;苏联议会联盟院主席拉普捷夫认为非党化问题早已成熟,并建议戈尔巴乔夫向全苏发布一项此类命令。

7月25日——2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全会审议了以下问题:1.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根据其讨论结果提出党组织任务的问题。2.关于提出代表苏共的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以替换前代表的问题。3.组织问题。4.关于对俄罗斯总统《关于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命令》的态度问题。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就上述第一个问题作了报告。参加全会工作的有苏共28大成立的苏共纲领草案起草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边疆区、州和专区党委第一书记,不属于被选出的苏共中央机关的、苏联武装力量苏共组织的党委书记。在全会上发言的有27人,他们主要谈的是党纲草案问题。尽管他们对党纲草案提出许多意见,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可以以这个草案为基础。新党纲将在预定于今年11——12月举行的苏共29大上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讨论结果作了总结。

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党组织讨论草案的任务的决定》、《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非例行的第29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苏联共产党推选苏联人民代表办法的决定》、《关于1990年苏共预算执

行情况的决定》、《关于 1991 年苏共预算的决定》以及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 1991 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活动经费预算的联合决定》。全会还就叶利钦关于非党化的命令通过了苏共中央声明。鉴于西拉耶夫已递交了退党申请,谢瓦尔德纳泽已停止了苏共党员资格,阿·别列津已被开除出苏共,全会决定取消他们苏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全会还作出了其他人事变动的决定。

苏共中央书记彼·卢钦斯基在就全会的工作情况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关于在这次全会上苏共将发生分裂的预言落空了”。列宁格勒党组织首脑吉达斯波夫在会议发言中说:“我甚至感到奇怪,全会开得很平静。”苏共中央书记扎索霍夫则称全会经受住了在基本问题上保持一致的考验。但也有人认为,苏共只是暂时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团结,党的分裂只不过是向后推迟而已。

7月26日 塔斯社全文播发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1.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由苏共 28 大委员会起草的苏共纲领草案是在党内进行最后加工和讨论的可以接受的基础。2. 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对本次全会讨论草案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并转交 28 大委员会。建议纲领起草委员会在对草案进行最后加工时要特别注意草案最重要条款的理论根据是否充分,注意继承苏共 28 大的纲领性声明以及党的组织政治建设问题。3. 在草案公布之后进行全党大辩论。各级党委应该组织在劳动集体中、在居民点、在社会政治中心对党纲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4. 党的舆论工具应保证对苏共纲领草案的全党性大辩论进行深入的、战役性的报导。定期刊登全面反映党内状况和党的现行政策的文章。5.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苏共中央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各共和国社会政治研究所应参与对苏共纲领草案不断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和总结,参与进行科研、启蒙和宣传工作。

8月8日 《真理报》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该草案由苏共28大成立的新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一年来8易其稿，最后吸收了苏共七月全会代表们的意见，才正式公布于众。

这份草案约12000字，分5个部分。1. 我们的原则；2. 历史的教训；3. 我们的最近目标；4. 党表达谁的利益；5. 为政治行动的党而斗争。

草案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进步——这就是苏共的目标，苏联的改革进程的发展是矛盾的和复杂的。随着新事物而来的是社会政治紧张和族际关系的紧张、经济危机及社会意识的巨大进步。苏共正在经历自己发展的关键时期。

草案说，苏共把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它今天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民主改革的党、社会公正和全人类价值的党、经济、政治和精神自由的党来行动的。苏共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将遵循社会全面进步的利益、人道主义、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家与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利益的原则。

草案说，苏共无条件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这些罪行对党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的原则。

草案强调，随着党的既定目标真正实现，将建立一个入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理想只有在建立新的世界文明的轨道上才能顺利实现。

8月14日 苏《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该条约于1991年7月23日商定，将于8月20日开始签署。

条约的前言说，签约国在缔约时，根据它们宣布的国家主权宣言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考虑到各族人民历史命运相近，力图实现保留和更新联盟的意愿；致力于友好与和睦地生活，保障平等的合作；愿意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关心各族人民的物质福利和精神

发展；吸取过去的教训并注意到国家生活中全世界的变化；决定在联盟中按照新的原则建立自己的关系。

条约的第一部分是“总则”。从7个方面阐述了组成联盟的国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条约的第二部分是“联盟的结构”。

第一条说，加入联盟自愿，各国可直接加入或作为其他国家的一员加入。

第三条规定本条约参加国在签约时承认它们之间的现存边界。

第四条规定了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平等、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承担的义务。

第五条规定了苏联的管辖范围。

第六条规定了联盟和共和国共同管辖的范围。

第三部分为“联盟机关”。一共8条，分别规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总统、副总统、内阁、宪法法律、联盟（联邦）法院、联盟检察院的设置和职能。

第四部分为“最后条款”，共7条。规定联盟的族际交往语言为俄语，首都为莫斯科，条约自签约日起生效，同时对签约国来说，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

8月18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黑海休养地——福罗斯镇的总统别墅休假。戈尔巴乔夫是4日开始休假的，原定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签署新联盟条约的仪式。

同日16:50（莫斯科时间，下同）负责苏联领导人安全的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舍宁、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苏联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从莫斯科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休假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签署紧急状态令，或者自愿交权，或者辞职。

这一要求被拒绝。当晚,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8月19日 4:00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瓦斯托波尔团奉苏联防空军参谋长马尔采夫上将之命,封锁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别墅。这个团用两辆牵引车切断了在别利别克机场的跑道。机场上停放着总统的两架飞机:“图-134”型飞机和“米-8”型直升机。

6:05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根纳季·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总统职务。

6:23 亚纳耶夫向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重申苏联信守以前承担的国际义务。

6:25 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人组成:奥·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弗·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帕夫洛夫(苏联总理)鲍·普戈(苏联内务部长)、瓦·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阿·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德·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根·亚纳耶夫(苏联代总统)。

6:34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指出国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正在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呼吁全国公民全力支持该委员会为使苏联摆脱危机所作的努力。

11:06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1号决定,要求各级政权机关“确保无条件地实行紧急状态”,立即解散非法的机构与武装,禁止

游行、集会、示威、罢工,对舆论工具实行监督,并提出了使经济局势正常化的一些措施。

11:46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一次“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要求立即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并号召举行“总罢工”。

同日,叶利钦颁发了第59号、第61号、第62号和第63号命令。要求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及其官员不得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并声称将对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的官员和军人追究刑事责任。

17:06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定于8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批准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

17:29 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

17:35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决定,规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政治出版物,只允许出版下列9种报纸:《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17:46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亚纳耶夫在招待会上表示,苏联领导打算今后继续奉行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方针。

21:15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国内局势平静,居民对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支持,国外也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声明对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表示不满,并对他们“不负责任的、不明智的举动”提出警告。

8月20日 9:00 约5万游行者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议会大厦旁聚集。

13:36 叶利钦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发出呼吁书，要求在24小时内安排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在3天内由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参加对戈尔巴乔夫的健康进行医学鉴定；军队立即返回驻地；立即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撤销它的所有命令和决定。

19:03 列宁格勒市长索布哈克说，该市局势“完全在合法权力机关的控制下”。他向列宁格勒居民保证，“部队不会进城”。

19:48 俄罗斯领导人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会晤，卢基扬诺夫同意把部队从莫斯科撤回原驻地的要求。

21:31 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从每晚11点至次日凌晨5点在苏联首都实行宵禁。

21:43 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托，苏联内务部长普戈撤销了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关于向莫斯科调遣数百名军事学院武装学员的命令。

同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因高血压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在他患病期间由第一副总理多古日耶夫代行总理职务。

同日，苏联内阁表态，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一系列旨在克服政治、经济危机的措施；支持内阁主席团8月17日的决议（该决议赞成联盟条约文本的基本原则，同时指出，该条约必须写进确保过渡时期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维护各加盟共和国主权等条款）。

同日，克格勃的特种部队——“阿尔法”行动小组的20多名指挥官拒绝于20日晚上和21日上午攻击俄罗斯议会大厦。

8月21日 9:40 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8月21日凌晨，莫斯科发生了极端分子的严重挑衅事件，造成悲惨后果。

12:09 苏共中央副书记伊瓦什科受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向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提出了关于立即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

夫会晤问题。

16:11 国防部宣布把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

16:2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以及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季贾科夫先后飞往克里米亚会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17:04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报刊的限制被取消。

19:13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扎索霍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中央书记处认为不能允许试图建立专制制度。他说,书记处主张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讨论当前局势,如有可能的话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书记处还主张举行有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

19:26 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解除首都地区宵禁的通告。

19:30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先会见俄罗斯代表团,后会见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但拒绝会见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季贾科夫。

19:35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会上决定:“认为实际停止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履行他的宪法规定的职责并把这种职责转交给副总统的作法是非法的”。

20:17 苏联检察院散发一份公告指出,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动中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总检察长已提出刑事起诉并指派一批侦察员进行调察。

21:10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曾一度被中断的同外部的联系也已恢复,过几天他就可以开始完全履行自己的总统职责。

21:39 散发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份声明,表示忠于对苏联进行民主革新的方针,不允许利用临时的非常权力来确立专横制度,建

立违宪的权力机关和试图动用武力的作法。

8月22日 凌晨2点12分,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赞扬叶利钦等人所起的“卓越作用”。他说除了“惩办这次阴谋的罪魁祸首”外,也要对某些公职人员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

戈尔巴乔夫命令撤销由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的一切决定并解除其全体成员的现任职务。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被拘留,帕夫洛夫在医院被监护,普戈自杀身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后来也被捕。

聚集在莫斯科克格勃大楼前的示威人群,将克格勃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10米铜像推倒。

苏共中央书记处发布通告说,一些苏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参与了企图发动政变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背着党的领导人秘密进行的。苏共中央坚决谴责冒险分子,并建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尽快审议有关参与违宪行动的苏共党员对党所负的责任问题,在下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中央对这场行动负有罪责的人的问题。

8月23日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上发表讲话说,苏联社会“已发展到一切都应当改变的阶段”;他与叶利钦已达成协议,若他们两人其中一人不能履行其职务时,另一人便自动地立即取代并接掌其职务。叶利钦命令《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苏共报纸暂停出版。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命令,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18点30分,大楼顶上的红旗在一群反共分子的狂呼声中落地,大楼正面挂上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与此同时,俄共中央大楼、莫斯科市委及区委的办公大楼、列宁格勒市委和党的其他机关也都被查封。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声明,决定把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除出党,同时表示反对掀起反共

歇斯底里。

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说,他已无法继续行使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权,并辞去这一职务,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作出了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兵及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他还宣布将苏共的财产交给苏维埃保管。

8月25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法令,宣布苏共和俄共的全部财产归俄罗斯国有。

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请求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准许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中央全会或采取其他组织措施,讨论党今后的命运问题。但未见答复。

随着苏共在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的党组织被取消,苏共的办公楼和财产被全部没收,档案被接管。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有些停止活动或宣布解散,有些宣布脱离苏共另立新党。原来的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

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沿革及成员变动

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1898.3—1903.8)

中 央 委 员 会	中 央 机 关 报 编 辑 部	备 注
1898年3月选出中央委员： 拉德琴科、艾杰尔曼、克列美尔。	1900年12月选出编辑部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列宁。 6—7月增补克拉西科夫为编辑部成员。	未设候补中央委员。3名中央委员当选不久后被捕。

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03.8—1905.5)

中 央 委 员 会	中 央 机 关 报 编 辑 部	党的总委员会	备 注
1903年8月选出中央委员：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特拉温斯基)、林格尼克(瓦西里耶夫)、诺斯科夫。	1903年8月选出编辑部成员：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	1903年8月选出党的总委员会成员：普列汉诺夫(主席)，中央委员会代表林格尼克(另1人姓名不详)，中央机关报代表列宁、加利佩林。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具有同等地位；党的总委员会具有监察机关职能。马尔托夫拒绝就任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并拒绝参加党的总委员会。
1903年9月补选中央委员： 古萨罗夫、泽姆利亚奇卡、克拉辛、埃森。			1903年11月列宁辞去在中央机关报和党的总委员会的职务，不久后代表中央委员会重新参加党的总委员会。

1903年11月补选中央委员： 列宁、加利佩林。	1903年11月增补 编辑部成员：马尔托 夫、阿克雪里罗得、查 苏利奇、波特列索夫。	1903年11月改组后党的 总委员会成员有普列汉诺夫、马 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列宁、林 格尼克。	列宁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 部，但代表中央委员会继续参加 党的总委员会。
1904年上半年中央委员仅 剩：克拉辛、诺斯科夫、加利佩林、 列宁。			林格尼克、埃森被捕；古萨 罗夫离职；泽姆利亚奇卡被开 除中央；克尔日札诺夫斯基退 出中央。
1904年下半年补选中央委员： 柳比莫夫、卡尔波夫、杜勃洛文斯 基，同年底又补选亚历山大罗娃、克 罗马赫尔、罗扎诺夫为中央委员。		党的总委员会将列宁开除 出中央委员会。	1904年8月，列宁、泽姆利 亚奇卡、波格丹诺夫、利亚多夫、 古谢夫、利特维诺夫、鲁缅采夫成 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1905年初中央委员仅剩：克拉 辛、柳比莫夫。			其余均被捕。

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1905.5—1906.5)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1905年5月选出中央委员：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波 斯托洛大斯基、李可夫；候补中央委员：埃森、鲁缅采夫、古谢 夫。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改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列宁被任命为中央机 关报主编和中央委员会驻外代表。党的总委员会被撤销。此届中央 委员会由布尔什维克单独组成。
1905年底重组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中央委员 有克拉辛、拉拉扬茨、萨梅尔。	这是与孟什维克共同组成的联合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派的 成员姓名不详。

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1906.5—1907.5)

中 央 委 员 会	中 央 机 关 报 编 辑 部	备 注
1906年5月选出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派——罗扎诺夫、戈利德曼、拉德琴柯、克罗斯赫马利、巴赫梅捷也夫、柯洛柯利尼柯夫、欣丘克。布尔什维克派——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克拉辛、李可夫。	1906年5月选出成员：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马斯洛夫、唐恩、波特列索夫。	恢复中央委员会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两个中心的设置；中央委员李可夫后被捕，由波格丹诺夫继任。
1906年7月以后增补中央委员：瓦尔斯基、捷尔任斯基、达尼舍夫斯基、阿勃拉莫维奇、克列美尔。		

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1907.5—1917.7)

中 央 委 员 会 (布 尔 什 维 克 与 孟 什 维 克 联 合 组 成)	中 央 机 关 报 编 辑 部	备 注
1907年5月选出中央委员：杜勃洛文斯基、戈利德曼、罗日柯夫、泰奥多罗夫、诺根、马尔丁诺夫、若尔达尼娅、伊苏夫、尼基弗尔、瓦尔斯基、捷尔任斯基、达尼舍夫斯基、戈尔登贝格（另有一人姓名不详）。候补中央委员：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尚切尔、萨麦尔、列伊捷津、塔拉图塔、斯米尔诺夫。后又增补3名中央委员（姓名不详）		中央委员会成立五人核心组，成员有梅会科夫斯基、马列茨基、雅科夫和另外两人（姓名不详）。中央委员会设俄国常务局作为党在国内的领导中心，由杜勃洛文斯基、戈尔登贝格、诺根、若尔达尼娅、拉米什维利组

和若干候补中央委员(姓名不详)。		成。布尔什维克另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15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心。
1910年1月重新选出中央委员：诺根、戈利坚别尔格、马尔丁诺夫、阿勃拉莫维奇(列伊恩)、利巴夫斯基,另外2人姓名不详。	同时选出新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马尔托夫、唐恩、瓦尔斯基。	新中央委员会包括俄国局和国外局两部分。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中心解散。
1910年4月中央委员会7人中有6人被捕。中央俄国局大多数成员也被捕。	马尔托夫、唐恩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此时,中央委员会权力转到国外局。
1911年9月29日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奥尔忠尼启则、什瓦尔茨曼、邵武勉、斯潘达梁、索柯林。		组织委员会实际上起了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1912年1月选出中央委员：列宁、哥洛舍金、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季诺维也夫、什瓦尔茨曼、马利诺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加里宁、斯塔索娃、邵武勉。别洛斯托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不久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12年1月选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马林诺夫斯基后被揭发出是沙皇暗探。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为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哥洛舍金、斯大林、斯塔索娃等。
1913年绍特补选为中央委员。		
1914年后几乎所有中央委员被捕,陆续增补的中央委员有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普略施尼柯夫。		此时,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起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成员先后有扎列日斯基、弗金、奥西波

夫、普略施尼柯夫、叶列梅也夫、林纳也夫、扎鲁茨基、莫洛托夫等。		
1917年4月重新选出中央委员：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柳亭、诺根、斯米尔加、费多罗夫；候补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布勃诺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普拉夫丁。	1917年3月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为：奥列明斯基、加里宁、叶列梅也夫、莫洛托夫。后改组，成员为：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	1917年3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为：扎鲁茨基、莫洛托夫、施略普尼柯夫、叶列梅也夫、扎列日斯基、施维德奇柯夫、加里宁、舒特柯、哈哈列夫、奥列尚斯基、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

第六——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1917.8—1918.3)

中 央 委 员 会	中 央 书 记 处	备 注
1917年8月选出中央委员：列宁、布勃诺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邵勉武、托洛茨基、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克列斯廷斯基、斯米尔加、别尔津、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米柳亭、穆拉诺夫、诺根、李可夫；候补中央委员：斯塔索娃、越飞、基谢廖夫、查帕里泽、洛莫夫(奥波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柯	1917年8月选出中央书记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穆拉诺夫、越飞、斯塔索娃。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地位降低，1917年12月布哈林成为《真理报》主编。中央书记处成为重要工作机构。斯维尔德洛夫事实上是第一书记。斯塔索娃、洛莫夫、越飞很快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雷普尼克、雅科夫列娃，另有2人姓名不详。

1917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	1917年10月成立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成员为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1917年11月加米涅夫与列宁等人发生分歧后，退出中央委员会。
---	--

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1918.3—1919.3)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1918年3月选出中央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斯米尔加、斯塔索娃、拉舍维奇、施米特、捷尔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候补中央委员：越飞、基谢廖夫、别尔津、文特耳、乌里茨基、斯图奇卡、彼得罗夫斯基、洛莫夫、施略普尼柯夫。	1919年1—2月间，成立了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组织局，另外成立了由1名责任书记、1名中央组织局成员和5名技术书记组成的书记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书记处领导人。三个机构地位平等。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3月逝世。

第八——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1919.3—1920.4)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1919年3月选出中央委员：别洛鲍罗多夫、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叶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穆拉诺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	同时，选出中央检查委员会，由3人组成：库尔斯基、卢那察斯基、齐夫

基、谢列布利雅柯夫、斯米尔加、斯大林、斯塔索娃、斯图奇卡、托姆斯基、托洛茨基； 候补中央委员：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布勃诺夫、弗拉基米尔斯基、达尼舍夫斯基、 米茨克维奇、斯米尔诺夫、施米特、雅罗斯拉夫斯基。				齐瓦泽。			
政	治	局	组	织	局	备	注
1919年3月25日选出政治局委 员：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托 洛茨基、斯大林；候补委员：布哈林、季 诺维也夫、加里宁。			同时，选出组织局委员：别洛鲍罗多夫、 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 塔索娃；补候委员：穆拉诺夫。			斯塔索娃同时任中央责任书记。托 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说，1919年 政治局委员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 加米涅夫、布哈林。	
						1920年3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谢列布利雅柯夫进入书记处。	

第九——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1920.4—1921.3)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1920年4月选出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谢列布利雅柯夫、斯米尔诺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候补中央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米柳亭、斯图奇卡、诺根、古谢夫、皮亚特尼茨基、别洛鲍罗多夫、扎鲁茨基、莫洛托夫、斯米尔加。			同时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人组成。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20年4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克列	1920年4月选出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利雅柯夫。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说政治局委员此时为7人，即1919年的5	

斯廷斯基；候补委员：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人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利雅柯夫。组织局由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雅柯夫、李可夫、斯大林等5人组成。
--------------------------	---

第十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1921.3—1922.4)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1921年3月选出中央委员：列宁、拉狄克、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斯大林、李可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捷尔任斯基、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柯马罗夫、库图佐夫、施略普尼柯夫、彼得罗夫斯基、童图尔、伏龙芝、伏罗希洛夫、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基谢廖夫、奥新斯基、基洛夫、古比雪夫等15人。				同时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索尔茨等7人组成。
政 治 局	组 织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21年3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布哈林。	同时选出组织局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托姆斯基；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莫洛托夫(责任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	同时选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为诺根。	

第十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1922.4—1923.4)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p>1922年4月选出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布哈林、伏罗布洛夫、捷尔任斯基、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科罗特柯夫、古比雪夫、列宁、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伏龙芝、楚巴尔、雅罗斯拉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巴达也夫、古谢夫、基洛夫、柯马罗夫、基谢廖夫、克里沃夫、列别季、列普谢、洛鲍夫、曼努伊尔斯基、米哈伊洛夫、米高扬、拉希姆巴也夫、皮达可夫、萨发罗夫、斯米尔加、苏利莫夫、施米特。</p>	<p>同时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瓦连佐娃、科罗斯杰洛夫、索尔茨、钦佐夫、什基里亚托夫；候补委员：穆拉诺夫、萨莫伊洛夫。中央检查委员会撤销。</p> <p>新一届中国中央全会决定仍按惯例不设主席，书记为中央唯一负责人。</p>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p>1922年4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候补委员：布哈林、莫洛托夫、加里宁。</p>	<p>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古比雪夫。</p>
备 注	备 注
	<p>斯大林同时成为中央组织局主席。</p>

第十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23.4—1924.5)

中 央 委 员 会	备 注
<p>1923年4月选出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布哈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叶夫多基莫夫、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扎鲁茨基、加里宁、库勃雅克、基洛夫、科罗特柯夫、柯马罗夫、克维林格、加米涅夫、列宁、拉舍维奇、曼努伊尔斯基、米哈伊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皮达可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斯大林、苏利莫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诺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乌格拉诺夫、乌汉诺夫、伏龙芝、哈里托诺夫、楚巴尔、瞿鲁巴；补候委员：巴达也夫、布勃诺夫、卡冈诺维奇、柯洛季诺夫、柯秀尔、列普塞、列别季、莫斯克文、米雅斯尼柯夫、莫罗佐夫、纳里曼诺夫、奥拉赫施维利、鲁绍采夫、雷斯库洛夫、斯克雷普尼克、乌雷瓦也夫、楚多夫。</p>	<p>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到60人，其中候补委员10人。</p>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p>1923年4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候补委员：加里宁、布哈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p>	<p>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鲁祖塔克。</p>
备 注	备 注
	<p>同时选出组织局成员，姓名不详。 1923年10月布哈林进入组织局。1924年4月列宁去世。</p>

第十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1924.5—1925.12)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24年6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索柯里柯夫、伏龙芝。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泽林斯基。	选出中央委员53人，候补中央委员34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1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3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时任组织局成员。1925年伏龙芝去世。此时，中央委员会实际作用下降。

第十四——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1926.1—1927.12)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26年1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候补委员：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乌克拉诺夫、加米涅夫。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乌克拉诺夫、柯秀尔、叶甫多基莫夫；候补书记：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	选出中央委员63人，候补委员43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63人，古比雪夫为主席；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7人。当选的组织局成员11人，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乌克拉诺夫、柯秀尔等；候补委员5人。当选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5人组成：季诺维也夫

1926年7月解除季诺维也夫政治局委员职务,补选鲁祖塔克为委员。补选候补委员安德烈也夫、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为候补委员。	(团长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另有候补团员5人。1926年捷尔任斯基去世。奥尔忠尼启则1926年11月改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越飞在此前自杀。布哈林接替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任政治书记。
1926年10月解除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职务,补选古比雪夫为政治局委员。	
1926年11月解除奥尔忠尼启则政治局委员职务,补选楚巴尔为政治局委员。	

第十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1927.12—1930.6)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27年12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候补委员:彼得罗夫斯基、乌克拉诺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楚巴尔、柯秀尔。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莫洛托夫、乌克拉诺夫、柯秀尔、库别克;候补书记:莫斯克文、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	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委员50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9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萨普龙诺夫、加米涅夫等98人被开除出党。组织局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乌克拉诺夫、柯秀尔、库别克、莫斯克文、布勃诺夫、阿尔丘希娜、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斯米尔诺夫、鲁希莫维奇、利莫夫。
1929年4月乌克拉诺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补选鲍曼为候补委员。 1929年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1929年4月乌克拉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补选鲍曼为中央书记。	

第十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1930.7—1934.2)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30年7月选出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基洛夫、李可夫、柯秀尔、古比雪夫、鲁祖塔克；候补委员：米高扬、楚巴尔、彼得罗夫斯基、安德烈耶夫、瑟尔佐夫；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总书记）、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波斯蒂舍夫、鲍曼；候补书记：莫斯克文、什维尔尼克。	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委员6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87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3人。莫洛托夫等人选入组织部。安德烈耶夫于1930年12月就任中央监委主席。莫洛托夫不再担任组织部委员。鲁祖塔克1933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托姆斯基没能进入政治局，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0年12月李可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瑟尔佐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安德烈耶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奥尔忠尼则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1930年12月莫洛托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改任他职）。	安德烈耶夫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32年2月鲁祖塔克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安德烈耶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鲁祖塔克再次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第十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期间(1934.2—1939.3)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34年2月选出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德烈耶夫、柯秀尔；候补委员：米高扬、楚巴尔、彼得罗夫斯基、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基洛夫、日丹诺夫。	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委员68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61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22人。斯大林从此改称为书记。叶若夫、日丹诺夫等人为组织局成员。卡冈诺维奇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叶若夫同时为中央监委副主席。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1935年1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控参与此案，分别被判5年和10年徒刑。
1935年2月补选米高扬、楚巴尔为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埃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2月叶若夫被任命为中央书记。	1935年1月古比雪夫去世。1935年12月，叶若夫同时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36年8月托姆斯基自杀。 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被判死刑。
1937年10月补选叶若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7年1月皮达可夫、拉狄克等13人被判死刑。2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
1938年1月解除波斯蒂舍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补选赫鲁晓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8年3月，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3人被处死。
		1937—1938年间，柯秀尔、楚巴尔、鲁祖塔克相继被解职、处死。

第十八——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1939.3—1952.10)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39年3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 候补委员：贝利亚、什维尔尼克。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斯大林。	选出中央委员71人，候补中央委员68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50人。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地位下降。 组织局成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马林科夫、日丹诺夫、梅科斯、米哈伊洛夫、谢尔巴科夫。 1939年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死于集中营。1940年埃森、叶若夫被枪毙。
1941年2月补选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46年3月补选柯西金、布尔加宁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为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因病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	1946年补选库兹涅佐夫任中央书记，免去马林科夫中央书记职务。	1945年谢尔巴科夫去世。1946年加里宁去世。
1947年2月补选沃兹涅先斯基为政治局委员。	1947年，苏斯洛夫任中央书记。	
1948年2月柯西金、布尔加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48年7月马林科夫重新进入书记处。	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
1949年初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1949年初解除库兹涅佐夫中央书记职务。1949年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	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因牵涉“列宁格勒案件”而被处决。

第十九——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1952.10—1956.2)

主 席 团	书 记 处	备 注
1952年10月选出主席团成员：斯大林、马林科夫、安德里亚诺夫、马利歌夫、阿里斯托夫、麦尔尼科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米哈伊洛夫、伊格纳切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科罗特钦科、波诺马连科、库兹涅佐夫、萨布罗夫、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契斯诺科夫、施里亚托夫、贝利亚，候补成员：勃列日涅夫、巴托里切夫、维辛斯基、别哥夫、兹维列夫、普扎诺夫、卡巴诺夫、捷沃西安、柯西金、尤金、伊格纳托夫。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斯大林、米哈伊洛夫、阿里斯托夫、别哥夫、勃列日涅夫、波诺马连科、伊格纳托夫、苏斯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	选出中央委员125人，候补委员110人。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主席团。施里亚托夫被批准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摩斯卡托夫被选举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1953年3月主席团改组，成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候补成员：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麦尔尼科夫、巴吉罗夫。	1953年3月增补中央书记：伊格纳切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解除勃列日涅夫的中央书记职务。 不久中央书记处改组，中央书记为：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1953年5—6月间解除麦尔尼科夫主席团候补成员职务，补选基里钦科为候补成员。	林、伊格纳切夫。 1953年4月解除伊格纳切夫中央书记职务。 1953年9月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	1953年7月贝利亚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被处决。 巴吉罗夫于1953年或1954年被捕。
1955年7月补选：基里钦科、苏斯洛夫为主席团委员。	1955年7月补选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谢皮洛夫为中央书记。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1956.2—1961.10)

主席团	书记处	备注
1956年2月选出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候补成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诺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第一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波斯别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 1956年12月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书记职务(另任它职)。	选出中央委员133人，候补中央委员122人。

1957年2月选举科兹洛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57年2月重新选举谢皮洛夫为中央书记。	
1957年6月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的主席团成员职务,解除谢皮洛夫的主席团候补成员职务,别尔乌辛由主席团成员降为候补成员,增选库西宁、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斯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为主席团成员,增补波斯别洛夫、基里钦科、马祖罗夫、科罗特钦科、柯西金、姆日阿瓦纳泽为候补成员。	1957年6月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书记职务。选举库西宁为中央书记。	同时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的中央委员职务。主席团成员由11人增至15人,候补成员增至9人。
1957年10月解除朱可夫的主席团成员职务。		同时解除朱可夫中央委员职务。
1957年12月补选穆希金诺夫为主席团成员。	1957年12月补选伊格纳托夫、基里钦科、穆希金诺夫为中央书记。	
1958年6月补选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58年9月解除布尔加宁的主席团成员职务。	同时解除布尔加宁的中央委员职务。
	1958年11月解除别利亚耶夫的中央书记职务(另任他职)。此时中央书记为: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伊格纳托夫、穆希金诺夫、波斯彼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
1960年5月补选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为主席团成员。解除基里科、别利亚耶夫的主席团成员职务(另任他职)。	1960年5月解除阿里斯托夫、伊格纳托夫、波斯彼洛夫、福尔采娃中央书记职务;补选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为中央书记。
1960年7月解除伏罗希洛夫主席团成员职务。	1960年7月解除勃列日涅夫中央书记职务(另任他职)。
1961年1月增补沃罗诺夫、格里申为主席团候补委员。	

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61.10—1966.4)

主席团	书记处	备注
1961年10月选出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候补成员:格里申、拉希多夫、马祖罗夫、姆日阿瓦纳泽、谢尔比茨基。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科兹洛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库西宁、波诺马廖夫、斯皮里多诺夫、苏斯洛夫、谢列平。	选出中央委员175人,候补委员155人。选举什维尔尼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尔久克为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选举穆拉维耶娃为主席。设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为赫鲁晓夫,第一副主席为沃罗诺

			夫,副主席为洛马科,委员有阿布拉莫夫、叶弗列莫夫、基里连科、奥尔加诺夫、波利扬斯基、罗曼诺夫、丘拉耶夫、雅斯诺夫。
1962年4月选举基里连科为主席团成员。	1962年4月解除斯皮里多诺夫的中央书记职务。	1962年11月选举叶弗列莫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62年11月选举叶弗列莫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62年11月选举叶弗列莫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62年11月,选举鲁达柯夫、波利雅科夫、安德罗波夫、季托夫为中央书记。		
1963年12月解除谢尔比茨基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增选谢列斯特为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3年6月增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为中央书记。		
			1964年5月库西宁去世。
1964年10月解除赫鲁晓夫主席团委员职务。	同时解除赫鲁晓夫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也被解除,宣告退休。

1964年11月增选谢列斯特、谢列平为主席团成员，杰米契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解除科兹洛夫的主席团成员职务。	1964年11月解除科兹洛夫、波利雅科夫的中央书记职务；补选库拉科夫为中央书记。	
1965年3月马祖罗夫晋升为主席团成员，增选乌斯季诺夫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65年3月增选乌斯季诺夫为中央书记；解除伊利切夫中央书记职务。	1965年1月科兹洛夫去世。
1965年9月增选库拉科夫为主席团成员。	1965年9月解除季托夫中央书记职务，增选库拉科夫为中央书记。	
1965年12月增选谢尔比茨基为主席团候补成员。	1965年12月增选卡皮托诺夫为中央书记。	

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1966.4—1971.4)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66年4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	同时选出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卡皮托诺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鲁	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65人。选举佩尔谢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选举西佐夫为党的检查委员会

格夫、谢列平、谢列斯特；候补委员：格里申、杰米契夫、库纳耶夫、马谢罗夫、姆日阿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	达柯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谢列平。 1966年12月补选索洛缅采夫为中央书记。	主席，恢复中央政治局，取消主席团设置。 1966年3月鲁达柯夫去世。
1967年6月补选安德罗波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7年6月解除安德罗波夫中央书记职务。	
	1967年9月解除谢列平的中央书记职务(另任他职)。	
	1968年4月卡图谢夫当选为中央书记。	

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1971.4—1976.3)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71年4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沃罗佐夫、格里申、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候补委员：安	同时选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杰米契夫、卡皮托诺夫、卡图谢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	选出中央委员241人，候补中央委员155人，选举佩尔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西佐夫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德罗波夫、杰米契夫、马谢罗夫、姆口阿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			
1971年11月补选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1年11月解除索洛缅采夫的中央书记职务。		
1972年5月补选波诺马廖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2年12月解除姆口阿瓦纳泽政治局委员职务。	1972年12月补选多尔基赫为中央书记。		
1973年4月解除谢列斯特、沃罗诺夫政治局委员职务。安德罗波夫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增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为政治局委员。增选罗曼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4年解除杰米契夫中央书记职务。		
1975年4月解除谢列平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1976.3—1981.3)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76年3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格列奇科、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罗曼诺夫、苏斯洛夫、乌斯诺夫、谢尔比茨基。候补委员：阿利耶夫、杰米契夫、马谢罗夫、波诺马廖夫、拉希多夫、索洛缅采夫。	同时选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诺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多尔赫赫、卡图谢夫、齐米亚京、契尔年科。	选出中央委员 287 名，候补委员 139 名；批准佩尔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西佐夫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1976 年 4 月格列奇科去世。
1977 年 5 月解除波德戈尔内内政治局委员职务，1977 年 10 月补选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7 年 5 月解除卡图谢夫中央书记职务，补选鲁萨科夫为中央书记。	
1978 年 11 月解除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补选吉洪诺夫、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契尔年科为政治局委员。	1978 年 11 月补选戈尔巴乔夫为中央书记。	1978 年 7 月库拉科夫去世。

1979年11月补选戈尔巴乔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0年10月解除柯西金政治局委员职务。		柯西金宣告退休,不久后病逝。

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1981.3—1986.2)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81年3月选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库纳耶夫、佩尔谢、罗曼诺夫、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谢尔比茨基;候补委员:阿利耶夫、杰米契夫、基谢廖夫、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拉希多夫、索洛缅采夫、谢瓦尔德纳泽。	1981年3月选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书记: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多尔基赫、齐米里亚京、鲁萨科夫。	选出中央委员319人,候补委员151人。批准佩尔谢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82年5月补选安德罗波夫为中央书记。	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
	1982年11月10日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补选雷日科夫为中央书记。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

1982年11月解除基里连科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2年11月解除基里连科的中央书记职务。	基里连科宣告退休。
1983年12月选举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4年2月选举契尔年科为中央总书记。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
	1985年3月11月选举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	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1985年4月切布里科夫晋升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索科洛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5年4月增选尼克诺夫为中央书记。	
1985年7月解除罗曼诺夫政治局委员职务，谢瓦尔德纳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5年7月解除罗曼诺夫中央书记职务。增选叶利钦、扎伊科夫为中央书记。	罗曼诺夫宣告退休。
1985年10月解除吉洪诺夫政治局委员职务；增选塔雷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5年10月解除雷日科夫中央书记职务。	吉洪诺夫宣告退休，雷日科夫接任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986年2月增选叶利钦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格里申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6年2月解除叶利钦中央书记职务；解除鲁萨科夫中央书记职务。	格里申宣告退休。叶利钦已于1985年12月接替格里申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	----------------------------------	--

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期间(1986.2—1990.7)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86年2月选出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索洛维采夫、雷日科夫；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	同时选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书记：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京、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选出中央委员307人，候补中央委员170人。选举索洛维采夫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86年12月解除库纳耶夫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宣告退休。
1987年1月解除库纳耶夫政治局委员职务；增选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月解除齐米京中央书记职务，增选斯柳尼科夫、卢基扬诺夫为中央书记。	
1987年6月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索科洛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亚佐夫当选为政治局候		1987年6月库纳耶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

补委员；尼科诺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87年10月解除阿利耶夫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7年11月解除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由扎伊科夫接任。		
1988年2月增选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88年2月补选巴克拉诺夫为中央书记。		
1988年9月解除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政治局委员职务；解除多尔基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选举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弗拉索夫、比留可娃和卢基扬诺娃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8年9月解除多勃雷宁中央书记职务；选举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		同时解除索洛缅采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普戈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多勃雷宁、多尔基赫等人宣布退休。 同时成立六个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党和国家事务，即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斯柳尼科夫）；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为梅德韦杰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为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为雅科夫列夫）；法制政策委员会（主席为切布里科夫）。
			1989年4月，葛罗米柯、杰米契夫等110人辞去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职务。
1989年9月增选克留奇科夫为政治局委员；马斯柳科夫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普里马科夫、普戈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尼科诺夫、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9年9月增选马纳延科夫、斯特罗耶夫、乌斯曼诺夫、吉连科为中央书记；解除尼科诺夫、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职务。		同时，索洛维约夫、塔雷津、谢尔比茨基、切布里科夫宣布退休。 1989年11月扎伊科夫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另有他任），普罗科菲耶夫继任。

1989年12月增选伊瓦什科为政治局委员。	1989年12月增选弗罗洛夫为中央书记。	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戈尔巴乔夫任主席。
		1990年6月作为苏共组成部分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成立。波洛兹科夫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1990.7—1991.8)

政 治 局	书 记 处	备 注
1990年7月选出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布罗基亚维丘斯、贡巴利泽、古连科、扎索霍夫、伊瓦什科、卡里莫夫、卢钦斯基、马萨利耶夫、马赫卡莫夫、莫夫西相、穆塔利博夫、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波洛兹科夫、普罗科菲耶夫、鲁比斯克、谢苗诺娃、西拉里、索科洛夫、斯特罗耶夫、弗罗洛夫、舍宁、亚纳耶夫。	1990年7月选出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副总书记伊瓦什科,书记巴克拉诺夫、吉达斯波夫、吉连科、扎索霍夫、库普佐夫、马纳延科夫、谢苗诺娃、斯特罗耶夫、法林、舍宁、亚纳耶夫;书记处成员阿列克金、盖沃龙斯基、梅利尼科夫、捷普列尼切夫、图尔古诺娃。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412人,候补中央委员设置取消。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65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副总书记、中央监委主席均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为普戈。利加乔夫竞选副总书记职务失败。中央政治局24人,其中15人为各共和国苏共党组织第一把手。取消政治局候补委员设置。增加中央书记处成员设置,书记处成员为各民主党派代表。叶利钦等人在大会期间宣布退出苏共。
1990年12月11日解除索科洛夫、莫夫西相的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马洛费夫、波戈相为政治局委员。		

1991年1月解除贡巴利泽政治局委员职务；解除亚纳耶夫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阿努斯为政治局委员。	1991年1月解除亚纳耶夫中央书记职务；增补卢钦斯基为中央书记。	亚纳耶夫已出任副总统职务。贡巴利泽已脱离党的活动。
1991年4月解除马萨利耶夫政治局委员职务，补选阿曼巴耶夫、叶列梅依、苏尔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1991年4月巴克拉诺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另有他任）。	1991年3月成立苏共全军党委，苏尔科夫任书记。1991年7月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退出苏共。1991年7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非党化命令。苏共和俄共领导机构予以谴责。苏共和俄共某些基层组织宣布解散。1991年8月俄联邦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波洛兹科夫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库普佐夫任中央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第二书记。鲁茨科伊等人在党内建党被谴责为分裂并被开除出俄共和苏共。1991年8月阿利耶夫宣布退出苏共。
		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于8月22日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同时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说明：

①由于资料原因，苏共代表大会期间领导机构及人员调整情况此表可能有疏漏和不详之处。

②苏共历史上,前期阶段的中央委员会作用很大,故在此开列了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后期阶段(列宁逝世后)作用更大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故只列出政治局与书记处的构成与变化。

③关于苏联国家和行政领导机构及人员的变动在本表中一般不予反映。

④人名排列顺序基本上依据于所见资料原文,有的按俄文字母,有的按选票,还有些是编者根据不同资料编辑的,故名单排列不完全反映其党内地位。

⑤括弧内的人名为化名或曾用名。